剑桥（下）

美国对外关系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Warren I. Cohen, Editor

【美】孔华润（沃沦·I. 科恩）主编

第三卷　美国的全球化进程 (1913-1945)

第四卷　苏联强权时期的美国 (1945-1991)

新华出版社

《美国的全球化进程》一书，对一个纷繁复杂的时期作了出色的概括。作者以其大家手笔，清楚地阐明了美国在欧亚地区获得主导地位的过程。本书的特点是：透彻、睿智、独到。

——*欧内斯特·R. 梅，哈佛大学*

入江昭的著作对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曾经深受其影响的那个时期作了条理清晰、极有洞见的概述。

——*蒂莫西·纳弗塔利，《波士顿书评》*

《苏联强权时期的美国》以最新学术成果为基础的概述，简洁明了，可读性极强。此书对美国的政策持同情态度，但绝非不加批判地一概认同。讨论的重点既包括欧洲，也包括亚洲，相信这也是读者所乐于接受的。

——*戴维·雷诺兹，剑桥大学*

在综合历史文献、汲取政治经济学家的思想以及阐释苏联强权时期美国政府官员的观点等方面，孔华润《苏联强权时期的美国》所做的工作极为出色。

——*梅尔文·莱弗勒，弗吉尼亚大学*

剑桥大学最新推出的这四本书，是对自革命时期至1991年的美国外交史的权威评述。四位作者均为公认的对有关时期研究有素的行家。这几本书的内容远不限于一般性的概括。每一位作者对大量历史研究成果的解读，都将使读者获益匪浅。

——*《图书馆杂志》*

责任编辑　张雪梅
　　　　　汪明丽
封面设计　肖　东

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 下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美】孔华润（沃伦·I. 科恩） 主编

Warren I. Cohen, Editor

第三卷：美国的全球化进程（1913—1945）

◎【美】入江昭／著 ◎张振江 施茵／译

第四卷：苏联强权时期的美国（1945—1991）

◎【美】孔华润（沃伦·I. 科恩）／著 ◎王琛／译

Volume III: The Globalizing of America, 1913-1945 / Akira Iriye

Volume IV: America in the Age of Soviet Power, 1945-1991 / Warren I. Cohen

新华出版社

主编导言

本人编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的主旨，乃是让广大读者得以赏阅历史学界顶尖学者所奉献的鼎乘之作。我并无思想或方法上的先入之见。我期望美国外交史领域的几名一流学者摒弃门户之见，与我共同努力，令我喜出望外的是，我向头三名学者发出的邀请均被一一接受。大约 10 年前，我在构思这个项目时，根本没有想到冷战会突然终结，以致这套书的最后一卷会以一个完整的时代而告终，就像前三卷定好的时限那样。当我写完第四卷时，苏联帝国的崩溃令我惊讶不已，但却使这套书有了一种完整性，而在别的情势下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第一卷由布拉福德·珀金斯教授执笔，他是专攻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美国外交的杰出史家，也是活跃于当今外交史学界的老前辈。珀金斯认为，年轻的共和国的对外政策，乃是物质利益、文化和各种民族价值观的产物。他描述了美国立国之前即已存在的一种美国行为方式，展示了革命以及共和国初期的经历又是如何塑造了这种行为方式。通过对宪法和外交的探讨，他梳理出一条能够贯穿于其他各卷的主线：从华盛顿开始，历届总统都始终如一地力图主导政策，而这与制宪会议参加者的意图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珀金斯执笔的这一卷，书名就预示了其无可回避的主题：在意识形态上信奉行共和主义价值观，矢志不渝地向整个北美大陆

推广这些价值观，扫除一切无论是人类的还是地理的障碍。他认为，美利坚帝国的崛起，乃是源于对土地和资源的贪婪，而不是对其他民族的统治权。然而，正是这种对其他族裔——土著美国人、墨西哥人特别是非洲裔美国人——的统治权，导致了内战及其期间的外交——这是本卷作者讨论的最后一个事件。这本杰作，概述了美国崛起为一个国家并奠定了在19世纪行将结束之际成为世界强国之基础的那些岁月。

第二卷的作者沃尔特·拉夫伯，是外交史学家威斯康星学派最令人尊敬的一员。该学派的成员受教于弗雷德·哈维·哈林顿和威廉·艾普尔曼·威廉斯及其门生，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杀进学术舞台时被贴上了“新左派”的标签。拉夫伯执笔的这一卷，涵盖了19世纪最后1/3时期，并延续到20世纪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执政结束的1913年。他探讨了美国经济力量的增长与扩张主义之间的联系，增加了种族主义的主题，特别是用来分析土著美国人和菲律宾人。令人印象至深的是，他反对美国是在追求秩序这种观念。他指出说，美国人在国外寻找经济和传教活动的机会，而对他们给其他国家带来的混乱状态毫无顾忌之心。中国或墨西哥爆发的一次革命，不过是美国人为越来越多的好处付出的代价，特别是这种代价由当地人所付出时，尤为如此。他的另一个不可回避的主题，是运用外交来扩大总统权。

第三卷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由美国历史学家协会前主席、我们这一代最具创见性的国际关系史学家入江昭执笔。入江昭出生于日本，受教于美国大学，执著于研究权力政治中无处不在的文化冲突与融合，特别是研究美国与东亚国家直面相撞时的境况。入江昭的这一卷，开篇时简略交待了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的不断演变的并由欧洲主导的国际体系。他分析了战争与和平时期的威尔逊主义，以及它是如何运用于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作者对他所说的20世纪20年代的

“文化方面”的讨论，最为突出。入江昭认为，他所写的这个时期构成了“美国的全球化进程”——在这个时期，美国取代欧洲成为世界领袖，并为筹划和维持国际秩序提供了经济和文化资源。他指出，非西方民族觉醒了，他们期待着美国的支持和鼓励。他在终卷时预见说，跟着世界的美国化接踵而来的，将会是麻烦。

我所写的那一卷的许多内容，一如入江昭那样，也集中在美国—东亚关系上。我的朋友迈克尔·韩德将我归入外交史学家“现实主义”学派之列。我同珀金斯、拉夫伯、入江昭、厄内斯特·梅以及诸如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迈克尔·霍根和梅尔文·莱弗勒这些年轻朋友相互交往并受其影响，注重研究美国政策的国内根源，观念、态度和经济考虑的作用，包括传教士在内的非政府组织的影响，以及技术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在这套书的最后一卷《苏联强权时期的美国（1945—1991 年）》中，我还大大借用了从政治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那里汲取的知识。

我那一卷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落幕之际，终于 1991 年苏联的消亡。我写到了美国领导人对于战后世界秩序的设想，指出他们越来越意识到苏联对这个设想构成的威胁。“安全困境”的概念，亦即每一方的防御行动看来都是对另一方的威胁，在我对冷战起源的分析中占据着突出地位。我还强调了两种政治制度的重要作用、美国国家强盛而政府软弱的矛盾处境以及斯大林式政权的隐秘性和残忍性。在这一卷中，我指出了战前殖民帝国纷纷崩溃、亚非拉一系列新近独立国家相继出现以及美苏力图迫使它们加入华盛顿和莫斯科各自设计的国际体系所引起的混乱的重要意义。最后，我叙述了德国和日本作为大国的重新崛起、苏联的分崩离析、美国的发展趋势及其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在世界事务中的游移不定的方向。

无论各个作者处理其研究对象的方式是多么的大异其趣，这

四卷著作均有着许多主题可以遵循。首先，美国矢志不渝地追逐着财富和权势，珀金斯和拉夫伯对此做了生动描述。入江昭展示了美国在历经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崛起为世界领袖之后是如何运用其财富和权势的，我则探讨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这一时期美国作为霸权国家的行为以及它对其统治地位面临的威胁所作的反应。

第二个至关重要的主题，是争夺外交政策的控制权。每一位作者都指出了宪法体制所带来的总统与国会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从1789年至今的各位总统如何力图绕开宪法对其权力的种种限制。民主政府所面临的威胁，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尼克松—基辛格鬼迷心窍地弄出水门事件和里根弄出伊朗门闹剧予以说明。

最后，我们都关注着世界舞台上所见的那种美国特性的构成因素。存在着一种把美国同世界其他地方区分开来的独一无二的美国对外政策吗？我们考察了美国价值观的演变过程，并将其同美国的国际行为进行了对照。此外，我们对美国的全球行动能力对国内秩序的影响不无顾虑，对托马斯·杰斐逊的那个正直而有德行的共和国构想已遭遗忘忧心忡忡，这些对美国人以及美国人宣称“注定领导”的世界来说，都是不祥之兆。

孔华润（沃伦·I. 科恩）

内容提要

本册全面考察了1913年至1945年间的美国对外关系，其中包括伍德罗·威尔逊、沃伦·哈丁、卡尔文·柯立芝、赫伯特·胡佛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等相继的数届总统任期。入江昭教授首先回顾了国际体系历经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的演进，直至欧洲的民族国家成为其主宰，由此带出了他的美国“全球化”的主题框架，因为20世纪前半期目睹了美国接替欧洲成为世界领袖，不仅仅在军事领域，而且还表现在经济和文化的影响方面。

入江昭讨论了美国从中立到最后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转变。美国人确信国内稳定和全球经济发展与相互依存是可以相互替换的议题，都能有助于海内外的和平。颇具讽刺的是，正是这种自负首先将美国推入了欧洲的战争。入江昭解释了美国与欧洲持续不断的贸易往来如何使得美国的中立问题变得愈加复杂，但它同样促使美国崛起为世界经济领头羊，实际上，美国是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债权国。这种经济影响，再加之同样程度的威尔逊主义的精神劝导，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塑造欧洲政治秩序的崭新机会。

入江昭描述了美国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回应，后者是对美国新霸权的一种意识形态性质的挑战。他展示了凡尔赛条约如何部分实现了威尔逊的目标，诸如在种族性的民族主义基础上创建了

新的国家。然而，在此同时，由于对战败的德国施加惩罚性赔款和战罪声明，凡尔赛条约又背叛了和平精神的真谛。

美国资金、技术以及商品在世界市场的渗透为战后的国际秩序提供了经济基础。入江昭谈论了新和平的经济繁荣，描述了世界范围内和平运动所激发的文化和思想领域的国际主义。美国商品和大众文化在海外的广泛流行伴随着精英阶层的交流，共同发展出了一种带有明显美国特色的全球文化秩序。

在一场遍及全球的经济萧条的袭击下，文化国际主义难以阻止国际秩序在30年代的骇人崩溃。这一阶段目睹了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以及集中营的残暴。就涉及范围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远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为全球化，然而，真正卷入所有战场的只有美国：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从北非到东南亚、从中东到南美。从这种意义上讲，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稳步走向全球化篇章的高潮。构建一个更为稳定的国际秩序将成为美国的任务，该秩序既能马上反映出美国的传统价值观，也需响应20世纪的新挑战。在走向全球化发展的整个论述中，入江昭始终在探讨美国作为一个崛起大国的地位和作用。

前　　言

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1913—1945年是一个动荡的年代，期间的美国对外关系已经广为人知，再用详细资料和琐碎情节堆积成一部概览性著作实在没有什么意义。因此，在这一册中，我力图多加分析以突出美国稳步走向全球化的方式方法，也就是分析它是如何卷入世界各地的安全、经济和文化事务之中的。这一现象绝非按照单一的线路发展，对国际事务所造成的后果也不总是一样。然而，如果不去试图理解这些年在美国权势、意志和影响下的外部世界之变化，描述美国对外关系之演变则无异于闭门造车。鉴于此，我决定在此书中大量使用别国的资料，尽管这样一类的著作并不常这样做。

对这一时段国际事务以及美国对外关系的学术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不仅只在美国，其他地区或国家也是一样。本书中所用的书目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十分高兴地看到世界各地的学者们竞相写出了许多摆脱教条主义和沙文主义的重要专著和论文，我借助了他们的劳动成果，并且为这种历史文献的日益国际化而激励，这也是美国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与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弗兰克·史密斯共同创意并发出了编写一套4卷本美国对外关系史的孔华润邀我承担该卷的写作任务，他还耐心细致地阅读了我的手稿，对他以及同样阅读了我的手稿并提出宝贵意见的前两卷作者（布拉福德·珀金斯和沃尔特·拉

夫伯)，我在此深表谢意。在成书的最后阶段，我仔细阅读了罗伯特·戴维·约翰逊和布莱恩·麦克唐纳的文本并从中受益，妻子和两个女儿所营造的温暖活泼的家庭环境同样使我受益。

第三卷

美国的全球化进程

1913-1945

Volume III

The Globalizing of America

Akira Iriye

【美】入江昭／著

张振江　施　茵／译

目　　录

第三卷
美国的全球化进程(1913—1955年)

第四卷

苏联强权时期的美国(1945—1991 年)

第一章　欧洲主宰的年代

西方的崛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世界是由欧洲主宰的。在我们追溯1913年至1945年间的美国对外关系史时，重要的一点是应当认识到美国是在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当中得以建立并从事其对外事务的。这种情况并非历来如此，在18世纪之前，中东的奥斯曼帝国和东亚的中华帝国是国际权势和影响的两个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而欧洲的民族国家在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却一直深陷不间断的战乱。这足以使当时任何一位冷静的观察家都会作出如下预言：这些国家将很快内耗衰竭，而中东和东亚地区（笼统地被称为“亚洲”、“东方”或“东部”）较为统一的帝国则会成为长时间影响世界事务的决定力量。

然而，恰如保罗·肯尼迪等人所指出的，正是这种四分五裂的特性才构成欧洲地区成为主宰国际社会的决定性因素。[①] 因为一直处于持续战争或战争准备的状态，这些民族国家就得发展出一种便于为战争去动员军事力量和征收税率的中央管理机构，它被约翰·布鲁尔称为“权势之腱”（sinews of power）。整个17世纪，欧洲的君主们已经系统地发展出了这一体制，在接下来的

①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纽约，1987年）。

一个世纪中，民族国家间的这种权势争霸成为欧洲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①]“霸权国家”、“均势”和“国家理性”等概念逐步成为指导国家内外政策都应服务于增强本国相对实力的辩辞。

尽管这种对抗将欧洲变成了四分五裂的竞争单位，但它同时也起到了增强该地区综合实力的效果，特别是相对于其他地区统一但缺乏军事导向的帝国。因为成功的战争需要有效的战略和先进的军事设备，因而也就毫不奇怪为什么欧洲的战争是与其科学、技术以及战略的迅猛发展齐头并进。到了18世纪末，欧洲陆军和海军的装备已经远比中东和东亚国家的军队更为精良。

但是，仅此单一的因素并不能确保欧洲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正如威廉姆·麦克尼尔所注意到的，追逐霸权最终将浪费国家的资源。[②] 如果17和18世纪西班牙、荷兰共和国以及法国权势的崛起是其相对军事优势和一系列成功战争的结果，那么这也同样导致了它们资源的耗竭和国内舆论的分化，从而也削弱了增加一国权势所必须的国家内部团结。当18世纪70至80年代与美洲殖民地兵戎相见时，同样的命运也落到了欧洲霸权舞台上的后来者——大不列颠的头上。

真正拯救并使得欧洲主导地位不朽的两个因素是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它们在18世纪就开始崭露头角。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两种因素相互携手，共同促成了摆脱传统羁绊的近现代理性思想的萌生，从而导致生产成倍增长，首先将英国、接着将其他国家变成了全世界的生产车间。

在经济方面，应当注意到的是直至1800年，中国的产出一直占据世界榜首。[③] 但是，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的工业革命来到

① 约翰·布鲁尔：《强权之腱》（纽约，1989年）。

② 威廉姆·麦克尼尔：《追求强权》（芝加哥，1984年）。

③ 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149页。

了英国，将这个岛国变成了全世界纺织品的生产中心，高效产出由此也价格低廉的棉纱和纤维开始充斥全球各地，为英国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和船运收益。随着工厂就业人数的增加以及连接城乡铁路的修建，整个国家的人口组成发生了相应变化：不但整个人口数量快速增加，而且还产生了新的阶层。供求规则比以往任何时候在全球范围内得到重视，海外的棉花、食品以及其他原材料都被发掘，因而销售成品的国内市场也由此被开发起来。英国财富的增加也惠及其他欧洲国家，它们可以向人口增加并日益富有的英国人出售更多的产品，而挣回的英国资金又可用于改进自身的经济体制。这一切导致整个欧洲经济地位的迅速改善，并很快赶上和超过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

在文化方面，强调理性的启蒙思想与英国早期的自由主义传统相结合，共同产生了典型的 18 世纪历史进步观：人有无限的发展潜力，其中隐含着人权与自由的观念。就集体而言，各类人群都被赋予不可剥夺的公民权，在法律面前平等；而对于个体，每一个人都天生拥有追求物质享受和精神满足的权力。这些观念使得个人与诸如教会和国家等更大的实体对立起来，由此在个人意识与宗教、更严重的是在公民与国家之间产生了冲突，这些冲突将成为 18 世纪欧洲思想的一个重要主题。

回到本文文首的观察，注意到美国诞生的世界舞台是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所塑造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为这一年轻国家的内政外交提供了起点。首先，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之本身就得益于欧洲的军事角逐，特别是英法两国的霸权斗争。其次，这种背景也使得国父们顺理成章地认为如果要维护自己的独立，就得准备战争，这当然是指必备一支军事力量和一个支持并管理该军事力量的行政机构。此外，国家实力的加强也只有通过领土扩张和消灭毗邻的潜在威胁。上述所有这些都成为通过 1787 年宪法正式组成的美国政府的追求目标。

在经济活动方面，整个美国也都不过是欧洲发展的一部分，除了得不到英帝国的军火以及被排挤出西印度群岛市场之外，美国人就像作为英国殖民地时一样在其他领域继续自己的经济活动，他们生产食品、在海外出售剩余产品、向海外派出船只并从事各种转口贸易等等。与英格兰的工业革命相并行，独立进一步促进了这些活动，因为外部对美国小麦、鱼类、木材以及其他初级产品的需求大量增加，其转口贸易范围遍及北非、印度洋和东亚。除了新的合众国公民这一政治身份外，他们的经济活动与欧洲国家别无二致，实际上，他们完全是由西方发起的全球经济渗透的一部分。

在文化领域，美国既是英国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的结果，也是本土环境的产物。可以肯定，美国人从一开始就拥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认为自己是没有受到旧世界熏染的新世界公民和例外的人群。实际上，向旧世界传统造反同样也是一种欧洲现象，并可上溯至宗教改革（the Reformation）和早期近代思潮，所以，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只不过是这种欧洲现象的部分发展和延伸。共和主义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是一种强调集团的意识形态，该集团由一群有美德的公民组成并被冠以特别关注公共福利，即便他们是在为自己谋私利。这种思潮在英格兰由来已久，却被美国领导人郑重接受，他们坚信它能够在新世界付诸实施，而拥有肥沃土壤和广袤的平等自然环境的美洲大陆也似乎适合进行这种实验，正如詹姆斯·麦迪逊的最好概括：共和主义具有在新大陆生根发芽的难得机会，因为这里的人口成倍增加，但却没有发生权力与财富集中的现象，相反，生活在一种节俭富裕当中的人们反而更加珍惜自己的自由。[1] 很明显，这些观念都源于欧洲背景，从西方之外的角度来看，它们不是欧洲思想

① 德鲁·麦克伊：《不可捉摸的共和国》（查佩尔希尔，1988年）。

的背离，而是欧洲思想的发展和升华。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又是独一无二的，或者至少可以说是与18世纪末期的欧洲有着重大的不同，那就是在没有封建主义、既定教堂、君主体制以及其他既得利益阶层的情况下，美国的整个社会更具团结和凝聚力。当然，奴隶制和从未承认13个殖民地独立的土著印第安人口的存在意味着社会的严重分裂，而且这种分裂将会持续破坏国家的团结。[1] 但是，在共和国历史的初期阶段，美国确实没有像欧洲那样，出现足以造成像法国那样四分五裂的局面。在占据美国多数人口的白人当中，也偶尔出现一些危机甚至暴动，但他们基本上没有打破政治认同或改变社会结构的危险。美国的这种凝聚力产生了一种国家观念(nationhood)，这种观念超越了公民的宗派或者种族认同并形成了一种只关注于如何取得独立的共同意识。没有严重分裂实际上是新国家的一个力量源泉，也许它还是促成了美国愿意作为欧洲国家集团一员的关键。

如果这就是美国诞生的18世纪后期的世界图景，那么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则是对该画面的确定和补充。19世纪以法国的革命性战争开始，这场战争由拿破仑·波拿巴领导，目的是在整个欧洲和全世界建立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霸权，它遭到几乎其他所有国家的坚决反对并最终以失败告终。拿破仑战争严重损害了欧洲国家，但却没有削弱欧洲在世界中的相对实力。相反，随着工业革命的继续，被战争动员起来的大众、改进的军事技术以及继续深入的启蒙思想等等使得战争后的欧洲在世界上拥有了比其他地区人们更加优越的地位。而合众国，尽管在欧洲战争中因为中立权与法国和英国发生摩擦，但它仍然没有脱离这样的大背

---

① 关于美洲土著对13个殖民地独立的反应，参见J.L.怀特：《英国和美国边疆》（佐治亚州雅典市，1975年）。

景，仍然是组成由西方控制着的整个世界的一部分。

然而，与此同时的美国国家团结或国内凝聚力的优势开始恶变，并在19世纪中期导致整个国家从经济和地域上分成了相互隔离的地区。大体上讲，北方坚持自由白人劳力*能够发展经济以及对外国制成品实施进口保护的国家观念，而追求农奴制经济、需要自由贸易得到出售棉花市场并获取廉价消费品的南方却认为当他们不再能从这个国家联盟中获益时，它就应该解散。这一分裂使得合众国难以以一个统一的国家行事，在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为创建统一国家积蓄力量时，美国却面临着国家分裂的危险，尽管它同时也在不断地扩大疆域，跨过了密西西比河并最终抵达太平洋。所幸的是，19世纪中叶的欧洲大国基本上维持着比较稳定的关系，而没有过多地理会美国的事务。

由此，格外引人注目的是，作为工业革命下西方扩张的一部分，欧洲之外的美国得以继续其利益的扩张行为。尽管到内战后才开始成为真正的发展动力，但美国自身的工业化在1812年的对英战争时期就已经开始。同时，它在贸易和船运方面都技高一筹，其轮船数量几乎赶上英国，遍布中东和东亚地区探寻新的市场，并与刚刚独立的拉美国家建立联系。显然，这些行为大大增加了美国的私人财富。但是，由于缺少足够的国内团结，上述发展能否增强整个国家的力量还是个问号。世纪中叶，大家已经公认美国是一个经济巨人，但它还没有变成世界事务中的一个令人敬畏的强国。当一种由西方人通过特定制度控制当地人群以促其贸易发展的"非正式帝国"在中东、东亚和拉美如日中天之时，美国在这些地区的出现也是引人注目的。[1] 这种非正式帝国或许

---

* 原文如此，但如果改成"自由黑人劳力"似乎更为恰当。——译者

[1] 开创"非正式帝国"研究的是罗纳德·罗宾逊和约翰·加拉格尔：《非洲和维多利亚时代》(纽约，1961年)。

促进了美国在全球图景中的出现，标志性的事件是1853年和1854年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的远征日本，那是一个戏剧性的时刻，标志着美国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的出现。佩里本人一直有着美国统治西太平洋的梦想，然而，当国家日益走向分裂时，这种梦想绝无可能实现。但也应注意到一些欧洲国家在这一时刻力图系统地将其控制向全球其他地区扩张，从这一方面讲，美国也是西方的一部分。

文化领域亦是大同小异。欧洲文化继续主导19世纪的世界，但与此同时它自身也经历着重要的变化。在18世纪的遗产上又增加了浪漫主义、社会主义和许多其他意识形态，它们都为国内和国际事务带来了新的问题。赞美感情胜过理性、强调原始优于现代的浪漫主义引发了遍布整个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它们不是弘扬普遍价值观的法国大革命式的民族主义，而是种族式的民族主义，即每一个种族群体都强调自己的传统并追求反对被外人统治的政治自决。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又催生工业化社会中一些特定阶层产生自觉，从而赋予了工人一种集体团结的意识。这样，浪漫主义和社会主义都鼓动着这种排它性的倾向，即宣扬在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群体与阶级的存在。

以往的传统观点都集中于国家或个体的权力和利益，所以这些19世纪的新观念使得这些传统思想变得愈加复杂，这一点尤为体现在国际事务的讨论中。在此之前，治国谋略（statecraft）（国家理性、均势、国家利益）和人权（平等、自由、追求幸福）是两个时有冲突的指导原则，而浪漫主义与社会主义却向现存的国家组织和疆界基础发出质疑，并将个人的权力放置于一个群体的较大框架中。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国际关系的内容一方面不但要大大超出国家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可能超越个人追求贸易等活动的内容。例如，战争的爆发肯定不仅仅是因为地理疆界和贸易权利的冲突，而和平也不会只是理性的人的行为结果。战争由

此会受到为高尚民族的事业而抛头颅洒热血的浪漫动力的驱使，或者源于工人和资本家两者间的阶级冲突；而和平则可被定义为一种终极目标，它只有在浪漫追求实现后或一个没有阶级社会的建立以及国家消失后才能实现。

19世纪思想的分裂又进一步被强调不同种族间差异的生物科学发展所加剧，这些突出种族差异的各式理论不再强调人的共性，反而去设想各个种族群体那些自治的和不变的特性，并且总是将白人作为最先进的标准。接着，在人类学、语言学、历史研究以及其他学科领域内都出现了强调种族和民族差异的发展。此时基督教新教的复兴又恰恰成为这种发展图景中的一部分，因为此前新教传教士们正在不遗余力地说服那些未被启蒙的人加入他们的宗教，当然，他们相信将这些未被启蒙者从其"道德黑暗"中拯救出来是完全可能的，甚至都认为自己可以改变异教徒。这种认为人类可以改变的论调与种族差异各式理论所持的文化决定论是相互矛盾的，但两者却被西方优越的坚定信念所结合。

19世纪的美国文化是整个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其中的这些欧洲观念都可以在美国找到对应物，但并不是所有的这些观念都有着一样程度的影响，诸如浪漫主义在南方较为易见，而社会主义的试验却主要出现在中西部。但是，种族差异的思想却为大家所普遍接受，到19世纪40年代，除了一些极少数的人坚信完全的种族平等外，遍布世界各地的美国人都将白种人的优越视为理所当然。[①] 在这一方面，他们也属于欧洲人的一部分。总而言之，无论是在文化方面还是在经济领域，美国人等于西方人，日益增大的国内紧张所导致的美国在对外事务方面表现出的暂时被动并不会改变这一等式。

---

① 雷金纳德·豪斯曼：《种族和天定命运》（马萨诸塞州剑桥，1981年）；迈克尔·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外政策》（纽黑文，1987年）。

近代国家的出现

内战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美国的国家团结问题，尽管派别分歧依然存在、种族裂痕没有消失，但国家的政治团结不再受到挑战。这一点对美国外交事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政府现在能够专心处理对外事务而不再担心它们对国内凝聚力带来直接的影响。当然，由选举产生的国家领导人不得不关注各种利益集团和选民的倾向，但他们至少可以将这个国家作为统一实体的继续存在视为当然。

这一现象的出现恰逢其时，因为内战的结束正好与欧洲的一些重大事件发生巧合：意大利统一、德国统一、普法战争、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诞生、英国 1867 年改革法案以及俄国 1861 年的农奴解放等等，所有这些事件的发生将欧洲带入了近代国家的阶段。

近代国家的特点是中央极权管理、统一军队、在一定范围内限定人们行为的世俗公共权威与组织、政治进程的大众参与、统一的国内市场和生产与分配体系、区分本国公民与外国人的法律规则等等，它固然是 17 世纪以来就已经存在的早期民族国家的产物，但更是建立在一个将很多人口组合成颇具凝聚力的社会实体之上。拥有一支伴随着科技发展而配备最新武器并被国家化的全民武装力量、并且国家本身而不是君主或贵族统治成为公民忠诚对象的近代国家显然要比以往更加强大。

当然，有些近代国家比别的更具专制，而另一些又比其他较为脆弱，还有些国家的公民和社会阶层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加意识到自己的权利等等，正是这些近代国家间互为差异和相似的特点决定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像接下来的国际关系史所显示的那样。但应当强调的一点是，在 19 世纪的最后 10 年中，不少

国家都成为近代国家，而且它们显然又都是军事和经济强国。他们的力量或许不能常常被完全组织起来，但它们却可以依赖其公民的忠诚，特别是在出现对外危机的时候。所以，就此而言，未来的国际关系成为了一种强国间的关系。

部分出于近代国家的原因，这些强国对那些缺少同样实力的国家和人民自然有一种不可避免地扩展其统治的倾向，这既是为了强化它们在世界上的相对实力地位，也是为了减少可能导致不利于自身国际秩序的不稳定区域。这一现象就是帝国主义，或者也被称为新帝国主义，以区别于先前各式各样的殖民主义。

为了避免人们认为近代国家只顾增强其实力地位并深陷永恒的权势斗争，应当指出的是，它们不仅通过贸易和投资的经济方式互通有无，而且还通过诸如旅游和学术交往等文化方式进行和平交往。尽管这些活动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家的控制，但它们已经建立了一套不同于国家层次交往的个人纽带，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交往影响到了所有国家的社会发展，从而使得后者不会重复以前的历史道路。实际上，尽管近代国家的出现正在改变着国际关系，但上述的这些国家间关系如何改变近代国家却是理解 19 世纪 60 年代之后世界事务的一个关键。

作为一个刚刚获得统一的近代国家，美国有着许多与欧洲近代国家一样的特征。尽管 1865 年后的国家领袖不具备像德国奥托·冯·俾斯麦或英国威廉·格拉斯通的赫赫威名，但联邦政府在维持国内秩序的权威也同样不容置疑，它同样拥有可支配的国家级武装力量和“国家卫兵”，尽管在规模上比欧洲大陆国家小得多，但也同样被不间断地现代化以适应可能出现的海外危机。实际上，在 19 世纪 90 年代之前，美国的军事力量远不如欧洲国家那么引人注意，在 1868—1878 年的古巴危机中，当古巴岛的叛军求助美国支持时，华盛顿拒绝行动，理由是害怕卷入与西班牙的战争，而西班牙的军事力量在当时被公认超过美国。但这一

切都只是时间的问题，后者迅速赶超，并在1898年就相当成功地取得了一场针对西班牙战争的胜利。

海外殖民地是美国落后于欧洲的另一个领域。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大国获取海外殖民地在欧洲已被视为理所当然，这既是为了显示其大国实力，而且还因为殖民地、基地和势力范围等被当成是增加其国家资源和提升其世界战略地位的主要资产。美国在加入这一潮流方面姗姗来迟，对美国领导人而言，除了作为市场外，遥远的非洲、中东以及亚洲几乎没有什么吸引力，更谈不上建立特殊利益领地的燃眉之急，因为目前的美国贸易总量的4/5都是与欧洲国家完成的。并不是美国不关心欧洲以外的形势发展，特别是19世纪80年代后大国在非洲、中东、部分亚洲以及太平洋地区加紧划分各自势力范围的进程。在此期间，美国只在夏威夷效仿了欧洲，1876年两国签署了一项条约，规定夏威夷的君主不能将其港口租让给其他国家以及不能设立贸易领域的互惠安排等。

经过一段被动之后，美国开始在世界事务中重新定义自己的角色，并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加强军事建设与殖民扩张。这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的，没有一条巴拿马式的运河，海军的扩建就难以完成，反过来，获取运河本身又需要美国军队出现在中美洲。同样，一只扩张的海军还需要在海外建立加煤站和基地。

最关键的一点已经为许多人所指出：即美国不能在与其他列强的“比赛中落后”的观念。在欧洲国家瓜分全球时无所事事就等于落后，而落后就是迟钝、消沉、颓废，甚至是整个民族的死亡。当传统人士指出侵略性的对外政策会导致国内分裂时，扩张分子们的回答恰恰相反：造成这种结果的是迟钝，当其他国家都在迅速行动时，如果美国原地不动，那么整个国家的力量将会很快耗尽并终将萎缩，此刻惟一能够显示国家活力并防止内部分裂

的路线就是像大国一样行动起来，进行海外领土扩张。这一提法的确不易论证，但事实显示出美国的殖民扩张并没有造成国内分裂，相反的是，经过内战完成的经济统一为采取积极外交政策而无需担心失去国内凝聚力大开绿灯。

就这样，当一些欧洲国家日益变成全球大国时，美国也作为一个全球大国步入了20世纪。由于加强了军事力量以及殖民控制，它也在世界范围内拥有了发言权。实际上。美国不再满足于仅作为紧随欧洲国家之后的西方一员，它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重新定义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并使用自己的力量去界定世界秩序，全球美国化的时代已经来临。

这一点不仅可以从军事和地域方面看出来，而且特别反映在美国的经济资源及其运作方式上。世纪之交，美国的生产总量已经仅次英国位居世界第二，快速工业化还使得美国在欧洲之外的贸易量较欧洲国家有了显著增长。1899年首次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显示出美国政府对参与世界欠发达地区贸易的关注。对外投资是另一个例证，尽管仍然从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吸收资金进行工业化，但与此同时美国的金融巨擘们开始将目光转向诸如墨西哥和中国等不发达地区。他们首先集中于这些地区的铁路建设决不是偶然的，此时，美国国内已经完成了世界上最长铁路(18.2万英里)的建设，使得美国人认为通过在拉丁美洲、亚洲、甚至可能在中东修筑铁路，他们就可以开发这些地区并将之变成美国产品的巨大市场。作为国内政治和社会体系健康的基本保障，建立美国经济与全球的联系已经成为政治和商业领袖的一项主要任务。

美国在对外事务领域的冲劲也得到了一些强调实力、秩序和文明等因素的思想流派的支持。它们大多源于欧洲，应当注意到的是在欧洲文化风靡世界的同时，帝国主义年代也产生了一些相当程度的自觉防御意识。当然，西方仍然在科学、医药、技术方

面技高一筹，享受着世界其他地区人们无可比拟的医疗保健和卫生条件，美国和欧洲的平均寿命大大延长，婴儿出生死亡率空前减少。西方国家成为世界各地有志青年的目标。在住房、道路、管道和排污等基础设施，甚至在娱乐休闲方面，西方人的生活质量都比其他地区的人们要好得多。除了俄国以及由多民族组成的奥匈帝国，西方社会接受教育和摆脱文盲的比例也高得多。最重要的，欧洲和美国发展出了近现代的政府管理制度，主要包括法律框架、含有特定权利与义务的公民概念以及社会服务等。所有这些都成为吸引和招揽亚洲、中东和非洲人才的主要内容。

与此同时，西方思想也越来越对权势给予非同寻常的重视。当然，这并不是新的现象，从 17 世纪开始，学人们已经发展出了如何衡量与加强国家权势的各种理论。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这一现象继续发展，而且权势还被置于西方与非西方关系的新语境当中。权势就意味着对远方土地的控制，而另一个被广泛使用的词汇——文明——也成了权势的同义词：那些最具权势的国家被界定为最文明，当然，最文明的国家也就最具权势；那些不文明的国家不但没有权势，而且在没有西方指导与保护的情况下甚至都难于维持自身的生存。因此，较为文明的国家就有了监管和帮助这些没有权势国家的责任。这一点最形象地被拉迪亚德·吉卜林“白种人的负担”的提法表达出来，体现了当时讨论国际事务时将权势与文明相互等同的意识形态背景。

负担是白种人的，因为当时只有白种人才是最具权势和最文明的，其他人种似乎都陷入被动、虚弱和混乱之中，除非有白种人的拯救，否则他们将面临灭绝的危险，而拯救就是去管理他们、给他们提供法律和秩序、医疗和教育，一句话，就是去开化他们。所有这些行为都起到了加强和巩固种族等级的观念，这种思想一直存在，只不过在人类不同种族越来越走到一起的时候变得更为突出。

美国人同样持此观念。当然，他们为自己身居最文明行列而感到自豪，他们享受着世界上最好的生活水准，道路与管道系统将整个大陆连为一体，他们的学校教化着成千上万的新来者，冷藏技术、肉类包装以及零售批发业的出现催生了一个巨大的国内中产阶层。像欧洲国家一样，政府和社会（有些人将之分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距离日益缩小，国家变得越来越关注社会秩序和社会福利。在这种环境下，不管是国内政策还是外交事务都日渐成为政府机关和公民个人之间密切合作的产物，其密切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或许这也是为什么权势与文明能够如此相互替换的一个原因。行使权势的国家负责保护文明，而后者是所有个体努力的总和。即便是在历来强调私人领域（社会）远重于作为国家生活规范者的政府（国家）的美国，权势和文明也变成了同义词，显示了大西洋两岸思想观念发展的相近性。

与此同时，美国与欧洲的这种文化自我张扬掩盖了一种日益显露的防御姿态，那是一种对致力于改变世界的新帝国主义可能造成的后果的恐惧，因为这种新帝国主义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矛盾：一方面，它承认西方对非西方的控制地位；但另一方面，它的方式却又是在于改变这种状况。实际上，一旦这种改变发生，就难以确保非西方不会起来挑战西方的霸权。世纪之交的日本就是这种可能性的一个活生生例证，它正在作为一个近代国家崛起，拥有管理上集中、经济上统一以及强大军事力量等特点，战胜中国和俄国（分别通过 1894—1895 年和 1904—1905 年的战争）以及占领邻近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等都表明日本是一个西方式的强国和帝国主义者，这种转变是日本国家领袖刻意效仿西方并力求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追赶西方的结果。如果资源贫乏和人口已经过分拥挤的日本能够这样改变自己，那么中国、印度、土耳其以及任何其他国家为什么不会致力于同样的模式？假如这些国家都能成功地现代化以后又会发生什么？毫无疑问，现代化

只会使他们不再愿意忍受西方的控制，甚至起而威胁西方的霸权。西方或许仍然在科学与医药方面技高一筹，或许继续比世界其他地方更好地捍卫人权和个人自由，但是如果人数远远超出西方的非西方决定操起武器并对准他们时，这一切又能好到哪里去？

当然，这些设想太过极端，它们源自西方与非西方、白人和非白人的基本不融观（“黄祸”的提法是代表这些恐惧的种族主义的最形象例证）。但颇为有趣的是，谈起这些问题时，美国人却始终与欧洲一致，认为自己是享受一时霸权而担心其后果的西方少数人的一部分，亨利·亚当斯及其兄弟布鲁克斯以及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都是那个时代最高深的思想家，他们都郑重其事地高谈西方霸权末日的到来。除了他们，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也以此论调而呼吁加强移民控制，特别是拒绝亚洲的移民。实际上，就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而言，他们完全接受了欧洲人的心态。总之，不管是他们的自我张扬，还是自我防御，美国都是整个西方的重要部分。[1]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在界定国际事务方面只会尾随它的欧洲表兄。早在1914年大战爆发的前几年，美国社会就出现了一种日益强烈的自信果敢，政府内外的领袖们都强调美国的特殊角色或美国对世界的特殊贡献，其中有两个十分重要的特点：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的“金元外交”以及他们对通过国际法落实世界和平方式的信奉。

塔夫脱的想法是利用美国的经济资源促进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相信由此便可以导致政治上的稳定并最终出现国际秩序。通过“金元替代子弹”，美国就能结束充满军备扩充、殖民竞赛和

---

① 关于西方对非西方近现代化看法的讨论，参见入江昭：《跨越太平洋》（纽约，1967年、芝加哥1992年重印）第三章。

军事结盟的混乱世界，各个国家都会倾其资源进行经济发展。作为快速崛起的大国，美国可以作为带路人。与任何其他强国相比，美国在政府和军备开支方面的相对比例都要小，所以，它可以说服别人如法炮制。

这种将经济发展和相互依存作为创造世界秩序的关键的想法得到了美国日益兴起的和平运动的加强。当然，和平主义在美国和欧洲都已经存在数十载，但此前它主要是受到虔诚基督教徒的驱动，后期的社会主义也为其增加了新成分：和平是工人掌握决策的产物（他们或许比资本家甚至是资助他们的武器生产商以及银行家更具世界主义）。20 世纪初期的美国和平运动者对国际法重要性的看法并不一致，他们认为和平是一种可以进行法律定义的现象，其中的国家都遵守一些特定的国际法原则。因此，毫不奇怪他们对将仲裁作为解决国家争端的办法特别感兴趣，如果各个国家接受将国际法作为指导其行为的基本准则，那么它们自然也就能够通过仲裁而不是武力去解决争端。[①]

经济相互依存与和平解决争端的思想都将被融入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为美国外交事务提出的全新日程。实际上，在 1914 年之前，它们已经在美国得到充足发展并构成了美国领导国际关系的一个蓝图，不仅仅是在军事领域和殖民地问题上，而且还在如何让世界更为和平的安排方面，美国正在准备自己的全球角色。

---

① 桑德拉·赫曼：《11 人反对战争》（斯坦福，1969 年）；沃伦·库赫：《寻求世界秩序》（纳什维尔，1969 年）；罗兰德·马钱德：《美国和平运动与社会改革》（普林斯顿，1972 年）。强调国际法是维护世界秩序一种工具也是 17 世纪以来欧洲思想的一部分。参见纳丁·泰利和戴维·马佩尔：《国际伦理传统》（剑桥，1992 年）。

第二章 大战与美国中立

战争中的美国问题

大战的发生几乎与美国没有任何直接关系。它是欧洲国家间复杂冲突的长期积累后果，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法国和德国在阿尔萨斯—洛林的斗争、阿尔干半岛各民族试图从奥匈帝国或奥斯曼帝国独立出来所引发的危机、德国和英国的海军竞赛以及围绕殖民地的基本矛盾。[①] 上述这些矛盾都没有美国的直接介入，尽管其军事实力显著增长，也拥有了一个海外帝国，但它对全球事务的影响还基本限定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虽然其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已经广布全球。实际上，没有美国参与的欧洲战争爆发也说明了仅靠美国独自一家还不足以防止国际事务大灾难的发生，尽管它已着力使自己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当欧洲国家一个接一个地相继在 1914 年 7 月进行战争动员并在 8 月份正式开战时，美国退避三舍，怎么也不相信这些文明国家就此陷入一场手足相残的厮杀，但同时也庆幸自己至少能够免于这场悲剧。

因此，战争爆发后美国宣布中立也是自然而然的，尽管也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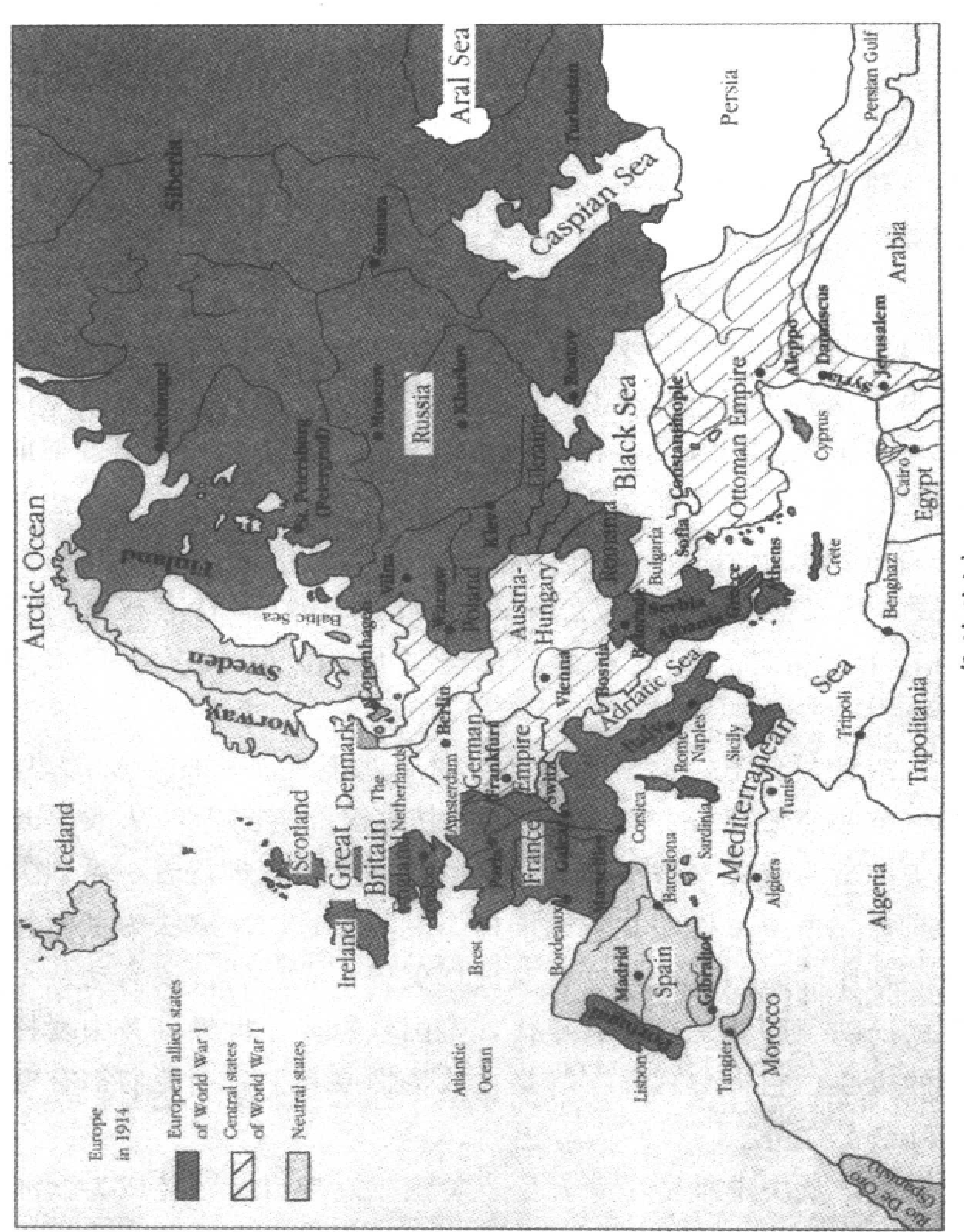
① 对一战的起源研究，最好的总结参见詹姆斯·乔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伦敦，1984 年）。

一些人特别是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警告这场战争将改变全球均势并最终影响到美国的安全，但至少一开始并非如此。当德国军队跨过西线占领比利时并直逼法国腹地时，当英国和德国的船只在北海交火时，人们一点也不担心欧洲战事会很快殃及美国。惟一的威胁发生在1914年夏天的亚洲，美国的竞争对手日本利用与英国的同盟关系对德国宣战并将之赶出了中国（山东半岛）和西太平洋（加罗林、马利亚纳和马绍尔群岛），夏威夷和华盛顿的一些海军战略家立即警觉起来，但威尔逊总统却没有任何担心，实际上，他还禁止海军实施假想以日本为对手的战争演习计划。他没有觉察到与日本的冲突因子，特别是西海岸的移民纷争。不管怎样，他在当时不相信两国会变成潜在的对手，日本占领山东以及德国的太平洋岛屿被处之泰然。此外，亚洲的事情也不会影响到美国在欧洲的中立。

然而，中立并不意味着割断与欧洲的联系，恰恰相反，就像他们的先辈们在拿破仑战争时期一样，美国人热衷于继续横跨大西洋的商业活动。但在这样做的同时，他们也很快就认识到官方的中立并不能阻止美国对战争进程的影响：他们所持守的中立会终将导致偏爱一方而疏离另一方。

作为中立国的美国公民的商业行为包括把商品从美国运到欧洲、从欧洲的一个国家运到另一个国家、乘坐美国或欧洲国家的船只以及与交战国政府及其公民进行金融等交易，华盛顿宣称所有这些都是一个中立国的合法行为。但与此同时，它也承认在现行的国际法条文中，交战国在处理中立贸易方面也拥有一些特定权力，譬如它们可以中途拦截中立船只以检查所载货物、征收被认定为违禁的货物、带走船上的敌国人员，甚至为了防止落入敌人之手而将之带到港口扣留等。

如此宽泛的界定自然不能确保中立国权利受到充分的尊重，此外，所有交战国还都试图限制这些权利以防止敌国从中受益。



1914年的欧洲

英国在界定违禁货物品种时已经讲得非常清楚，目的在于阻止美国向德国运送物资，因此他们的界定违禁物品非常宽泛而且显著包含食品和医药等非军用物品。1915 年 3 月后，英国海军通过一个封锁机构授权阻止所有运向德国的货物。根据当时的国际

法，封锁敌国的沿海是可接受的，实施封锁的交战国并非仅指宣布封锁，而是以武力迫使进入封锁区的船只改变其原定目的地，船上的货物也可能被扣押或收购。但是，因为中立国（也就是美国）货物还可以通过另一个中立国码头（譬如瑞典）到达德国，因此英国也禁止这样的行为（“连续航行”）并阻止美国禁运品抵达其他中立港口。

可想而知，这些强硬的措施一定会引发德国的反措施，为了抵消英国及其盟国的海上优势，德国海军从1915年开始使用潜艇对付敌国的战舰及其他种类的船只。尽管在诸如未发出警告前用潜水艇攻击敌国商船是否合法还很不明确，但当时的国际法并没有明文禁止潜水艇战（不像毒气，1899年的海牙国际和平会议宣布它为非法）。但不管怎样，当美国人还在坚持有权乘坐交战国的非军事性船只时，德国潜艇的使用当即就影响到了美国。[1]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继续保持中立就不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华盛顿决心要保护美国公民的中立权。实际上，从战争开始，美国就与有关交战国就其行为的合法性一直进行着一系列尖锐的交锋。值得重提的是美国国内爆发了要求以国家法为基础促进世界秩序的激烈运动，这种对破坏美国中立权的抗议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即便是在冲突年代，美国依然要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决心，它提醒列强不管是在战争抑或和平时期他们都有遵守国际法的义务。

所以，从决定维持中立开始，美国就发现自己已经成为欧洲大战的一部分。对各个交战国来讲，他们在权衡战略需要时都不得不考虑到与美国的外交关系，英国和德国即便是在进行最激烈

---

① 对战时中立权的广泛讨论，参见阿瑟·林克：《争取中立的斗争》（普林斯顿，1960年）。

的海战时也都决心避免与美国发生严重冲突。但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譬如为了平息美国舆论英国不得不将棉花从禁运品清单中删除，但此举并未成功阻止严重分歧的发生，两国在1914—1915年间相互交换了一系列外交照会，美国抗议英国对其中立权的损害，而英国则极力为其行为的合法性进行辩解。双方的立场实际上不可调和，如果不是因为其他缘由，两国之间定会爆发十分严重的危机。

一个原因是美国的公共舆论以及不受控制的官员言论，威尔逊总统在多次场合都宣称美国要在思想和行为上保持中立，他反复告诫国人这是一场欧洲分歧的战争而与美国无关。但与此同时，在私下的谈话和通信中，他却毫不掩饰自己对英国的同情。作为一名政治学出身的学者和一名政治家，他一直将英国体制视为民主政府的典范，而它此时正经受着德国独裁的挑战。[①] 他身边的许多幕僚，包括爱德华·豪斯上校、罗伯特·兰辛（1915年5月后担任国务卿）等也都是英国的公开支持者。在公共舆论方面，与他们遥相呼应的是有很大公众影响力的前总统罗斯福以及东海岸众多知名高校的校长们，这种亲英情绪更得到伦敦方面高效的宣传运动的支持，通过外交官员以及其他专门人员（他们当中最成功的是威廉·怀斯曼爵士，他在纽约建立总部并与众多的美国要人保持密切接触），英国政府广为散播反德宣传、向美国高层提供有利于协约国的秘密情报、通过各地报纸主编以寻求影响当地舆论等。当然，德国也绝非无动于衷，特别是在有着一定德国背景人口规模的乡村和城镇，他们也组织了反英的公关网络。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也包括爱尔兰裔人都认为美国应当在战争中保持严格的中立，很少人公开支持德国，但很多反对美国采取任何有助于英国及其同盟的行动。如果仅围绕与英国所出现的分

① 同上，第50–52页。

歧而言，这种亲德的影响依然存在，甚至可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1]

然而，从1915年开始，随着柏林潜艇的使用及其对战舰和非军事客货船只的一并攻击，致使美国在维护中立权方面与德国之间的纠葛开始和英国一样频繁。一个戏剧性的事件发生在1915年5月，一艘运载美国游客的英国航线的露西塔尼亚号(*Lusitania*)客轮被击沉，船上的128名美国人遇难。美国的公众被激怒了，因为他们确信这是他们的一项基本权利。华盛顿立即发出强硬抗议，要求德国为以后任何美国人的牺牲和中立权的破坏负责，为了防止美国可能为此而加入对方阵营，柏林立即对该事件表示遗憾并答应以后对美国人谨慎行事。

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因为威尔逊对露西塔努亚事件的过激反应而辞职，从一个侧面也说明即便是如此严重的事件，此时也不足以团结美国的整个舆论来反对德国。许多美国人肯定赞同布莱恩的看法，即美国游客的牺牲固然令人遗憾，但与此同时，英国的封锁政策致使整个美国蒙受损失也同样令人不快。[2]该问题的道德评断的确不易，但起码明确的一点是德国潜艇的使用阻止了战时英美关系继续滑向更为严重的危机地步。

最后，尽管在中立权方面存有尖锐争论，但从经济方面来讲美国几乎完全与英国绑在了一起。当然，从理论上讲，中立贸易意味着可以和每个交战国进行贸易往来，但实际上由于欧洲大陆的封锁，很难有货物能够运进德国。相反，英国及其盟友却能够从美国得到所需要的一切，特别是武器和军火。从1914年8月到1917年3月的中立期，美国仅向英国及其盟国出售的武器价

---

① 战时美国社会的最好研究之一是戴维·肯尼迪：《在这里》（纽约，1980年）。

② 查尔斯·坦西尔：《美国走向战争》（波士顿，1938年），第258—259页。

值就超过22亿美元，相比1913年美国整个出口微超24亿美元的记录，这一数据颇为巨大。再加之同样数量剧增的钢铁和食品等，如此庞大的货物量不可能由英国独自的对美出口和黄金转移（各个交战国都禁止黄金出口，从而为19世纪90年代以来维持世界贸易结算的金本位划上了句号）进行冲抵，即便加上英国在美国的资产也同样不足以支付。为此，美国在一开始给与英国为期6个月的短期贷款、但接着由于战争的继续又实施了长期贷款以维持后者的购买。这些贷款由美国的银行家提供，威尔逊和布莱恩起初因为它们可能对中立政策的影响感到不安，但最终还是支持了上述金融交易，因为没有它们，整个战时贸易就难以为继。

与英国日益紧密的贸易和金融联系即便是没有改变美国的中立政策，但至少也缓和了双方在海上争端的危机氛围，因为不可否认的是美国贸易、船运和贷款的增多正在将国家变成一个实际上的战争参与国，而且确定无疑的是，这些行为使得英国受益而危害中欧国家。就这样，颇具讽刺的是，美国的中立贸易越多，它能够维持中立的可能性就越少。就交战国而言，它们也了解这种局势，并充分认识到没有在欧洲战争爆发方面发挥任何作用的美国，如今正在变成一个甚至可能决定整个战争进程的关键因素。

美国的抱负

美国对欧洲战争重要性日益突出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需要说服美国人认识到这一点：尽管他们宣称中立并厌恶直接卷入冲突，但实际上他们所起到的作用却越来越重要，即便是作为一个非交战国，他们的行为已经对战争的结果构成了严重的影响。

首先，美国人很快认识到欧洲战争正在将自己的国家变成世

界上最为强大的经济实体，这一点对美国外交事务以及其他国家的未来发展都有着影响，因为美国贸易和船运的扩张并不局限在欧洲，当欧洲的商船从亚洲、中东和拉美等地消失后，满载本国和外国货物的美国商船很快取而代之并遍布全世界。与之相伴随的是，美国在海外的投资和借贷迅猛增长，当欧洲各国将自身在美资产都用来购买美国商品并开始从美国寻求借贷时，美国一夜之间就从一个纯粹的资本输入国变成了债权国。同时，越来越多的美国资金也流向欧洲以外的地区并投资于当地的银行、铁路和工厂（为弥补失去欧洲进口后的各种新兴工业化运动在亚洲和拉美相继出现）。

当然，如果没有欧洲的战争，美国也会崛起为世界经济强国，而现在的战争显然将之加速变为现实。美国政府和人民对此双手欢迎，他们对任何危及其中立权的持续抗议表明：如果美国的所得是建立在欧洲的苦难之上，他们对此也没有任何道歉之意。实际上，通过这些商业行为，可以说美国确保了战时全球的经济交往活动最大可能地避免遭受战争的干扰。因此，对于那些坚持只有经济才能确保国际秩序稳定的人们，他们更加确信通过令人瞩目的美国的经济行为，世界和平事业的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显著。

这种思想距美国不仅简单地行使中立权而且应当运用新近获得的实力与影响帮助欧洲终止战争的主张仅一步之遥，避免作为交战国介入战争而通过一些建设性的调停措施，美国可以对世界事务作出有价值的贡献，这才是美国运用其资源与影响的最满意方式。正因为欧洲战争的根源与美国没有任何关系，美国才得以在交战国之间进行斡旋调解。早在 1915 年初，威尔逊已经派遣爱德华·豪斯和平出使英国、法国和德国，以确保调解结束战争后的各方利益。此时此刻，威尔逊和豪斯的想法也都仅不过是恢

复战前状态，加上部分裁军以及重建一个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体系。[①]

不幸的是，豪斯的使命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伦敦告诉他英国只可能接受一个彻底粉碎德国军国主义的和平。但威尔逊并不气馁，他在 1916 年再次派遣豪斯出使欧洲各国。但是，豪斯此次不再是纯粹提议美国的斡旋和听取各交战国的想法，而是召集欧洲各国召开一个和平会议。美国将邀请交战双方参加会议，然后拿出具体的和平方案。颇有意思的是，此时的华盛顿已经不再恪守先前的想法，1916 年的豪斯使命已经超出 1915 年时恢复战前状态的要求，豪斯（当然，还有威尔逊）现在大谈将阿尔萨斯和洛林割让法国，把君士坦丁堡交给俄国等，这些条件显然都有利于协约国。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提出了一个确保战后世界秩序的国际机构的建议案，该方案出自一些领导人，诸如前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早就呼吁建立“一个强制和平的联盟”（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也持此观点）。威尔逊有意将这种想法据为己有，由此力促在战后建立此类机构。塔夫脱、威尔逊以及赞成这种观念的其他人认为如果仅靠恢复战前现状，那么只能将世界带回 1914 年，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另一场战争定会接踵而至，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新的国际机构以替代传统的均势机制。在一些重要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共同支持下，威尔逊的这种新创意或许可以让美国在不介入战争的情况下成为欧洲战争的仲裁者。

然而，欧洲各国还没有准备接受美国的倡议。当然，1916 年被豪斯游说过的英国、法国和德国都没有断然拒绝威尔逊的调停，否则定会引起美国的敌意，实际上，他们都表示听从豪斯的建议并愿意进一步研究和谈的可能性，特别是柏林，它试图以同

---

① 戈登·莱文：《伍德罗·威尔逊和世界政治》（纽约，1968 年），第 38—39 页。

意美国的调停来羞辱英法两国。而在私下里，德国海军却计划以潜艇作为最后武器发动全面潜艇战以击垮协约国，因为此时双方的陆军都完全僵持在壕沟战之中。海军将领们对此抱有极大的信心，他们在德皇的支持下反对任何不成熟的停战。在协约国方面，英法以及与其他盟国（俄国、日本、意大利）之间也都展开了秘密谈判以划分战利品，他们认为自己终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因此战后的领土处置应当以德国及其海外帝国为代价反映出胜利者的利益。这些谈判都是背着美国秘密进行的，但显然也都不能构成拒绝美国调停的理由。因此，伦敦和巴黎的官员们都以鼓励豪斯的努力来讨好美国，表示赞同以威尔逊的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甚至还成功地使后者承诺如果德国及其盟国拒绝参加美国发起的和平会议，那么后者就“可能参战”并与他们站在一起。威尔逊的这一承诺非同小可，或许显示了他自信该承诺不会兑现，因为德国应该看到和平调停的价值。

不管怎样，美国当时对和平使者的兴趣是显而易见的，这实际上超出了华盛顿对欧洲事务的历来界限。很显然，它反映了欧洲已经无力处理自家乃至全世界事务的意味，而且如果美国不出面扮演部分领导角色，就很难出现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尽管这一角色以及美国所追求的国际秩序的基本性质仍然相当模糊，但美国却不需一切从零开始，而实际上已有了多年的准备：即他们认为国际秩序、全球经济的发展和相互依存以及国内稳定都是一些可以相互替换的问题，它们共同构成了海内外的和平。就此而言，经济发达且政治先进的欧洲国家间的战争无疑是一场灾难，因为各国都在试图消灭对方。因此，欧洲一定是缺少了某种东西，而美国将会提供这种东西，它以此激励自己致力于最大程度地减少这场战争对文明的破坏，并创立一个能够避免此类战争的稳定国际体系。

很显然，当德国在 1917 年宣布恢复无条件潜艇战时，美国

的调停努力最终遭到失败。然而，不可忽视上述事态的历史重要性。在经济方面以及思想方面，美国都已经为在欧洲冲突中充当一个关键的角色作好了准备。到 1917 年时，它准备通过军事和战略手段来完成自己的角色，以取得不仅仅在欧洲而是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实际上，除了 30 年代中期的一段时间，美国在未来几十年中一直致力于追求这一目标。从这种意义上讲，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 20 世纪或许可以说是始于 1917 年。

美国在亚洲和拉美

在准备最终介入欧洲战争的同时，美国在东亚和加勒比海地区还奉行着一种积极的干预政策，实际上这将是加诸于欧洲的政策的一种预演。

首先，美国越来越深入地卷入东亚事务，因为它是能够影响纷争不休且常常伴有武力冲突的中日关系进程的惟一国家。应当注意到欧洲战争的来临与这些国家的内部变化不期而遇，成功领导日本加强军事力量并进行殖民扩张的明治天皇在 1912 年去世，之后的大正时代（Taisho）却爆发了反对明治改革的一系列运动。有些人呼吁削减军事开支、另一些主张建立更为民主的政府，但此时却爆发了欧洲战争，日本对山东以及德国岛屿的远征进一步加强了军方的力量，他们主张日本应当利用欧洲国家暂时无暇顾及的有利时机以替代它们在中国的地位，事件的高潮发展到 1915 年 5 月日本向中国提出了一份 21 条要求的清单，其中包括延长满洲南部基地的租借、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交日本以及由日本监管中国的警察力量等等。

中国难以抵制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势，因为它正在经历一场变革。1911 年爆发了反对清朝的起义，已经统治中国 300 多年的清王朝此时既不能抵抗革命运动也难以阻止内部的衰落，作为旧

日精英分子的学者士绅们不但不愿出手相助，反而与革命者携手联合在第二年即宣告了中华民国的成立。在经历诸多的混乱与分裂后，1913 年，一位清朝的官员袁世凯成为新的领袖，并被称为临时大总统。然而，他却遭到孙中山领导的激进分子以及控制着全国不同地区的其他前期领导人的反对，他们很快变成军阀并建立了自己的军事基地，从而将刚刚诞生的共和国分成了许多小单位。在这种混乱局势发生的同时，新的政治和思想思潮也在四处蔓延，在自认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令人难堪软弱无能的印象的深刻影响下，“年轻中国”的领导者们决定改变国家的屈辱命运，由大学教授、学生、商人、记者甚至还有在海外（包括日本）受过训练的军官等组成的舆论领袖也成为一股必须面对的力量。诸如 21 条的事件不但显示了中国的软弱也激发了民族主义的反应，使得政府极端难以屈服于日本的压力。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发现自己正在越来越深地卷入亚洲事务，其程度比预期的还要广泛。部分原因是欧洲从亚洲的暂时消失，更准确地说是它在非西方世界声誉的下降。毫无疑问，欧洲国家历来被当做文明与权势中心的名声被战争所击碎，中国的重要知识分子梁启超的总结道出了西方世界之外的众多心声，他写道：欧洲不再是人们效仿的榜样，它的伟大掩盖了它的缺陷及其病症，而这一切都被血腥的战争充分暴露出来。[①]

在欧洲，即便是文化名流中的佼佼者和“社会主义国际”（the Socialist International）的风云领袖都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激进的爱国分子，各自呼吁国人将自己的国家置于第一位，这一现象使得一直将欧洲视为楷模的亚洲人深感困惑与不安。由此，他们很自然地将目光转向美国——一个没有加入战争的大国。当

---

① 约瑟夫·利文森：《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心智》（马萨诸塞州剑桥，1953 年），第 203 页。

然，由于美国巨大的自然资源以及先进的技术，他们对美国同时具有羡慕和敬畏之情。但不管怎样，如今美国却在欧洲抛弃理性时拥有智慧、在欧洲误入歧途时高举进步大旗，并准备替代后者成为世界新的领头羊。

中国的形势预示了一切。很多美国人现在称中国为他们的“姊妹共和国”，新的中国领导人也的确可以在重整国内事务的过程中期待从美国的现身中获益，威尔逊总统毫不犹豫地出手施惠。实际上，早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他就对传教士活动显示出了极大兴趣，成为总统后他更急于在基督教以及世俗方面促进美国在中国的利益。他曾任命一名学者（威斯康星大学的保罗·芮恩施）担任驻北京公使，派遣霍普金斯大学的弗兰克·古德诺担任袁世凯的特别顾问，他还鼓励美国银行家向中国的铁路和工业发展提供投资等。因此，当中国政府与战时日本帝国主义特别是1915年的21条要求发生冲突时，袁世凯及其幕僚很自然地把求援对象转向美国。

另一方面，此时的日本也认识到他们今后在处理中国问题时将不得不认真对待美国的反应。应当注意到许多日本领导人和他们的中国对手一样，都意识到了美国在全球日益攀升的威望和重要性，正是基于这一点，他们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倍感不安。他们向华盛顿保证日本在中国没有任何特殊追求，仅是对欧洲战争所造成的新形势的防御性调整。在一定程度上讲，日本将美国放置于传统的大国外交框架之中，而中国却更期望美国能够代表一种崭新的原则、一种处理国际事务的崭新方式。

日本和中国都没有错。实际上，围绕究竟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卷入中日纠纷的问题，美国决策层内的意见也不尽一致。与西奥多·罗斯福实用观点相一致的人相信支持中国对抗在亚洲和太平洋对美国安全和利益构成威胁的日本对美国一点好处也没有，而另一些人却坚持应当抛弃这种过时的思维，起而采取一项直率与

正义的政策，特别是在中国的新共和国迫切需要美国帮助的情况下。[①] 最终的结果是项折衷：华盛顿一方面对二十一条当中最易受谴责的部分静悄悄地表示了反对，但与此同时却公开宣称美国不承认两个亚洲国家间签订的任何违反门户开放原则或损害中国领土完整的协议。这一表示有助于中国，但与此同时它又向日本政府声明美国也的确承认日本在诸如满洲等邻近日本的中国地区拥有特殊的利益。

威尔逊总统对这种支持中国又安抚日本的政策并不满意，他把同情更多地给了前者。为了更有效地帮助中国，他决定鼓励中国参加欧洲战争，尽管这种举动仅只象征意义，但通过对德、奥的宣战，中国却能够没收敌国的资产、结束曾赋予这些国家“不平等”权利的旧日条约，并能够以敌国公民的名义对在华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进行管制。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这些措施至少也可以显示出中国并非没有一点力量，而且还可以和世界上一些最强大的国家进行公开叫板。日本人也深知这个道理及其象征意义，所以反对中国参战。但是从1917年开始，他们不得不调整政策以适应形势并看到支持中国加入反德战争的好处。到袁世凯去世（1916年6月）北京处于军阀（至少其中有几个被认为是亲日的）控制的时候，日本希望通过不阻止中国参战的方式为改善两国关系扫平道路。

就这样，一场与美洲和亚洲毫无关系的欧洲大国战争最终使得美国、日本以及中国作为支持一方而反对另一方地加入了战争，这些非欧洲国家当然也会在战后国际事务中拥有较大的发言权，实际上，这也是欧洲在世界上相对衰落的另一个标志。

与此同时，美国又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强化了它比战前

---

① 关于在中国“传教士外交”的起源，参见詹姆斯·里德：《传教士思想与美国东亚政策》（马萨诸塞州剑桥，1983年）。

更为稳固的存在。美国在该地区的武断和干预并非鲜事，在美西战争的影响下，美国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稳步扩大自己的影响：吞并（波多黎各）、建立保护国（古巴）、实施军事占领（运河区）、海关代管（圣多明戈）以及政治干预（尼加拉瓜）等等。当欧洲国家的注意力转向别处时，美国却在该地区建立起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大战为强化美国的控制提供了机会，其理由是防止该地区成为欧洲敌对的牺牲品。然而，威尔逊总统还想进一步超越传统的炮舰外交，表示美国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政策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截然不同。他也只有这样做，因为他越来越强烈地认为如果美国不想止步于一个地区性大国并试图将其政策推向全球，那么美国就必须激励自己在国际事务中起到领导作用，而此中十分重要的一点是得向世人昭告在处理与邻国关系时，美国追求的不全是自身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对大战期间干预墨西哥、海地以及圣多明戈的语言表述总是与更为广泛的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相联系。在此之前，美国对该地区干预的理由是门罗主义（西奥多·罗斯福）或金元外交（塔夫脱），而现在的威尔逊时代，政治改革却成为流行词汇，这恰恰是威尔逊政府在应付亚洲和欧洲局势时所使用的语言。

固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问题。就墨西哥而言，美国的两次干预（1914 年和 1916 年）都与 1911 年推翻伯特非利奥·迪亚士长达 35 年独裁统治后的国内动荡和混乱有密切关系。就在威尔逊入主白宫之前，一位名叫维多利亚诺·许尔塔的权力竞争者脱颖而出并宣称自己为新一届总统。然而，不像中国的袁世凯，从一开始，威尔逊总统不但断定此人不值美国的支持，而且还认定他是通过压迫甚至暗杀政敌的手段获得权力的。为此，威尔逊坚持墨西哥应当受到惩罚：美国正式承认墨西哥政府的条件必须是一位民选领袖上台。尽管之后的两国关系得以维系，但

在 1914 年春季，为了报复几个从战舰中派出获取石油的美国海员在坦皮科（Tampico）的被扣事件，美国军队登陆并占领韦拉·克鲁斯（Vera Cruz），使得两国关系雪上加霜。实际上，美国采取如此激烈反应的目的在于迫使许尔塔辞职，尽管该目的最终得以实现，但美国的入侵行径却遭到了包括许尔塔政敌在内大多墨西哥人的强烈谴责。

该事件典型地反映了日益显现的美国全球角色的复杂性：一方面是美国促进当地国政府进行改革的政策，另一方面是超越其内部纷争的当地民族主义力量，而这两者之间总是相互冲突。围绕该主题的美墨关系在 1916 年发生了一次不幸的纷争，导致一支美国军队进入墨西哥北部追捕效忠于弗朗西斯科·维拉的军队，此人因不满墨西哥新的临时总统韦努斯提亚诺·卡兰萨而入侵美国边境（新墨西哥州）并制造麻烦。实际上，维拉此举几乎达到了目的，因为卡兰萨对美国约翰·潘兴将军的远征行动进行了公开抗议，甚至都出现了两国开战的言论，但双方最终还是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威尔逊在美国日益卷入欧洲战争的情况下自然不愿意发展到如此境地，而卡兰萨也乐于结束危机以得到美国的外交承认，他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然而，美墨危机并未就此完全终结。就在卡兰萨即将得到华盛顿正式外交承认之前，墨西哥颁布了一部新的宪法，其中包括全民普选、土地改革，以及限制外国对土地以及地下资源、特别是石油的拥有权，最后这一点对美国最为重要，它被写进宪法第 27 款，对已经拥有采油权的美国及其他（主要是英国）投资商极为不利。[①] 墨西哥民族主义与美国坚持商业合同神圣性之间的冲突使得未来数年内的两国关系更为复杂，尽管美国对一个全新

① 罗伯特·弗里曼·史密斯：《美国与墨西哥的革命民族主义》（芝加哥，1972 年），第四章。

的民主与法制的墨西哥十分欢迎，但它不能无条件接受其宪法27款当中隐含的极端主义做法。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先兆，它预示着美国在世界各地将遭受同样的挑战。

相对来讲，美国对海地（1915年）以及圣多明戈（1916年）的干预要简单一些，因为两国都没有出现反对外国势力入侵的民族主义统一运动。但伊斯帕尼奥拉岛（即海地岛）的局势与中国和墨西哥也有相似之处，因为不管是海地还是圣多明戈都陷入了无尽的政治动荡：政治家一个接一个地被杀、普通老百姓丝毫不能制止腐败和混乱。为此，威尔逊总统认为美国不得不站出来去“教育”当地人民“怎样选举出好人”，这就是很快出台的“保障民主”原则的加勒比海版本：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成为这一教育过程的主要工具，他们指导选举、维持法律和秩序、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甚至还接管了内阁。美国对这些国家的摄政和保护完全超出了罗斯福推论（导致了关税代管制度的确立）的范围，并导致一系列美国籍金融顾问、卫生工程师以及警察督导的产生。

尽管华盛顿此时正在支持中国激烈反对使之变成日本保护国、而日本却声称可以此结束中国动荡的二十一条，但威尔逊当局还是在上述两个加勒比海国家确立了军事管制并持续了很多年，美军在1924年和1934年才分别撤出了圣多明戈和海地。在尼加拉瓜，威尔逊沿袭了其前任的驻军政策（直至1925年）并确立了关税代管制度，从而将美国变成了该地区的霸主。美国此举与日本在亚洲和德国在欧洲的行为有何区别？至少对威尔逊来讲，他不认为一个和平世界秩序与加勒比海地区的武力行为互有矛盾，他在此时此刻所展望的未来和平是一种国际行动超越地方性利益的合作行为，只要是用于高尚而不是传统的目的，武力便

可以在其中扮演适当的角色。[1] 实际上，美国马上就要为高尚的目的而卷入一场大战，就此而言，对墨西哥以及加勒比海国家的远征或许可以被当做是美国准备全球重建宏伟任务的一次演练。

---

① 对威尔逊在加勒比海地区使用武力的最好分析是弗雷德里克·卡尔霍恩：《强权与原则》（俄亥俄州肯特市，1986 年）和《威尔逊对外政策和武力的使用》（俄亥俄州肯特市，1993 年）。

第三章　大战中的美国

美国参战

很少有国家能像1917年的美国为加入一场战争而做好了如此充分的准备，不是指整个国家为选择站在英国及其盟国一边以反对德国和其他“中央”国家而介入欧洲大战所进行的具体准备，如果交战各方无需美国的介入而能够自己达成和平，华盛顿官员和美国民众也一样举双手赞成。此处的准备是指美国在加入战争时所拥有的决定性作用。在实施中立政策的几年中，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都得以大大加强，民众有充分的时间认识世界事务以及自身国家在其中可能的作用，而外交政策也一直致力于确保美国一旦参战后的领导地位。

在军事方面，威尔逊总统从1916年就开始呼吁备战，首先是为了让美国在军事上有足够的准备以防止其他国家对其安全和利益构成挑战，当然，1917年以后，其目的已经变成为打赢一场战争而建立强大的武装力量。1917年5月的《选征兵役法》(the Selective Service Act) 创立了美国人的军队服役制度，一年之内，军方就能够将200万的步兵派往欧洲。同一时期的海军也得到了迅猛发展，1918年的海军建设计划旨在创建世界一流的美国海军力量。整个军队的火力和装备都由国内生产，政府还成立了确保资源调配的专门机构。通常来讲，上述这些政策不但

要耗费一国大量的资金和时间，更会加剧内部社会秩序的紧张，然而，相对而言，美国从和平向战争的过渡却十分顺利和平稳。整个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支付得起”这场战争，国家有充裕的财政预算，工厂在增加军工设备产出的同时并没有减少消费品的生产，关于国家和社会相互协作的进步主义思想（为了实施必要的改革，政府和民众必须密切合作）不但适用于和平年代也同样适用于战争时期。

尽管如此，美国卷入欧洲战争并将之变成“世界”大战也并非刻意选择的结果。假如德国在 1917 年 1 月宣布无限制潜艇战之后的美德关系得到缓解，华盛顿或许会再次尝试调停的努力。然而，在其后的三个月，欧洲形势的发展和其他因素一同促成了美国的参战：首先，德国海军不顾威尔逊对恢复潜艇战的谴责而继续下令布防潜水艇并不断击沉英国的战舰和美国的商船，德军的这种敌对行为以及柏林当局对之明显的顺从使威尔逊认为德国对通过谈判终止战争的方法不感兴趣，并断定德国的军国主义是和平的最大障碍。当然，这种观点是英国所一贯坚持的，美国只不过现在才接受它。与关于战争的这一基本信念相比，美国与伦敦关于中立权的所有尖锐争论都不再重要。

2 月下旬的一个事件使得美、德关系进一步恶化，美国截获了德国外长艾尔弗雷德·齐默曼给墨西哥政府的一份电报，其中谈到德、墨两国政府（有可能再加上日本）组成一个反对美国的同盟，齐默曼甚至还暗示德国可以协助墨西哥恢复 1848 年割让给美国的北部领土。在此之前，美国官员已经对德国在墨西哥日益增长的影响感到忧虑，现在被广泛公开的齐默曼电报则大大激发了这种公共舆论。[①] 3 月，俄国爆发了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并

---

① 关于齐默曼电报，参见弗雷德里克·卡茨：《墨西哥的秘密战争》（芝加哥，1981 年），第 350—355 页。

建立了改革型的政府，它在表面上看起来较为民主并顺应民意。该事件对美国的政策有着直接的影响，威尔逊总统将之视为全球民主风潮兴起的证据：这是一个最令人振奋的事件，它需要美国强有力的支持，否则就会被专制力量摧毁，而德国现在就是这种专制力量的代表。美国参战的时间已经到来。

1917 年 4 月 2 日威尔逊总统向国会交付战争提案标志着美国的正式参战，该提案明确谈到了美国对德国特别是其无限制潜艇战的不满，但威尔逊远远超出了所罗列具体的愤懑，而将参战的决定冠以更广泛的意识形态原因。他说，美国向德国开战的理由是后者对世界和平与文明构成了威胁，只要德国军国主义尚存，世界就难保和平。这一论调多是对他自己也是对格雷观点的重复，它们已经在多次场合中有所表露。总统现在将对德国军国主义的斗争放置于一个普遍的和历史的框架之中，指出军国主义本身是长期以来压制民主的专制主义产物。与一个多世纪前伊曼努尔·康德的观点遥相呼应，威尔逊坚持只有民主政府才实施和平的对外政策。追求民主与和平是历史的必然，而美国则受命致力于确保这一历史进步的落实。在包括英国、法国和俄国（在新民主政体的领导下）在内的欧洲民主国家自身无力抗击德国军事力量的情况下，美国就不得不站出来干预，而且还要为此进行一场对抗一个欧洲大国的百年不遇的战争。美国现在要使用自己的军事力量去决定欧洲战争的结果，最重要的是，去确保整个世界的“民主通行无阻”。4 天以后（4 月 6 日），国会向德国宣战。

具体来讲，美国的军事力量到底会给战争带来什么不同？它最初的心理作用大于实际的军事效用；美国的参战迫使交战各方都不得不重新考虑这种新形势并改变现有的战略谋划。固然，威尔逊总统没有将美国军队作为盟友合并到协约国军队之中，他坚持将两者区分并称美国是一个拥有自己独立指挥系统的“联合”国家。但即便如此，在美国军队出现在欧洲大陆之前，美国的战

舰、士兵以及武器被增添到战争中一方去反对另一方的事实就已经对欧洲战局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譬如，德国试图在美国参战之前孤注一掷地迫使敌人屈服，为此，它就必须最大范围地使用潜水艇以尽可能多地摧毁英国的海上力量，而同时在陆地上又必须完成两个主要目标：将俄国军队尽可能向东赶回去与占领巴黎和已经被自己包围的其他地方。德国在第一个目标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不仅因为俄国军队经过数月苦战之后的士气低落，还由于推翻不受人民欢迎的沙俄政府后的三月革命新政权无力号召民众继续战争。士兵们接连从部队中潜逃，同时从未接受新政权的极端布尔什维克在军队中积极动员鼓励士兵们反战，他们谴责战争是帝国主义对被压迫人民的剥削和利用。迫切想利用这一形势的德国高层指挥官试图以鼓励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和俄国的政治动荡将俄国逐出战争，他们为此用火车将流亡在瑞士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送到彼得格勒，显然想以此加剧俄国的混乱。他们的计划起到了效果，布尔什维克很快于 1917 年 11 月在彼得格勒及其他几个城市取得了政权。布尔什维克的成功意味着俄国将从反德联盟中脱离出来，这正是德国所希望的。

德国在法国的策略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他们争取在美国出手援助之前努力迫近巴黎，到 1918 年春，德军已经占领了距巴黎仅数英里的地方。他们还试图利用法国和英国日益增长的厌战心理，这种厌战情绪很可能会由于美国的参战而立即消失，因此需要速战速决并马上取得成功。与此同时，德国军队还在 10 月份的一次重要战役中击溃了意大利。因此，到 1917 年底，种种迹象都似乎表明德国的胜利近在咫尺，除非美国出面加以阻止。

美国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出面了，从 1918 年 6 月开始，共计有 200 万之多的美国军队登陆法国并准备与德国交战。很难断言美国将是这场战争的主要赢家，更准确的应当是美国阻止了

德国的进一步推进。美国的介入显然打破了欧洲战争终将出现泾渭分明胜利的可能，而且德国高层也认识到局势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这不仅仅体现在陆地方面，同样也反映在海上：美国的布雷以及对德国海岸的成功封锁都有效地削弱了德国的潜艇战。总之，美国的参战显示出德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最好结果也只可能是一场和局，也就是说，美国的介入意味着德国野心的破产。

为什么美国军队在与训练有素且富有实战经验的德国军队的战斗中能够取得如此成功？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美国的士兵与海员刚刚参加战争并仍处在极富热情的开始阶段，而德国人已经经历两年多的殊死阵地战；更重要的是，每个美国士兵背后都有着源源不断的给养补充，而德国的资源已经使用到了最大极限；同样不能忽略的是充当德国最重要盟友的奥匈帝国正在四分五裂，给美国及其“盟国”以支持哈布斯堡王朝内部分裂运动而从后方给德国造成威胁的机会。譬如，当捷克领导人在巴黎建立临时政府时，美国政府当即予以承认。威尔逊总统甚至还向西伯利亚派出一支小规模队伍以拯救被困在那里并希望重返欧洲作战的一支数千人的捷克部队。与此同时，华盛顿当局还鼓动诸如塞族和克罗地亚等反哈布斯堡的民族情绪。所有这些行动都削弱了德国有效抵抗美国挑战的能力。

然而，促使美国最终成功的最重要原因还是美国的经济资源，它的“盟国”也都从中获益。正如前一章节所言，三年的中立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它大大扩张了和交战国的贸易并向他们提供借款。现在，这些积累的财富以士兵和武器的形式表现出来，从 1917 年 4 月到 1918 年 11 月停战，美国政府组织（并支付）了 400 万人的陆军、新增 16 艘战舰和无数潜水艇的海军以及拥有数量庞大的现代武器兵工厂，尽管政府为此也通过出售战争债券的方式筹募资金，但在战争开始前实施的收入所得税制

度被证明是资助战争的最有效手段。整个战争期间，美国共向其“盟国”借贷了77亿美元，若与1917年全国收入大致440亿美元的数字加以比较，就很容易理解美国人民为这场战争并无需付出过多的痛苦代价。

200万美国人赶赴欧洲也没有影响国内经济的生产和效率，这也许是所有事态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幕。当然，政府在农业及其他军工服务行业暂缓了义务兵役制，但各大工厂、商厦和办公室都不得不征招新人，其中很多是妇女，为了接替城市的劳动力，大量的黑人从南方向北方城市“大移民”，他们很快并且看起来非常适合地融入经济大潮。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战争期间的移民数量大大下降，既反映了欧洲战争的影响，也显示了美国官方政策的改变。因为就在此期间，美国政府开始加紧限制外来移民，要求他们接受文化测试。由此，战前每年超过100多万人的移民数量现在缩减到该数字的零头，当时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安排妇女和南部的黑人进入北部工作。

十字军东征的战争

美国强大军事和经济资源的发挥又被威尔逊总统领导的意识形态攻势所配合与支撑，实际上，结合他在1917年之前对重塑战后世界的强烈兴趣，这一点似乎并不奇怪。奇怪的倒是美国卷入战争后，这位中立国领导人的志向却成为指导交战国各方追求与制定和平的官方原则。

就在他把战争提案送交国会的同时，总统就开始采取了确保由于美国参战而改变整个战争性质的措施，这场战争不再是野心勃勃的列强相互争夺权势的传统争霸战，而应当被定义成一场十字军的东征、一场“确保民主在全世界通行无阻”的战争。美国不应当对帮助欧洲恢复战前现状感兴趣，它不是为了这种旧日的

过时目标而战，更迫切在于为重塑未来世界贡献自己的力量并为之带来真正的改变。在此，“民主”是一个最重要的指导原则，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国内政治秩序，由此当然也能普及于国际秩序。这里不言自明的基本假设是只要世界上还有反民主和不民主政府的存在，他们就会诉诸于战争征服，而民主国家是从来不会从事这种战争的，因为民主意味着开明的国民和负责任的公共舆论，他们会抛弃非理性的权势争霸而热衷于追求一个更为理性、秩序与和谐的世界。威尔逊这里关于“世界公共舆论”的观念十分关键，他相信世界公共舆论致力于追求和平，当全世界范围内的公共舆论也就是民主理想得以表达时，民主一定会无往不胜。到那时，国内的民主与国际的和平只不过是同一硬币的两面。

这一观念也有其经济基础，民主的十字军东征意味着个人拥有尽可能不受干预而追求个人行动的自由，在各个国家以边境为界设置经济障碍的情况下，这些行动将有利于国内财富的增加并创建一个更为相互依赖的世界。此外，一个和平的世界也意味着更少的武器，各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将多用于经济发展而少用于军事备战。

从 1917 年 4 月到 1918 年 11 月停战，威尔逊做出过无数次声明以阐明他的观点，其中最为著名的是 1918 年 1 月的“十四点”演说，其中列举了结束战争的基本条件。与他的十字军精神相一致，“十四点”包括公开外交（反对秘密条约和同盟）、“门户开放”、军备控制以及确保未来和平的一个全新国家联盟，这些观点在当时都已经存在已久，而威尔逊的贡献则在于将它们结合到一起并组成了致力于未来和平的工作日程。

“十四点”也包括了针对国家边界的具体方案，这一点更具传统色彩，因为所有的战争都会导致国家边界的重新调整。但威尔逊重新定义战后国家边界的基本指导是“民族”的原则，也就

是人们称为“民族自决”的原则，它也来自于威尔逊的民主理念，意味着一个国家的人民有决定自身命运包括创建国家的自由。这种每个“民族”都应当拥有自己国家（或许可以称为“民族国家主义”）的观念从19世纪以来就有所发展，历史还将证明它依然是持续贯穿整个20世纪的一支巨大力量，威尔逊对之充满信心并以之反对诸如由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所代表的多种族的国家组成观念。这样，“十四点”就提议组成奥匈帝国的不同民族的“自治发展”、波兰独立（拥有出海口）、削减土耳其境内被土耳其民族所占领的土地以及根据“清晰可认的民族国家分界线”对意大利边境进行局部调整。但这些原则的阐述远比实际上的贯彻容易得多，因为世界上一个民族只居住在一个地方、或一个地区只由一个单一民族组成的情况极为少见。威尔逊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些困难，但实际上即便是认识到了，他依然会拥护民族自决的原则，否则让民主在全世界通行无阻的概念就太过抽象。①

他的演说还呼吁交战国从俄国、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撤出军队、恢复比利时的独立以及将阿尔萨斯—洛林交还法国等，尽管上述国家和地区都存在复杂的民族关系，但这些措施也都可以说是基于民族自决的原则。最后，在“十四点”的第五点，威尔逊还提到了对殖民地的平等调整，这是他整个演说中惟一提到殖民地问题的地方，或许显示此时威尔逊心目中的当务之急还是欧洲问题。很显然，他没有考虑将民族自决的原则应用到欧洲的海外殖民地，随后他及其继任者将被迫为具体界定他们在该问题上的态度而表明立场。

① 对和平条款的更多思考和研究都是由咨询团完成的，它是在1918年为协助总统准备和平会议而组成的，包括150名学者和相关专家。参见劳伦斯·盖尔芬德：《咨询团》（纽黑文，1963年）。

总而言之，这是为和平所设计的一份不同寻常的说明、一个评断国家行为的里程碑，或许其中的关键是它的普世主义特点：它清晰地阐明了界定战后世界秩序的一些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份强加给德国的报复性和平条款。当然，德国被要求撤出比利时等国以及放弃阿尔萨斯和洛林，拥有出海口的波兰独立也意味着剥夺德国的部分领土，与德国结盟的奥匈帝国以及奥斯曼帝国也不得不面对庞大国土的分崩离析。但是，英国、法国、意大利甚至包括美国在内也都将面对新规则的制约，其中一些条款甚至还损害到它们的传统利益。

威尔逊之所以将他的方案以如此普遍和宽泛的方式提出，主要是因为他相信这是说服各个交战国，特别是德国、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普通百姓体面地放下武器的最好方式。不知威尔逊此时心目中是否考虑到中国、日本和其他的非欧洲国家，但后者也都很快认识到了威尔逊主义的重要和深远影响。（1917 年 10 月，美国和日本签署了《兰辛—石井协定》(the Lansing-Ishii Agreement)，结果是前者承认后者“在中国的特殊利益”。这听起来是与威尔逊所呼吁的原则完全相反的旧日外交，但该协定包含一份秘密协议，声明两国“不利用现在的局势在中国寻求可能导致剥夺其他友好国家公民权利的特权”，很显然，后者符合威尔逊的原则。但颇具讽刺和不幸的是，他们将之作为秘密条款没有对外宣布，而不知道这一点的中国人激烈地抗议《兰辛—石井协定》。）[1]

当“十四点”公布时，绝大多数的美国军队还没有抵达欧洲，和平迅速到来的机会依然遥远。实际上，德国在 1918 年 3 月还成功地将俄国分离出了战争，就像接着所看到的，布尔什维

---

① 对《兰辛—石井协定》的解释，参见伯顿·比尔斯：《徒劳的努力》（北卡罗来纳州杜厄姆，1962 年）。

克领导人决定把摆脱战争当成其优先目标，为了取得和平，他们甚至愿意接受屈辱性条款（诸如失去波兰、芬兰、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布列斯特—列托夫斯克条约》（the Treaty of Brest-Litovsk）使得德国能够全力对付西线，实际上，“盟国们”甚至还担心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会加入德国的行列。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关于和平的谈论似乎都为时尚早。但是随着战局在夏天的扭转，威尔逊的战时声明便成为双方同意停火的基本话语背景，到9月底，德国政府找到威尔逊表示可以接受以“十四点”为基础的和平。威尔逊欢迎德国的举动，并在德国人完成其政府改组使其看起来较为民主（诸如废黜皇帝）之后再设法取得协约国的同意。尽管也存在一些保留意见（诸如欧洲协约国要求德国的赔款），但协约国还是接受了威尔逊的动议，实际上也是承认了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领导地位，他们已经无力继续战争。美国的介入是必需的，但其介入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军事和战略领域，更重要的体现在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欧洲的战争成为美国为和平而进行的一场十字军东征。

十字军远征也有其国内的对应面。实际上，威尔逊的战争努力与其国内改革密不可分。他决心通过思想动员进一步推进进步主义的改革，他和他的支持者，诸如沃尔特·李普曼、赫伯特·克罗利、伯纳德·巴鲁克等都认为战争是完成这一任务的难得机会，因为战争需要全国的团结和动员，而这正是重组国内事务的最佳条件。他们大力宣扬经济规划、公共服务以及国际事务的公众教育等，我们当今称之为“公共外交”的最后这一点是一大创新，其出发点是威尔逊通报美国战时外交的想法以及让美国民众了解战争的重要性。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们还专门设立了一个新的机构：信息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Information），在一个科罗拉多办报人乔治·克利尔的领导下，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广泛的新闻活动，最具代表的是“四分钟人”活动：地方

负责人向其左邻右舍发表简短讲演并讨论国际问题。在海外，委员会也派出他们的代表从事公共关系活动，而且还常常与从事同样工作的领事以及外交人员发生冲突。[①]

此类公共关系活动并非为战时的美国所独有，诸如英国也通过外交部的信息局（the Foreign Office's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在国内外发展了一套更为精细和复杂的公共信息系统。然而，对于威尔逊来讲，这些活动的目的并不是仅只为了战争的眼前之需，也是为战争停止后的未来世界奠定基础。极具讽刺的是，全球的民众在战争结束后都熟悉了威尔逊的理想，美国公众也对外国事务具有了史无前例的了解，但也正是这一教育过程使得美国人和外国人更加清晰地看到了理想与现实、承诺与操作之间的鸿沟。此外，公共教育也未必一定使得人们都变成国际主义，也许正是由于认识到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一个少数民族，或者是一个受压迫群体的权益，他们可能会变得更加民族主义甚至是地方狭隘主义。如何调和他们的这些期望和全球和平秩序总目标两者间的矛盾，这一问题在战时还较为模糊，但显然成为战后的一个巨大艰难挑战。

威尔逊和列宁

问题的一个方面已经十分清晰：布尔什维克对威尔逊动议所构成的挑战。让国际事务民主化是威尔逊与反动和专制势力作战的主要诉求，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发生在俄国的一场与威尔逊主义很不相符的运动也向公共舆论以及普通民众发出了同样的呼吁，布尔什维克党人以人民大众的名义取得了政权，并承诺立即使国家摆脱战争以结束人民的苦难。当威尔逊相信他是在为民主

① 克雷格·沃尔珀：《威尔逊的公共外交》，载《外交史》（1993年冬）。

而战以及民主阵营也应包括俄国时，列宁、托洛斯基以及其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却断定、而且是正确地断定俄国人民已经厌恶战争，只有通过与德国签署一项单独的和平条约才能确保革命政权的继续存在。布尔什维克退出战争的决定直接对威尔逊的领导地位构成了挑战。

如果布尔什维克能够再稍稍多等一些时间，美国人就可以抵达法国并确保协约国的胜利，那样或许俄国也会成为一个战胜国，但他们当时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而是满脑子的国内危机，核心问题是不惜一切巩固政权，反布尔什维克势力、沙俄保皇党等各种力量遍布全国，布尔什维克不可能在消灭他们的同时还继续着一场对外战争。此外，他们也不相信德国能够容易地被击败。毕竟，他们还认为英国、法国和其他所有国家的人民都像俄国人一样厌倦了战争，就像托洛斯基指出的那样，俄国摆脱战争的榜样或许能够激励他们迫使自己的政府也作出同样的决定。[①]如果这样，很快就会达成停火，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俄国也就能够要求和平安排过程中的领导权，如果可能，这种情况下的和平就是一种人民的和平，它将不同于重组国家边界和从战败国取得赔偿的传统规则。这是威尔逊面对布尔什维克俄国的第二个挑战。由此，美国的战时外交和策略将与应付这些新的挑战而密切相联。

与此同时，俄国和德国的停战产生了直接的军事影响，德国军队不但能全力集中西线，而且也会掌握乌克兰及其邻近地区的巨大资源，协约国运送到俄国并存放在诸如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摩尔曼斯克等海港城市的物资供应和军火武器也会落入德国之手，囚禁在俄国的德国和奥地利战俘也会被释放并重返战场（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主要是捷克的军队也许拒绝这样并加入协约国，但

① 列夫·托洛斯基：《我的一生》（伦敦，1930年），第31章。

不会改变整个形势）。此外，协约国还确实担心布尔什维克会加入德国的战争，很多西方人认为布尔什维克是受到德国的指使或接受德国的资助，德国和俄国的联手无疑会成为结束战争的巨大障碍。

失去俄国对亚洲也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布尔什维克最初并没有将其控制扩展到西伯利亚，那里的“白”俄罗斯还有十分强大的势力，因此，只要在发生两者政权交替的地方，就会有不同规模的武力冲突，实际上，整个西伯利亚地区都陷入了这种内乱。这种形势为分离主义和外国势力特别是日本的野心提供了机会，日本深切关注那里的局势发展，一些军方领导人开始鼓吹至少将东西伯利亚从俄国分离出来的战略。如果这样，日本就会成为一个可怕的亚洲大国，且不论对中国，即使对美国而言也是一个十分严重的前景。

基于上述所有原因，布尔什维克的上台具有重要的战略影响，如何应对这一形势越来越成为威尔逊及其幕僚的关注点。

整个问题还有其经济因素的一面。俄罗斯以及乌克兰一直是世界上主要的农业生产基地，战时对农民的征用以及政治动乱已经导致了严重的粮食短缺，而现在乌克兰的丢失更是加剧了整个国家已经动荡不安的经济形势，接着还有布尔什维克的土地国有化方案，令整个经济形势更加混乱不堪。此外，战前的俄国已经积累了大量外债，外国特别是法国的资本多投资在铁路、银行以及工厂，沙皇政权为支付日俄战争以及其他开支还出售了债券。但是，布尔什维克却声称这些都是和一个已经被推翻、而且也不代表俄国人民真实利益的政府所签署的，并拒绝承担这些债务。这种革命性的姿态不但使得布尔什维克不可能再从海外筹借到资金（即便是他们愿意），更招致了外国的敌意，他们一致坚持在承认新政府之前首先解决债务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人民遭受了严重的困难，但布尔什维克

人显然盘算着他们可以在战争结束后集中力量重建国内经济，也能诉诸于其他地方同情者的人道主义援助。但这种希望在欧洲交战国自顾不暇而更不可能提供食品和相关物资的情况下太过空洞，惟一的希望只能落在美国身上，但让布尔什维克转到这一方向以及美国愿意提供人道主义救援都需要时间。[①]

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还发出了意识形态攻势，不但对传统的欧洲外交、同时也对威尔逊的国际主义构成挑战。他们是世纪之交的反帝国主义论的信奉者，其中有约翰·霍布森和鲁道夫·希法亭等，他们指责大国的帝国主义行为危害了自身国家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真正利益。作为布尔什维克的主要思想家，列宁也就自然将反对帝国主义当成了其革命学说的核心内容，他在1916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指出，为了给剩余资本寻求出路，资本主义国家注定要变成帝国主义，欧洲的战争是一场纯粹的帝国主义战争，是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结束战争和摆脱资本主义剥削的惟一出路就是消灭帝国主义。在1917年取得政权后，列宁断言这可以通过支持殖民地被压迫人民事业的方式取得成功。他、托洛斯基以及负责布尔什维克政府外交事务的列奥·加拉罕**都反复宣扬反帝国主义的原则，具体来讲，他们批判沙皇在殖民地地区的所有行为，谴责和其他帝国主义所签订的殖民协定，并号召殖民地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的西方主人。[②]

这种姿态不但将布尔什维克的对外政策置于传统欧洲大国政治的对立面，而且也将自己与正在出现的威尔逊的领导地位对立

---

① 关于美国对俄国的救济行动，参见威廉·艾普尔曼·威廉斯：《俄美关系》（纽约，1952年），第193—201页。

** 亦有人译成喀拉罕或卡拉汉。　　译者

② 对列宁反帝国主义的讨论，参见艾伦·惠廷：《苏维埃对华政策（1917—1924）》（纽约，1954年）。

起来。列宁嘲笑威尔逊主义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开明主义，像老式欧洲体系的资本主义一样罪恶，断言威尔逊像欧洲的统治阶级一样只对保卫资本主义感兴趣，只有布尔什维克代表着真正的变革并致力于一个彻底的新秩序。

威尔逊充分认识到了列宁主义的挑战，并为回应它而专门提出了“十四点”。如前所述，“十四点”当中关于外国军队撤出俄国的一点就是为了确保战后德国以及其他外国势力都不能留在俄国。其他各点则都清晰表明了威尔逊对一个由民族自决原则和国际合作精神为指导的世界的展望。不幸的是，列宁却将之当成不能给国际关系带来任何革新的资本主义式的花言巧语加以拒绝：只适用于欧洲民族的自决原则难以触动世界其他地区，而提议的国际联盟也仅只不过是几个将继续控制世界事务的现存大国的组合而已。

这很快成为威尔逊主义与列宁主义、美国理想与俄国革命两大对立的萌芽。但如果说在1917—1918年两国的分界线就已经明确划定也不符合实际，因为威尔逊此时也正在拉开他和欧洲列强之间的距离，尽管他在战争问题上加入了他们。他认为美国在战时和战后都会承担着独特的角色，而为了确保其行动自由它就必须与英国、法国及其他协约国保持一定距离。他希望能够鼓动起欧洲大众以废除旧日外交，在这一点上，他与列宁并无差别，俩人都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国际秩序，都看到了国际秩序和国内秩序两者的明确关联，至少就欧洲而言，威尔逊和列宁都支持解散哈布斯堡和奥斯曼帝国。因此，两位领导人以某种方式走到一起并携手合作去重新稳定世界事务的可能性并非完全没有。

不幸的是，美国与布尔什维克俄国的关系不但没有得到任何进展，反而由于前者和日本在1918年夏进行的一次东西伯利亚远征而恶化。

这次远征的直接背景是军事和战略的需要。如前所述，美国

和协约国害怕德国会利用俄国的资源和人力从事战争，因此十分需要阻止这种可能性的发生。英国和法国政府为此都要求威尔逊对俄国实施某种形式的军事行动以达到这种目的，具体来讲，它们主张远征西伯利亚开辟东方战场，以迫使德国和他们认定的布尔什维克盟友不得不关注那一地区并从西线抽调力量。这种联合远征也肯定会为反布尔什维克实力壮胆，他们当时被认定渴望俄国继续作战。

但是，任何此类的干预行动都与威尔逊关于所有外国军队一律撤出俄国的政策声明相冲突，威尔逊热切地希望和相信这能够给俄国提供一个自我发展的机会，当然并非最终一定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他还担心轴心国特别是日本会利用这样的军事干预行动达到各自的自私目的，使得自己所一向阐发的崇高战争目标功亏一篑。

直到 1918 年春天，当威尔逊得知一支捷克军团受困于西伯利亚时，他才说服自己联合东征西伯利亚的紧迫性，而且当时日本显然已经不顾其他协约国而决心向东西伯利亚派出自己的军队，其意图当然在于加强对这一邻近满洲地区的控制。在满洲，日本已经通过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巩固了自己的力量。威尔逊决定阻止日本的单边行动，而且还要尽一切代价维持国际合作。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加入日本的西伯利亚远征。经过 1918 年初夏几周忙乱的谈判，东京和华盛顿达成协议：两国各派出不超过 8000 人的军队进入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协助维持那里的秩序和以之为终点的西伯利亚铁路，以确保捷克军队能够安全撤出俄国。[1]

不幸的是，西伯利亚远征完全是一场大失败。其一，当大约

---

① 弗雷德里克·卡尔霍恩：《实力与原则》（俄亥俄州肯特市，1986 年），第 193－210 页。

8000 人的美国分遣队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时，捷克军团的绝大多数已经安全地撤离了西伯利亚腹地而不需要美国人的拯救了。此外，欧洲的战争几近结束，开辟东线战场的战略需要也不复存在。实际上，抵达西伯利亚的美国军队几乎无所事事，除了和日本军队经常发生摩擦与纠纷。

日本军队的人数非常多，他们无视每国 8000 军人的限额，最终派出了超过 8 万人的军队，目的在于确立日本在该地区的牢固地位。他们还进入了西伯利亚腹地和其他城市，其中一部分还转向了从西北到东南而横穿满洲的中东铁路。他们的行动引起了美国的反感，双方产生了公开的敌视。因此，威尔逊很快就后悔决定实施了此次远征，并准备在战争一结束就尽可能迅速地撤出美国军队，这是丝毫也不奇怪的。

无论是对美日关系还是美俄关系，此次远征都留下了一笔苦涩的遗产。布尔什维克将会长时间记着此次行动并将之视为帝国主义干预革命的典型事例。重要的是当交战国在 1919 年初聚会巴黎商讨和平条款时，美国和日本的军队还在西伯利亚。就俄国而言，对德战争早已结束（自从 1918 年 3 月的《布列斯特—列托夫斯克和约》），而令人羞辱的是外国军队依然驻扎在自己的领土上。布尔什维克没有被邀请参加和平会议，而他们自己也无意在这样的情况下赴会。实际上，美俄双方仍然都在作出防止事态完全失控的努力，尽管发生了西伯利亚的远征事件。威尔逊继续坚持列强应当尊重俄国人自决的原则，他甚至还可能出面代表他们对不在彼得堡建立民选政府的问题进行调解。在列宁一方，他对与西方国家，特别是与能够提供最多经济援助的美国保持某种形式的联系也十分谨慎。

因此，威尔逊和列宁亲自会面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实际上，前者在巴黎对列宁发出了一份邀请，建议双方在普林吉普岛

(Prinkipo Island)* 会面并讨论在俄国建立一个代议制政府。[①] 但该建议最终没有成行，因为列宁坚持只能由布尔什维克代表参加，而威尔逊却要求其他党派也能出席。就此，美国和布尔什维克俄国的直接首脑会面被迫推到了 24 年之后。

---

* 土耳其境内马尔马拉海域中较为接近伊斯坦布尔附近的一个小岛。——译者

① 威廉斯：《美俄关系》，第 164—168 页。

第四章　凡尔赛的和平

新　和　平

巴黎和平会议始于1919年1月18日，一直延续到6月28日才在凡尔赛宫签署了一项对德和约。在这5个月期间，战胜国的领袖们共聚一桌，不但讨论了施加给敌国的和平条款，而且还筹划了战后世界的雏形。威尔逊和战时欧洲盟国的领导人劳合—乔治（英国）、乔治·克里孟梭（法国）、维多利奥·奥兰多（意大利）等都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议，被卷入战争的两个亚洲国家日本和中国尽管没有政府首脑亲自出席，但也都派员参加了巴黎和会，实际上，美国以及这些国家对处理一场源于欧洲战争的参与本身就清晰地表明欧洲主导世界秩序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1]

每个参加会议的国家都有自己的具体要求。美国已经在威尔逊的“十四点”当中阐述了自己所主张的和平条款，威尔逊及其随从决定创建一个尽可能多地反映这些条款的和平。这也符合德国代表团的愿望，德国本身就是在“十四点”的基础上才同意停火的，柏林的代表相信按照这些条款达成的和平德国只能接受，而它目前正致力于摆脱战后的混乱局面：军方不承认自己是被战

---

① 对巴黎和会的最好简要回顾仍然是见证人哈罗德·尼科尔森的回忆：《缔造和平》（伦敦，1933年）。

败的，在布尔什维克影响下的极端分子又叫嚷着要推翻政府抢夺权力。尽管依照“十四点”的和平方案也意味着失去部分领土，但它显然也能够保持德国作为一个位于法国和俄国之间的大国的尊严，德国人在巴黎还声称，他们将成为抵御布尔什维克极端主义的主要缓冲国。[①]

其他的欧洲国家也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感到恐惧，但这并不能阻止它们追求报复和惩罚德国的处理方案。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都坚决要求限制德国的武装力量以防止其安全再次受到威胁。在领土方面，除了阿尔萨斯和洛林，法国还要求拥有丰富煤炭资源的萨尔区。战胜国的眼睛还都盯上了德国的殖民地，希望能够根据他们在战时所订立的秘密协定进行分割。此外，他们还都希望从战败国得到战争赔偿，以此有助于各自的战后重建，同时又达到了在经济上削弱德国的目的。日本决心继续保持其已经占领了的德国在太平洋的势力范围，并试图取得德国在中国山东省的权益和地位。中国当然反对这种转让，它在巴黎的主要外交目标就是要收回德国和奥地利在自己国土上的种种特权。

鉴于美国“盟国”们大相径庭的目标，巴黎和会很快陷入各国间的一系列激烈冲突。即便是威尔逊享誉全球的名望和声誉也不足以确保其取得外交成功，他发现自己不得不向“盟国”进行让步以拯救会议和完成和平协定。由此，经过艰辛谈判最终达成的《凡尔赛条约》与威尔逊主义的精神是如此的背离，以致于德国代表团以极不情愿的态度签署了它，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这是惟一的选择，否则将没有任何其他形式的解决方案，而那无疑对饱受战乱之苦的德国更具灾难性。

然而，如果就此断言凡尔赛和平完全抛弃威尔逊主义也是不

---

① 对1918年秋天威尔逊和德国人复杂谈判的最详尽研究是克劳斯·施瓦布：《世界大战、革命德国与和平缔造》（查佩尔希尔，1985年）。

对的。实际上，它修正而不是拒绝了“十四点”，尽管其中的某些条款对德国的确极端苛刻，但是关于战后安排的条文却体现了威尔逊的设想。

首先，德国以丧失领土、严厉限制军备和支付战争赔偿受到了惩罚。曾经强大的欧洲中央大国被迫在东、西两面割让领土，新成立的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都包含了部分曾属于德意志的领土，波兰还被给予一条穿越德国的狭长土地以拥有通向北海的出海权，但泽（波兰语称之为格旦斯克）被划定成一个自由城市，虽然走廊地区和但泽市的主要人口还是德意志民族，但“波兰走廊”就此将德国分成了两个部分。此举在理论上违反了民族国家以及民族自决的原则，但其主要考虑还是制衡德国，并鼓励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作为独立国家的发展。在西部，德国将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使两国的边境恢复到了1870—1871年普法战争之前的状态。此外，德国还不能在毗邻法国的莱茵河西岸地区驻扎军队，此举显然是加强法国安全感的一种办法，以防止德国复仇主义分子在阿尔萨斯—洛林问题上滋事。

德国在战后军备方面也受到了严厉的限制，这一点倒符合“十四点”当中关于武器控制的精神，尽管此时该精神只是用到了德国及其昔日的盟国身上。凡尔赛条约限制了德国的武装力量（具体见下章）并为其军火生产制定了清单。所有这些举措都将损害到德国的主权并成为德国人的长期痛苦回忆，但对协约国而言，它们却是创造一个更为安全世界的关键措施。威尔逊的用心是最终将这些军控方案也适用于其他国家，然而他同时却又支持进一步加强美国的海军力量。因此，必须承认此时的裁军只是应用到了战败国身上，尽管后者特别是德国并不承认是被战败的。

尽管“十四点”没有提及战债问题，但如前所示，英国和法国却以作为回应德国停火建议的条件而迫使威尔逊总统接受这一要求。威尔逊基本上是反对赔款的，不仅仅是它意味着将所有战

争责任都完全归咎德国，更因为德国被迫承担的巨大赔款数目将妨碍其经济恢复，而它又是整个欧洲经济复兴的关键所在。但欧洲盟国在这一点上极为顽固，最后美国只好表示同意。凡尔赛条约没有制定具体的赔偿数目，但规定设立一个赔偿委员会研究制定每个先前敌国应当赔偿的基本数目。

战后欧洲秩序的一个核心部分是德国受到惩罚和削弱，同样重要的还有中欧和东欧一系列新兴国家的建立。除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之外，还有奥地利、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他们都是在奥匈帝国废墟上出现的新国家。此外，与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或者同时与两者保持微妙关系的巴尔干半岛上的诸多半自治国家，此时也都变成了完全独立的国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希腊，这些位于德国东部和东南部的国家的作用被认定是为了制衡德国。最重要的是，作为德国直接邻邦的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角色十分关键，难怪法国一直试图加强这些国家，而20年后德国对他们的入侵则直接意味着另一场欧洲大战的降临。[①]

在西部，比利时的独立得以恢复，它将与荷兰、卢森堡和法国一起确保西欧的安全。尽管不是不折不扣地按照原文的规定，但这些安排大体上还是遵从了“十四点”的精神。对意大利的处理稍有不同，而且基本上没有太多地改变它的边界。正是因为这一点，意大利的一些人强烈反对凡尔赛的和平安排，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有功于协约国的战争，由此应当得到哈布斯堡帝国的更多领土。

为了避免上述领土安排难以稳定战后欧洲以及防止侵略性德国的再次崛起，和平会议还建立了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

① 也有人提出反论，认为凡尔赛条约并没有充分地削弱德国，参见A. J. P. 泰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伦敦，1961年）。

(the League of Nations)，这也是“十四点”所提出的。国际联盟盟约详细规定了联盟的组成及其作用。首先，它将邀请所有的主权国家都加入联盟，尽管先前的敌国暂时处于察看状态，但同意它们在一段时间后可以参加。此外，由于考虑到其持续的内乱，俄国没有被邀请。(即便得到邀请，俄国是否能够参加国联也是值得怀疑的，他们一直声称国联是变相的帝国主义、最好也只是资本主义的国际主义，并以此为由拒绝加入。)[①]

但是，并非所有成员的待遇都是平等的。国联成立了一个由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五大国代表组成的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五大国在其中相互交换意见并向国联提出建议，但不像后来的联合国，该委员会成员不享有否决权。威尔逊也曾考虑由美国、英国和法国结成一项互助安全协定以制衡德国，但后来还是因为此举与国联精神相违背而放弃。尽管委员会成员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道德而非军事方面，但对威尔逊的蓝图来讲已经足够：五大国将树立一个通过国际合作以确保各自安全的榜样。

联盟盟约第 10 条规定在需要时可以使用集体武力，如果一个成员国侵犯了另一个成员国的主权与领土，国联将采取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制裁措施以惩罚侵略者。这意味着国家间边界的任何变动只能通过谈判而不是武力手段加以和平解决，国界的“和平调整”与分歧的“和平解决”原则成为新国际组织的核心思想。

这些原则听起来令人赞赏，但却招致反对者的激烈批评，指责它们冻结了世界上的领土现状。通过对欧洲以及我们后来所看到的对世界其他地区的重新划定以及加强和平的集体安全条款，可以说是国联盟约界定了一个为所有成员国所尊重和维护的新现

① 参见约翰·汤普森：《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凡尔赛和平》(普林斯顿，1967 年)。

状。威尔逊的许多国内批评者都拒绝接受冻结现状的条款，特别是国联盟约第十条意味着美国将承诺去维护这一点，因为这样的安排会把美国拖入一场情非所愿、与自身重要利益和安全无涉的战争。反对者们都以上述恐惧来加强自己观点的说服力，但威尔逊也同样言之成理，他重申正在出现的国际秩序不是恢复军备和结盟的旧世界，而是所有国家都应当为其他国家的集体防卫作出贡献的新秩序，此外，他还强调指出如果没有第十条，整个国联的国际主义大厦将难以自立。

当然，也应当承认，国联盟约的条款也的确让那些寻求改变领土边界的国家感到困难。然而，如果由于国家间广泛经济交往的增加，使得边界在经济而不是政治方面变得不再重要，那么这一点也许就无所谓了。威尔逊也一定这样想，实际上，也只有出台促进经济国际主义的办法，国联的国际主义才能够有机会生存。不幸的是，至少在问题清晰出现之前的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情况并非如此。

新和平的经济问题

新和平的经济基础摇摇欲坠的部分原因来自德国的赔款问题。当超越“十四点”并决定向德国要求战争赔偿时，凡尔赛和约的签署国就已经砍下了新和平的一角。为了满足战时敌国的复仇心理，德国不得不牺牲自己的战后经济复兴，而一个经济脆弱的德国又是整个中欧的动荡根源。更重要的是，德国人对这种违反“十四点”的行为十分不满，认为凡尔赛和平很不公正并造成了德国的苦难，这很难说是国联机构能够正常运作的吉兆。

然而，这只是国联及其盟约所存在的众多问题中的一个方面，实际上，它对领土的处理与对经济问题的处理一样失败。威尔逊自己在“十四点”中坚持航海自由和获取世界市场的平等权

是和平国际秩序的前提条件，他有意尽可能快地将德国及其战时盟国重新融入战后全球经济，坚信德国的经济恢复对中欧的发展甚至战后整个欧洲的稳定至关重要。然而，国联盟约却对各国在这一方面的利益只字不提。

围绕德国赔款问题的分歧首先揭示了美国的欧洲盟国对该问题的严重重视程度，在它们看来，当时估价超过 200 亿美元的战争赔偿对其各自的城市、乡村以及整个经济重建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战败国的资金输入，这些战时盟国恢复和平时期经济生活的努力就会更加困难。他们已经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数千亿美元的财产遭到毁灭和破坏、贸易和生产领域的损失更是巨大），因此急需外来的资金，而这只能来自美国和德国。

在经济重建的过程中，欧洲各国政府也不愿意尽快放弃战时对黄金外流以及部分不必要外国商品进口等实施的管制措施。交换和贸易控制是在战争期间实行的，在没有明确战争赔偿一定到来的情况下，他们都不愿意恢复到 1914 年以前的国际经济流通体系。

在这种情况下，威尔逊不得不对德国赔偿问题作出让步。此外，在没有承诺美国资金协助欧洲经济重建之前，他也不能迫使欧洲国家迅速恢复国际经济流通。但在美国，战争的结束导致向和平的迅速“恢复”，尽管当时对欧洲各国的政府贷款仍在继续（实际上，在 1918—1920 年已达 26 亿美元），但所有这些项目的终止都是早晚的事情，对外金融事务最终也将恢复到由私人银行家和投资者掌控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他很难在巴黎和平会议上推动更具活力的经济国际主义方案。

实际上，即便是在美国国内，也存在着强大的经济民族主义而不是经济国际主义的势力。商人、银行家、政府官员以及劳工领袖等都欣赏战时的经济繁荣，并相信在面对欧洲竞争者可能重返世界经济竞技场的情况下，将这种繁荣局面维持到战后的最好

方法就是通过出台一些政策和立法措施以加强美国的竞争力。譬如，国会甚至在停战之前就通过了韦伯—波梅兰斯法案（the Webb-Pomerance Act），授权出口商在出口贸易方面进行联合而免于违反反托拉斯法的制裁。[①] 这是确保美国贸易持续增长的一种方法，但也显示了威尔逊以及美国领导人在重新界定国际经济框架的情况下也要主动考量美国国家利益。因此，其他国家试图确立保护其工业和增加贸易的相似安排也就毫不奇怪了。

另一个关于德国前殖民地的问题也同样具有战略和经济意义。巴黎和会的参加国在德国放弃其帝国的问题上很快达成一致，但是在如何处理德国前殖民地方面却产生了相互冲突的意见。英国（包括澳大利亚）、法国、意大利和日本都盯上了它们，但美国却明确提出自决的原则。尽管该原则主要应用于中欧和东欧，但威尔逊也希望战胜国不要将德国的殖民地当做战利品而简单瓜分了事。在这一问题上，威尔逊取得了成功，因为他说服与会者接受了一种新型的委任托管制：将德国的殖民地分配给一个大国，它将在国际联盟的委任下对之实施管理。也就是说，国联将对这些殖民地的福利和发展负责，而真正的管理权却在这些大国手中。这是一种独创的制度，它确保了国联在世界各地可以贯彻自决的原则而同时无需宣布这些殖民地的独立。

该制度既是一种政治处理，也是一个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因为当中一些委任地（特别是中东）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而另一些（诸如太平洋诸岛）却十分落后并需要大量的外来资金与技术。如此复杂的情况如何被整合进战后世界经济还不得而知，而英国和法国已经对中东委任地的分配

① 琼·霍夫·威尔逊：《美国商业与对外政策》（波士顿，1971年），第一章。

争论不休，预示了未来在自然资源方面的矛盾。[①] 与此同时，得到德国在赤道以北的太平洋殖民地诸岛委任权的日本也试图将它们视为寻求自然资源的领地。美国反对把雅浦岛（the island of Yap）作为日本委任地，因为该小岛位于夏威夷和菲律宾之间，是一个有用的电缆基地。这些分歧在当时都没有得到解决，再次显示和平的经济方面像政治问题一样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解决。

中国和日本代表团在凡尔赛的一个提案使得问题更为复杂，它们建议国联盟约应当提及种族平等。在它们看来，这似乎是建立一个对所有种族与人群都需公正的国际新秩序的最佳时机，即便是一个乏味的“国家平等”的笼统声明也能够让世人感到战后秩序的新颖。当然，不管是中国亦或日本都不认为仅此一个简单的原则声明就能够改变世界的政治现状，但他们认为这将最终导致对在空间和资源上利于白人国家的现有全球经济体系进行重构，正如日本代表团成员牧野伸显指出的：如果新的和平能够有什么新意，那么它必须建立在各国经济平等的观念之上。[②] 不幸的是，由于英联邦国家的极力反对，该方案未被接受，他们认为隐藏在该原则之下的是亚洲人向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无限制移民要求。威尔逊总统虽然对中国和日本的观点寄予同情，但他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对新和平的至关重要性，为了维护其个人调停的合理性，他宣称由于缺乏全体一致的同意而不能对此进行认可。

鉴于威尔逊对世界秩序的经济基础方面众所周知的兴趣，他对凡尔赛和平的这一方面所给予如此之少的关注实在令人奇怪。或许是更为急迫的政治和军事事务占据了他太多的精力而使之无暇给予经济问题以应有的关心，也许更是因为经历了战争浩劫后

---

① 丹尼尔·耶金：《奖品》（纽约，1991年），第10章。

② 多萝西·琼斯：《和平的密码》（芝加哥，1991年），第41－44页。

的国家无心在经济上对别人仁慈，战争还激发了经济民族主义的强烈意识。如何将这种情况与日益出现的政治上的国际主义相协调，是留给战后世界的一个主要问题。

威尔逊主义的确认与背叛

尽管存在着上述这些相互冲突的方面，但应当承认凡尔赛和平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体现了一些威尔逊国际主义的基本信条。排除其中的不足和自相矛盾之处，国际联盟盟约基本上还是一份威尔逊式的文件，它提出了取代传统国际秩序的新方法，在威尔逊看来，这种传统的国际秩序是靠武力为支撑，并导致了危险的军备竞赛和帝国主义的海外扩展活动。而现在军事强权和帝国主义都被一套法制所替代，其中国际秩序的核心是“世界公共舆论”而不再是结盟和军备。

“世界公共舆论”是一个典型的威尔逊的概念，它意味着世间存在一股来自于世界各地人民的道德力量，人民、而不是他们的领袖才是世界的推动者，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有道德的善类。当他们说话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远远大于军事武力的力量。当然，人民也会被误导，也可能一度受到非理性化的欲望和情感的驱使，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似乎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威尔逊坚持他的杰斐逊式的信仰：人类是按照利益和谐化的方式行事的；此外，当他们认识自己的权利时，他们终将废除将之相互隔离的人为国家边界，共同携手追求人类的整体福祉。这样，建立在“世界公共舆论”上的新秩序将是和平与稳定的最佳保障。[①]

极具讽刺的是，他自己的人民不但远未表现出“世界公共舆

① 关于威尔逊主义的杰斐逊渊源，参见约翰·米尔顿·库伯：《武士与牧师》（纽约，1983年）。

论”，反而背弃威尔逊并拒绝接受国际联盟及巴黎和会提出的其他相关和平安排。当然，对德和平条约和国联盟约并未直接让美国人民表决批准，所以威尔逊直至最后仍然相信人民是与他站在一起的。但是至少有相当数量的参议员拒绝接受巴黎和平会议的结果，以至于这些条约未能获取 2/3 的票数得到批准，而在接下来的选举中选民并没有抛弃这些参议员。

参议院对条约的审议从 1918 年夏天持续到 1920 年春天，比巴黎和会的时间还长，反映了参议员们的观点与威尔逊决定誓死追求新和平之间的严重分歧。1918 年的选举导致共和党成为参议院多数党（49 名共和党对 47 名民主党），威尔逊不共戴天的政敌亨利·卡伯特·洛奇掌握了至关重要的对外关系委员会（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其中包括 6 名“不可和解的政敌”，这些共和党分子拒绝以任何形式接受凡尔赛条约和国际联盟，洛奇和这些不可和解分子再加之其他人员足以击败条约。[①]

条约的反对者们也并非一言堂。诸如包括艾达荷州的威廉·博拉和加利福尼亚的海勒姆·约翰逊在内的不可调和分子们都激烈反对美国加入任何像国联形式的国际组织，认为此举将妨碍美国的独立性和玷污美国的纯洁。与无知的传统主义者不一样，他们对一个没有战争灾害和侵略的世界有着一套自己的展望，但认为倡议中的国际联盟不是他们想要的答案。在他们看来，这种和平处理方式以及国联制造并维持了一种新的现状，而成为世界组织成员则意味着美国在需要的情况下不得不使用武力承担起维护该现状的义务，即便是该现状充满着不公正。不可调和分子们不喜欢像英国和日本这样的帝国主义列强在战后世界横行霸道，希望美国与维持这种现状的行动不要有任何关联。在某种程度上

① 关于凡尔赛条约的争论有很多研究，诸如，可参见威廉·魏德诺：《亨利·洛奇和美国对外政策的形成》（伯克利，1980 年）。

讲，他们比威尔逊本人更威尔逊化。

其他人在反对威尔逊方面更加直言不讳，他们拒不相信国际关系就此开始一个新的时代，拒不接受如下观点：因为世界发生了变化，美国就得改变自身传统的自由人政策。一些人坚持不能将门罗宣言和移民等问题上的国家主权交给一个新的国际机构，也有另一些人反对和平条约的一些具体方面，诸如未能迫使日本放弃山东等。

包括洛奇在内的许多参议员都是“有保留意见者”，也就是说，他们并非毫无余地地反对和平条约，而是坚持在支持它之前得到一些限制条件。此外，还有一些民主党参议员也呼吁威尔逊接受这些条件以拯救条约与国联。总统也准备作出一些折衷，毕竟，他依然认为这是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而不是主权国家消亡的世界，尽管他也的确希望削减主权国家的一些权力和特权，特别是为追求自身目的而使用武力等，但他也准备同意避免国内事务（诸如移民）接受国联的管辖。但是，威尔逊在坚持国联盟约第十条方面非常强硬，认为它是国际合作新秩序的关键。洛奇等人寻求修正该条款下的美国义务，要求政府承担的每项行动都应得到国会的授权，这将意味着第十条的落实不得不听从国会的意愿，这一点是总统不能接受的，因为他已经在巴黎作出承诺：美国要协助创立一个新的国家秩序。如果美国要在战后世界扮演某种角色，那么就应当把无条件接受第十条当做是一项神圣的义务。

争吵是实实在在的，对立是悲剧性的。威尔逊相信美国人民会支持他战胜参议院，因此于 1919 年 9 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一场总计 8000 英里、长达 21 天的大巡游，但在还未能估量该行程的效果之前，他就瘫倒在科罗拉多，标志着此行将成为一场无法履行的梦想。参议院继续拒绝接受条约（美国在 1921 年分别与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单独缔结了和平条约；但它们不包括成

为国联成员的任何条款）。

由此而论，如果参议院和美国人民都还没有为威尔逊的国际秩序作好准备，那么其他国家就差得更远。美国当时未能加入国联倒不像是背叛，更表明了美国决定停留在其他国家的水平上。而威尔逊的失败也不意味着威尔逊主义的消亡。在欧洲和世界许多国家都出现了越来越多信奉其理想的威尔逊主义者，在战后世界的塑造方面，他们的影响和传统力量的影响一样强大。

威尔逊主义在欧洲霸权趋于结束的时刻为美国界定其对外关系提出了一个框架，它将美国的军事力量、经济资源和文化创新结合在一起，旨在超越那种主权国家为了一己私立而全然不顾全世界利益的传统方式的世界事务：战争和备战被当成是行为的规范；均势成为外交的主导。伍德罗·威尔逊向这些惯例和设想发出挑战，他希望每一个国家不但服务于自己的利益也要服务于全世界的整体利益。他说，美国应当释放自己的能量“以服务整个人类”，其他国家也应这么做。最终的结果便是国家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融合，而主权国家也只有在与整体的关系中才有意义。

随后10年的“现实主义者们”对威尔逊的国际主义绝无善意，指责它是天真幼稚的理想主义，正像威尔逊的参议院对手们嘲笑他竟然相信其他国家会对该理想作出承诺。[①] 许多空洞的辩论还要完成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信奉者之间。应当认识到，形成威尔逊思想的国际主义并不全是理想主义，而是深深扎根于各国共同利益以及世界各地超越国家边界的人们的共同志向之上的一种国际主义，其中包含一些基本的文化动力，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威尔逊主义是将文化放置到了国际关系的中心地位。尽管在威尔逊之后的几十年内赤裸的强权还是国际事务中的一项关

① 现实主义者批评的最佳例证是罗伯特·奥斯古德：《美国对外关系中的理想与私利》（芝加哥，1953年）。

键性决定因素，但在20世纪末谁敢否认文化再次反复重申自己的权威？20世纪初美国崛起在国际舞台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因为它成为主要的军事和经济强国，更因为它将文化因素引入了世界事务。因为美国全球化已经成为本世纪的一个主要事件，因此威尔逊主义就不应被看成是一个瞬时现象和一种抽象的理想主义的反应，而应视为当代历史的有力定义者。

第五章 20年代：安全方面

裁 军

战后世界始于凡尔赛和平条约签署的1919年。当时没有人知道新和平结构的稳固程度，更不知道这些结构在世界不同的地区意味着什么。随着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和约，一些人已经把刚刚开始的战后阶段看成是充满争斗的国际事务的一个间歇期，许多人对国际联盟以及巴黎出台的各种安排的前景变得悲观。

1919—1920年的世界也的确显得很不稳定，几乎与大战前夜的形势没有多大差别。不只是美国没有参加国联而明显返回到战前的孤立主义状态，还有和平条约似乎在很多国家都很不受欢迎：德国、中国、意大利等等。在这些国家，公开抨击和平条约及其所预示结果的运动已经开始出现，德国谴责和平的惩罚方面，意大利认为他们应当从中得到更多，而中国则因为条约未能迫使日本撤出山东而大加不满。

苏联的局势仍然动荡不安，波兰借机入侵爆发革命的国家，与此同时的匈牙利由于恐惧布尔什维克的四处蔓延而成立了一个极端政府。1919年一个协调全世界共产主义活动的共产国际（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的创立又编织出了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向和平挑战的景象。在各殖民地地区，受伍德罗·威尔逊和列宁激励下的强大而且常常极端的反帝运动四处滋长。尽管一种

国联托管制度得以建立，但这种初发的反帝运动对威尔逊未能在凡尔赛对他们予以支持表示失望，因此，这些领导人十分欢迎共产国际对该运动的支持倡议。[①]

一个这样的世界如何能够维持稳定？大概只有那些有着寻常乐观主义或远见的人才会对战后的国际秩序抱以希望。实际上，20世纪20年代远比任何人在1919年的大胆设想都更为稳定，并充满国际和平与善意。本章和下两章将探讨20世纪20年代国际体系诸方面以及美国在该体系的演变与维护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首先，尽管战后世界纷乱不已，但各主要大国都显示出愿意在裁军方面作出相当的准备，当然，根据和平条约的规定，德国的裁军比其他国家更为容易。根据相关条约，德国只能拥有具体数目的军队和武器，诸如整个德国军队的人数不能超过10万人、最多4000名军官、10.2万枝来福枪和卡宾枪、1134枝轻机枪和792挺重机枪，海军被限制在6艘战舰、6艘轻型巡洋舰、12艘驱逐舰和不超过1.5万名士兵和1500名军官。[②]

威尔逊原希望军控行动并不止于德国，战胜国或战败国都将跟着做。然而，实际上，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国在战后却持续扩充各自的海军，威尔逊本人在1919年就签署了一份海军扩建方案，呼吁增建16艘战舰，这样，美国的海军就会成为世界第一。威尔逊此举显然与他所宣称的裁军原则大相径庭，原因在于他当时接受了对日本以及英国的普遍怀疑情绪：这两国都在加紧制造战舰，总统的思路也许是只有追赶甚至是超越这些国家的海军扩建步伐才能最终迫使他们接受裁军方案。当然，这种军备竞赛极大

---

① 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马萨诸塞州剑桥，1965年），第12页。

② 参见F.L.卡斯登：《德国军队与政治》（牛津，1966年），其中对德国裁军有讨论。

地破坏了稳定，几乎引爆了一场可怕的战争，因此，毫不奇怪的是美国和其他国家都很快相继出现了停止疯狂竞赛而将各国资源用于和平途径的呼声。

召开一个世界性裁军会议的动议来自美国国会，参议员威廉·博拉是海军裁军运动的急先锋。博拉是和平条约大辩论时的“不可调和分子”，而他呼吁全球裁军（一个威尔逊的理想）则显示出他和其他许多人并非完全排斥威尔逊主义，尽管他们拒绝其中的部分内容。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后来被称为“和平进步主义者”，他们反对凡尔赛和平，大力鼓吹自己所信仰的另一种更为稳定和公正的世界秩序蓝图，而此时的一个主要目标便是裁军。他们呼吁只要包括美国在内的军事大国削减武器，世界便可以避免另一场战火。他们当中的许多参议员还认为美国应当结束占领外国、承认苏联并支持殖民地的自决运动。这些主张都不是孤立主义，而且预见了美国未来年代内的政策主张。尽管还有一些人不愿走得太远，但至少在裁军问题上，国会内外已经达成了强烈的共识，实际上，威尔逊的另一位对手亨利·洛奇还要成为出席1921年11月华盛顿海军裁军会议的美国代表团成员。[1]

当然，召开一个裁军会议所需的条件要远远超过一些参议员的努力，除非其他国家都接受同样的观点，认为有必要终止海军竞赛，才可能达成裁军协议。随着军备限制呼声的高涨，英国和日本也都出现了变化，理由既出于经济的权衡（在战后恢复与重建急需资金情况下在军备上大量花钱的愚蠢）也有政治上的考虑（无需与美国敌对）。尽管这两国的海军将领们起初都不愿意削减各自的海军规模，但伦敦和东京当局都决定接受美国的动议，结果促成了由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政治首脑和海军将

① 罗杰·丁曼：《太平洋国家》（芝加哥，1976年）仍然是华盛顿会议的最佳研究成果。

领参加的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就像将要注意到的，在处理中国问题的讨论中，其他一些国家也出席了会议）。

然而，裁军不能与亚太地区的其他安全问题相分离，特别是英日同盟的未来以及各国在太平洋构筑各自的军事基地等问题。1902年签署的英日同盟在1911年被延长了10年，1921年面临再次延长，美国激烈反对，华盛顿坚决要求废除该条约，不仅仅是因为它违背了支撑新和平并显示美国人继续信奉威尔逊精神的公开外交的原则（是指抛弃诸如军事同盟的特殊安排），更是因为续签后的英日同盟会对美国构成战略影响，迫使美国不得不增加海军以便同时与英国和日本的联合海上力量相匹敌，后两者显然也会迎接挑战，这样就会在三者之间引发海军竞赛，从而就像1914年前的英德海军竞赛一样给世界和平带来危险。英国和日本的领导人都明白这一点，尽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极不情愿放弃这样一个能够很好服务于各自利益的联盟，但双方都不想出面挑战美国。

废除英日同盟的决定使得三国较为容易地接受海军裁军倡议，各国代表在华盛顿达成了一项多边的海军裁减方案。根据该方案，美国和英国将销毁部分现有的战船并控制正在建造中的其他战舰，以便使得各自的主力舰总吨位（“主力舰”是指排水量超过1万吨并配有8英尺枪炮的战舰）不超过52.5万吨，由于现有的吨位大大超过了该数额，方案要求美国销毁48艘中的30艘（包括建成的或正在建造中的），英国也要从45艘减到20艘。日本的总吨位限额是31.5万吨，销毁27艘中的17艘，这就是著名的5：5：3比例，日本据此将拥有相当于美国和英国各自60%的海军力量。一些日本海军将领指责这种不利于自身的比例是日本的耻辱，并警告这样一支被削减了的海军不足以保卫帝国，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从未接受华盛顿方案，但鉴于三个海军强国同意在太平洋上就珍珠港和新加坡除外的各自占有的要塞维持

现状，很多人还是接受了该方案（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在条约之内）。和废除英日同盟一样，不修筑新的防御工事协议也是整个裁军协定中的一个主要部分。

如果一些日本人对海军比例感到不安，那么法国和意大利更是如此，它们的总吨位限额分别是 17.5 万吨，只相当于英国和美国的 1/3。但是，巴黎和罗马当局最终都接受了这一方案，他们的理由在很大程度上与英国和日本一样：负担不起耗资巨大的军备竞赛。就此，在凡尔赛条约签署后的短短两年内，一个未能付诸实施的威尔逊主义的诺言变成了现实。

因为华盛顿的海军协定只限定了主力舰，各国仍然可以放手发展其他类型的战舰，即通常被称为辅助战舰，它们包括轻型巡洋舰、驱逐舰以及潜水艇等。此外，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对空中力量的概念还十分感兴趣，飞机当时还处在初期阶段，但它们似乎远比战舰便宜，而且空战也似乎比让士兵面对面绞杀的陆地战更为“人道”。[1] 即便是一些最坚定的裁军支持者也赞成发展空中力量，因为不会有任何限制这种最新型军事武器的国际协定。1927 年，美国又发起了另一轮海军军控倡议，而且是针对辅助战舰。美国、英国和日本都派团参加了日内瓦的会议，但法国和意大利拒绝与会。此外，美国和英国对待巡洋舰的态度也不一致：后者因为需要大量的轻型巡洋舰保卫其辽阔的帝国而不愿意对此作出让步，但美国则希望增加重型巡洋舰的数量。日本试图在美英之间进行协调但未取得成功。因此，日内瓦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协定，而另一次较为成功的海军裁军会议要在 3 年之后。

尽管存在上述的失败，但事实是直到达成核武器控制协议的 20 世纪 80 年代，20 世纪 20 年代是近代历史上真正进行裁军的

---

① 关于美国空权的发展，最好的历史回顾是迈克尔·谢利：《美国空权的兴起》（纽黑文，1989 年）。

10年。当然，德国一直试图通过与苏联的秘密协定超越凡尔赛条约的限制而发展军队，但同样的事实是1929年世界上的军备要比1919年少。[①] 各个国家在武器方面的相对开支都有所下降，兵工厂和造船厂都在增加生产非军事用途的消费品。

这些发展是否导致国际关系的稳定？它们是否在世界上制造了一种安全的假象？现在回头来看，人们可以认为武器控制，至少美英两国海上力量的限制是一个错误，因为它使得军事力量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不管怎样，这种发展军备有错的态度一直持续到了确实需要加强军备的30年代。从这一方面来讲，美国也许从一开始就不应该销毁其海上优势力量。[②]

另一方面，如果就此纯粹从30年代所发生事件的框架来评价20年代，或者将30年代和平崩溃归咎于20年代的裁军也是不正确的。应当看到作为新和平象征标志的这些裁军措施在当时的重大意义，别的不讲，它们是威尔逊模式的一座丰碑，而且由美国出头也别有深意，至少就裁军而言，说明紧随威尔逊之后的共和党政府也像威尔逊本人一样致力于威尔逊式的国际主义。通过削减武器，排除了和平时期经济发展的限制，而且完成此举的方式是国际合作，这些都是重大的成就，表明不再重复1914年之前欧洲形势的普遍决心，一种清晰而为大家共享的观念出现了：世界变了，历史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它更多的特色是和平而不是战争。

---

① 哈罗德·戈登：《德国军队与德意志共和国》（普林斯顿，1957年），第188—189页。

② 参见罗伯特·奥斯古德：《美国对外关系中的理想与私利》（芝加哥，1953年）。

欧洲、亚洲和世界各地的和平

20世纪20年代的和平远不止裁军协定一个方面，维持它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协定，其中包括国联、欧洲的洛迦诺会议条约以及处理亚洲问题的华盛顿会议等，都显示了世界不再想面临另一场大战的希望和决心。

的确，国联是在没有美国参加的情况下开始运行的，本来其支持和平的意愿是最值得依靠的。尽管如此，四个常任理事国英国、法国、日本和意大利与其他成员国一道决心利用这一新的机构来稳定国际事务。理事会由7个国家的代表组成，其中包括4个常任国和3个其他成员国，国联大会的所有决定都须获得他们的批准。国联的规模是该类组织前所未有的：它最初包括41个成员国，其理念是国家间的争端要拿到该机构面前而不是由当事国诉诸武力就地解决。实际上，很少有争端被拿到国联面前，1925年希腊与保加利亚的领土争端是一个例子。但不管怎样，国联的存在就是新和平的一个象征。

更重要的是，作为国联行动的一部分，另一些国际组织也应运而生，诸如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和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这些机构的名称表明国联所关注的不仅仅局限于领土和政治问题，它还同样处理战后世界的经济、社会和医疗问题。人们都清晰地认识到这些问题都具有全球意义，而且也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来加以解决。此外，国联还建立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合作委员会，旨在促进各国私人间的学术与艺术交流，加之在海牙建立的国际常设法院（the 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或所谓的国际法庭〔与1901年设立的海牙常设仲裁法庭（the Hague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不是同一机构〕，这些机构甚至比国联更

重要地激发了跨越国家间边界的合作观念。当然，这里的基本设想是通过此类的合作，世界各国将学会相互和平与和谐相处，就此，国际主义成为战后和平的脊梁。

尽管美国不是国际联盟的成员，但它还是参加了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以及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一些美国人还十分积极并热衷于这些机构的活动。不幸的是，美国选择不遵从世界法庭议定书，本来它意味着美国可以在一些案件方面寻求意见，或者美国的法官可以应邀前往处理一些争端。整个 20 年代的共和党政府一直支持这种想法，但参议院坚决反对，他们害怕该法庭会成为一个将美国拉入国联的秘密途径。然而，回头来看，世界法庭在促进国际主义方面的作用远比诸如国际劳工组织等机构要小得多，因此，对美国政府或至少对美国个人来讲，服务于国际合作与和平事业还是有充足机会的。

紧随凡尔赛会议后的欧洲战后和平还很脆弱。1920 年，国联赔偿委员会将德国赔偿给战时敌国的数目定为 330 亿美元，但德国认为该数目过高而加以拒绝，并以增加钞票的印数而破坏赔偿，愤怒之下，法国和比利时在 1923 年出兵占领了德国的一个工业基地鲁尔谷地（the Ruhr Valley），以此索取赔偿，此举激发了当地德国工人的大罢工，这些事件巧遇阿道夫·希特勒在慕尼黑的政变企图，引起了那些强烈反对和平方案的德国人的欢迎，看来法国和德国的敌对给战后和平形成了一次致命的打击。

所幸的是，这场危机在美国的介入后得以缓和。美国介入的方式不是通过正式的外交手段，而是通过我们将在下章论述的“金元外交”。结果是 1925 年德国、法国和比利时政府在洛迦诺签署了一份协议以冻结并承诺维持各自的边界，此举为德国在 1926 年获准加入国联铺平了道路。在德国，希勒特被囚禁，主要存在于军队当中坚决主张摆脱凡尔赛限制的人也都被同意接受新现状的人所取代，尽管在该问题解决过程中美国只扮演了金融

而非政治的角色，但华盛顿当局还是对洛迦诺协定表示欢迎，并欢呼德国重新融入欧洲秩序。魏玛共和国的经济复兴与政治和解政策完美地符合美国关于战后国际秩序的观念，在外交部长阿利斯蒂德·白里安的领导下，法国也愿意将和平建立在与德国的稳固理解之上。

与此同时，1921—1922 年的华盛顿会议在亚洲也建立了一个合作与稳定的框架。除海军裁军协定外，美国还带头起草和签署了致力于稳定亚太事务的一些其他协定，譬如由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参加的四国公约旨在就相关的地区安全事务提供相互协商机制，几个相关的九国协定（由中国、上述四国以及另外四个欧洲国家签署）确立了在中国问题上的合作与协商原则，并约定了一些针对重新追求“不平等条约”行为所采取的具体步骤。

正如后来所看到的，这些条约并没有立即在亚洲产生一个和平的环境；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要求尽快并彻底改变现状，苏联则鼓励他们攻击华盛顿条约。然而，“洛迦诺体系”与“华盛顿体系”都在界定战后地区秩序方面发挥着作用，一个很好的例证是日本 20 年代的外交变得比以前远为合作，日本军队针对中国的公然军事侵略行动也大为收敛。在中国方面，它最终也接受了华盛顿条约并将之作为其外交的基础，当 1928 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时，美国迅速予以承认并开始条约修正的谈判工作，其他国家也都采取了同样的政策。[1]

相互合作、而不是高压和单边主义的精神同样反映在拉丁美洲的事务当中。如上所论，在战争期间，美国与墨西哥的关系恶化，美国军队进驻海地、圣多明戈和尼加拉瓜。但在战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改变了的世界地位以及威尔逊主义对官方的影响下，美国愿意重新界定其拉美政策。

---

① 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第 3 章。

当然，美国仍然将门罗主义作为它在该地区的政策关键，但其内容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华盛顿的官员不再恪守门罗主义的罗斯福推论，因为它旨在将美国对一些加勒比海国家军事干预和财政监管的行动合法化，他们转而将门罗主义看成是泛美团结与合作的一种表达形式。1922—1923年，美国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中美洲的国家会议，力图促进该地区的全面裁军和仲裁，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宣称门罗主义不是确立美国的保护国以及对美洲国家的统治地位。1928年，国务卿帮办鲁本·克拉克写了一份备忘录，坦言打着门罗主义招牌的干预是错误的，宣称门罗主义应当回归到罗斯福推论之前的本意。同年，赢得总统大选的赫伯特·胡佛游历拉美地区，强调"睦邻"的概念，公开反对干预政策。实际上，在他的总统任期内，美国没有发生干预拉美的军事行动。[①]

国际合作与和平体系在世界各地的逐步确立又被另一事件给予了标志性的强化：那就是包括美国甚至苏联在内的33个国家在1928年签署了《凯洛格—白里安公约》（the Kellogg-Briand Pact）（即所谓的巴黎公约）。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和法国外交部长白里安共同起草了该文件，希望以此将战争非法化，声明各签署国"谴责诉诸于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并在处理相互关系上放弃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做法"。此外，他们还同意"所有争端和冲突的解决和处理……都只能通过和平的方式"。即便是在当时，这些措辞听起来也太过理想化，许多美国观察家注意到这种纸上和平十分危险，因为它会引导人们认为不再需要军事武装。但另一些人，特别是参议员博拉却对此十分严肃，相信此种国际主义远比国联所定义的世界秩序更为现实和公正。

① 关于美洲国家间体系的发展，参见戈登·康奈尔一史密斯：《美洲国家间体系》（伦敦，1966年）。

《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后来被融入国际法，成为未来谴责第二次世界大战侵略者所引用的几个主要文件之一。毫无疑问，不管从哪方面讲，巴黎公约都是20年代寻求稳固新和平的另一种体现。

应对革命民族主义

通过签署《凯洛格—白里安公约》，苏联可以说在经历诸多困难之后又终于加入了国际社会。它曾拒绝和其他国家发生联系，特别是美国。仅在几年之前，苏维埃的领导人还嘲笑将战争宣布为非法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多愁善感，宣称世界和平到来的条件只能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殖民独立替代帝国主义。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美国的布尔什维克政策肯定没有发生变化，尽管一些共和党领袖，特别是参议员博拉等人倾向于改变威尔逊的反布尔什维克立场，但整个20年代的几届共和党政府基本上还是沿袭了这一政策，即除非满足了以下几个基本条件，苏联才能得到美国的承认：同意支付未清的债务、赔偿被国有化的企业、承诺不介入美国国内的宣传活动。这种僵硬的立场使得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难以建立外交关系，而且两国都不愿意采取主动以改变这种状况。

另一方面，外交关系的缺乏并没有完全妨碍两国间其他形式的交流。1921—1923年，美国救济署（the American Relief Administration）共向俄国提供了超过90万吨价值6600万美元的食品，其中美国救济署提供的救济货物占总数的90%，据称这些食品从饥荒手中拯救了1000多万俄国人的生命。[1] 很难证明这

① 弗雷德里克·舍曼：《美国对俄政策》（纽约，1928年），第203—207页。

一说法，但不管怎样，该插曲至少表明美国人没有看到在他们接近苏联的道路上有什么严重的障碍，而且他们也应当作出这样的决定。同样地，像我们将要注意到的，两国间的贸易还在继续，尽管其规模远比美国与欧洲国家的贸易要小得多。问题是不管华盛顿还是莫斯科，双方都不认为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紧迫性，不管有没有这样的关系，他们也能够相互交往。

20 年代绝大多数时间内的俄国对外政策以及共产国际的活动依然表明苏联还是清楚地站在已被普遍接受的战后和平的框架之外。尽管包括英国、法国和日本在内绝大多数国家一个接一个都承认了布尔什维克政权，但这些发展并没有阻止莫斯科通过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和通过殖民地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参与反对资本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行动。

上述的后一种现象在中国特别明显，苏联成功地与中国的各种不同权力中心都建立了联系：北京政府、控制各省的军阀、广东地区的国民党（民族主义者）以及刚刚出现的中国共产党。结果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走向极端，使得中国的领袖和公众舆论都反对为中国提供国际合作框架的华盛顿会议条约，中国的官员、学生、商人和其他群体等都谴责华盛顿条约完全不合时宜。在 20 年代中期，共产党和国民党将各自的力量联合起来发起了大规模的反帝运动，他们袭击美国、欧洲以及日本在中国的人员和财产，并迫使外国商人和传教士从中国内地大规模撤离。

尽管其范围有限，但对美国产生同样影响的是国务院在 1927 年一份题为《布尔什维克在墨西哥和中美洲的目的和政策》的报告。因为 1917 年的墨西哥宪法规定全国的所有地下石油都属于国家，由此在围绕美国在墨西哥的产权和采矿权，特别是原油的开采和提炼方面，两国持续产生了尖锐的分歧。不管是 1920 年执掌政府的奥尔瓦多·奥夫雷贡还是 1924 年接任的普鲁塔克·伊莱亚斯·卡列斯，都不愿意接受美国的论点：即国有化

的原则不应追溯性地应用到1917年之前美国已经拥有的权利。墨西哥如此强硬的立场自然使得国务院将之归于布尔什维克的影响，这一点也的确存在，但远不至在中国的影响程度。此外，美国还怀疑苏联和北美的共产党特务暗地里协助墨西哥支持尼加拉瓜的一个反政府派别。

但是，对极端民族主义这种言过其实的夸大恐惧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而且也没有普及到妨碍华盛顿寻求其他的解决方案。到20年代末，美国官员逐步认识到与其和中国、墨西哥以及其他地区的激进实力维持一种可以想像得到的战争后果的敌对关系，倒不如通过密切的经济纽带来达成一种折衷。就这样，这些国家内部那些寻求与美国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解的势力逐步占据影响，诸如我们知道的墨西哥“国家发展派”（national development wing），他们首先下决心发展经济，并为获取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的货物、资金和技术而准备缓和自己的民族主义。[①] 代表着这种新的发展势头，卡列斯准备与华盛顿进行和解，而后者也正求之不得，卡尔文·柯立芝总统迅速在1927年派遣华尔街银行家德怀特·莫罗作为驻墨西哥新任大使并着手一项石油问题的折衷方案。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很好地显示出墨西哥的民族主义者和美国商人具有共同的利益。在中国也一样，当国民党在1928年统一国家时，他们的领袖蒋介石迅速采取措施与美国和解关系，以便吸引美国的金融家和工程师对中国的现代化进行投资。美国也迫切从这样的建议中受惠，实际上，美国是承认南京政府并表示愿意修改现有条约的第一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鉴于上述这种背景，苏联加入签署巴黎公约的队伍是具有标

① 罗伯特·弗里曼·史密斯：《美国与墨西哥的革命民族主义》（芝加哥，1972年），第245页。

志性的行为，说明了它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状态发生了变化。苏联好像不再热心于全球革命化，而更关注于巩固他们已经取得的成果和稳定其对外关系，实际上，那就是约瑟夫·斯大林谈及“一国的社会主义”所暗示的内容，不再试图将所有国家都引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托洛斯基仍然坚持这一策略，它是列宁在1924 年去世后与斯大林争夺权力的主要对手），俄国将满足于它作为惟一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而斯大林自己的生存与这种温和得多的目标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如何，从今以后的苏联也开始集中于国内的经济建设而不再参与全球革命的使命，因此莫斯科现在愿意、实际上是迫切希望修复它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由此的结果便是稳定重新回到了国际关系领域，结合成功达成的裁军协定以及用于巩固新现状的其他相关条约安排，到 20 年代末，不管是否出于自愿，苏联也在发挥着巩固战后秩序的作用。

第六章 20年代：经济方面

金元外交

任何稳定的国际关系体系都必须有其经济基础，20年代的情况也不例外。实际上，鉴于欧洲经济所遭受的巨大损害，任何不包含经济内容的战后秩序都是不可想像的。如何重建欧洲经济以及通过恢复经济以重新确立稳定的国际经济关系是战后阶段的核心任务。

欧洲为大战付出了惨重的代价：900多万年轻人失去了生命，2000万人受伤，整个战争共耗资4000亿美元。不管是战胜或战败的欧洲国家，工农业产出都不可避免地严重下降，再加之严重的通货膨胀，共同引发了社会和政治动荡。此外，与外国货币的兑换机制也陷入混乱，基于黄金本位与货币兑换原则的战前多边贸易和投资体系在战争期间都被终止，但和平来临时它们难以自动恢复。（只有美国在战争一结束就解除了黄金禁运令。）

加剧这种混乱画面的还有德国的赔款问题和盟国欠下美国的战争债务。如前所述，德国被要求支付总数高达330亿美元的赔偿，对于这一数目，德国的政府首脑与人民都认为是难以忍受的。但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却在赔款问题上极为强硬，因为他们的战后经济重建似乎都系于这些赔款。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在1917年之后还依然向美国大量举债，如前所述，1917—1920年

间，他们的借贷数额已经超过了100亿美元，并且以5%的利率再次延长。美国不但希望所有的债务都能最终返还，而且还要求继续支付利息。然而，欧洲国家却坚持这样做的前提只能是降低利率以及得到德国的赔款资金。

这就导致了战后美欧关系的一个最严重争端。美国反对将赔偿与战债相互挂钩，宣称前者与德国的战罪有关，而后者则是纯粹的商业交易，当然，美国也同意降低借款利息，为此在整个20年代进行了长时间谈判并最终与其战时盟国达成谅解，把对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贷款利率分别降到了3.3%、1.6%和0.4%。然而，从欧洲国家的立场来看，他们认为这些让步还不够，至少还应再获得德国的部分赔款。由于法德两国围绕该问题所爆发的危机，英、法、意希望从德国接受赔款，然后以之支付美国债务的模式难以奏效。鉴于美国持续坚持其战时盟国应当尊重还款义务，随后的美欧关系出现了严重紧张，特别是法国觉得自己倍受伤害，因为它遭受战争的破坏最为严重，在美国出面帮助之前它已经独自牺牲了3年的时间。法国人说他们付出了鲜血，而美国却在谈论金钱。此外，还有一些法国人提出他们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借给美国的金钱还没有归还。[①] 双方的争执十分尖锐，在危机持续期间，华盛顿的商务部甚至禁止美国的私人贷款流向法国。

1923—1924年，危机达到顶点：法国和比利时出兵占领了鲁尔谷地、德国拒绝改变态度、美国强烈指责欧洲国家不尊重战时的还贷义务、遭受破坏的货币兑换体系没有得到恢复。在这种时候，美国决定帮助缓和危机，但它并不准备采取直接行动，因为赔款问题不涉及没有签署凡尔赛条约的美国政府，尽管它也希

① 让—巴布提斯特·杜洛塞：《法国与美国》（芝加哥，1976年），第124--126页。

望德国能够对战争所造成的损失进行部分赔偿。华盛顿官员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政府呆在幕后，而通过私人银行家和商人出头接近其欧洲对手。①

这一早期的“合作主义”，或是政府—商人合作模式范例运行得非常之好，在柯立芝总统的要求下，1924年，查尔斯·道威斯、亨利·罗宾逊和欧文·杨格三个银行家组成了一个调查德国财政情况的委员会，他们出使欧洲并提出了关于德国赔款计划的一份修正方案，将德国的赔款总数降到了可以支付的水平。为了确保德国马上开始支付赔偿，战时盟国将共同负责稳定德国的货币，包括一笔1.1亿美元的紧急外国贷款，其中大部分将在美国筹集。对美国银行家来讲，筹集这笔贷款毫不困难，就这样，被称之为“道威斯计划”（the Dawes Plan）的赔款问题的解决就为稳定欧洲外交以及金融事务铺平了道路。结合1926年完成的战债问题处理方案，美国与欧洲国家首次恢复了战后的正常经济关系。

就像为了纪念那一时刻，20多个国家决定重建黄金本位，更准确地讲应该是“黄金汇兑本位制”，该体系解除了战时的黄金禁运，也就此恢复了不同货币间的兑换，它们之间的兑换比率都或多或少地通过黄金加以确定。也就是说，一国货币的价值是由该货币的黄金价格所决定，而它与另一种货币的兑换比率也同样由它们与黄金的比较价值来确定。譬如，一盎司的黄金被定为20.67美元，在英镑价格上，一盎司黄金大概是4.13英镑，那也就是1英镑等于5美元。这与战前的兑换率一样，双方的货币都以“战前平价”重新与黄金挂钩。这一决定没有考虑到战时和战后的通货膨胀，因为美元和英镑的实际购买力都比战前有所下

① 对赔偿和战债问题的美国政策，最好的研究成果是梅尔文·莱夫勒：《难以捉摸的要求》（查佩尔希尔，1979年）。

降，因而它们以黄金定义的相对价格也都应当有所下调。以战前的价格恢复金本位，实际上就是意味着以更贵的金钱和更低的商品价格来对付通货膨胀，这势必会导致经济衰退的到来，造成资本短缺和失业率增高。但是在 20 年代中期，似乎再找不到对付通货膨胀的更好方法。如果要想恢复正常的国际经济交往，似乎就得恢复汇率的稳定，而汇率的稳定也只有依靠尽最大可能地维持各种货币的价格。

对美国而言，尽管存在一个长年的农业衰退问题，但该政策并没有造成整个经济的紧缩，因为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都存在着让工厂充分运行的足够需求。即便国内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发展速度不够快，但剩余的资本会立刻转向投资海外。

实际上，美国的资本成为整个 20 年代特别是 1924 年之后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引擎，由此美国财政资源的角色有时被称为“金元外交”。[1] 该提法说明了如下事实：当华盛顿的美国政府不让自己积极参与世界政治事务并对国内反对与国联有任何关系问题特别敏感之时，私人银行家和投机者却急切地利用现有的机会扩大他们在海外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从 1924 年给德国的 1.1 亿美元贷款开始，美国向海外的借贷与投资迅猛增长。

美国的海外投资通常有两种类型：直接的和间接的。前者指与海外相互往来的商业活动，诸如利用带来的资本设立工厂和生产商品；后者则是购买的各种债券，也就是等于在外国的公共借贷与私人投资。这两种类型的投资在 20 年代都有所增长，到 1929 年，美国仅在欧洲的直接投资就高达 13.52 亿美元，间接投资 30.3 亿美元。美国输送到海外的全部资金总额超过 100 亿美元，而此时整个国家的国民收入是 800 亿美元左右，拥有如此

① 赫伯特·菲斯：《金元外交》（巴尔的摩，1950 年）。

的经济规模，美国很容易地应付这样的投资活动。[①]

对这些资金的接受国来讲，数量如此巨大的美国资本持续流入到底吉凶如何还存有严重争论，但它们确实没有别的选择，因为遭受战争破坏的欧洲缺乏资金，而且直到1929年，美国的国民收入几乎占整个世界收入的50%。显然，如果世界各地和欧洲的国家要致力于经济恢复和发展，那就很容易转向这个资金来源而无需在国内筹集资金。

在这种模式下，美国和欧洲，实际上是美国和其余整个世界的一种金融依附关系就产生了，欧洲尤为重要，因为美国资金的流入能够确保德国向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支付战争赔偿，而后者则以得到的部分资金偿还欠下美国的战时债务。整个机制都取决于持续的美国资金流动以及这些国家对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的理解，因而毫不奇怪1929年各方又对德国的赔款问题达成另一个新的方案，这就是以协助安排该方案的美国银行家杨格的名字而命名的“杨格计划”（the Young Plan），该计划将德国的赔款减到了90亿美元，分59年付清，利息5.5%。结合当时美国与其战时盟国通过谈判达成的其他各种债务处理，1929年的安排成为合作精神以及美元在国际事务中关键作用的缩影。

美国在西半球的经济活动也很广泛，到1929年，美国在加拿大的直接投资达到19.6亿美元、古巴和西印度群岛10.54亿美元、墨西哥9.13亿美元、南美洲15.48亿美元，而作为间接投资和政府贷款到达这些国家的资金数目与上述数字也不相上下。其中的一些投资颇具风险，譬如在阿根廷，许多商业项目都被迫关闭，以至于华盛顿的商务部警告银行家不要向那里作进一

①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萧条中的世界》（伯克利，1973年），第56、71页。

步的投资。[1] 同样地，如果没有美国资金的大量输入，这些国家也难以实施经济发展规划。

尽管与对欧洲和西半球的投资规模相比要小一些，但美国流向亚洲和中东的资金也同样引人注目。美国的资金对日本从 1923 年大地震破坏中的恢复起到了很大的帮助，这次地震摧毁了东京大部并造成了高达 10 亿美元的财产损失。福特汽车公司（the Ford Motor Company）在日本设立工厂并生产出了第一辆汽车，美国人还积极投资于使得整个日本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医药、电子等行业。同一时期在中国，美国的投资在大城市的公用事业以及电话建设等方面格外显著。标准真空油公司（the Standard Vacuum Oil Company）在亚洲大陆和荷兰的东印度参与炼油工业。到大萧条爆发前夜，美国在该地区的投资总额加起来已经接近 10 亿美元。

20 年代同样极为显著的是美国商业利益在国务院和商务部强有力支持下积极地进入了中东油田。该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一直被英国、法国和荷兰的公司所瓜分，在紧迫地感觉到要以进口石油替代国产油的情况下（汽车制造业的发展促成了这种显而易见的需求），美国人毅然决定涉足石油领域。在政府的支持下，他们成功地迫使欧洲同意重新划分采油特权的势力范围，为美国公司赢得了一定的地盘，这就是所谓的 1928 年红线协定（the red-line agreement of 1928），规定了上述四国在发展油田方面的基本权利和各自地域。[2]

除了上述地区，主要代表 20 年代美国经济活动的还应提到利比里亚和苏联。在利比里亚这个与美国有着历史纽带的非洲共和国，美国的主要目标是橡胶种植。汽车轮胎需要橡胶，但其生

① 约瑟夫・图尔钦：《战争的后果》（纽约，1971 年），第 174 页。
② 丹尼尔・耶金：《奖品》（纽约，1991 年），第 204—205 页。

产和价格却一直被英国所控制，因为英国在其亚洲帝国特别是马来亚占有着非常丰富的橡胶资源。菲尔斯通橡胶公司（the Firestone Rubber Company）在拓展其利比里亚橡胶生产过程中始终与商务部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虽然有着强烈的反帝意识形态，但此时的苏联也毫不犹豫地转向美国谋求更多的所需资金，尽管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意味着难以形成强制约束性的法律合同，但它并未阻止美国的企业与苏联政府官员们达成一些商业协定，譬如，辛克莱尔石油公司（the Sinclair Oil Company）在萨哈林北部获得了采油权，W. 艾夫里尔·哈里曼投资锰矿，而最有名的是亨利·福特建立了拖拉机厂。从 1926 年到 1929 年，苏联境内的 100 多项租让权投标方案都是由美国人提出的，仅在 1928—1929 年就有 54 项，占同一时期所有外国投标总数的 26.1%。[①]

如果说 20 年代的美国海外投资是一项主要的国际活动，而且毫无疑问地有助于世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那么同一时期的贸易活动也扮演了同样重要的角色。世界贸易在欧洲战争期间遭受了全面衰退，直到 20 年代后半期也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众多因素：战争给欧洲国家造成的破坏、失去了成千上万的劳动力（和消费者）、1925 年之前由于缺乏金本位而导致的各国货币兑换的混乱状况以及世界许多地区为了鼓励国内生产和抑制国外进口而采取的“进口替代”的生产措施等等。然而，在整个贸易停滞的画面中，美国依然是个例外，它在战时显著发展起来的出口贸易虽然在 1919 年以后逐渐有所回落，但它仍然是世界的主要出口大国，向欧洲国家提供绝大多数的生活用品、工业设备以及诸如好莱坞电影等无形商品。

尽管美国也从欧洲进口，但双方间的贸易平衡总是有利于前

① 威廉·艾普尔曼·威廉斯：《美俄关系》（纽约，1952 年），第 208—225 页。

者，这种形势扭转了世纪之交以前的状况。战后年代的一个重要现象是欧洲作为美国贸易伙伴的重要性日益降低，在 1910—1914 年间，欧洲国家加起来共占美国整个出口和进口贸易总量的 62％和 49％，但到了战后的年均比例已经分别降到 45％和 30％，表明美国几近 1/3 的购买来自欧洲的这个后一数据对欧洲国家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如果他们要恢复和扩展贸易以重建经济和归还美国贷款、如果他们不再像战前一样依赖于和美国的紧密贸易关系，那么他们就不得不积极地增加向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诸如以前是他们殖民统治地区而现在部分成为国联托管地的中东和东南亚。然而，美国也热衷于涉足这些地区，早先因中国市场而被提出来的门户开放政策现在被有力地贯彻到每一个地方，商务部采取一切主动措施以打开他们认为关闭着的大门。

尽管美国在曾经受到欧洲国家包围的中东、非洲以及东南亚等地的贸易仍然受到限制，但在东亚和西半球却得到了迅猛发展。亚洲在美国出口贸易中的份额比战前 6％的数字翻了一番，而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则从 15％发展到 29％。到了 20 年代末，美国整个出口的 1/3 都流向了西半球国家。这些数据都表明美国在贸易领域也迅速将自己全球化。从 1913 年到 1929 年，全世界的贸易总量只增长了 13％，而美国却增加了 1 倍之多，这不由得使人们设想如果战前的紧密美欧贸易得以维持，全球贸易是否还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不可争辩的是美国资金、技术以及商品对世界市场的渗透为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一个经济基础。

商业文明化

这些经济活动还受了一种在战后世界特别是在美国有着独一无二作用的精神特质的支撑。例如，在 1927 年一次由国联在日内瓦发起的世界经济会议上，各国代表都认识到现在的国际和平

要取决于经济基础，他们设立了一个专家委员会专门研究最适于达到各国间“理解与和睦”的贸易和财经政策。[①] 尽管美国政府没有参加这一活动，但美国当然赞成这一想法，他们发展了一种可以被称为商业文明化的观念作为指导国家和国际事务的关键：对一个厌倦了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扩张的国家来讲，将经济作为重点是最受欢迎的，作为一种理性行为和激励整个国家乃至全世界的模式，生产、分配、银行和相关商业行为将无往不前。这就是隐藏在20年代美国对外关系中的商业文明化的理念。

赫伯特·胡佛、亨利·福特、沃尔特·李普曼和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等人代表着不同的背景、来自不同的职业，但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表达了这种商业理念。担任8年商务部部长并在1929年当选为总统的胡佛对美国私人的经济和人道主义主动性深信不疑，认为它们将有助于一个更加稳定和繁荣世界的出现，被他称之为“美国的个人主义”不是靠政府的权威，而是依赖于美国人的私利观念和公民精神，这两者结合起来将会增加整个国家的财富，因而也可用于世界其他地区。[②] 福特鼓吹机械化新时代的福音，宣称这是整个世界进步事业的推进器，正如他自己所写：“机器的公正和精神的公正基本上是一回事……就像一个没有缺陷的车间、洁净的工具、标准的测量仪器和精确的生产方法生产出一套顺畅有效的机器一样，头脑清晰的思维、有条理的生活和诚实的行为也使得一个人或一个家庭获得成功，使得每一个相关的个体都顺畅有效。”像胡佛一样，福特也确信美国有很多东西可以展示给其他国家，泰勒制（Taylorism）（以弗雷德里克·泰勒的名字命名，他传播了劳资关系和有效生产制度）尽管代表着美国的方式，但它显然可以向其他国家输出。就像有的工

① 昆西·赖特：《战争研究》（芝加哥，1965年），第417—418页。

② 赫伯特·胡佛：《美国个人主义》（纽约，1922年），第71页。

业家所注意到的，“外国的土地上都感受着我们美国的进步、感受着我们美国的正确思想，俄国和中国的基本问题都是工业性的，只有应用了切实可用的正确的思想方法，一切都将迎刃而解。”紧随之后，“政治边界和政治观念都不再重要，真正带来改变和推动进步的是经济条件。”[①]

最富影响的外交事务评论家李普曼和尼布尔都同样坚持，像美国这样经济极端强大而不愿使用军事力量的国家是处在界定国际秩序的最佳位置。曾经为伍德罗·威尔逊和平蓝图未能付诸实施而大感失望的李普曼现在接受了美国对外关系的经济导向，相信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纽带能够变成将整个世界连在一起的粘连剂。对社会事务怀有浓厚兴趣的年轻神学家尼布尔对公司化的资本主义倍加批判，但也相信武力扩张和帝国创建的时代已经被一个新的“经济时代”所取代，“我们帝国的使节不再是海军上将或殖民地总督，而变成了银行家。”他写道，如果“我们不用非凡的军事武力支撑自己的经济力量，那么［我们］就得学习如何生活在一个世界大家庭当中，并且调整和适应受到审慎和良心驱动的其他国家的愿望和需求”。[②]

所有这些评论都反映了这样一种普遍的流行观点：即作为与传统地缘政治相反的经济正在成为国家和国际事务中的主要力量，而作为主要经济大国的美国正在战后世界发挥着最大的影响。关于经济交往带来更和平国际秩序的观念并不新颖，塔夫脱总统和威尔逊总统都曾有过这样的信仰。但是，通过美元外交，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似乎变得更为接近。

“经济时代”能否真正保证凡尔赛和平更为持久，将部分取

① 亨利·福特：《我的工业理念》（纽约，1929 年），第 35、37—39、45 页。关于泰勒制，参见弗雷德里克·泰勒：《科学管理原则》（纽约，1911 年）。

② 《哈泼斯》第 149 期（1932 年 1 月）第 90、92、95 页。

决于美国经济实力的持续发展，部分取决于美国注意“其他国家愿望和需要”的意愿（尼布尔语）。到1929年大萧条到来时，第一个条件显然已经存在，而关键的问题是第二个，即美国的经济政策是否能够服务于世界群体的利益，美国在致力于增加自身财富之外是否追求一种进一步促进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的政策？它是否愿意为一个和谐、秩序的国际社会而使用自己积累起来的财富？

这一画面是复杂的，整个20年代，经济国际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之间一直存在着斗争。当时对美国经济政策的历史表现的评判并不宽容温和，将之描绘成自我中心、眼界狭隘和目光短浅，作为证据，评论家指出了存在于美国宣称的门户开放政策和其保守主义的关税政策之间的巨大鸿沟，还有人提出了美国相关的限制性移民政策等，所有这些政策都使得美国对外国的商品和人员不够它作为世界经济领头国所应具有的程度开放。

与战前一样，保护主义依然是共和党在20年代的一个信条。1922年的《福德尼—麦坎伯关税法》（the Fordney-MaCumber Tariff）提高了威尔逊政府时期绝大多数农产品和制成品的较低进口关税。很难断定是不是这种保护主义导致了20年代世界贸易增长缓慢，但该政策很可能是导致美国对欧洲国家形成巨大贸易顺差的原因，高关税使美国成为资金和货物的净出口国。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1928年，美国的贸易顺差8.8亿美元，流向海外的贷款和投资为9.7亿美元，就像是它自己帮助其他国家支付了它们对美国的贸易赤字。[1] 这与战前英国的情形有所不同，1914年之前，作为世界的金融首都，伦敦将它的资金向美国和世界各地投资与借贷，与此同时，英国实施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并愿意与这些国家发展逆差的贸易活动，由此，资金接受国

① 沃尔特·李普曼：《解释1931—1932年》（纽约，1932年），第46页。

就通过与英国的贸易盈余将这些投资与借贷返还伦敦，这就是英国至少在贸易和金融领域作为经济霸权以有助于世界稳定的行事方式。然而，由于其保护主义的关税政策，战后的美国却成为一种截然不同的霸权国家。欧洲批评家以及持同样观点的美国人都指出这种形势是难以为继的，因为它使得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过分依赖于美国。由此，美国作为自我中心和不够顾及整体形势的形象开始凸现。

但另一方面支持该体系的人却辩护此种安排并没有什么不妥，只要美国持续不停地向海外输出资金，别的国家就可以平衡其收支，当然，它们还得支付美国借贷和投资的利息和红利，1928 年，这些数目已经达到 8 亿美元。这会使美国的债务国变得更为贫困吗？美国人反驳说他们的游客也在海外消费（1928 年达到 6.6 亿美元）、从欧洲到美国的新移民还将它们相当部分的积蓄寄回了母国（2.2 亿美元）。如果上述这些金融安排能够一直持续下去，人们或许可认为它能够成为维持有序国际商业往来的有效工具，就像以英国为中心的战前制度一样。

胡佛等一些政府官员也对美国的保护主义进行了辩护，认为它对美国以及世界都是必要的，全球的经济发展都取决于美国的强势经济，高关税的政策能够刺激国内生产、带来财政盈余、稳定美元价值，从而使得美国发挥世界银行的作用，所有这些不但对美国国内而且对于整个世界都是一种可喜的发展。对于这种论调，反对者则回应美国的保护主义会给世人留下如下的印象：即尽管美国带头缔造一个经济上更为相互依存的世界秩序，但至少在顾及其他国家的“愿望与需求”方面，它自身并没有完全奉行国际主义的宗旨。正像被人所指出的那样，它没有实施一种更为开明的贸易政策，从而没有给别人树立一个可以效仿的榜样。此外，制度化的保护性关税还大幅提高了战前的税率标准，结果则导致了丝毫无助于经济国际主义事业的可怕的贸易战。

这种批评看来至少在美国与欧洲的贸易方面颇有道理，但它们显然忽略了美国在与英国、法国、意大利的战债问题上的慷慨处理以及通过贷款和投资对德国重新融入欧洲经济的支持。因而，最好应当说，作为战后世界的经济霸权，美国积极致力于促进欧洲的重建，但在关于商业国际主义的承诺方面还有所局限。

当我们再考虑到欧洲以外的世界时，画面就变得更为复杂。通过商品、资金和技术出口，美国在把这些国家带入全球经济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如果不是毫不批评地欢迎，像开始致力于自身现代化努力的中国和墨西哥等国家也都逐步接受了美国的这种角色。尽管强烈的反帝语言使得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领袖反对美国资金的输入，但到 20 年代末，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开始认识到如果没有美国资金，他们在国内发展方面实在难以有所作为。

与此相关的有趣现象是，即便是斯大林也开始勉强赞扬美国的资本主义，在一本 1924 年出版的小册子（《列宁主义的基础》）当中，在重复“殖民地和附属国”一定“通过一些‘先进国家’……向一个经济奴役和殖民压迫的世界体系”“发起解放斗争”等标准列宁论调的同时，他还写道，单个的国家经济和国家领土被融合组成“一个被称为世界经济的链条”，从中或许可以产生出“真正的国际主义”、一种“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主义。但是，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实现这一目标之前，他们应当学会结合“俄罗斯的成功革命”和“美国的效率”。对于后者，他接着进行了如下解释，它是“不理会也不承认困难的一种不屈不挠的力量；以商业般百折不挠的精神扫除一切障碍；即便是一项微小的任务，一旦开始就一定坚持到最终完成；没有它就不能从事任

何难以想像的建设性工作”。[①] 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声明调和了革命民族主义和美国的商业特质，在必要情况下，它能够为非西方国家领导人接受美国商品、资金、技术以及管理经验等提供正当的理由。

如果说当时的美国经济影响将世界各地拉得更近并创立了很大意义上的全球相互依赖，那么也有一个相反的现象：美国的新移民政策。1921 年和 1924 年的移民法都建立了一种基于不同国籍的配额制度，据此，只有来自西欧和中欧的移民最受欢迎，即便是他们超过了每年 15 万人的总移民限额；东欧的移民受到了严重限制；而亚洲人则被完全禁止。（该配额制度不限制加拿大和拉丁美洲。）这种被世界上一个最富有国家所采用的立法，不可能不使其他国家认为美国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和心态狭隘的国家，当美国在诸多方面都积极致力于促进国际经济交流的情况下，这种印象实在不幸。特别是对于亚洲、非洲和中东的广大国家，它们与美国日益增加的贸易联系与美国几近完全排斥其人员的两种现象形成了尖锐的对比，实际上，这也是显示美国对外事务当中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存有张力的一种很好例证。

① 约瑟夫·斯大林：《列宁主义的基础》（纽约，1939 年），第 27、79、81、122　124 页。

第七章 20年代：文化方面

作为思想观念的和平

和平作为一种重要观念是战后年代的一个特色，这并不是说在此之前就没有和平观念的有效表达或者有力的和平运动。早在大战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从传统基督教概念到新近的社会主义表述等各式各样不同的和平主义。在美国，为了更好促进国际社会形成一个稳定和相互依存的国际秩序，许多和平社团相继成立。战争时期，伍德罗·威尔逊和列宁分别成为关于国际事务的两种不同观念的代言人，并各自展望了一个没有战争的未来世界。

然而，无论以何种意义显现的和平观念是在1919年之后才占据了讨论国际事务的中心舞台，我们在上面已经论及了裁军、战争非法化、经济稳定以及美国资本流动等方面的巨大影响，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比战争和备战更有助于国家间和平交往的环境，但这一现象的发生也有其深层的文化根源以及整个20年代思想发展的支撑。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和平的思想观念是当时的"霸权性的意识形态"，该词汇被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在监狱中记录其思想时首次使用。[①] 根据他的意思，一个社会要通过一套思想观念将之团结起来，这套思想观念是由一批为维护

①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纽约，1989年）。

某种程度的秩序与凝聚力的精英分子所提出、精炼与操纵，这套观念非常普及人心，即便是这些精英分子的反对者们也在有意或无意地使用它们。因此，一套思想观念不光是一个阶级的一种产物，而是其利益的表述，它远比被模糊界定的集体性民族精神要清楚得多，它有着其具体的来源和目标，代表着该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它非常广泛，以至于那些没有权势的人也将之作为安排社会、国家和国际事务的方式加以拥护。

和平在20年代就是一种这样的思想观念。它有着多种不同的根源，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欧洲、北美和亚洲等较发达国家的精英分子，是他们将和平的观念确立为讨论国家和国际事务方面的主导框架。也就是说，和平被提升到了这样一种优势概念，以至于一种和平的世界被当作是一种正常和规范的状态（当然，这两者绝非一致），而战争则被视为失常状态。

如上述所论，作为一种优势概念的和平有着不同的含义，有经济方面的，也有战略方面的。它服务于各国不同的利益和需要，诸如欧洲国家致力于重建、日本开始工业化和发展、而美国则进一步提高生活水平等，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都将和平等同于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社会团结。也就是说，国内秩序被认为是依赖于一个和平的国际秩序，反之亦然，因此，国际组织和国际活动的第一位目标都是用于团结整个国际社会。

这些逻辑非常清楚，但普通民众如何将自己与这样一种思想形态联系起来？怎样将他们融入霸权思想的框架之内？当然，有一些人是办不到的，诸如在战后最初几年内德国和法国的好战民族主义者或者中国、墨西哥等地的激进反帝分子等都是例外。然而，即便是他们，也都及时受到了和平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至少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感到自己处于守势，需要向作为一种正常状态的和平观念辩护他们的反对意见。到洛迦诺公约在欧洲的签署以及1928年苏联加入32个资本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签署

《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的行列时，可以说和平已经变成了全球的最主要思想形态。

在这种环境下，和平研究或更宽泛地说是国际关系研究自然成为世界各国的主要关注。和平在近现代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严肃学术思想的一个研究主题，国际关系成为学术中心教授的一门课程，正如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战后和平运动重要人物的詹姆斯·肖特维尔所指出的那样：探询和平实际上是一种思想事业，一种需要将“过去的狭隘的思想概念变成一种世界观点”的有意识的努力。[①] 许多人都赞同他的说法，证据之一就是世界各地都设立了一些致力于研究国际关系的研究团体和机构，其中最著名的是伦敦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和纽约的对外关系委员会（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两者都创建于战争刚刚结束后的年代，都旨在促进该领域的具体研究。国际联盟也采取主动措施鼓励世界各地的学校和大学教授国际事务课程。

在教授这些课程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超过美国的普及和热情程度，这也清晰显示出官方没有参加国联并不意味着美国不是整个时代思想氛围的一部分，恰恰相反，通过他们的学术和专业努力，美国可以说是世界和平运动的思想领路人，一个很好的例证是芝加哥大学的昆西·赖特及其同事们对战争与和平所进行的广泛研究。该校在1923年设立了一个国际关系的研究生项目，被称为美国同类专业（或许也是全世界）的首创，它由怀特领导，汇集了历史学、政治科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专家，他们在1926年发起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旨在研究过去的所有战争，探究它们的根源和外部环境，

① 《肖特维尔备忘录》，1932年5月31日，ED25/25，伦敦，公共档案局教育委员会档案。

并寻找确保和平的条件。该研究项目没有期限，到1942年完成时，20年代中期的乐观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不管怎样，这一举动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对战争与和平进行学术理解的全球思潮的一部分。[①]

战后10年也给予了传统词汇“国际理解”一个较以前更具学术和教育性的内涵：如果各国人民能够更好地相互理解，如果他们从各自的学校教育中取消过分的沙文主义宣传，和平的机会就能够增加。美国在这方面也是全球思潮的一部分，整个20年代，开设俄国、中国、日本和其他非西方国家历史和语言课程的学校和大学数目持续不断地增加，支持相关学术研究的各种基金会也相继设立，诸如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和美国学会委员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等等，它们都倾其资源以鼓励在相关学术中心着手“地区研究”。

因为其教育管理的分散特性，修改课程，特别是重写扭曲其他国家内容的教科书在美国更为困难。但是在国联呼吁诸如法、德等国修改它们的历史教科书以促进相互理解时，美国也出现了相应的努力以形成对近期历史特别是大战起源等问题的一个较为冷静的理解。很多“修正主义”的作品得以发表，它们向战争起源（强调德国军国主义和战罪）和美国卷入战争的原因等已为人所普遍接受的论点发出质询，像哈里·埃尔默·伯恩斯在内的作家都指出有些美国人不加批评地接受英国的解释并在无意中成为亲英宣传的代言人，并对这些人进行了指责。[②] 尽管走得如此之远的人并不在多数，但这种修正主义是与整个时代的氛围相一致的，即符合国际主义精神的教科书修改被看成是达成和平的一个

① 昆西·赖特：《战争研究》（芝加哥，1965年）。

② 孔华润：《美国的修正主义者》（芝加哥，1967年），第3章。

重要手段。

通过文化交流的和平

和平是一种思想活动的主张对战后年代有着很大的贡献：各国间展开文化与学术合作的办法是促进和平的一个有效途径，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化国际主义”：即认为文化的沟通、理解与合作是实现国际和平与秩序的基本前提。国联从一开始就赞同这种观念，它在1921年宣称：“如果成员国之间没有相互间的学术活动精神，任何国家间的组织都无望存在。”[1]

国联委员会“相互间的学术活动”到底是什么意思？首先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它是指超越国界的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协作与合作行动，法国诗人保罗·瓦莱里称国联为“一个人类智力的联盟”，一位英国学者赞同这一提法，说很多土地上“有知识和思想的人们”有促进“以国家和种族边界而独立存在……各人群间相互理解”的责任。[2] 为了实现这些人的主张，国联设立了一个学术合作委员会，专门负责安排各国文化和学术领头人之间的学术、文学和艺术交流。

这种思想毫无疑问具有精英色彩，但我们必须记得世界刚刚经历了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学者、艺术家、新闻记者、其他知识分子以及所有的文化人都曾献身于它们各自的国家，并将爱国主义高高置于国际主义之上。他们对这一经历极为尴尬，欧洲的许多作家和一些美国同行发布了一份由法国小说家罗曼·罗

---

① 国际联盟：《道德裁军》，1932年2月24日，ED25/25，伦敦，公共档案局。

② 《海斯备忘录》1929年5月25日，ED25/25，伦敦，公共档案局。

兰起草的学术独立宣言。[1] 这是知识分子们一个响亮的声明，他们迟到地认识到自己的主要作用应当是克服国家间的差异并追求和平，如果这一点不可能，那么至少也应当在各国刀枪相向时通过维持各国间文化层面的沟通以减少战争带来的创伤，正如宣言所示："我们不知道不同的人种。我们只知道人类……包括所有人、所有平等手足兄弟的人类"；人类不承认区分他们的人为政治边界，他们应当团结而不是分裂，由此，如果他们的学术领袖以爱国主义的言辞激励他们并使之痛恨其他地区的同类，那将是、并且已经是大错而特错的。如今悲剧已经成为过去，所有国家的知识分子们都有一种责任：去教导他们的民众如何摆脱沙文主义的癫狂和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整个人类的共同命运。

这种对知识分子作为国家和国际事务塑造者角色的强调是贯穿整个20年代的一个主题，知识分子喜欢被葛兰西称为"社会霸权"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们在国家权力和组成社会的民众之间进行协调，他们区分国家和"市民社会"，认为后者由私人个体和没有被国家权力渗透的团体构成。作为这两者之间的调解人，知识分子处在能够缩小或扩大它们分歧的地位。在战后年代，丝毫不奇怪很多作家认为国家的权力增长太快，要想防止另一场灾难性战争就必须扭转现有形势，必须通过个人权利、市民社会以及被著名德国法理学家杰利内克称为"社会的公共良知"等对国家主权进行一定的制衡。[2] 只有遏制住国家主权才能有国际间的理解与和平，而知识分子必须抓住这一时刻推进这种运动。

这种主张通过遏制国家主权和极端国家主义以求得一个新的

① 让·弗兰克斯·西尼莱里：《知识分子和法国热情》（巴黎，1990年），第41—42页。

② 乔沙·福格尔：《中江丑吉在中国》（马萨诸塞州剑桥，1988年），第33—38页。

世界秩序的世界大同主义思想并非没有受到挑战，法国的辩论尤为激烈，国家和民族主义者坚持世界仍然由各个国家组成，因此法国知识分子的主要责任至少应当体现在法国身上。[①] 在德国，卡尔·施米特和其他人继续主张在一个由权力界定的世界当中，国家权力仍然是至关重要的。[②] 当然，这也正是很多人试图通过遏制国家权力以重新界定世界事物的原因所在。传统国家主义和战后国际主义的辩论是没有结果的，但至少在战争 10 年后的 1929 年，世界大同主义的观点似乎已经站稳了脚跟，任何关于国家事务和国际事务的讨论都不得不严肃面对它。相反的论点也继续存在，但那些歌颂为母国而献身的个人英雄主义作品成为少数，诸如勒内·昆顿的《战争格言》（Maxims on War, 1930）或者艾尔弗雷德·罗森伯格的《20 世纪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30），它们都表现出一种反抗那个时代主导思潮的情调。

国联的学术合作委员会是这种思潮的范例，它成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促进文化交流的总部。委员会活动的一个典型例证是它积极赞助一些世界级顶尖学术与艺术人物间进行公开的观点交流，最著名的例子是 1932 年艾尔伯特·爱因斯坦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信件交换，尽管当时国际秩序的稳定已经开始受到大萧条的威胁，但他们两人所表述出来的观点却是典型的 20 年代的信仰和乐观。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都赞同只有通过具有国际主义思想的个人间的主动合作及其所倡导的文化事业，人类才有可能摆脱战争的灾害。

稍逊于他们的思想家们也同样主动，许多国家的著名学者、

① 西尼莱里：《知识分子和法国热情》，第 43—47 页。

② 约瑟夫·本德尔斯基：《卡尔·施米特》（普林斯顿，1983 年），第 87—92 页。

艺术家、音乐家等等都分别组织各自国家的学术交流委员会以联络国联委员会和各国文化团体，巴黎还设立了一个国际学术合作院并举办了多次展览和座谈会。〔在这些机构和活动的基础上，1945 年建立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此外，还有大量的各种国际组织，许多都是在紧随战后的年代所设立，并且多与一些文化名人有关，列举几个例子，如博物馆国际办公室（the International Office of Museums）、流行艺术国际大会（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Popular Arts）、当代音乐国际协会（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Contemporary Music）等。所有这些机构背后的理念都是通过相互协作的努力将文化事务"国际化"，（19 世纪后期该词汇就出现在英语当中，但却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才拥有近现代的意义。）只有此举才是取得国际理解并由此达到持久和平的最可靠途径。

美国也是这种文化国际主义潮流中的一部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雷蒙德·福斯迪克是美国在国联学术合作委员会的代表，即便是在参议院拒绝凡尔赛条约后，美国人依然出席委员会的相关会议。他们还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学术合作委员会，詹姆斯·肖特维尔在其中担任了很久的主席职务。除了参加各式各样的国际组织之外，美国人还组织了大约 350 个致力于加深学术交流与国际对话的机构，较典型的是太平洋关系研究院（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它最初成立于檀香山（亦称火奴鲁鲁），后来移至纽约，由对太平洋事务感兴趣的美国人、加拿大人、欧洲人和亚洲人组成，旨在便利一种非党派环境下的对话，它吸收了美国和其他相关国家的杰出学者、新闻记者和商人等，对影响该地区的现状进行研究，并举行每年两次的意见交流会。20 年代设立的另一个重要机构是古根海姆基金会（the Guggenheim Foundation），它向学者和艺术家提供资助，并积极鼓励来自拉

美知识分子的研究方案。

这一时期美国对学术合作的主要贡献或许是学生交换活动。在战前，已经有不少外国年轻人在美国学校就读，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庚子赔款学生”（美国在义和团运动赔款中给中国所减免的资金）的中国学生。但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的基金会和教育机构对教育外国青年人产生了浓厚兴趣的还是战争，国际教育协会（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积极筹措资金将外国学生招进美国并安排他们进入各个学院和大学，尽管绝大多数学生来自亚洲，拉美学生也稳步增长，但横跨大西洋的学生和教师交流活动也得到发展，其中一些是受到英国国家交换委员会的支持。

当时的文化与学术合作代表了世界领路人致力于国际主义与和平的认真努力，美国也是这种运动中的一部分。有人也许会问这些努力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和平事业，当然，这些学者、作家和教育领域的其他人士的所有努力并没有阻止另一段国际危机的降临。毫无疑问，两战期间的文化国际主义者们还很幼稚，因为他们认为只要超越了狭隘的地方性关注和极端的沙文主义，就可以克服国际间的紧张。现在回头来看，可以说是这种理想主义使得他们无视传统的特别是对种族和国家身份等忠诚现象的持续存在，但不管怎样，他们这种思想主张的很大部分经受了另一场世界大战的磨练，为丰富 20 世纪下半期的人类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

世界美国化

假如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只局限在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圈子之内，那么它们对国际事务的影响或许还不会如此之大。实际上，20 年代的一个主要特点是这种跨越国界的交流远远超出精英分

子间的往来而走入了世界范围内的普通百姓生活，其中最为基本的原因是美国大众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普遍影响。

即便是在 20 年代，世界在物质和大众文化方面的美国化也不是一个新现象，正如艾米莉·罗森伯格和雅克·波特斯等人所指出：早在世纪之交，外国观察家就已经谈论美国商品及其生活方式对整个世界的普遍影响。[①] 享受着世界上最高生活水准的美国人是世界各地的羡慕对象，他们似乎代表着物质繁荣、舒适和一种摆脱了旧世界混乱的生活方式，大战之前绝大多数国家还没有大量出现的电器、汽车、电话等现代化的产品在美国已经成为极其普通的物品。（美国 1902 年有 1800 万枝电灯，1912 年注册的汽车有 90.2 万辆，1914 年有 1000 万部电话。）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这种现象在 1919 年后进一步加剧，而且由于欧洲地位的衰落，美国的影响更是毫无质疑。通过 1918 年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同名著作的出版，被称之为西方衰落的思想流行起来，它指的是欧洲的衰落。由于战争的破坏以及部分非欧国家在工业和贸易领域的成功追赶努力，欧洲感到自己处在防御的状态，不再是绝无质疑的智慧源泉或文明中心。实际上，面对整个世界的重建，欧洲似乎拿不出任何东西，界定和平（不仅在地缘政治方面，而且还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任务不得不托付于其他国家，而首当其冲的就是美国。

没有受到战争实质性损伤的美国成为新的物质与流行文化的象征。社会学家罗伯特·林德和海伦·林德在 20 年代中期对“典型的”美国社会〔实际上是印第安纳州的芒西（Muncie, Indiana)〕进行了一项突破性研究，指出了“从外部进来的诸如汽

① 艾米莉·罗森伯格：《散播美国梦》（纽约，1982 年）；雅克·波特斯：《迟疑不决的法西斯化》（南希，1990 年）。

车、电影和收音机等各种发明”日益攀升的影响。[1] 从“外部”（是指美国的其他地区）进来的这些发明将小城镇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使得当地的人们认识到他们与其他地区人口的相互关系，尽管林德在此论述的是美国文化的同质化，但全球也发生着同样的现象。

将不同地区美国人连接起来的汽车、电影和收音机三个发明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因为这三者基本上都是美国文明的产物，因为它们是在紧随战争后的年代里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的，因而我们可以谈谈20年代期间的世界美国文化化。

仅举电影的一个例子，另一位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在广泛游历和调查后对电影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写道，电影“或许可以被认为是国际关系和种族关系的一个新的维度，它不是政治、也不是经济，而是文化”。电影和收音机的传播正在影响着“人们的心理……他们的个人经历”，并“将地球的彼端拉到了眼前，而这在几年前还是不可想象的”。帕克最后相信“地球上的所有人群”都被“可预见性地带进了一种共同文化和共同历史生活的有限圈子。”[2]

现在看来，这样的观点显然过分夸大了技术革新对消除国家分歧的影响，接下来的10年显示出即便是一个文化上被美国化的世界也不足以确保国际理解与和平。然而，关于美国化的现象是毫无疑问的，即便是远在印度和巴西等地的人们也观看着和美国人与欧洲人一样的电影，而富裕的亚洲人和欧洲人开着汽车收听着收音机，他们认为自己和美国人分享着同样的经历。

即便是那些对该现象感到震惊的人，在他们指责这将有害于维持本国文化完整的时候也在无意当中承认了美国文化的绝对影

---

① 罗伯特·林德、海伦·林德：《米德尔敦》（纽约，1929年）。

② 罗伯特·帕克：《种族和文化》（波士顿，1940年），第149页。

响。仅举一个例证，两位法国作家在1930年出版了一本名为《美国癌症》的著作，断言美国正在通过生产和效率的观念将法国殖民化，他们宣称注重机械化的银行家、贸易和工业主的“新封建主义”正在扼杀体现在倡导个性和人权原则的法国大革命的真正精神，“沉重威胁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是美国征服的经济力量，但都不及美国精神及其对盲目理性和理性机构的崇拜那么凶残。”作者最后总结道：法国正在受到“美国佬的鼓动和引导”而变得道德腐化，并成为财阀统治的奴隶。[①]

如此极端的语言证明了美国商业文化的广泛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帕克的文字。这些观察家们都注意到了美国文化影响的传播，加以巨大的经济力量，它们共同对国家和国际事务进行着重新定义，这将最终出现战后和平与国际秩序的建构，其基础既是军事性的，也有同样多的经济和文化因素。这是一种通过经济和文化交流来维持的和平，一种以非军事手段取代武器作为处理世界事物的关键的和平。美国成为这个新时代的范例，就在一方面通过和平条约与裁减海军力量、另一方面通过跨越国家边界的商品和资金流动来界定战后世界的同时，它也发展出了一种全球性的文化秩序。正因为美国一贯（特别是在威尔逊时期）追求给国际事务带来一个文化定义，因此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将文化国际主义的时代称为美国化的时代。

① 罗伯特·阿伦和A. 丹迪欧：《美国癌症》（巴黎，1931年），第14—16页。

第八章 国际秩序的崩溃

混乱中的世界经济

没人知道美国经济的崩溃以及随之在1929年之后世界经济的崩溃是否多多少少已经被20年代的经济结构所注定，或者假如从一开始美国就和其他国家采取有力措施对付经济危机，那么战后年代的繁荣与和平是否就能得以维持。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20年代的世界经济与美国经济资源和运作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整个战后10年繁荣与稳定的相对延续在很大程度上都以美国官员、银行家和相关人员的政策为转移，而后者相应的无为和被动对30年代的世界事务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截至1929年，美国仍然占据着世界工业总产量的40%、世界黄金储备的50%和整个国际贸易的16%。因此，如果美国经济出现任何风吹草动，那么一定会给其他国家造成严重的影响。实际上，严重的事情确实发生了，从1929年10月份的股票市场崩溃到1932年，美国的产出下跌50%、出口贸易下跌60%、在此期间的失业人口从150万猛增至1200万，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和从业人员的工资都大为下降，大批的个人和企业破产事件上升，风靡战后第一个10年的对生产和效率价值观的崇拜迅速被对资本主义的严厉批判所替代。

尽管不能预测其准确的范围和程度，但这场危机的许多征兆

事先已经有所表露。总崩溃前的投机热潮得到了低利息政策的滋养，银行采取低利息是为了鼓励个人和工厂的借贷，但该政策却将海外的投资吸引到国内并加剧了投机热潮。假如银行维持较高的利息，那么这些可能就不会发生，当然，如果利息显著高过海外投资的回报率，它也可能导致美国资金的回流并造成一个投机环境。更严重的还有整个 20 年代的平均购买力未能跟上步伐，尽管美国的整个经济在持续增长，但一些领域特别是农业领域出现了过分产出，从而严重地削弱了农民的收入。农场农民、工厂工人以及各种店主都在有意进行超出其收入能力的开支，从而陷入常年欠债的状况，实际上，20 年代还开创了分期付款式的购买方式，即消费者可以借钱购买。到 20 年代末，很多人开始借钱投机股票市场。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不但制造了 1929 年的恐慌，还导致股票市场的暂时重新调整乃至所有经济层面的大范围破产与失衡。

就美国的对外关系而言，大萧条的到来更是雪上加霜。如第六章所论，美国和欧洲刚刚通过它们各自的银行代表（杨格计划）达成了解决战债和赔偿的协议安排，进一步稳定欧洲事务的大门似乎刚刚打开。但是，因为作为战后国际经济关系核心的美国资金突然没有了，这样的安排也顿时失去了任何意义。美国资金的回流在股票市场崩溃之前就已经开始，而且被崩溃所造成的难以摆脱的恐慌所进一步加剧。按理来说，随着人们对国内经济信心的动摇，美国人应当再次回到海外的投资市场，但不幸的是，他们已经没有了足够的资金，股票市场和商品价格的下跌、企业的破产以及剧增的失业率都表明不可能有多余的资金投资国外。这就自然导致了其他国家的连锁反应，随着美国资金的锐减，战债、赔偿以及这些国家生产能力都受到损害，由此它们也遭受了商业破产、工厂关门和失业增加，随着整个生产和个人收入的下降，贸易受到损害，而出口贸易的衰落又进一步造成生产

的下降和失业的增加。

依靠多边贸易、货币兑换以及各国间资本自由流动的战后国际体系现在陷入混乱，世界贸易迅速从1929年的303亿美元跌至1931年的203亿美元，德国的资本输入在1928年为9.67亿美元，但1929年仅为4.82亿美元，1930年又进一步跌至1.29亿美元。到1932年，不仅作为德国而且还是全世界主要资金供应国的美国实际上已经全部停止了其海外投资活动。日益缩减的贸易和资金流动严重影响了作为战后多边体系支柱的金本位，各个国家现在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用黄金进行支付：不愿意是因为他们担心黄金的流出会进一步加剧人们对经济失去信心，没有能力是因为一些国家（澳大利亚，接着是英国）的中央银行由于黄金"告磬"的恐慌已经失去了它们的黄金储备，结果导致一些国家（包括德国和日本，还有澳大利亚的英国，日本只是在1930年才重新采取金本位）在1932年放弃了金本位，国际经济的交割不再按照各国货币以黄金为定价的兑换比率，而要依照浮动汇率了。各国政府将被迫实施通货膨胀以使得各自的商品在世界市场上变得相对便宜，这种被称为"操纵货币"的做法是一种增加出口和减少进口的途径。出于同样的理由，各国政府也倾向于制定抬高关税的立法以保持有利于自身的贸易平衡。

多边主义崩溃的另一个方面是经济区域主义或自给自足经济政策的出现。自给自足是指一些特定的国家通过诸如相互削减关税等特定的经济方式联合起来，而对集团之外的国家则采取较为排斥的政策。这种潮流的一个最早体现是流产的德奥关税同盟，它将在经济上使得两国关系更加密切，该计划最终由于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对而被搁置。然而，就在同一年，来自英国和英联邦成员国的代表们却在渥太华签署了一个关税互惠协定，据此，他们将对各自的往来货物实施低于施加给从其他国家进口同类货物的

关税水平。[①]

货币操纵、保护主义以及自给自足的政策标志着盛行于战后10年的多边经济体系的寿终正寝。尽管我们在前面谈到这种体系并未消除经济民族主义，但以金本位为标志的多边主义基本原则已经为大家广为接受，而现在这一关键的原则不复存在，所以最为紧迫的问题在于是否必须恢复旧的体系以及如何恢复。作为一种选择，如果在复兴多边主义不可能或不可取的情况下，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新安排？是不是整个世界要进入一个没有任何共同游戏规则、各国只关心自身利益而不顾及全球安危的经济民族主义的猖獗时代？那么这样一种发展的相应后果又是什么？

很显然，美国对上述问题的态度十分重要，整个世界已经如此习惯于依靠美国的经济资源，以至于现在只有美国作出缓解形势的行动才能使得世界经济免于全盘崩溃，在诸如德国赔款、欧洲战债、货币贬值、高关税以及贸易集团等问题上华盛顿将持何立场？美国是否将在恢复国际货币汇兑和贸易的局部稳定方面采取主动措施？

这些都是赫伯特·胡佛总统刚刚走进白宫时所面对的问题，他和他的国务卿（亨利·史汀生）以及其他官员在整个4年的任期内都在极力应付经济危机。不幸的是，其政策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他们希望完成的目标很多，但均由于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影响而壮志未酬。

如前所述，虽然也赞成高关税政策，但胡佛仍然是一位经济国际主义者，坚信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他对大萧条的最初反应也显示出他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他努力说服美国民众不要对经济失去信心，宣称美国经济基本上还处在健康状态。当失业

① 有关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探讨，参见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大萧条中的世界》（伯克利，1973年）。

率持续攀升时，他只发起了一个温和的公共建设项目。他还支持高关税政策，甚至还在华尔街崩溃之前，国会就开始酝酿提高关税，并在1930年6月通过了一项关于进口关税的新方案《斯穆特—霍利关税法》(the Smoot-Hawley Tariff)，据此提高了绝大多数商品特别是糖类和纺织品的进口关税。该法案得到了胡佛的支持，因为他相信此举将有利于保护国内生产、抑制进口和扩大出口。[1]

与此同时，胡佛还号召美国民众对赔偿、战债以及国际货币往来持续混乱的状况有所作为，尽管对国内经济利益保持关注，但他在此还是谋求恢复战后国际经济关系的总体系，认为该体系对美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用。1931年6月，他提议将所有政府间的战债和赔偿支付延期一年，延债宣言在7月份生效，但此时的德国银行已经关闭，紧接着在9月份英国决定脱离金本位。很显然，胡佛的延债宣言不足以缓和危机，但它至少显示出美国愿意与其他国家一起应对危机。在避免采纳单边行动的情况下，各国政府都试图全力拯救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结构。

无论如何，战债延付宣言只是一个暂时的缓和，1932年6月，欧洲国家在洛桑召开会议讨论战债和赔偿问题，他们达成削减德国赔偿的协议，但前提是美国就战债问题同意进行重新谈判。然而，胡佛拒绝采取仓促行动而只同意将一年的战债延付令再延长6个月。当1932年12月延付令到期时，他坚持战时盟国恢复还债，英国、意大利和芬兰等国这样做了，但法国拒绝。胡佛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十分强硬，其中的部分原因源于他认定战债将有助于保持美国的财政平衡和商业恢复，也同时源于他在该问题上的总战略：战债和赔偿问题应当放在支持多边主义的国际合

① 关于胡佛对大萧条的反应，参见艾尔伯特·罗曼斯科：《富裕的贫困》(纽约，1965年)。

作的大框架之内加以解决。[1]

令胡佛大为失望的是，他在 1932 年 11 月总统选举中败北（甚至一些直言不讳的国际主义者也抛弃了他），因此，未来的美国经济政策将要取决于他的继任者富兰克林·罗斯福。尽管如此，胡佛还是没有对多边主义的方法失去信心，他极力劝说未来的总统应当郑重其事地准备 1933 年年中在伦敦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此次会议将全面讨论贸易、汇兑、赔偿、战债和其他相关问题。他想首先确保金本位的恢复，因为它是恢复经济与重建稳定的关键所在，他认为，世界各国届时将不得不同意放弃限制性的贸易操作和地区安排，重新采纳固定汇率的部分制度。这一切都应归功于胡佛：尽管这些建议在一开始都没有被罗斯福采纳，但其中的大部分最终还是被美国和其他国家所接受，成为另一场世界大战后的另一个全新世界经济体系的基础。

日本对世界秩序的挑战

胡佛还有控制经济危机的另一种想法：鼓励进一步的裁军。如第五章所论，美国、英国和日本未能在扩大其裁军协定所包含的范围方面达成一致，即进一步将轻型巡洋舰、驱逐舰和潜水艇等所谓的辅助战舰包括进去。当选总统后，胡佛决心再作努力，并在 1930 年 1 月组织了 10 年内的第 3 次海军裁军会议。尽管最初与大萧条无关，但胡佛看到了两者的联系，相信裁军将迫使政府减少公共开支，而平衡的预算显然是结束经济混乱、恢复商业信心和保持货币价值所需要的。胡佛还开始将战债和赔偿问题的解决与裁军相挂钩，表示愿意考虑削减甚至是取消这些支付，只

① 梅尔文·莱夫勒：《难以琢磨的要求》（查佩尔希尔，1979 年），第 234—245 页。

要相关国家同意将所节省下来的资金不用于军备建设。因此，不管是对1930年的海军裁军会议，还是对1932年国联在日内瓦召开的一般性裁军会议，胡佛都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兴趣，实际上，这些都是他通过国际合作寻求经济恢复的整体战略中的一部分。

他至少可以对1930年的海军会议感到骄傲，因为它是一个成功的国际合作典范，尽管也产生了一些当时无法预料的后果。美国、英国和日本的代表们解决了三国海军在不同类型战舰上的力量分配，日本海军坚持在辅助性战舰上10：7的比例，声称华盛顿会议在主力战舰方面规定的10：6的比例已经妨碍到了它的国家利益。美国和英国的代表认为满足日本的要求将会危及它们太平洋领地的安全，此外，他们还没有解决在巡洋舰吨位上的分歧，这一点曾经导致了1927年会议的失败。

好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出现促使三国政府格外努力并终于达成一份折衷方案，实际上，这三个国家都迫切需要避免一场代价巨大的海军军备竞赛，他们还相信在很多国家都受到单边主义力量驱使的时刻，他们在海军问题上的失败将会给基于相互合作与协商的国际关系构成一次致命打击。伦敦的折衷是一个具有独创性的方案：相对于美国的10，日本的相对海军吨位将为6.975，该比例是根据大型巡洋舰和潜水艇10：6和其他种类辅助战舰10：7的比例综合计算出来的，此外，各国还同意继续维持主力战舰10：6的华盛顿模式。[1]

伦敦折衷案是常识的胜利，并证明了此时三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有足够的决心维持合作的框架，不幸的是，该会议成为此类行动的最后一次。至此，三国在未来的很多年内再也没有就海

[1] 关于伦敦海军会议，参见詹姆斯·克罗利：《日本的自治要求》（普林斯顿，1966年）。

军事务，实际上没有在任何事务上采取共同行动。

就此而言，应当受到责备的是日本海军。尽管日本代表团中的海军代表在伦敦同意了折衷方案，但东京的大多数海军官员拒绝照此行事，他们攻击说新条约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和尊严，并抓住机会鼓动群众性运动羞辱文官政府，指控他们违反了“最高指挥权”，即一种只有至高无上的天皇和军方在相互协商后才能决策的权力。为了说服天皇无视海军的反对而接受伦敦条约，反对者们辩解说政府实际上是保护了国家主权。公共舆论就此被激发起来，一个右翼的年轻人袭击了首相并导致后者的死亡。被冠以国际合作外交的日本文官政府受到了严重的动摇。

这些似乎还都不够，日本政府和整个国际社会在 1931 年又要面对一个更为严峻的危机。9 月 18 日，日本驻满洲部队关东军炸毁了靠近沈阳（奉天）车站附近的一段南满铁路，他们以此为借口在城内制造混乱，并与守卫政府办公室的中国小分队发生了小范围冲突。（作为日本击败俄国的战果，日本军队从 1905 年起就驻扎沈阳，并接管了俄国自 19 世纪 90 年代后期在南满所拥有的权利。）这就是沈阳危机的开始，它迅速演变成满洲危机，致使中日两国在整个满洲范围内发生冲突，最终的结果是日本的大获全胜，因为该地区的中国军队太过虚弱而无法抵抗，此外，他们也没有得到南京政府的支持，实际上，后者早已决定不在军事上介入长城以北的地区冲突。[①]

正陷国际经济危机之中的美国和其他国家难以作出任何举动以影响远在满洲的事件，换一个角度来讲，日本军队行动的时机也是经过精心算计而利用这种形势的，海军对伦敦条约的反对已经削弱了文官政府，现在陆军决定与海军争夺更大的权力，此举

① 英语文献中对满洲事件的最好研究是绪方贞子：《满洲的挑衅》（伯克利，1964 年）。

对支持国内自由政治秩序和对外国际合作的党派政治家、官员、商人和知识分子等构成了另一次打击。在策划满洲军事行动的同时，一些陆军和海军人员也卷入一场试图推翻政府以建立军事独裁的秘密计划，该计划未能成功，实际上，满洲行动绝非偶然，从共谋论者的观点来看，1931 年是一个采取此类行动的最好年份。1930 年伦敦会议取得的国际合作并不容易维持，特别是当经济危机恶化、世界大国都在全力以赴地应对德国和奥地利的银行危机之时。（前面已经提到，英格兰银行在 9 月 21 日宣布脱离金本位。）日本的激进主义分子正确地断定：只要他们将自己的行动表现为是针对中国反对条约权利的一种自卫行动，其他大国就不大会涉入满洲的冲突。

中国方面拼命地转向国联和美国以求得帮助，它认为这是对战后和平与秩序原则的公然反对，也是对集体安全的一次考验。中国人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日本进攻沈阳后，中国迅即上诉，国联不能无视中国的呼吁，日内瓦迅速召开一次会议并呼吁两个交战国停火。但是在国联作出进一步行动之前，中国又转向美国寻求帮助。[①]

美国发现自己也要被迫采取一个立场：是否应当在集体安全的名义下支持国联由此也支持中国？这样的支持会造成什么后果？美国民众是否会支持这样的政策？或者，美国是否应当远离此事？此举肯定会被解释成对国际合作的背离，如果这样，美国将如何解释自己的立场？美国应当对日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日本成功征服满洲会对美国的安全和利益造成什么后果？这些问题都十分严峻，美国政府决心全力应付。不幸的是，既由于经济危机造成整个国际社会的混乱，也因为日本军队不管付出任何代价

① 关于对日本侵略的中国反应，参见帕克斯・考博尔：《面对日本》（马萨诸塞州剑桥，1991 年）。

都决心继续占有其征服成果，美国的行动没有带来直接的不同。

同时得到华盛顿大多数官员所赞同的国务卿史汀生的最初反应，是关东军的单边行动能够被东京的文职领导人所制约，他们在整个20年代都极为合作，史汀生不相信他们会认可任何破坏华盛顿会议条约框架的行动。但美国高估了日本政府控制军队的能力和意愿，因为东京的文职领导人已经受到伦敦海军条约插曲的严重动摇。伴随着公共舆论表现出对军方“惩罚中国”行动的满意以及反对党对内阁屈膝外交的攻击，几乎不存在任何史汀生所希望的势头。日本甚至还设法阻止国联开会讨论沈阳事件，要求直接与中国解决问题，当国联开会并呼吁两国立即停火时，关东军将冲突扩大到满洲南部边界的锦州地区以此回应国联的呼吁。但日本和中国都赞同国联在12月设立的一个调查委员会，因为双方都认为委员会的发现将有利于自己一边。

该委员会由李顿勋爵领导，美国也任命了一位将军弗兰克·麦科伊参加委员会工作，表明美国对遏制危机的国际合作努力有了更进一步的介入。史汀生早先已经派出了美国领事普伦蒂斯·吉尔伯特到日内瓦参加国联对满洲危机的讨论，这是美国主动与世界组织紧密合作的罕见举动。当1932年1月初日本军队完全占领南部满洲时，国务卿史汀生发表了一项声明，表示美国政府不承认中国和日本两国签署的违反门户开放中关于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原则的任何协定，这一立场表示胡佛政府拼命地试图维护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结构，如果需要它和国联一起努力，美国也会照做。考虑到胡佛在世界金融事务方面所实施的同样举措，满洲危机期间的美国政策充分证明了它旨在维护国际合作框架的决心。[1]

---

① 加里·奥斯特罗维尔：《集体不安全》（宾夕法尼亚州莱维斯堡，1979年）。

在1932年2月日内瓦召开的由国联主办和59国参加的全面裁军会议上，美国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它准备再一次与国联协同行动，胡佛总统甚至建议所有国家将各自军备削减1/3，尽管该建议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但英国、法国和其他相关国家都同意裁军，但条件是如果它们遭到进攻（假想被重新武装的德国），美国得答应帮助它们。美国未能给出这样的承诺，但它至少表示愿意就此进行协商。如前所述，美国决策者试图将裁军和战债赔偿问题放在恢复世界秩序的整个框架之中加以解决。

但是，美国也只能走这么远，当日本公然藐视将满洲危机归咎于日本、并要求两个亚洲国家恢复到1931年9月状况的李顿委员会的报告时，美国没有作出任何阻止日本退出国联的行动，尽管日本此举是对国际组织的一次严重打击。相应地，当德国民众在1932年的选举中广泛支持反对战后秩序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时，美国当局也是毫无作为。这样，就在胡佛于1933年3月离开白宫时，尽管他自己及其助手怀有良好的愿望和努力，但国际体系已经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它是否还值得继续维护将是留给下一届政府的主要问题。

遭受攻击的自由主义

胡佛年代的经济和外交危机也同时见证了一场对美国外交政策和战后国际秩序的思想基础的严重挑战。如前章所论，战后国际秩序和美国对外政策都是基于一种新的和平观念，更具体来说，是一种在世界事务中更为注重经济和文化关系而不是武力和军事战略的思想观念。

国际秩序与稳定的关键被设想为国内的民主、资本主义制度与海外的经济相互依存和文化交流，但是，伴随着看起来没有尽头的经济危机而导致的人们对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怀疑，这些

假设开始都受到了攻击。从 1932 年起，越来越多的评论家开始讨论这些制度的灭亡以及用一些左的或右的激进办法取而代之，几年前看起来注定改变整个世界的美国生活方式现在似乎已经垮台，很多美国人认为美国不再能够以自己的模式去影响其他国家，反而开始考虑外国是否有应付经济危机的更好办法。当他们看着苏联成功地完成了它的五年计划（1928—1932）以及纳粹和共产党在德国的影响日益增长时，美国人开始怀疑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甚至独裁是不是比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更为有效。在政治方面，美国政治似乎也无力应对危机，人们看不出两个主要政党的分别，有人开始呼吁一个不要过于关注商业利益的新党派的出现。[①]

在这种对自由资本主义批评声音日益高涨的情况下，很多观察家很自然地开始放弃盛行于 20 年代的那种国际主义，并将之视为失败了的资本主义的一种表现。他们指出这种伴有自由企业、投机和贪婪本质等国内秩序的国际秩序只是增加已经富有者的财富，而不能给整个国家带来切实的利益。那些醉心于促进经济国际主义的华尔街银行家、投机分子以及投资者曾经显赫一时，而现在的声誉均遭败坏，经济国际主义也受到质疑。当胡佛总统在拼命地复兴经济国际主义时，他的批评者们却试图将之完全摆脱并激进地要求重新制定美国的对外政策，使之将广泛的国际经济往来减少到最低程度而确保国内经济的发展，这就是查尔斯·比尔德在 1934 年出版的一本书名所称的“国内的门户开放”。[②] 它的指导思想是通过关注国内而不是重返多边主义的方式寻求经济的恢复，为了防止经济危机的进一步恶化，看来很有必要尽可能地减少美国对外国的承诺和联系。

---

① 艾伦·布林克利：《抗议的声音》（纽约，1982 年）。

② 查尔斯·比尔德：《国内的门户开放》（纽约，1934 年）。

文化国际主义的结局又是如何呢？是否也成了大萧条的牺牲品？当然是这样，因为对国际经济主义的反对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包含着对设想相互依存与合作的世界社会的基本原则的抛弃，在一种国家利益优先于对世界社会关注的氛围中，那种成为20年代主要特色的国际意识要注定遭到伤害。由此，美国的思想领袖也从以普遍有效原则说话的弗雷德里克·泰勒家族和亨利·福特家族让位于强调国内需要的查尔斯·比尔德等人，甚至还有查尔斯·库格林，这位底特律的牧师大肆谴责金融家、知识分子以及赞同有国际导向的其他人误导了整个国家。甚至曾经代表战后国际主义思潮的沃尔特·李普曼现在也指责美国的政治领袖将“贪婪的观念”发展到了损害“那些使人自尊、平静和自信的东西”的地步。[1] 在经济危机的环境下，这是一种国家而不是国际救亡的表达，因此李普曼加入众多反对美国帮助中国保卫满洲的专栏作家的行列也绝非偶然，美国国内的迫切问题已经应接不暇。

另一方面，国际主义并没有就此消失，正是因为民族主义和常常呈现出狭隘心态的沙文主义在世界各地的复兴，才出现了文化国际主义者为保香火不绝的英雄举动，尽管他们最终都备受挫折。诸如巴黎的文化合作国际研究院（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Cooperation）在30年代初期的活动比以往更为频繁，德国和日本也继续向国联派出自己的代表参加经常性的文化交流聚会，或许最为显著的是国联的科学顾问委员会将“道德裁军”成功地纳入了日内瓦裁军会议的日程，其指导思想是对武装力量之规模的技术性限制并不能确保和平，除非它受到宽容和世界主义心态的支持。

---

① 沃尔特·李普曼：《解释（1931—1932）》（纽约，1932年），第28—29页。

在美国，诸如对外政策协会（the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和对外关系委员会等机构在大萧条期间也没有终止各自的活动，尽管也受到了公司和个人捐款急剧减少的影响，但它们仍然继续招募新的会员并与反国际主义潮流斗争。太平洋关系研究院的几次最重要会议都是在1929—1932年间举行的，中国和日本的学者与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同行们一起讨论并寻求解决满洲危机的办法。上述这些行动似乎都没有产生什么效用，但这并不会减少其历史意义，因为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思想在黑色的30年代中保持生生不息，并成为构筑另一个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原则。

第九章　极权主义和民主的生存

极权主义与战争

前文所引用的李普曼的表述说明：即便是在美国，一些有影响的时论家也逐步认识到如果要克服严重的经济危机，就必须对政治和社会进行基本的重新定位甚至是重新构建。李普曼对当时的危机非常关注，以至于他在某些方面都走到承认只有独裁才可能拯救美国的地步。[①] 像他这样信奉民主与自由主义的人们都产生了这种感觉，显示了当时人们对美国现存机构应付危机能力的完全绝望。

如果美国都存在一些人对危机产生这样的反应，那么在一些更加缺乏民主根基的国家，各种致力于将其政治制度转变成独裁体制的力量的壮大就更不足为奇了。

当然，近代极权主义的崛起不能全部归咎于大萧条，极右的（法西斯主义）和极左的（共产主义）极权主义在 1929 年之前都已存在。即便是将我们的讨论限定在 20 世纪，也应注意到法西斯主义（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国家专制主义）是紧随着大战而出现在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等地，它们向那里的党派政治、议会民

① 参见罗兰德·斯迪尔：《沃尔特·李普曼和他的美国》（波士顿，1980 年）。

主以及多元化的意识形态发出挑战，并力图以国家名义下的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控制的中央极权体系取而代之。在此过程中，对战争结果、战后通货膨胀、失业以及对国际主义情调的不满等因素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除了在意大利，这些运动都未能夺取政权并建立他们对国家政治的控制。但是，1929 年之后，由于大萧条的出现以及国家和国际事务的动荡无常，法西斯主义的吸引力开始上升。

法西斯运动获取权力的典型模式是通过议会政治（选举）和群众游行与暴力，一旦掌权，它们就立即与军队和商业集团联合起来铲除反对力量并将整个决策极权化。接着，通过攻击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文化教育政策、通过制造新就业机会的公共建设项目、通过各种各样的年轻人组织、通过游行、烟花以及通过恐吓政策等等将普通百姓纳入新的政权当中，持不同政见者将被封杀、临禁、驱逐甚至暗杀。在所有的法西斯国度，主要的制度工具都是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都是民族文化，它要求献身和弘扬某一种文化遗产，而这种文化遗产都是以国家或种族进行狭隘定义的。也就是说，在整个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对某人自己的团体、政党或国家的一种排他性的忠诚的特殊主义战胜了普遍主义。[①]

与此同时，共产主义也出现在 1917 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的俄国，它宣扬一种作为无产阶级利益化身的共产党掌权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国家终“消亡”，当所有的国家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到达这一阶段时，就不会再有单个的国家而是一个大同的世界。但到 20 年代后期斯大林完全掌权后，他重新调整了革命议程，保护和发展苏联的利益高于世界无产阶级的团结，共产党仍然是关键的机构，但由共产党员领导的国家也发展出了自己的权

---

① F. L. 卡斯顿：《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伯克利，1967 年）。

力体系，最重要的是警察和情报机构，并建立了对公民个人实质上的全盘控制。尽管这种倾向出现在 1929 年之前，尽管大萧条没有给苏联造成像西方国家一样的严重影响，但在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早期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这种倾向在苏联无疑得到了加强。苏联的五年计划强调的是自足和发展重工业，因为美国和欧洲资本已经中断，在国内寻求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和人力是必然的，这一过程确认了集体化政策，也进一步加剧了国家权力的膨胀。

30 年代初，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放弃或至少减少它们对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以及自由文化的承诺。在欧洲，奥地利、罗马尼亚和芬兰等国的民主政府都遭到侵蚀；在亚洲，日本的政党被持续削弱，以至于无力阻止日益壮大的军方对决策的控制，中国的国民革命者甚至在反对共产党方面向德国和意大利寻求办法；在拉美，对极权主义的迷恋也在扩散，最具典型代表是胡安·庇隆在阿根廷领导的法西斯运动。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当时这种转向极权主义的潮流对国际事务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国内极权和对外侵略是否有一种什么样关系？一个民主政治倍受攻击和专制主义上扬的世界是否更倾向于战争？应当为维护国际秩序与和平采取什么措施？正陷于经济危机并全力应对的国家是否会将注意力外移并形成一个有效的对外政策？

这都是些极端重要的问题，它们的出现也显示了 20 年代以来的世界环境发生了多么不同的变化。本章将主要讨论 1933—1937 年间的这些问题，它是罗斯福任期的头 4 年，但对研究专制政府的世界事务及战争与和平观颇为有用。

曾任纳粹党冲锋队司令的厄恩斯特·罗姆宣称：战争“是一个想在地球上生存和征服的民族的内部需要，对士兵来讲，战争

是青春、希望和满足的基础”。[1] 常被法西斯国家重复的上述表达是对盛行于20年代和平观念的断然抛弃，至少在法西斯国家，和平不再是一种正常和规范的状态，战争成为人类社会中善良与高贵的代表。在这些社会中，国家成为渴望战争、自我牺牲和甘愿为集体利益奉献生命的体现，而另一方面的和平则意味着被动、庸俗和不能给集体带来任何意义的消沉。一位美国观察家在1934年写道：“在其余的所有国家，除了一小部分对战争和战争利润感兴趣的群体以外，未来战争被看成了每个人都必须为之准备的一场可能的罪恶。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德国，战争就是民族的理想和所有政治和社会目标的终结。……它……是治国术本身的终结。”[2] 他还应该将日本和意大利加入上述名单。对于这些和那些正在加入法西斯行列的国家，战争被当做国家和国际事务的永恒状态。苏联的共产党领导人未必一定持此观点，但他们也认为世界就是一个争夺权力的场地，而战争是威胁国内体制的一个持续的可能因素。尽管艾伦·梅尔沃德指出此时的这些国家并没有制定出一个长期的战争计划，[3] 但至少欧洲的法西斯国家都将使用武力当成是一种合理的国家政策，它不但可以实现具体的目标，而且也能对国家纪律和民族荣耀产生影响。

这不光是重返霍布斯的概念，即主权国家处在一个持续的战争或备战状态，在30年代，极权国家在国内秩序和对外事务两者之间建立了一种非常明确的联系，而这在大战前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对法西斯国家以及斯大林专制下的苏联来讲，战争与国家的出现密不可分，战争的记忆将现在与过去联系起来，战争终究到来的观念确立了国内秩序的合法性。当时的极权主义是

---

① 参见威廉姆·舍尔：《噩梦年代》（纽约，1984年）。

② 《哈泼斯》第168期（1934年4月），第517页。

③ 艾伦·梅尔沃德：《战争、经济与社会》（伯克利，1979年）。

一种政治控制的制度，它在国家权力和民族荣耀的名义下确保内部团结、纪律和自我牺牲的优先地位。即便是没有真正的战争，但战争的心态一直存在，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政治制度又进一步加强这一点。

由极权国家发动的具体战争事例会在后面提及，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必须认识到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对国际事务有着一个立竿见影的不安影响。问题是这种事态的发展是否会完全打乱国际体系，答案日益取决于民主国家的回应。

民主国家与战争

民主国家是怎样面对世界范围内日益增长的极权主义影响的？李普曼在1933年3月写道："从19世纪起就了解民主的人们、曾经生活在自由主义传统下的人们并没有陷入混乱、也没有向独裁者屈服。"[①] 他心中的民主国家是指斯堪的纳维亚、瑞士、法国、英国及其自治领和美国，这些国家似乎是当时仅存的民主国家，李普曼满怀信心地宣称：面对极权主义的扩散，它们"能够防御民主"，因为这些国家的"平民政府本来就很强大"。然而，他很快就对此失去了信心，而且指责罗斯福政府将国家引入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其他民主国家也出现了同样的运动［诸如英国的工会运动（the Union movement)］，它们对各自民主政府应对严重经济危机的缓慢步伐越来越失去耐心，四处呼吁至少在危机阶段应当实施某种形式的极权控制。它们声称在应对大规模失业、无力赎回抵押品以及普遍饥饿等方面，传统民主政治无能为力，因为其特征是党派政治家们的相互争吵，而他们均受惠于利益集团。但一般的商业机构也不足以托付缓解危机的重任。真

① 沃尔特·李普曼：《解释（1933—1935）》（纽约，1935年），第297页。

正需要的是中央政权能够采取有力措施以创造就业岗位、重新分配收入并满足人们最小需求的一种全新制度。

就这样，在30年代的前半期，民主国家受到了针对其合法性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它们被要求在不要将民主传统变得面目全非的情况下应对挑战。这就是1933年3月入主白宫的罗斯福与其他民主国家领导人所要面对的任务，因为我们这里主要关注的是美国的对外政策，所以不需要详细描述他的“新政”（the New Deal）方案。然而，如果不谈及美国所实施的一些重大试验，任何对30年代早期国际关系的讨论都是不恰当的，因为诸多的同时代观察家都同意如下说法：如果民主政府在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消失，那一定会对其他的民主国家带来严重的影响，鉴于法西斯国家对战争的偏好，整个国际事务的性质也会由此发生重大变化。

新政是一项试验性的工作，它超过了以往的改革措施，但又止于法西斯国家的中央极权特色。它的关键是启动了一套由政府指导、策划和赞助的项目用于制造就业机会、提升物价与增加工资以鼓励生产和消费、重新分配私有财富、保证银行存款以及为美国民众提供最低的社会保障。所有这些措施都需要加强政府的中央化，用于管理各种项目的联邦政府机构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开启了美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主要特征：官僚机构的膨胀。官僚们非但没有没落，反而与党派政治家特别是设计新政方案的民主党领袖一起工作，更重要的是，政治家和官僚们与私有行业特别是企业人（尽管许多银行家和工业主至少在一开始曾激烈地反对罗斯福）、律师等行业人员以及劳联领导人携手合作，将不同的协商机构都团结起来以助于整个经济和社会的规划，而那些拒绝合作者都受到了惩罚，尽管美国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出现对持不同政见者的严重镇压现象。

因为这样的一种安排巩固了国家的团结，也因为现在国家和

社会（以商业、劳工和其他职业为代表）在更高程度上的合作，新政期间的美国政治呈现出一种介于传统自由国家和法西斯国家之间的某种状态。但对同时代的许多观察家来讲，新政还是一种将整个国家逐步疏离自由主义并走向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墨索里尼曾祝贺罗斯福在转变美国政府的过程中效仿了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①] 李普曼也将新政贴上了极权主义的标签。不能否认的是美国确实正在变得更加中央化和官僚化，在此过程中，民主、自由和自由企业的传统概念也被赋予重大的重新定义，一位投稿《哈泼斯》的作者在 1934 年写道："在当今，保卫民主的努力有点像 313 年保卫异教信仰或 1793 年保卫神圣皇权，人们都将民主是坏的以及民主正在死亡视为当然……人们可以注意到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分子都有一定的羞愧，他们就像是社会底层的贱民，对能够允许单调的生存就已经深感满意了。"[②] 但是，这位作者还正确地断言：只要言论、结社和政治的自由尚存，美国就不会走向德国、意大利和苏联的道路。实际上，在美国，联邦计划和官僚体制的增长并没有导致压制自由的结果，我们甚或可以说反而更多的人被赋予了表达自己的机会，他们都被融入了整个政治体系，不是通过来自上面专制主义者的操纵或者崇拜国家的群众教化，而是通过在新政中给予人们利益并使他们成为政治进程积极参与者的经济和社会措施。

就美国正在出现的一种合作主义制度而言，墨索里尼宣称罗斯福是在效仿他是符合部分事实的，这是一种国家和社会，特别是政府、企业与劳工之间的协作安排。但正如前一章所论，如果不是更早，这种安排在 20 年代就已经出现了，并被称为"合作

---

① 约翰·狄金斯：《墨索里尼与法西斯主义——美国的观点》（普林斯顿，1972 年），第 280—281 页。

② 《哈泼斯》第 169 期（1931 年 9 月），第 418、426 页。

主义”。新政是否属于这种合作主义的安排尚存疑问，但无论如何，新政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大量的政府督导经济而不是 20 年代那种政府与企业自愿合作的事件。实际上，与上个 10 年商业文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30 年代初期的资本家和工厂主都因经济灾难备受责备而处于守势。整个国家的主流风潮是强烈的反商业以及各种各样、诸如由路易斯安那的休伊·朗和加利福尼亚的弗朗西斯·汤森等人领导的抗议活动，他们都旨在以政治行动寻求美国财富的重新分配。在这种情况下，新政提供了一种不太显极端的方式，从而使得国家避免走入另一极端的那种国家与企业间法西斯式的同盟模式。

另一方面，或许还应注意到美国的劳工在新政期间获得了权力与影响，他们积极参与了新政方案并从中获益。当然，有些激进的劳工领袖和知识分子认为新政的步伐还不够快，指出新政仅仅是为了从一些失败中拯救资本主义，而国家需要的是一场更为深远的结构性改革。[①] 就像一些少数的右翼极端分子将意识形态的方向转向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一样，他们将苏联当做榜样。但是，总地来讲，或左或右的极端主义都未能在转变公众舆论方面取得成功，它们大多还是受到由新政所代表的那种改革主义的影响。

不管怎样，美国和欧洲的民主国家都没有出现作为大萧条后果的好战情绪，人们都忙于国内事务，只有一小部分人产生了激进的思想，认为对外政策是解决国内危机的关键，当然更没有出现崇尚战争和放弃和平主义的现象。当这种现象在很多国家肆意横行之时，民主国家没有参与其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即便是极权国家诉诸于使用武力来破坏国际秩序时，它们仍倾向于回避外国的纠缠。

---

① 马尔克姆·考利：《金山梦》（纽约，1980 年）。

孤立主义的冲动

这就是被称为孤立主义的现象成为30年代中期美国社会一般主要力量的背景，当时的孤立主义实质上是指美国不偏离它对和平的基本定位并尽力避免对任何外部影响的卷入。鉴于极权国家的好战倾向及其激进的对外政策，外部影响又是必然的，因此，对和平主义的坚持和对战争的痛恨则主张美国应当变得更为孤立，应当比战后第一个10年内与世界事务的联系更少。

加以胡佛政府在恢复由于日本单边行动和各个欧洲国家单干经济措施所动摇的世界秩序方面的失败，孤立主义的情绪受到进一步的鼓励。因为美国支持国联阻止日本侵略和促进世界范围内裁军与经济合作的努力没有取得成功，公共舆论以及官方思维在1933年以后都不愿意再次支持类似努力，它们都相信新政府的首要任务应当是恢复国内经济的信心并采取措施阻止大萧条的蔓延，就此，外国的影响应当予以回避。通过国际合作行为恢复经济的时机似乎已经过去，特别是因为愿意合作的国家现在似乎很少。许多美国人呼吁，现在是美国必须停止担心世界事务而将精力转向国内的时间。这种孤立主义情绪的一个典型代表是1935年的中立法（the Neutrality Act of 1935），它禁止向一切交战国运送武器，这与包括有权向交战国销售武器的美国传统立场完全相反。现在，美国认为不但最好不要继续坚持1914—1917年所经历的这种权力，反而应设法限制它们，以便将卷入外国事务的风险减到最低程度。

罗斯福政府在第一任期内的对外政策就反映了这种孤立主义，新总统也似乎意识到了希特勒在德国崛起给世界与美国所带来的潜在威胁，但在一开始，他还是顺应美国人民对介入外国事务的嫌恶以及他们认为国际事务的重要性次于国内复兴的意识，

而且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也似乎越来越小。在这种状况下，罗斯福认为应当在对外事务方面采取一个比较被动的姿态。

然而，由于这一时期的国际领域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美国的被动和孤立实际上就等于放弃了自己作为世界领袖的作用。当其他国家寻求重新定义世界秩序时，即便是美国不喜欢这种努力，但也应当站出来。然而，当外国势力迅速合谋以破坏、如果不是完全摧毁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建成的国际关系体系时，美国却对此没有进行抵制。

有一些具体的事例可以证明这一点。对于国际经济交易的混乱状况，与胡佛不一样的是，罗斯福不愿意在伦敦经济会议上扮演坚定角色，该会议筹备于胡佛时期，但直到 1933 年 6 月才得以召开。正像会议所显示出的那样，此次会议是一个机会，一个给世界上主要工业国家的最后机会：看他们能否在战债与赔偿、保护主义以及货币操纵等棘手问题上相互协调各自的对外经济政策。会议的最终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美国的态度，因为尽管出现了大萧条，但它仍是国际经济秩序的关键所在。

美国在伦敦的举动未能有助于激发人们对该秩序的未来产生信心。也有一些以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为代表的美国人想真心维护经济国际主义的框架，但其他官员则非如此。除了赫尔，参加会议的美国代表团成员还有内华达州参议员基·皮特曼和雷蒙德·莫利，前者的主要兴趣在于恢复白银的通货地位（也就是说，让各国将白银作为另一种交换媒体），后者是一位“智囊”要员，提倡采纳诸如保护主义和美元贬值等激烈政策以扩大美国的出口贸易。他们之间没有就伦敦的主要讨论议题达成一致，而罗斯福也没有下达明确的指示与进行领导。

伦敦经济会议的成功与否将完全取决于美国能否与英、法等国相互合作，通过恢复金本位稳定对外汇率以避免国际贸易领域的进一步混乱。汇率的稳定成为所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激烈争论

话题，因为它是维护经济国际主义的一个原则问题，而此时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放弃该原则并倾向于经济民族主义。对如果要维持经济国际主义就不得不充当领导角色的美国人而言，汇率稳定则意味着美元必须维持相对于其他货币的较高价值，这不仅意味着美国商品价格在海外的相对昂贵，而且还迫使美国不得不通过输出黄金以支持其他货币的价值，此举显然会抑制国内的经济复兴。此外，即便是美国的货币在世界市场上保持稳定，但它在国内的价值（即商品价格）也会大幅浮动，从而加剧国内的经济动荡。罗斯福对这种担忧十分敏感，而且也认为仓促重返一种国际黄金本位只能将国家经济置于由外国货币摆布的境地，最好还是坚持能够年年保持相同的国内购买力的美元货币，以防止国内物价的急剧下跌。因为罗斯福认为这样的目标与汇率的稳定相互矛盾，所以他反对在伦敦就该问题达成任何协议，从而导致经济会议的失败。实际上，这是反映罗斯福政府在其第一届任期内将国内问题置于国际问题之上的最佳例证。

美国对同一时期其他国际危机的反应也显现出了相同的态度，或许最明显也最不幸的是1934年的《白银购买法》（the Silver Purchase Act of 1934），它是在代表白银和农民利益的国会议员压力下的结果，该法案实际上是将白银国有化，罗斯福总统下令财政部以比现有价格高出不少的一盎司50美分的价位收购美国国内的所有白银，其目的在于将恢复白银的通货作用，并增加它特别是在西部各州的流通。这一政策将世界其他国家的白银也都吸引到了美国，特别是白银通货经济的中国遭到特别大的打击，因为在美国较高价位的吸引下，大量的白银被迫外流。而占领满洲和华北部分地区的日本军队又专门制造事件进一步加剧中国经济的混乱。美国白银购买政策对中国造成的严重影响不是罗斯福政府的有意结果，但这一插曲却反映了当时美国与亚洲的关系。

这些关系已经脱离了胡佛一史汀生时期所奉行的集体安全框架，在解决中日冲突的问题上，美国政府要放弃集体行动的办法，并随着事件的发展而采取一种务实的方法。美国并非要认可日本的侵略成果，不存在承认1932年日军占领满洲后所宣布成立的满洲国的问题，也不要改变它自己一直宣称的门户开放或维持中国领土完整的政策。因此，当日本外务省在1934年宣称日本不希望任何第三国单独处理中国问题时，华盛顿立即抗议此举违反了上述原则。同样，美国还拒绝了日本关于太平洋共管新方案的提议，实际上，双方都是在界定自己在该地区的势力范围并确保对方遵守新的现状。罗斯福当局不满日本的扩张，但它也没有采取重要的步骤将之顶回去。1934年通过的答应在12年内让菲律宾独立的《泰丁斯一麦克杜菲法案》（the Tydings-McDuffie Act）也是这整个画面中的一幕，它是对该地区战略设想的一个产物，但更是来自国内压力的结果：各种利益集团都害怕菲律宾商品日益增长的竞争，除非割断它与美国的联系。

美国亚洲政策的观望和决断缺失还表现在未能和日本与英国继续海军裁军协定，如果得不到续签，在华盛顿和伦敦签署的海军协定都将在1936年终止，三国代表已经在1934—1935年期间陆续展开了初步磋商，但由于日本对所有类型战舰比例的要求以及美英的拒绝而一直难有结果。对日本来讲，新比例的原则意味着承认太平洋地区的新现状，但美国却认为它只能引发军备竞赛，并由此呼吁对所有类型的战舰进行20%的全面削减，日本和英国都不接受这一提议。最终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日本郑重地利用了裁军协定的这一间隔，迅速开始制定其旨在最终控制西南太平洋的全新海军战略。美国没有进行这样的转型，其海军建设与其说是符合太平洋的争霸战略，还不如说是与制造更多就业机会的联系更为密切。

美国在欧洲的政策也大体相似，它缺乏明确的定义，并且是

极力置身问题之外。1934 年，意大利人侵埃塞俄比亚，这是继日本占领满洲后对国际秩序的第一次公然挑战，罗斯福明确指责意大利是侵略者，但是却以采纳中立政策淡化了该事件的影响，美国公民不但被禁止向交战国出售武器，而且不能乘坐交战国的船只，当然，由于埃塞俄比亚根本就没有任何现金或船只吸引美国人，所以中立的真正效果还是惩罚了意大利。但像大战时期一样，该政策的目的更多的仍然在于避免卷入外国的影响，而不是针对改变这场冲突的结果。当国联投票对意大利实施经济制裁（但引人注目的是石油不在制裁之列）时，总统呼吁美国人都遵守这一决议。结果是一场没有法律保障的道德禁运，实际上，美国对意大利的石油和其他商品的运送船只并没有显著减少。[①]

对希特勒的德国，美国的政策（如果有的话）就更缺乏果断。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大部分美国人都对德国的种族政治，特别是对犹太人的迫害产生反感，一些美国人呼吁抵制德国贸易，另一些公开谴责纳粹暴行，还有一些组织结社反对纳粹。然而，美国政府却没有过多的行动，譬如国务院拒绝增加移民配额以适应想进入美国的德国犹太人，主要原因是害怕他们成为社会负担，因为德国当局不允许他们携带金钱。[②] 罗斯福总统也曾考虑过在德国采取侵略行动时对之实施贸易禁运，但这也存在诸如如何界定“侵略”等诸多的实际困难，在当时都未能解决。

实际上，相比日本与意大利，德国的直接目标还是比较温和的，主要是为了摆脱 1919 年和平条约施加给它的限制，即重新武装的问题，希特勒致力于消除对德国武装力量的规模和禁止在莱茵河地区驻军等两方面的限制。为此，他在 1933 年抨击日内瓦裁军会议并宣布德国退出国联，两年后，他与英国达成一项海

① 狄金斯：《墨索里尼》，第 290—292 页。

② A. 奥夫纳：《美国的绥靖》（马萨诸塞州剑桥，1969 年），第 105 页。

军协定，规定德国的海军被控制在英国海军力量的35%（于1919年所允许的数量相比，仍然有了相当大的增加），1936年，德国军队进驻莱茵河重新占领了这块一直禁止驻军的地区。

针对这些违反凡尔赛安排的举动，各大国反应寥寥或视而不见，美国也不例外。华盛顿的官员都认为美国在不选择立场的情况下难以有所作为，通过国联组织的国际合作看来已经不复存在，而说服德国重返国联更没有任何希望。如果欧洲国家能够找到处理德国重新武装的方法，那最好不过了，但那也是它们自己的事情，美国不应该介入其中。这就是罗斯福政府的整个态度，表现出了一种如下的认识：及战后的国际体系已经无法修复，且美国在重新定义世界秩序方面也做不了什么。当德国军队重占莱茵河地区时，美国反应十分平淡，国务院谢绝干预的原因正如赫尔所言，即美国与德国在1921年单独签署的和平条约并不包括莱茵河地区的内容。[①]

因此，罗斯福第一届任期内的整个对外政策反映了公众的孤立主义情绪并强调回避麻烦，它远离了胡佛政府郑重努力防止国际秩序全面崩溃的呼声。世界正在支离破碎，而美国并没有给自己委以恢复它的重任。

然而，这也不是说美国在此期间就没有任何主动的外交举措，两个美国外交决策显示出并非一切停止不动，在整个被动的框架之内，还是出现了一些小的步骤并对未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个事件是承认苏联，它没有产生什么直接的效果，但却对国际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承认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决策并不是专门对日本和德国崛起以及单边主义蔓延等事态考虑的成熟产物，而是罗斯福作为一项外交成就对苏联要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公

---

① 同上，第141—142页。

开姿态的回应。（就苏联方面，他们无疑对欧洲和亚洲形势的发展感到担忧。）此外，此举还能取悦那些醉心于拓展苏联市场的农场主、工业主以及商业人士。美国对苏联的正式承认始于1933年11月，但之后并没有发生任何能够将美苏关系带入世界政治等式的重大举措。在巴黎和会的日子里对苏联表现出极大兴趣的威廉·布利特被任命为第一任驻莫斯科大使，但他与苏联建立紧密联系的梦想很快就破灭了。

美国缺乏在国际关系中利用与苏联外交关系的兴趣体现在它对1935年8月共产国际召开的呼吁结成全球反法西斯阵线会议的漠然甚至反感。如果美国对影响国际关系有任何微小的兴趣，它都应该关注苏联的这一倡议，然而，它却将该会议看成是共产国际的另一次宣传。只有一少部分激进的美国人士抓住了这次机会并开始了一场漫长而备受挫折的努力：将国人的关注从国内转向国外危机。[1]

罗斯福时期更为嘹亮的号角声是被称为“睦邻政策”（the Good Neighbor policy）的拉美政策。如前所论，改变美国干预主义政策的决定是胡佛总统作出的，这种干预主义的标志是对门罗主义的西奥多·罗斯福推论和威尔逊时期对海地和圣多明戈的占领。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所作的只是扩大胡佛政策的范围与公开采取不干涉政策，当国务卿赫尔参加1933年12月在乌拉圭蒙得维的亚召开的第七次美洲国家会议（这样的会议是在战后开始的）时，他支持会议的宣言：“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力去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内外事务。”[2] 仿佛是为了将此原则落到实处，华盛顿着手废除与古巴有关的《普拉特修正案》（1901年）（the Platt Amendment），它曾赋予美国干涉古巴的权力，而现在古巴的主

① 考利：《金山梦》。

② 欧文·格尔曼：《睦邻外交》（巴尔的摩，1979年），第23—26页。

权被全面承认。美国在 1934 年撤出了它 1916 年派驻海地的军队，至此，运河区的美军成为美国在西半球的惟一的海外驻军。

这些措施也符合整个美国对外政策方向从行动主义到被动和孤立主义的演进。这是美国在 20 世纪以来第一次不再赋予自己确保加勒比海地区政治与经济安定的任务，也不再干预另一个美洲国家的内部事务。当然，现在看来，睦邻政策的这一方面只维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不到 10 年后，尽管形势出现不同，但美国的军事力量再次进入了拉丁美洲。然而，应当引起注意的是，睦邻政策也部分构成了在地区主义框架下的美国西半球政策，所谓地区主义就是指当时反对全球安排的一种普遍走向地区安排的倾向。尽管它与英联邦的帝国特惠制以及日本的亚洲自治不完全一样，但睦邻政策也旨在从政治和经济上将美洲国家捆在一起。因此，授权总统和外国政府谈判升降关税的 1934 年《互惠贸易协定法》(the 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 Act of 1934) 结果是和拉美国家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协定，尽管西半球的贸易并没有就此马上扩展，但这些谈判的确起到了加强地区联系的纽带作用，使得美洲国家顶住了世界其他地区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睦邻政策也将西半球从亚洲和欧洲当中孤立出来，从这一方面讲，它是美国孤立主义的一个方面，并反映了这样一种决心：在一个增加军备以及某些国家将之用于侵略的世界上，美国将保持低度武装并回避对海外的军事介入。在不增加军备、不愿意采取共产国际所追求的那种意识形态攻势的情况下，孤立主义似乎是惟一可行的选择。

第十章 地缘政治的出现

亚洲和欧洲的战争

直到1936年，亚洲和欧洲的极权主义还没有直接的联系。日本的军国主义在亚洲大陆有着一套自己的议程，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的纳粹主义也有着各自的战略，前者致力于征服埃塞俄比亚，后者则集中要求重新武装的权力和废除凡尔赛的限制。这3个国家逐个向世界秩序发出挑战，但它们的利益和定位都不一致，而且行动零散，未能联合起来对全球和平与安全构成统一的威胁。

这种情况从1936年开始出现变化。当年7月，西班牙爆发内战，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领导的法西斯分子向马德里的共和政府发出挑战。德国和意大利几乎与此同时就开始援助这些叛乱分子，而苏联则站到了共和政府一边。为了防止这场内战演变成一场国际战争，英国和法国拼命努力并至少在纸上取得了成功：他们建立了一个不干涉的国际委员会。但西班牙的内战没有停止，在德国武器特别是飞机及飞行员的支持下，佛朗哥的军队在1937—1939年间稳步壮大。

1936年11月，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签署了一项反对共产国际的协定。公开的协定是3国合作反击共产国际在新近宣布的联合阵线下领导的颠覆活动，但该协定中包含一个秘密条款，即签

字国承诺在任何一国发生反对苏联的战争时都应相互协助。就此，这3个右倾的极权主义国家首次与左翼的独裁国家发生竞争，增加了世界上反民主国家之间产生冲突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中国局势也出现了同样重大的变化。当年12月，蒋介石下令国民党军队包围西安（中国内地的西部古老首都）的共产党起义者，但效忠于前满洲军阀张学良的部队却拘留了蒋，迫使他停止反共行动以领导国家联合抵抗日本的侵略。张学良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以及接受共产国际联合阵线主张的很多其他人士的支持，作为释放的条件，蒋接受了这一要求，他在返回首府南京后宣布组成联合阵线，此举构成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国民党军队现在与共产党联合在一起，甚至双方的军队也合二为一共同对日本作战。

极权国家的合流以及中国第二条联合阵线的形成无疑显示了欧洲和亚洲事态的相互影响。就这样，整个世界缓慢而稳步地走上了暴力和战争之路，迫使苏联以及非极权国家以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对之作出回应。

如果人们在此之前还对极权国家诉诸战争的想法存有疑虑，那么这种疑虑在1937年和1938年则完全消失了，因为日本和德国都开始对邻邦国家诉诸武力。

1937年7月，日本和中国开始了一场持续8年的战争。尽管对7月7日发生在北京的两国最早冲突的起源仍然存有争议，但毫无疑问，它是中国的新兴民族主义和在中国华北寻求维持与扩展其影响的日本军方之间的直接对抗结果。后者成功地将中国军队赶出该地区并侵入中国中部，中国首都于12月陷落，在南京地区的战斗造成了巨大的中国人口伤亡，根据中国方面的研究，数字超过了30万，此次凶残的大屠杀是未来的凶兆。

整个1938年，日本军队继续向南部和西部推进并试图控制中国大部，但中国坚持抵抗，他们首先将首都迁到汉口，之后又

移至西南部的重庆，经过两年的战斗，结局仍然难以确定。为了改善形势，日本试图在南京成立一个亲日政府，他们说服中国的一个重要国民党人汪精卫离开重庆，转道汉口到达日本人控制下的南京。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在1938年11月宣布建立东亚“新秩序”，宣称旧的秩序不复存在，呼吁亚洲国家与日本合作建立一个新的地区体系，该体系代表的是亚洲的价值观与原则，不再是西方人所控制下的那套东西，尽管没人能真正明白这两套价值观和原则到底有什么不同。

在日本极力创建东亚新秩序的同时，德国也致力于确立它在“中欧”（Mitteleuropa）的霸权地位，此处的中欧是指主要由德意志人口组成的地区，诸如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以及但泽（Danzig）等。这是希特勒之前的诸多德国人曾经追求的目标：把通过创建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等国家所强行分开的德国人重新联合起来，但希特勒更愿意使用武力实现这些目标，而别人却犹豫不决。

1938年3月对奥地利的吞并（即所谓的“联合”）之所以在没有流血也没有引起世界其他大国更多反对的情况下得以完成，基本上是因为奥地利民族人口的主要构成是德意志人，以及奥地利独立地位在战后年代中一直受到质疑等原因。但是，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情况却不一样，它们位于德国和俄国之间，并且通过安全协定与法国发生联系，代表着欧洲的战后秩序，对它们独立地位的任何侵犯都意味着对凡尔赛体系的破坏，因此，不得不考虑到其他国家。

实际上，这恰是希特勒想对这两个新兴国家动手的原因，即对国际体系进行一次致命的打击。在此期间他是否还有其他更大的野心还不完全为人所知：在摧毁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两国后，或许他有意继续向东推进以获取乌克兰的粮食和领土；或许他已经设想了一场最终与包括苏联在内的斯拉夫人的种族之战；他也

许还有意控制整个欧洲并挑战海外的英帝国；或许上述整个目标他都兼而有之。但很显然，在 1939 年之前他还没有针对任何一个欧洲大国的系统战争计划，更准确地讲，他是首先追求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然后再根据情况制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①]

最初的步骤是外交性的，英国和法国政府都愿意与希特勒进行谈判以避免一场还没有准备的战争，他们的政策被称为“绥靖”，其主要想法是当有些国家扩充军备时，谨慎的政策还是设法与之谈判。尽管有可能导致对凡尔赛安排的进一步破坏，但对一场民主国家还没有准备的毁灭性战争来讲，达成一些折衷性的解决仍然是可取的。绥靖政策的一个突出例子是 1938 年 9 月达成的慕尼黑协定，在英国和法国的许可下，苏台德地区被德国吞并。然而，当随后 1939 年 3 月希特勒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其余大部国土时，英国和法国迅速作出反应，它们当即宣布不再承认德国的侵略行为，如果希特勒对波兰的独立作出行动，他们将履行对后者的承诺，即暗示他们甚至会使用武力以阻止德国。[②]

紧接着到了 1939 年春天，德国与英法的分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尖锐。伦敦和巴黎相继抛弃绥靖政策，与此同时，它们开始接近苏联以寻求达成针对德国的战略合作协议。然而，当德国和苏联也开始谈判并寻求达成一个避免相互开战的某种协议时，整个事态变得十分复杂，这样的一种协定对苏德双方都有意义：德国将无需担心两面作战，而苏联则在忧虑东方日本威胁时能够避免一场还不成熟的冲突。〔整个夏天，日本和苏联的军队在西

---

① 关于希特勒可能的战争目标，参见两种相互冲突的解释，A.J.P. 泰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伦敦，1961 年）；格哈德·温伯格：《希特勒德国的对外政策》（2 卷本，芝加哥，1970、1980 年）。

② 关于慕尼黑会议后一年内战争的爆发，最好的解释是 D.C. 瓦特：《战争是如何到来的》（伦敦，1989 年）。

伯利亚—蒙古—满洲交界的诺门坎（Nomohan）发生冲突*。]结果是1939年8月23日的一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不但损害了共产国际一直试图建立的全球反法西斯联合阵线，而且将两个主要的极权国家连在了一起，至少暂时是这样。

西方的民主国家处于防御态势，它们不但面临着与德国的可能战争，而且还面对着一个世界范围内反民主国家联盟的幽灵。对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来讲，现在苏联似乎也加入了它们的队伍。更糟糕的是，西班牙的内战在1939年以佛朗哥的胜利而告终，意味着世界法西斯阵营又多了一个成员。这一切似乎都表明民主国家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危险之中。

美国重返国际舞台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美国恢复了在国际事务中的积极角色。从1933年以来，它一直回避果断的外交（或许除了在西半球，但即便是在那里，重点也只是在互惠贸易方面）。但是，从1937年以后，罗斯福政府逐渐地开始显示出愿意重返国际舞台的迹象。并非是美国为应对日益严重的欧洲和亚洲危机所制定出了一项精心和全面的回应战略，而是这些危机事件逐步地迫使美国重新思考与重新定位自己的对外政策。

挑战和应对之间存有一个极大的落差。整个1936年，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孤立主义势头不但没有改变，反而为当年的中立法有所强化，该法再次延长了对交战国借贷的强行中立条款。当西班牙爆发内战时，国务院呼吁进行道德禁运，劝告美国人不要向

* 1939年5—8月，日苏双方在诺门坎发生武装冲突，有关细节可参见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5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217—221页。——译者

交战双方船运武器，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蒙得维的亚不干涉政策在西班牙的应用，然而，即便是与欧洲国家的不干涉委员会（美国没有参加）相比，美国的这种政策也显得太过温和。

或许惟一可见并有新意的事件是罗斯福总统当年11月末的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之行，他前往参加一个美洲国家间"维持和平会议"的开幕式。他当时刚刚赢得了第二任的竞选，觉得美国民众都在坚定地支持他的国内改革方案，或许是他决定利用此行重申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当然，此时的这种作用还是集中发展一种西半球的团结意识，但即便如此，他对世界事务也有着一种清晰的含义，正如他对各国会议代表所言：寻求侵略的外部国家"将会发现一个为着它们共同安全和共同利益而充分准备相互协商的西半球"。他是提醒那些寻求向大西洋彼岸进行权势扩张的外部国家（很显然是暗指德国）：美国以及美洲其他国家决心并有能力抵御这样的挑战。罗斯福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其他与会者在整个12月间讨论并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其中包括一项为了应付针对西半球威胁的自愿协商机制。这不是一个很大的收获，说明西半球国家还没有作好为保卫其集体安全而协同行动的准备，但对美国而言，它至少反映了美国有一种希望别人能够聆听自己声音的意愿，不光是在拉丁美洲，还包括世界其他地区。

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还采纳了一项计划：在美国和其他美洲国家政府奖学金的支持下进行学生和教师的交换，这是华盛顿官方支持下的第一个此类计划。[①] 这是一个重要的事件，标志着文化合作已经得到了美国官方的郑重关注。有趣的是，不少国家都在30年代积极促进文化的交流与宣传活动，英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都为此专门设立了官方或半官方机构，说明了它

① 欧文·格尔曼：《睦邻外交》（巴尔的摩，1979年），第64—65页。

们都对此很重视，希望通过交流与信息项目产生有利于自己的外国舆论以影响其他国家。在美国，文化交流一向都是由私人基金会和教育机构操办，而现在华盛顿官方却持有这样一种看法：对外政策要承担的任务并非仅仅是保护安全与经济利益。当然，文化是 20 年代国际关系的一个主要因素，但当时的重点是文化国际主义，即强调一种世界范围内的人类团结与相互联系。相比而言，30 年代的独特现象是文化交流被直接当成一种官方政策的工具。鉴于服务于国家实力的对抗性意识形态和各种政治运动的出现，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世界事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凸现文化因素，尽管它依然附属于国家实力。所以，尽管已经迟到，但美国也毫不奇怪地开始强调文化外交了。

时机恰到好处，因为紧随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后，美国人民就被迫面对中立政策的危机，并被迫认识到在一个民主与极权力量如此鲜明对垒的世界中，中立政策并不是一种无辜的自我满足，而对这场斗争有着十分严重的影响。这既是一个文化问题，也是传统的对外政策事务，美国人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通过自己的为与不为，在不协助极权主义力量和侵略的同时避免卷入另一场战争。

1937 年 1 月，国会制定了另一个中立法，对处于内战中的任何国家均实施武器禁运，由此也就禁止了向西班牙内战双方的武器船运。（有人担心一些美国人不服从道德禁运。）这种政策在起初看来是正确的，即避免美国卷入外部争斗，但人们很快就看清了美国的中立实际上起到了帮助佛朗哥的作用，因为他能够从德国手中得到武器，因为德国可以不受中立法的限制而从美国购入军火。这种情况以及叛乱分子对共和国残忍袭击等事件的及时报道引起了美国孤立主义者的严肃反思，问题是当海外发生战争或内战并能够清晰区分侵略者和受害人时，美国能否长期保持袖手旁观。中立并不区分侵略者与受害者，如果一味地拒绝帮助，

结果会使受害者更加受到伤害。另一方面，对反抗侵略的任何帮助都肯定是一种非中立的行为，并且可能在美国民众和政府既不希望战争而且也没有准备的时候将战争带进国门。

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国际危机，这种困境也许就不可能催生对外交事务的重要新思考。1937 年 7 月中日战争的爆发表明美国并不能在外国危机时安享短暂的和平。战争被称为“事件”，而且也没有涉及到美国的中立问题，美国政府极端小心地回避被牵连进去，国务院鼓励美国人从中国内地撤出，阻止美国商船向中国运载飞机和军火以免被日本海军截取。

然而，在谨慎行事的同时，美国领导人也开始将欧洲和亚洲的发展联系起来，并将它们当做全球危机以寻求应对的办法。最清楚的一个例证是罗斯福总统在 7 月下旬邀请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到华盛顿共同协商国际事务的合作方案，张伯伦拒绝了邀请，并留下著名的话语：“除了甜言蜜语，最好别依靠美国人任何东西。”[①] 尽管后人都称首相的这一论断着实愚蠢，但或许并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毕竟，在罗斯福总统带领下的美国一直回避集体行动（除了拉美地区，但即便在那里最多的也还是“甜言蜜语”），英国又有什么理由严肃对待一个跨大西洋的合作提议呢？

但是，也许应当注意到另一方面。尽管由于国内经济问题的困扰，罗斯福第一任期在外交领域内基本上无所作为，然而在 1936 年赢得连任竞选后，他觉得采取一些主动外交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虽然国内的整体经济指标（国民收入、产出、对外贸易等）还没有恢复到 1929 年前的水平，但最坏的情况显然已经结束，失业率、农场抵押以及商业破产等都有了相当程度的下降。尽管罗斯福的日程上还有诸如将支持其国内方案的法官都

① A. A. 奥夫纳：《美国的绥靖》（马萨诸塞州剑桥，1969 年），第 189 页。

“塞进”最高法院的安排等，但他显然相信自己现在可以在对外事务方面更为主动一些了，对张伯伦的邀请是他的第一次尝试，当然，也是他的第一次失败。

但失败并没有使罗斯福退缩，他在今后将一次又一次地重回合作的主题，很显然，在保卫世界和平与秩序方面，他再次寻求将美国与其他国家联合起来的办法，尽管这种态势当时只表现在口头上，但其重要性不可低估，因为最终是美国的合作、而不是孤立或单边主义造成了全球形势的重大不同。

罗斯福的下一步举措是10月份在芝加哥的一次讲演，他呼吁各国进行合作以孤立或“隔离”侵略国家。如他所言，当一种传染病在社会中出现，“该社会将同意并联合将病人隔离，以保护社区健康，反对疾病的流传。”因此，在国际社会中，那些有病（侵略病）的国家也应当被其他的国家所隔离。

“隔离演说”几乎没有引起海外的注意，在国内，罗斯福也持续声称不会偏离预期的外交政策。然而，现在回头来看，该演说意义重大，结合其他不同但也属于政府主动试探的事件，它们共同显示出美国想在世界事务中再次发出声音的意愿。譬如，紧随罗斯福的演说之后，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就提出召开一个讨论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的世界会议的提案，后来由于国务卿赫尔认为时机还不成熟才不了了之。然而，当国联呼吁召开一个讨论中日战争的会议时，罗斯福和赫尔都坚决支持，该会议在布鲁塞尔开幕，日本和德国都加以抵制，但美国、苏联以及九国公约的欧洲签字国都参加了会议。尽管除了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进行谴责之外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具体成果，但此次会议是美国重新崛起在国际舞台进程中的另一个里程碑。

事态在1937年底有了进一步的激化，一艘从南京向上海疏散美国使馆等人员的美国“帕奈号”军舰（Panay）在长江遭到了日本军用飞机的袭击而沉没，美国人两死30伤。这是一件极

具震惊性的事件，表明即便在外国的战争中保持中立，美国国民的性命也会受到伤害。只要不能将所有的美国人全部撤出冲突地区，美国就不得不准备在将来面临同样的事件，而如果这样的事件持续发生，不管多么不情愿，美国就不得不使用武力来保护自己的国民。

在该事件中，不想进一步激怒美国的日本迅速道歉并提供了赔偿，因此在表面上两国关系似乎恢复如常。然而，罗斯福总统对此十分警觉，并专门派遣美国海军情报处负责人罗亚尔·英格索尔上校出使伦敦与英国海军部门进行秘密会谈，以寻求对付日本的可能联合战略。当然，该行动也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举措，尽管是以非常秘密的形式进行，但它充分说明了罗斯福对亚洲危机日益增长的担忧以及采取行动的意愿。英格索尔在当年年底抵达伦敦并开始了两国间军事行动合作的首次协商，在罗斯福的直接要求下，会谈涉及了美英两国军舰对日本的联合封锁并甚至就此达成了协议。尽管最终没有产生具体的结果，但该事件显示出在短短的时间内，总统已经在保卫世界秩序方面走出了很远。[1]

这种势头一旦出现就难以逆转。当然，罗斯福并不想在超越公共舆论方面走得太远，在官方政策声明中，他仍然表示美国不卷入外国复杂纠纷的决心。但是，在他的心目中，如今想得更多的是在不直接卷入海外冲突的情况下美国能够以及应当做些什么。1938 年 1 月，他重提韦尔斯关于召开一个国际会议的想法，并建议将华盛顿作为会议地址。张伯伦再次拒绝，因为他此时正在（通过承认意大利占领埃塞俄比亚）实施一场将意大利分化出德国集团的复杂外交行动，显然不想给人留下英国与美国太过亲近的形象。当德国吞并奥地利后，美国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但宣

① 关于对英格索尔使命的讨论，参见詹姆斯·勒茨：《协商霸权》（查佩尔希尔，1977 年）。

布了自己的增军方案，罗斯福特别迫切地想加强美国的海军力量，他完全批准了5月份的文森海军扩军法（the Vinson Naval Expansion Act of May），该文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海军扩充法案，包括将主力舰的吨位增加到66万吨，首次突破了先前海军裁军协定（1936年失效）所规定的“条约极限”。

但是，当时人们都认为即便是将海军力量增加到这种比较适中的程度也要花费十年的时间，此外，珍珠港和菲律宾苏比克湾（Subic Bay in the Philippines）的海军基地都急需维修，关岛还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基地等。与此同时，考虑到日本在西太平洋的崛起，美国还要修改其“橙色”作战计划（一个以日本为假想对手的作战计划），在此之前的作战设想一直是调动美国的舰队横跨太平洋到日本近海向日本舰队发起一场进攻战，而现在却采纳了防御性的战略；在一场战争的初期，美国还不得不把菲律宾让给日本，然后才能逐步发起反攻。无论如何，一场可能与日本的战争已经不再遥远。[1]

与此同时，总统也非常想在欧洲的苏德台地危机中发挥作用。9月26日，在德、英、法三国领导人签署将苏德台地并入德国的重要慕尼黑协定的前三天，罗斯福向欧洲各国政府发出和平解决难题的呼吁，而且还分别在27日和28日发给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当慕尼黑会议似乎成功地防止了战争后，他当即表示了自己的满意，其想法或许反映在副国务卿韦尔斯充满希望的宣称中：“一个基于公正和法律之上的全新国际秩序”正在出现。[2]这也许是自欺欺人的浮夸之词，但至少也反映出美国政府更愿意表达它对国际事务的看法。

---

① 关于美国对日战略的一份最近的有趣研究是威廉·赫南：《丑行的景象》（纽约，1991年）。

② 奥夫纳：《美国的绥靖》，第269页。

美国政府不再满足于发表声明以及要求欧洲各国政府避免战争的迹象在慕尼黑之后很快明朗起来。首先，出于对德国11月袭击犹太商人的“打碎玻璃之夜”（“night of the broken glass”）* 的愤怒，罗斯福总统召回了美国政府驻柏林代办休斯·威尔逊，此人是美国驻德国大使威廉·多德在1937年底由于对纳粹种族政策的反感而辞职后的美国驻德最高代表。希特勒也以召回德国驻华盛顿大使的方式作出回应，由此，在战前的一段时期内，两国的大使馆都没有了主要负责人。

第二，当年12月，美洲国家在利马（Lima）召开了另一次会议。大会通过了一项反对纳粹种族主义的决议，与会各国还同意进一步加强现有的协商程序，以防止对任何一个美洲国家“和平、安全或领土完整”的任何威胁。排除1938年美国和墨西哥关系几乎到达破裂地步，利马会议对美洲国家团结的重申是一项重大的成就。通过德怀特·莫罗等人努力（见第六章），墨西哥民族主义和美国经济利益两者之间的冲突曾一度得到了暂时缓和，但在1934年拉扎罗·卡德纳斯成为总统后再次恶化，他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比卡列斯更为激进，1938年3月，卡德纳斯政府颁布了一项石油征用法令，将美英石油公司的财产都收为国有，美国则以停止以高于世界价格的标准收购墨西哥白银和抵制墨西哥石油等手段加以报复，墨西哥则寻求将石油销往德国和日本。然而，即便是这样严重的危机也没有妨碍利马宣言的发表，实际上，墨西哥和美国很快就在1939年达成了合理补偿石油公司的协定。[①]

第三，在当年年底，罗斯福总统决定向英国和法国出售军用

---

* 希特勒掀起的大规模反犹太人活动，焚烧犹太教堂，打砸犹太人的商店，“打碎玻璃之夜”有人译为“水晶之夜”即在全国范围内砸碎所有犹太人的玻璃窗，一夜之间造成无数犹太人流离失所。——译者

① 格尔曼：《睦邻》，第50—54页。

飞机，以加强他们在一场可能与德国发生的战争中的防御力量。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受命牵头实施这一交易，英法两国的代表（包括未来被誉为欧洲一体化之父的让·莫内）很快来到美国购置飞机。由于欧洲并未处于战争，因此该交易并没有违反中立法，但罗斯福的这一决定显示了他对战争终究来临的悲观看法以及他的决心：如果发生战争，美国必须在加强民主国家方面发挥作用。

在同一时期的亚洲，美国变得更为果断。1938 年 3 月出台了一项明确的决定：有关中日战争等问题不适用中立法，这就使得中国能够在美国购置军火，当年已经有价值 890 万美元的武器运到了中国，该交易的资金源自中国向美国出售的白银（当年约为 1.15 亿美元）。由于 1934 年的白银收购危机，白银已经在中国“停止作为流通货币”，因此中国可以将大量的白银运往美国，其中的收益能够用来购买武器和其他物品。

当然，日本也能够从美国购买军火，整个 30 年代一向如此。（1938 年的数量达 910 万美元。）但这种交易在美国受到越来越多的公开批评，人们不安地认识到自己的国家正在向日本提供飞机、坦克和弹药，而后者正在使用它们对中国进行侵略战争。为了抗议这种交易，人们召集公共集会、向报纸写信以及组织各种各样的群众团体，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不参与日本侵略委员会（the American Committee for Nonparticipation in Japanese Aggression），基本上是由以前在中国的传教士组织发起。该机构的名称不言自明，表明每个人都赞同日本是在进行一场侵略中国的战争，尽管在美国是否应当以超出道德反感的方式进行干预方面没有达成共识，但在避免以出售美国武器协助日本方面至少还是有意义的。[①]

① 孔华润：《中国情结》（纽约，1978 年），第 214—218 页。

这种日益发展的公众性抗议也反映到了官方政策之中，它们也越来越倾向于批评日本。7月，国务院宣布对日本实施飞机的道德禁运，尽管不受法律约束，但它却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日本在中国的战争中不能再依靠美国的武器了。接着，当日本在年底声明建立东亚新秩序时，国务卿赫尔当即对之发出公开指责，否认日本有权自行创建新秩序，声明美国坚决反对日本的单边主义，除非通过协商与合作的方式，否则美国不会接受对地区现状作出任何形式的变动。这种反对成为战争爆发前美日关系的主要特点。

最后，也在12月，美国政府宣布了一笔给中国政府2500万美元的贷款，贷款的用途完全由重庆政府自行决定。尽管美国此前已经给了中国一些要求以白银归还的贷款，但这些借贷大多用于稳定中国的金融，而现在，中国政府可以将这些资金用于军事目的，他们首先将之用于修筑一条从缅甸到重庆的道路，以便利各种武器和物资运到战时首都。尽管这笔贷款数目微小，但同样显示了一种重要的象征性姿态，而且对交战国的影响重大。逐步地，日本越来越意识到美国正在变成其侵略行动的对手，而中国则在多年以来首次感到它们可以在苏联之外依靠美国。

当然，无论是当时的东京还是重庆，谁也没想到美国会以军事参与亚洲的战争。此外，美国愿意在帮助中国方面有所举动还不意味着是在实施罗斯福隔离演说精神下的一种对抗日本的全球战略。然而，现在回头来看，美国开始采取的这些暂时性步骤明白无疑地为以后演变成为对抗日本的坚定政策奠定了基础。

地缘政治思想的发展

1939年1月4日，罗斯福总统向国会发布了他的年度咨文，颇为引人注目的是，他没再提出新的国内改革创意，取而代之的

是，总统将注意力放到了国际形势上，强调侵略的力量正在变得强大，必须展开严肃的合作才能抵御侵略者，他说，美国必须使用“除战争以外”的所有手段来阻止侵略。

“除战争以外”到底意味着什么？罗斯福在第二天提交国会的1940年财政预算案对此作出了回答，在整个90亿美元的总数目中，用于国防的部分超过13亿美元。将政府开支的15%用于防务，在和平年代是前所未有的，而实际上的国防开支又超过了这一数目，因为总统在不停要求、国会不停地批准更多的拨款。也就是说，为了应对国际危机，美国从1939年开始大规模的军备方案。在这一年，与多数大国相比，美国库存的军用飞机、战船以及机车等数量都相对较少，诸如1939年美国军用飞机的产量还不足2000架，而同一时期的苏联为10300架、英国7900架、德国8200架、日本4400架。[1] 美国现在必须要做以及决心要做的就是在武器生产方面赶上和超过其他国家。

人们并非希望美国会真正使用这些武器，它们将作为一种标志，显示出美国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决心，同时也能够用于战略安排，以威慑想要侵略美国的国家。当然，其数目的增长也能使之可用于反对侵略国家的斗争。

最后这项目标十分重要，但也充满了风险，正如一架满载法国官员的飞机1月份在西海岸坠毁一样，这些法国人是来测试并购买美国飞机的，该事件或许还表明在保卫法国的承诺方面，美国所作的已经超出了总统的打算。尽管如此，该事件并没有吓倒罗斯福或政府当中的任何人，他们决定美国必须在反对侵略面前站稳立场。7月，谢菲尔德的里弗代尔勋爵来到美国考察英国能够依靠美国的军事供应种类。与1938年开始的对中国的援助一起，这些事件显示了这样一种政策：保护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军

---

①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纽约，1987年），第324页。

国主义现在和未来的牺牲对象。

与此同时，罗斯福政府还寻求废除现存的中立法。从他们的观点来看，中立法的寿命已经超出它所服务的各种目的，在一个像 1939 年所存在的明显分裂的世界之中，是不应当存在中立的。政府的努力没有马上得到回报，因为相当部分的国会议员还没有做好一个迅速转变的准备，为此，罗斯福愿意以一项军火贸易的“现款自运”原则加以解决。（该条款首次在 1937 年 5 月写入中立法，表明只要支付现金且不用美国船只运送，交战国就可以购买美国的商品，但不包括军火。）即便如此，直到 11 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会才最终修改中立法，授权以“现款自运”的原则向交战国出售军火。尽管仍然受到种种限制，但新的中立法却成为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标志着美国在世界冲突中的孤立主义的终结。

在逐步增加武器生产和修改中立法的同时，美国政府还采取了一些防止国际局势进一步恶化的提议。颇为有趣的是他对欧洲和亚洲的不同政策。在欧洲，罗斯福继续他从 1938 年开始的努力，即呼吁各国领导人以和平与合作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譬如，1939 年春夏，当欧洲的局势紧张加剧以及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罗斯福总统向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和平解决波兰问题。有一次，罗斯福还邀请他们以及相关国家领导人点出他们承诺不去入侵的 31 个国家的名单。由于一面是难以调和的德国，另一面是不屈服的英国和法国，他一定知道这些建议难以起到作用，为此，他又以另一种尝试（没有成功）来加倍努力，即说服苏联与英法合作防止德国的进一步侵略。然而，除了这些行动之外，他并不想让自己的国家直接卷入欧洲事务，如果英国和法国需要，他将为之提供军火，这种准备似乎已经足够。

相比而言，罗斯福总统更愿意在亚洲采取有力措施。在界定美国亚洲政策方面，或许这一阶段最为关键的行为莫过于在 7 月

份发给东京政府的通知：美国有意在 1940 年 1 月起废除两国间的贸易条约。这一措施比总统在欧洲的任何行动都更为激烈；废除贸易条约就等于将美日的双边贸易往来置于政府的支配之下，因为涉及与美贸易的日本运输商、商人以及金融家都不能再获得条约权利的保护。

东京的官员十分震惊，尽管已经注意到美国的亚洲政策日趋强硬，但他们却没有认识到华盛顿对亚洲的局势持如此悲观的看法并愿意在反对日本侵略方面如此坚决和果断。实际上，罗斯福总统之所以采取这样的行动似乎是为了防止国会抢先提出同样的议案，国会议员们已经开始强烈批评日本，显然也是受到了日益壮大的反日公共情绪的影响。此外，罗斯福可能还试图以此削弱日本作为德国潜在盟友的价值，以防止德日同盟的形成，像大家一样，他也知道德国和日本正在就此进行探讨。没有了贸易条约，日本可能会更加依靠美国的善意，从而也就减少了作为德国全球战略合作伙伴的吸引力。（当时，德国热心与日本结成反对英国的同盟，而日本则希望将同盟限于对苏联展开联合行动。结果，在挫败这样一个德日同盟方面，罗斯福还不如希特勒和斯大林卖力；日本人后来为德苏互不侵犯条约所震惊，并一度失去了与德国结成同盟的意愿。）

应当注意到，从增加军备到废除与日本的贸易条约，上述这些所有举措都发生在欧洲陷入另一场大战前的 9 月份，它们共同构成了欧洲战争爆发前美国对外政策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从根本上讲是地缘政治性的，是美国民众和美国领导人在维护和平与防止侵略方面采纳军事武力、强权政治和国际集体行动等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地缘政治的意识从何而来呢？出现在西奥多·罗斯福时代的任何地缘政治特点似乎都已不复存在，或者至少可以说是被 30 年代所淹没。纳粹的兴起以及日本军国主义的复兴也没有自

动产生强权政治的思想，相反，这些海外现象的出现反而强化了国内的和平主义、孤立主义和反军国主义。实际上，直到1937年之后才有些人开始谈论美国的地缘政治角色，首批提倡这种新思想的一本著作是1937年出版的利文斯顿·哈特利的《美国害怕吗?》(Is America Afraid?) 记者出身的这位作者认为，由一个国家控制欧洲（德国或者可能是苏联）和另一个国家控制亚洲（日本或者甚至中国）会对美国构成威胁。这两种可能中的任何一种形势都会导致大不列颠和英帝国的衰落，其整个资源都会服务于霸权国家。哈特利指出，美国会像三明治一样被夹在两个大陆国家之间：德国或苏联下的欧洲和日本或中国控制下的亚洲。特别当崛起在这两个地区最强国的德国和日本联手时，对美国安全构成的危险就会增大。他们不但是军事强国，更是专制国家，由此会威胁到民主国家的安全。作者断言，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必须准备与英国结盟，两国在基本的政策和利益方面都有着诸多的相同。[①]

一开始并没有几个人注意到这本书，但它所持的观点的影响却持续增长。它有两个主题：一个是民主国家处于危险之中，另一个是美国必须愿意再一次参与世界政治。前一个主题可能容易接受，因为到1937年人们对民主国家的信心已经转移到了美国身上。在谈论民主时，评论家和政治家们也都不再像罗斯福执政头几年那样愁眉苦脸或处于防御姿态，美国在没有被迫放弃民主政府的情况下已经度过了大萧条的最恶劣阶段，所有政党和派系的美国人都感觉到美国的民主已经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但是就在对自己的民主制度重新获得信心时，他们意识到海外反民主力量对之所带来的危险。对这种国家危险的定义是重新界定他们对待国际事务态度的重要的第一步。

---

① 利文斯顿·哈特利：《美国害怕吗?》(纽约，1937年)。

为了应对这种新近认识到的对国家安全和制度所带来的威胁，赞成美英（或美中）合作的人数稳步增长。尽管他们并不经常使用地缘政治的语言，但目标是一致的，因为他们的建议一旦被采纳，美国就不得不为防止德国在欧洲的全胜以及日本在亚洲的胜利有所作为，接着，它还必须穷其所有来维护全球现状，否则就得将自己卷入欧洲和亚洲的事务之中。

通过一小群学者的努力，这种思想开始得到有力传播，这些学者当中的一些人刚刚从欧洲来到美国，他们是以地缘政治的框架来看待那里的形势的。对他们（诸如尼克拉斯·斯派克曼和菲利克斯·吉尔伯特）以及接受其学说的人（其中一些人在普林斯顿、耶鲁等地创建了战略研究中心）而言，其公理就是“权势的现实”是世界事务当中的基本存在，不管美国是否愿意，它都要依靠自己实实在在的巨大块头、人口、资源以及经济产出等来参与全球强权政治。这就是实际情况，美国别无选择，只有在国际事务中坚持这种作用，而不应当被动地对世界各地的形势作出回应。

地缘政治心态的出现是美国思想史和外交史当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对实力的认识以及将战争看成是国家政策工具的准备都是对世界事务的“现实主义”式的反应，它们对美国人看待外部事件的方式有着深远的影响。罗斯福外交政策的新信心与这种思想发展相互吻合，这种政策与思想在 1939 年的同时出现或许对美国乃至全世界都是值得庆幸的。但与此同时，早期的威尔逊主义传统也没有完全被这种新的现实主义所淹没，因此，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任务是将地缘政治与威尔逊的国际主义相结合，而如何将两者揉合起来还不为人所知。

第十一章　迈向珍珠港之路

欧洲战争与美国中立

从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到1940年春其矛头指向西欧的几个月被称为“虚假战争”*。德国人侵波兰后，英国和法国都迅速宣战，但实际上双方没有发生任何战事。9月27日华沙陷落后，还是没有进一步的军事行动，甚至还有一些在不流更多血的情况下重建欧洲现状的愿望。尽管法国和德国的军队都在各自的边境上相互对垒，但却没有发生交火。人们都处在一种非现实的氛围之中，很多人怀疑这是否真是另一场世界大战的开始。

但东欧形势的发展绝非“虚假”，苏联利用刚刚与德国签署的互不侵犯条约，从东部向波兰调动军队实际上将之一分为二，然后会师北移在10月中旬进犯芬兰，双方激战到1940年3月，最终签署了和平条约，其中包括给苏联割让部分领土。在亚洲，中日战争在继续，尽管陆地战事的程度有所减弱，但日本空军却加强了对中国铁路、军事基地以及战时首府重庆的空袭。就在德国开始西部春季攻势的同时，汪精卫带领一些中国官员在南京建立了一个亲日政府，与其他事件一起，该行动表明日本有意长期留在中国，因为如果没有日本军方的支持，该傀儡政权就不可能

* 亦有人将之译成“奇怪战争”或“静坐战”等。——译者

生存。

这些事件表明，尽管欧洲战争是“虚假的”，但随着德国、日本以及现在的苏联都力图通过武力改变各自的领土边界，全球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这3个国家是否携手共同成为向现状发起挑战的“修正主义者”？如果这样，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应当做何反应？特别是多年来保持不介入冲突的美国？尽管华盛顿采取了一些措施支持正在受到和可能受到侵略的国家，但它一直将其援助界定在“战争之外”的手段，这样的立场是否能够长期坚持，特别是在3个专制国家联合起来的时候？

这种可能并非遥远，纳粹与苏联的条约动摇了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联盟，结果造成在国际事务中紧随苏联的人民阵线、共产党、激进分子以及很多其他组织都变得士气受挫并迷失方向。与此同时，在日本，甚至是在日本军方，人们开始听到这样的呼声：尽管日本传统上一直将苏联视为假想敌，但鉴于国际事件的迅速变化，日本应当全面检查自己的对外政策，寻求与苏联的和解，以便达成由3个反民主强国组成的3方安排。尽管持此观点的人仍在少数，但重要的是苏联入侵波兰与诺门坎停火协定的签署不谋而合，该协定终止了苏联和日本两国在西伯利亚—蒙古—满洲交界处的一系列武力冲突。在德国方面，一些官员又开始对恢复与日本结成同盟的对话感兴趣，当然，这次的目标不再是苏联而变成了美国和英国。与此同时，对德国最为重要的是防止美国卷入欧洲战争，不管是虚假战争和还是真实的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立场就显得至关重要。它有很多选择：可以维持1939年9月前的立场而袖手旁观；可以公开宣称它对民主国家的支持并继续以“战争以外”所有手段的援助；可以通过对德国与苏联两个侵略者采取不同的反应试图将两者离间开来；可以通过与日本协商达成解决两国分歧的协定以阻止德国—苏联—日本同盟的发展；它也可以增加对中国的帮助，以便将



1939年的欧洲

日本栓在亚洲大陆，降低它作为德国或苏联盟友的价值。

这都是些艰难的选择。上一章所讨论的地缘政治思想在1938—1939年的美国已经十分明显，它或许呼吁一种认清主要威胁的政策，譬如德国，并且通过向它可能的同伙，这里指的是

苏联和日本，提供一些利诱以将它们与之孤立开来。或者，如果日本被认定是和平的主要威胁，美国的主要精力就集中在亚洲战争，而在欧洲的审慎政策就应当寻求达成一个新的慕尼黑式的安排。

麻烦的是当时的美国官员与公共舆论对上述3国都很敌对，因此要想在三者之间作出区分极端不易。公众们都支持修改中立法、援助中国和终止与日本的贸易协定，现在他们又为苏联在波兰和芬兰的行为所激怒，并迫使罗斯福政府对苏联实施制裁。（苏联在12月被逐出国联。）在这种环境下，即便是罗斯福政府有心防止德国、苏联和日本的相互勾结，他也很难得到公众的支持。

确有证据证明罗斯福的确想对苏联有所不同，他相信纳粹与苏联这种出于权宜之计的联盟迟早要解散，和平的主要威胁是欧洲的德国与亚洲的日本，而不是苏联。但有些人，诸如有名的孤立主义者查尔斯·林德伯格*却宣称苏联对文明构成的威胁要大于德国，因此，在任何苏联政策方面，总统都不得不谨慎从事。[①]

在对待德国与日本方面，美国民众似乎已经满足于最新中立法当中的“现款自运”条款，因为它可以使英国、法国和中国合法地购买美国的军火。但是，在此之外，美国人似乎更愿意在亚洲而不是在欧洲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他们不是喜欢与希特勒和解以便集中精力挫败日本在中国的野心，但至少在当时他们反对对英法超出“现款自运”的安排，比如借钱给它们，那样会使美国进一步卷入欧洲纷争，而此时的德国正在极力避免激起美国的

* 亦有人译为林白。——译者

① 沃伦·金博尔：《最高尚的法案》（巴尔的摩，1969年），第29页；也参见H. W. 布兰兹：《冷战内部》（纽约，1991年），第93—95页。

敌意。希特勒非常清楚地看到，不管他在欧洲采取什么样的下一步行动，都应当认真对待美国，因为它是英国和法国主要供应国，同时也是其实现野心道路上的主要潜在障碍。在战争爆发后不久，他就宣称“德国人没有什么反对美国人的地方，因此美国人也没有什么反对德国人的地方”，旨在向美国保证他不想找美国的麻烦，同时也是为了防止美国介入欧洲事务。[1] 他认为，如果能够以某种方式让美国不插手欧洲战争，那么德国就不会受到英国和法国的更多干预，以便在中欧和东欧建立自己的霸权。

从这一角度讲，希特勒部分获得了成功。在德国没有明显袭击美国公民、货物以及商船的情况下，美国的公共舆论始终保持反对采取任何超出“现款自运”的方式帮助民主国家。1940 年 2 月，罗斯福总统派遣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出使欧洲寻求和平的可能，假如德国当时能够以自己的和平意图说服韦尔斯，那么美国的对外政策或许就能够更长时间地保持不变。然而，事实上，从欧洲返回美国的韦尔斯确信防止虚假战争演变成真正严重事态的最好办法就是美国明确自己的计划：如果德国决定使欧洲陷入一场毁灭性的战争，那么美国就会支持英国和法国。这一插曲表明美国有一个不能超越的极限，它不会去主动寻求在欧洲战争的双方之间作出调解，以免这样的努力会相对削弱民主国家对抗德国的立场。在大部分美国人的眼中，不能给欧洲对垒的双方划上等号，很显然，一方是侵略者，因而进行一场要求双方都作出让步的调解是站不住脚的。

亚洲的局势更为明朗，人们也更不愿意安抚日本。像他们的德国盟友一样，日本官员也充分认识到美国妨碍他们实现野心的潜在力量，所以东京当局在 1939 年末和 1940 年初连续采取几次主动的外交姿态，旨在说服后者恢复两国的贸易关系而不要宣布

---

[1] 索尔·弗里德兰德：《毁灭的前奏》（纽约，1967 年）第 41 页。

废除贸易条约。但华盛顿回绝了日本的主动建议，坚持原议并于1940年1月26日废除条约。依据日本的说法，两国关系由此进入“没有条约的时期”。美国对日本政策如此坚决源于这样一种信念：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防止日本领导人走上不计后果的道路。

在一定程度上，美国对德日政策的强硬旨在缓和他们的行为，但它没有做到这一点。正如前面所指出的，日本建立了南京傀儡政权，而更严重的是，德国在4月底向斯堪的纳维亚、法国和低地国家发起全面进攻，到6月就征服了西欧大部，这些国家一个接一个地被德军占领，高潮是6月份德军占领巴黎，当月22日，德法签署停战协定。使得局势更为严重的是，苏联的军队又向立陶宛发起进攻，到7月21日，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3个波罗的海国家被并入苏联。（美国迅速冻结了这些国家的财产。）就这样，3个专制强国就好像没有任何阻力地进一步扩张它们的版图。如果说华盛顿有任何防止这种事态发生的目的，那它显然是失败的。

失败的感觉是具破坏性的，但它也引发了美国政策的重大变化，那就是去挫败德国和日本的野心，同时还将致力于将苏联从这两个国家当中分离出来。

轴心国对民主国

德国之所以采取春季攻势（闪电攻势），是因为希特勒估计到西欧的民主国家还很虚弱，而且美国军事卷入的机会也很微小，相反，如果他犹豫不决的时间越长，这些国家抵抗的准备就越充分。因此有必要采取迅速与果断的打击，首先是法国，接着是邻近的国家，然后是英国，而这一切都应完成在美国有机会干预之前。如果征服了整个西欧，德国最后就能够将枪口转向苏联

并控制整个欧洲。

很显然，在希特勒的整个算计当中，美国的位置十分重要，实际上，无论美国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它都注定要影响欧洲战争的进程，因此，可以想像得到，希特勒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止美国的介入。第一，他继续向美国保证“德国从没有对美洲大陆有过任何领土或政治计划，现在也没有”。[①] 实际上，他是在要求一个被分割的世界，如他自己所言，“欧洲人的欧洲和美洲人的美洲”，他认为美国人会接受此种安排，并不会用卷入战争的手段阻止这样的发展。与此同时，他还利用宣传攻势，通过微妙的暗示和隐秘的行动影响美国的舆论以激发孤立主义。第三，他还通过暗示可能与日本达成协定的方式试图将美国拴在太平洋，其想法是警告美国并使之关注日本在亚洲的侵略，以此防止美国干预欧洲事务。

这些策略都没有用，因为在春季攻势之后，美国的公共舆论都明确地转向反对德国而倾向于援助英国，尽管赞成直接军事干预的人仍在少数，但公众们都清楚地认识到：如果德国击败英国，美国的安全与利益就会受到威胁，德国届时会进攻苏联或南美洲，而不管哪种结果最终都将把威胁带进美国本土。获胜的德国海军会中断美国的对外贸易，最根本的，一个专制的欧洲（和南美）会危及其余的民主国家并最终危及美国的民主。紧随之后，如果日本正式与德国结盟，整个威胁将会变得更为可怕。

面对这样的情况，美国的反应快捷而明了。实际上，在德日同盟完成的 9 月 27 日之前，美国就已经采取了阻止英国战败的果断措施。当伦敦政府（自 5 月份后由丘吉尔领导）向罗斯福发出紧急求救时，美国开始向英国大量运送武器和飞机。6 月 10 日，意大利向英国和法国宣战，罗斯福当天在弗吉尼亚大学的讲

---

① 索尔·弗里德兰德：《毁灭的前奏》（纽约，1967 年），第 95 页。

演中宣称："我们将向反抗力量敞开本国的物质资源。"迄今为止，这些援助都是采取"现款自运"原则下的贸易交易方式，但总统现在清晰表明他说的是援助而不再是出售；显而易见的是，英国迟早都会用尽购买美国武器的现金，所以美国应当考虑帮助它的其他办法。其中的一个安排是9月份的"驱逐舰交易"，它是一次以货易货的安排，美国将50艘驱逐舰转让给英国，而后者则将它在西半球的一些基地租借给美国，其中包括在纽芬兰、百慕大和特立尼达岛的基地等。该协定由美国派到英国的一个军事使团首先提出，他们报告说英国看来能够顶住德国的攻击，因此美国所提供的武器不会落到德国手中。在此之后，大量的军火、轮船和飞机开始源源不断地运往英国。

这些措施得到了公众的支持，其中一些呼声最高和最突出的人在5月份创建了援助盟国保卫美国委员会（the Committee to Defend America by Aiding the Allies），其发言人反复重申这样的主题：美国的存亡与英国休戚相关，这两个国家现在是保卫文明的最后希望。[①] 这些言论受到了孤立主义分子的反驳，他们也公开组织了反对英国的美国第一委员会（America First Committee），致力于让美国从复杂的外部纷争中脱离出来，构筑一个能够抵御任何外来威胁的"美国堡垒"。[②] 然而，民意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正站到保卫美国委员会而不是美国第一委员会的一边，罗斯福的一个决定象征着全国范围内的共识正在形成：他决定让两名重要的共和党人弗兰克·诺克斯和亨利·史汀生加入他的政府，并分别担任海军部长和陆军部长。政府现在变得更为两党性，而尤为重要的是，这两位共和党人的加盟将大大有利于

---

① 关于保卫美国委员会，参见马克·查德温：《好战分子》（纽约，1968年）。

② 关于美国第一委员会，参见韦恩·科尔：《美国第一》（麦迪逊，1953年）。

重建政府与企业间的紧密联系。如今的罗斯福政府也不再与华尔街以及公司经理和律师们的世界保持距离，它可以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形成一个新的合作整体。

与此同时，鉴于德国海军在大西洋的行动以及纳粹在拉美的宣传活动，保卫西半球的任务也变得愈发紧迫。7月底，国务卿赫尔赶赴哈瓦那参加他上任以来的第四次美洲间国家会议。21个美洲共和国一致同意它们准备集体或单独接管西半球任何受到侵略的欧洲领地，并对这些领土建立暂时的托管。与会国家还通过了一项宣言，声明一个非美洲国家对西半球任何一个国家的主权的任何干预企图都会被当成是对所有美洲国家的攻击，并招致所有美洲国家寻求阻止威胁的办法。就像“驱逐舰交易”以及一个月后的哈瓦那会议，这都是些旨在挫败德国野心的措施，并为美国再次军事干预拉美铺平了道路。[①]

美国还要在亚洲帮助保卫英帝国。日本显然有意利用英国的困境以对其领地施加压力，例如，6月24日，德法停火协议签署的前两天，日本政府要求英国停止通过香港和缅甸向重庆运送物资，在此之前，日本曾警告法国不要通过印度支那向中国国民政府运送卡车和汽油，像法国一样，英国除了让步而别无选择。

形势使得美国成为还能够保护亚洲英帝国以及法国和荷兰帝国的惟一国家，因为尽管它们的宗主国政府已经屈从于德国，但其亚洲殖民地仍然独立存在。日本想利用英国在欧洲的失败控制它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这是一个拥有惊人自然资源的地区，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将中国的漫长战争进行到满意的结局。为此，东京的宣传人员开始喊出“亚洲人的亚洲”的口号，其论调旨在摆脱西方对该地区的影响，恢复它“真正的”过去，即当地的居民追求没有受到堕落的西方文化影响和经济剥削的传统生活方式。

---

① 欧文·格尔曼：《睦邻外交》（巴尔的摩，1979年），第100—101页。

这样一个由日本控制的亚洲与一个德国控制下的欧洲的可能联合，才是美国人不得不考虑的最可怕前景，除非他们在欧洲和亚洲同时采取行动。罗斯福政府在此方面作出了一系列的果断措施。4月份以后，一大部分在太平洋完成春季训练后的美国舰队没有像以往一样返回大西洋，而被留在了珍珠港，用于威慑轻率的日本行动。同样重要的是对日本的一些特殊商品交易实施贸易管制，迄今为止，对运往日本的飞机一直进行道德禁运，但从6月份起，美国开始禁止向日本出售工业机械，7月，向西半球以外国家出口的航空燃料也被禁止，9月26日，禁运扩大到所有类型的钢铁废料。

第二天，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签署了同盟条约。应当注意到美国对日本和德国的强硬政策在轴心国同盟完成之前就已经确立，三方协定的效果只是加强了人们对这两个侵略国家试图联手统治世界的印象。美国人对这样一种联合已经想像了一段时间，如今，它变成了现实，而至此以后的美国政策也不得不真正变成全球性的了。

苏联又怎么样呢？在决心遏制德国和日本野心之际，罗斯福政府是否考虑到了苏联的潜在价值，或者将之视为世界专制与侵略势力的一部分？为了报复苏联入侵芬兰而在1939年实施的对苏武器的道德禁运仍然有效，公众对援助英国的上升意愿并没有转变成将苏联作为制衡德国可能的新看法。与此同时，华盛顿政府内外还有很多人预期德苏协定迟早会露出其局限，当这两个国家在双方都觊觎的地区发生冲突时，它们的同盟或许就会破裂，这些地区包括巴尔干和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等。实际上，1940年夏末，希特勒已经断定：要想打败英国就得必须先制服苏联，原因非常简单：如果控制了俄罗斯，德国就会拥有更大实力对付英国，并对美国施加更大的压力，使之对出手拯救英国的决心有所动摇。此外，如果苏联被削弱，日本在亚洲的力量就会

有所加强，就此也可以使美国不能有所作为。[1] 这样说服了自己之后，希特勒在 1940 年 12 月决定在 1941 年 3 月对苏联开战。

美国对苏德关系的这种发展也有一些模糊的感觉，但在没有确切的消息之前，它不能以苏德马上就要决裂的假设进行决策。这样，在 1940—1941 年秋冬军方制定出的战争计划中，苏联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他们只有在不设定苏联角色的情况下设计自己的战略。然而，至少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那就是美国必须制定出一个与仍为维护自身独立而奋斗的英国等站在一起去反对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全球战争计划，这些战争计划被称为“彩虹计划”是很合适的，因为未来的战争对手不光是日本（“橙色”）或德国（“黑色”），而是有很多国家。

在所设计的 5 个“彩虹计划”中，彩虹 5 号，或后来被称为计划 D 设计的是将美国的主要军事努力都放在大西洋，让太平洋处于防御状态。因为美国现有的军事资源不适于两洋作战，因此只能在一段时间内集中于一个主要敌人身上。鉴于英国生死存亡的急迫危险，大西洋是显而易见的选择，人们觉得只要对日本继续保持坚定的立场，美国或许就不必真正参与亚洲和太平洋的战事，他们相信这样的强硬政策一定能够起到限制和威慑日本的作用。[2] 但是，还不完全清楚的是，如果日本与苏联携手，或者相反的是日本进攻苏联时，美国应当做何反应。这都是美国在 1941 年将要面临的问题，它们不仅仅是为了亚洲，同时也是为了欧洲。

---

① 弗里德兰德：《毁灭的前奏》，第 114 页。

② 关于彩虹计划，参见刘易斯·莫顿：《战略与命令——开始的两年》（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62 年）。

日本进攻美国

在1941年的前半年，苏联问题像是漂浮在国际事务上的一片云雾，而其他事情似乎都已经明朗：德日联合及其对英国和美国的威胁；英美力量的联合；美国对中国的支持等。这种趋势在新一年的头几个月得到更加显著地发展，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事件是3月份通过的租借法案，授权总统可以向任何被认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有至关重要的国家出售、转让、交换和租借武器以及相关物资。这种一揽子性的授权几个月前还被指责是总统的夺权行为，而现在却在参议院以2/3的多数票、众议院更是以一边倒的317∶71的票数得以通过，清楚表明公众坚定地支持这一应急措施。英国成为这一新法案的直接受益国，而中国在5月份也成为租借物资的接受国。

同时，美国和英国官员开始了协调其军事战略的对话（被称为美英对话或ABC*），对美国而言，此举显然不是中立行为，但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为这种学究性的问题而吹毛求疵。对话产生了一个被称为ABC—1的计划，即以彩虹5计划为基础，确认了大西洋的优先地位，决定在应对日本威胁之前集中清除德国的威胁。作为该战略的一部分，美国的海军舰队开始在大西洋西部区域（开始是在1939年10月利马美洲间国家会议上确定的“中立区”，但现在则进一步扩大）巡逻，保护英国船只并通报所发现的德国潜水艇。[1] 接着，美国海军又占用了包括在美国巡逻区内的丹麦属地格陵兰，用于修筑基地和其他设施。与此同时，美国、英国和荷兰在亚洲也拿出了一份对付日本的联合战略，他们

---

* ABC是American-British conversation的首字母缩写。——译者。

① 格尔曼：《睦邻外交》，第90—91页。

还与该地区的石油公司紧密联系，以确保日本人不能得到超过合同签订数量的石油，特别是在苏门答腊。（被派到荷属东印度群岛首府巴达维亚的日本贸易使团在该地区总是不能取得成功。）被称为 ABD 的国家继续协调它们的对日政策，再加上中国，他们实际上建立了 ABCD 联盟。*

没有联系上的仍然是苏联。到了 1941 年初，美国官员已经确信他们有足够可信的情报显示希特勒即将对苏联发起进攻，而美国也应当开始修改对苏政策，以提醒苏联该是摆脱 1939 年斯大林—希特勒条约后备受国际孤立的时候了。于是，罗斯福批准解除了对苏联的道德禁运。然而，在美国人还没有观察到该举动的效用时，他们却碰到了另一种形势的出现：4 月 13 日，苏联和日本签署了中立条约，双方相互承诺在一方陷入一场与第三国或国家集团的战争时另一方要保持中立。在伴随条约的联合声明中，日本表示尊重外蒙古的领土完整，而苏联则对满洲国表示尊重。后面这一条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显著改变，因为它实际上等于承认了满洲的傀儡政权，是对中国人（国民党也同样包括共产党）的真正打击。在此之前，苏联给中国的援助比任何国家都要多，而如今美国迅速赶上。尽管苏联官员现在继续向中国保证和日本的条约不会给中苏关系带来任何变化，但中方却不得不认为这是苏联政策的逆转。在此之前，中国一直要求俄国人以武力介入对日战争，现在的这种苏联政策是难以想像的，因此他们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靠美国的帮助。

约瑟夫·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实际上背叛了中国，因为它关注的是德国可能的入侵。尽管直到 6 月 22 日德国真正向苏联发起进攻时斯大林还不相信，但实际上他早已通过各种情报人员，

* ABD 和 ABCD 分别是美国、英国、荷兰三国以及美、英、中、荷四国英文名称的首字母缩写。——译者

最著名的是在东京的理查德·佐尔格知道了德国的进攻即将到来。无论如何，一项与日本的中立条约可以确保日本不会加入德国的行动，他的确应该感激这一确实阻止了日本加入苏德战争的中立条约。

不是日本没有设想这样的行动。由独裁者随兴致而签订或废除一项条约是那个年代的典型做法，但现在日本的军方和文职官员（最突出的是轴心同盟构建人的外相松冈洋右）却都要求撕毁和苏联刚刚签署的合同，协同德国在西部的军事行动而派兵入侵西伯利亚，东京最高指挥部还一度安排了在9月份第一周实施这一进攻。

假如这一计划得以贯彻，那么随后的战争进程、实际上是随后的整个世界历史进程都将会出现一个完全不同的形势。当日本进攻俄国的太平洋省份时，美国是袖手旁观？还是参加战争？如果美国不作出强烈的反应，德国和日本是否会打败苏联？那样就会推翻斯大林政府？之后德国、日本和战败的苏联是否会联手转向美国？同时的英国是否会屈服？中国又会怎样呢？它是否会利用日俄冲突而取回失去的土地？或者德日主宰世界的前景使会使之失去勇气而起到鼓励亲日派的效果？

上述问题的列举仅仅是为了突出德国入侵苏联以及（原文斜体。——译者）日本最终决定不进攻苏联的重大意义。日本最终向美国、英国以及法国和荷兰的亚洲殖民地发起了进攻，实际上是除了苏联之外的该地区所有国家，这里是理解通向珍珠港之路的一个关键。

巧合的是，紧随苏日中立条约签署之后的是美国和日本官员开始在华盛顿的外交对话（即所谓的华盛顿对话），它的起源与苏联没有丝毫关系。实际上，它反映了一种利益关系：对美国来讲，在全力关注欧洲形势的同时如果不能避免但至少也可以推迟

与日本的摊牌；就日本而言，其目的旨在减少美国对中国的支持。[1]

当然，双方的目标难以融合，谈判也没有机会有所进展，尽管没有产生能够使两国关系恢复正常的办法，但对话至少有助于点出两国的冲突领域。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中国，美国想让日本结束在中国的战争并尊重中国的独立与领土完整，简言之，就是要恢复到如果不是1931年、但至少应当是1937年前的状况。而另一方面的日本却希望美国能够利用自己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影响使之接受与日本达成某种安排，这样的安排肯定会限定日本在中国的特权，但日本官员相信美国在关注欧洲的同时愿意看到亚洲战争有所缓解。

与此相关的是，轴心国盟约成为美日之间争论的第二个问题。前者希望后者完全废除盟约以证明它与华盛顿寻求和解的善意，只要东京还与柏林绑在一起，日本就难有证据说服美国它是在真诚地寻求两国间的和平关系。然而，日本政府却认定与德国的同盟可以保持美国不会更有力地介入亚洲问题，在不能成功说服美国在中国问题上变得和解之前是不能将之放弃的。就这样，华盛顿对话的第一轮无果而终。但对美国来讲，它至少有助于防止两面的冲突。

美日关系的下一步也是最关键的阶段是紧随之后的德国入侵苏联。罗斯福总统不完全了解日本进攻西伯利亚的军事计划，但他意识到有这种可能，并决心防止这种可能成为现实。从直接警告东京政府美国反对这种行动到冻结日本在美资产，他竭尽全力阻止日本向北侵略。

美日关系的最后一幕是在双方贸易往来真正终结的7月25

[1] 罗伯特·布脱：《约翰·多伊联合》（斯坦福，1974年）对华盛顿对话有最好的描述。

日。3天以后，日本军队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的南部地区，这是日本军队在1940年9月首次前往印度支那北部以期通过封锁边界的办法迫使中国屈服的“南进”政策的继续，通过截获并破解的秘密电报，华盛顿得知了东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的计划，因此，冻结日本在美资产也是部分报复日本的“南进”。很显然，如果日本被允许不受任何惩罚地占领印度支那南部，它也许就会进一步南下，威胁英国与荷兰的殖民地以及那里的丰富自然资源。然而，此时的罗斯福似乎更关注于日本和苏联的关系，因此，冻结资产令是作为一道清晰的信号传递给日本：如果向北进犯苏联，日本就会面对美国的报复。[①] 就像是为了确保日本得到了这一信息，华盛顿又对运往日本的石油实施了实质上的禁运。（没有正式的禁运令，但销往日本石油出口的许可证被一个安排冻结资产令的执行委员会所中断，因此，在8月1日以后，日本实际上就再没有得到美国的石油了。）

事实证明这一点是无法回头的。美国将会站在日本北进的道路上，得到提醒的日本在秋天就取消了袭击西伯利亚的计划。之后的美日关系就集中到了石油问题上，迄今一直依靠美国石油的日本海军在难以得到美国石油的情况下坚持从荷属东印度群岛获取，如果需要使用武力也在所不惜，但日本的海军和陆军也都认识到这样的行动一定会遭致美国的报复，结果肯定会导致两国的战争。因此，如果想进一步实施“南扩”计划，日本将不得不准备应对美国的战争，而准备一场这样的战争，日本就更加需要苏门答腊的石油。在考虑一场可能和美国以及拥有亚洲属地的欧洲国家的战争过程中，这样的循环逻辑就一直影响着日本军方。必须注意到的是，在一定程度上讲，防止日本进攻苏联是罗斯福外交的主要目标，而且它也显然取得了成功。但是，他所考虑的内

---

① 沃尔多·海因里希斯：《战争的门槛》（纽约，1988年）。

容当然不仅仅是俄罗斯的命运，最根本的还是保卫英国。为了确保苏联的生存（租借法案在11月适用于苏联），总统还采取了制衡德国的其他措施，7月初，美国军队登陆冰岛以防德国的进犯，并将之当成保卫西半球的基地。在附近区域，美国战舰继续在海上巡逻，当两个月后一艘名为“格里尔”（Greer）驱逐舰被一艘德国潜水艇击沉时，罗斯福总统当即给大西洋海军司令下达了“当场开火”（“shoot on sight”）的命令，要求他们不能让德国和意大利的船只进入美国的“防御水域”（“defensive waters”），这片水域包括了西经26度以西的绝大地区。当10月份另外两艘美国驱逐舰遭到德国潜水艇袭击时，国会批准了武装美国的商船，一场还未宣布的战争已经降临大西洋。

与此同时，从1940年春天就开始保持频繁联络的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8月初在纽芬兰海岸的美英战舰上会晤了几天，他们进一步交换了战略情报并协调各自在欧洲和亚洲的军事计划。在后一方面，罗斯福同意向日本发出一份措辞激烈的反对日本进一步南进的警告，但当总统回到首都会见日本大使时，这条信息的语气大为缓和，因为他的助手提醒在这种时候不要激怒日本人。不管怎样，重要的是美国和英国不仅在大西洋、而且在亚洲也进行着全面的合作，整个世界从未像现在这样日益分裂成为秩序侵犯者和保卫者的两大集团，而苏联如今也正在加入后者的阵营。

苏联加入英美同盟的显著事件是与另外14个国家（有些国家的代表是流亡政府）共同签署了《大西洋宪章》，该文件的基本原则是罗斯福和丘吉尔在会晤结束时提出的。宪章是对民主国家领袖所宣称的作战目标与价值观的响亮声明，其中包括自决、门户开放、裁军以及全球经济合作等。该声明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十四点”，对那些熟悉威尔逊原则的人来讲，大西洋宪章几乎没有什么新内容。与此同时，在涉及“免于恐惧和免于匮

乏的自由”、提供劳工标准以及社会安全等，该声明又将其呼吁扩大到了所有遭受贫困、剥削和不安全的人们。文件明确声明它所罗列的原则将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包括战后的战胜国与战败国，因此，它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战后的世界蓝图，即便是德国人、意大利人和日本人也能预期安享其中，只要他们的专制和侵略政策被粉碎。

就这样，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前的几个月内，整个世界不但在军事上，而且还在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分裂开来，一方是通过征服和基于修正主义原则而图谋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轴心国同盟，他们设想将世界分成几个地区集团，每个都是自足独立的经济单位；而另一方则是一个反轴心集团的国家联盟，已经多达 17 个国家，它们为防止轴心国统治世界而战。前者拥护的是排他主义、专制主义与反民主思想，后者则是普遍主义、国际主义和民主思想。

亚洲和太平洋的危机是全球形势发展的一部分，日本图谋在这里建立一个由自己控制下的亚洲区域集团，并旨在将西方国家从中驱逐出去；而美国及其实际上的盟国则为了保持亚洲对西方的开放以及捍卫中国和殖民帝国的权利与日本针锋相对。除非有一方主动退却，否则这两种对立力量不可能有所折衷，但退却的只能是日本。

美国加大了迫使日本退却的压力：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被任命为美国亚洲战区总司令，其中还包括菲律宾的部队；威慑日本的战斗机被运往中国和菲律宾；当日本首相在寻求避免战争的最后努力下要求召开有关会议时，罗斯福总统拒绝与之见面，声称除非日本首先恢复中国的主权；更为重要的是，当双方在华盛顿恢复对话时，国务卿赫尔向日本代表发出了一个声明（11 月 26 日的“赫尔备忘录”），重申了美国坚持日本如果想要和平就必须得接受的基本原则：

1. 相互之间以及任何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的不可侵犯原则；

2. 不干预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原则；

3. 平等的原则，包括商业机会和待遇的平等原则；

4. 在和平解决争端、通过和平方式与过程促进国际大环境方面必须依靠国家合作与和解的原则。

这些原则汇总了美国传统的目标，日本或许可以接受它们并避免战争，但那得需要一个无畏的政治领袖，而这是不存在的。相反，他们认为赫尔备忘录等于是一份最后通牒，并作出了致命的发动战争的决定。对珍珠港的袭击发生在11天之后，与此同时，日本军队轰炸、入侵并开始了在整个亚洲的军事行动。欧洲战争与亚洲战争合二为一，美国同时深陷两个战场。

第十二章　全球冲突

战争外交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远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为全球化，这场始于欧洲、向苏联与中东扩展、与亚洲战争融合并甚至涉及到拉美的战争囊括全球各地，没有被之所触及的地方少之又少（如果有的话）。整个世界分成同盟国（正式称为联合国家）和轴心国，只有很少的几个国家（西班牙、瑞典和瑞士）保持中立。

但是，真正卷入此次战争所有战场的只有美国，不仅在太平洋还在大西洋，不仅在东南亚还在北部非洲，不仅在南美而且还在中东。从这种意义上讲，这场就是美国稳步走向全球化篇章的最高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创立了领导地位，而现在它在军事方面、经济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如此有力地行使自己的角色，以至于二战后的世界可以真正说成是美国权势与影响的产品。

这里不便详细叙述战争的整个进程，就美国而言，论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事发展的三个阶段就足够了：1941 年 12 月到 1943 年 1 月；1943 年 1 月到 1944 年 8 月；然后到太平洋战争结束的 1945 年 8 月。本章的前三部分简要描述这三个阶段的战争进程，并指出美国在进行战争以及同时准备战后和平战略与对外政策方面的主题。

紧随日本袭击珍珠港将美国拖入战争之后，形势的最重要发展是战时同盟的形成，特别是美国和英国联合战争战略的形成。尽管两国此前已经建立了实质上的同盟，但实际上只有后者在进行战争。而现在，不仅仅是日本向他们（还有荷属东印度群岛）发动了攻击，而且德国也向美国宣布了战争状态。（此举发生在珍珠港事件 4 天后的 12 月 11 日。在此期间，华盛顿对是否进行一场不仅对日本而且还针对德国的战争犹豫不决。假如希特勒决定不加入日本的战争，罗斯福总统或许会陷入困境，因为美国民众只为日本的突然袭击所激怒而决心惩罚后者。希特勒显然认为随着日本在太平洋初步取得的辉煌胜利，主动表示尊重轴心国条约并加入对美战争不会给德国造成任何损失；美国由此要忙于太平洋战争，而同时德国在大西洋也可以合法地攻击美国船只了。当然，对希特勒来讲，就像他在 6 个月前入侵苏联一样，这样的决定被证明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紧随德国加入美日战争，丘吉尔首相访问了华盛顿，此举导致了联合参谋部（the Combined Chiefs of Staff）的建立。位于美国首都的联合参谋部是两个英语国家的战时同盟象征，一些关键的战略决策在这里得以协调，尽管最终权力还是掌握在罗斯福和丘吉尔手中，他们两人在战争期间多次会面并定期交换电报。此举的一个显然后果是美国在未来的战略决策问题上更多地听从英国而不是中国或苏联等盟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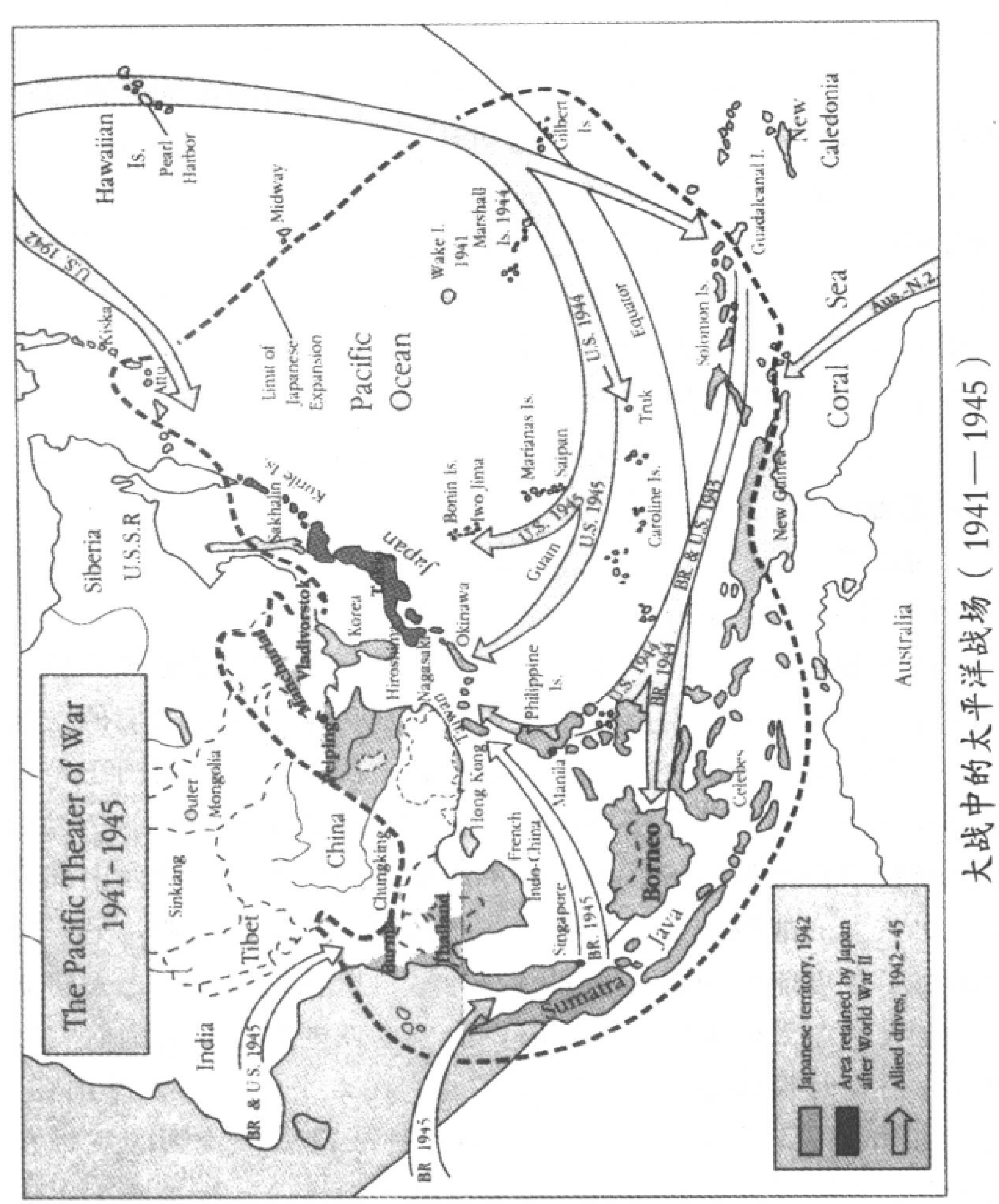
这些国家现在也成了美国的盟友，尽管苏联还没有介入太平洋战争（由于它和日本在 1941 年 4 月签署的中立条约）。美国也向它们连续提供租借物资并与其领导人交换战略情报，但却没有像与英国那样如此紧密的协调与合作。

此处的一个例子是战争初期推迟建立欧洲第二战场的决策。第二战场是在西欧向德军发起进攻以减缓东部（苏联）战线的压力，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乔治·马歇尔将军在内的绝大多数

美国军方领导人都倾向于早日实施第二战场的计划，并在英国本土大规模积聚远征力量准备进入法国西北海岸。但是，英国却认为盟国还没有准备好实施这种时机还未成熟的战略，反而提出了一个北非作战建议，即进攻仍处于“维希政府”（与德国人合作的海内外法国人）控制下的法国殖民地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进攻这些地区将侵犯它们的中立地位（因为法国已经退出了战争），但丘吉尔却劝说罗斯福该战略将有助于盟国控制住北非海岸，反过来能够确保盟军准备对西西里和意大利发起进攻。尽管马歇尔等人抗议这样的战略是浪费资源，如果不实施跨越海峡的登陆行动，美国军队就应当集中于太平洋战区，但他们最后还是同意了总统的决定。在 1942 年的最后一个月份中，北非作战计划得以成功实施。

这并非意味着太平洋受到了忽视，实际上，紧随德国人被逐出北非后，发起一场对日军的反击战就成为美国战争初期的主要目标。在这里，美国拥有真正的自主权，因为不管是英国还是苏联都没有介入美国的太平洋战略或行动。尽管美国舰队的一大部分已经在珍珠港被摧毁，但这并不能妨碍美国在太平洋西南部发起一次重大的战役，一个目标是防止日军进攻澳大利亚，另一个目的在于尽可能地削弱日本的海军力量，以杜绝敌人用之去建立一个庞大的亚太帝国。与此同时，免于珍珠港灾难的美国航空母舰（它们当时很偶然地不在海军基地）在太平洋中部大派用场，在 1942 年 6 月份一次靠近中途岛的关键战役中，美国的飞机和战舰重创入侵夏威夷群岛后回途中试图占领该岛的日本海军，仅仅在珍珠港之后的 6 个月，这场战役就成为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

美国在其他地区卷入的不多，但绝非不重要。在亚洲大陆，中国—缅甸—印度（CBI）战区得以建立，由美国、英国和中国三个国家在此协调合作。这种联合的事业使得那里的战争任务远



大战中的太平洋战场（1941—1945）

比太平洋战场复杂得多，为了确保那里的顺利行动，罗斯福总统派遣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前往重庆指挥中缅印战区的美国军队并安排中国的租借物资分配，同时还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的任务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他不得不争取达到不同的目标以及确定盟军的不同优先次序，而已经认定美国的参战将会确保中国最

终战胜日本的中国领导人在进行战争的同时越来越多地关注起中国的内部政治斗争（国民党和共产党从未成功地建立一个联合政府）。而英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坚持集中力量保卫印度，但它却在得到诸如穆汉达斯·甘地等民族主义领袖的全力支持方面陷入困难，后者坚持英国作出让印度独立的承诺以换得他们对战争的支持。实际上，除了被动地抵抗日军在马来亚和缅甸的攻势之外，这一时期的中缅印联合军队难以有所作为。[①]

在西半球，紧随珍珠港之后，美洲国家在1942年1月又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在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举行，美洲各国（阿根廷除外）同意断绝与轴心国的外交关系。之后墨西哥和巴西很快向轴心国宣战并最终向战场派出了自己的部分军队（一个墨西哥空军中队到了菲律宾，巴西军队到了意大利）。3月，一个用于设计联合战略的美洲间国家防御委员会在华盛顿成立。尽管西半球实际上并没有爆发战事，但人们从一开始就对德国潜水艇在大西洋西部的活动感到焦虑，在此较为重要的是巴西的“凸出部分”，它距盟军将要入侵的北非最西部不足2000英里，为了保卫这一凸出部分并为北非战役做好准备，美国军队在那里建立了空军基地。整个战争期间，拉丁美洲各地共建立了40个这样的飞机场，尽管1943年以后人们断定对美洲大陆的严重威胁已经减退，而对西半球的防御也失去了紧迫性。（运往拉美的租借物资仍在继续，但它们只占到美国整个军事外援总量的1.1%。）[②]

此时的美国军队还没有直接参与战争中的最激烈战役，它们发生在东部战场，即（1942年）夏天德军向斯大林格勒发起的

① 关于史迪威的使命，参见巴巴拉·塔克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纽约，1971年）。

② 欧文·格尔曼：《睦邻外交》（巴尔的摩，1979年），第136—137页。

攻势，当时列宁格勒已经被包围了好几个月，莫斯科距德军前线仅100英里。美国在这里的作用是增加租借物资的运送，华盛顿和莫斯科都为此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以加快处理速度。鉴于在苏联供应线当中处于极端重要的地理位置，美国还支持英国和苏联占领了伊朗。中东供应中心（the Middle Eastern Supply Centre）是一个重要的象征，标志着美国对击败轴心国所作出的承诺，就像它所展开的更多公开军事行动一样。

然而，即便是在战争的最初阶段，军事战略也只是整个画面的一部分。从一开始，美国就没有将自己的角色限定在战略方面，由于战时同盟的结果，它发现自己逐渐陷入一系列复杂的政治问题。实际上，鉴于美国实力和资源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卷入，以及由于随着战争的进展美国所掌握的权力的进一步扩大，这一切都也都是难以避免的。

仅举一例，战争过程中对任何地方的占领都会产生管理方面的问题：如何对待占领地的领导和人民？在美国不是惟一占领国的情况下，如何协调与其他占领国的政策？如何平衡日常管理事务与占领地的未来地位等等。美军在1942—1943年占领的第一块主要地区的北非预示了整个战争期间乃至战后的占领地问题。不提希望某种形式自治的当地人口，仅鉴于维希法国、自由法国力量、英国军队和许多中立国公民的存在，被占领地北非的政治就已经特别麻烦了。罗斯福总统尽力采取注重实效的政策，将大的政治问题向后拖延，尽管这样，在盟军登陆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之后还是招致与维希法国政权诸如海军上将达尔朗的合作。但英国却只承认戴高乐将军领导下流亡伦敦的自由法国政府，后者坚持在解放的北非建立政权，最后，在两个法国派别之间达成了一个共享权利的安排，但这远不是一项满意的解决办法。①

① 参见阿瑟·芬克：《“火炬”政治》（堪萨斯州劳伦斯，1974年）。

与此同时，也不能无视摩洛哥人、阿尔及利亚人和突尼斯人的愿望，因为他们的配合对战争十分重要，特别是当德国正在鼓动他们反对盟国的时候，而这只是整个问题的一部分：鉴于1941年8月的崇高宣言（大西洋宪章），美国及其盟国能否不对全世界的殖民地和附属地区的未来地位阐明自己的立场？美国是否应当将殖民地自决变成战争的一个目标？例如，副国务卿韦尔斯在1942年5月响应了美国公共舆论的一个主题，宣称“我们的胜利必须对所有的人种带来一连串的解放”。[①]

罗斯福总统试图一直顶住这些压力，在集中精力进行战争努力的时候尽可能地回避作出匆忙承诺或给人们过高的期望。但他不能无视公众对战争目的的讨论，也不能忘记他自己在大西洋宪章当中清晰展现出的击败德国后的世界和平前景。实际上，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说明他已经在郑重思考胜利后的世界雏形，例如，1942年3月，当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华盛顿拜会他时，罗斯福建议战后美苏英中四大国可以发挥“警察”作用以确保全球安全，如果“四大警察”能够合作管辖世界，那么其他小国将不必维持大量的军事力量以防止德国或日本的复活。总统似乎还希望如果这样的大国合作得以维持，苏联和英国也都无需拥有殖民地或势力范围。实际上，他认为在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准备自己的最终自由时，四大国还可以充当他们的“托管人”。[②]

这都是些没有具体界定的模糊观念，但它们至少显示罗斯福的主要关注是维持战时同盟并将之作为战后世界秩序的关键。这一观念不像威尔逊而更接近西奥多·罗斯福式的强权政治框架，说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如下信念：强权是国际关系中的基本现

① W. 罗杰·刘易斯：《走投无路的帝国主义》（纽约，1978年），第155页。

② 入江昭：《强权与文化》（马萨诸塞州剑桥，1981年），第53—54页。

实，强权应当以一种负责任的方式进行实施。因此，对他来讲，为了整个世界的利益，呼吁战败轴心国之后的四个最大的军事强国继续合作是有意义的。尽管他不想作出任何具体的承诺，但十分明显的是，就像威尔逊一样，他将美国在战后世界秩序中继续作为一个主要参与国的角色视为理所当然。

如果说总统本人太过关注于军事和战略问题而无暇更多思考胜利后的世界形势，那么其他人则有更多的时间投入战后设计。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国务院所作的努力，几乎伴随着战争的降临，他们就开始组织针对未来世界事务的研究小组和咨询委员会等，将本部门的官员以及国会议员、记者、学者、军官等相关人员召集起来对战后事务进行广泛的研究与讨论，其中包括对敌国的占领、领土调整、国际安全以及重建贸易关系等等。尽管上述委员会此时的探讨还没有太多超出信息与观点的交换，但一些特定的观念已经出现，这些观念一旦在华盛顿开始寻求战后世界的具体指导时就会立即成为美国正式政策的一部分。[①]

这些观念很明显是威尔逊式的，参加研究小组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同意，击败轴心国后的维持秩序与安全的主要框架是要恢复国际合作的原则，而不是过时的均势。为了确保一个稳定的和平，敌国的专制主义与军国主义必须予以根除，但对其国民则必须宽大，这里的逻辑是，尽管德国和日本都处于专制主义的控制之下，但那里都存在着民主力量，它们暂时受到压制，而一旦那里的专制主义领导人被粉碎，它们就会受到鼓舞而重新崛起。这些国家还要被融入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之中，该秩序与30年代极为不同，但却也不全然是大萧条之前世界秩序的背离。例如，各个委员会都一致赞同战后世界的所有领土改变都必须符合相关人民的愿望，也不应当再有政治性或经济性的势力范围。

① 关于对对待日本的战时计划讨论，参见上引书第2章和第3章。

人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威尔逊式的安排，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原则已经由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而且还因为它们暗含一种这样的信念：即30年代的邪恶是一种失常状态，而部分体现了威尔逊原则的20年代才基本上是正常的。也就是说，国务院的会议正在展望回归到专制主义与侵略性军国主义崛起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一种国际关系模式。当然，他们都清楚地认识到必须防止相同历史的再次重演：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满怀希望的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惊恐进程。许多美国人都相信答案存在于以下两个方面：美国对国际政治的积极参与，一种含有防止过分经济民族主义的组织。这两样都是20年代所缺乏的，因此，如果新和平要想获得成功，它就有必要发展这样的政策。当然，这些都意味着美国对世界事务的持续介入。尽管这更像是一种对期望的表达而不是一个具体的方案，但随着战争迈入第二个阶段，这些观念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新国际主义

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一个人们常说的“扭转潮流”的时刻，那就是苏联军队冲破对列宁格勒的围困并迫使德军放弃斯大林格勒的1943年1月。紧随苏联发起的反攻，其他地方的盟军也攻入了西西里和意大利（1943年7月）并开始向日军占领的太平洋中部岛屿展开进攻，较为著名的是吉尔伯特岛（11月）。欧洲战场的高潮是1944年6月美英军队进入罗马并登陆法国的诺曼底海岸，此次登陆开启了长时间以来所允诺的第二战场并在8月份以解放巴黎而达到顶点。几乎与此同时，美国军队攻占马利亚纳群岛，并将其中的一些岛屿（特别是塞班岛和蒂尼安岛）建成轰炸日本本土的空军基地。

随着潮流的扭转，第二阶段目睹了战争期间才会出现的盟国

间的诚意与合作。但毫不奇怪的是，盟国的注意力开始转向战后问题，恰巧1943年1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召开了一次会议。卡萨布兰卡会议变得闻名于世的原因是两位领导人最后提出了“无条件投降”的模式，也就是说，在敌人投降之前不与之讨论任何和平条款或战后问题。该政策是对1918年休战安排的反应，如前所论，当时的德国求助于威尔逊总统以获得以十四点为基础的和平。这一次，罗斯福总统决心再也不能让敌人指定这样的条件。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实际上，尽管盟国都坚持战斗直至敌人投降，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能开始郑重考虑和平的形式。战争的第二阶段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美国、英国、苏联与中国在战后问题上的相互协商。

罗斯福和丘吉尔一路赶到卡萨布兰卡开会的事实证明了他们一直公开宣称的不考虑战后问题的不现实性，因为他们赶到那里的部分任务就是解决在北非支持哪一个法国的问题。结果是：维希法国和自由法国两个都支持，前者由亨利·吉罗所代表，后者是戴高乐。这种权宜的联姻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到巴黎解放时，作为自由法国毫无争议的代言人的戴高乐完全崛起。尽管罗斯福不喜欢他自己所认为的戴高乐的那种自负感觉，但罗丘两人在卡萨布兰卡的会面却有其政治含义，并显示了回避作出对战后世界形态有影响的决策是多么的困难。

意大利是“无条件投降”条款的例外。从1943年秋天开始，盟国就愿意与墨索里尼的继任政府进行交往，当时墨索里尼已经逃离罗马，半个意大利已经被解放出来。但应当由谁出面领导继任政府却是个麻烦的问题，当时没有容易的解决办法。但是，盟国都愿意向被占领的意大利提供经济救援，也愿意设立一个管制

委员会制定占领政策。[1]

在处理两个主要敌国方面，这一阶段也出现了实质性的进展。从1943年春天开始，华盛顿与伦敦开始交换占领德国的看法，并且很快就以下两点达成了一致：第一，东德（普鲁士）必须与德国其他部分分开并有可能并入波兰；第二，德国应划分成三个占领区，分别由美国、英国和苏联进行管理。

这两条政策被1943年底和1944年初在德黑兰首次会面的罗斯福、丘吉尔和约瑟夫·斯大林所批准，"三巨头"对上述问题以及诸如战后从伊朗撤出外国军队等其他问题的讨论说明他们十分乐意考虑战后问题。就他们而言，甚至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之前，开始考虑战后世界形势的时间就已经到来。

实际上，战后欧洲的雏形已经出现。苏联将保留波罗的海国家以及它在1939—1940年间所吸收的东一半的波兰，尽管在德黑兰没有具体谈到这些问题，但对德国的讨论却暗含在战败的德国与波兰之间建立新的边界，因此也就需要在波兰与苏联之间设立新的边界。至于波罗的海国家，在一再推迟开辟第二战场的情况下，罗斯福和丘吉尔谁也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向斯大林挑战，这似乎是为换取苏联在战时以及战后安排方面继续合作而付出的一个微小代价。三巨头在欧洲的合作将是基本的原则。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罗斯福总统已经设想让中国加入三大国，建立一个战后四强的合作框架。像在欧洲一样，亚洲的这种合作也要建立在能够接受的领土调整的基础上，苏联将重新获得分别在1875年和1905年割让给日本的库页岛和萨哈林岛南部，英国则恢复它在亚洲的帝国，尽管罗斯福和国务院都迫使其作出未来自决的某种承诺，但当时什么也没有得到。

---

[1] 关于1943年后对意大利的处理，参见诺曼·科根：《意大利和盟国》（马萨诸塞州剑桥，1956年）。

在上述过程中，美国并没有自己的领土打算。美国海军希望能够保留一些太平洋岛屿用于防止战后日本军事的复燃，罗斯福支持这一想法并在 1943 年派出一个海军使团到太平洋考察这种可能性。与此同时，他还倾向于对所有存有争议的岛屿实施某种形式的托管，托管的形式取决于能够完成这项任务的战后世界组织，但毫无疑问的是，美国将是这些岛屿的惟一托管人。[①]

与太平洋诸岛的处理不同，战后亚洲的关键问题是不管什么样的蓝图都必须将中国包括进去，当中国领导人蒋介石在年底被邀前往开罗会见罗斯福和丘吉尔共商亚洲战争与战后问题时，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是再也明显不过了。开罗会议发生在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的德黑兰会议期间[**]，两件事情之所以被分开讨论是因为斯大林不想参加一个讨论对日战争的会议，因为苏联当时还对日本保持中立。（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作出苏联在击败德国后参加对日战争的承诺。）无论如何，开罗会议同意中国收回日本从 19 世纪 90 年代开始所“偷窃”的所有领土，特别是台湾和满洲。而作为日本另一块殖民地的朝鲜将“在适当的时候”赋予独立。当时的想法是在朝鲜能够独立之前将之置于托管之下，托管人可能是美国、苏联和中国，这也是推动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大国地位的另一件事。

1943 年早期，美国主动废除了多年来为中国所抱怨的两项不平等条约，首先是结束了在中国的治外法权，然后是终止排斥华人向美国的移民。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都是些令人满意的发展，对美国而言，它们表达了在打败日本后将中国看成是亚洲主要伙伴的一种政策。随着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优势的突出以及中国在亚洲大陆作为新大国的崛起，这一地区的未来可以被期望

---

① 对托管安排的最好研究是刘易斯的《走投无路的帝国主义》。

** 准确地说，应当是在德黑兰会议之前。——译者

得比以往更为稳定。（在10月份莫斯科召开的外长会议上，美国、英国和苏联的代表确认了中国将在战后作为四大国之一而发挥作用。）

在这些决定中，日本成为一个小国，退回到19世纪90年代之前的状态。但是，不管在当时还是以后，人们都没有过多考虑将日本分成不同的占领区。国务院的官员坚持美国独占日本，因而没有必要建立像德国一样由不同国家控制下的占领区。其结果是影响深远的，就像部分美国官员所认为的那样：在实施占领政策过程中，此举将有助于获得“友好”日本人的合作，这些人包括在20世纪20年代十分活跃并与美国人建立了密切联系的战前自由派人士和商人等等。尽管在支持美中伙伴关系和在日本战败后对日本多多少少的善意占领政策之间有明显的不对称，但从中都可以看出美国当局对战后国际事务的郑重考虑。

这些计划当中最多的还是关于大国的政治安排。同盟国设想的战后世界是保持轴心国弱小而由四大国代替它们成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美国将崛起为太平洋和西半球（美国在这里的利益是将西半球战略合作维持到战后）的主要大国。与此相关应该注意到的是，美国在1943—1944年已经将自己视为一个将拥有原子弹的核大国，这项计划一直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 New Mexico）秘密进行。利用原子能（通过对铀原子的裂变或聚变而产生）制造出一种爆炸力和破坏力都史无前例的炸弹的想法已经存在多年，战争的双方都在迫切地试图生产这种炸弹。一旦成功，他们肯定都会投入使用，但同样重要的是它们的未来使用，不管是否依靠这种新式武器击败敌国。因此，在1943年8月的魁北克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讨论了这一问题并签署了一项秘密协议，决定两国继续分享原子秘密以及在其未来使用方面相互协商，这一秘密在当时没有告知苏联或任何国家。很显然，美国是两个原子伙伴中的老大，该备忘录（这一想

法在 1944 年的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中被两位领导人再次重申）表明：在各盟国所协商的不同领土安排之外，另一个前提就是美国还要成为胜利后的惟一超级大国，至少在军事力量方面。[1]

国际关系的经济和文化方面又如何呢？国务院战后设计委员会背后的威尔逊主义动力从未减退，到 1943—1944 年，呼吁新国际主义的诸多美国个人和团体又加盟其中，这种新国际主义是一种受到威尔逊主义的启发、但又认识到需要与其他诸如英国、中国与苏联等军事大国密切合作的“新”国际主义。他们的希望是这些国家将共享大西洋宪章中所包含的原则与价值观念，并在战后一起合作将之贯彻落实。更具体地讲，到 1943 年，美国国内已经出现了支持美国参加一个国际新组织的清晰共识，即便是此前最有名的孤立主义分子密西根州参议员阿瑟·范登堡也站出来支持这种举措，共和党也发表了一项政策声明认可美国加入战后国际组织。然而，除非受到经济支柱的支持，否则这样的成员身份没有什么意义，而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会议（the Bretton Woods Conference）的任务。与此同时，联合国建立了善后救济总署（the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简称 UNR-RA），向饱受战争破坏而被盟国解放出来的地区分配食品与补给品。

在文化领域，大家都充分认识到整个战争期间包括联合国家和轴心国等在内的所有交战国都曾集中进行了宣传工作，目标既指向敌国也针对国内。实际上，如果不是服务于战争的努力，文化国际主义真算是一项奢侈品。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国联所支持的旨在促进跨文化合作的早期活动从未被遗忘，曾经参与这些活动以及赞同这种观点的人一直试图保持这份遗产永不磨灭，并且决心在战争一旦结束的时候就使之重生。例如，这可以反映

① 参见马丁·舍温：《一个被毁灭的世界》（纽约，1975 年）。

在早从1942年盟国教育部长在伦敦开始的一系列会议，尽管会议的最初目标旨在帮助那些受到战争创伤与破坏的学童，但会议代表们也同样对及时准备战后的工作感兴趣。美国人从1943年开始参加这些会议，1944年4月，一个包括国会议员J. 威廉·富布赖特以及国会图书馆的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在内的高级代表团赶赴伦敦，讨论设立接替国联的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的机构，这就是战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开始。[1]

走向战后和平

充满希望的新国际主义能否发展成为战后世界事务的一个稳定结构，将取决于盟国单个或集体地在1944年迅速开始收复和占领地区内的未来行动。随着法国和西部低地国家的解放以及苏联反攻和对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以及最终德国东部的占领，战时同盟显然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同一时间的太平洋也目睹了美军进攻并重新占领菲律宾以及对日本本土轰炸的开始。现在的大问题是这些必然导致战争迅速结束的成功战事对盟国们的影响：胜利会使得同盟永存？还是各个盟国在战争结束后分道扬镳而各行其是？它们怎样保持战时合作并形成战后国际秩序的一个稳定框架？

这些问题以前曾经被提及，但现在却随着德国的很快投降以及一年或再晚一些时日后的日本战败前景的清晰而更显紧迫。苏联似乎急迫地想在它占领的巴尔干和东欧的绝大多数地区建立自己的控制权，丘吉尔首相对此十分警觉，以致于为了换取斯大林承认英国继续保有其势力范围而主动承认了苏联在这些国家中的

[1] 我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立的叙述源自伦敦公共记录办公室外交部档案的FO 394系列文件。

势力范围，罗斯福不接受如此露骨的安排，但只要它能够成为维持大国合作的基础，他也不反对这种事实上的势力范围。

然而，由于四强中英国和中国相对于另外两强的弱势的加剧，从 1944 年中期以后的大国合作观念经历了微妙的变化，英国政府内外的官员都承认国家已经破产，除非美国的帮助才能渡过难关，否则，不管它是否希望继续发挥世界大国的作用，其经济困难与财政紧缩都将会使整个国家问题百出。美国不希望英国削弱，如前文所言，罗斯福确定要保持美英两国对原子武器的垄断，其想法是英国仍然是平衡苏联力量的一个重要国家。然而，此时此刻，美国没有向英国作出主动提供战后经济援助的承诺。

1944 年秋，中国也开始失去它的部分实力与影响，部分原因在于美国的太平洋战略，其“跳岛”战术的成功使得中缅印战场对最终击败日本的关键性减弱。罗斯福总统确实想利用中国以及在亚洲大陆上的美国军队拖住日军，以防他们返回防卫日本本岛，但他在建议让史迪威将军全盘指挥包括共产党力量在内的整个中国军队时和蒋介石发生了矛盾，因为这一要求激怒了决心防止共产党在战后夺权的蒋介石。随着日本战败只是一个时间早晚问题的出现，中国国内的派系力量开始布置战后的斗争，蒋认为接受罗斯福的建议就等于自杀，因此他坚持不屈服，史迪威最终被召回，而中美关系显而易见地冷却下来。

这种形势就使得美国和苏联可能成为主宰战后世界的两个军事大国，尽管前者无疑是两者中的强者，并不仅因为它将拥有（而且在可见的未来会垄断）原子武器。无论如何，战后世界的形态将依赖于两国能否在击败轴心国之后保持继续合作。问题实质上是超出军事性的，因为那时美国官员已经准备认可战后国际社会的具体计划，这些计划既是地缘政治性的也是经济和文化性的，既是通过国际合作也是通过美国的单边主动。

这一点在 1944 年的两次国际会议上变得更为清晰，一次是

在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7月），另一次在敦巴顿橡树园（Dumbarton Oaks）（10月）。前者是为了重建被大萧条和各国自给自足政策所摧毁国际经济秩序，包括著名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内的与会者都同意自30年代以来所盛行的那种混乱的经济民族主义必须得由某种国际合作形式的安排所替代，但他们也明白仅仅返回到1929年之前的那种形势是不够的，如前所示，20年代国际经济交往的基础是黄金交换体系，它正常运作的前提是跨越国界的贸易和投资要不受干扰地流动，以及政府愿意为了支持其货币的价值而控制支出，但大萧条却显示出这种整体结构的脆弱。人们认为，现在需要的是一种能够维持不同货币之间的稳定兑换比例，但同时又能避免每个国家为稳定其货币价值而被迫采取保守的财经政策（人们普遍认为这样的一种政策会抑制消费并增加失业）的某种机构性的制度安排。在布雷顿森林参加会议的44国代表都同意这样的一种任务可以通过建立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加以完成，该组织将在一些国家经历贸易和兑换困难的时候向它们提供暂时的救济，这样就能避免这些国家被迫诉诸于保护主义、主动贬值或者是导致失业上升的国内紧缩政策。拥有88亿美元启动资金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一个全新的尝试，世界经济事务当中从未有过这样的东西，它标志着国际合作已经步入超越诸如安全和军控等传统领域的新时代。

布雷顿森林会议还建议成立一个用于重建和发展的国际银行，这就是人们后来所知道的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这也是一项创新，其指导思想是集中比较富裕国家的资源（起初设想是100亿美元）去帮助那些致力于经济转型的欠发达国家以及依赖外援的国家。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还没有变成现实，但显而易见的是，一旦它们建立，美国将被要求向之提供大量的启动资金。这显然也是从大萧条当中得到的一个教训，美

国不再重拾经济民族主义，反而要成为经济国际主义的领头羊。

在与此同时的敦巴顿橡胶园，来自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的代表们为战后国际机构创立了一个基础，其指导思想并非新颖，但他们现在已经准备为这样的一个机构起草具体的章程，它将被称为联合国（the United Nations），显示了他们决心将战时合作继续维持到战后时代。代表们还知道联合国要得远比国联有效，会议提出的设立一个四大国作为常任成员的安全理事会，反映了被其他三个政府所同意的罗斯福长期以来的大国合作观念。然而，苏联坚持在安全理事会采取任何行动之前需要四大国的完全一致，美国反对给予任何常任成员国的一揽子性的否决权，与会国当时未能解决这一分歧。尽管如此，敦巴顿橡胶园仍然是标志着战后世界组织已经确有雏形的里程碑。

上述两个会议都有苏联参加的事实说明：尽管迅速对被自己军队所占领的地区宣布独家控制，但它还是有兴趣在战后继续维持部分合作。苏联政策中这种既想维持部分合作框架又想建立自己势力范围的两个方面是否相容还不甚明了，很多人认为它们相互冲突，而且只要苏联坚持单边行动，它就得被视为建立战后秩序道路上的障碍。一些人相信这种以实力为水准的安排是能够确保大国继续合作的惟一框架，而包括罗斯福总统本人在内的另一些人则希望在安全、经济等相关领域内也尽可能地继续保持大国合作。（毕竟，苏联代表团还是定期参加旨在建立一个国际文化机构的伦敦教育部长会议。）

这种乐观主义似乎被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所部分证实，这是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三人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会晤。随着德国投降的临近，盟国领导人开始将精力转向尽可能快地击败日本。斯大林重申了在德国投降3个月后苏联将加入对日战争的承诺，他还同意将国民党政府当成是中国的合法政府继续交往，尽管该政权已经公开受到共产党的挑战。作为回报，罗斯福

和丘吉尔支持苏联在满洲特别是满洲铁路和南部（不冻）港口的特殊利益。

三位领导人还就其他一些问题达成了一致，比如斯大林放弃了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的完全否决权，同意否决权将不用于“程序性的”事务，他还同意让法国加入占领德国的行列。在罗斯福和丘吉尔方面，他们正式认可了苏联和波兰的新边界。但是，双方在被解放地区最突出的波兰新政府的构成方面产生了分歧，斯大林坚持这些政府应当由绝大多数在战争期间呆在苏联的共产党政治家控制，而罗斯福和丘吉尔则想扩大这些政府的组成基础，他们在最后达成了一项折衷：即三大国同意支持这些国家组成民主政府的原则，尽管由苏联指导下的共产党人在一开始构成其核心力量。

雅尔塔会议上的折衷似乎很好地预示了盟国间的持续合作。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以实力为水准的安排，其中三大国都或明或暗地接受了将这种实力现状作为战后势力范围的基础以及这种势力范围是构成世界秩序的关键。只要美国和苏联能够继续某种形式的合作，这些合作就有希望最终扩大到其他领域并使得苏联政策符合大西洋宪章的原则，那正是战时同盟的思想基础。

从这一方面来讲，德国战争在1945年5月8日的结束或许可以说是来得太快。罗斯福在4月12日去世，在欧洲战争结束前，新总统哈里·杜鲁门还没有时间形成他对战后问题的处理方法。德国被粉碎后，同盟国都开始各行其是。对日战争固然还需要他们的合作，但需要合作的程度大大缩小。有些美国人甚至开始指出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或许既不必要，也不合意愿，因为这会使得苏联在亚洲的力量得到进一步扩张。还有一些官员想以政治方式结束对日战争，相信（或许是正确的）只要确定盟国无意摧毁天皇制度，日本就有可能被说服停止战争，因此，他们主张

以此为基础寻求和日本达成可能的停火。但是，杜鲁门总统不同意这样做，他相信公共舆论将不会接受任何保留天皇的承诺，为了把拟于1946年美国军队进攻日本本岛的代价减到最低程度，苏联的参战在战略上还是必需的。[①]

与此同时，国务院官员和海军部与陆军部人员已经最终确定了占领日本的计划，他们现在比以往更加坚定地决心不把日本分成不同的占领区，而是由美国独家决定日本的命运。中国仍然被视为美国在战后亚洲的主要伙伴，但是随着国民党和共产党冲突再次爆发，关于这个国家在不久将来能否作为一个统一和强大大国的前景则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

结果是在德国战败后的几个月内，从1944年以后已经变得紧张的战时同盟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由于共同敌人的消失，这一任务并非易事，现在的同盟要得为和平而重新定义，但和平本身的形成又取决于它们之间的合作，或者它们之间的不合作。在这种动荡易变的形势下，只有坚决维护同盟的努力才能管用，这应归功于杜鲁门、斯大林和丘吉尔（还有在7月选举中击败保守党并接替丘吉尔的克莱门特·艾德礼），他们在这一方面继续作出了自己的努力。譬如，从4月底到7月底在旧金山召开的50国会议上完成了起草联合国宪章的绝大任务。该宪章是宣扬联合国家决心为维护和平以及通过集体行动来惩罚未来侵略者而携手合作的响亮声明，其导言部分还罗列了战后世界要为之努力的一些基本原则（自决、人权、“男女平等”、“社会进步”、“较好的生活水准”等等）。

这些都是在当时能够取得的最满意成就，结合雅尔塔所产生的更为直接的以实力为水准的安排，旧金山会议可以说是界定了

① 关于结束太平洋战争时的天皇问题，参见入江昭：《实力与文化》，第251—257页。

战后世界秩序的基本框架。

在这种环境下，8 月 15 日的日本投降可以被看成是一个脚注，是战后世界历史新篇章开始前的最后一幕。然而，从很多方面看来，日本投降的方式不仅使之成为战后和平的开始，也成为冷战的发端。首先，苏联加入对日战争（8 月 8 日）确定了它不仅作为欧洲强国而且也作为一个强大的亚洲大国的出现，它对中国的影响预期会相当之大。第二，美国使用原子弹的决定开创了核武器的时代。这些形势的发展都不在预料之内，但它们实实在在的发生却当即造就了极其新颖的现实，使得战后的国际关系更加难以概念化。

在原子弹决策之前，三大国在柏林郊外波茨坦举行了会议，杜鲁门、斯大林和丘吉尔（以及艾德礼）在这里协商了对德国的处理以及对日战争的问题。关于前一议题，他们决定设立一个由三大国外加法国组成的外长会议准备与德国及其盟国的和平条约。对于日本，与会者发表了一项宣言，警告除非立即投降，否则将面临灾难性的毁灭（尽管没有提及但暗含了原子弹）。当时包括天皇在内的东京文职官员都认为战争已经失败，应当寻求一种结束战争的体面方式，但他们并没有立即对波茨坦宣言作出回应，因为他们得首先说服军方特别是陆军接受停战，也因为他们希望苏联能够出面对战争进行调停，因为当时的苏联在技术上仍然维持中立，因而有人希望它能够充当日本和美国及其盟国的调解人。

这样的犹豫不但使得日本遭受了更大的破坏，而且还将世界带入了原子弹时代。在参加波茨坦会议期间被告知原子弹成功试爆的杜鲁门总统决定使用原子弹以尽快结束战争。两颗原子弹被抛到了广岛（8 月 6 日）和长崎（8 月 9 日），直接和间接（通过辐射）造成了成千上万名平民的死亡。原子弹的轰炸以及苏联的参战最终迫使天皇及其高级幕僚接受了波茨坦宣言，8 月 14 日

（亚洲是 8 月 15 日）天皇向国民发表了史无前例的广播讲话，正式宣布了他的决定。由此，这场伤亡多达 4000 万人、超过世界总人口 2%、此外还由于强制性移民、财产破坏、疾病以及饥饿等影响到更大数目人口的漫长战争终于结束了。

但战争结束的方式，即苏联参加太平洋战场和美国使用原子弹，预示着战后的世界形势将变得极为复杂。当任何形式的合作需要同时应付苏联巨额扩张的领土控制以及美国已经拥有而其他国家也会很快获得的这种可怕新式武器时，所有人都相信未来世界和平所赖以存在的一个关键性基础的有效大国合作将难以产生了。

但与此同时，战后国际秩序的另外两个支柱却通过美国的主动以及其他国家的合作而得以产生，一个是经济方面的，人们将拭目以待，看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相关的机构和机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将包括苏联并最终包括前轴心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都纳入到一个开放和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秩序当中去。第二个是文化和意识形态性质的，被表达在联合国宪章之中，它所展望的是一个没有暴君、没有压迫和拥有安全感的世界。所有的国家和人民将团结起来，共同追求并致力于自由、公正和怜悯。当然，这也是美国传统与理想的一个产品。

也就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世界是一个美国军事力量、经济资源与文化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显现的世界。可以预见，它们将被用于塑造和平，如果不是这样，那一定是因为美国的权势与影响受到了挑战，这种挑战不仅仅是来自苏联及其他那些未来的军事超级大国，还来自那些想更好地利用新的经济机会和更全面地拥抱出现在地平线上的自由前景的国家和人们。正当美国走向全球化之时，世界也正在变得美国化了。

结　　语

1913—1945年世界转变的历史也是美国世界角色的变化历史。曾经充当波及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各地的国际关系中心的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失去了霸权地位。1917年之后的年代标志着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崛起，即便是在没有利用军事力量真正发挥领导作用的时候（诸如20年代），它也提供了经济和文化资源以界定和维持全球秩序。30年代中期的美国在各个层面回避国际领导权或国际合作并退回到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实在是一个例外，但即便是在那个时候，使用约瑟夫·奈的语言，依然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迟早都要"注定领导"。[1]它不能不这样做，除非它的领导人和人民以及其他各地成千上万的人们满足于生活在一个被切割成分散区域、并且许多人屈从于专制统治下的世界。伴随着德国在1939年入侵波兰以及日本两年后的偷袭珍珠港，美国领导时刻的到来比预期的要快。如今，美国在军事、经济和政治各个方面全面卷入世界各地：西半球、大西洋、欧洲、非洲、中东、亚洲、太平洋，美国全球化实际上已经囊括全球。

作为世界领袖的出现，美国也为其他国家带来了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转变，这也是二战期间的众多观察家都畅谈世界正处于革命的原因，这里的革命意指史无前例的变化。特别引人注目的变化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大国冲突在那里导致了顽固权威的混乱、大众动员以及大规模的破坏，并且出现了要求自治的政治运动。非西方的觉醒将成为战后历史的一个重要主题，但实际上它是与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出现而同时开始的，这两种现象是相互关联的，因为非西方的人民都转向美国寻

---

[1] 约瑟夫·奈：《注定领导》（波士顿，1990年）。

求鼓舞与支持。

全球美国化将会是不稳定的，即便美国全球化的过程是一次在欧洲相对衰落时重新界定世界秩序的努力。这两种孪生现象如何发展、能否在无需像 1913—1945 年代付出千万条生命代价的情况下出现一个美国和世界更为相互依存的全新国际秩序，这一切都将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参考文献短论

1913–1921

On the origins of World War I, the best summary of various factors and interpretations is offered by James Joll,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1984). On United States neutrality during 1914–17, the standard work is Ernest R. May, *The World War and American Isolation* (Cambridge, Mass., 1959). There is a voluminous amount of writings on President Woodrow Wilson's diplomacy both during the period of neutrality and after the decision for war. The most detailed and reliable study is the multivolume biography by Arthur S. Link, of which two volumes are particularly relevant: *Wilson: The Struggle for Neutrality* (Princeton, 1960), and *Wilson: Campaigns for Progressivism and Peace* (Princeton, 1965). For a more compact survey, see Robert H. Ferrell, *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War I* (New York, 1985). An extremely interesting contrast between Wilson and former president Theodore Roosevelt is drawn in John Milton Cooper, *The Warrior and the Priest* (New York, 1983). See also the same author's *The Vanity of Power* (Westport, Conn., 1969) for a discussion of antiinterventionism during the war.

Perhaps the most influential interpretation of Wilsonian foreign policy in peace and war has been offered by N. Gordon Levin, *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1968), which places Wilsonianism squarely in the middle between traditional power politics and Bolshevik radicalism. The best analysis of Wilson's struggle to go beyond traditional patterns of diplomacy is Frederick Calhoun, *Power and Principle* (Kent, Ohio, 198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ilsonianism and Leninism is given further elaboration in such works as Klaus Schwabe, *The World War, Revolutionary Germany, and Peacemaking* (Chapel Hill, 1985); Arno Mayer, *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Peacemaking* (New York, 1967); and John M. Thompson,

Russia, Bolshevism, and the Versailles Peace (Princeton, 1967). On America's expedition to Siberia, the most authoritative historian has been George F. Kennan. See his *Russia Leaves the War* (Princeton, 1956) and *The Decision to Intervene* (Princeton, 1958). The Siberian intervention is put in the framework of American relations with the Czechs and wartime developments in Central Europe in Betty Miller Unterberger's massive *The United States, Revolutionary Russia, and the Making of Czechoslovakia* (Chapel Hill, 1989).

There are many accounts of American relations with specific countries and regions of the world in the era of World War I.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are treated extensively in such works as Lloyd C. Gardner, *Safe for Democracy* (New York, 1984); Seth P. Tillman,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Princeton, 1961); and W. B. Fowler, *British-American Relations* (Princeton, 1969). The literature on U.S. involve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East Asia is particularly rich. On Mexico, see Friedrich Katz, *The Secret War in Mexico* (Chicago, 1981), a study of U.S.-German rivalry in that country. The American expeditions to Santo Domingo and Haiti are chronicled in David Healy, *Gunboat Diplomacy in the Wilson Era* (Madison, 1976); and Hans Schmidt, *The U.S. Occupation of Haiti* (New Brunswick, N.J., 1971).

Regarding the wartime friction with Japan and Wilson's pro-Chinese orientation, see Tien-i Li, *Woodrow Wilson's China Policy* (New York, 1969); James Reed, *The Missionary Mind and American East Asian Policy* (Cambridge, Mass., 1983); and Roy Watson Curry, *Woodrow Wilson and Far Eastern Policy* (New York, 1959). There is less work on the Middle East, but some useful data may be obtained in John A. DeNovo, *American Interests and Policies in the Middle East* (Minneapolis, 1963); Laurence Evans, *United States Policy and the Partition of Turkey* (Baltimore, 1965); Daniel Yergin, *The Prize* (New York, 1991); and Burton Kaufman, *Efficiency and Expansion* (Westport, Conn., 1974). This last, in addition to discussing the American pursuit of Middle Eastern oil fields, presents a fresh interpretation of Wilsonian foreign policy in terms of the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government-business cooperation in the interest of efficiency and maximization of overall national interests. This theme,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a framework for state-society coop-

eration steadily came to characterize America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is known as a "corporatist" interpretation and has informed such other important works as Michael J. Hogan, *Informal Entente* (Columbia, Mo., 1977), and Emily Rosenberg, *Spreading the American Dream* (New York, 1982). Both stress the initiatives taken by the nation's political and business leaders to reform domestic institutions and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s so as to realize the efficient use of resources at home and the expansion of interests and opportunities abroad. See also Jerry Israel, *Progressivism and the Open Door* (Pittsburgh, 1971), and Carl P. Parrini, *Heir to Empire* (Pittsburgh, 1969).

1921–1933

United States foreign relations after World War I used to be dismissed as little more than a story of isolation, a less than honorable period in the nation's history when it abdicated its responsibility in the world arena. This view has been steadily undermined by scholarly publications since the 1960s, and today it is much more common among historians to stress continuities rather than discontinuities between wartime diplomacy and the foreign affairs of the 1920s. For a good survey of this topic, the best place to start is Warren I. Cohen, *Empire Without Tears* (New York, 1987), a scholarly synthesis and a comprehensive survey. Further factual details on American-European relations, particularly on the thorny debt question, are provided by Melvin Leffler, *The Elusive Quest* (Chapel Hill, 1979), and Frank Costigliola, *Awkward Dominion* (Ithaca, 1984). As the titles of these books suggest, there was something tentative about American involvement in postwar European affairs, but one could argu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much more self-confident and less hesitant in its relations with other parts of the globe.

A great deal has been written on postwar America's role in stabilizing Asian-Pacific affairs.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 the point of departure, is well analyzed by Roger Dingman, *Power in the Pacific* (Chicago, 1976). More critical assessments of the disarmament initiatives of the interwar period are offered by Robert E. Osgood, *Ideals and Self-Interest i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Chicago, 1953),

and Betty Glad, *Charles Evans Hughes and the Illusions of Innocence* (Urbana, Ill., 1966). For the London Conference of 1930, see Raymond O'Connor, *Perilous Equilibrium* (Lawrence, Kans., 1962). On the response to the growth of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Nationalists as the new leaders in China, see Akira Iriye, *After Imperialism* (Cambridge, Mass., 1965); Dorothy Borg,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1947); Paul A. Varg, *Missionaries, Chinese, and Diplomats* (Princeton, 1958); L. Ethan Ellis, *Frank B. Kellogg and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New Brunswick, N.J., 1961); and Russell D. Buhite, *Nelson T. Johnson and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East Lansing, Mich., 1968). Warren I. Cohen, *The Chinese Connection* (New York, 1978), is a study of three Americans representing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interests in China.

On Latin American relations, Bryce Wood, *The Making of a Good Neighbor Policy* (New York, 1961), is still useful as a history of the redefinition of the Monroe Doctrine in the 1920s, as is Alexander DeConde, *Herbert Hoover's Latin American Policy* (Stanford, 1951). Responses to Mexico's radical nationalism are given a masterful treatment in Robert Freeman Sm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Revolutionary Nationalism in Mexico* (Chicago, 1972). The continued intervention in Nicaragua is discussed in William Kamman, *A Search for Stability* (Notre Dame, Ind., 1968). On the overall commercial links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America, see Joseph Tulchin, *Aftermath of War* (New York, 1971).

American relations with Bolshevik Russia are a story in themselves – or, one could say a nonstory in that there was no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governments. But there were commercial interactions and, besides, Americans of all political persuasions were fascinated by the Soviet experiment. These developments are described in such books as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American-Russian Relations* (New York, 1952); Joan Hoff Wilson, *Ideology and Economics* (Columbia, Mo., 1974); and Peter G. Filene, *Americans and the Soviet Experiment* (Cambridge, Mass., 1967).

There is much interesting work on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foreign affairs during the 1920s. Warren I. Cohen, *The American Revi-*

sionists (Chicago, 1967), studies the controversy on the origins of World War II; 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New York, 1988), offers an intriguing account of the impact of that controversy on historians; and Selig Adler, *The Isolationist Impulse* (New York, 1957), while more traditional in interpretation, contains much valuable information on American opinion in the interwar years. Robert D. Schulzinger, *The Wise Men of Foreign Affairs* (New York, 1984), looks at the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established in 1921 as an elite organization to influen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same author's *The Making of the Diplomatic Mind* (Middletown, Conn., 1975) describes what may be termed the official ideology of the period concern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increasingly active peace movement in postwar America is treated extensively in Charles Chatfield, *For Peace and Justice* (Knoxville, 1971). See also Charles DeBenedetti, *Origins of the Modern American Peace Movement* (Millwood, N.Y., 1978), and Robert H. Ferrell, *Peace in Their Time* (New Haven, 1952). This latter focuses on the making of the Kellogg-Briand Pact of 1928. Slightly different in character but essential reading for understanding American attitudes in the interwar years is John P. Diggins, *Mussolini and Fascism: The View from America* (Princeton, 1972). It not only shows how Americans responded to the rise of fascism in Italy but how they defined their mental universes at a time of steady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penetration among nations.

Economics was a crucial medium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920s, and its importance is reflected in such standard works as Herbert Feis, *The Diplomacy of the Dollar* (Baltimore, 1950); Joan Hoff Wilson, *American Business and Foreign Policy* (Boston, 1971); and Joseph Brandes, *Herbert Hoover and Economic Diplomacy* (Pittsburgh, 1962). The collapse of economic diplomacy that came with the Depression is the subject of Ferrell, *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New Haven, 1957). For a penetrating discussion of the structural problems in the global economic system during the 1920s with its heavy dependence on the United States, consult 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Berkeley, 1973).

Japan's invasion of Manchuria, the first overt challenge to world order during the Depression, has been a subject of numerous stud-

ies. In the context of U.S.-Japanese relations, an excellent account, besides Ferrell's *American Diplomacy,* is Christopher Thorne, *The Limits of Power* (New York, 1973). See also Armin Rappaport, *Henry L. Stimson and Japan* (Chicago, 1973); Gary Ostrower, *Collective Insecurity* (Lewisburg, Pa., 1979); and Justus Doenecke, *When the Wicked Rise* (Lewisburg, Pa., 1984). Rappaport's book takes a harshly critical view of Stimson's foreign policy, the others much less so. The best study of Japan's decision for continental expansionism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is Michael Barnhart, *Japan Prepares for Total War* (Ithaca, 1987).

1933–1939

The period between 1933, when Franklin D. Roosevelt entered the White House, and 1939, when World War II began in Europe, has not been as extensively studied by historians in the recent decades, in part because they have tended to focus on the New Deal and other domestic developments, and also because the nation's foreign affairs were much more circumscribed during those years than earlier. Still, many interesting works exist and help us explore how the United States, going through an unprecedented economic crisis, coped with serious world problems ranging from Japan's aggressive war in China to Nazi Germany's repudiation of the Versailles peace settlement.

Lloyd C. Gardner, *Economic Aspects of the New Deal Diplomacy* (Madison, 1964), examines the efforts of Secretary of State Cordell Hull and others to solve the acute economic crisis at home through reestablishing an orderly system of multilateral trade. See also Frederick C. Adams, *Economic Diplomacy* (Columbia, Mo., 1976). On the impact of the Depression on American opinion, especially the rise of extremism with obvious implications for foreign relations, see Alan Brinkley, *Voices of Protest* (New York, 1982), and Geoffrey S. Smith, *To Save a Nation* (New York, 1973).

The isolationist bent of American public and congressional opinion during much of the 1930s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phenomenon. We must realize, however, that it was filled with contradictions. One person's isolationism could mean another's interventionism. The various shades of isolationist thought are lucidly analyzed

by Manfred Jonas, *Isolationism in America* (Ithaca, 1966). On congressional isolationists, the best study is Wayne S. Cole, *Roosevelt and the Isolationists* (Lincoln, Neb., 1983). Cole has devoted his career to the study of isolationism and published many other important works, including *Gerald P. Nye and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Minneapolis, 1962) and *Charles A. Lindbergh and the Battle Against American Intervention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1974). The congressional enactment of neutrality laws is given authoritative treatment in Robert A. Divine, *The Illusion of Neutrality* (Chicago, 1962). On the persistence of pacifist opinion, see Lawrence S. Wittner, *Rebels Against War* (New York, 1969).

Despite America's self-imposed isolation, external events mercilessly intruded upo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forced the policymakers to respond. President Roosevelt's thinking, in which he had to weigh domestic opinion as well as the threat to world peace, is carefully traced in Robert Dallek,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1979). Readers interested in Roosevelt's foreign policy should first turn to this book and then supplement it with other studies of specific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For instance, on U.S. responses to various initiatives undertaken by Nazi Germany, the best account is found in Arnold A. Offner, *American Appeasement* (Cambridge, Mass., 1967). See also J. A. Compton, *The Swastika and the Eagle* (Boston, 1967). On German propaganda activities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see Alton Frye, *Nazi Germany and the American Hemisphere* (New Haven, 1967).

The uneasy state of U.S.-British relations in the 1930s is well described in Offner's book. The fascinating question of how, despite such uncertainty, even profound mistrust at times between Washington and London, there eventually emerged a cooperative framework for dealing with German and Japanese aggression, is discussed in two excellent books: James R. Leutze, *Bargaining for Supremacy* (Chapel Hill, 1977), and David Reynolds, *The Creation of the Anglo-American Alliance* (Chapel Hill, 1981). See also Ritchie Ovendale, *"Appeasement" and the English Speaking World* (Cardiff, 1975). Concerning Fascist Italy, there is, in addition to the previously noted book by Diggins, Bryce Harr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talo-*

Ethiopian Crisis (Stanford, 1964). On the turmoil of 1931–9 and American responses, among the most useful works are Douglas Little, *Malevolent Neutrality* (Ithaca, 1985), and Richard Traina, *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Bloomington, Ind., 1968).

On Latin American policy, in addition to the book by Frye, one may consult E. D. Cronon, *Josephus Daniels in Mexico* (Madison, 1960); Irwin Gellman, *Roosevelt and Batista* (Albuquerque, 1973); the same author's *Good Neighbor Diplomacy* (Baltimore, 1979); and Joseph Tulchin, *Argent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oston, 1990). On the Asian crisis, the best study remains Dorothy Borg,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 (Cambridge, Mass., 1964). The book chronicles America's failure to come to the aid of China until very late in the 1930s. The same theme is treated from various angles in two collections of scholarly essays: Dorothy Borg and Shumpei Okamoto, *Pearl Harbor as History* (New York, 1973), and Akira Iriye and Warren I. Cohen, *American, Chinese, and Japanese Perspectives on Wartime Asia* (Wilmington, Del., 1990). These volumes are useful as they contain contributions by Chinese and Japanese, as well as American, scholars. James C. Thomson, *While China Faced West* (Cambridge, Mass., 1969), discusses America's difficulties in assisting China because of the Depression. The decision to reverse the trend and to come to the support of China during 1938–9 is ably described in Michael Schaller, *The U.S. Crusade in China* (New York, 1979). For a survey of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at led to the Pacific war, see Akira Iriye,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London, 1987). One American diplomat's heroic endeavor to preserve the peace with Japan is detailed in Waldo Heinrichs, *American Ambassador* (Boston, 1966), a biography of Joseph C. Grew. Sandra Taylor, *Advocate of Understanding* (Kent, Ohio, 1984), offers a portrait of a former missionary, Sidney Gulick, who struggled for the same end.

Although the Soviet Union would emerge as a key factor in U.S. dealings with Japan as well as with Germany, there has been little systematic study of U.S. relations with Moscow, probably because historians have not had time to digest the mass of archival documents that have been opened up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But Robert C. Tucker, *Stalin in Power* (New York, 1990), does make use of these documents and gives a sinister portrait of the Soviet dicta-

tor's opportunistic diplomacy.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the Comintern's call in 1935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global antifascist front, an event that held real significance for a large number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s, one may profitably turn to personal reminiscences such as Malcolm Cowley, *The Dream of the Golden Mountains* (New York, 1980).

1939–1945

The best account of the coming of World War II in Europe is D. C. Watt, *How War Came* (London, 1989). The way in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became steadily drawn into the European conflict during 1939–41 is chronicled in detail in William L. Langer and S. Everett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New York, 1953). On Roosevelt's growing readiness to support Britain by all means short of war, see, besides the works by Dallek and Reynolds cited in the previous section, James M. Burns, *Roosevelt: The Soldier of Freedom* (New York, 1970); Theodore A. Wilson, *The First Summit* (Boston, 1969); and Warren F. Kimball, *The Most Unsordid Act* (Baltimore, 1969). This last is an important study of the making of the Lend-Lease Act. Its application to the Soviet Union after June 1941 is described in Raymond H. Dawson, *The Decision to Aid Russia* (Chapel Hill, 1959), and George C. Herring, *Aid to Russia* (New York, 1973). The American public's increasing willingness to help the democracies against Nazi Germany is documented in such works as Mark L. Chadwin, *Warhawks* (New York, 1968); Walter Johnson, *The Battle Against Isolation* (Chicago, 1944); and James C. Schneider, *Should America Go to War?* (Chapel Hill, 1989). On the less well known aid to France, which also began around 1939, consult Julian Hurstfield, *America and the French Nation* (Chapel Hill, 1986).

There is an enormous amount of scholarly literature on "the road to Pearl Harbor." The standard "orthodox" presentation is Herbert Feis, *The Road to Pearl Harbor* (Princeton, 1950), and the most extreme "revisionist" interpretation – that the Roosevelt administration was engaged in a conspiracy to maneuver the Japanese into firing the first shot so that the United States might enter the war in

Europe through the Asian "back door" – is in Charles C. Tansill, *Back Door to War* (Chicago, 1952), and Charles A. Beard, *President Roosevelt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 (New York, 1948). Most studies reject the conspiracy theory but add many nuances to the story climaxing in the Pearl Harbor attack. The role of the Axis pact in the deteriorating U.S.-Japanese relations is analyzed critically in Paul W. Schroeder, *The Axis Alliance and 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 (Ithaca, 1958), and Saul Friedlander, *Prelude to Downfall* (New York, 1967). The crucial petroleum question as a determining factor is discussed in Irvine H. Anderson, *The Standard Vacuum Oil Company and United States East Asian Policy* (Princeton, 1975). The story is brought up to date in an excellent chapter in Yergin's *The Prize* (New York, 1991). See also Jonathan G. Utley, *Going to War with Japan* (Knoxville, 1985). The Washington "conversations" of 1941, in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sought to avoid a final showdown, are ably presented in Robert Butow, *The John Doe Associates* (Stanford, 1974). See also the same author's *Tojo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 (Princeton, 1961). By far the best account of the U.S.-Japanese crisis in the summer and fall of the year is Waldo Heinrichs, *Threshold of War* (New York, 1988). The book stresses Roosevelt's concern with preventing Soviet collapse as the main factor behind his get-tough policy toward Japan.

Among the voluminous literature on the Pearl Harbor attack, the most detailed and reliable is Gordon W. Prange, *At Dawn We Slept* (New York, 1981). See also the same author's *Pearl Harbor: The Verdict of History* (New York, 1986). The influential book by Roberta Wohlstetter, *Pearl Harbor: Warning and Decision* (Stanford, 1962), argues that it was the volume of the cable traffic that created confusion in official Washington and made it impossible to communicate relevant messages to the commanders in Hawaii in time to avert the disaster.

Thousands of books have been written on American strategy and diplomacy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best brief summary is Gaddis Smith, *American Diplomac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1985). On overall strategy, see Maurice Matloff and Edwin M. Snell,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Washington, D.C., 1953). There are two excellent studies of military preparedness and mobil-

ization undertaken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Alan S. Milward, *War, 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1977), and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1987).

The Anglo-American alliance is best understood by reading the letters exchanged between the two wartime leaders, ably edited by Warren F. Kimball: *Churchill and Roosevelt* (Princeton, 1984).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big three, Herbert Feis, *Churchill, Roosevelt, Stalin* (Princeton, 1957), is still useful, but it should be supplemented by Martin Sherwin, *A World Destroyed* (New York, 1975),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weapons and of their implications for postwar world affairs. Diana Clemens, *Yalta* (New York, 1970), shows that there was as much U.S.-Soviet agreement as disagreement at the 1945 conference.

Because the latter part of the war was also the period of preparation for the defining of the postwar world, and because the postwar world was to be characterized by the breakup of the wartime alliance into two camps, many accounts of World War II are also, in effect, descriptions of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in tracing this transition in Europe are William H. McNeill, *America, Britain, and Russia* (London, 1953); John W.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1972); Daniel Yergin, *The Shattered Peace* (Boston, 1977); Vojtech Mastny, *Russia's Road to the Cold War* (New York, 1979); and Lynn E. Davis, *The Cold War Begins* (Princeton, 1974). Hugh DeSantis, *The Diplomacy of Silence* (Chicago, 1980), is unique in its focus on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s'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the Soviet Union. Also see, in this connection, Ralph Levering, *American Opinion and the Russian Alliance* (Chapel Hill, 1976).

On the Pacific theater of the war, Christopher Thorne, *Allies of a Kind* (New York, 1978), offers a fascinating account of Anglo-American cooperation as well as differences over such matters as the future of China and of the British Empire. Akira Iriye, *Power and Culture* (Cambridge, Mass., 1981), suggests areas of convergence in official American and Japanese wartime thinking. On China's role in the war, see Barbara Tuchman,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New York, 1971). The subtle ways in which the Asian war developed into an Asian Cold War is treated in such works as Her-

bert Feis, *Dilemma in China* (Hamden, Con., 1980); Russell Buhite, *Patrick J. Hurley and American Relations with China* (Ithaca, 1973); Kenneth Shewmak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Communists* (Ithaca, 1971); Marc Gallicchio, *The Cold War Begins in Asia* (New York, 1988); 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Chicago, 1963); Akira Iriye, *The Cold War in Asia* (New York, 1974); and the essays contained in Yōnosuke Nagai and Akira Iriye,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Tokyo, 1977). Frank Ninkovich, *The Diplomacy of Ideas* (New York, 1981), offers interesting observations on wartime American cultural diplomacy in China and elsewhere.

Because of the global character of the war, no part of the world escaped American attention and influence. Some flavor of the way in which the nation's military presence became intertwined with the destiny of people everywhere may be gathered by reading such books as Gary Hess, *America Encounters India* (Baltimore, 1971); Martin W. Wilmington, *The Middle East Supply Centre* (Albany, 1971); Arthur L. Funk, *The Politics of TORCH* (Lawrence, Kans., 1974), a study of the occupation of North Africa; and Donald M. Dozer, *Are We Good Neighbors?* (Gainesville, Fla., 1959), which recounts the activities of American airmen in Brazil and other countries.

What did World War II mean to the American people? The question has been examined from various angles. Paul Fussell, *Wartime* (New York, 1989), looks at the war from the common soldier's perspective. John Dower, *War Without Mercy* (New York, 1986), examines wartime stereotypes of the Japanese enemy. Robert A. Divine, *Second Chance* (New York, 1971), is an excellent study of the "new internationalism."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during the war are described in John Morton Blum, *V Was for Victory* (New York, 1976); Richard Polenberg, *War and Society* (Philadelphia, 1972); Richard Darilek, *A Loyal Opposition in Time of War* (Westport, Conn., 1976); and Martin Melosi, *The Shadow of Pearl Harbor* (College Station, Tex., 1977).

On planning for the enemy's surrender and occupation by the allies, Harley Notter, *Postwar Foreign Policy Preparation* (Washington, D.C., 1949), provides essential raw material from the minutes of numerous State Department meetings. Regarding the treatment of defeated Germany, see Tony Sharp, *The Wartime Alliance and the*

Zonal Division of Germany (Oxford, 1975). On Japan, Frederick Dunn, *Peacemaking and the Settlement with Japan* (Princeton, 1963), is useful. The best study of the important Bretton Woods Conference is Richard N. Gardner, *Sterling-Dollar Diplomacy* (New York, 1980). See also Alfred Eckes, *A Search for Solvency* (Austin, Tex., 1975). On the dropping of the atom bomb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American policy and opinion, see, besides Sherwin's *World Destroyed*, mentioned earlier, Herbert Feis, *The Atomic Bomb and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Princeton, 1961), Leon Sigal, *Fighting to a Finish* (Ithaca, 1988), and Paul Boyer, *By the Bomb's Early Light* (New York, 1985).



第四卷

苏联强权时期的美国

1945-19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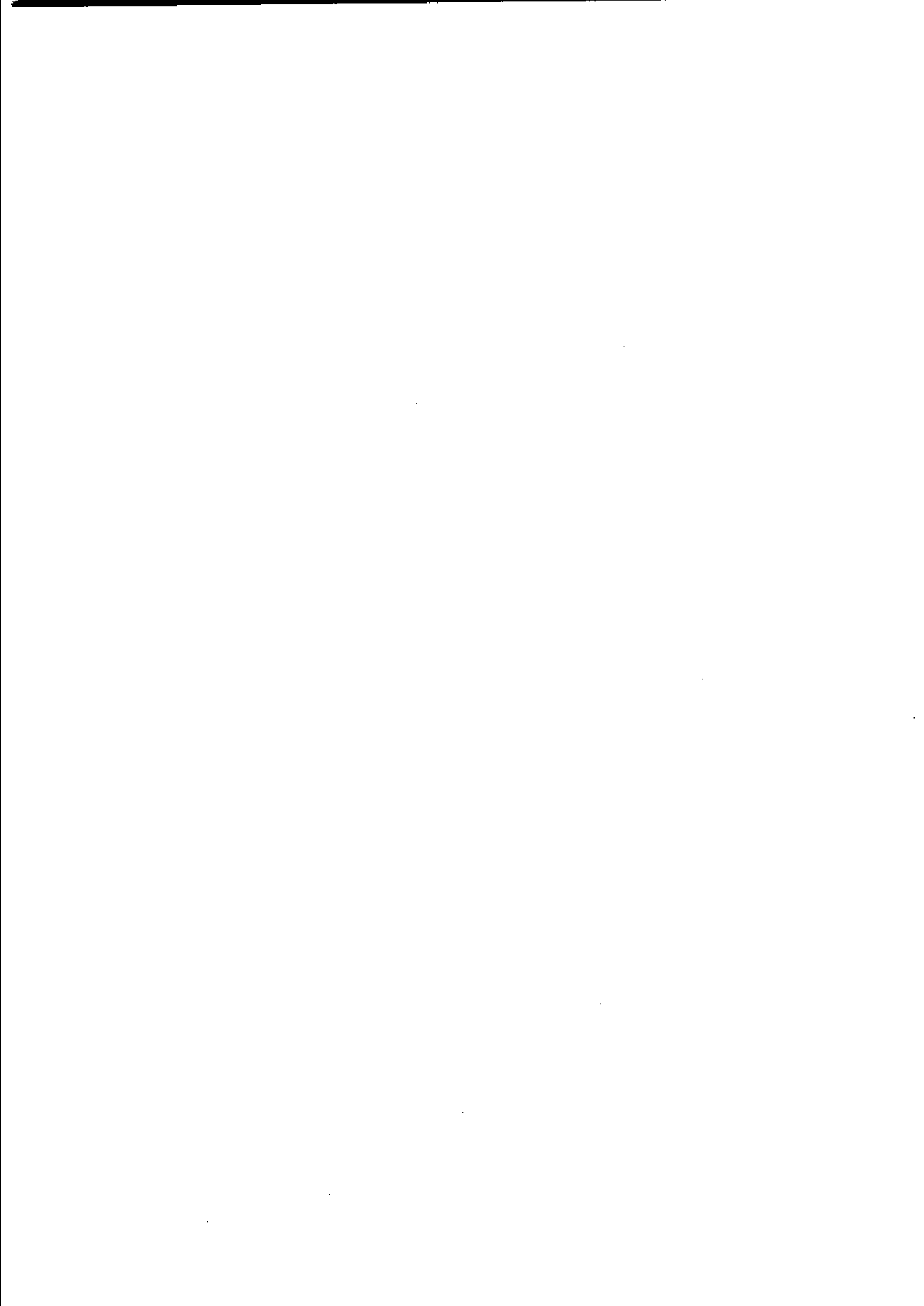
Volume IV

America in the Age of Soviet Power

Warren I. Cohen

【美】孔华润（沃伦·I. 科恩）／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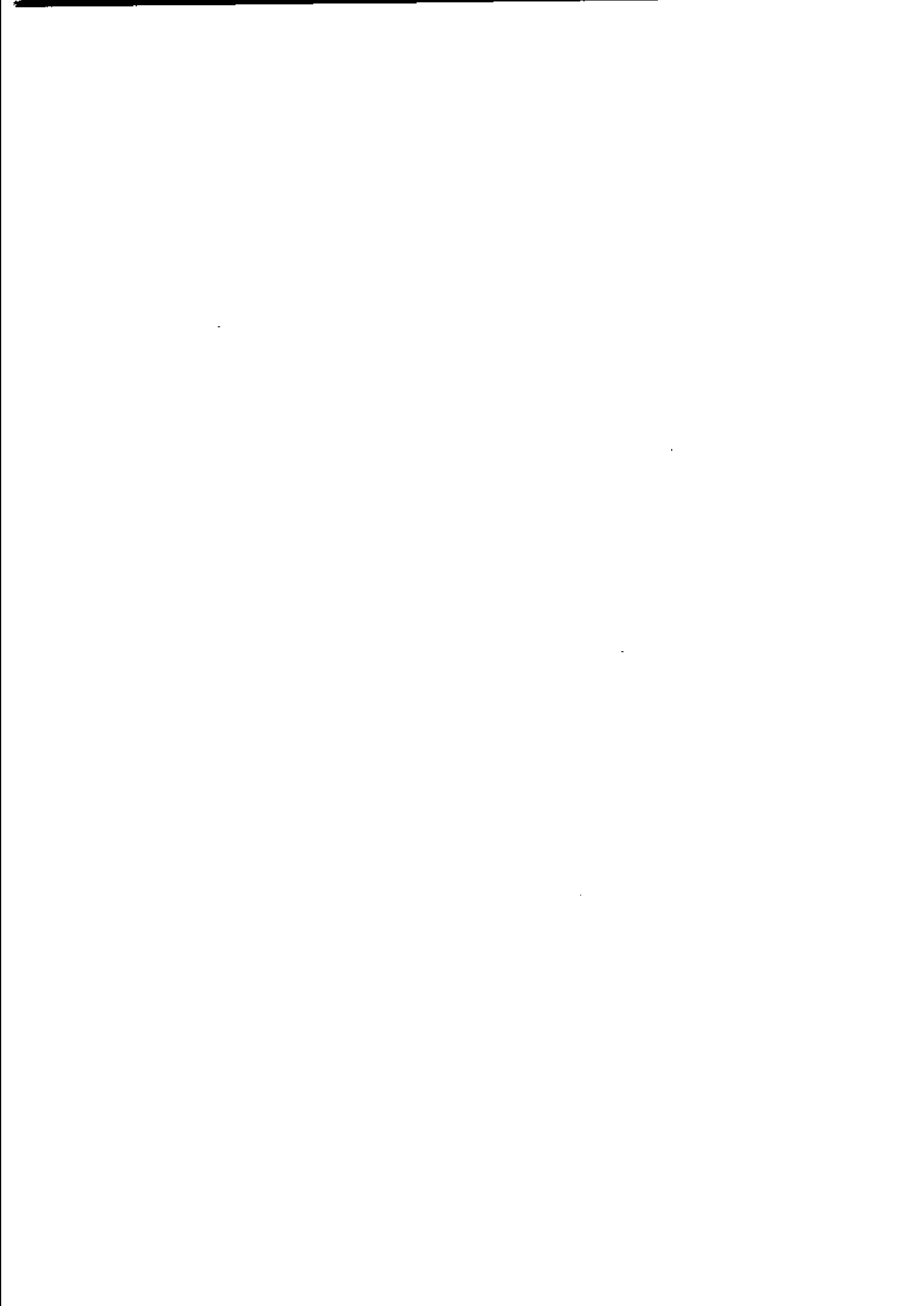
王琛／译



内容提要

《苏联强权时期的美国（1945—1991）》是冷战结束后研究美苏对抗的起源以及该对抗由欧洲中心舞台向第三世界的边缘地区、特别是东亚和中东扩展的首部著作。该书探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国际体系的状态、美国领导世界的决心以及两个超级大国在彼此之间所造成的“安全困境”。

虽然孔华润教授从体系的角度来诠释美苏冲突，但是，在叙述这种对抗过程的时候，他指出了斯大林主义国家及其秘密统治和残忍独裁的本性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他还认为，美国政治制度的特性、权力制衡和利益集团的作用，致使美国领导人得以夸大来自海外的危险，并借以提升他们在国内的权力。借助中国和苏联近年来公布的资料，孔华润教授对两国在朝鲜战争、20世纪50年代台湾海峡危机和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行动作出了新的阐释。他关于越南战争的章节无疑是那场悲剧对抗的最好的简明史。作者揭示了20世纪70年代的缓和兴衰，描述了帝国的过度扩张怎样使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和苏联都深受其害，最后，作者对冷战于世界的意义以及“胜利”对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影响进行了思考。该书包括一篇述及这一时期美国对外关系大量史学作品的重要参考文献短论。



致谢

首先，我要感谢入江昭、沃尔特·拉夫伯和布拉福德·珀金斯加入我这个写作计划，感谢弗兰克·斯密斯和马丁·迪尼兹自始至终给予的指导。前三位阅读了我的手稿，并提出了修改建议，其中一些使我受益匪浅。作为我作品的经常的评论者，唐·拉默斯以一位伟大导师的耐心展示了他那惯常的作用。梅尔·莱弗勒和南希·B. 塔克极为认真地审查了初稿，但是，他们的努力未能使我却步。梅尔可能永远都不会理解迪安·艾奇逊或美国对华政策。南希也只能接受我的执着。

该书的大部分工作是我在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一年公休假期中完成的。感谢密歇根州立大学在我 30 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所给予的持久不懈的支持。我还要特别感谢文学院院长约翰·伊迪和历史系主任戈登·斯图尔特，前者尽可能地提供帮助，使我数年来能轻易地往返于东兰辛和华盛顿之间，后者则对我经常的请假表示了宽容。

1990—1991 年，我以研究员身份在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从事研究工作，在那里，我得到了玛丽·布洛克、罗布·利特维克、萨姆·韦尔斯和林赛·柯林斯的眷顾，他们提供了一个人希望从驻所项目中得到的全部支持。1991 年 6 月，瑟戈·米高扬对我在中心提交的一篇论文的评价于我也极有助益。

此类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许多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著

述，就本书而言，其中的大多数在我的注释和参考文献短论中均有提及。这些年来，我与许多本书所提及的学者以及英国、中国、德国、日本、韩国和苏联的同行在许多国际会议上进行了交流，使我颇受教益。我还同样受益于我的学生，卿斯美的建议大概使这部书稿的完成时间延长了一年。

最后，使人痛惜的是，就在书稿修改告竣之日，我失去了最忠实的读者和最儒雅的批评家——我的叔父拉斐尔·阿维恩。

前言

20世纪40年代后期标志着记者和政治哲学家沃尔特·李普曼在1947年所说的“冷战”——美苏之间日益升级的对抗——的开始。[①] 作为对直至1989年或1990年的美苏关系的一种简洁描述以及作为对这一时期美国大部分对外政策的一种阐释，该术语还在使用。冷战的最后关头是德国的重新统一，那两年的事件表明，苏联放弃了许多它奋斗得来的成果，使美国得以宣称自己为胜利者，也推动着美国领导人去寻找一种新的逻辑依据，以便继续行使或滥用美国的财富和权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45年夏季结束，而朝鲜战争则在1950年夏季开场。美国和苏联利用此中5年的多数时光来界定它们的战后关系。两国都在追寻它们自己的世界秩序的梦想，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探寻着合作的可能性，在追求其独享目标的时候考验着对方的忍耐限度。双方都在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去填补因德日战败和英国衰落而出现的权力真空。每一方都找到了重要的盟友，虽然世界其他许多地区并非如华盛顿和莫斯科的领导人想象的那样顺从。尽管如此，两国还是成功地实现了各自的大部分主要目标，大致解决了使之分道扬镳的主要问题，在一个为核毁灭

① “冷战”一词的首次使用通常归功于赫伯特·贝亚德·斯沃普，一位为伯纳德·巴鲁克工作的共和党人。

所笼罩的世界里，两国为自己求得了不管怎么说总算是过得去的安全。它们之间维持了一种和平，尽管这种和平令人焦虑，但其中并不存在多大的威胁。而且，设若苏联在朝鲜的冒险没有加剧那些美国领导人——他们坚信的基本对策是为军事解决美苏分歧而未雨绸缪——的忧虑并强化他们的说辞，在20世纪50年代及其以后，他们也许会很好地致力于国内急需的改革。

第一章　战争即将结束：新世界秩序的展望

1944年，盟军重返法国，从诺曼底海滩向内地挺进。在华盛顿，富兰克林·D. 罗斯福总统感到德国的战败即将来临，日本的垮台也为时不远了。他和政府内外的其他领导人的思虑都迅速地转向了战后的世界：他将给美国人民留下什么遗产？他和助手们如何保证一个持久的和平与一个繁荣的美国？从以往的失败、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些失败——未能阻止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灾难与侵略暴行中——能汲取什么教训？

罗斯福及其同僚期待美国从战争中崛起，进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在此次战争之后，他们决心要领导世界。这一次，他们要创建一种可以增进美国利益的世界秩序，使美国不仅能够提升自己的财富和权势，也可以将其价值观推展到世界的任何角落。美国不能再次规避大国的责任，而应该提供一种创建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以自由贸易和稳定的货币汇率为基础——所必需的领导权，创造一种世界各民族闻所未闻的繁荣。美国还必须领导世界，以阻止德日强权的复活，防止可能效法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其他强权的崛起。

值得注意的是，罗斯福把具体工作、特别是专门的经济问题留给了他人。在他的经济顾问中，天平已经从在1933年的黑暗岁月里起支配作用的民族主义分子转向国务院的科德尔·赫尔和财政部的亨利·摩根索一边。赫尔、摩根索及其助手们醉心于启

蒙时代法国哲学家的观念，正如伍德罗·威尔逊所阐释的：经济民族主义导致战争；市场和原料的自由流动则可消除通往和平的主要障碍。20 世纪 30 年代那种损人自肥的行为和纳粹实施的经济战给人类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其中有许多在战争打响之前就已经显露无遗。

早在 1936 年，赫尔与摩根索已经着手调整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方向，向货币汇率方面的合作和非歧视性的贸易模式转变。他们引领美国与英法达成了稳定币值的三边协议，而这正是罗斯福在 1933 年抛弃的方针。赫尔签订的互惠贸易协定的宗旨基本相似，那就是推动门户开放和拓展国际贸易。

1941 年 8 月，正值罗斯福和丘吉尔制定《大西洋宪章》——对那些抗击希特勒的人们的目标所作的公开和雄辩的表述——的时候，他们的助手则在下面交锋，美国官员竭力向他们穷途末路的英国朋友施压，以迫使其放弃在英帝国内眷顾英国贸易和歧视它国的帝国特惠制度。无独有偶，在谈判 1942 年的美英互助协定或"租借"协定的条款时，美国代表无情地把英国哀求者进一步推向赫尔与摩根索决意创制的多边与非歧视的战后经济秩序之中。[①]

美国梦的光辉顶点在 1944 年的布雷顿森林（新罕布什尔州）会议上展露无遗。那年 7 月，44 个国家的代表通过了一个有关战后金融体系的纲领。美国官员，特别是罗斯福、财政部的摩根索及其主要副手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把会议及其谋取的各项协议视为战后大同盟得以运转的经济基础。正如对希特勒的恐惧使他们在战争中走到一起那样，作为战后世界经济秩序共同利益

① 罗伊·F. 哈罗德：《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生平》（纽约，1951 年），第 510—514 页；理查德·N. 加德纳：《英镑—美元外交》（增补版，纽约，1969 年），第 40—53、56—68 页；加布里埃尔·科尔科：《战争之政治》（纽约，1968 年），第 248—250 页。

之所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将在和平时期把大不列颠、苏联和美国结为一体。由于英镑与美元同属国际贸易的基本货币，所以，美国人认为，作为世界主要贸易商的英国人的合作是不可或缺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很快就成为代表美国的怀特和代表大不列颠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之间的一场谈判。苏联官员也参与其中，但是，苏联一向致力于国家对贸易的控制，他们与其说对协议细节感兴趣，还不如说是为了展示大国地位，表达通过与盟国合作解决贸易和货币问题——国际关系紧张的根源——的意愿。由于非常希望苏联人参加谈判，怀特就时常对他们迁就让步，然而，苏联人却一直站在这场以美英为主角的演出舞台的边缘。[①]

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建立确保汇率稳定的机制，以促进国际贸易的扩张。与会者创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便在会员国的国际收支——由出口、服务、观光、汇款等收入的现金与商品或服务的进口、国民的海外旅行和投资等支出现金之间的差额——出现赤字时提供援助。另一个机构是后来被称为世界银行的复兴开发银行，目的是在私人银行家不愿参与的情形下提供贷款或者为贷款担保。还有，在会议视野之外，设计者展望了一个将逐渐消除限制性贸易行为的国际贸易组织。作为世界最富庶的国家，美国的经济已从大萧条中复兴，在战争期间又展现了惊人的生产能力，它将为这些机构提供所需的大量资金，而且对其活动保持与之相称的控制权。无论在华盛顿还是在海外，人们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服务美国长远利益的初衷已不再有任何疑问，至少在当时控制华盛顿的经济势力联合而成的新政联合阵线（the New Deal coalition）看来正是如此。然而，一般来说，其他国家

---

① 理查德·N. 加德纳：《英镑—美元外交》，第 11—12 页；艾尔弗雷德·E. 埃克斯：《探求清偿能力——布雷顿森林与国际货币体系（1947—1971）》（得克萨斯州奥斯丁，1975 年），第 139—164 页；罗伊·F. 哈罗德：《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生平》，第 525—585 页。

的领袖打消了此前的疑虑，接受了这样的思想：这个体系造福美国时也同样造福世界，而且世界将从美国所致力承担的责任和慷慨的领导中饱受其利。虽然凯恩斯勋爵的希望与此相当不同，但他对会议的结果并不感到苦恼。

另一方面，凯恩斯和怀特、其他与会的策划者、以及未能受邀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见多识广的银行家和经济学家，都深知这种新的自由主义国际贸易秩序的建立在战争结束后不可能一蹴而就。他们代表自己的国家就上述目标作出承诺，但是他们认为，该目标将只有在满足了重建的紧急需求后才能实现。回头看看，美国人至少低估了战争给英国经济带来的损害，低估了战后重建的主要问题和所需费用，低估了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也低估了决意要摧毁保护主义结构的国际贸易组织所面临的阻力，这似乎是没有疑问的。当然，在这些人之中，有很少几位——如果有的话——曾经设想，在启动任何类似于完全意义的货币自由兑换的工作之前，时光可能已经转到 1958 年了，而且，甚至到那时候，世界上也只有这一部分地区能指望得到美国的保护。

罗斯福、赫尔和摩根索非常清楚，他们的多边自由贸易计划将面临国内的反对，政府进一步干预经济事务将令自由企业制度的卫道士们愤愤不已，政府争夺海外贷款将使银行家们忧心忡忡，受保护的工业、特别是长期以来已失却竞争优势的工业部门，也将反对贸易自由化，它们很可能会得到一些工会组织的大力支持，对美国卷入世界事务深感不安的民众将不愿接受既定的美国领导地位。确切地说，布雷顿森林协定是一个先发制人的经典案例，因为就在反对力量行动之前，它就试图使美国承担其久已渴望的角色和领导一个非同寻常的国际经济体制。虽然美国权势遍及世界，美国政府却易受国内特殊利益集团的阻挠，因为它们各有一套自诩能最好地服务于这个国家的理念。的确，罗斯福及其同僚无论多么成功地将其国际经济秩序之梦赋予美国，他们

也未能就创建一个国际贸易组织说服国会，而且只能满足于比他们曾经希望的更少的资金和更少的利他主义。[①]

虽然他们的成功是不彻底的，其时间表也是错误的，但是，随着布雷顿森林协定在1945年12月基本上为国会批准，美国领导人成功地启动了他们构想的新世界秩序——以历史学家迈克尔·J. 霍根所称的“新政合题”（the “New Deal synthesis”）为基础——的建设工作。[②] 他们击退了经济民族主义的强大势力，使许多贸易国家加入了这个自由主义计划。各国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增加贸易、提升产能和更多地造福个人，而不再为重新分配现有财富而诉诸战争。政府、工商企业和劳工阶级将为实现该新秩序而共同努力。当批准该协定的最后期限到来时，苏联缩了回去，然而，它的贸易量无足轻重，它对布雷顿森林体制也一直提不起兴趣，其缺席虽令人遗憾，但还不至于对这个组织造成多少伤害。

如果说罗斯福把许多经济计划托付给几个次要官员，他自己却投身于战后世界的政治和战略安排，尽管对此中细节的关注亦非其所长。罗斯福确信，美国、英国和苏联这些大国对世界的共同统治是维持和平与防止未来侵略的基础。他对联合国、对一个国际组织承担义务，主要是为了安抚公众舆论和他身边的威尔逊主义者，展示美国加入和领导战后世界的意愿，但是，他对三巨头难以合作的前景并无多少幻想。罗斯福清楚英国面临的困难：凯恩斯在保护英镑和英国市场时拒不退让，丘吉尔在受到殖民地自由化刺激时的表现也丝毫不逊于前者。但是，两人之间建立了

① 艾尔弗雷德·E. 埃克斯：《探求清偿能力——布雷顿森林与国际货币体系（1947—1971）》，第165—202页；约翰·H. 威廉斯：《战后金融计划及其他尝试》（纽约，1947年）；理查德·N. 加德纳：《英镑—美元外交》，第129—144页。

② 迈克尔·J. 霍根：《马歇尔计划》（坎布里奇，1990年），第12—18页。

一种私人友谊，其国人亦深受同源之共同价值观念的影响。斯大林与苏联比谜更难以捉摸。苏联和美国的政治家仍在极为小心地兜圈子，他们在经历一代人之久的敌视——希特勒曾迫使他们将其一度掩藏起来——之后仍然疑心重重。虽然如此，苏联和美国没有生死攸关的利害冲突，胜利后的合作几乎是刻不容缓的，而且，罗斯福对他和斯大林找出一条维持合作的道路充满了信心。[①]

当1943年11月三巨头聚首于德黑兰的时候，而且在整个1944年，斯大林的焦虑是确凿无疑的，他对一个复活的德国的担忧也显而易见，罗斯福也有斯大林一样的担忧，于是就毫不犹豫地向后者保证，将采取措施防止一个德国强权在战后的复活：德国将被征服、平定、而且可能甚至被肢解。与罗斯福的忧虑相比，斯大林对东欧的安全担忧往最少里说也更让人头痛。当然，他有资格在苏联边境得到一个由友好国家组成的缓冲地带，亦即有人所称的“势力范围”。苏联要求重新安排波兰版图，以德国为代价把这个国家向西推一段距离，以便兼并波兰的部分东部领土，使苏联取得有利地位。这肯定会使波兰人苦恼不已，也同样使科德尔·赫尔与一大帮坚定支持自决原则的其他美国人心烦意乱。但是，如果对地图作出某种适度的重新安排是三大国保持和平的前提，这还不是一个高得不能偿付的代价。当然，尽管罗斯福对双方而言并无此种资格，但是，如果以世界和平之名用德国土地换取波兰领土，他不会有丝毫的犹豫。毫无疑问，波兰人拥有自决的权力，尽管作了小的领土调整，他们依然可能拥有这种

① 罗伯特·达莱克：《富兰克林·D. 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纽约，1979年），第282—284页，第317页之后；赫伯特·菲斯：《丘吉尔、罗斯福与斯大林》（普林斯顿，1957年），第269—279、596—599页。

权力。另一方面，苏联也赢得了安定边界的权力。[1] 罗斯福明白，这不是正确或谬误的问题，而是一个权力相互抵触的情形，而苏联需求要得到优先考虑，尤其在红军承担与希特勒军队作战重任之时，情况就更是如此。

波兰问题给罗斯福提出了一个国内政治难题，但他自认尚能对付。倘若波兰裔美国人断定他背叛了波兰，他们会彻底抛弃民主党，这将危及他 1944 年再次当选的希望，也会损害他的党的前途，更有甚者，这种损害将会持续一代人以上。1919 年，伍德罗·威尔逊在凡尔赛对日本作出了领土让步，空头理论家就借此凶猛地抨击他与他的和平条约。而今他们将故伎重施，不断地骚扰他，阻挠他迈向公正的和平。罗斯福主张，美国应在战后世界秩序中起领导作用，为此，他需要与苏联合作，但是，反对他这一想法的人为一己之私可能会歪曲波兰问题。在德黑兰会议期间及其后的数月里，罗斯福把上述担心告诉斯大林，希望他在处理波兰事务时以美国人民可以接受的方法行事。即使作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强势总统，罗斯福也清楚他面临的种种限制，他需要从朋友那儿获得一些帮助，斯大林明白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罗斯福从政时间是如此之长，以至于不太相信什么确凿无疑的事情，但是他深信，大国在胜利后通过合作可以实现其维持公正和平的梦想。他还相信，他不仅能支配丘吉尔，还能驾驭斯大林。但是，罗斯福也是一位为避免损失而两边下注的谨慎之人。他颁布命令，宣布其亚洲盟友中国为一个大国，可以分享对战后世界的共同管辖权，并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一席之地，不仅如此，正如丘吉尔抱怨的，中国还成为支持美国的“名不符实的一票”。如果英国人不守规矩，中国对亚洲的英帝国主义的敌意对

[1] 约翰·L. 盖迪斯，《美国与冷战的起源》，纽约，1972 年，本书对该问题最具说服力。

美国也许不无裨益。倘若苏联人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样给予足够的合作，罗斯福还另有一手，那就是秘密备用的更为可怕的武器——原子弹。他的一位科学顾问力陈不要把有关原子弹的关键资料送给英国人。还有一次，一群原子科学家提议与苏联分享原子武器的秘密，罗斯福愿意与英国分享情报而对苏联人实施封锁。如果苏联人蜕变到像 1941 年德国军队入侵之前那样令人讨厌，美国还是有办法对付的。[①]

甚至直到今日，我们还远不能确定斯大林的战后世界梦想究竟是什么，也许我们将永远都弄不清楚了。斯大林对美国企望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甚为冷淡，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一点，因为他在那个体系中看不到以计划经济和国家控制贸易为特征的苏联的合适位子。这一体系似乎正隐隐约约地威胁着苏联，但是，在 1947 年之前，斯大林并未表明他对此有多少苦恼。他从 20 世纪 30 年代得到的教训与汇率和关税壁垒并无多少关联，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均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苏联走向独裁专制，甘愿承担风险，在经济上不依附于任何外国势力。的确，英国曾领导资本主义世界顽固地敌视苏联，使其深受损害，而且，由于未能阻止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成功，它们封锁和包围苏联，企图摧毁这个革命政权。最后，苏联的敌人终于放希特勒出笼。尽管精明的斯大林借助与纳粹的条约获得了近两年的时间，但希特勒仍然进攻了苏联，而且危险到几乎推翻苏联政权，致使 2000 多万苏联人丧生，国家惨遭纳粹入侵者蹂躏。英美两国勉强与苏联联手抵抗希特勒，向它提供了适度却必不可少的物资援助。然而，在两年半的时间里，罗斯福与丘吉尔一直拒绝斯大林的在法国开辟第二战

① 加布里埃尔·科尔科：《战争的政治学》，第 218—221 页；罗伯特·达莱克：《富兰克林·D. 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第 389—391 页；马丁·J. 舍温：《一个被毁灭的世界》（纽约，1975 年），第 90 页之后。

场的请求，让苏联军队去面对80%的德国军队。像罗斯福一样，斯大林也看不出加入联合国有什么害处，条件是苏联能在大会中获得多张选票（他认为16票就已经足矣），而且在安理会得到保护其利益的一票否决权。但是他并不愚钝，在维护苏联安全方面，他既不寄希望于新朋友的善意、也不打算依赖联合国的效力。一定要打碎德国的力量，以其财富医治德国军队对苏联的伤害，德国也一定要由盟国占领。正如波兰人、芬兰人和罗马尼亚人交出领土那样，所谓的波罗的海共和国必须交还给俄罗斯帝国。不允许东欧国家成为侵略苏联的新跳板：它们都必须建立惟苏联之命是听的“友好”政府。最理想的是，苏联的南部边境也要以伊朗、阿富汗和亲德国的土耳其为代价作出调整。而且，当苏联军队参与对日作战的时刻到来时，斯大林打算在东亚——不仅在当时的日本帝国，还要在中国——获得缓冲区和基地，只是中国的国共两党对权力的争夺使他颇为不快。斯大林甚至还经常思量着把苏联的影响扩展至非洲，梦想着他那些感激涕零的盟国会把意大利在这个大陆的一些前殖民地作为酬劳奉送给他。[①]

奇怪的是，丘吉尔已被证实比较容易打交道。1944年秋季的一天晚上，他与斯大林坐在桌旁，只用了几分钟，就在东欧势力范围的公平划分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罗斯福则让人难以捉摸，他对苏联的渴望明显给予了更多的同情，甚至提出美苏共谋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可能性，但是，他不愿作出坚定承诺，给苏联在东欧自由行动的权力，他总是滔滔不绝地奢谈那些安抚美国公众舆论的需要，不断戏弄那些反对苏联的波兰人。随后有证据表明，斯大林从苏联情报机构获知，美英正在合作发展一种名为原子弹

① 赫伯特·菲斯：《丘吉尔、罗斯福与斯大林》，第26、510—511、550—555页；罗伯特·达莱克：《富兰克林·D.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第389—391页；威廉·陶布曼：《斯大林的美国政策》（纽约，1982年），第75—82页。

的秘密武器，而罗斯福却对其忠实的盟国苏联丝毫没有提及。由此可知，胜利者之间的战后关系是绝不会令人满意的。是该小心的时候了，无论斯大林多么残酷无情，如果不是一位异常谨慎的人，他也不能在苏联制度下终其一生。

在战争结束前的数月里，东亚地区出现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情势。蒋介石，这位倔强的中国领袖避居于重庆，保存着实力，等待着美国盟友把日本侵略军从他的国土上赶出去。鉴于其政权的存在仍然很成问题，可以想见，较之与罗斯福和丘吉尔，蒋介石的忧虑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1944 年，日本人仍有能力、而且的确发动了另一场攻势。如果蒋介石动摇畏缩，政府内部的数位知名人物——多数为军人——就准备取而代之。在中国西北部的延安，与政府做对的共产党力量控制了广大的地区，一旦日本人撤退，它就准备将控制区再次扩大。令美国人恼火的是，为阻止共产党势力的扩张，蒋介石把装备最好的 50 万军队部署在共产党控制区的周围，他不愿冒哪怕一丁点的风险，用这些本钱去攻击日本人。美国人对他逐渐增大压力，要他进攻日本人，威胁说要与这个国家更愿意作战的其他力量合作。美国肯定能赶走日本人，但接下来的事情又将怎样？内战的再起看来已难以避免。苏联明确增加在中国边境的驻军，而且，失去日本的制约后，在战争中取胜的斯大林将会变成一位苛求的邻居。英帝国主义也将要重返香港。鉴于蒋介石对国家的有限控制，中国也不是自称对它友好却向它索要利益的大国的对手。蒋介石不得不依靠他已展示出的能力，巧妙地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周旋，为了中国的利益，他不得不诉诸中国传统的以夷制夷的法宝。

1943 年，蒋介石没有受邀参加德黑兰会议，与三巨头共商世界大事。但是，罗斯福同意在会议前后与他会面，以提升中国的大国地位。在开罗期间，两人数次单独会谈，由蒋介石受过美式教育的妻子充任译员。一如既往，蒋介石要求美国提供更多援

助，还要求驻华美军更多地参加战斗。罗斯福也如过去那样作了含糊的许诺，他要求中国人采取更多的军事行动。罗斯福也许就战后的援助有所承诺，然而，没有证据表明像蒋夫人及其丈夫在后来说的如此之多。

1944年，罗斯福对蒋介石的按兵不动终于失去了耐心，要求他把军队投入战场，由美国将军约瑟夫·史迪威指挥。史迪威乃行伍出身，为人刻薄，两年以来，蒋介石对他虚与委蛇，心中一直不快。蒋介石拒绝了罗斯福的要求，还要求他召回史迪威，因而就没能成为解放中国的主要角色。罗斯福于是转向苏联寻求帮助，要它承担起中国人自己不愿从事的工作。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以支持苏联对中国的帝国主义要求为条件，换取了它加入对日战争的承诺。[①]

斯大林一度担心——世界上有许多国家也曾企盼——日本进攻苏联的东亚领土，但是，日本人在重创珍珠港的美国舰队后却掉头南下，加之希特勒军队正猛叩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大门，斯大林就把注意力转到了他的欧洲前线。当苏联军队在1943年击退德国人并发起反攻之后，斯大林还是对中国领土提出了要求，而且念念不忘中国人对其在中亚的新疆的势力范围的侵扰。由于不再需要中国军队与日本人作战，而且相信美国人就足以完成上述任务，1944年，斯大林试图把中国人从他所谓的苏联领土上

① 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普林斯顿，1953年），第166--201页；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纽约，1970年）；查尔斯·罗马纳斯和赖利·森德兰：《史迪威的指挥权问题》（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1956年）；亲蒋介石的观点，可见梁敬錞：《史迪威将军在中国（1942—1944）》（纽约，1972年）。

赶出去，以此提醒蒋介石，苏联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国家。[1]而且，几个月后，他为苏维埃政府找到了可与沙皇专制帝国主义的成就一较高下的新机会，不仅重新从他即将攻打的日本人那里获得领土，而且从他即将帮助解放的中国人手里攫取了一块势力范围。在雅尔塔，罗斯福对斯大林的渴求并无不安，为了拯救美国人的生命，再高的价码他都愿付出，更遑论这是拿其他民族的钞票来偿付。

在延安，毛泽东，这位致力于反对日本人和蒋介石的中国共产党领袖，对能从美国或苏联那里得到什么心中没底。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打断了蒋介石根除共产党人的努力。在战争结束之际，蒋介石肯定要继续他未竟的事业。不管怎样，美国人在战争期间还是友好的，作为毛泽东信任的代表，周恩来在重庆度过了战时的许多时光，成功地赢得了美国人的好感，他就蒋介石行为的卑劣一面向他们发出了警告。考虑到首先要击败日本人，美国人一直把共产党作为他们支持的对象之一，决心要制止蒋介石重开内战。在美国，主张与苏联合作的进步主义力量（progressive forces）看来已被压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急于知道美国在战后是否保持友好以及美国在中国可能扮演的角色。

毛泽东并不指望会出现一个仁慈的斯大林。以前，斯大林为一己之私曾经背叛过中国共产党人，还千方百计地把俯首听命的领导人强加给他们。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为了保卫苏联，他试图利用——也许甚至是牺牲——中国共产党人，要他们向日本军队发动自杀性攻击，只是没能如愿。他把中国共产党军队从毛泽

---

① 约翰·W. 加弗：《中国与苏联关系（1937—1945）》（纽约，1988 年），第 153—181、196—230 页；艾伦·S. 惠廷和盛世才：《新疆——小卒子还是排头兵？》（密歇根州东兰辛，1958 年）。该书仍有参考价值。另见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44 年，中国》（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1967 年），第 758—823 页。

东认为的中国领土上赶了出去。而且，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思想的毛泽东清楚地知道斯大林对蒙古的计划，可能还怀疑苏联对中国领土有其他企图。他是靠着超乎寻常的才智和运气才崛起至共产党的顶端，使中国共产党历经20世纪20和30年代的那些灾难而幸存下来。毛泽东及其同僚将需要所有的这些——或许是更多——才智和运气在战后去克敌制胜。[①]

战争给东亚其他地区也带来了通常难以逆料的混乱。在整个1944年，而且直至1945年，正值日本人为了延缓失败命运而拼命战斗之时，他们压迫下的民族以及视之为解放者的民族——朝鲜人、马来人、缅甸人、菲律宾人、越南人、爪哇人、苏门答腊人以及日本、英国、美国、法国、荷兰帝国的诸多臣民——正等待着和平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命运，其中的一些是消极等待，但有些已经武装或正准备武装起来。

富兰克林·D. 罗斯福，这位四度当选的美国总统，在欧战胜利前夜的1945年4月与世长辞了。在辞世之前，亦即1945年2月在雅尔塔及其后的几周里，他孤注一掷，希望确保他为之作出如此英勇努力的持久和平。在雅尔塔，他与丘吉尔和斯大林的讨论非常顺利。罗斯福发现其他盟国领袖的要求坦率而又理智，对他的要求，他们的反应更为迅速。罗斯福的首要目标是促使斯大林同意废止他与日本签订的、1946年才到期的互不侵犯条约，进攻驻满洲的日本关东军。因为中国人在此项工作中已经彰显了他们的无能，而罗斯福又不愿在这个大陆上牺牲美国人的生命，他将为此招来苏联红军，其后果则要中国人承受。斯大林表示同意，但以获取在满洲的势力范围为条件。接下来，罗斯福试图得

① 约翰·W. 加弗：《中国与苏联关系（1937—1945）》，第58—80页；本杰明·I. 施瓦茨：《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1958年），第172—188页；查尔斯·B. 麦克莱恩：《苏联政策与中国共产党人（1931—1946）》（纽约，1958年），第29—34页。

到苏联在没有16票的情况下参加联合国的保证，斯大林无可奈何，只好勉强认可了3张席位。最后，罗斯福希望斯大林将其扶植的波兰傀儡政府束之高阁，尊重民族自决的原则。斯大林不愿遣散主要由长期流亡国外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党同情者组成的“卢布林”政府，但他提出了粉饰该政府的办法：把更多的职位让给非共产党人，对在东欧举行广泛的民主和自由选举作了含糊的保证。罗斯福接受了这一解决方案，他们没能就德国问题达成协议。然而，美英接受了苏联的要求，把强行索取100亿美元赔偿作为谈判的基础。随后，丘吉尔在议会下院热情洋溢地赞扬斯大林的忠诚与合作，看来没有什么问题能使三巨头分道扬镳。战争进展顺利，斯大林同意在2月发动春季攻势，从而挽救了因希特勒的阿登攻势而遭受重创的美英军队，和平已经在握。但是，假如罗斯福活得更久一些，他就可以看到他的三巨头战后合作希望已经开始破灭。

也许是过度劳累，抑或是死神即将来临，罗斯福在1945年3月铸成了大错。对苏联的焦虑缺乏足够敏锐的感知，使他授权美国情报人员在瑞士秘密会晤德国高级官员，讨论驻意德军的投降问题。斯大林立即想到最坏的情形：德国人正在与美英盟国谈判一宗交易，以便德国人能够集中全部抵抗力量阻止红军的推进。在1938年的慕尼黑，英国和法国曾试图把希特勒恶魔般的力量引向苏联，但斯大林以智谋战而胜之。他们很可能想故伎重演，这一次是在自封的美国朋友的领导下进行的。勃然大怒的斯大林不顾任何外交礼节，向美英提出抗议。这次该轮到罗斯福对斯大林的指责表示不快了，可以想见，罗斯福不相信自己会成为一个如此的背叛者，斯大林显然是想得太多了。事情虽已过去，但两人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信任的薄薄虚饰之后决非没有摩擦。

毫无疑问，这种气氛已经不太有助于有关波兰新分歧的友好解决。[1]

来自波兰的报告——为丘吉尔的一封电报所强调——表明，与美国核心政治家对波兰的所作所为相比，苏联强行控制波兰的手段实在是巧妙不足赤裸有余，罗斯福一直希望斯大林能在这方面好好向他们学习。对苏联强加的共产主义统治制度的反抗正受到无情和公开的镇压。罗斯福对波兰人——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行为乖张——可能的同情并不比丘吉尔——他的国家就是为保卫波兰才向德国宣战——的更多，罗斯福不愿让非共产党波兰领袖的强硬态度使其美苏合作的愿望陷于危殆。然而，即使波兰人的自决权只是一种虚饰，一旦苏联否定它，他也不能对此无动于衷。如果予以默认，事情就会更糟，不赞成美国主导新世界秩序的那帮人将会利用该问题攻击他，美国人民也会因此而愤愤不平。在他最后的日子里，罗斯福试图重新解释他在雅尔塔对斯大林的让步，这个令人不快的工作使他心烦意乱，然而，鉴于他此前允准苏联在东欧建立势力范围和确保波兰有一个对苏联友好的政府，这种重新解释很难不被斯大林视为美国意愿的倒退。

罗斯福去世后，哈里·S. 杜鲁门成为美国第33任总统。杜鲁门深知他自己对世界事务的知识有多少了解，也非常清楚罗斯福为他担任该职务所作的准备是多么的贫乏。当第三帝国在美国、英国与苏联的联合力量打击下开始崩溃、太平洋上的美国军队正准备予日本本土以致命一击时，这位一度在堪萨斯城以经营男子服饰为生的人，将不得不去主持这场胜利。为了采摘胜利的果实，并把随之而来的和平维持下去，他也将不得不作出必要的

---

[1] 赫伯特·菲斯：《丘吉尔、罗斯福与斯大林》，第583—596页；加布里埃尔·科尔科：《战争之政治》，第375—379页；威廉·陶布曼：《斯大林的美国政策》，第95—96页。

决定。他对此有些担心，但却知道如何应对，于是就向那些曾指点过罗斯福的人问计。

杜鲁门对罗斯福的目标或承诺没有丝毫不安，因为他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推动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赫尔—摩根索计划与他作参议员时支持的民主党的计划并不相悖。战争结束后，与国会之间的麻烦肯定会有，但他有充足时间去应付。德国在杜鲁门上任仅仅几周后就宣布投降，总算没让这位总统太劳心费神。如何尽快战胜日本则要求他付出更多心力，包括为把美国伤亡降至最低，他需要权衡一系列方案，以便作出正确的抉择。而以其顾问之见，他眼下最迫切的问题是消除美苏关系上似乎还在成长着的一些奇想怪念。[①]

在几年前一次令人失望的即兴讲话中，杜鲁门曾对纳粹德国入侵苏联感到满意，希望看到这两个政权同样受到削弱。他一点也不同情共产主义。但是，杜鲁门在1945年不再敌视苏联，而把它视为忠实的盟国，没有多少保留就接受了罗斯福的信念：对战后世界的公正与和平的前景而言，美苏合作是不可或缺的。然而，正如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杜鲁门认为可以用苏联尊重美国的程度来考量它合作的意愿。

就任总统之后，杜鲁门马上被告知了罗斯福和斯大林在东欧问题上的意见分歧。问题并非要不要继续合作，而是在不牺牲美国理想和利益的前提下怎样最好地实现这种合作。罗斯福的一些顾问、特别是他的主要白宫办公厅主任威廉·李海海军上将和驻苏大使W. 艾夫里尔·哈里曼都认为，困难之出现源于罗斯福对苏联人的过分宽容，因为这种宽容刺激了他们的贪欲，以至于他们把美国的支持视为当然而几乎没有回报。他们认为，是苏联而

---

① 约翰·刘易斯·盖迪斯，《美国与冷战的起源》，第198—206页；德博拉·韦尔奇·拉森：《遏制的起源》（普林斯顿，1985年），第150—158页。

非美国才违反了雅尔塔协议中有关波兰的条款。特别是哈里曼，他强烈要求改变政策，强烈要求得到更有利于美国的交易，强烈要求使用胡萝卜加大棒和获得补偿的方法。如果苏联人想有所收获，比如说经济援助，那就要他们出让什么作为回报。如果美国在财政方面帮助苏联的战后重建，苏联人就需报之以放松对东欧的控制、允许自由选举、在把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并入其控制的政治经济集团的问题上保持克制。上述想法并非不要合作，也不是与苏联作对，而是要找出一条更能导向相互满意、并与美国卓越地位相匹配的美苏关系的道路。[①]

杜鲁门接受了对苏联人强硬的建议，他不顾外交礼节，首次见面就给苏联外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一顿责骂。作为一位轻易不动感情的人，莫洛托夫虽然只对杜鲁门的腔调表示了抗议，但他很快就领悟了美国政策业已改变的信息，只是还不清楚美国目标是否业已改变。莫洛托夫及其助手迅速认定，罗斯福的谢世已使美国近年蛰伏的反苏力量卷土重来。在杜鲁门的言论中，找不到对莫洛托夫及其代表的国家的任何尊重。随着胜利的到来，美国人已得出明确结论，他们不再需要苏联的进一步合作。如果美国人不愿承认苏联对同盟国事业的伟大贡献，拒绝承认现在的苏联为世界第二大强国，哪个国家还能符合这一地位要求的先决条件！在苏联领导人看来，杜鲁门有关苏联的问题也许比他提出的还要多得多，他们在此后几个月要越发警惕才行。[②]

1945 年 7 月，杜鲁门前往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废墟中的波茨

① 加布里埃尔·科尔科：《战争的政治学》，第 390—403；约翰·刘易斯·盖迪斯，《美国与冷战的起源》，第 200—205 页；德博拉·韦尔奇·拉森：《遏制的起源》，第 66—125 页。

② 参见安德列·葛罗米柯：《葛罗米柯回忆录》（纽约，1989 年）；以及"诺维科夫电报"，引自肯尼思·M. 詹森编：《冷战的起源》（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1991 年），第 3—16 页。

坦，参加在那里召开的战时最后一次重要会议，并会晤了丘吉尔（以及接替他首相职位的克莱门特·艾德礼）和斯大林。考虑到需要解决的问题的重要性和另外两位的才干，杜鲁门刚开始还有些拘谨，但是，当得知美国的秘密武器原子弹已经试验成功，而且很快会用于对日战争，他的自信由此而得到极大的提升。美国将从战争中崛起为世界的领袖国家，他对此从未有过丝毫的疑问。如果需要的话，现在单靠美国的力量就足以结束战争，如果需要的话，美国也能单枪匹马地维持和平。原子弹可以确保美国立即在东亚取胜，而且很可能为美国在战后国际政治活动中赢得更多威望，他不经意地向斯大林提及这种新式武器，但后者好像对此兴趣索然。[①]

一般说来，杜鲁门对他在波茨坦见到的斯大林有不俗的印象，在打道回府的时候，他已经认定，就像他早年密苏里州的政治导师博斯·彭德格斯特[②]那样，斯大林确实是一位可与之打交道的人。[③] 的确，罗斯福和丘吉尔、抑或甚至是哈里曼都不怀疑，如果由一位合适的人（比如罗斯福、丘吉尔、或者哈里曼）对谈判加以指导，一个与斯大林之间的合理协议是可以达成的。尽管斯大林残忍无情，但也不能把他与恶魔般的希特勒等量齐观。而且，意识形态的分歧好像与此并不相干。美苏之间似乎也不存在根本性的安全问题。有关波兰的分歧依然存在，但是，杜鲁门承认波兰关乎苏联的关键利益，而对美国来说，它至多是需

① 赫伯特·菲斯：《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波茨坦会议》（普林斯顿，1960年），第172—179页；加尔·阿尔珀洛维茨：《原子外交——广岛与波茨坦》（增补版，纽约，1985年），第198—204页；可参阅J. 塞缪尔·沃克的一篇精彩的历史学论文：《使用原子弹的决定——史学研究的新进展》，《外交史》，第14卷（1990年），第97—114页。

② 博斯·彭德格斯特（Boss Pendergast，1873—1945），美国民主党政客，操纵密苏里州政治多年，当年杜鲁门以投人其门下而发迹。——译者

③ 德博拉·韦尔奇·拉森：《遏制的起源》，第132—136、178、197页。

要关注的次要利益。作为世界上惟一拥有原子弹而且为苏联所赖以获得重建资金的国家，美国要求的较小调整将最终会得到满足，杜鲁门及其顾问深信，他和斯大林能够处理好这些事情。杜鲁门启程回国，命令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第二章 冷战的起源

杀戮的结束给世界各民族带来了莫大慰藉，也引发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对德国和日本来说，以后的岁月将是严酷的，他们的福祉，他们的生存，都将取决于胜利者——包括不久前饱受德国和日本军队蹂躏、有时甚至是恐怖统治的国家——一时的奇想怪念。大多数盟国都面临大规模的重建任务。苏联至少丧失了2000万人，也许有多达4000万人在纳粹的攻势下失去了生命。法国、比利时、荷兰、丹麦、挪威以及英国不得不重建其受损严重的工业设施，寻求使民众得以温饱的途径。在中国，内战在悄悄地逼近，想得到甚至是战前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准也越发不大可能。在殖民地世界，数百万民众坚持要终结帝国主义时代，如果必要的话就使用暴力。

相比之下，美国的情形可谓辉煌灿烂。美国人很少死于战火，只有潜水艇或敌国气球所携炸弹偶尔抵达美国大陆的海岸。美国工业毫发无损，战争订货一片繁荣。美国的农业随时可以满足全世界的饥民之需。全国上下都要求“让孩子们回家”，回到前总统沃伦·哈定所称的“常态”中去。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虽然美国为世界其他地区如此地羡慕，然而，当胜利的愉悦消退后，人们发现这个国家充满着不得不面对的严重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美国也忍受了大萧条的苦难，数以百万计的身强力壮者——不论是熟练还是非熟练

工人——都失业了。数百万美国人失去了家园，眼睁睁地看着儿女忍饥挨饿。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福利计划——为大多数美国富人极力反对——的确减轻了他们的痛苦，然而，正是这次战争才赋予美国经济以新的活力，使他们的充分就业得以实现。而今战争结束了，数百万为祖国而战的男女军人都要回家找工作，难道要他们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那样露宿街头，靠卖苹果维持生计[①]吗？那些制造坦克、舰船、飞机和弹药的工厂出路何在？现在要它们生产什么？谁会在这些工厂里工作？哪个还要去买他们的产品？战争期间被招入北方城市工厂的数百万美国黑人——他们的出现曾在战争期间引发过爆炸性的种族紧张——的出路何在？那些承担传统上男人工作的“铆工罗琦”（Rosie the Riveter）和其他女性的命运又将如何？简言之，这个世界最富足和最强大的国家在经济上面临着深刻的结构性问题，经济与社会问题之间也存有深深的鸿沟。罗斯福过世后，哈里·杜鲁门将把这个国家引向何方？哈里·杜鲁门有能力领导这个国家吗？

对华盛顿内外的多数美国人来说，最优先的考虑是创建一个健康和平的经济。随着希特勒的失败与珍珠港之耻一朝得雪，在他们看来，对外事务的重要性已降至最低。职业外交官、军事官员以及官僚机构内外靠为这个世界的其他地区操劳而生活的其他人等，都不能无视公众和国会要军队回国、要数百万年轻人复员以及把这个世界的难题留给联合国的强烈要求。

那些美国对外政策的主导者却放眼全球，算计着美国的海外利益和需求，更警惕那些潜在的威胁。最直接的需求是一支占领

---

① 1932年5月之后，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身无分文的退伍军人约2.5万人为了得到“退伍军人补偿金”，携家带口从全国各地来到华盛顿，栖身在市内公园、街头空地以及垃圾场地，直至7月底为麦克阿瑟将军亲自指挥的以刺刀、机枪和坦克开道的军队逐出首都，他们一直靠捡垃圾、卖水果、在市内空地种菜养鸡维持生计。——译者

德国和日本的军队、以及维持这支军队和军政管理机构的资金，以监督和指导这些国家的人民，使之改正错误并走向和平。当美国的超强力量足以确保其无往不胜的基地和其他资产时，就应当为下一场战争制定应急方案，并采取相应步骤。美国在战争期间创建了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今，为了震慑将来可能出现的侵略者，就必须得到维持这支军队的资金。那些专家学者——醉心于实施布雷顿森林协定以及为新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贸易组织和其他机构努力工作的人——认为，提供重建援助还远远不够。但是，在战争结束时，军方和此前的盟国对金钱的要求已不再受到欢迎，更不用说把金钱送给那些发动这场战争的国家了。如果有机会将美国人置于首要地位的话，此其时矣。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人民可以清楚地表达其意愿，对他们不理不睬将会使政府陷于危险的境地。1945 年，对外事务专家与新建立的国家安全机构已经被撇在一边。

让孩子们从战场回家，这是世人所见的最惊人的复员之一。军事义务的解除是依照民主原则和个人情况，取决于士兵服役年限、受伤情况和所得军功，而不是一支部队接一支部队地进行。军舰停泊在那儿，上面没有船员，坦克隆隆地开走了，里面没有炮手，军队战斗力因失去主要的战斗人员而遭受重创。复员后的军队规模与以前相比已大为缩减。一支强大军队被弄得乱七八糟，但谁又需要它呢？

当男人返国，女人回家，许多黑人劳工就被撇在一边。这一次，退伍军人得到了国家的关怀，在工作和家庭生活方面获得了优待。《退伍军人法》使数百万退伍军人得以学习新的技能，赋予了他们也许从来不能得到的受教育的机会，该法案还使他们有能力为自己和苦等他们的女孩子购置房产，所有这些所造就的“婴儿潮”催生了下半个世纪美国人口的主体。在 1945 年的最后数月，种族与性别问题看来还无关紧要，至少在社会上占压倒优

势的白人男性看来正是如此。

战争刚刚结束，有关福利国家的特征和如何分配美国财富的争斗重新开始了。20世纪30年代，由于工会活动得到罗斯福政府的保护，它们普遍接受了罗斯福关于在战争期间自我约束的要求。一些工会，譬如产业工会联合会，较以往更急切地要求举国团结。所有工会都决心改善劳工的命运，使他们能从利润中获得自己公平的一份。在1945年的最后几个月，国家遭受罢工的沉重打击，劳资关系的紧张程度持续攀升，因为急于剥削他们想像中的工人的劳动盈余，许多雇主决心彻底改变罗斯福的一些亲劳工的改革，打碎各工会的新权力。政治分析家对杜鲁门能否把新政联盟团结在一起以及美国能否摆脱激化的阶级冲突表示了怀疑。

美国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紧张的出路取决于美国经济如何从战时向和平转变，前景是光明的。鉴于在战时买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美国消费者盼着赶快花钱。显而易见，不久的将来，在欧洲与日本工业重建之前，美国商品的海外市场是广阔的，在控制所需原材料方面，美国也没有什么竞争对手。恰如20世纪20年代那样，美国国内市场兴旺繁荣，出口商品潮水般奔涌而出。赫尔与摩根索设计的商业和货币协定为美国商人抓住战后初期数月的特殊机会提供了便利。在阶级矛盾没有激化的情况下，生产与收益的增加也为人们在加薪的基础上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然而，这种情况不可能永远持续，在没有东西卖给美国的情况下，外国买主迟早会耗尽其手中购置美国货的美元。只有这个问题获得解决，战前竞争对手的产业才能最终恢复，对市场的争夺、甚至对美国国内市场的争夺才能重新展开。然而，在1945年，所有这些仿佛还非常遥远。

那些为数不多但仍然关注世界事务的美国人一直在关注战后初期数月里美苏关系的若干棘手问题。如同英国那样，苏联也需

要重建资金，希望从美国得到低息贷款，这是美国国会和公众都不愿提供的。美苏两国在德国的赔偿数额和处理方式上仍存歧见，美国的盟国、特别是苏联，对美国垄断对日占领管理权的专横方式甚为不快。美国记者与外交官也报道了苏联当局在东欧堪与美国相提并论的霸道行为，尤其在波兰，苏联的作为非常粗暴。在纽约，赔偿委员会的外交官与技术专家努力地工作，希望为联合国创建有效力的职能机构，苏美谈判人员发现他们之间很难合作，有时甚至颇不愉快，对那些负责创建联合国之军事维和机构以及为国际原子能控制工作的人来说，情况尤为如此。[①]

苏联的猜疑激怒了美国，而美国几近蔑视的傲慢也使苏联愤愤不平。美国闹不懂苏联为何不愿接受美国仁慈的优势地位，苏联也弄不清美国为何拒绝予其和它一样的地位。文化方面的分歧加剧了相互之间的不满，共同敌人的消失使双方便自然地想起了过去的分歧，并使更早时期的意识形态偏见喷涌而出。正如苏联人对美英意图的忧虑那样，美国反共产主义的深层潜流熬过战时的合作而延续下来。当然，只要美国保持对核武器的垄断，苏联人就永远没有安全感。在缺少共同敌人和共同价值观的情况下，和平时期的合作恐将不易。尽管美苏两国外交官的热情可能在不断消退，但他们还是在继续工作。

在太平洋对岸，还有美国领导人难以摆脱的其他问题。中国情势一时间仿佛失控，为帮助蒋介石的军队顺利进入中国共产党人威胁的地区，美军一直在为其提供运输的便利。美国海军陆战队拒绝共产党人进入他们从日本人手中解放的城市，在蒋介石的军队抵达之前一直坚守在那里。与此同时，华盛顿拒绝了对它干

① 托马斯·G. 帕特森：《1943—1946 年对俄贷款的流产与冷战的起源》，《美国历史杂志》，第 56 卷（1969 年），第 70—92 页；与迪安·腊斯克的谈话，1977 年 4 月；孔华润：《迪安·腊斯克》（纽约州托托瓦，1980 年），第 9—14 页。

涉中国内政的指责。

1945年11月，由于未能成功地调解蒋介石政府与毛泽东的共产党军队之间的关系，美国驻华大使帕特里克·J. 赫尔利宣布辞职。赫尔利将其失败的责任公开地大而化之，诿过于帝国主义者、共产党分子与对外事务官员。鉴于国内政治的原因，杜鲁门的助手们认为总统必须有所反应，而如何反应则取决于他们如何看待苏联在中国的作用。有迹象显示，苏联在援助满洲的中共军队时表现出矛盾的心态，美国人担心苏联在满洲的存在可能会超越雅尔塔协定——蒋介石为换取苏联的公开支持在1945年8月的中日条约[①]中予以承认——允许的范围。另一方面，苏联军队在满洲大肆掠夺表明他们正准备打道回府。杜鲁门决定派遣美国最有威望的军人乔治·C. 马歇尔将军，这位使对德和对日战争走向胜利的设计师，到中国阻止内战，更重要的是去弄清楚苏联意图之所在。[②]

得悉马歇尔的使命，斯大林很高兴。苏联的在华利益源于雅尔塔协议以及它与中国的条约，斯大林与蒋介石以前就一度合作，而且还相互理解，尽管他们并不相互信任。斯大林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谨慎行事，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存在使他得到了与蒋介石讨价还价的宝贵影响力，一场他们不大可能取胜的内战将恶化苏联与美国的关系。为了双方非关键利益的边缘地区而把两国关系弄得紧张兮兮，这实无必要。而且，毛泽东性格倔强，并不欢迎来自莫斯科的控制。在斯大林看来，一个分裂的中国，加之中国共产党人对莫斯科的依附，是最合乎需要的。一个肯定由毛泽东

---

① 原文如此，应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译者

② 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普林斯顿，1953年），第406 424页；拉塞尔·D. 布海特：《帕特里克·J. 赫尔利与美国对外政策》（伊萨卡，1973年），第253—278页；史蒂文·I. 莱文：《美国调停中国内战的新视野——马歇尔使命与满洲》，《外交史》，第3卷（1979年），第349—375页。

领导的共产党中国也许并不是苏联的一项资产。斯大林也许真诚地希望马歇尔能成功地阻止内战，使中国免于成为美苏关系中的难题。为表明友谊，斯大林在蒋介石的请求下调整了从满洲撤军的时间表，在共产党军队控制该地区之前为蒋介石调集军队助了一臂之力。

毋庸置疑，美国与苏联已从战争中崛起为世界的支配力量。在一个无政府世界里，它们时而特立独行，时而相互合作，努力探索创建秩序和确保自己与友邦安全的道路。如果没有受到很多的约束，各民族就会因在世界各地追逐各自利益而相互争斗。在华盛顿和莫斯科，根本不了解其他民族历史文化的那些人都试图代全世界拍板定夺。苏联经验表明，它不能信任那些在历史上曾试图孤立和摧毁该政权的外部力量。希特勒败亡后，美国人对斯大林强加于自己人民身上的恐怖统治表示反感，对他此前强化于国内而今又扩展至东欧的极权主义专制体制也深为憎恶，这种情形阻碍了他们的合作。尽管他们相互提防，然而，为了减轻相互间的忧虑、克服历史上的猜忌、联手控制德国人和日本人以及为了创建一种持久的和平，双方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鉴于斯大林认为不能对美国的优势力量进行不必要的冒犯，杜鲁门也仍然相信他与斯大林能够解决新近出现的任何分歧，到 1945 年岁末，而且一直到 1946 年，他们仍然在全力以赴地努力着。1945 年 12 月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杜鲁门在对外关系上的表现感到满意。[①]

1945 年，与美国领导人对苏联的猜疑和担忧相比，苏联领导人对美国的此种感觉似乎更为强烈。然而，华盛顿的态度在 1946 年发生了明显转变。苏联在整个 1946 年的所作所为迫使杜

① 哈德利·坎特里尔和米尔德里德·斯特伦克编：《公共舆论（1935—1946)》(普林斯顿，1951 年)，第 889—901 页。

鲁门及其顾问对它的意图和美苏合作的可能进行了重新评估。苏联的行动与美国对它们的认知成为政治学家所说的“安全困境”——一国安全的强化将会自动和无意中损害另一国安全——的典型表现。鉴于遭受西方敌视的历史经验和面对美国优势力量的现实，苏联对美国能否温和地使用力量心中没底，苏联领导人故而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强化国家安全的行动。然而，他们追求安全的每一步骤均为美国领导人视为对美国安全的损害。最后，美国作出反应，为增强自己的安全而改变了以前的政策，而苏联又视之为威胁它的安全。每个国家均把自己的政策界定为防御性的，但都把它国行动视为对自己的威胁。[①]

战争结束前，一些美国官员就已视苏联为下一个敌人。1945年12月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虽然只有1/3强的美国人预测在下一个1/4世纪会有一场大战，但是持该想法者几乎都把苏联视为发动战争的国家。[②] 1946年2月，在最高苏维埃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说时，斯大林强调了纯洁意识形态、制定一个新的5年计划、以及做出新的牺牲的需要，因为在这样一个世界，和平受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的威胁，共产主义制度还要为生存而战。对苏联及其意识形态感到恐惧的美国人认为，斯大林的演说充满了敌意，它是一篇战争宣言书。

然而，大多数美国人与他们的总统还仍然不准备放弃美苏合作的希望。3月，业已下野的丘吉尔访问美国，在杜鲁门陪伴下，于密苏里州的富尔顿谴责了他所宣称的、苏联纵贯欧洲划定并将其控制区与该大陆其他地区一分为二的“铁幕”。他那嘹亮

---

① 梅尔文·P. 莱夫勒：《权力的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斯坦福，1992年），该书有关于“安全困境”争论的类似叙述，而且还更为详尽。

② 哈德利·坎特里尔和米尔德里德·斯特伦克编：《公共舆论（1935—1946）》，第783—784页。

的号召——告诫美国人提防苏联威胁——虽然得到那些信念一致者的共鸣，但并未吸引到多少归附者。愤世嫉俗者怀疑，邱吉尔描述的危险与国会中处境不妙的英国贷款法案之间存在某种关联。许多记者和一些国会议员担心，丘吉尔之所以在美国煽动危险，目的在于刺激美国人再次拯救那个暂时还存在的英帝国。杜鲁门小心翼翼地避免把自己与该演说牵扯一处。虽然对杜鲁门处理外交事务的不满与日俱增，对苏联行为也越发愤怒，但是，迟至1946年9月的民意测验显示，只有8%的美国人愿意放弃与莫斯科的和解，而74%的人则认为，美苏两国对它们之间已出现的不和都负有责任。①

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不断发展的严重分歧是难以避免的。美国在德国的所作所为使苏联人感到苦恼、也许甚至是惊恐。1946年1月，基督教民主党人——反对苏联而且对拿德国领土补偿波兰的损失感到愤怒——在美国占领区、而后在英国和法国占领区赢得了选举。数月之后，驻德国的美国总督②卢修斯·克莱决定停止苏联从其控制区进一步索取赔偿。7月，美国人启动了一个大赦前纳粹分子的计划。苏联情报员早就知道，美国特工正在保护那些被其视为科学和情报资源的纳粹军政人员。9月，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在斯图加特宣布对德国实行一种更加仁慈的新政策，与满足苏联的需求相比，华盛顿更关注它以前的德国敌人的福祉。最后，美国人与他们的英国朋友在12月将其德国占领区合二为一，并倡议法国与苏联也加入进来，法国人很快就如此行事，而苏联人几乎不可能放弃他们仍在盘剥的那部分占领区，更不会考虑贝尔纳斯4月提出的危险建议，去解除对德国的

① 德博拉·韦尔奇·拉森：《遏制的起源》（普林斯顿，1985年），第263—267、288页；哈德利·坎特里尔和米尔德里德·斯特伦克编：《公共舆论（1935—1946）》，第964页。

② 原文如此，即美国占领区军事长官。——译者

军事管制。在斯大林的一生中，德国人两度极大伤害了他的俄罗斯祖国。阻止德国强权的复活是苏联最优先的考虑，它不能不正视美国重建德国、宽恕法西斯分子、以及鼓励德国复仇主义的动机。

杜鲁门及其助手好像已经忘却了苏联的焦虑，而是对斯大林在中东地区——在伊朗、土耳其和希腊——的意图感到担忧。美国领导人认为这些国家的任何一个都不会威胁苏联的安全，他们也弄不懂苏联这样做的任何正当理由。美国、英国和苏联共同对伊朗实施先发制人的占领，以避免德国人得到它的石油，同时也为美国人援助其苏联支持者的租借物资保持一个通道。他们同意在战后撤出驻伊军队，美英军队如期撤出，而苏联人却待着不走，显而易见，他们打算把伊朗富藏石油的一个省与伊朗其他地区分割出去，使该省及其居民加入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同胞之中。1946 年 1 月，在联合国安理会的首次会议上，美国谴责了苏联在伊朗的继续存在。当苏联坦克 3 月威胁德黑兰时，美国发出严厉警告，苏联人只好撤退。

战争结束时，为了得到小规模领土调整和分享对苏联进入地中海的惟一通道达达尼尔海峡的控制权，莫斯科开始向土耳其施加压力。起初，杜鲁门对苏联在海峡管理中的作用表示同情，但是，苏联在其他地区令人不快的行为引发了他对其意图的疑虑，上述态度因而逆转。当苏联压力在 1946 年 8 月达到顶峰时，杜鲁门命令美国军舰“富兰克林·D. 罗斯福号”——世界上火力最强的战舰——开赴东地中海，以强化土耳其人的决心，斯大林于是再次退却。

在希腊这个曾被斯大林视为英国势力范围的国家，一场激烈的内战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一方是腐败、镇压成性的政府，其不少成员曾与德国人合作；另一方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其中许多人积极参加了抵抗运动。英国支持希腊政府，而南斯拉夫、

保加利亚以及阿尔巴尼亚等国的共产党政权则支持叛乱分子。没有证据表明苏联已卷入其中，但是，它对英国的舆论攻击清楚展示了斯大林的好恶，即使斯大林不能控制巴尔干地区的共产党人，他对他们的影响力却是可想而知的。

美国领导人均不认为苏联是中东的主要角色，他们视该地区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如果英国人支撑不住，就需要其他人挫败俄国人久已存在的对这一地区的野心。对于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及其在该地区的支配地位，杜鲁门及其多数主要顾问都打算让步，但决不在伊朗或希腊或土耳其或整个中东地区作出让步。甚至当他们考虑把美国力量投射到距其海岸 5000 多英里以外的地方、考虑在苏联周围替代衰落中的英国力量时，他们还是把苏联在该地区的行为视为威胁，把美国的行为看成防御。

原子能和核武器的国际控制问题也损害了两国合作的能力。杜鲁门及其助手知道苏联将最终发展出核武器，一些人认为，最聪明的办法是与苏联分享这种炸弹的秘密，以此表明美国的善意和赢得苏联对美国意图的信任。其他人不大赞同这种伟大的姿态，他们依然认为，对核武器实行国际控制以及对核力量的使用进行国际监督是可行的，在没有危及美国安全的情况下是可以达到目的的。在政府内部已提交的若干建议中，以国务院的迪安·艾奇逊和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主席戴维·利连索尔——他曾与指导核炸弹研制的 J. 罗伯特·奥本海默领导的一个科学顾问小组一起工作过——认可的那个最为著名。“艾奇逊—利连索尔报告”（Acheson－Lilienthal report）主张，联合国一旦确立核武器的控制，就要考虑现存核武器的销毁问题。联合国的控制和随之而来的核查将杜绝对核武器发展的研究，使美国成为惟一拥有核力量的国家。在联合国有机会考虑该计划之前，总统顾问伯纳德·巴鲁克又加以修改，要制裁“不服从否决者”（not subject to the veto），从而把苏联的安全整个置

于美国及其朋友可轻易操纵的联合国的控制之下。“巴鲁克计划”（Baruch Plan）在1946年6月一出笼就被苏联拒绝，这一点也不值得奇怪。

乔治·凯南，这位已成为美国头号苏联问题专家的外交官发现，他的政府在理解苏联目标时迟钝得令人沮丧，他认为在抵制斯大林时必须立场坚定。1946年2月，他从莫斯科呈上一封深思熟虑的长电报，并且在华盛顿得到广泛传阅。他认为，苏联领导人不仅受到他们创造的政治制度的需要的驱使，而且还受到一种自身不安全感的推动，这种不安全感正是在其他国家可能允许的范围内极力扩张影响和权势的过程中产生的。他警告说，宽大为怀与咆哮恐吓将被斯大林及其同伙视为软弱的表现，他们只会对强硬立场、对不能容忍其行动的明确信号作出反应。美国必须划出一条底线，以坚定的立场和耐心捍卫它，一直等待着，直至苏维埃制度丧失其内在影响力和对外扩张的能力。他的“长电报”颇受许多美国领导人的青睐，此时此刻，这些人正在对苏联的行为和美国的适当反应进行类似的分析。3月，为了推迟美国军队完成复员的时间，他们说服杜鲁门把服役时间延长了一年。[①]

贝尔纳斯国务卿不同意凯南—哈里曼的分析，然而，这一年还未结束，他对自己谈判能力的自信几乎就要磨尽了。这年春天，苏联人拒绝他们不大可能获得的美国贷款的条件，放弃了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的机会。8月，苏联外交官安德列·维辛斯基谴责美国的“金元外交”，捷克外交官对此鼓掌喝彩，使贝尔纳斯勃然大怒。是该调整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时候

① 凯南的“长电报”和英、苏驻美大使大约同时致各自政府的可资比较的电报，可参见肯尼思·M. 詹森编：《冷战的起源——1946年诺维科夫、凯南与罗伯茨的“长电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91年）；以及集中讨论诺维科夫电报的专题论丛，《外交史》，第15卷（1991年），第523—563页。

了，也许，与犒赏朋友和惩罚对手相比，一个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并非更加重要。4 月，苏联人拒绝了贝尔纳斯关于德国的提议，9 月，他宣布将自行其是而不再顾及苏联的反应。与他类似，艾奇逊，这位没有让他对共产主义的蔑视挡住视线的人，这位一直对苏联人怎样以其想像中的偏执看待事物表示理解的人，这位一直愿意对苏联安全需求作出让步的人，也得出了苏联在中东的要求已失去理智，因而不得不予以抵制的结论。[①]

在美国，对与苏联继续合作仍寄予希望的最后一位大人物是亨利·华莱士，他曾一度出任副总统，而今是杜鲁门政府的商业部长。9 月，在得到杜鲁门的默许和非正式同意后，华莱士公开批评了他认定已误入歧途的美国政策方向，坚持认为美国没必要疏远苏联。但是，该月还未结束，杜鲁门就不得不解除其职务，以免苏联人——还有美国人民——收到错误信号。而且就在几周之后，格奥尔基·朱可夫元帅，这位伟大的苏联战争英雄，由于在某些方面被认为对美国友好，其苏联武装力量总司令之职亦为他人取代。

在这一年中，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成为美苏关系的好兆头，然而杜鲁门还有其他不容拖延的难题。他不需要也不希望有一种与苏联人敌对的关系。一般来说，杜鲁门希望苏联人行事文明、承担义务，遵从美国寻求一个和平与繁荣世界的计划，使他有时间和精力去对付劳工骚乱、通货膨胀以及共和党复兴的威胁，所有这些均是他对美国社会承担的责任。而且，共和党人在 1946 年 11 月的选举中猛烈反扑，自 1930 年以来首次获得了对国会的控制权，这表明杜鲁门正失去对曾属于他的那一小块世界的控制，预示他将要过一个糟糕的圣诞节。

---

① 罗伯特·L. 梅瑟：《同盟的终结》，查珀尔希尔，1982 年，第 181—194 页；德博拉·韦尔奇·拉森：《遏制的起源》，第 256—257、283—288 页。

共和党人重返华盛顿，决心要摧毁罗斯福的遗产与杜鲁门继续新政计划的努力，其中一些人决心要发动一场纯洁社会的思想修正运动，首先从联邦政府开始，修正所谓政府对民众福利负有责任的思想，修正新政派的那些“伪善的共产主义”（crypto-communist）思想。他们将停止推行服务于社会福利以及对财富进行再分配的税收政策，中止政府对威胁自由企业制度的工会和激进分子的保护，阻止政府挥霍美国的钱财去资助英帝国。他们憎恨国内的“渐进式社会主义”（creeping socialism），迫使杜鲁门去抵抗苏联共产主义分子，把罗斯福在雅尔塔的“背叛”扭转过来。如果杜鲁门还有一些领导才能，第 80 届国会将给他一个表现的机会。

当他们引起杜鲁门总统的注意时，总统的对外事务顾问反复强调了两个严重而又迫切的忧虑。首先，西欧的战后复兴面临的始料未及的困难、该困难造成的无尽的痛苦、以及那里存在的对公民社会的威胁；其次，欧洲权势、特别是英国权势在世界各地的崩溃以及美国以迅速和令人信服的行动填补真空的重要性。1946 年给英国的贷款证明是远远不够的，部分原因是他们所需的美国商品价格的上涨。英国人在国内正在实行食物配给，还准备放弃印度和缅甸，他们已无力继续支持希腊政府，而且被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恐怖分子的攻击弄得晕头转向。[①]

在法国，夏尔·戴高乐，这位战时“自由法国”的傲慢的领导人，在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强烈反对下，于 1946 年 1 月辞去总统职务。在 11 月的选举中，共产党人在议会赢得了多数。

① 乔伊斯·科尔科和加布里埃尔·科尔科：《力量的限度》（纽约，1972 年），第 365—367 页；安东·W. 德波特：《超级大国之间的欧洲》（第 2 版，纽黑文，1986 年），第 131—132 页；沃尔特·艾萨克森和埃文·托马斯：《美国智囊六人传》（纽约，1986 年），第 386—389 页；梅尔文·P. 莱夫勒：《权力的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第 188—192 页。

1947年1月，正值共和党领导的保守联盟控制华盛顿的美国国会时，法国共产党人眼看着就要控制政府。还有意大利，在华盛顿看来，它那虚弱不堪的政府正受到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少数派的威胁。最糟糕的也许是未来德国的走向，他们是否最终会选择与苏联结盟？

在杜鲁门的顾问之中，无人曾经设想苏联会对美国或者西欧发动进攻。尽管华丽的词藻模糊了凯南的本意，但他一直强调的是一种政治威胁的存在。鉴于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其他大多数人均感到安全，因而瞧不起苏联的现有力量。但是大家都承认西欧对美国的重要性。西欧是美国认同的文明的心脏地区，其参与对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至关重要，美国也坚信，这种自由主义经济秩序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来说又是不可或缺的。美国领导人认为，对西欧的友善的控制于美国安全至关重要。任何一位地缘政治学学者都清楚，一国如果控制亚欧大陆，它将获得统治世界的力量。可以想见，苏联若能实现这种控制，它不是用红军的刺刀，而是借助于现存的西欧社会的崩溃。如果没有外来援助，加之当地共产党人的颠覆活动，这样的社会很难从战争的破坏中重新振兴。正如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1]法官所说的，危险并非“既清楚又紧迫”。然而，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冒险对此不闻不问。[2]

如果有人以为杜鲁门清楚这种危险而且愿意有所行动，然而，欧洲人要求的援助规模是巨大的，对美国的要求也将超越它在和平时期曾经做过的任何事情，其中的花费也将很庞大。鉴于

---

① 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1841—1935），1902—1932年任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在多数法官作出否定进步的社会和劳工法律的判决时，他则经常持有自由派的反对立场，因而闻名。——译者

② 梅尔文·P. 莱夫勒：《权力的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第162—163页。

国会与行政部门的不和及其削减预算的承诺，怎样才能说服国会为反对那种难以觉察的危险而拨出巨款重建美国竞争对手的经济呢？鉴于联合国需要美国承担更多的世界事务的责任，怎样才能说服美利坚民族为实践它对曾经是地球上遥远角落的领导权而做出必要牺牲呢？

由于杜鲁门一个极为精明的任命，另一个艰巨的任务就变得容易处理了。1947 年 1 月，在中国经历一年之久的挫折后，拒绝退隐的乔治·马歇尔取代贝尔纳斯，成为美国国务卿。马歇尔从莫斯科召回凯南，要其主持新近设立的政策设计委员会，他请艾奇逊留任副国务卿数月之后，就代之以罗伯特·洛维特。尽管仍然存有争议，但是，它的确是国务院曾经有过的最有力的领导集体，而且很好地使用了自己掌控的资源。很快，它制定了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政策，先折服总统，再说服国会，最后又获得了公众的支持。经过杜鲁门政府 1947—1949 年的提炼，在付诸实施的时候，该政策虽不能说毫无瑕疵，但是，它们构成了一系列稳妥、慎重与可控的步骤，去保护美国以及与美国经济政治价值观相一致的国家的利益，从而为所有在此后 20 年接受美国霸权的国家的惊人物质繁荣奠定了基础。毋庸置疑，上述政策的宗旨首先而且主要是服务于美国的利益，但是，擘划政策的男女官员懂得，努力追求美国经济或政治优势的最大化并不能很好地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从一开始，正是美国的海外朋友才成为这种政策的最大受益者。[①]

---

① 沃尔特·艾萨克森和埃文·托马斯：《美国智囊六人传》，第 386—418 页；查尔斯·S. 梅尔："生产力政治学——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基石"，参见，彼得·卡赞斯坦编：《在权势和富足之间》（麦迪逊，1978 年），第 23—49 页；罗伯特·O. 基欧汉和约瑟夫·S. 奈：《权力与相互依赖》（波士顿，1977 年），第 135—136 页；迈克尔·J. 霍根：《马歇尔计划》（坎布里奇，1990 年），第 443 页。

马歇尔、艾奇逊与凯南几乎没有丝毫犹豫就接受了以下观念：美国不得不担起历史上英国的角色，以遏制俄国权势在东地中海的扩张和影响。凯南强烈要求在欧洲任何地区对苏联实行遏制，艾奇逊则因苏联对土耳其的压力尤为苦恼。鉴于英国意志力的丧失和资源的缺乏，希腊的危机为美国提供了实践和解释后来所称的“遏制”政策的大好机会。为赢得对该政策的支持，他们制定了相关的策略，而且取得了成功，然而却造成了始料未及而且最终也无法解决的难题。

马歇尔、艾奇逊与凯南知道，他们准备支持的希腊政府不值得美国施以援手，因为它腐败堕落、镇压成性而且愚蠢无能。尽管他们推测苏联将从共产党在希腊的胜利中获益，斯大林也将为之欢欣鼓舞，而且他们也清楚，几乎没有什么证据表明苏联直接介入了希腊内战，但是，他们最终关注的并非希腊，而是为美国干预中东寻找依据。万一发生与苏联的战争，该地区将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其石油储备决不能落入敌对国家之手。他们打算发出信号，由美国作为该地区支配性力量接下英国的角色。[1]

斯大林发现自己处境尴尬。正如他告诉丘吉尔的那样，他一直愿意把希腊丢弃给西方。苏联对土耳其和伊朗的直接压力表明，他对这两个国家更有兴趣。他不想因希腊引发一场与美国的对抗。但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急于支持希腊的共产党人，斯大林建议南斯拉夫人保持克制，但这位南斯拉夫的独裁者并非依靠苏联刺刀来维持统治，他是在领导反德斗争中控制南斯拉夫的。在确定本国的目标和政策时，他基本不看莫斯科的脸色。斯大林深感进退维谷，一方面担心触怒美国人，另一方面又

① 约瑟夫·M. 琼斯：《十五周》，纽约，1955 年，第 73 页；乔伊斯·科尔科和加布里埃尔·科尔科：《力量的限度》，第 232—242 页；德博拉·韦尔奇·拉森：《遏制的起源》，第 302—323 页；梅尔文·P. 莱夫勒：《权力的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第 237—246、286—291 页。

不愿疏远一个自主的盟友。直至美国人开始行动，铁托才被说服减少对希腊共产党的支持。[①]

1947年2月，当英国人正式通知美国他们已无力再支持希腊政府的时候，马歇尔的团队已有所准备，杜鲁门也是如此。国会领袖们被召到白宫，马歇尔在那里向他们介绍了希腊和土耳其的局势，解释了英国人无力承担其历史角色的情形，请求他们为美国接过英国的任务拨出必要的款项。然而，行政当局最大的担忧立即得到了证实。第80届国会的领袖们不愿意浪费纳税人的金钱去养活饥饿的希腊人或者去解决英国的问题。一个更加慷慨的、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好不容易才批准1946年的对英贷款，此届国会已拒绝增加对外援助和防务开支，以牺牲美国为代价去拯救英国的利益，它对此没有丝毫的兴趣。

然而，艾奇逊清楚他要弹什么调子，这些国会议员都是苏联和共产主义扩张的直言无隐的反对派，他警告说，苏联人的扩张方兴未艾，他们正以一种大胆的策略，试图进入三个大陆。如果希腊落入他们手中，土耳其、伊朗以及小亚细亚将会步其后尘。没有什么能阻挡俄国人经埃及进入非洲和通过意大利与法国侵入欧洲。赌注实属高昂，危险已经迫近，而且，随着英国权势的崩溃，惟有美国才能阻止苏联人的步伐。阿瑟·范登堡参议员（共和党人，来自密歇根州）——在对外事务方面，他一向表态支持本党的政策——向杜鲁门保证，如果他能像艾奇逊那样向国会讲话，国会将会给予积极的回应。

1947年3月，在致国会的咨文中，杜鲁门请求为援助希腊和土耳其拨款4亿美元，并发表了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政策声

① 米洛凡·吉拉斯：《与斯大林的谈话》，纽约，1962年，第81—82页；小威廉·O. 麦克吉：《四面楚歌的斯大林（1943—1948）》（底特律，1978年），第242、297、300页；威廉·陶布曼：《斯大林的美国政策》（纽约，1982年），第150—151页。

明：

> “除非我们愿意帮助自由的民族维持他们的自由制度与国家的完整，以抵制企图将极权体制强加于他们的各种侵略行动，我们就将不能实现自己〔有关联合国所有成员的自由与独立〕的目标……我认为，美国的政策必须支持各个自由的民族，他们正在抵抗武装的少数集团或外来压力所试图进行的征服活动。”

国会很勉强地拨出了这笔资金。

在当时，在多年之后，批评家对杜鲁门以如此启示性语言描述苏联威胁是否明智提出了质疑。正如历史学家梅尔文·莱弗勒后来强调的那样，苏联的行为“几乎不能证明艾奇逊和杜鲁门使用的刺激性言辞的正当性”。[①] 很清楚，美国领导人压根儿不认为苏联的进攻已经迫在眉睫。美国军队没有为战争做好准备。另一方面，马歇尔、艾奇逊与凯南都坚信苏联的扩张主义性质，坚信苏联超越其安全需求，企图将影响扩张到世界上任何易受攻击的地区，坚信中东（经由希腊）与西欧均面临日益逼近的本地共产党颠覆的危险。只有美国能阻止他们，但是，美国有此种意愿吗？

在其电报和《外交》季刊[②]上（1947 年 7 月）发表的那篇署名 X 的著名文章中，凯南使用夸张言辞的宗旨就是为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使之在震惊之余认识到这一严重问题的存在。艾奇逊与杜鲁门的其他助手也怀有类似的看法，即需要警醒国会和美国

---

① 梅尔文·P. 莱夫勒：《美国的国家安全观与冷战之肇始（1945—1948）》，《美国历史评论》，第 89 卷（1984 年），第 368 页。

② 《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是美国著名思想库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在 1922 年所办刊物，为该委员会宣传其对外政策主张和理念的重要阵地。1993 年年末由季刊改为双月刊。也有人译为《外交》、《外交事务》、《外交季刊》等。——译者

公众，使之认识到要以足够的注意力和金钱对付这种来自外部的威胁。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中，总统对国会的控制往往有限，特别是它为反对党控制的时候。国会议员们有自己的议事程序，一般说来，与对行政部门的外交事务要求的反应相比，他们对国内特殊利益集团要求的反应更为迅疾，而以和平时期为甚。战争期间，把国会注意力集中到对外政策上较为容易，行政部门也能不费太多周折就能满足需求。杜鲁门政府 1947 年的策略目标就是为造成一种气氛——至少在华盛顿是如此，如果需要的话在全国亦如此，使得行政部门能像战时那样掌控立法机构的议事日程。如果说赢得国会和公众支持的前提误导他们，使之相信苏联的确威胁了美国利益，而且威胁已迫在眉睫，那么，看来这是一个需要付出的小小代价。可以想见，没有别的什么替代办法能从第 80 届国会那里弄到拨款。[①]

凯南很快就悟出了杜鲁门主义带来的严重问题，沃尔特·李普曼也意识到了。虽然杜鲁门的话主要是讲给本国人的，但莫斯科的任何人都能够读到它。这些言辞以及深思熟虑的对土耳其军事援助的使命，都会被斯大林视为挑衅，被视为对苏联的一种威胁。更有甚者，杜鲁门的讲话也意味着，美国准备援助世界上任何地区的每一个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国家，却不去好好地算计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他暗示要组织一场全球性的十字军讨伐，这又是美国力所不及的，而且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大能说得通。然

---

① 乔伊斯·科尔科和加布里埃尔·科尔科：《力量的限度》，第 329—358、374—376 页。可参阅，迪安·艾奇逊：《创世亲历记》（纽约，1970 年），第 489 页。他在该书有关 NSC68 号文件的内容中解释了哄骗美国人民的必要性："如果我们把观点说得比事实还清楚，我们就与绝大多数教师爷没有了区别。"也可参阅，斯蒂芬·O. 克拉斯纳：《美国的商业和金融政策——解读外部强大而内部虚弱的悖论》，引自彼得·卡赞斯坦：《在权势和富足之间》，第 51—87 页，在论述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弱点时提出了一种有说服力的观点。

而，艾奇逊没有什么耐心去考察其中的细微差别，他的办法就是动用专为那些对赤裸裸的强硬手段更为敏感的人所设计的现实政治的手段。

事实证明，在艾奇逊未能考虑的那些方面，凯南与李普曼的看法是正确的。对中国怎么办？国会议员周以德（共和党人，来自明尼苏达州）和蒋介石的其他朋友质问道。尽管乔治·马歇尔全力以赴，内战还是在中国爆发了，共产党军队与苏联联系频繁，目的是要推翻蒋的政权。毫无疑问，中国至少像希腊那样值得美国拯救。但艾奇逊怯懦地坚持说，杜鲁门主义不能四海皆准，每一地区的形势应依其本身情况加以判断，而中国的情况与希腊完全不同。然而，更为谲诈的问题是：为什么杜鲁门政府对国内共产主义的发展放任自流，而在阻止海外共产主义的时候却如此急如星火？在这个决心要击退新政、决心将民主制度等同资本主义、把福利国家看做共产主义的社会中，除了蒋介石的支持者之外，艾奇逊及其同僚也不知不觉地强化了这些观念。但是，他暂时取得了成功，款项拨出来了，希腊与土耳其就要得到“拯救”了。

更为危急的问题出现在西欧。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经济形势令人绝望。生产难以达到战前水平，从美国购买必需品的美元供应出现短缺，通货膨胀升至危险的高度，国内的分配制度早已崩溃，社会动乱持续增长。有关极度苦难的报道充斥新闻媒体，也极为迅速地为驻在国使节电传至国务院，在华盛顿引发了人道主义忧虑，但是，决定行动的还是美国的自身利益，是美国对欧洲的混乱和颠覆活动的担忧。使西欧远离斯大林的影响，这是美国最起码的要求。部分原因是该地区对于美国商业与防务的极端重要性，而且还在于它是西方文明的共同价值观的发祥地。美国必须使西欧获得 20 世纪美国人所享有的自由和安全感。欧洲领导人非常清楚美国的忧虑，为了得到急需的援助，他们就

极力地夸大共产主义的威胁。[1]

在李普曼的协助下，艾奇逊、凯南及其同僚制定了一个杰出的援欧方案。为了制定一个统一的欧洲复兴计划，美国打算请欧洲各国政府带头。美国领导人早已承认德国经济对欧洲经济安全的重要性，而且一直在探索政治上可行的重建德国的途径。把西德融入复兴的欧洲经济之中也许会减轻它对法国的威胁，也是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民能够容忍的。正如历史学家沃尔夫拉姆·汉瑞德强调的，美国政策乃"双重遏制"（double—containment）之一种，除遏制苏联之外，它还有对付德国的目的。[2] 但是，更重要的是该方案的主导思想：让欧洲人制定自己的复兴计划而不是把华盛顿制定的计划强加给他们。

固然，那些为杜鲁门所说的"马歇尔计划"工作的美国人制定了一个他们希望实现的清晰构想，此外，他们没有强调阶级冲突和财富的再分配，而是致力于建设布雷顿森林会议展望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推动自由贸易与货币自由兑换、输出罗斯福之新政计划的社会理念、以及强调增加生产和为每一个人提供更多的产品。战后混乱减缓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设步伐，马歇尔计划将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资金。这一体系也将服务于美国的经济需求，它将施惠于欧洲，它将有益于世界。欧洲规划者有自己的盘算，一些人对劳工阶级吝啬有加，一些人不愿考虑美国的经济需求，为满足自己之需，他们对方案作了反复的修订。这个成果是对大西洋两岸远见卓识者的一种称赞。[3]

尽管最初担忧欧洲经济的美国官员与商人对马歇尔计划的前

---

① 约瑟夫·M. 琼斯：《十五周》，第 239—254 页；麦克尔·霍根：《马歇尔计划》，第 445—447 页。

② 沃尔夫拉姆·汉瑞德：《德国、美国、欧洲——德国对外政策四十年》（纽黑文，1989 年）。

③ 迈克尔·J. 霍根：《马歇尔计划》，第 427—445 页。

景感到高兴，但欧洲复兴计划的动力还有政治方面的考虑。杜鲁门和马歇尔把该计划视为在欧洲反对苏联侵略和保卫美国利益的手段，希望借此撑起西欧经济，使该地区增强抵御苏联颠覆的能力。然而，他们的顾问不同意为反对苏联而把该计划推展到整个世界。他们也的确放权让欧洲人邀请苏联和东欧参加，因为他们推测共产党国家将不会接受这样的邀请，而且，即使苏联和波兰政权选择参加在巴黎召开的首次计划会议，他们也会知难而退。苏联很快就退出了，随即把恋恋不舍的波兰人和捷克人也拖了回去。斯大林对把苏联经济或他控制下的任何国家的经济纳入美国支配的经济秩序均没有兴趣。不出凯南的预料，苏联人承担了以接受和拒绝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为标准把欧洲国家一分为二的责任。

如果苏联选择加入马歇尔计划，人们就可以展望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在这样的秩序中，苏联及其卫星国将会开放边界，并且还会向马歇尔计划的审计官敞开账册，给共产主义及其计划经济一个参与世界市场竞争的机会，使集聚于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所有紧张随风而逝。但话又说回来，既然杜鲁门政府在获得 4 亿美元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时已遭遇如此的阻力，在第 80 届国会还未意识到需要阻止即将来临的厄运时，很难想像它会拨出几十亿美元用于外援。事实上，甚至在苏联退出并谴责该计划之后，国会仍不愿意妥协。像罗伯特·塔夫脱参议员（共和党人，来自俄亥俄州）这样在国内一向敌视新政的保守分子，并不急于在外援方面投入金钱。其他人则从未喜欢过这个新经济秩序要求的削减关税的义务。还有一些人，包括自由派和保守派，都不愿把美国的税收收入输往海外。自由派发现了贫困的美国人，而保守派宁愿把金钱用于防务、或者拒绝把税收收入拨给行政部门。所以，直至 1948 年 2 月，国会是否给马歇尔计划拨款仍然大有疑问，然而就在此时，斯大林的疏忽大意总算助了杜鲁门政府一

臂之力。

在整个1947年秋冬，直至进入1948年，遵照莫斯科的指示，西欧各国共产党都竭力阻挠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当地经济岌岌可危，各国政府朝不保夕，共产党人企图用大规模罢工颠覆它们。许多征象表明，斯大林的战略业已改变，其行动也日益明确。莫斯科创建了共产党情报局——一个以协调全世界共产党活动为宗旨的组织，企图藉此向坚如磐石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神话中塞进一些实质性内容。苏联显著加强了对东欧的控制。斯大林好像并未因美国早先的不快而备感忧虑。他对杜鲁门主义——一些学者一直视之为反苏的冷战宣言——最令人感兴趣的反应是要马歇尔相信，过不了多久，所有分歧都能够获得妥协的解决。但是，马歇尔计划、特别是美国打算重建德国以及将其纳人反苏集团的种种征兆，在莫斯科引发了恐慌。这是"安全困境"起作用的又一个典型例证。美国人及其西欧朋友正在为他们所认为的防御行动未雨绸缪，以防备苏联对他们安全的潜在威胁，这又降低了苏联人心中的那一点点安全感。苏联对西方的威胁迅速作出反应，加强了对其属国的控制，然而，他们采取的每一步行动均被美国视为对自己及其西欧朋友的安全的威胁。在美苏两国从盟友转向敌手的过程中，一方在寻求自身安全的同时都降低了另一方的安全感。

1948年2月25日，捷克共产党人在已处优势的情况下发动政变，这次政变由于亲西方的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3月10日莫名其妙的死亡而更加引人注目，也确保了苏联对这个国家的完全控制。在华盛顿，美国领导人想知道苏联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是否正在展开，战争是否已迫在眉睫。新成立的中央情报局只向总统保证说，在此后60天内不会爆发战争。为了从国会索要更多的拨款，美国军方处心积虑地强化人们的忧虑。在五角大楼的要求下，克莱将军从德国报告说，战争可能会"戏剧性地突然"到

来。置马歇尔的不同观点于不顾，杜鲁门在3月17日巧妙利用了这次战争恐慌，企图藉此达到国会为马歇尔计划拨款的目的。就在这一咨文中，他强调了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残酷行动带来的威胁，要求国会恢复审议马歇尔计划，同时要求国会为国防开支和全面军事训练拨出额外的资金。国会满足了他的许多要求。斯大林的“防御”行动促使国会通过了他所担忧的马歇尔计划，美国的经济力量使西方世界团结起来一起反对他，而且这一次，西方世界涵盖了德国的大部分地区。[①]

紧张局势在1948年6月迅速升温。毋庸置疑，俄国人由于德国的形势——西方占领区的合并、整肃纳粹行动的结束、重建德国工业能力的决定、创建一个强大的西德国家并使之加入西欧一体化之中——而陷入深深的不安，虽然其中一些是苏联人自己触发的，他们也有充足的理由对此感到担忧，并试图扭转这一趋势，因为一个强大的德国可能再次威胁苏联的安全。斯大林小心翼翼地开始了行动，不断骚扰西方占领区与柏林——由英法美管制的柏林部分位于苏联占领区——之间的交通往来。然而，在6月24日，苏联人断绝了通往西柏林的所有交通运输。克莱将军要求采取行动强行打破封锁，向苏联发出最后通牒，实行武装押运以逼迫苏联人摊牌。战争仿佛随时都可能爆发。

在华盛顿，杜鲁门及其顾问、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拒绝了克莱的建议。他们不希望开战，军方还没有为打仗做好准备，但是，他们也不可能对苏联否认其进出柏林、断绝数百万柏林人与西方联系的企图听之任之。在政治上，总统也不能示弱，民意测验表明，美国人民认为他的对苏政策“软弱”，1948年可是一个选举年！同样重要的是，有必要向苏联人和西欧人民展示美国的

① 丹尼尔·耶金：《破碎的和平》（波士顿，1978年），第343—353页；琼·爱德华·史密斯：《卢修斯·D. 克莱》（纽约，1990年），第466—468页。

决心。最后，美国以空运作答，给柏林人运去了惊人数量的食物与煤炭。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每隔几分钟就有一架类似的巨型运输机着陆。空运耗资巨大，但却极为成功。苏联飞机也偶尔骚扰一下西方的运输机，但从未采取威胁行动。看来，在战争准备方面，斯大林并不比杜鲁门做得更好。

1949 年 5 月，苏联人承认失败，解除了封锁。斯大林试图以相对谨慎的手段去阻止一个潜力巨大和威胁性的德意志国家的创建，而这是美国自战争结束后采取的最具威胁性的步骤。他虽然失败了，有关柏林的对抗却改变了美苏关系的性质。美国对东欧、特别是波兰事务上的指责一直使苏联人烦恼不已，然而，斯大林根本不理睬美国人，偶尔也扔给他们一根骨头而不作任何实质性让步。杜鲁门对希腊的闲言碎语也让人心烦，能控制希腊当然不是一件坏事，但苏联早就把希腊丢弃给西方了，是铁托而非斯大林一直在那里与西方较劲。美国对苏联在伊朗和土耳其利益的敌视更令斯大林愤愤不平。不过，在适当的时候，当苏联相对于美国的力量增强之后，就会出现带来更令人满意结果的机会。无论如何，德国的重建以及把一个德意志国家纳入美国领导下的反苏联盟，却真的使苏联人惶恐不安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击败了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给苏联带来了巨大的浩劫，几乎到了致其毁灭的地步。有美国人在后面撑腰，复仇的德国人有能力抹去斯大林 1945 年以来的所有收益，而且再一次给苏联人民带来灾难。苏联只好认定美国的行为实属对它的敌视，所以要理所当然地予以回击，使用战争之外的所有方法迫使美国人后退，而且也失败了。由于无力与美国抗争，苏联被迫接受了按美国条件促成的德国以及欧洲分裂的现实。

华盛顿的感受与莫斯科完全不同。美国对苏联并无敌意，它已经表明承认苏联安全需求的意愿，接受了苏联把东欧和中国东北（满洲）变成势力范围的现实，它也愿意在布雷顿森林会议计

划的国际经济秩序中给予苏联某种角色。然而，苏联人在东欧行为乖戾，有时候甚至是残酷无情，而且拒绝了布雷顿森林协定。他们曾一度威胁伊朗、土耳其和希腊。莫斯科还利用西欧各国的共产党破坏该地区重建和复兴的努力。它还把捷克斯洛伐克曾经拥有的民主和所有的独立表象摧毁殆尽。最后，它又向西方国家在柏林的权利发起了挑战。杜鲁门的顾问都怀疑苏联正在试图控制亚欧大陆，有些人还认为，斯大林同希特勒一样企图征服世界。苏联威胁了美国的朋友以及美国的海外利益，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将很快会威胁到美国的安全。数年之后，一位名叫安德列·考茨耶夫的苏联高级外交官认为，斯大林主义是他的国家与战时盟国关系紧张的罪魁祸首，他认为，人们不可能信任一个“几乎不可避免地”把暴力扩展到边境之外的“独裁和反人民的政权”。“我们的伙伴因斯大林主义而担惊受怕，因为人们难以信任一个深陷备受猜疑泥沼的社会，也难以相信一个不信任自己人民的政权。”①

1948 年岁末，美国与苏联不再是盟友或朋友，这一点已路人皆知。他们已经确定要成为对手，但也许还不至于成为彻头彻尾的敌人。李普曼的“冷战”看来是一个适当的词语。两个国家都已经结束了军队复员的进程，启动了军事战备计划，包括为相互之间的战争做准备。然而，甚至是柏林封锁，尽管是那样的使人不安，还是由双方小心翼翼地解决了。他们都为对方留下退却的空间，未经流血就成功地消弭了危机。莫斯科与华盛顿均视之为实质性问题的德国分裂已经成为现实，他们之间已没有什么遗留问题。这个世界呈现出一种让人不安的均势状态，它在外表上是两极的，然而，其中美国的优势力量、包括对核武器的单独掌

① 引自布鲁斯·拉希特：《紧握宝剑——国家安全的管理方法》（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90 年），第 144 页。

控，却保证了美国与盟友的安全。美国也许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击退苏联的扩张，也许有能力颠覆莫斯科的共产主义政权，但是很清楚，美国并没有付出这样一种代价的意愿，也没有什么证据表明斯大林对美国这样的进攻忧心忡忡。鉴于欧洲的分裂是可以忍受的，而且又没有任何至关重要的利害冲突，这两个最强大的国家或许能致力于解决它们更应关注的国内问题。然而，他们没有这样做。

对柏林成功的空运挽救了哈里·杜鲁门的政治生命。由于该事件给了他一个展示美国力量的良机，使一个可怕的对手屈从于他的意志，杜鲁门因此赢得了另一个领导人民的机会。在美国选举史上最混乱之一的选举中，虽然失去了投向进步党候选人亨利·华莱士的左翼选票，也丢掉了流向以南部民主党人身份参选的斯特罗姆·瑟蒙德的右翼选票，因为他拉走了那些认为杜鲁门过于同情美国黑人的南方民主党人的选票，但是，杜鲁门还是击败了广受赞誉的共和党候选人——来自纽约的托马斯·E. 杜威。身患重疾的马歇尔得到杜鲁门允准而解甲归田，国务卿一职就落到了艾奇逊肩上，杜鲁门团队剩下的大多数人都聚集在他的周围。

下一步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创立，它是从 1948 年在欧洲国家的倡议中演变而来的。马歇尔计划的受援国对美国的宽厚大度虽然欢欣鼓舞，然而他们担心，经济援助也许不足以遏制他们所感受的苏联和共产党情报局的政治威胁。华盛顿的美国人远在大西洋的另一边，与苏联坦克相距最近亦有数千英里之遥，而且几乎感觉不到他们小得可怜而又极其虚弱的共产党的存在，因此，他们也许会感到安全。但是，欧洲国家领导人可没有这样的感觉。1948 年 3 月，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借助布鲁塞尔条约联合起来，旨在保护自己免遭苏联、如果需要也免遭一个复兴德国的侵略，希望美国也加入他们的联盟，因为他们

深知美国的力量对他们的安全是绝对必要的。

与欧洲国家在和平时期缔结军事联盟，这对美国而言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对美国领导人也并非很有吸引力（虽然他们在1947年已经与拉丁美洲国家签署了相互防御条约）。显而易见，他们对苏联人在其周边地区的行为甚是不悦，对苏联风格的外交烦恼不已，对苏联不尊敬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十分失望。然而，在整个1947年，直至1948年年初，他们并没有觉察到来自苏联的威胁，在欧洲及其他地区发生战争的几率也微乎其微，他们也没有发现经济援助、亦即美国金钱所不能缓和的问题。任何诸如建立和平时期同盟的极端步骤都是不必要的，而且也许会使第80届国会的许多议员义愤填膺。

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变，对随之而来在意大利发生类似政变的恐惧以及挪威对苏联压力的抗议，使那些主张与欧洲朋友达成一个相互安全协议的美国人取得了胜利。尽管美国军方一直对承担过多的义务和不得不与欧洲人分享物资与秘密感到担心，但它还是不怎么情愿地慢慢前进。柏林封锁提供了另一个必要的刺激因素。然而，美国政府坚持按其好恶重塑最终的组织，譬如说，华盛顿坚持给丹麦、冰岛、意大利、挪威和葡萄牙成员国资格，以淡化创始签字国的影响力。1948年美国选战的政治环境排除了在1949年之前签订条约的可能性，但是，这个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得以创建的条约最终于1949年4月签订。至少在纸面上，西欧领导人对他们企盼的美国政治和军事支持有了一些信心。[①]

1948年岁末和1949年年初，人们在华盛顿谈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时候，其紧张心态已经大幅缓解。美国成功阻止了意大利共产党在1948年4月的大选中取胜，对柏林的空运也取得成

① 劳伦斯·卡普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美国》（波士顿，1988年），第16—30页。

功，挪威人也不那么担惊受怕了。铁托与斯大林已经分道扬镳，而且他还在继续执政。如果曾经有苏联的进攻，它显然已经消退了。莫斯科已明显处于防守地位。斯大林及其外交官员正在向愿意倾听他们的人述说对和平的渴望。可以想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被证明是不必要的，它是对一种已经消失的危险的反应。鉴于它遇到的美国的决心，加之满足于在东欧和中欧的所得以及不愿为进一步扩张付出代价，苏联人决定接受这种现状，与西方在和平竞争中生活，在它把世界进一步拖到战争边缘之前结束这种紧张局势。

当然，甚至和平的竞争也意味着苏联将力争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无论是在斯大林还是在以后的任何不那么穷凶极恶的领导人带领下，苏联将要求得到一个超级大国应有的尊重，竭力发展它需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鉴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苏联领导人很可能仍然对他们的西方对手疑虑重重，他们并不认为美国影响的每一次扩展都是善意的，他们也不打算放弃对边缘地区、对新出现的独立于美国的那些国家的控制。

正如1946年那样，1949年，国际体系的结构再次支配了美苏之间的争夺。但是，在1949年，美国与苏联已经赢得了4年相处的经验，兵不血刃就设法处理了他们的分歧。斯大林明确承认了美国的力量优势，对它的效能有了清醒的认识，并且也清楚了美国力量可能得以使用的条件。杜鲁门及其助手划定了最后的界限，而且迫使斯大林就此止步。两国之间有可能出现暂时的缓和，双方也可能赢得服务本国国民的时间，但是，美国领导人拒绝承认苏联的竞争努力，也不愿承认美国相对力量的下降，他们对边缘地区逐渐脱离控制的迹象感到震惊，因此，他们就继续备战，以防止出现最坏的情形。

1948年大选没有缓解美国社会的紧张状态。杜鲁门出人意料的胜利意味着至少有另一个4年——总共20年——将在共和

党人不能控制白宫的情况下度过，而且，他还把民主党对国会的控制权带回了华盛顿。共和党基层政客因国家大权和重要职务任命权——美国政党的目标——的丧失而恼羞成怒，于是向他们的领袖施加压力，希望在战略上来一个根本转变，结束外交政策上两党一致的原则和他们所看重的“政策附和主义”（me-too-ism）。他们要求并精心组织了一场对杜鲁门政府各项政策的猛烈进攻。基于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柏林空运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诸多事实，有关杜鲁门“对共产主义心慈手软”的批评是难以得逞的，然而，蒋介石政权在中国的垮台为反对行政当局的势力提供了一个他们不会错过的机会。

不管 1946 年马歇尔为调处作出多少努力，内战还是在中国爆发了。蒋介石把美国的援助挥霍殆尽，丧失了他发动战争时的巨大的兵力和火力优势，艾奇逊 1949 年 1 月就任国务卿时，他在中国共产党的打击下已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绝望之余，蒋介石及其美国朋友乞求美国改变对中国的不公做法，以挽救他的政权。假如马歇尔或艾奇逊能够想出一个阻止共产党在中国取胜的方法，毫无疑问，他们早就付诸实施了，但他们的顾问警告说，这个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人力与财力的支出超出了美国所能忍受的程度，而且，在美国战略家的心中，中国的重要性难以与欧洲、中东和日本相提并论。马歇尔，这位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第一战略的设计者，与艾奇逊这位造诣极高的大西洋主义者一道，在该问题上无需向顾问们问计。中国沦陷于中国共产党之手是人们不愿看到的，也是不幸的，但还不至于构成一个灾难性的失败。中国是一个弱国，在可预见的将来可能仍然如此，对苏联而言，它与其说是一项财富，倒不如说更像一个负担。到了适当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就会像铁托和南斯拉夫那样摆脱莫斯科的控制。美国需要做的就是尽其所能加速这一时刻的

到来。[1]

尽管在此前就有与院外活动集团和支持蒋介石的国会议员打交道的经验，马歇尔和艾奇逊都不希望把蒋介石的失败和国内政治搅和在一起。那些人指责罗斯福和杜鲁门的民主党政府背叛了忠实的盟国，拒绝在物资上援助本可能取胜的蒋介石政权，而批评蒋介石贪污腐败、镇压成性和效率低下的政府官员被指控为共产党的代理人，他们要求民主党人承担“丢失”中国的责任，对其施加了无情的骚扰与折磨，而实际上，在这些共和党分子中，有很多人基本上不关心中国的命运。有一位反政府的著名新闻记者名叫乔治·索科尔斯基，他在署名的专栏文章中攻击政府没有援助蒋介石，又在不署名的社论中攻击政府在援蒋方面浪费了纳税人的钱财。他们之所以生出这些事端，其目的就是拿民主党人示众，以便在政治上取得优势。[2]

然而，对杜鲁门政府的攻击也有超越党派政治的意识形态因素。1947 年，随着国会推翻杜鲁门的否决和《塔夫脱—哈特利法》的生效，反新政势力已经赢得了对工会的一次重要胜利，显著削弱了工会力量。参议院坚持不懈地为杜鲁门在劳务市场防止歧视黑人的适度努力设置障碍。自封的保守分子把新政与共产主义同等看待，但是，新政只是美国历史上为不幸的公民提供一种最低水平体面生活的那些偶然的尝试之一，其目的是保护他们免遭伴随市场经济周期性经济危机而来的苦难。对劳工、少数族裔、卫生保险和社会保障的支持被打上煽动共产主义的标签。20 世纪 30 年代，资本主义在美国成为一个肮脏的词语，因为美国

---

① 多萝西·博格和沃尔多·海因里希斯：《未定之秋——1947—1950 年的中美关系》（纽约，1980 年）。该书是有关本课题的权威之作。

② 南希·B. 塔克：《尘埃中的格局》（纽约，1983 年）；孔华润：《中国情结——罗杰·S. 格林、托马斯·W. 拉蒙特、乔治·E. 索科尔斯基和美国—东亚关系》（纽约，1982 年），第 260—272 页。

人坚信资本家应为大萧条负责。而今，社会上在20世纪30年代失势的某些人开始反攻倒算。与苏联的紧张关系，视共产主义为异己和敌对势力的观念的广泛传播，都很好地促进了他们的目标。

1948和1949年轰动一时的阿尔杰·希斯案件为盼望把主张新政的民主党人视为共产主义和叛国的那帮人提供了极好的关联。希斯是一位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1]的门徒，曾担任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的法律秘书，在接受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主席一职之前，他曾服务于罗斯福的农业调整局和司法部副部长办公室，在国务院还任过几个中级职位。他与新政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以及保守分子所诅咒的自由国际主义联系密切，看来还是其统治受到该国许多人满腔仇恨的东部权势集团的美国白人的典范。1948年，希斯被控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将秘密情报传给苏联，而且（因发誓否认其间谍罪名）以伪证罪受到起诉。首次审判在1949年7月因陪审团势均力敌而告结束之后，他于1950年1月被判有罪，部分原因是国会议员理查德·尼克松（共和党人，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经过努力，成功地找到了反对他的证据。这就证明，或者说如此即可断言，主张新政的民主党人业已背叛了这个国家。他们在国内外推行的计划已经破坏了美国的立国准则，因此不得不进行彻底的改变。艾奇逊曾经作过希斯兄长的律师合伙人，他声称不会抛弃阿尔杰·希斯，这又让行政部门的敌人拣了个便宜。

艾奇逊和杜鲁门蔑视那些折磨他们的人，他们认为自己的路

[1] 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1882—1965），1939—1962年任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会时期的法律顾问，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译者

线是正确的，就坚持干下去。蒋介石的中国即将被弃之脑后，罗斯福的福利国家的适度改革继续推行，国家公务人员受到保护，避免了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和艾奇逊斥之为“土佬”所在的其他保守机构的诽谤。但是，他们也时不时地作些让步，以便使政治运作保持顺畅，平息其更具理性的批评者以及加强他们在国会和新闻界的支持者。他们克制自己，避免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权，继续着他们与蒋介石政府——其残余力量已逃到台湾，正等着共产党的最后一击——的联系。杜鲁门出台了一个忠诚计划，去查找政府中的共产党分子。尽管行政当局不得不与国会的阻挠势力作战，但它受到的制约还不是太严重。

对杜鲁门的第二届政府而言，其开年必须解决的主要外交政策问题或许是防务开支以及美国与苏联对抗时采取的军事姿态。杜鲁门挡开了军方显著增加军事预算的强大压力，对美国给海外朋友的经济援助感到满意，以充分增加的核武库为后盾，他足以保护美国的安全和利益。杜鲁门主持改组了美国军方领导机构，由一位国防部长领导军队，1949 年，杜鲁门任命路易斯·约翰逊，一位承诺要削减军费开支的人担任此职。但是艾奇逊可不这么有把握，他的一些顾问因苏联常规力量的规模而如坐针毡，也对他们强调的苏联随时横扫西欧的能力苦恼不已。艾奇逊信奉实力决定论，他对诸如凯南那样认为苏联无意进军西欧的人极不耐烦，他怀疑是否有人能够弄清楚这个封闭而又神秘的斯大林主义国家的意图。美国必须对苏联的军事能力作出反应，它必须未雨绸缪，它必须以防万一，以保证在每个关乎美国利益的地点压倒苏联。但是，鉴于总统、国防部长、国会以及美国人民的反对，

大规模的军事备战计划是不可能的。[1]

1949年8月，苏联爆炸了一个核装置，从而帮了那些坚决要求美国扩军备战者一个大忙。尽管科学家们在1944年就曾警告罗斯福，苏联人5年之内很可能开发出他们自己的核炸弹，但当这天来临时，杜鲁门还是深受震动，而且有迹象显示，美国人民也陷入莫大的焦虑之中。而今的美国人也不得不生活在广岛和长崎的阴影之中了。现在，美国的核武库也许不足以吓阻斯大林走向战争，美国不得不去研制威力更大、技术更先进的核炸弹，而且也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常规力量的规模和部署。1950年1月，杜鲁门批准了研制氢弹的计划，命令对美国的安全政策进行重新的评估。

共产党人征服中国、阿尔杰·希斯案件以及苏联的核爆炸，在美国产生了各不相同而又相互交织的影响。[2] 要么因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分歧，要么的确对美国的战略态势表示关注，不满意杜鲁门行政当局的人强烈要求变革，要求制定更具进攻性的反苏政策。苏联在此种气氛产生时并没有施加什么影响，对于毛泽东在中国的胜利，苏联也没有起多大的作用，中国人将会经常向苏联领导人提及此一事实。从事间谍活动是一个肮脏的行当，毫无疑问，双方在1949年都为此忙得够呛，而希斯却被控在20世纪30年代末犯下了叛国罪。苏联肯定不希望让美国人永远享有对核武器的垄断。概而言之，苏联人刺激了美国人，但他们并非是主动挑起事端，此种情形之出现，几乎皆由现存的力量结构所造成。为了保持美国的军事优势，杜鲁门和艾奇逊开始行动，但在同月，即1950年1月，他们却拒绝了著名的共和党领袖要其干

---

① 梅尔文·P. 莱夫勒：《权力的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第304—311页。

② 埃里克·F. 古德曼：《关键十年及其之后（1945—1960）》（纽约，1960年），作者很好地把握了1949年美国人的心理状态。

预中国内战的请求。在一次重要的演说中，艾奇逊宣布亚洲大陆和台湾岛处于美国的防御圈之外。

3月，行政当局完成了对新的安全政策、亦即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的研究，目的就是以明确的语言为美国的大规模军事扩张寻找合法依据，确保美国具备持久的能力，以压倒性力量对付任何威胁。一个侵略成性的扩张主义苏联是预设的，它的能力被夸大了，它的危险是按照“最坏的情形”估计的，如果每一个可变因素都尽可能按照有利于苏联的标准进行评估，美国怎样做才能对付苏联的威胁？答案就是把军事预算增至3倍。然而，“安全困境”是明摆着的，苏联别无选择，只能制造核武器。他们认为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创设以及核武器的发展对苏联构成了威胁，这并非是空穴来风。但是，苏联力量的任何增长，其增强国家安全的任何努力，在华盛顿看来都威胁了美国的安全。但是，艾奇逊正准备再大干一场，为美国建立一支强大的“防御”力量，丝毫不去考虑苏联人对所受威胁的感受。也许幸运的是，杜鲁门虽然也赞同他的逻辑前提，但是，他并没有说服总统批准该计划所需要的资源。计划搁置了，冷战形势也稳定下来，斯大林开始呼吁和平，而且，在1950年初的几个月，和平的机会似乎就在眼前。

德国和日本战败之后，新的国际体系结构包含了美国和苏联这两个主要大国，它们都有扩张影响的机会。历史上，一旦这样的机会出现，这些国家都会抓住不放。美国和苏联的行动是可以预期的，当争夺它们之间某些地区的主导权时，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同样可想而知。苏联控制东欧的决心在整个战争期间都非常明确。统治东北亚、伊朗和土耳其这些俄国传统目标的再现也应该不使人感到惊奇。由于长期以来不愿在东半球扩展影响而只满足于控制许多西半球地区，如果美国不仅在东亚，而且还要在中东、西欧和中欧宣布自己的权利，那么罗斯福将会与斯大林一样

吃惊不已。在随后争夺势力范围、财富和权力的时候，经济与科技力量赋予美国巨大的优势，如果它本身不过度扩张的话。

无论哪两个国家取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始的争夺都将会继续下去。已经发生的争夺的性质、敌对与冷战，均肇始于以下事实：竞争国之一是一个给它统治下的人民带来难以忍受的苦难的残酷无情的专制政体，一个其统治方法使人深感恐惧的独裁国家，一个不可能对协议进行有效核查的神秘的封闭社会。更有甚者，在俄国革命后的 20 年里，苏联摒弃了约定俗成的外交惯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它还没有时间去养成新的行为习惯。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的交流一向困难重重，猜疑犹如水泡一样很快从下面冒上来，相互的理解和信任或许是几十年之后的事了。

美国政治制度的特性使问题更为恶化。政治学家斯蒂芬·克拉斯纳曾指出了"外部强大而内部虚弱的悖论"。[1] 世界最强大国家的领导人经常受到国内利益集团和宪法赋予国会的权力的制约。罗斯福和杜鲁门在追求他们所理解的国家利益的时候经常规避这种限制。杜鲁门及其顾问认为，要想克服公众和国会的惰性，就必须夸大苏联的威胁以及这种威胁在美国人不希望见到的后果中所起的作用。1950 年之后，那种夸大苏联威胁的观点已经根深蒂固，这极有利于反共产主义的理论家，使之最终主宰了美国的政坛。

美国自视为伟大的解放者，世界上许多国家也有此种观念。美国领导人希望表现得慷慨大度，但他们期待受人尊敬，希望他人接受美国重塑世界的原则。苏联对美国疑虑重重，不愿在美利坚统治下的和平中扮演从属的角色，这使美国人大为不悦。他们

[1] 斯蒂芬·O. 克拉斯纳：《美国的商业与财政政策——解读外部强大而内部虚弱的悖论》，参见彼得·卡赞斯坦：《在权势和富足之间》，第 51—87 页

对苏联没有多少尊重，对它的政治文化，对它统治其他民族的残酷手段，他们感到惊诧莫名。既然已从希特勒这个专制独裁者所擅长的难以言状的暴行中汲取了经验教训，他们预料斯大林在这方面将会与希特勒一比高下，他们认为斯大林与希特勒乃一丘之貉，他们的统治制度也如出一辙。虽然存在着争议，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尽管斯大林恶毒凶狠，尽管美国傲慢自大，尽管存在着制度上的对抗，美国和苏联还是不愿诉诸战争。他们的确相互关注着对方的所作所为，如果可以的话，就去储存大量武器，但是双方都没有打仗的意愿。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也许能学会如何相互地对话。

第三章　朝鲜战争及其后果

欧洲是美苏关系紧张的主要中心地区。苏联人认为控制东欧是其安全的关键所在，而美国人认为，一个非共产主义的西欧与其安全也息息相关。鉴于一个统一的德国可能会倒向对方阵营，任何一方也不愿冒险让它统一。当美国、英国和法国计划在它们的占领区不仅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德意志国家，而且在政治和经济上也将其纳入西方，并借此与苏联对抗时，战后时期惟一的[1]严重危机到来了。斯大林的反应是封锁柏林。

美国和苏联在亚洲都有重要利益。苏联统治着亚洲的全部北方地区，与朝鲜、中国、蒙古和阿富汗毗邻。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在争夺太平洋地区，并最终控制了它。亚洲在过去始终没有摆脱大国在这一地区的对抗，它也将难以摆脱美苏之间的争夺。然而，对美苏两国而言，亚洲的重要性与欧洲相比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然而，一场战争注定要在东亚爆发，这场战争将改变美苏对抗的性质，使之从国际体系的政治竞争转变为一场受意识形态驱使并威胁到世界根本生存的军事竞赛。正如逐渐为人所熟知的第三世界的其他地区一样，地区性角色在这场冲突和亚洲其他冲突的生成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在此期间，特别是在斯大林去世之

[1] 原文如此。——译者

后，苏联制定了政策，准备援助所有反对帝国主义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运动。美国领导人——曾经渴望美国以帝国主义的头号对手的面目出现——很快就得出了结论：所有的左翼运动要么是莫斯科的工具，要么可能成为苏联强权的附属物，“民族解放战争”是必须要予以扑灭的共产主义阴谋。一般说来，由于谨慎而不愿意冒直接对抗的风险，超级大国就让他们的代理人去相互厮杀，但是，仍然有10万多美国男女军人在东亚与共产主义的战斗中失去了生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也许是20世纪后半期最重要的一系列事件所构成的非殖民化运动搭好了舞台。殖民大国，如英国、法国与荷兰都受到战争的极大削弱。日本激发了亚洲各地的民族主义情绪，作出了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保证，成功地把西方人赶出了东亚、法属印度支那、英属马来亚和英属缅甸、荷属东印度群岛以及美属菲律宾。战争结束时，这些殖民地的各民族都不欢迎他们的帝国主人卷土重来。印度次大陆的人民虽然没有积极响应日本的保证，但也不再满足于继续作英国的臣民。随着日本的战败，它统治之下的各民族、至少是中国人和朝鲜人，正在努力地挣脱他们那自封的主子，去赢得自己的自由与独立。而且，经过一段时间后，他们都成功了，一些靠苏联的帮助，一些有美国的支持，有的没有遭受什么苦难，有的经历了可怕的毁灭性战争。他们之所以要打这些战争，不仅是为了追求独立，而且还为了决定独立后谁将统治这些国家。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混乱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场景。当地领导人成功地把超级大国拖下了水，使危险更加恶化和扩大，在世人看来，其结果就是世界战争的再生。

日本自身没有遭受席卷亚洲的诸多动乱的影响。但是，战争和美国无情的轰炸、包括对东京的燃烧弹袭击与对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攻击，使日本遭到了毁灭性打击，经过在诸如硫磺岛和冲

绳岛的残酷争夺，他们的武装力量损失惨重，日本人已经比较温顺乖巧了。他们接受了美国总督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仁慈统治，为了利用他，他们可谓是费尽了心机 。苏联获得了对库页岛和日本列岛以北的一组小岛——这所谓的北方四岛使几代人之久的日苏关系陷于困境——的控制权。但是，在对日占领中，他们被排斥出局，失去了任何实质性的角色。

主要由于日本人善于接受外来影响，美国占领者在日本推行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工业力量的庞大聚合体——财阀（zaibatsu）——被解散，土地被重新分配，工会组织得到了加强。在日本实行新政的观念来自于麦克阿瑟驻东京的文职幕僚。然而，由于对苏联日益增加的恐惧远远超过了对一个复兴日本的担忧，华盛顿的美国领导人最终"改弦易辙"，决定重建日本经济，把日本纳入正在出现的反苏集团之中，正如他们处置德国那样。与在德国的情况毫无二致，美国毫不费力地就从日本传统的精英分子中找到了反苏领导人。而且也一如德国重建之影响，日本的重建至少使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朋友像它的对手一样感到惊恐不已。[①]

战争行将结束时，罗斯福消除法国对印度支那的宗主国统治的本能兴趣被忘却了，该地区的解放任务留给了英国人和中国人。中国阻止法国返回的努力难以与英国的推动力量相匹敌。越南的民族主义者，也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越盟，由于不能和平地获得独立，到 1946 年就已经投身于一场革命战争之中。尽管越南人求助于对杰斐逊和林肯的怀念，美国对他们的事业还是显得兴趣索然，而且，当美国人对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人开始持怀疑的

---

① 迈克尔·沙勒：《美国对日本的占领》（纽约，1985 年）。有关该问题和文献的论述，参见卡罗尔·格鲁克：《纠缠不清的幻想——日本人和美国人对占领的观念》，载孔华润编：《美国——东亚关系中的新边疆》（纽约，1983 年），第 169—236 页。

态度后，也就变得越来越敌视他们。[1]

相比之下，美国逐渐变得更加支持在东印度群岛为自由而与荷兰人战斗的男男女女，它向荷兰人施加压力，从而最终确保了印度尼西亚的独立。然而，就此事而论，美国之所以干预，主要是担忧如果不能把荷兰人从这些岛屿上赶走，这场非共产主义独立运动的领导权将会落入共产党人之手。同样在印度支那，长期以来美国对自决原则的承诺和历史上对帝国主义的反对，首次从属于不损害一个重要的欧洲朋友，接着又服从于反对共产主义的需要。[2]

随着菲律宾和中国形势的变化，美国进一步卷入其中，这个模式已经可以看清楚了。1946 年，美国以最真实的手段展示了它的反帝国主义态度，把独立授予了它的臣民——菲律宾人。然而，宗主国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美国还保有对驻留于该群岛的主要基地的控制权，而且继续操纵着当地的政治运作，以至于传统的精英阶层——他们曾经与日本人进行合作，正如在战前和战后时期与美国人合作那样——仍然处于它的控制之下。直至左翼领导的农民革命者、亦即新人民军（the Hukbalahap）的壮大之前，该群岛经济上的相互分割以及与殖民地联系的骤然丧失，在华盛顿并未引起什么人的忧虑。然而，为了镇压这场农民运动，美国政府此后迅速提供了指导和必需的援助。[3]

---

① 伯纳德·福尔：《失乐之街》（纽约，1972 年）；埃伦·J. 哈默：《为印度尼西亚而战（1940—1955）》（斯坦福，1956 年）；加里·赫斯：《美国作为一支东南亚力量的出现（1940—1950）》（纽约，1987 年），第 159—214、311—332 页。

② 罗伯特·J. 麦克马洪：《殖民主义与冷战——美国与争取印度尼西亚独立的斗争（1945—1949）》（伊萨卡，1981 年）。

③ 小詹姆士·C. 汤姆森、彼得·W. 斯坦利和约翰·柯蒂斯·佩里：《多愁善感的帝国主义者》（纽约，1981 年），第 268—275 页；加里·赫斯：《美国作为一支东南亚力量的出现（1940—1950）》，第 217—250 页。

中国是一个更为复杂和更加重要的实例。战争末期，蒋介石政权失去了华盛顿的同情，它已经证明是一个不俯首听命的盟友。但是，战争期间与毛泽东的共产党之间的同志情谊也迅速让位给对他们与莫斯科之间关系的担忧。正如在其他任何地区那样，美国人希望按照他们自己的形象重新塑造中国，通过创建一个国民党与共产党“稳健派”的联盟来实践他们的使命意识，这就是在中国实行的新政。显而易见，与诸如蒋介石和毛泽东那样难以驾驭的爱国者打交道，美国所期待的与中国的一种“恩主—扈从”关系是不会轻易地实现的。既然马歇尔在 1946 年未能避免内战，美国领导人也就放弃了对以服务美国利益为宗旨的类似于一个中国的期望，蒋介石的胜利成为他们明确的优先选择，他们继续援助其军队，尽管没有他所希望的那么多，但还是远远超过了他们认为的他的政权值得援助的数量。诸如马歇尔、艾奇逊和凯南这样的人心里清楚，蒋介石在 1948 年的垮台以及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随后建立尽管是不幸的，而且也有悖于美国利益，但还不至于酿成一场灾难。他们知道，较之于华盛顿，毛泽东与莫斯科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但他们也明白，毛泽东与那些他最亲近的人都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正如他们在 1948 年 11 月设计的对华政策的那样，他们认为共产党中国能够避免成为一个“苏联强权的附属品”。[1]

艾奇逊在 1949 年决心抛弃已逃到台湾的蒋介石，并寻求与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Republic）的和解。但是，国内的政治环境妨碍了他的努力，而且，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和宣言也未能在这方面助其一臂之力。他在国务院的大多数顾问、国防部长及

---

① 孔华润：《艾奇逊、他的顾问和中国（1949—1950）》，载多萝西·博格和沃尔多·海因里希斯编：《未定之秋——1947—1950 年的中美关系》（纽约，1980 年），第 13—52 页。

其助手、两党的主要国会议员均持反对意见，有时还为他的政策设置障碍。在一位犹豫不决的总统的支持下，艾奇逊控制着航向，他认为时间在自己一边，到一定的时候，共产党人将会消灭蒋介石政权，美国人将学着与一个共产党中国的现实共处。对艾奇逊而言，毛泽东 1949 年 12 月的莫斯科之行以及作为其结果的中苏同盟是一个明显的挫折，但他坚持认为，中国和苏联并非天然的盟国，中国的民族主义将会阻止苏联控制中国，当两国间的问题使其分道扬镳时，这一天终将来临。1950 年 1 月，艾奇逊公开谈及一个把台湾排除在外的美国防御圈，他还暗示，等到内战尘埃落定，美国将会承认毛泽东的北京政府。在春天离去与夏天光顾华盛顿之际，他的助手们正在为弄出一个拯救台湾的计划而拼命地工作，而后战争就在朝鲜爆发了。①

这样一场发生在朝鲜的内战将成为战后美苏关系决定性的转折，而且增加了世界战争爆发的可能，现在回头看看，好像一点也不奇怪。当然，其他地区爆发的此类冲突迟早也很可能具有这种影响，但也可能不会。在 1949 和 1950 年那些紧张的日子里，美国分析家一直等着苏联人进攻欧洲。南斯拉夫是个最令人信服的目标，因为这个国家离经叛道的共产党领导人对斯大林代表所有共产党人的资格发起了挑战。虽然苏联红军甚至未采取行动加以惩罚，然而在 6 月 25 日，苏联训练和装备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和坦克越过三八线，向美国训练和装备的南方大韩民国的军队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在 19 世纪，美国的传教士、商人和海军军官已经与朝鲜建立了联系，但是，在 1905 年日俄战争结束、日本在那里确立其

① 孔华润：《艾奇逊、他的顾问和中国（1949—1950）》以及南希·B. 塔克：《尘埃中的格局》（纽约，1983 年）。与“科恩—塔克命题”相反的观点，参见罗伯特·布鲁姆：《划线》（纽约，1982 年）以及小威廉·W. 斯图克：《走向对抗之路》（查帕尔希尔，1981 年）。

霸权之后，美国与那个国家就基本上断绝了往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时，美国及其苏联盟友同意共同解放朝鲜，按照三八线划分其责任区，这也正是以前日本与沙皇俄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地点。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周内，苏联军队首先进抵朝鲜，越过了三八线，但是，当美国军队抵达后，他们就毫不迟疑地撤到该线以北。苏联人和美国人都对朝鲜所知不多，但是，由于距离数千英里之遥，美国人了解的无疑比俄国人更少，因为后者与朝鲜人还有一段很短的边界，历史上也曾经有过控制该国的兴趣。

朝鲜解放后，朝鲜人要求获得独立。在基本的独立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除了建立某种托管制度的含糊想法，美国人和苏联人对与他们打交道时做些什么均心中没底。朝鲜人可不管他们政策背后的什么动机，他们对托管的想法异常地愤怒，希望能立即获得独立。当解放力量在他们各自责任区启动其临时的管理事务时，苏联转向了当地共产党以及与苏联军队并肩反对日本的朝鲜人。美国则把那些最熟悉自由主义民主词汇、而且其中有许多曾与日本人合作的人吸引到自己一边。随着美苏紧张关系的发展，三八线已不再是两个盟国的军队划分战区的临时分界，如果朝鲜人不这样看待的话，那么在俄国人和美国人的眼中，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固定化，更加类似一种国际边界。每一方都训练和装备了它管辖之下的朝鲜人。几年过去了，有关统一的协议仍未达成，他们在1948年更是建立了各自的政府。两边的朝鲜人都拒绝接受国家分裂的状态，他们在边界地区时常制造一些小冲突，而且尽其所能地向另一方的控制区渗透。随着李承晚——一位在普林斯顿受过教育的残酷无情的独裁者，尽管反对共产党，但对美国人却不怎么俯首听命——的崛起，美国人在此地的政治经历既令人难以理解又不讨人喜欢，因此，美国军方盼望能早点打道

回府。[1]

在 1949 年即将来临之际，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说服国家安全委员会下令从朝鲜撤出美国军队。但国务院反对这样做，根据情报部门的估计，朝鲜共产党军队处于明显的优势，在李承晚统治下的公民中，可能有多达 1/3 的人对共产党表示同情，可能有更多的人对李承晚持有明确的敌视态度，这使国务院深感不安。没有美国军队的存在，南朝鲜将可能被共产党人打垮，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朝鲜就会随之出现。但是，在 1949 年，这种威胁在华盛顿基本上没有引起什么不安。总统与国防部长承诺要限制防务支出，朝鲜在几乎所有人的优先顺序的清单上都不占有重要位置，亚洲大陆已被置于美国防御圈之外。驻朝鲜的军队在与苏联的战争中派不上用场，而别的每一个地方都需要他们。美国所给与的经济援助、军事情报和财政支持将足以保证李氏政权的存在。艾奇逊在 1950 年 1 月的演说、那年春天其他军事和政治领袖的声明、以及最明显不过的美国军队早先撤离，均表明在与苏联的全球性对抗中，美国对朝鲜战略地位的评价是不高的。[2]

我们对莫斯科此时的想法所知不多。斯大林不想与美国打仗，这倒是很清楚的。他完全明了美国的战略优势。他仍然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使其军队拥有可资倚靠的核武器。他可能认为，如果放手让红军进攻西欧，美国将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它那不断增强的核武库。对每一位愿意听的人，对许多不愿听的人，斯大林及其代理人都通过秘密和公开的方式喋喋不休地谈论和平的必要性，喋喋不休地谈论他们关于共产党人和资本家在这个星球上共处的信念。他的和平攻势无疑是策略性的，目的是为了赢得时

---

① 布鲁斯·卡明斯：《朝鲜战争的起源》（两卷本，普林斯顿，1981 年，1990 年）；博顿·I. 考夫曼：《朝鲜战争》（纽约，1986 年），第 7—22 页。

② 博顿·I. 考夫曼：《朝鲜战争》，第 22—25 页；詹姆士·I. 马特里：《勉为其难的征讨》（檀香山，1985 年），第 175—225 页。

间，便苏联能够赶上或超过美国的力量。他在1950年还没有准备就绪，为了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朝鲜，他犯不上冒此风险。[①]

另一方面，就像南方的李氏政权一样，斯大林在朝鲜的门徒也是铁了心要打仗，以武力统一朝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可以从斯大林的政策中发现美国政策的影子。他试图牢牢地控制住朝鲜的共产党军队，向它提供的主要是防御性武器。但是，当美国军队撤离朝鲜半岛后，斯大林及其顾问得出了也许是相当有理性的结论：美国并不关心朝鲜内战的后果。斯大林曾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谨慎行事，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战心怀恐惧。中国人没理他的茬，他的担心也未变成现实。与中国相比，朝鲜对美国就更不重要了，美国干预的威胁几乎已消散殆尽。斯大林决定向朝鲜共产党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进攻性武器。整个行动很可能为时短暂而且风险甚微。斯大林的继任者尼基塔·赫鲁晓夫后来坚持认为："真正的共产党人都不会试图劝说金日成（北朝鲜共产党领导人）约束其把南朝鲜从李承晚和美国反动派的影响中解放出来的强烈冲动"。[②]

斯大林及其顾问由于不了解美国而误判了它的反应。此后的事实表明，对北朝鲜人的武装和对他们入侵南方的默许是斯大林最具灾难性的冷战投机。它把苏联与美国的缓和推迟了20年。它强化了持续40年的对抗，该对抗使其主要对手以及世界上其他的许多国家都付出了莫大的代价。这场战争使美国国内的力量平衡朝着有利于反对社会正义的极端好战分子、佐治亚州的尤金·塔尔梅奇和密西西比州的约翰·兰金之类的种族主义政治

---

① 马歇尔·D. 舒尔曼：《重估斯大林的对外政策》（纽约，1966年），第80—138页。

② 小此木真男：《朝鲜战争的国内根源》，见入江昭和永井阳之助编：《亚洲冷战的起源》（纽约，1977年），第299—320页；爱德华·克兰克肖和斯特罗布·塔尔博特：《赫鲁晓夫回忆录》（波士顿，1970年），第368页。

家、乔治·索科尔斯基那样的工会组织的敌人、全国制造商协会、R. J. 雷诺兹烟草公司、乔·麦卡锡[1]和理查德·尼克松之类的机会主义者、以及诸如联邦调查局的J. 埃德加·胡佛那样势力强大的官僚主义者一边转移，使他们能够把美国人民的注意力和精力从急需的改革转到在国内外追捕共产党人的事情上来。它使得此类的人和组织通过与特别是航空工业的合作创制了一个军事—工业联合体，既消耗了美国经济的生产能力，又加剧了世界各地的冲突。美国社会中的这些因素与任何苏联威胁并无必然的关联，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牢牢地控制着这个社会，他们也能够杜撰出来自火星的威胁。然而，正是斯大林在朝鲜的机会主义才为他们打开了方便之门。

得知朝鲜爆发战争的消息后，美国领导人最初的反应是感到宽慰，因为战争不是李承晚发动的。当然，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李承晚无疑是会加以利用的，然而他一直没有这种机会。共产党人侵入南方，杜鲁门不得不决定是否作出反应，如果作出反应，他需要作出何种反应。如果朝鲜位于美国的防御圈之外，如果国家安全委员会曾经得出一致的结论，认为朝鲜与其他地区相比并不怎么重要，那还要作什么反应？但是，令人惊奇的是，他所有的顾问都彻底改变了主张，认为必须击退这次侵略，美国不能袖手旁观，让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一场侵略行动不受阻碍地进行下去。一些人强调说，如果让侵略者这样干下去而不受到惩罚，联合国的信用就将陷于危殆；一些人担心，美国作为非共产主义世界保护者的声誉也将岌岌可危。杜鲁门所有的顾问都认为，朝鲜发生的事件是对美国抵制苏联扩张其势力与制度企图的意志的考验。假如让斯大林在朝鲜的投机得逞，他就会在其他地方再试身手，并且一直这样干下去，直至他要么征服欧亚大陆，要么触发

[1] 即约瑟夫·R. 麦卡锡（Joseph R. McCarthy）。—译者

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今正是阻止他的时刻。[①]

未能言明的另一种深刻的担忧事关杜鲁门的政治前途，也关乎他在剩余的总统任期内治理国家的能力。他的政府被指责背叛了中国，使得苏联在亚洲扩展了影响。与对其他地区的关注相比，艾奇逊对亚洲漠不关心的坏名声在美国已经路人皆知，他的许多最忠实的助手都为之苦恼不已，其中有几位一直在努力制定详细的计划，至少也要把该计划作为政府在东亚采取行动的一种表象。如果不在朝鲜有所行动，那么政府可能面临一场政治性的灾难。如果能取得成功，则不仅能使政府的批评者哑口无言，也许甚至能使杜鲁门在白宫度过第 3 个任期。

阻止侵略者、遏制苏联的扩张、向斯大林、美国的欧洲盟国以及紧张不安的亚洲展示美国的决心、维护联合国的信用以及在国内保护杜鲁门，这些决定行动的各种因素的结合压倒了任何其他的考虑。让斯大林沮丧的是，美国干预了朝鲜的内战。通过动员仍然由它操控的联合国，在其各不相同的成员比如英国、土耳其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家协助下，美国派出它的武装力量与李承晚的军队并肩战斗。他是一位不值得支持的盟友，然而，美国承担不起无动于衷的风险。

起初，由美国将军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进展不顺。李承晚军队的装备根本不能与对手一比高下，美国军队基本上没有实战的经验，在入侵军队的攻击下连遭败绩，美国的空中力量也没能发挥什么效用。不管怎样，麦克阿瑟的部下最后总算在东南部的港口城市釜山的郊外守住了阵地，与此同时，通过

---

① 格伦·D. 佩奇：《1950 年 6 月 24 至 30 日有关朝鲜的决策》（纽约，1968 年）；迪安·艾奇逊：《创世亲历记》（纽约，1969 年），第 523—537 页。孔华润：《迪安·腊斯克》（纽约州托托瓦，1980 年），第 51—52 页。对有关该政策转变的精彩分析，也可参见杰克·斯奈德：《帝国的秘密》（伊萨卡，1991 年），第 289—296 页。

他安排的在南朝鲜西北海岸的仁川的一次策划巧妙而又极其冒险的登陆，他们开始了反攻。到9月下旬，他们以一次堪称典范的钳形攻势完成了对北朝鲜军队的包围并且将其击溃。在不足3个月的时间里，美国领导下的联合国军击败了侵略者，几乎解放了南方，向全世界展示了联合国的活力和美国的决心。

不幸的是，在胜利的时刻，杜鲁门政府向任何胜利者都要面对的最危险的诱惑之一——扩大战争目标的诱惑——低下了头。杜鲁门及其顾问不再满足于击退侵略和解放南朝鲜，他们断定，斯大林不会来帮助他的朝鲜代理人了，他们可以指挥联合国军越过把共产主义北方和非共产主义南方一分为二的三八线，肃清北方的共产党分子，也许是在比李氏政权更民主的政府之下统一整个朝鲜。这固然存在着风险，因为中国人说如果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他们就要介入，但是，艾奇逊与麦克阿瑟一样瞧不起中国人，倾向于把他们发出的威胁低估为恐吓，深信中国人不敢冒险与美国的压倒性火力对抗。更有甚者，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判断，美国领导人认为，如果中国人胆敢插手，他们将很快被消灭。共产党正在退却，美国业已苏醒。[1]

在华盛顿，要求在三八线附近停下来的声音依然存在。乔治·凯南争辩说，这是一个把中国人从苏联共产党人那里分离出来的好机会，因为他们对印度提出的签订停火协定的建议、包括在联合国给与中国共产党人席位作出了不同的反应。保罗·尼采，这位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为遏制不断增长的苏联威胁而进行大规模军备建设的计划——的设计者坚持认为，冒

① 考夫曼：《朝鲜战争》，第84—87页；詹姆士·I. 马特里：《杜鲁门争取胜利的计划——民族自决与朝鲜的三八线决策》，《美国历史杂志》，第66卷（1979年），第314—333页；罗斯玛丽·富特：《错误的战争》（伊萨卡，1985年），第66—74页。

险打一场更大规模战争的时机不对，在他的计划得到贯彻之前，在可能发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军事优势仍然在苏联一边。视苏联为敌人的军方人士也无意把他们的军队投入一个边缘地区。而且，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极有可能的介入将促成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

在朝鲜击退共产党人的良机，把一个统一的朝鲜改造为民主橱窗的前景以及作为对批评杜鲁门对共产主义心慈手软的那些人的回答，均对杜鲁门政府具有难以抗拒的诱惑力。麦克阿瑟指挥其部下沿着朝鲜半岛两边的滨海平原以及高耸的中部山脊的两侧向前推进。对他的惟一限制是，让韩国军队先期进入与中国和苏联接壤的那些地区，一旦遭遇到大规模的中国或苏联军队就暂停前进。对中国人忧心忡忡的杜鲁门飞赴太平洋上的威克岛去会晤他的战地司令官。兴高采烈的麦克阿瑟使总统相信，即使中国人愚蠢到干预朝鲜战事的程度，美国仍然可以迅速取得胜利。

在北京，毛泽东及其顾问对美国的意图极为担忧。中美两国之间的联系在1950年早期中国人没收了美国政府在北京的地产之后就已告中断，美国当时曾警告说，没收地产将会导致它召回所有的外交人员。毛泽东与斯大林在1950年2月签署的同盟条约迫使艾奇逊放弃了在不远的将来在两个共产党国家之间打楔子的愿望。作为一位始终不渝的现实主义者，艾奇逊仍旧倾向于最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他不打算急匆匆地去奖赏敌人的这位朋友。另一方面，毛泽东深信美国的敌视是难以改变的，它迟早会进攻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彻底抵消他所取得的胜利。美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军事行动强化了他的这种焦虑。美国命令其军舰开进台湾海峡，阻止毛泽东的军队进入台湾并扫荡那里残余的蒋介石军队。麦克阿瑟飞赴台北，与蒋介石并肩而立，以示对他的支持，麦克阿瑟还把台湾视为一艘不能落入共产党之手的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人又一次打算干预中国的内战，去支持蒋介石

反对共产党人。

毛泽东对美国派遣军队到朝鲜以及他们随后在仁川的胜利深感不安。把《纽约时报》作为获知美国情况主渠道的那些顾问报告说，美国主张统一朝鲜、进而继续进军中国把共产党驱逐出去的情绪在不断增长。[①] 中国是一个弱国，它的一些地区自1931年以来就一直战乱不断，它急需时间和所有的资源用于重建，然后使这个国家现代化。它几乎不能指望能赢得一场反对世人曾经知道的最强大国家的战争。中国领导人不希望打仗，然而，由于坚信美国人使之别无选择，毛泽东就宁愿在朝鲜而非中国的土地上作战。当联合国军在10月跨过三八线向把朝鲜与中国分隔开来的鸭绿江挺进时，毛泽东命令中国军队进入朝鲜。中国人屡次警告说，如果联合国军继续北进，他们就发起进攻。自大傲慢的美国人及其盟友继续进军，他们对获得一场速胜充满了信心。[②]

艾奇逊试图要中国人相信美国不打算进攻中国，但是，美国的保证在北京缺乏信用。美国人曾经说过，朝鲜在他们的防御圈之外，但他们仍然派军队来保卫它。他们还说，他们希望击退侵略，把北朝鲜人赶过三八线，而今却又挥师挺进鸭绿江。假如不加以阻止，他们会在那儿罢手吗？艾奇逊说，他们没有敌视中国的企图，然而，许多国会议员却起劲地要求在大陆复辟蒋介石的政府。麦克阿瑟与蒋介石正在密谋勾结，美国飞机正向中国的机

① 孔华润：《与中国朋友的谈话——周恩来同僚谈19世纪40年代和朝鲜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外交史》，第11卷（1987年），第283—289页；亦可见张曙光：《遏制与战略文化》（伊萨卡，199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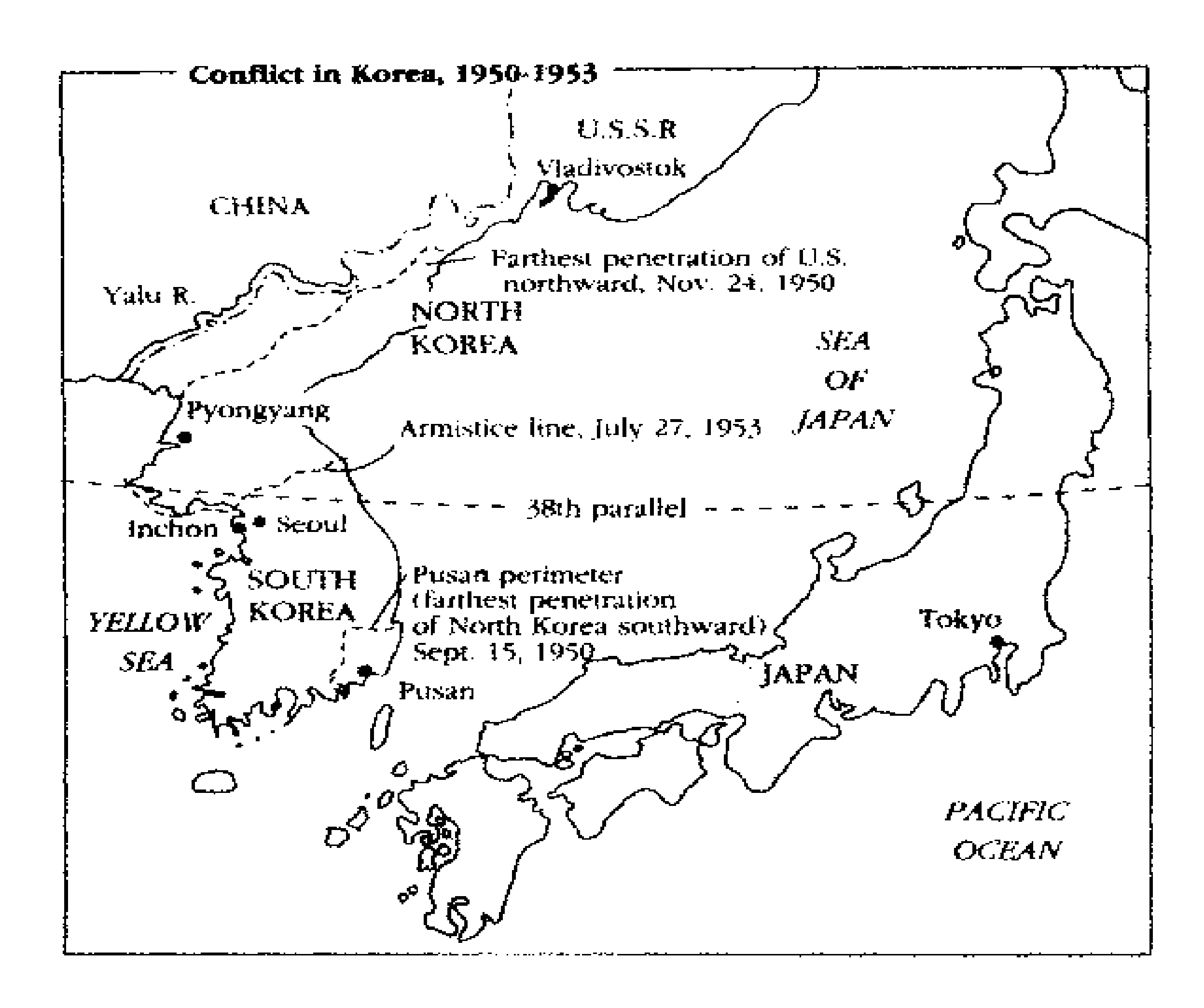
② 中国学者对我们了解中国干预的决定做出了极大贡献。尤其是郝雨凡和翟志海：《中国决定参与朝鲜战争——对历史的再考察》，《中国季刊》，第121卷（1990年），第94—115页；张曙光：《有备无患——1949—1950年中国共产党的安全担忧与中美对抗的起源》，陈兼：《朝鲜战争期间中国目标的改变》，两文可见《美国与东亚关系》，第1卷（1992年），第42—72、8—41页。亦可参见艾伦·S. 惠廷的经典著作：《中国跨过鸭绿江》（斯坦福，1960年）。

场扔炸弹。毛泽东是不会安心的。由于两国缺乏信任与理解，美国也未发出明确的信号，中国在朝鲜的干预乃是审慎行事的需要。

10月中旬，中国军队向美军发起攻击，在给予重创之后，脱离接触观察美国的反应。麦克阿瑟没有被吓倒，两周之后，联合国军遭到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组成的20万“志愿军”的进攻。中国人击溃了联合国军，迫使其乱哄哄地逃过三八线，沿途又加之以严重的杀伤。到11月末，美国军队已在准备逃出朝鲜和接受战败的现实。杜鲁门为自己的机会主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在华盛顿，乔治·马歇尔已经回来主持国防部，他、凯南与艾奇逊的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重振了美国政府的士气。他们拒绝接受麦克阿瑟的失败主义，发誓要继续战斗，美国军队再次守住了釜山以北的防线。杜鲁门及其顾问，无论文官还是武将，由于担心引发苏联的干预，拒绝了麦克阿瑟允许其进攻中国的要求。美国军队正在迅速扩充，但是，美国还没有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中国过分伸展的供应线的猛烈空袭开始造成重大伤亡，中国人被一步步逐退到三八线以北。1951年春季，大致以战前情况为基础的结束战争的努力已经认真启动。与1950年9月杜鲁门宣称的全面胜利相左，政府继续进行的战争已经得不到美国人民的支持，在人员和财富方面又使美国受到了极大的消耗。它为自己弄出了一场如果不冒世界战争的风险就不能取胜的战争，而美国军方还没有为世界战争做好准备。由于与华盛顿的军方及文职领袖们闹起了别扭，杜鲁门不得不解除在狂躁的欣慰与沮丧消沉之间莫衷一是的麦克阿瑟的职务，对一位伟大的美国英雄来说，这是一个颇为辛酸的结局，不幸的是，他的解职又给政府增添了骂名。

结束这场战争一共耗费了两年多的时光，哈里·杜鲁门及其助手那时候已经归隐田园，尼采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



朝鲜的冲突，1950—1953 年

中所设想的军费开支的规模已开始出现。美国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核力量，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尽管苏联不能很快赶上美国，一场军备竞赛已经开始。到 1952 年岁末，根据历史学家马克·特拉亨伯格的话，美国军方领导人认为他们已经做好了击败苏联的准备。[①] 此前美国领导人一直把朝鲜战争的爆发与中国的干预视为苏联不惧怕美国的表现，而今他们也把苏联让其朝鲜和中国代理人遭受杀戮理解为优势转向美国的标志。美国又一次在维护其利益时采取了进攻性的行动。

① 马克·特拉亨伯格，《历史与战略》（普林斯顿，1991 年），第 100—152 页。

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苏联在外交上支持其朝鲜和中国盟友，但却拒绝提供斯大林的让毛泽东一直翘首以盼的空中掩护。[①] 苏联的确向中国提供了军事装备，然而是以中国人难以忍受的代价为条件，一些苏联飞行员在北部执行飞行任务，但苏联从未威胁过美国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它从未在欧洲挑起过一次危机，以便分散在朝鲜的联合国军的注意力。它从未威胁在欧洲开辟“第二战线”。莫斯科欢迎东亚的共产党人与美国的武装力量之间的对抗，但是它自己却不愿冒丝毫的风险。不管美国分析人士认为形势如何对苏联有利，斯大林还是不愿使战事升级。小心谨慎再次成为克里姆林宫的口号，斯大林早就宣布，只有苏联的利益和安全得到了保证，国际共产主义的利益才能得到最好的体现。

朝鲜战争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不久宣告结束。在克里姆林宫，一场真正的接班危机正在上演，苏联领导人全神贯注于内部的权力争夺，一时间失去了对外冒险的兴趣。中国人遭受了极大的伤亡，其中包括失去毛泽东的儿子。他们遏制住了美帝国主义者，保持了他们的政权，而且为自己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在从苏联获得很少援助的情况下，他们把北朝鲜的共产党政权作为他们的边界与南方敌对力量之间的缓冲保持了下来。是回到在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的时候了。

在美国，人们的情绪糟糕到了极点。整个国家由于战争期间的歇斯底里而陷于分裂，在那些煽动分子的刺激下危机四伏：一些人正在攫取个人权力，一些人正在追逐党派利益，一些人企图回到欺压穷人、黑人、犹太人以及美国主流文化之外的其他任何

---

① 陈兼：《中苏同盟与中国加入朝鲜战争》，1991年11月1日在密歇根州立大学举行的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讨论会（由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之冷战史项目和史密森学会共同主办）提交的论文。

人而且可以得到宽容的时代。美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排外主义特征，在与对激进主义的恐惧混合后开始发酵。1886 年的秣市广场事件（Haymarket Affair）、1919—1920 年的赤色恐慌（Red Scare）、以及 20 世纪 20 年代的萨柯—万泽蒂案（Sacco－Vanzetti Case），就是这个国家在更早时候如何反应的见证。在紧接战后的年月里，当保守分子企图击退新政、特别是企图击退劳工取得的成就时，他们就乞灵于大众对激进主义的恐惧，把他们不喜欢的任何东西都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把反对他们的每一个人都视为共产党分子，更有甚者，他们还把民主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甚至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混为一谈。美苏之间紧张状态的出现使他们的说辞得到了极大的强化。

苏维埃俄国威胁美国一说之荒诞不经是赤色恐慌在 1920 年如此迅速地消失的原因之一。但到了 20 世纪 40 年代末，这个想法已不再荒唐。就其内在原因而论，为了赢得对美国的新霸权角色及其开支的一致支持，杜鲁门政府夸大了苏联的威胁。毋庸置疑，斯大林试图利用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及共产党的同情者服务于苏联政策的目标。尽管其人数及破坏能力微不足道，这些充当苏联间谍的共产党分子肯定存在于美国社会之中，希斯案件已经为这种危险作了注脚。早在 1947 年，杜鲁门就弄出了一个纯洁官僚机构的忠诚委员会，而且，为了在 1948 年竞选连任，他也热衷于给人扣上红帽子。众院非美活动委员会把网撒开，他们的指控也就以骇人的速度传播开来。

1950 年 2 月，约瑟夫·R. 麦卡锡，一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资历平平且名声低微的参议员，为了出名就在一次演说中声称，他有一个 205 位地地道道的共产党成员的名单，他们任职于国务院，负责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这种手段通常被称为撒“弥天大谎”。麦卡锡手里握着在 20 世纪 40 年代大致因为对中国共产党人友好而屡次遭受指控的为数不多的人员名单，有几位证明犯了

有欠谨慎的错误，但没有一位是共产党，没有一位从事了间谍活动，而且其中的大部分已经不再为国务院工作。然而，如果一位美国参议员断言国务院有 205 名共产党人，那肯定是有一些的，也许只有 200 人、100 人、50 人，但肯定是有一些的。麦卡锡没有任何证据。一个由保守的反新政分子、参议员米勒德·泰丁斯（民主党人，来自马里兰州）领导的两党委员会调查并拒绝了他的指控。麦卡锡没有退缩，更有甚者，在其他共和党参议员的鼓动下，他急切地把民主党描绘为“叛国党”，一心指望着在 1950 年的选举中捞取好处，并且通过 1952 年的选举最终收复白宫。

在对付他所谓“土佬的攻击”之时，艾奇逊的傲慢最初庇护了他自己，也庇护了美国的对外政策。他通常藐视公众舆论，特别瞧不起国会议员，不理睬麦卡锡及其同党的指责，继续做他认为的最正确的事情。必要的时候，为了政治的便利，他也会在杜鲁门的督促下作些让步，但仅限于他认为的策略性的事情。麦卡锡及其同僚从蒋介石的朋友那里得到了大量情报，艾奇逊向压力让步，在蒋介石灭亡之前推迟了对毛泽东政府的承认。但是，在朝鲜战争期间出现的反共产主义的歇斯底里把他逼到墙角之前，艾奇逊一直不打算完全改变他试图与毛泽东和解的政策。

麦卡锡之流的大吵大嚷似乎是标榜言论自由的社会组织中的一种反复出现的现象。美国大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在他的书中论述了“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妄想症”。[1] 这些人很偶然地弄到一小撮忠实的信徒，在瞬间的炫目燃烧之后，就消逝的无影无踪了。一部分美国人信任他们，等待着他们的下一个预言。尽管他们的所作所为给他们的受害者带来了如此的痛苦，此类蛊惑人心者对一个较大的社会所造成的影响通常是很小的。设若没有

① 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妄想症》（纽约，1967 年），第 3—40 页。

朝鲜战争，麦卡锡与其他反共产主义十字军的所谓领袖将可能成为过眼烟云和美国过去记录上的暂时的污点。

一旦美国人在朝鲜死于共产党之手，因苏联拥有原子武器、希斯案件以及共产党间谍在美国活动的事实而产生的焦虑，就转变为一场反共产主义的歇斯底里。任何人只要与左翼组织有瓜葛，任何人只要为全体美国人的社会正义工作，任何人只要与社会上非主流观念有染，譬如说支持劳工或支持南方的民权，任何人只要是蒋介石的批评者或者被视为苏联行为辩护者，任何人只要他曾经对邻居发过火，他就可能被指控为共产党。而这种指控和调查则足以毁掉一个人的前程。证据并非必不可少。娱乐业的黑名单使被怀疑的演员难以在电影或电视上抛头露面，受到怀疑的作家不能使其著作为公众所知晓。像阿伦·科普兰如此伟大的作曲家也备受折磨，最后仅因乔治·索科尔斯基这位为麦卡锡捧场的新闻界核心人物对其音乐的嗜好才得以过关。许多无辜的政府官员、大学和公立学校的教师、民权领袖以及劳工运动的组织者的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他们失去了工作，有时甚至是失去了寻找类似工作的机会。

如果说朝鲜战争造成的气氛导致了麦卡锡主义的兴起，那么，麦卡锡主义所造成的气氛则使美苏紧张关系的缓解变得异常困难，对美国人民来说，两者的差别无异于一场小事之于一次大灾难。最为不幸的是，那些支持麦卡锡的激情澎湃的反共产主义分子的成功几乎没有为这样一种精细的外交政策留下运作的空间，该政策的基础不仅承认不同的共产党国家之间存有冲突，而且还清楚自封为社会主义者的第三世界中的激进民族主义分子与受苏联教条支配的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差别。在国内给人戴红帽子无疑是令人讨厌的。而作为一种对外政策的基础，它却使美国失去了数百万条生命和难以计数的金钱。麦卡锡主义与朝鲜战争以及美国妄想症与苏联机会主义的结合在此后 40 多年里带来了一

次又一次的灾难。

麦卡锡和朝鲜的第一个主要牺牲品是艾奇逊的对华政策。毛泽东的“赤色部落”（Red hordes）杀死了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使更多的人受伤致残。中国人的虚弱和温顺、对美国乐善好施的感激和渴望基督教、民主制度和自由企业制度的形象一去不复返了。在美国人看来，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现在已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阴谋的工具，正在遵照斯大林的指令攻击美国人。盖洛普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只有5%的美国人认为中国人的干涉出自内在的决定。有指控说，在共产主义同情者的建议下，杜鲁门和艾奇逊背叛了他们忠实的盟友蒋介石，把中国“丢弃”给共产党人，让他们在那里生根发芽，这是麦卡锡所说的罗斯福与杜鲁门的民主党政府“叛卖的20年”的最好证明。毛泽东的中国成为美国最为担忧和最可憎恨的敌人，是“黄祸”的回潮。正如美国不可能默认其在联合国的席位一样，承认北京政权也是不可能的。蒋介石的批评者已经从国务院清洗出去，或者被派到默默无闻的岗位上去，那些倾向于把蒋介石的利益等同于美国利益的人开始支配国务院的中国事务科。1951年，助理国务卿腊斯克发出了政策转变的信号，把毛泽东的中国谴责为一个巨大的“斯拉夫人的满洲国”，由于它是苏联的一个傀儡而非一个独立的中国人的国家，所以断不能予以承认。这种杜撰毒害中美关系长达数十年之久，甚至在中国和苏联自相残杀时仍未有些许的改变。[①]

直接的对抗导致了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强烈敌视，但是，美国领导人并未忘记苏联才是他们的主要对手。正如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指出的，如果响应进攻中国的要求，那将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正确

① 乔治·盖洛普：《盖洛普民意测验——1935—1971年的公众舆论》（纽约，1972年），第2卷，第955页；孔华润：《迪安·腊斯克》，第62—67页。

的战争将是反对苏联的，而且要等到美国的军事准备完成之后。到 1952 年岁末，美国军队已经准备就绪，急切地要对苏联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1]

为了对付苏联的威胁，欧洲领导人希望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以，他们担心美国在亚洲边缘荒嬉时日将导致它对欧洲的忘却，英国、法国与德国的领导人都在焦急地寻求一支规模更大的美国军队常驻于这个大陆。苏联创制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朝鲜的努力预示了它在红旗下统一两个德意志国家的企图。美国政府理解欧洲人的某些忧虑，但希望他们能为自己的防御做出更大的贡献。华盛顿的那些人越来越根据重新武装德国和德国军队的需要来考虑问题，因为后者为中欧的北约军队提供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源。1950 年 12 月，有关德国在西欧防务中的角色的正式讨论开始了。就在当天，作为美国承诺的象征，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驻欧洲盟军的最高指挥官，随之而来的还有四个师的美国军队。美国尽管犹豫良久，但终于走上了重整德国军备的道路。

朝鲜战争的最大受益者也许是日本人。当美国海军面临清除朝鲜港口地雷的困难之时，残存的前日本帝国海军人员则应召积极地承担了这项工作。在朝美军需要的大多数商品与服务均来自日本，这给日本经济提供了 40 亿美元的刺激。而且在 1951 年 9 月，在旧金山，48 个国家在美国的率领下，与日本签署了和平条约，最终在 1952 年 5 月结束了对它的占领。在条约签订的当日，日本和美国签订了安全保障条约，在一个动荡的世界里为解除军备的日本提供保护。美国人在日本保留基地的同时也归还了

[1] 马克·特拉亨伯格：《历史与战略》（普林斯顿，1991 年），第 100—152 页。

日本的主权，进一步把这个国家纳入到反共产主义的同盟之中。[1]

朝鲜战争是冷战期间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在一个民族、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之间的一次几乎无法避免的、以统一国家为目标的内战，转变为一次国际性战争和恐怖的军备竞赛的催化剂。无论斯大林应负什么责任，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对苏联而言，其破坏性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对世界的其余地区来说也是不幸的。他的和平攻势亦受到殃及。美国的财富使其军事优势得到迅速的提升，特别是核优势，无论出于想像还是实际情况，都超过了苏联。重新武装德国的进程业已启动。土耳其和希腊被纳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日本和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与美国签署了安全保障条约，美国对印度支那的法国人的援助也增加了。华盛顿在中东取代英国势力范围的那一点点迟疑也已经消失。对苏联人民而言，朝鲜战争所产出的一场噩梦，仅仅由于战争在结束之前巧遇斯大林的去世才得以减轻。除日本之外，诸如李承晚、蒋介石以及其他所有残酷的独裁者亦属于胜利的一方，他们指望以反对共产主义的表白换取美国的支持。在美国，胜利者是那些力主反击的人，那些要求在海外击退共产党的人，那些渴望在国内击退社会正义计划的人。

---

① 詹姆斯·E. 奥尔：《日本海军在战后的重新武装（1945—1971）》（纽约，1973年）；T. E. 瓦德尼：《1945年以来的世界》（纽约，1987年），第363页；迈克尔·吉津：《日本与旧金山和平安排》（纽约，1983年）。

第四章　冷战：新领袖与新战场

斯大林去世了。特别是在那些争夺最高领导权的人除掉可怕的秘密警察头子拉夫连季·贝利亚之后，苏联内部的恐怖慢慢地缓解了。格奥尔基·马林科夫，这位在1953年看来可能继承斯大林的人，试图降低国际间的紧张状态。他号召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向南斯拉夫的铁托伸出了橄榄枝，对土耳其、伊朗和希腊作出了苏联友好的保证，以色列、印度和日本同样收到了这样的暗示：斯大林的去世意味着它们与苏联关系的改善。但是，马林科夫对权力的控制是不牢固的，他的那些竞争对手反对他改变苏联外交政策的努力。直至马林科夫被排挤出局、尼基塔·赫鲁晓夫在承接其倡议的同时又添加一些他自己的东西之后，斯大林去世后的苏联政策框架才为世人看清楚。①

苏联新领导人继承了一个这样的世界：美国作为世界上的支配性力量，已经在致力于一次迅速的军备扩张，向他们展示向数千英里的海外投送军队的能力。就在斯大林去世之前的几周，华盛顿迎来了新一届政府，它的领导人要求推行更加积极的反苏政策、要求解放东欧、而且还要求放蒋介石“出笼”。这些人企图否定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胜利成果，否定苏联作为世界第二大强国应该享有的影响和尊重。此外，斯大林之死使中国政

① 亚当·乌拉姆：《扩张与共存》（纽约，1974年），第544—547页。

府变得更加独立。1953年，东德爆发了工人暴动，骚乱在斯大林的新帝国的其他地区上演。外部世界将不会把机会送给克里姆林宫的人，让他们尽情享受在内部争权夺利的乐趣。

斯大林的遗产阻碍了苏联新的领导集团。除了长期担任外交部长的莫洛托夫之外，其他领导成员都没有多少外交事务的经验，对苏联政策的了解也仅限于斯大林愿意告诉他们的那些。对国际关系的研究，或者对社会科学的一般性研究，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几乎不存在。基本上没有什么能提出新思想的学者，他们也脱不去斯大林健在时被视为学问的意识形态的特征。斯大林所依赖的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分析严重脱离了现实世界，他坚信，在世界战争结束之后，资本主义世界将很快因萧条而崩溃，资本主义国家也将很快开始自相残杀。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头号学者E. S. 瓦尔加论证说，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可能会繁荣发展。斯大林勃然大怒，把瓦尔加打入冷宫，并解散了他的研究所。仅仅是他活下来的事实就让他的同代人大吃一惊。瓦尔加的观点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再也没能出现，因为这个独裁者正在耐心等待着打击西方的灾难的降临。[①]

与此类似，斯大林因其在20世纪20年代支持蒋介石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革命而遭受重创。蒋介石挫败了他，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人，赶走了苏联顾问。斯大林不打算再一次重复自己的错误，去支持诸如印度的尼赫鲁、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或者埃及的纳赛尔之类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袖。正如斯大林所看到的，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世界已经分裂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阵营。尼赫鲁、苏加诺、纳赛尔以及其他仅惟其前殖民主子之命是听的一路货色，仍旧是帝国主义阵营的一部分，斯

---

① 威廉·齐默曼：《苏联的国际关系观念（1956—1967）》（普林斯顿，1969年），第26—32页。

大林蔑视这些新近独立的国家，而且直到斯大林去世，它们也未能在苏联学者中找到为其说说好话的人。[①]

超越教条主义的努力开始于社会科学的复兴和对国际关系的合法性的研究。1956 年，在苏联社会科学院之下设立了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西方的信息资源已经开始得到应用。起初是小心翼翼地摸索，1956 年的第 20 次党的代表大会之后，胆子就越来越大了。苏联的分析人员发现并介绍了马歇尔计划的成就、美国、西欧与日本经济的成功一体化、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出现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预言的冲突。他们报道了欧洲经济的迅速复兴及其表现出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率。在资本主义世界看不到迫在眉睫的战争和萧条。与此同时，他们重新评价了新独立的国家在世界事务中所起的作用，发现其中的一些可以成为他们与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潜在盟友。他们认识到更加深人地研究这些国家和在学术界培养有关领域专家的必要性。大体说来，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他们已经开始为克里姆林宫的领袖们提供更切合现实和更不受意识形态束缚的信息与荐言，而在斯大林去世之前，这只能是一种可能。[②]

在 1956 年 2 月的第 20 次党的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及其反人民罪行的一次激动人心的谴责，使代表们如梦方醒。这次演说的消息迅速传到了西方。斯大林的后继者们发出决心改弦更张的信号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他们的行动彻底打消了世人对他们的怀疑。在国内，斯大林的妄想症，如同带有反犹主义情绪和威胁他身边所有人的所谓“医生谋杀案”一样，受到了谴责。那些被错误监禁和流放的男男女女，包括外交部长莫洛托夫

① 布鲁斯·D. 波特：《第三世界冲突中的苏联》（坎布里奇，1984 年），第 14—16 页。

② 威廉·齐默曼：《苏联的国际关系观念（1956—1967）》，第 26—32 页。

的妻子和政治局委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的儿子们，重返了家人的怀抱。根据斯大林的奇想怪念而制定的法律被废除了。在东欧的卫星国，苏联的经济压力减轻了，而且，在1953年夏季的不断变动之后，地方政权得到了支配其资源的更大权限。在东亚，马林科夫及其同僚很快表明了结束朝鲜战争的愿望。一年之后，他们放弃了斯大林在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上从中国获取的帝国主义特权，将其还给了他们的中国同志。

显而易见，在莫斯科放弃了对土耳其的领土要求，并把斯大林从芬兰勒索的一个海军基地原物奉还之后，苏联新政权相对温和的意图得到进一步的展现。与希腊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恢复了，红军撤出了东奥地利，允准了奥地利的再次统一和奥地利人民的自由。苏联新领导集团承认了西德政权，以令人惊奇的沉着和冷静接受了它重新武装的现实。它向美国提议寻求一个限制军备竞赛的协议。而且，在第20次代表大会之后不久的1956年4月，苏联正式取消了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亦即斯大林试图用来控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工具。

斯大林一去不返了。起初在马林科夫，而后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制造恐怖的政治机构被拆除了。然而，苏联仍旧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它继续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东欧的大多数民众，它的盟国有能力威胁美国在东亚的利益和朋友。它有500万武装起来的男女军人，更有甚者，在1953年8月，它还爆炸了一颗热核（“氢”）炸弹。在追求强权和影响力的持续竞争中，苏联将是美国的危险对手。不过，在比较理智和负责的人的领导下，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是一个与以前迥异的国家，与他们打交道，奠基于和平竞赛原则之上的协议是有可能达成的。赫鲁晓夫很快就懂得：在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战争不可避免的列宁主义观点已经过时了，在射线和放射性尘埃不理会任何意识形态的核武器时代，就必须避免大规模战争的爆发。他满腔热情地相信，无需

列宁和斯大林所预言的大动乱，社会主义也将会取得胜利。超级大国将通过相互间的威慑来避免核武器的使用和大规模的对抗，革命将从边缘地区慢慢发动，在那里，对财富和权力的争夺将会继续下去。苏联的利益将会得到保护，其意识形态将会与那里的现实结合起来。从赫鲁晓夫那里，美国看到了一位胆大冒失和富有创新精神的领导人，他急切地希望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但又不愿意放弃世界最终将一统于社会主义的救世观念。赫鲁晓夫的愿望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华盛顿如何作出回应。

从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身上可以看出，在世界事务的处理方面，共和党与美国人民选择了两个特别有资格的人。作为一位国务卿[1]的外孙和另一位国务卿[2]的外甥，自 1919 年巴黎和会以来，杜勒斯就一直活跃于国际政治界。在罗斯福和杜鲁门入主白宫的那些岁月里，他一直是政府对外政策的重要发言人。假如托马斯·杜威在 1948 年当选为总统的话，杜勒斯将成为他的国务卿。1950 年，为挡开共和党人对其东亚政策的攻击，杜鲁门在国务院为杜勒斯安排了一个职务，要他全权负责对日和约的谈判。杜勒斯才智过人、博闻强识、经验丰富，在海内外均受到高度的尊敬。

艾森豪威尔过去曾是盟军进攻欧洲和击败希特勒军团的著名司令官。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队创建之后，他随之担任了驻欧洲的盟军最高司令。他以这两种身份与欧洲和苏联的领袖们进行了广泛的接触。除了在教员和学生中间，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

---

① 约翰·W. 福斯特（John W. Foster，1836—1917），美国政治家、外交家，曾先后出任美国驻墨西哥、俄国和西班牙公使，1892 至 1893 年任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曾跟随他周游过不少国家。——译者

② 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1864—1928），美国律师、政治家，外交家，1890 年娶约翰·W. 福斯特之女为妻，1915 至 1920 年任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曾跟随他参加巴黎和会，并参与了赔偿问题的谈判。——译者

长的这段经历并未降低他的威望。他是一位非常受欢迎的慈祥的人，两个主要的政党都争着要他做自己的候选人。他所追求的超政治姿态使之似乎成了终结麦卡锡主义、平息美国人民的焦虑、以及使这个国家再次团结起来对付它在 1953 年面临的严重国内和国际任务的理想人选。

然而，党内的右翼分子还是以怀疑的眼光审视着他们俩，他们在世界事务中的经历、他们在杜鲁门政府内的任职以及他们在共和党东部“国际主义派”中的名望，都使这些人疑虑重重。右翼分子所认定的罗斯福和杜鲁门政府的“叛国的 20 年”，会不会在艾森豪威尔领导下变成叛国的 21 年？

在 1952 年的整个竞选运动中，为安抚右翼分子，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处处谨言慎行。艾森豪威尔接受了理查德·M. 尼克松，一位以给人戴红帽子而声名鹊起的年轻参议员，作为他的竞选搭档，而且给他分派了诽谤民主党人的肮脏工作。艾森豪威尔听任麦卡锡为他奔走呼号，在麦卡锡中伤乔治·马歇尔忠诚之时又暗中给予支持，而对艾森豪威尔的发迹，马歇尔曾给了如此之多的帮助。杜勒斯谴责杜鲁门和艾奇逊的遏制政策，认为它是不道德的，许诺要“解放受奴役的民族”，在东欧和东亚击退苏联的影响。由于深悉反共产主义的歇斯底里给杜鲁门政府的施政能力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为了引开右派分子的言论攻击，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就任命了一些右翼分子所中意的人士担任名义上的重要职务。对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而言，右派分子的教条主义产生的危险几乎快要赶上了斯大林的教条给赫鲁晓夫带来的困难。与赫鲁晓夫及其盟友从声讨斯大林所获得的自由度相比，参议院 1954 年对麦卡锡的谴责给政府带来的额外回旋余地也许还要更小一些。

美国在 1951—1953 年所实施的大规模军备扩充减轻了美国军事与情报部门对苏联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发动核打击的忧

虑。美国的优势变得如此地显著，以至于通常小心翼翼的军方领导人，在注意到行政当局嚷嚷着要打击共产主义力量的核心地区之后，就计划对苏联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进攻。杜勒斯用了两年的时间才埋葬了这个想法。然而，其他方面的考虑使艾森豪威尔对军费支出的巨大增长忧心忡忡。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军事计划的制定者，他认为现有的军事预算过多，远远超出了武装部门履行其使命的需要。作为一位经济思想家，艾森豪威尔的名望并不亚于杜鲁门这位前凯恩斯主义者，他决心要平衡预算，他担心，军备竞赛产生的赤字将会极大地削弱美国，它引发的经济崩溃将使美国脆弱到不堪一击的程度。作为战后惟一一位具有无可辩驳的军事预算观点的总统，艾森豪威尔成为适于抑制五角大楼上述嗜好的独一无二的人物。[①]

为了削减军费支出，艾森豪威尔修正了美国的冷战战略。鉴于在贯彻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的时候，为对付苏联的同类型优势武力的任何行动，杜鲁门政府一直努力地扩充常规力量与核力量，艾森豪威尔的“新面貌”战略则强调空中力量与核力量。历史学家约翰·刘易斯·盖迪斯争辩说，杜鲁门打算作出一种“对称”的反应，制定相应政策，以堪与一比的力量来迎击苏联的试探。而艾森豪威尔的战略则意味着，即使苏联的侵犯行动由常规手段来推行，美国也可能以核力量在不是苏联人选择的地点作出反应，这是一种“非对称”的反应，目的是使美国掌握着主动权。[②] 但是，盖迪斯在此时还派不上用场，艾森豪威尔就依靠杜勒斯去解释他的战略。杜勒斯提出了“大规模报复”的原则，这个概念的意思是美国可能以压倒性力量回击最轻微的挑

---

① 马克·特拉亨伯格：《历史与战略》（普林斯顿，1991年），第100—152页；西约姆·布朗：《权力面面观》（纽约，1968年），第65—75页。

② 约翰·刘易斯·盖迪斯：《遏制战略》（纽约，1982年），第147—148页。

畔。其他了解总统的财政保守主义的人把“新面貌”战略称为“少用钱而多打炮”。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对苏联内部发生的变化并非没有感觉，但在回应的时候却非常谨慎。他们受到美国反共产主义的紧张状态的制约，认为甚至在斯大林之后，苏联仍将是一个危险的对手。但是，他们对美国的力量充满了信心，确信苏联人不会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发起挑战。尽管言辞激昂，但他们并没有打算对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提出挑战。到20世纪50年代中叶，西德已经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奥地利也已获得自由，与马歇尔计划有联系的那些国家的经济得到了令人难忘的增长，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没有什么理由对欧洲感到担忧。鉴于每个超级大国都能够向对方发动一次毁灭性的核打击，它们在其争斗的中心战场形成了一种僵局。在向海外的投射能力方面，美国仍然享有巨大的优势。

苏联与美国正准备以热核武器武装自己，这种武器能在彼此之间造成不可思议的损失。这种武器部署就绪后，打赢一场战争的幻想就逐渐消失了。冲突的代价高到了难以接受的程度。清楚这些危险之后，两国领导人开始提出限制军备的建议，然而，由于相互之间失去了信任，由于双方都对特别建议或总体协议是否明智存在着内在分歧，比如说美国方面，它对对等谈判本身是否明智就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双方领导人在此问题上一直举步维艰。杜勒斯和其他官员担心，如果与苏联人坐在一起，除了会引发国内右翼分子的狂怒外，还可能减轻苏联的恐惧，因此就削弱了美国人民及其盟友的决心。由于未能找到一个使其主要盟国感到满意的谈判立场，特别是艾森豪威尔明显的矛盾心态，情况就越发对美国不利。而且，不论是苏联人还是美国人似乎都难以抵制寻求宣传优势的诱惑。

尽管人们过分频繁地提及艾森豪威尔把核武器与其他武器等

量齐观，准备在适当的时候使用这种装置——这就是他的“新面貌”战略强调这种武器的含意所在——但他还是急切地想找出一条出路，既能降低核战争的危险又能够抓住响应苏联新领导人建议的机会。由于1953年3月发表的一次演说在国内外都未取得预期效果，他就再次努力，制定了“原子能用于和平”（Atoms for Peace）的计划，并在1953年12月提交到联合国。艾森豪威尔号召核大国把它们的裂变材料上交给一个国际机构，由这个机构进行监督，使其用于和平目的。他的提议最终导致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建立，但对军备竞赛并没有什么影响。苏联人把这些言论视为一种宣传伎俩，为了抗衡美国，就再三提出签署一个禁止核武器的共同宣言的要求。美国没有跟着提出任何停止生产武器的建议，或者接着发动一场使苏联致力于对这些问题进行认真讨论的外交游说。以个人性格而论，艾森豪威尔看来对其演说所赢得的赞誉感到满足，然而，杜勒斯从一开始就对这个冒险行动表示怀疑。[①]

一年半之后，正当艾森豪威尔筹划他与苏联新领导人的首次会晤时，他的一位助手提出了后来被称为“开放天空”（Open Skies）的建议，得到了对军备控制不感兴趣的那些人的支持，他们视之为一个谋取对苏联情报优势或者一次在宣传上战而胜之的良机。在1955年7月的高峰会议上，艾森豪威尔建议，与会的每一方都把军事设施的蓝图送给另一方，允许相互之间的空中监视，以确保他们不准备发动突然袭击。赫鲁晓夫怀疑美国的意图，他也许还担心，如果允许美国深入苏联领空，美国将会了解到苏联的许多相对弱点，所以，他对美国的建议不感兴趣。然而

① 赫伯特·S. 帕默特：《艾森豪威尔与美国十字军》（纽约，1972年），第385—390页；麦乔治·邦迪：《危险与生存》（纽约，1990年），第287—295页。

在两年之后，当苏联同意了这个空中监视建议的部分内容的时候，美国人又全盘改变了自己的主张。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最好的成就是暂停核试验，尽管是小心翼翼地达成的而且也没有强制力，但它至少表明，两人承认放射性尘埃的危险，两国正缓慢而又拙笨地学习在一起共事。[①]

在紧接朝鲜战争结束后的这些年里，苏联的主要目标是缔结一项有关欧洲的安全协定，最好能达成一个美国承认其东欧势力范围并使其免遭一个复活德国侵害的安全协定。为了建立一个中立的、解除武装而且承认其现存边界的德国，莫斯科准备作出重大的让步，包括承认德国和奥地利各自的重新统一。假如美国军队同样撤退，而且假若是撤到大西洋对岸的话，对西欧并无野心的新苏联领导层愿意削减其武装力量并从中欧撤军，可以想见，他们甚至会从更多的地区撤军，或者是从整个东欧撤军。

然而，美国的战略思想却与此背道而驰。美国领导人确信，一个重新武装和加入西方同盟的德国，对欧洲安全以及最终对美国的安全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创设在杜鲁门当政时期已经计划就绪，杜勒斯踌躇满志，想把这个想法变为现实。当法国人畏缩不前，至少像害怕苏联那样担忧潜在的德意志强权而无意把他们的武装力量融入一支多国军队的时候，杜勒斯威胁要对美国在欧洲的作用作一次“令人苦恼的重新评估”。法国拒绝批准欧洲防务共同体协定未能使美国人就此止步。1954年10月，英国居中提出了一个新协定，好不容易才得到法国的同意。其条款中的关键内容是，英国承诺派军队赴欧洲大陆，美国保证在欧洲驻军，德国同意不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边界提出挑战，没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允准，德国也不能获取导弹或

---

① 格雷格·赫肯：《战争之决策》（纽约，1987年），第108—110页；麦乔治·邦迪：《危险与生存》，第295—305、328—333页。

核武器、生物或化学武器。1955年5月，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占领宣告结束，德国受邀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①]

苏联对德国的重新武装以及对它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反应出奇地温和。最初，莫斯科试图以答应德国的重新统一换取它的中立，为展示其诚意，苏联从奥地利撤出军队，使它成为一个统一和自由的国家。当这些努力失败后，苏联人就参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样子创建了一个军事同盟，也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引为靠山的华沙条约组织。最令人吃惊的是，苏联邀请西德领导人康拉德·阿登纳访问莫斯科，在那里，阿登纳获得了苏联对他的国家的正式承认。苏联领导层认为，一个重新武装的德国是可以忍受的，而且，与阿登纳政权和解乃是最明智的选择。

1955年7月，美国对来自于欧洲盟国的压力和苏联显著减少其威胁的姿态作出反应，参加了在日内瓦召开的高峰会议，艾森豪威尔首度会晤赫鲁晓夫，承认了他的权力（尽管尼古拉·布尔加宁总理是苏联代表团的挂名团长）。会议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成果，但是其象征意义却不可低估。这是美苏两国领导人自1945年以来的首次会谈，他们试图协商而非相互恐吓。“日内瓦精神”——问题可以通过外交而非武力解决的思想之再现——成为世界各地的善男信女的希望之源。它再度表明，现存的欧洲分裂对双方而言是可以接受的，战争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想像的。

虽然高峰会议之后的外长会议也无果而终，但是，在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交锋后的那年，更多迹象表明冷战也许正在降

① 劳伦斯·卡普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美国》（波士顿，1988年），第62—66页；弗兰克·宁科维奇：《德国与美国》（波士顿，1988年），第90—106页。

级。1956 年 2 月，赫鲁晓夫向第 20 次党代表大会发表了他遣责斯大林与赞成和平共处的著名演说，4 月，米高扬宣布解散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放弃了莫斯科控制所有外国共产党的权力。5 月，苏联公布了大规模裁军方案，把军队从 400 万减至 280 万人。斯大林主义的俄国被慢慢摧毁了，苏联人对世界事务及该政权性质的观念都处于变动之中。当恐惧从欧洲消失以及当美国反共产主义征讨者发现其目标不断缩小时，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的其他助手都担心美国会丧失它的意志力。①

东欧的事件很快就验证了苏联的忍耐底线，成就了那些拒绝对苏联放弃警惕的美国人。在波兰和匈牙利，终结苏联统治的呼声在 1956 年夏季的骚乱中像火山一样喷涌而出。波兰人赢得了他们自己选择共产党领导人的权力，然而，在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的鼓动下，匈牙利人向前走得更远，他们试图退出华沙条约组织，但为苏联坦克所镇压。匈牙利青年为保卫政府用石头和扫帚去反抗坦克和机枪，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使世界上的许多人为之震惊，却没有人过来伸以援手。虽然艾森豪威尔政府经常把“被奴役的民族”和“解放”挂在嘴边，然而，它却不准备冒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去干预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事务，因为那里的利益对苏联而言是生死攸关的，苏联人肯定会为此而战。

正如斯大林在柏林和朝鲜的行动一样，苏联在匈牙利的所作所为也使那些为与苏联开战而决心保持高度戒备的人受益匪浅。他们有理由对苏联在波兰问题上的妥协愿望表示怀疑，也有理由对它接受共产主义国家中出现相当程度的多元路线的愿望大打折扣。他们有理由对“非斯大林化”不加理睬，他们认为，所有能

① 沃尔特・拉夫伯：《美国、俄国与冷战（1945—1984）》（第五版，纽约，1985 年），第 182—183 页；保罗・哈蒙德：《冷战与缓和》（纽约，1975 年），第 97 页。

够感觉到的变化都是表象的或者是策略性的，美国仍然面对着一个野蛮、残忍、专制、在统治世界的决心方面拒不退让的敌人。而且，当苏联在1957年把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入轨道，成功地在太空竞赛中赢得先机时，艾森豪威尔因其本人受到无视美国安全和限制美国防务费用的攻击而大为沮丧。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有关在东亚更加坚定的竞选诺言赢得了美国右翼集团、特别是蒋介石那些朋友的欢迎。击退共产主义并使自己的代理人在中国大陆重新掌权，成为他们心中挥之不去的梦想。然而，艾森豪威尔急于把美国军队撤出亚洲大陆，决心结束在朝鲜的战争，并打算从近海以威胁性的姿态遏制该地区的共产主义。他和杜勒斯都不信任蒋介石，并为他从避难地台湾反攻大陆的计划感到担忧。他们知道，蒋介石渴望用美国的部队完成他自己军队难以完成的任务，他们无意对他放任纵容。假如国内政治气候没有那么多的限制，艾森豪威尔也许已经寻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解。他公开地反对贸易禁运并最终迫使华盛顿的官僚机构和国会答应放松对日本和欧洲同中国之间的贸易限制。华裔史学家卿斯美发现，艾森豪威尔政府秘密地允许美国企业通过它们在加拿大的子公司与中国做生意。[①]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美国东亚政策与杜鲁门政府的相关政策无论假设还是目标均极为相似。总统及其国务卿都认为东亚的重要性远逊于欧洲。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不愿对共产主义扩张无动于衷，他们把这种扩张视为苏联影响的扩展，并准备使用大规模军事干涉之外的美国力量和影响去阻止这股“红色浪潮”。更有甚

① 南希·B. 塔克：《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与两个中国政策的台湾根源》，见理查德·H. 伊默曼编：《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与冷战外交》（普林斯顿，1990年），第236—262页；卿斯美：《艾森豪威尔政府与西方对华禁运政策的变迁》，见孔华润和入江昭编：《大国在东亚（1953—1960）》（纽约，1990年），第121—142页。

者，由于夸下了海口，并且许诺要采取较其前任更具进攻性的政策，他们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

以华盛顿之见，东亚地区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北京。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清楚知道中国不是苏联的傀儡，而且对在两个共产主义巨人之间制造摩擦的可能性极感兴趣。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后，由蒋介石在国会与新闻界的支持者——所谓的中国院外活动集团——的煽动下产生的公众对中国共产主义的强烈敌视，阻碍了政府试图以友好姿态将中国人从苏联人那里争取过来的努力。在确信没有其他选择而只能向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不断发出挑战之后，杜勒斯为强化对中国人的压力而提出一个绝妙的理由：他希望看到，中国人对苏联的要求可能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将会使后者大为不满，苏联如果不能充分满足中国的要求，就会使中国人离心离德。与对中国慷慨大度的效果相比，美国不断增加的压力将更能拆散中苏同盟。但是，当中国人因渴望降低他们对苏联人的依赖而向美国示好时，杜勒斯不愿意或者无力作出反应，这显示出他的政策缺乏起码的活力。①

东亚地区在朝鲜战争后的首次危机出现在印度支那，在那里，越南人正在为从法兰西帝国内获得独立而战。较之与反帝国主义情绪，美国的反共产主义情绪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渴望法国支持德国的重新武装和支持欧洲团结起来反对苏联集团，美国到1953年就开始积极支持法国反对越南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那些赞成美国帮助法国恢复在印度支那影响的人还认为，绝不能由共产党人掌控印度支那的战略资源，对日本经济的

---

① 戴维·梅耶斯：《对艾森豪威尔与共产主义的新研究》见理查德·A.梅兰森和戴维·梅耶斯编：《重评艾森豪威尔》（伊利诺斯州厄巴纳，1987年），第88—120页；约翰·刘易斯·盖迪斯：《美国的楔子战略（1949—1955）》，见哈里·哈丁和袁明编：《中美关系（1945—1955）》（特拉华州威尔明顿，1989年），第157—183页。

生存能力而言，该地区市场是不可或缺的。朝鲜战争爆发前已经开始的对法援助在战争结束后大大加速。在美国直接向与法国合作的越南人提供了大量物资援助后，美国人的良心总算有所慰藉，这也可以算作美国与法兰西帝国主义拉开距离的一种努力吧。但美国提供的金钱和装备难以满足法国的需求，到了1954年3月，如果美国不派军队前来援救的话，法国将面临确凿无疑的失败，而且最终将被赶出印度支那。

当法国准备在奠边府作最后的抵抗时，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对干预作了仔细的盘算。有人使空军参谋长内森·特文宁将军相信，如果对俯瞰法国阵地的几个山头上的越南军队投掷几颗小型原子弹，战场形势将得以扭转。干过海军飞行员行当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雷德福海军上将认为，就该任务而论，最理想的选择是调派一个航空母舰特混舰队。陆军参谋长马修·李奇微将军，这位在麦克阿瑟去职后扭转朝鲜形势的要人认为，仅有空中力量是不够的，可能还需要50万人的美国地面部队，而且他认为把他们投送到亚洲大陆将是一个错误。艾森豪威尔并不急于派出地面部队，但他也不愿意把印度支那丢弃给共产党人。他承认就重要性而言，印度支那本身只是美国的边缘利益，但是，他概述了一种想法，后来被称为他的“多米诺理论”：如果印度支那倒下了，东南亚现存的其他国家就像一排多米诺骨牌一样，将会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但是，总统明智地坚持以得到国会事先的批准、英国与美国同舟共济以及法国给予越南独立的承诺作为美国干预的先决条件，而这些条件目前都不具备。美国没有进行军事干预，5月，亦即几个大国在日内瓦会议上讨论印度支那问

题前夕，法国人在奠边府被击败。[①]

在打击法兰西帝国主义和争取自由的长期斗争中，胡志明的军队赢得了一次伟大的胜利，但是，日内瓦会议在2月[②]达成的协议并未充分体现这次胜利。越南人和法国军队之间的休战已安排妥当。越南被暂时分开以便使北纬17°线两边的战斗人员脱离接触。先是临时分开，接着在1956年举行一次全国大选，这是由胡志明过去的支持者苏联和中国强加给他的。前者希望讨好法国人，后者担忧越南人的桀骜不驯可能导致美国的干预并危及他们在该地区的利益。然而胡志明可以指望在选举中轻易获胜，因此同意推迟建立一个统一和独立的越南。

美国参加了日内瓦会议，但没有在协议上签字，它只是许诺将不用武力破坏协议。然而，美国政府立即着手破坏协议，取代法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并试图将临时停火线变成永久边界。美国努力在南部建立一个分立的越南政府，使之成为反共产主义集团的一部分。1956年统一越南的选举将不再举行，共产主义将被遏制在北纬17°线上，南越政权、柬埔寨和老挝将成为美国的保护国。这些国家对美国而言并非特别重要，但通过"多米诺理论"的分析，它们之中任何一国的倒台将导致整个东南亚的"丢失"，艾森豪威尔把每一个小国都与整个地区的重要性紧密联系起来。在拒绝军事干预的同时，他也拒绝接受共产主义对印度支那的统治，就这样，艾森豪威尔政府把美国拖进了更深的泥

① 梅拉尼·比林斯·杨：《反战决策》（纽约，1988年）；乔治·C. 赫林与理查德·H. 伊默曼：《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与奠边府——对"我们未参战的日子"的再思考》，《美国历史杂志》，第71卷（1984年），第343—363页；玛里琳·B. 扬：《越南战争（1945—1990）》（纽约，1991年），第33—34页。

② 原文如此，应为7月。——译者

潭。[①]

1954 年 9 月，即日内瓦会议结束数周之后，美国在马尼拉发起召开了一次决定命运的会议。在杜勒斯的监督下，旨在保证该地区安全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在那里宣告成立。美国纠合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菲律宾和巴基斯坦，试图阻止共产主义影响在东南亚、尤其是在南越、柬埔寨和老挝的进一步上升。南亚和东南亚最重要的国家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拒绝参加这个组织，缅甸也拒绝加入。显而易见，东南亚条约组织是北大西洋条约组织的一个翻版，但是，而今华盛顿从那里得到了干预的法律基础。胡志明和毛泽东于是在事先就得到了警告。

困扰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一个问题是以何种形式处理美国与中华民国、亦即在台湾的蒋介石残余政权的安全关系。蒋介石的朋友、包括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逊，早就强烈要求将台湾纳入某种形式的相互防御条约之中。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大多数其他成员国坚决反对这样一个对北京如此明显的挑衅。一个双边条约似乎就成了惟一的选择，罗伯逊成功地使老大不情愿的杜勒斯接受了这种观点。正如历史学家南希·B. 塔克指出的，杜勒斯对蒋介石极不信任。[②] 他确信这位中国国民党领导人正在寻找一种途径，把美国拖入一场同中国共产党人的战争中去。这场战争如若爆发，美国人将要为蒋介石胜利重返大陆而战并为之付出牺牲。蒋介石没有如愿以偿，对未能得到他所期望的条约恼怒不已。但是，毛泽东的误判却使杜勒斯不得不倒向蒋介石一边。

对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不安以及对蒋介石政府和美国结盟的担

① 理查德·H. 伊默曼：《在不可得与不可接受之间——艾森豪威尔与奠边府》，见梅兰森和梅耶斯编：《重评艾森豪威尔》，第 120—154 页；乔治·麦克塔·卡欣：《干涉》（纽约，1986 年），第 66—92 页。

② 南希·B. 塔克：《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与两个中国政策的台湾根源》。

忧使毛泽东选择在台湾海峡突然挑起一场危机，危机开始于对国民党人据守的离中国大陆几英里远的岛屿的轰炸。中国学者何迪认为，毛泽东及其同僚对台北和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无所知。[①] 他们觉察到美国人把台湾永久从中国大陆分裂出去的阴谋。中国领导人认为，为了阻止这种同盟的出现，他们可以展示它对美国人的潜在危险：美国可能会为大陆炮火覆盖下的一些小岛而卷入一场战争。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理解这种信号，并在与蒋介石谈判结盟时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但他们拒绝向恐吓低头。毛泽东展示力量的结果恰恰是走到了他愿望的反面。

蒋介石赢得了条约，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不得不放弃在没有美国同意下进攻大陆的权利，而且没能得到美国保卫仍由其军队控制的任何沿海岛屿的承诺。在危机结束前，他被迫从大陈岛撤军。金门和马祖仍处于国民党的掌控之下，然而，只有在华盛顿认为台湾本身受到威胁时，美国才能向它提供保护。1955年3月，蒋介石越发愤怒了，因为杜勒斯要他停止对其民众宣讲返回大陆已经指日可待。美国人之所以同意签订相互防御条约，不仅是为了阻止共产党进攻台湾，而且也是确保华盛顿控制蒋介石的一种手段。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仍然担心与中国发生战争，他们不明白毛泽东的意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拒绝尝试在台湾海峡实行联合国监督下的停火。美国的盟国和世界上许多的其他国家都对杜勒斯愿意在金门和马祖冒战争之险感到恐惧。美国政府并未对这些岛屿的重要性抱什么幻想，但是艾森豪威尔担心，如果国民党军队被迫撤出这些岛屿，其士气将急剧衰落，美国的信用将在整个亚洲严重受损。艾森豪威尔再次变通其多米诺骨牌理论，把巨

① 何迪：《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沿海岛屿的政策的演变》，见孔华润和入江昭：《大国在东亚》，第222--245页。

大的重要性加诸于没有什么战略意义的地区：如果美国让中国共产党人夺取了金门和马祖，台湾政权将会崩溃，亚洲的许多国家将倒向共产主义，美国可能会在冷战中失败。“需要一把撒手锏……”，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心中的法宝就是核讹诈，间接地警告中国人，为保卫这些岛屿，他们将会使用核武器。

然而，中国人已经进抵他们打算去的地方，他们并不准备侵入金门和马祖。他们阻止美国和中华民国缔结相互防御条约的努力失败了，但却成功地警告了美国的许多盟友，特别是警告了那些不愿意参加因这些岛屿的对抗而引发一场第三次世界战争的欧洲盟友。在抓住了华盛顿的注意力之后，中国人开始提议就现存分歧与美国谈判，包括释放中国拘押的美国人和 1950 年中美两国敌对后在美国陷入困境的中国人。1955 年夏季，美国同意举行大使级会谈，危机平息了。

在两国相互交换国民的协议很快签订之后，会谈在台湾问题上陷入僵局。美国要中国放弃以武力夺取台湾岛的权力，但中国拒不同意。对北京的毛泽东及其同志而言，台湾问题是一个内政问题，是内战未了的事务。他们明白地暗示将不使用武力，强调了和平解放该岛屿的可能性，但拒绝对美国的要求作出明确保证。由于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者的掣肘，加之把他自己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压力的政策理念作为现实加以接受，杜勒斯就表现不出什么灵活性。1957 年夏天，尽管中国努力继续对话，但美国中断了谈判。

在北京，主动权转到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那些中国领导人的手中，他们宁愿采取更加激进的手段。苏联在太空竞赛中的成功使毛泽东坚信，向帝国主义发动一次大胆的共产主义进攻的时机已经来临。他发现赫鲁晓夫反应冷淡。赫鲁晓夫也坚信潮流对他有利，但他对美国的力量和苏联的脆弱性十分清楚。他不想搞对抗，更不愿意看到由中国选择一次这样的对抗。毛泽东蔑视赫鲁

晓夫的审慎，他选择了自己的时机。1958年8月末，中国发动一场夺取金门和马祖的战役，发起了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①]

蒋介石利用两次台海危机间歇那几年增强了在沿海岛屿的驻军，他蓄意增加赌注，以迫使美国为这些岛屿提供保护。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试图迫使蒋介石撤军未果之后，就作出了不得不前来援救的决定。美国再次威胁要用核武器攻击中国，并派遣包括7艘航空母舰在内的100多艘战舰赶赴台湾海峡。赫鲁晓夫警告华盛顿，如果美国发动核打击，苏联将进行报复。幸运的是，蒋介石的空军能够取得岛屿上的制空权，在美国没有进攻中国大陆的情况下使自己得以免受打击。

在抓住美国的注意力之后，毛泽东退却了。他很快就发现退却是一个天才的行动，从而展示了他的能力：成功虏获这些岛屿会切断台湾与大陆最后的联系，而且将导致中国的永久分裂。通过让蒋介石保持对这些岛屿的控制，他挫败了华盛顿的“两个中国”的阴谋。[②]

美国人表明了他们重开谈判的愿望。为了回应国内外民众对美国政府不惜因金门和马祖而冒世界战争危险的愤怒情绪，杜勒斯公开批评了蒋介石，并开始探索承认北京政权的可能性。两国政府重开谈判未能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成果，但外交行动总比相互威胁要好，特别是如果有希望说服中国遵守现有国际行为准则的话。杜勒斯的孤立和施压政策增加了中国作出不负责任和危险反应的可能性，而定期的大使级会谈则提供了一种发泄愤怒、提供和获得解释、探索甚至步入解决分歧的道路的机制。

毛泽东在海峡危机中的战术给赫鲁晓夫带来的麻烦也许像它

① 何迪：《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沿海岛屿的政策的演变》。

② 何迪：《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沿海岛屿的政策的演变》；托马斯·E. 斯托尔珀：《中国、台湾与沿海岛屿》（纽约，1985年），第124—130页。

们给美国带来的麻烦一样多。与艾森豪威尔非常相似的是，这位苏联领导人对自己国家的信誉甚为忧虑。当美国打击苏联的主要盟友时，他不能袖手旁观，他更不能对苏联正在争取但还没有结盟的国家发出错误信号。如果苏联不能成为一个可资依靠的保护者，第三世界还有哪一位统治者愿意站在苏联一边呢！另一方面，如果苏联打算在与美国之间的一场核对抗中冒自我毁灭的危险，赫鲁晓夫需要确保他的操控能力，确保战争将会在他认为值得为之战斗和牺牲的问题上发生，确保由他选择战争的时间和地点。但是，由于对他作为一个大国领导人的特权和挑起战争的能力的嫉妒，毛泽东不肯听从苏联的建议。而且，最糟糕的也许是，苏联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正在中国帮助其制造原子弹！

慢慢地，这两个共产主义大国之间的联系纽带松散了。苏联旨在缓和中国政策和避免挑衅的建议使毛泽东恨恨不已。苏联提议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要求在中国领土上取得潜艇基地和联络苏联潜艇的长波电台，这引发了毛泽东的猜疑。毛泽东对苏联的经济和技术援助条款也不满意。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总的说来，毛泽东已不把苏联外交政策当成一回事了，而且，苏联的国内政策，特别是非斯大林化，也未能给他带来好心绪。赫鲁晓夫之北京接受两个中国政策——美国用以打击毛泽东的强烈民族主义精髓的政策——的建议证实了毛泽东之苏联对中国利益漠不关心的判断，而且可能加速了两国的分裂。两国相互间的不满情绪——最初集中于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了赫鲁晓夫在1959年召回苏联的技术专家并且取消了对中国的原子弹工程的援助。[①]

---

① 爱德华·克兰克肖与斯特罗布·塔尔博特：《赫鲁晓夫回忆录》（波士顿，1970年），第463—471页；约翰·威尔逊·路易斯和薛理泰：《中国制造核武器》（斯坦福，加利福尼亚州，1988年），第60—72页。

然而，当盼望已久的中苏分裂终于发生时，艾森豪威尔政府没能制定一个对此加以利用的政策。反共产主义和对共产主义的遏制并没有为利用两个共产党巨人相互残杀的情势提供一个有用的思维框架。随着1959年初杜勒斯的故去和艾森豪威尔对亚洲事务的倦怠，华盛顿在1959和1960年没有出台新的政策。只有在印度支那的日益升级的卷入和对在老挝正在倒下的多米诺骨牌的关注，才成为艾森豪威尔执政的最后时光的标志。

如果说毛泽东的自负使克里姆林宫的生活不得安宁，那么一些美国的盟友也在尽其所能地为华盛顿沾沾自喜的情绪设置障碍。其中最为彰显的就是夏尔·戴高乐，这位傲慢的法国领导人在1958年重新掌权，卖力地反对他所认为的英美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控制，反对把法国降为一个次要角色。正值苏联准备部署洲际弹道导弹之时，他提出了一个对盟国而言的根本性问题：当苏联打击西欧时，美国是否愿意冒自己城市遭受核打击的危险而作出反应？美国的保证未能使他信服，他创建了法国自己的独立核力量。由于对美国拒绝分享同盟的指挥权感到不满，他开始将法国军队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控制中撤出。法国仍然是一个忠实的盟国，但在很大程度上以戴高乐的条件为前提。

毋庸置疑，日本人在20世纪50年代也变得更加自信。在1952年结束了军事占领以及通过与美国结盟解除外部威胁之后，借助于在朝鲜战争期间提供战争物资和后勤服务带来的利润，日本全神贯注于经济的迅速增长。日本人希望进入美国和中国市场并劝说艾森豪威尔给予支持。艾森豪威尔总统清楚地知道日本的经济稳定对于美国安全利益的极端重要性，他不断反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反对为日本与北京之间的贸易设置障碍。官僚机构采取拖延战术，艾森豪威尔也未努力加以推动，但他还是打开了

总统权限所允许的所有大门。[1]

日本人也渴望收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丢失给苏联的领土，而且为此目的，日本响应苏联的动议，于1956年同莫斯科重新建立了外交关系。杜勒斯对此感到担忧，他竭力阻止苏日两国恢复邦交，然而，苏日关系之所以在随后数年内一直不睦，其原因是两国谈判代表未能就领土问题达成一个可接受的妥协方案。

日本的自主性仍然使美国情报分析人员忧心忡忡，他们警告说，如果美国在双边关系上不给予更多的平等，日本就可能与西方集团离心离德。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特别是1954年3月在比基尼环礁的热核试验使日本"福龙丸号"（Lucky Dragon）渔船的船员遭受辐射之后，日本公众对美国在太平洋进行核试验表达了强烈的愤慨。1960年，日本反对重订日美安保条约的人士组织的反美骚乱反映了和平主义与中立主义的倾向。华盛顿感到惊慌的确是事出有因。[2]

当然，世界上的很多地方还是在埋头干自己的事情，它们很少顾及美国、苏联及其各自盟友之间的滑稽表演。除了冷战和大国政治之外，种族和宗教冲突、阶级斗争和社会动乱一直是人类生存在所难免的要素。但是，当美国和苏联获得了将其力量扩展到全球的能力以及当他们在至关重要的地区——如欧洲——达到一个不稳定的平衡时，这两个超级大国就开始卷入亚洲、拉丁美

① 孔华润：《日美关系中的中国》，见入江昭和孔华润编：《战后世界的美国与日本》（肯塔基州列克星敦，1989年），第36—60页；卿斯美：《艾森豪威尔政府与西方对华禁运政策的演变（1954—1958）》以及波顿·I. 考夫曼：《艾森豪威尔对东亚的经济政策》，两文均见孔华润和入江昭：《大国在东亚》，第121—142，104—120页。

② 孔华润：《日美关系中的中国》，第47页；罗杰·丁曼：《危机中的同盟——"福龙丸号"事件与日美关系》，见孔华润和入江昭：《大国在东亚》，第187—214页。乔治·帕卡德三世：《东京的抗议》（普林斯顿，1966年）。

洲、中东和非洲的地区争夺。美国和苏联的一些行动在战略上似乎是无可非议的，如果一方在多米诺骨牌理论上失分或声誉受损时，情形就更是如此。其中的某些行动关乎它们至关重要的经济利益，例如美国对中东石油的关注。其中的某些行动仅仅是习惯使然：既然拥有干预的力量，那就使用之，展示之，试验之。

相对而言，艾森豪威尔不太关注控制第三世界的争夺。他关心的主要是欧洲事务，他认为，美国的未来并非取决于为控制边远、落后、部落制的社会而斗争的结果。然而，那里有那些多米诺骨牌，还需要在那里遏制共产主义。在某些时候，第三世界国家是原料——特别明显的是石油——重要产地，或者是美国、日本、西欧等国家潜在的贸易伙伴。在苏联或中国卷入其中时，挥舞核武器也许可以保护美国利益，而在其他情势下，显示一下力量也许就已经足够。还有另一种正在使用但相当不易界定的手段：隐蔽行动，这是一种不为人熟知的方法，其潜在价值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

美国政府最初干预第三世界的重要行动之一发生在危地马拉，这是一个一向被视为美国势力范围的加勒比海国家，其他任何大国对它的影响都非常有限。对美国军事领导人而言，拉丁美洲是他们考虑最少的地区，因为苏联对该地区的干预被认为是极不可能的事情。而且事实上，也没有苏联卷入危地马拉的证据。然而，该国有一个通过宪法手段上台的民族主义和改良主义政府，它竟敢没收一个以美国为基地、构成危地马拉主要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公司——联合果品公司——的资产。毋庸置疑，这个政府得到了该国一小撮共产党人的支持，但是，它既不受他们的控

制亦不受他们的领导。[1]

危地马拉总统，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上校，拒绝了美国国务院给联合果品公司所认定的足额赔偿的要求，并对美国的压力一直反应迟钝。在联合果品公司董事们的游说下，美国政府作出决定，阿本斯的顽抗和联合果品公司在中美洲其他地区的劳工骚乱是由共产党分子煽动的。共产主义毒瘤已经在美国的势力范围内出现，必须将其迅速地根除。中央情报局于是就制定了纠正这一情势的计划。

当美国不断增加压力而且阿本斯获知一个流亡者入侵危地马拉的计划时，他绝望地到处寻求武器，最终不顾一切危险转向了苏联。苏联把这看作是以低廉代价和不冒什么风险就可以骚扰美国的机会，因此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很快，中央情报局发现一艘载有捷克武器的船只正开往危地马拉，对认为危地马拉改革背后有国际共产主义背景的那些人来说，这是一次公共关系方面的巨大成功。随之而来的就是中央情报局组织的一次突击（150 个人和少量的飞机），阿本斯政府垮台了。一个由美国人支持的政权在危地马拉上台执政，而且很快就把它变成了世界上最残暴的国家之一。以华盛顿之见，它在以最微小代价和几乎没有出手的情况下就赢得了一场针对共产主义的重要胜利，一场在冷战中赢得的重要胜利。危地马拉行动是通过隐蔽行动所能完成的最令人难以忘怀的证明。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均起源于中东地区。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为圣地控制权已经争斗了数个世纪。数百年来，散居于世

---

① 我的对危地马拉的论述主要来自于理查德·伊默曼的《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82 年）。也可参见斯蒂芬·拉布：《杜勒斯、拉丁美洲与冷战反共主义》，见理查德·H. 伊默曼：《杜勒斯与冷战外交》，第 159—187 页。

界各地的犹太人把号召返回耶路撒冷作为他们逾越节[1]庆祝活动的一部分。19世纪末期，在欧洲产生了世俗的犹太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而且在随后岁月里有几千犹太人逐渐移居到巴勒斯坦。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奥斯曼帝国手里夺取了对巴勒斯坦的控制权，它对居住在那里的阿拉伯穆斯林和盼望以那里为故国的欧洲犹太人作出了互相抵触的承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屠杀，亦即德国人屠杀了600万犹太人之后，美国和英国领导人都把巴勒斯坦视为在纳粹死亡集中营中幸存犹太人的一个合适的避难所。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邻近国家的阿拉伯人强烈反对联合国为了创立一个犹太国家而分裂巴勒斯坦的决议。1948年4月，犹太人在联合国分给他们的那块巴勒斯坦土地上宣布成立以色列国。随之就发生一场大规模战争，犹太人在战争中部分得益于苏联控制的捷克斯洛伐克所提供的武器，因而战胜了比它大许多的阿拉伯军队，并且创建了一个甚至大于联合国以前要建立的国家。以色列国在随后几十年里给该地区带来灾难的阿以冲突中赢得了第一个回合。

一些美国领导人，譬如说哈里·杜鲁门，似乎对这些从奥斯威辛和布痕瓦尔德[2]等集中营幸存下来的活“骷髅”们有着由衷的同情。他们响应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请求：犹太人民应该建立自己的国家，以保护他们免受在欧洲过于频繁地降临到他们头上的虐待、集体迫害和大屠杀。他们清楚这样的事实：作为大屠杀的后果，美国基督教徒中有许多人同犹太人一样支持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政治家不会不知道，从支持建立以色列国和迅速承认这个国家中能赢得选票。在1948年的选举运动中，尽管杜鲁门

① 逾越节（Passover），以色列人一年之中第一个重要的节期和最重要的节期之一。——译者

② 奥斯威辛（Auschwitz）位于波兰，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在德国境内。——译者

试图将该问题排除在党派政治之外，但他还是急忙动议承认以色列国，因而就损害了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寻求和平解决分治问题的努力。

其他美国领导人力劝总统把感情搁置一边，他们认为美国与阿拉伯人结盟乃国家利益之要求。广义而言，中东包括北非阿拉伯人地区、阿拉伯半岛和西南亚，其石油储量占了世界探明储量的相当大的比例。这个地区居住的几乎全部是穆斯林，大部分是阿拉伯人，而且对欧洲人的侵害怀有普遍的敌意。支持一小撮犹太人将会疏远控制着连接三大洲的战略要道和据有大量石油的数百万穆斯林。凯南曾对犹太人的遭遇表现得极为冷漠，此时却非常容易地受到了国务院阿拉伯问题专家说辞的影响。1948 年担任副国务卿的罗伯特·洛维特对犹太难民中的苏联同情者感到担忧，并不适当地警告杜鲁门说，接受这个犹太国家是“不问好坏而乱下赌注”。

简而言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半个世纪里，中东向来是一个美国日益依赖的极为重要的石油宝库，其欧洲和日本朋友对该地区石油的依赖程度就更大了。正是阿以冲突的这个地点，迅速地演变为历史上最难以解决的冲突之一。更有甚者，该地区之一部构成了苏联帝国的边缘地带，就不可避免地成为苏美对抗的重要舞台。

杜鲁门政府对苏联向伊朗和土耳其施加压力作出了强烈反应，并制定了防止共产党游击队推翻希腊政府的杜鲁门主义。它展示了美国继承英国在该地区地位的打算，也表明了它对苏联在那里扩张其势力的合法性的否定。斯大林赤裸裸的帝国主义及其兼并属于伊朗和土耳其的领土的企图，显而易见是令人讨厌的，而且也比较容易对付。而他对 1948 年阿以战争的干预以及他恶化该地区霸主英国处境的明显企图，则是更难以对付和尤其令人担忧的。斯大林去世后，正是苏联对中东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才构成了对美国在该地区利益的威胁。

自19世纪末以来，欧洲帝国主义者就统治着中东地区，从他们手里获得自由的要求在政治上把反复无常的阿拉伯人团结起来。作为非阿拉伯人穆斯林的伊朗人同样具有倔强的性格。到了1947年，英国正在撤退，法国却越发不愿放弃，然而，非殖民化进程却基础牢固，一些地区要比另一些地区慢一些，但其趋势却难以动摇。苏联被迫减轻了对土耳其和伊朗的压力，但对他们帮助建立的犹太国家向苏联犹太人的呼吁颇为不快，由于对阿拉伯世界的忽视和缺乏兴趣，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早期，苏联人对中东地区基本上是漠不关心的。由于历史上没有卷入这个地区，传统上又反对帝国主义，美国在当地民族主义者眼里并不具威胁，于是就以其力量渗入这个真空地带，把影响投射到了这一地区。

从一开始起，美国干预中东地区的动机就是复杂的，它是美国扩展其反帝国主义使命和阻止苏联扩张决心的混合物。在终结英法帝国主义的同时，美国领导人也不愿对苏联帝国主义有所助益。支持以色列是一件令人烦恼的麻烦事，它受到人道主义者、国内的政治考虑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能与物质利益相协调的一种强烈愿望的驱使。华盛顿的人士做了他们认为必须为以色列做的事情，希望能得到最好的结果。然而，事实证明，地区问题的复杂性使所有这一切都相形见绌。阿以冲突不能和苏美争夺截然分开。尽管美国在历史上一直有反对帝国主义的诉求，然而一旦机会出现，这种诉求并不能使它获得对帝国主义流毒的免疫力。

20世纪50年代早期，美国的伊朗政策是帝国责任中不道德影响的极好例证。苏联对伊朗领土完整和独立的威胁在1946年被成功地阻止了。英国几乎在战争一结束就立即从伊朗撤军，但是，英国在伊朗的石油利益仍很重要，而且在撤军之后很久还继续控制着伊朗的石油。当决心收回自己资源的伊朗民族主义政权

和英国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时，美国就试图斡旋。杜鲁门政府居中使英伊双方达成妥协的努力没有成功，伊朗政府继续在一些令人不安的方面拒不退让。

德黑兰不断增长的共产主义影响，伊朗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允许其国家接受苏联控制的可能，越发使华盛顿感到忧虑。尽管这是一个不大可能出现的结局，但是艾森豪威尔政府不允许伊朗与西方离心离德。就像在19世纪将宗主权加诸于附属国的任何一个帝国强权那样，美国决定更换伊朗的领导。在英国特工的帮助下，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53年秘密策划一次军事政变，逮捕了摩萨台，将权力转移到国王手中。此后许多年里，作为特别的感谢，国王对美国无不有求必应，包括在一个管理伊朗石油生产的新国际财团中给美国公司40%的股份，而他自己的臣民却受益甚微。[①]

当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及其顾问环顾世界的时候，他们注意到，中东成了他们决心合围共产主义集团的联盟网络的一个缺口。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之间是阿拉伯世界和伊朗，这里蕴藏着西方可资使用的占世界2/3的石油储量，而这些地区却非常容易遭受苏联的进攻。杜鲁门政府已经认识到这种危险，但它没能使埃及加入中东防御集团。埃及一直对与西方结盟不感兴趣，并且反对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加入西方集团。无论如何，现在是完成这个包围圈的时候了。为了抗衡苏联，土耳其渴望加强其东部边境的安全。伊拉克发现了一个机会，可以借此保护自己免受可能的苏联压力并缓解对英国的依赖。巴基斯坦也抓住了一个获取军事援助的机会，其目的与其说是反对苏联，不如说是反对印度。正值渴望行动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徘徊于幕后、但仍在探索不至于

① 巴里·鲁宾：《以善意开道》（纽约，1980年），第54—90页；乔治·伦乔斯基：《美国总统与中东》（北卡莱罗纳州达勒姆，1990年），第32—40页。

触怒以色列和埃及的方案时，土耳其走出了第一步。1956年2月，土耳其和伊拉克签署了后来所说的巴格达条约，英国、巴基斯坦和伊朗也于当年加入其中。该条约没能安抚以色列和埃及，两国都对伊拉克接受西方军事援助深恶痛绝。美国从未加入中东条约组织，尽管它是该组织的主要支持者。[①]

随着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相互之间而且分别与美国结盟，苏联集团起码在表面上被敌对国家包围了。这些国家都接受了美国军援或者得到了美国的保护。但是对包括伊拉克人的大多数中东居民来说，他们感受的不是苏联威胁，因为西欧、特别是英国的帝国主义摧残其生活已经有几代人的时间，他们宁愿宣称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他们把这视为最新的政治口号。只有土耳其和伊朗已经领教了苏联的压力，而且许多伊朗人对推翻摩萨台的美国人至少是不欢迎的。遏制苏联没有得到普遍的支持。另一方面，还有数量极大的易燃物正等着某位致力于反对以色列而且要消除由西方带来的数十年屈辱的领导人去点燃。

最有可能领导阿拉伯世界恢复荣誉和尊严的人是埃及的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在纳赛尔崛起为埃及主人之前，对1948年与以色列战争的失败和政府表现出的腐败和无能感到震惊的一群青年军官在1952年推翻了颓废的国王。纳赛尔及其同僚很快就要求取消欧洲人对埃及主权的限制，而英国既没有抵抗的意志，也没有抵抗的资源。美国同情埃及人的抱负，对纳赛尔印象甚佳，并渴望赢得他的友谊，因此主张英国主动撤离。然而，纳赛尔对美国立场的满足既没有达到愿意被纳入遏制苏联的集团之中的程度，也没有使他表现出缓和在阿拉伯世界如此流行的反以色列和反帝国主义言辞的意愿。[②]

① 约翰·C. 坎贝尔：《中东的防御》（纽约，1960年），第49—62页。
② 约翰·C. 坎贝尔：《中东的防御》，第63—72页。

巴格达条约激怒了冷战时期许多鼓吹不结盟的阿拉伯领导人，但以纳赛尔的反应最为强烈。伊拉克破坏了纳赛尔拒绝西方霸权以及把阿拉伯各民族集于其麾下的理想，西方正在加强他对手的力量并维持自己在该地区的影响。苏联对巴格达条约同样不悦，它在联合国以及在宣传中越发支持阿拉伯人反对以色列和西方世界，纳赛尔对此并非不知。所以，当 1955 年 2 月以色列为报复突击队的骚扰而对埃及控制的地区发动一场破坏及羞辱性袭击时，纳赛尔就决定向苏联求援。

与斯大林不同，赫鲁晓夫对与美国争夺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兴趣盎然。对苏联制度优越性的自信、对以色列承诺的解除、与阿拉伯人一样怀有的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敌意，使赫鲁晓夫及其同僚接受了巴格达条约的挑战和纳赛尔提供的机会。看到该地区主张不结盟政策的领袖们正在寻求对西方依赖的替代途径、抑或是正在寻求使其国家得到快速发展的更为激进的模式，苏联就准备向他们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1955 年 9 月，苏联作出安排，把捷克生产的武器运抵埃及。通过诱使伊拉克加入美国领导的遏制苏联的行动，美国大大推动了苏联对该地区的渗透，送给了苏联一个与伊拉克的对手——埃及——交好的机会。

在纳赛尔和共产主义集团关系升温之时，美国还在向他献殷勤。对纳赛尔和其他谙熟领导艺术的不结盟国家领导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惊喜的情势。通过不断地变换手腕，他们得以操纵超级大国之间的争夺。美苏两国领导人竞相颂扬非洲和亚洲许多地区的统治者的德行，并慷慨地向他们提供金钱、技术和武器。在捷克武器运往埃及的中途，纳赛尔发现，美国人（和英国人）要热情地帮他建一座水坝，使他征服尼罗河并利用其能量为河谷地带提供灌溉和电力。他希望得到这个援助，但是随着苏联援助的到来，他感到没必要为安抚美国人而调整自己的政策。武器交易被视为对西方的一记耳光，增强了纳赛尔在阿拉伯民众心中的地

位。他向阿拉伯人民许诺要做一些让以色列不悦的事情。为了进一步证明对美国的独立性，他完全置美国请求于不顾，在1956年5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①]

美国国会的许多议员不愿把钱送给外国人。南方的国会议员不愿资助诸如埃及这样的棉花出产国。有相当数量的男女议员不乐意援助那些威胁以色列的国家。而且，国会内部还有一个同情蒋介石的集团，他们强烈反对资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把援助给那些不知感激、在某种程度上走到美国愿望反面的国家，在政治上是不受欢迎的，也是不明智的。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怀疑苏联是否愿意给埃及足够的资金，所以决定停止资助纳赛尔的大坝工程，这一举动如此公开而且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其目的就是让埃及领导人难堪。[②]

纳赛尔勃然大怒，加之又缺少苏联对大坝的资金的保证，他就把一个英控公司所属的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他再一次当着西方帝国主义的面把运河据为己有，使许许多多的阿拉伯人兴奋雀跃。或许他能够用运河的收入资助他的大坝工程。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反应谨慎，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却坐不住了。对美国人来说，苏伊士运河远离本土，只关乎使用的便利而非关键的利益。至于谁控制该运河，那远不能与阿拉伯人保持友好关系相提并论，这种友好关系要足以保证石油流向西方并使苏联影响远离这一地区。以武力使运河处于欧洲人或国际社会的管理之下并非一个可接受的选择。然而，对艾登来说，运河是一条把英国和西欧工业与波斯湾石油相维系的主动脉，纳赛尔已经犯下一桩鲁莽

---

① 约翰·C. 坎贝尔：《中东的防御》，第72—76页；肯尼特·洛夫：《苏伊士运河危机》(纽约，1969年)，第297—327页。

② W. 罗杰·路易斯：《杜勒斯、苏伊士与英国》，见伊默曼编：《杜勒斯与冷战外交》，第133—158页，驻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的备忘录报告了反对阿斯旺贷款的院外活动情况。

的侵略行为。正如在 20 世纪 30 年代反对绥靖希特勒那样，艾登决定不去姑息纳赛尔，他确信纳赛尔和希特勒一样，只有用武力才能加以制止。[①]

为了迎合美国坚持以谈判解决运河问题的立场，英国人在 1956 年夏末秋初竭力克制着自己。他们谈着，他们听着，而且也准备着他们认为必要的军事行动。他们在法国和以色列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同谋者。法国也与英国那样关注着运河，并对纳赛尔支持阿尔及利亚脱离法国统治和寻求独立的努力恼怒不已。以色列人对苏联向埃及运送武器和美国拒绝向以色列提供额外的武器或保证感到深深地担忧。以色列领导人认为，美国在阿拉伯人准备摧毁他们的时候抛弃了犹太人，他们将不会再被动地观望，在纳粹大屠杀之后，他们永远不会再那样做了！英国和法国的援助提供了一个他们不能错过的良机。美国的情报分析人员低估了纳赛尔的敌人发动攻击的可能性。

1956 年 10 月 29 日，当世界大多数人聚焦于苏联对匈牙利革命的反应时，以色列坦克冲过西奈半岛，在数小时内歼灭大量埃及军队。为了配合以色列的行动，英法两国在次日发出警告，要求以色列和埃及的军队撤离苏伊士运河地区，而且以保护运河为借口向附近的埃及军队发动了进攻。在军事行动结束之前，英法军队一直在向苏伊士运河推进。为了对付桀骜不驯的当地居民，美国的盟国重新祭出了 19 世纪的一种经典法宝。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境地。如果支持英国、法国和以色列，那将意味着阿拉伯世界、甚至几乎肯定是其他第三世界地区的许多国家与美国分道扬镳，也将意味着美国抛

---

① 乔治·伦乔斯基：《美国总统与中东》，第 40—52 页，是对苏伊士运河危机的简明概括。亦可见洛夫：《苏伊士运河危机》，该书的叙述完全站在同情纳赛尔的立场上。在赫尔曼·芬那的《杜勒斯与苏伊士运河危机》（芝加哥，1964 年）一书中，也可以见到对危机期间的美国政策的尖锐批评。

弃了反帝国主义和反对侵略的传统政策，为对手攻击其伪善提供了有说服力的依据，它还意味着使苏联在中东地区居于发号施令的地位，使苏联得以树立其作为阿拉伯人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惟一支持者的形象。在世界应该谴责苏联在匈牙利的暴行之时，这将给威胁要对英法两国使用核武器的赫鲁晓夫以极大的宣传胜利。这个代价太高了，所以美国选择在联合国带头谴责英国和法国。就是这一回，为了争取对阿拉伯世界的影响，美国和苏联在谴责帝国主义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尽管以色列向艾森豪威尔索取了自由进出亚喀巴湾的保证，英国、法国、最终还有以色列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撤退。美国与其北约盟国的关系可能再也没有这样紧张过，但美国确保了它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对华盛顿而言颇为遗憾的是——苏联亦有同感——这事件对它改善在该地区的地位似乎是有害的。

纳赛尔的行动表明，为了权势和影响，他与美国以及与苏联之间已经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角逐。就像许多第三世界的其他领袖那样，当他的美国和苏联对手试图精明地利用他的时候，他也同样精明地利用他们为自己服务，华盛顿和莫斯科都不能指望建立对他或者对中东的控制权。然而，在整个 20 世纪 50 和 60 年代，就美苏两国的中东利益而论，纳赛尔对美国利益的威胁则更大一些。正是由于美国及其盟国对中东石油日益严重的依赖，他们才担忧纳赛尔的泛阿拉伯运动有朝一日将会控制这个石油龙头、有朝一日将会阻断对西欧和日本工业如此关键的石油输送。在纳赛尔或其他阿拉伯领导人试图为巴勒斯坦人讨还巴勒斯坦的时候，正是美国不能抛弃以色列，而且也正是美国对这一时刻的来临感到担心。赫鲁晓夫与斯大林不同，他愿意援助纳赛尔，确信一个更强大的埃及将是苏联的一笔资产，确信美国将由于石油运输的中断以及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之间的冲突而受到削弱。

在苏伊士运河危机的余波中，艾森豪威尔表达了美国的严重

关切，他请求国会通过一项宣称中东地区关乎美国关键利益的决议，结果也确实如愿以偿。该决议赋予总统便宜行事之权，在某个国家要求美国帮助反击“来自国际共产主义控制的任何国家的公开武装侵略”的时候，决定援助那里的国家以及在必要时使用美国军队。这个决议不久就被称为艾森豪威尔主义。除了对付苏联以外，它还有阻止纳赛尔扩张其影响的目的，而且也可用于对付该地区的突发事件。艾森豪威尔主义在1957年曾经付诸实施，那时候，约旦国王在国内外的亲纳赛尔力量的威胁下吁请美国的帮助，他声称——这丝毫也不奇怪——危险来自于“国际共产主义”。美国的第6舰队于是就开赴东地中海显示军威，与此同时，美国还向约旦国王提供了1000万美元的援助。

1958年夏天，一个更危险的情势震惊了华盛顿。在此之前，信奉基督教的黎巴嫩总统一直在向任何愿意听其倾诉的人吁请援助，以反对亲纳赛尔的力量。尽管与苏联关系密切的埃及和叙利亚都插手了该国事务，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国际共产主义已卷入其中。直至伊拉克发生政变、亲纳赛尔和亲苏联的政权取代了签署巴格达条约的政权之后，华盛顿才作出积极的反应。面对纳赛尔的力量似乎一统阿拉伯世界、消灭这个西方主要盟友以及苏联在该地区影响日益增长的情势，美国于是把海军陆战队调遣至黎巴嫩。赫鲁晓夫担心美国要干预伊拉克，就威胁着要开战。但美国很快就查明，苏联人没有卷入伊拉克的政变，新的伊拉克领导层确实有更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的情绪，但还不太可能愿意使他们的国家沦为苏联的卫星国。华盛顿通过承认巴格达政权化解了这场危机。纳赛尔不希望美国军队一直驻扎在这个地区，于是运用其影响要求黎巴嫩和叙利亚的朋友保持镇静，这就加速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撤出。美国在阿拉伯世界几乎没有结交到什么朋

友，但在愤怒之中也没有开火。[①]

正如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所表现的，它在中东扮演了一个传统大国的角色。美国主要是对该地区的资源、对以一个合理的价格源源不断地输送石油感兴趣。为此目的，美国需要维持中东地区的秩序和稳定，也需要在该地区销售外国商品，正如它在大多数发展中世界所做的那样。即使不曾有苏联的挑战，美国决策者遇到的问题将与此类似，而且同样难以解决。阿拉伯世界内部的竞争，特别是那些卷入埃及、伊拉克和叙利亚以及试图领导泛阿拉伯运动的国家，还有在世俗制和政教合一制度之间苦苦挣扎的那些国家，将会不断地制造动乱。与此相似的还有国家、宗教、种族和社会经济内部的紧张以及在缺少和平解决分歧的既有模式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冲突，即使这样的分歧是可解决的。所有这些问题在一个大锅里发酵，而以色列的出现又增加了一种爆炸性的混合剂。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密切关联构成了一个更深层和难以摆脱的苦恼之源。

苏联扮演着参与竞争但力量较弱的传统大国的角色。尽管苏联和中东毗邻，但它没有能力把美国从该地区排挤出去。它能够时而不时——它在50年代曾经如此行事——在它选择的地点搅动这口大锅，推动当地人抵制美国人的梦想，提升美利坚统治下的和平的代价。对与美国关系感到不满的阿拉伯人来说，无论如何，苏联给他们提供了一种选择。这些都与国际共产主义没多少关联，因为国际共产主义对阿拉伯世界没有什么吸引力，在此期间，它在中东地区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赢得立足点。

为了遏制苏联，美国努力把所谓的北层国家（northern tier

① 乔治·伦乔斯基：《美国总统与中东》，第57—64页；威廉·斯蒂弗斯：《艾森豪威尔与中东》，见梅兰森和梅耶斯：《重评艾森豪威尔》，第206—209页。

states）——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拖进巴格达条约，但这并不能真实反映苏联在该地区所起的作用。苏联并不是因为受到条约的刺激才插手中东事务。巴格达条约只是给了苏联在一个特别的时刻与埃及建立关系的机会。但是，作为世界第二个最强大的国家，它在该地区有传统的利益，因此不可能轻易就被挤出去。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领导人积极寻求与阿拉伯世界建立联系。迟早有一个阿拉伯领导人会发现，接受苏联人的建议是符合其利益的。

赫鲁晓夫对苏联在边缘地区成功地同美国竞争有相当的自信，在解释这一现象时，另外两个例子也许更有说服力。有史以来，苏联人从未关注过印度尼西亚和刚果这样的地方，它们与苏联任何至关重要的利益都相距甚远。为了在东南亚和非洲建立立足点，但也许主要是为了证明苏联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世界大国，赫鲁晓夫在这两个国家发展的关键时刻投入了苏联的资源。

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在1955年主办了不结盟国家的万隆会议，并由此生出了大国才有的宏大梦想。他自认为是一个世界级的领导人，在国内试图为自己僭取额外的权力，并把更多领土置于印度尼西亚的统治之下。由于不满意美国援助的范围和条件，他飞赴莫斯科，在那里得到了赫鲁晓夫提供的1亿美元贷款。返回印度尼西亚之后，他试图用苏联的贷款刺激华盛顿，以使它出手更大方一些。与此同时，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支持下，他把印度尼西亚现存的议会体制改为他所谓的“有指导的民主”之类的东西。他创立的决不是列宁主义体制，但是，他加强了个人权力，减少了追求真正的民主政府的机会。

华盛顿对苏加诺的极端利己主义感到厌恶，但是，目睹他和苏联人之间的调情、当地共产党人在他背后牵线搭桥的证据以及他对美国的盟国荷兰仍然控制下的新几内亚提出的领土要求，华盛顿就越发心烦意乱。大体说来，美国还是在1957年增加了对

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的援助，尽力保护该地区免受来自毛泽东的中国可能的威胁，但美国不愿意向印度尼西亚的军队提供武器，因为这些武器有可能用于反对荷兰，而且，美国并不愿意在这方面与苏联一争高下。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对有机会向印度尼西亚军队提供武器感到非常高兴。苏联在 50 年代后期成为印度尼西亚主要武器的供应者，它扮演这一角色几乎有整整 10 年。

美国从未在印度尼西亚建立强大的影响力，而且，美国之所以一开始就支持那里的独立运动，其原因是把它作为抢在共产党之前控制这个国家的手段。如果该国四分五裂，美国可能会感到特别的宽慰。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曾分别表示过，他们宁愿要几个小的岛国，也不愿意出现一个与共产党人结盟的统一的印度尼西亚。1958 年，中央情报局——艾森豪威尔心仪的武器——受命支持苏门答腊的分离运动。苏门答腊的反叛分子接受了中央情报局的装备与该局情报人员的训练，更有甚者，为帮助反叛分子，中央情报局的人员还亲自驾驶飞机去执行轰炸任务。这一努力失败了，而且事情因其中一架飞机被击落和飞行员被俘而败露。华盛顿试图否认它在其中应负的责任，但最终也未能得逞。[①]

美国没有能力控制印度尼西亚的资源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苏联的援助在印度尼西亚维持了一个前途未卜的朋友，而美国也继续其适度的援助计划，以免把苏加诺逼到完全依赖苏联的程度。没有一个超级大国能从讨好苏加诺中得到许多实际的好处，但赫鲁晓夫所得到的满意之处还是要多一些。

在刚果，赫鲁晓夫的策略就不那么成功，苏联人也不是中央情报局的对手。刚果共和国在 1960 年 6 月从比利时统治下获得

---

① 霍华德·帕尔弗里·琼斯：《印度尼西亚——可能的梦想》（纽约，1971 年），第 129—146 页。

了独立，它的首任总理是帕特里斯·卢蒙巴，一位很受非洲裔美国人敬重的人。在这个部落制度严重威胁其内部统一的国家里，他被视为惟一的国家领导人。尽管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很重视中部非洲的矿产资源，但他们都不认为该地区有什么战略价值。艾森豪威尔政府中也没有一个人认为美国在刚果的经济利益已处于危险之中。这里可能是免受超级大国对抗毒化的世界之一部分。[①]

刚果独立后没有几天，卢蒙巴就怀疑比利时人不太乐意把权力移交给他。刚果军人政变之后，比利时留在刚果的部队首先得到迅速增援，接下来就是加丹加省、这个欧洲人投资的中心地区的分离。比利时伞兵阻止卢蒙巴在加丹加省的主要机场着陆。卢蒙巴对这些事件感到震惊，就不停地向美国、联合国和苏联求援。

起初，美国和苏联都按照联合国的意见行事。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比利时撤军并在军事上援助卢蒙巴政府。数周过去了，刚果的重新统一未获任何进展。卢蒙巴再次向苏联求助。赫鲁晓夫这次再也忍不住了。他把苏联的运输能力发挥到了极限，向刚果输送了大量装备和许多苏联和捷克的专家。

苏联的卷入改变了美国人对卢蒙巴和刚果的战略价值的认识。尽管事实是卢蒙巴首先向美国求助，艾森豪威尔政府还是逐渐把他视为一个不稳定和危险的激进分子，他很可能会把共产主义引入中部非洲。一旦苏联明确宣示它在该地区享有利益，刚果就变成了南撒哈拉非洲地区的关键。如果共产党人实现了对刚果的控制，他们将会统治整个黑非洲地区。加上刚果附近的十来个

① 斯蒂芬·R. 韦斯曼：《美国在刚果的对外政策（1960—1964）》（伊萨卡，1974年），该书是我叙述刚果的主要参考书。也可见布赖恩·厄克特：《和平与战争的一生》（纽约，1987年），第145—173页。

甚至更多国家的重要地位，边缘地区的价值再一次得到提升。刚果的丢失等于整个地区的丢失，也许还意味着一块大陆的丢失，最后，世界的力量平衡也将岌岌可危。苏联必须被阻止，美国一定要干预。

艾森豪威尔政府希望在不与苏联直接对抗的情况下挫败它的计划。美国把希望寄托于联合国，再辅之以中央情报局暗杀卢蒙巴的行动。1960 年 9 月，刚果总统在美国驻刚果大使和联合国驻刚果代表的建议下采取行动，解除了卢蒙巴的职务。卢蒙巴试图抓住权力不放，但联合国部队关闭了机场，阻止苏联飞机把卢蒙巴的军队运往首都。卢蒙巴被软禁起来，而约瑟夫・蒙博托在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作为强权人物出现在新政府之中。

联合国部队在刚果反卢蒙巴的行动激怒了赫鲁晓夫。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战场转移到纽约，赫鲁晓夫亲自率领苏联代表团，在那里痛批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正是在这场言辞谩骂中，为了发泄对另一位演说者言辞的不满，赫鲁晓夫表演了他那很久以后还为人念念不忘的敲鞋的一幕。但是苏联人在刚果的阴谋已被挫败，在向该地区投送力量方面，他们无力与美国人抗衡。在蒙博托巩固权力之前，刚果内部的冲突又持续了数年，贯穿了整个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时期，直至赫鲁晓夫执政接近尾声。卢蒙巴在 1961 年被谋杀，苏联和几个非洲国家继续支持他的政治伙伴，但美国满意的政权最终取得了优势。在 20 世纪 60 年代，在非洲建立势力范围的竞争中，苏联不仅不能与美国比肩而立，而且还难以望其项背。

在斯大林去世和朝鲜战争结束之后，苏联人和美国人再一次开始探索规范其对抗的途径，寻求在相互对抗的同时又不至于威胁这个世界存在的方法。赫鲁晓夫及其同僚开始摧毁斯大林主义的国家，他们是富有献身精神的共产主义者，而且——以赫鲁晓夫为例——有着比斯大林多得多的救世理想。但是，他们希望把

人民从斯大林主义的恐怖和残暴中解救出来，他们愿意让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国家的人民享有更多的自由。他们试图——虽然有些迟疑和笨拙——在苏联创建一个更加开放和更加人道的社会。他们试图让邻国对他们的恐惧比对斯大林的更少一些。然而，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对世界和平变得更具威胁。斯大林此人虽然恶毒凶狠，但却出手谨慎。而赫鲁晓夫虽然体面正派，但有时却是一个生性冲动和热衷冒险的赌徒。赫鲁晓夫坚信共产主义将最终取胜，而美国霸权的日子业已屈指可数。他渴望为苏联赢得尊敬，并为了使锤子镰刀的旗帜在全世界飘扬而不倦地工作。在使苏联成为至少与美国比肩而立的世界大国的渴望驱使下，他将苏联的资源投到遥远但重要性大可怀疑的地区。他不愿将边缘地带白白让给美国人。

在美国人看来，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活动增加了美国的风险。无论何地，只要听说有苏联的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机器就急切地想阻止它，国会也会提供必要的资金。因为苏联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美国的反应常常是由中央情报局采取行动。有一些行动可能是成功的，如在伊朗、危地马拉和刚果，另一些行动则遭到了失败，譬如说在印度尼西亚。

在 20 世纪 50 年代，欧洲，这个美苏争夺的主战场是比较稳定的，大国之间的对抗陷入了僵局。正如在华盛顿那样，在莫斯科，苏联领导人的顾问们把第三世界视为他们的国家要争夺的地区，视为验证他们理想的魅力和他们的特工人员技艺的地方。超级大国的卷入不可避免地把一个次要事件变成了一个重要事件。每一方都不得不展示它的决心，以免其所谓的霸权形象和领导本集团的能力受到质疑，当毛泽东向苏联的领导权提出挑战的时候，当戴高乐拒绝惟美国马首是瞻之时，这样的事情确实发生了。

第五章 危机解决

在紧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40年中，1958—1962年间的紧张形势可谓无出其右者。对柏林和古巴的关注致使美国军队在此种情形下与苏联军队展开了直接对抗：一位喜欢寻衅或者神经紧张的军官的一个偶然错误或一个轻率行动，都可能引发一场战争，导致世界大部地区的核辐射与毁灭。每一次危机都是尼基塔·赫鲁晓夫挑起的。苏联在空间竞赛中的胜利和1957年人造地球卫星（Sputnik）的发射，增强了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将最终取胜的信念，而且希望在他当政期间加速这一进程。他发现美国的自负令人难以忍受，就强烈希望通过使战略平衡发生逆转来结束这种局面。他得意地把柏林称为西方的“睾丸”，他说，“只要我使劲一扯他们就会痛苦地喊叫”。[1] 古巴离佛罗里达州海岸只有90英里，它为苏联提供了一个部署核导弹的合适地点，赫鲁晓夫想借此让美国人也尝尝生活在核武器阴影下的滋味，以便使惯于核讹诈的美国人有所收敛。

尽管这个时代的危机是由苏联行为挑起或促成的，但是，如果看不到苏联人行动和声明之间相互作用的性质，也弄不清他们对美国及其盟国政策的反应程度，人们就难以理解这些危机。苏联人对西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反应平静得出奇，大概他们

① 引自赛勒斯·苏兹贝格：《巨人的末日》（纽约，1970年），第860页。

已经认识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遏制苏联集团的同时也制约了德国人。尽管如此，苏联人对一个复活的德国的恐惧无论如何也是不会消失的。德国经济的复苏可能令德国以外的任何人都感到担心，但是，最让赫鲁晓夫及其同僚寝食难安的莫过于西德人取得核武器的可能性。美国正在德国领土上储备能够打击苏联的“战术”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德国要求并已经获得了可携带核武器的大炮和战斗轰炸机。苏联急欲通过谈判解决欧洲的政治问题，以达到承认欧洲现状、包括承认德国分裂的目的。他们也对武器谈判极感兴趣，希望借此造就一个非军事化的、或者至少非核化的中欧。然而，苏联的提议没有得到华盛顿的积极回应，美国国内和盟国的政治生活排除了对任何类似中欧中立化计划的认真考虑，即使 1957 年乔治·凯南在“脱离接触”演说中提出该计划之后也仍然如此。用挑起一场危机去引起艾森豪威尔的注意，这种方法既拙劣又危险，但是，赫鲁晓夫没有高明的手段，而且可能也确实别无它法。

与此类似，美国加强了推翻古巴卡斯特罗政权的努力，此中种种迹象使苏联和古巴领导人预计美国会在 1962 年发动进攻。中央情报局和以美国为基地的古巴流亡者的反古巴行动从未间断过。苏联和古巴情报机关业已获悉，美国军队入侵古巴的紧急计划已经成型，这年秋季，美国军队计划在加勒比海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这对苏联与古巴来说也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保护古巴这个新朋友可能并不是赫鲁晓夫把核导弹安置在该岛的主要考虑，但是，这无疑是他考虑的一部分，而且后来还成为证明其行动正当性的辩辞。

这一点不难理解，一个超级大国的每一步行动都视其对另一个超级大国意图的判断而定。苏联在柏林和古巴的行动是根据它对德国和美国的进攻性的判断而采取的。苏联领导人以欧洲现状和古巴的保卫者自居，并视自己为美国威胁的牺牲品，他们试图

阻止这两个地方发生变化，与此同时，在古巴使用核武器制止美国的核威胁，从而校正两国之间的战略平衡。美国领导人由于担心苏联常规力量的优势而把导弹运往德国，他们没有把赫鲁晓夫在柏林的施压视为防御性行动。当他们决心摧毁卡斯特罗政权之时，目的是想防止古巴成为苏联在西半球的基地。他们正在保卫美国的关键利益。一如既往，每一方都把对方的行为视为对自己的威胁，自己的行动才是防御性的。双方的行动都有其依据，任何一方的反应都是视对方图谋而作出的。

赫鲁晓夫的外交政策似乎受到3种情绪的驱使，但归根结底是出于对苏联国家福祉的现实考量。他想使苏联取得至少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地位，并得到一个超级大国应有的尊重。他希望看到共产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较量中获胜。不过他却对德国的力量感到担忧。他在1958年挑起的柏林危机为他如何行事提供了一个有用的例证。

20世纪50年代后期，德国力量得到了恢复，它在西方盟国中的影响力也日益上升，这些表现使苏联分析家忧心忡忡。西德政府挫败美国要求其扩充常规力量而不是拥有核武器的能力，表明华盛顿要费尽心机去讨好波恩政权。显而易见，西德军方希望至少取得战术核武器，而且对战略导弹也极有兴趣，美国对此也开始持一种默许的态度。1958年2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美国司令官宣布说，“防御性核武器对于加强西德国防军的防御力量是绝对不可缺少的”。[①] 到了1958年岁末，一个为实施核打击而训练德国空军部队以及在其驻地附近建设储存设施的计划已经完成，对苏联和东德的情报机构而言，此类军事行动很难瞒过它们的耳目。

① 引自凯瑟琳·凯利赫：《德国与核武器的政治》（纽约，1975年），第94页。

与之相似，波恩拒绝保持德国永久分裂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对苏联来说，一个分裂的德国是比较安全的。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不能获得一个解除武装或中立化的德国，苏联人准备接受现状。他们希望得到美国对一个独立东德的承认，并想获得西德永远不能得到核武器控制权的保证。美国仍然希望德国重新统一，并且日益把核武器视为在数量上远逊于苏联红军的北约军队不可缺少的力量。

艾森豪威尔政府总是怀疑苏联意图，也不愿承认苏联为取得与美国的战略均势而努力的正当性，所以对它来说，与莫斯科谈判不是一个容易作出的选择。与苏联达成任何安排，只要不是以苏联投降为前提，共和党右翼就可能大吵大嚷，斥之以绥靖、"慕尼黑"或"雅尔塔"。在德国问题上对苏联的任何妥协都将打上背叛的标签。与之相似，由于美苏之间的有关谈判可能危及它既定的统一德国的目标或者它的主权，波恩政府对任何此类谈判都心存恐惧。在与苏联的有关德国的谈判上，北约盟国的意见并不一致，只有英国热心支持这一想法。为了不遭致波恩的反对，也不去蹚国内政治的混水，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苏联发出的信号一直不予理睬。

1957年晚些时候，在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之后，赫鲁晓夫开始酝酿与艾森豪威尔举行高峰会谈。而北京的毛泽东则认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进攻时机已经成熟，赫鲁晓夫的克里姆林宫的一些好战同僚也有这样的认识。在苏联人眼中，好兆头已经来临，美国人则与其无缘，他们气急败坏，宛如他们那嘶嘶作响而后发射失败的"先锋号"（Vanguard）火箭一样。赫鲁晓夫等了一年，直到台湾海峡危机和1958年国会中期选举过去后，他宣布西方大国必须在6个月内与东德政府通过谈判解决西柏林地位问题。超过最后期限，苏联将与东德单独缔结和平条约，让东德人自己负责西方进出柏林的问题。杜勒斯警告说，如果有必

要，西方将动用武力确保其出入柏林通道的畅通。赫鲁晓夫针锋相对地回应说，那随之而来的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柏林危机后期，赫鲁晓夫告诉艾夫里尔·哈里曼，“如果你们动用坦克护送，它们将被炸毁，这是确定无疑的。如果你们想要战争，你们会如愿以偿的，但记住它是你们发动的战争，我们的火箭正候着要飞起来呢。”①

艾森豪威尔没有被赫鲁晓夫的夸张言辞所吓倒，他拒绝按最后通牒的条件进行谈判。但是，他与杜勒斯——在后者 1959 年去世以前——都认为有必要对苏联人客气一点，不管怎么说，在他们最后一段任期内没有更多政治资源可资利用的时候，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做到的事情。赫鲁晓夫受邀访问美国，与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共度周末，去好莱坞旅行。由于安全的考虑，赫鲁晓夫没有访问迪斯尼乐园，在未完成访问计划的情况下便打道回府。尽管有关柏林的最后时限被取消了，但赫鲁晓夫继续抓住这个问题不放，他非常希望在 1960 年 5 月计划举行的高峰会议中加以解决。然而，西德的反对可能排除了在柏林问题上的任何妥协。到了 1960 年春天，美国政府从在苏联进行高空侦察的 U－2 飞机所搜集的情报中确认，赫鲁晓夫所宣称的苏联导弹优势缺乏证据。赫鲁晓夫也从高峰会议前夕一架 U－2 飞机被击落获悉，美国已清楚他在搞恫吓威胁，并且知道苏联处于相对的劣势。赫鲁晓夫从高峰会谈中退席以示抗议，其表面理由是 U－2 飞机问题。柏林问题又陷入焖烧的状态，于 1961 年 6 月再次危险地爆炸了，而赫鲁晓夫要面对的将是约翰·F. 肯尼迪政府。

在离本土较近一些的地方，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越来越不耐烦。在把古巴人民从邪恶统治者福尔

① 引自戴维·霍洛韦：《苏联与军备竞赛》（纽黑文，1983 年），第 84 页。

亨西奥·巴蒂斯塔那里解放之后，菲德尔·卡斯特罗就从罗宾汉[①]式的人物摇身一变，成为一位有发展前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成为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突然扎根于美国势力范围的工具。巴蒂斯塔早已失去古巴精英分子的信任，尽管有传闻说，革命力量中的共产主义势力试图废黜他，但他最终还是失去了获得华盛顿支持的任何希望。最后，巴蒂斯塔离开古巴逃往迈阿密，1959年1月初，卡斯特罗率领部下——这场革命的主要武装力量——进入哈瓦那，并迅速成立一个政府。

新成立的古巴政府是一个激情荡漾的民族主义政府，持一种温和的左翼立场。但是，以拉丁美洲的标准，这就意味着对美国、对这个长期的地区霸权国家、尤其是对美国经济权势的挑战。但是，最初的哈瓦那政权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它甚至是反共产主义的。这个政权内的许多人，要么是人们所说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拥护者，要么是一些其计划激进程度远逊于罗斯福新政的人。然而，温和领导人很快就向激进分子让步，包括没收美国人财产在内的改革步伐加快了，自由民主制度的前景日见黯淡。卡斯特罗发表了一系列抨击美国的言论，古巴共产党获得合法地位，尽管其成员处于少数地位，但在卡斯特罗的计划执行中，他们已经开始发挥作用。共产主义影响增长的种种迹象使艾森豪威尔寝食难安，然而，据中央情报局探得的情报，其中并没有苏联插手的证据，卡斯特罗本人也不像一个共产主义者。但在1960年2月，为了响应卡斯特罗的提议，赫鲁晓夫派出副总理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前往古巴，此次访问表面上是参加一个商品交易会。苏联与古巴随后签订了贸易协定。这足以使艾森豪威尔感到震惊了。为取卡斯特罗而代之，必须扶植一个由包括曾与其

---

① 罗宾汉（Robin Hood），英国民间传说中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译者

合作推翻巴蒂斯塔的民主改革人士组成的古巴政府。艾森豪威尔不希望像特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1] 或者伍德罗·威尔逊那样，派遣海军陆战队去执行这一使命。话说回来，他几乎不需要海军陆战队，因为他有中央情报局。[2]

艾森豪威尔之所以偏好与那些桀骜不驯的第三世界领导人打交道，其目的是尽可能地减少美国在这些地区的公开卷入。一如对待伊朗和危地马拉那样，他希望中央情报局找到更能接受美国政治和经济价值观的当地力量，并支持他们发动政变。不久，为了侵入古巴，中央情报局开始训练古巴的流亡分子，但它未能拼凑出古巴"流亡政府"，而这是艾森豪威尔命令他们进攻古巴岛的先决条件。在此期间，美国政府开始向古巴施加经济压力，减少其承诺的所购古巴糖的份额。最后，为暗杀卡斯特罗，中央情报局进行一系列稀奇古怪的阴谋活动，包括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把上述任务转包给黑手党。[3]

无论是从把古巴人民团结到他那日益激进的国内计划周围，还是从谨慎的赫鲁晓夫那里获取支持来说，美国的敌视都使卡斯特罗受益匪浅。1960 年 5 月，古巴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赫鲁晓夫再次把他的火箭弄的嘎嘎作响，借以警告美国不要进攻古巴。苏联领导人仍然怀疑卡斯特罗的动机，并对在美国势力范围内向其发起挑战感到不安，但是，挖美国墙角的机会证明是难以抗拒的，诸如纳赛尔和苏加诺等人曾经利用过的情形而今再度上演。随着美国对卡斯特罗施压力度的不断加强，卡斯特罗日益转

---

① 即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美国第 26 任总统（1901—1909），对拉丁美洲国家惯用"大棒政策"。

② 小理查德·E. 韦尔奇：《对革命的反应——美国与古巴革命（1959—1961）》（查佩尔希尔，1985 年），第 3—63 页。

③ 托马斯·鲍尔斯：《守口如瓶的人——理查德·霍尔姆斯与中央情报局》（纽约，1979 年）。

向苏联集团寻求支持。与纳赛尔和苏加诺迥异的是，就在事件发展的某个时候，譬如说在1960年底或者1961年，卡斯特罗决心要成为一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1960年12月，莫斯科和哈瓦那发表一个联合公报，古巴宣布支持苏联的对外政策。1961年1月，卡斯特罗下令大幅缩减美国驻古巴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艾森豪威尔恼怒地宣布同卡斯特罗政权断绝外交关系。中央情报局资助古巴流亡者入侵古巴岛的计划又获得新的动力。在即将卸任时，艾森豪威尔预先得知该计划可能不久将付诸实施。但一段时间之后，卡斯特罗将会变成约翰·F. 肯尼迪所面对的问题。

显而易见，在古巴、美国和苏联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中，关键性角色是主导古巴的革命并决定其速度和方向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卡斯特罗清楚知道美国是他实现目标的障碍，而苏联是一种有效的抗衡力量。卡斯特罗在不断地刺激美国人时又把苏联人拖下了水。这可不是一个大国利用不发达国家并操纵其不成熟领导人的情形。卡斯特罗像一位行家里手那样把超级大国玩弄于股掌之上，而且，一旦他在1961年12月表露自己的共产党人身份，苏联人要想弃而不顾就变得异常困难了。

美国的政策本应该更明智一些。但是，美国政治文化排除了对卡斯特罗所希望的激进革命的支持。古巴革命者抛弃此前对美国的看法，转而相信有关美帝国主义的说教，而美国领导人认为，美国自1898年古巴人民摆脱西班牙残暴统治以来就一直扮演着古巴救世主的角色，如此看来，两者间的友好关系已经不可能继续下去了。如果美国不实行那么敌对的政策，如果能在不满之余接受古巴革命、不去搞暗杀和入侵的阴谋，就可能使卡斯特罗减少对苏联援助的需求，也不会使赫鲁晓夫得到兴风作浪的机会。但是，形势却是如此不妙：美苏争夺为诸如卡斯特罗这样聪明的领导人利用它们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美国对共产主义的一

点点风吹草动又反应过激。

就在选举结果还几乎未被人们接受的时候，赫鲁晓夫已经开始向已当选但尚未就职的总统肯尼迪表示友好。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最后数月里，苏联已经放弃了在任何分裂超级大国的问题上取得进展的希望。他们急于发出信号，表达与美国新政府合作的意愿，给予和获取在欧洲现状方面的保证，为在第三世界的和平竞赛——赫鲁晓夫相信这可保证共产主义最终获得胜利——制定双方都能接受的规则。他们希望美国新政府能较少使用核讹诈手段，更多地尊重苏联的利益和接受苏联在世界上通过竞赛扩大影响的权利，更多地容忍苏联对第三世界激进政权的支持以及"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观念"。[1]

苏联之期望妥协并不亚于华盛顿，但赫鲁晓夫的条件令人无法接受。在遏制共产主义、阻止苏联势力的扩张以及维持和利用美国战略优势等方面，肯尼迪政府都是全力以赴，丝毫也不逊于前任。肯尼迪及其顾问因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的威胁和苏联在刚果、老挝和古巴的活动而忧心忡忡。而且，赫鲁晓夫发出的信号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大杂烩，它时常令人手足无措，因为他一会儿呼吁和平共处，一会儿又试图百般恐吓。1961 年 1 月 6 日，在莫斯科一次共产党集会上的讲话中，赫鲁晓夫强调了苏联对"民族解放战争"应尽的义务，他认为在与西方的斗争中，这些战争将确保共产主义取得最终的胜利。肯尼迪的苏联问题专家解读了这一讲话，他们认为这是赫鲁晓夫就第三世界不断增强的游

---

① 约翰·刘易斯·盖迪斯：《苏联与美国》（纽约，1978 年），第 233 页；威廉·齐默曼：《国际关系中的苏联观念（1956—1967）》（普林斯顿，1969 年），第 133　135、179—182、213—225 页；马克·特拉亨伯格：《历史与战略》（普林斯顿，1991 年），第 215—216 页。

击战和颠覆活动所发出的具有强烈敌意的警报。[①] 2月17日，苏联重新在柏林问题上向西方施压，不论赫鲁晓夫有什么和平意图，美国分析人士还是把他看做一个反复无常和十分危险的对手。

在入主白宫的最初几天，肯尼迪就已经发现危机四伏。在老挝，西方的地位正在迅速恶化，在刚果，这个新国家的分崩离析使得苏联在中部非洲取得了一个立足点，还有古巴，它看来正一天天地倒向苏联。中央情报局对老挝右派的支持虽动摇了中立主义政权，但事实证明，这种支持还不足以与苏联和越南对中央情报局招惹而起的老挝左翼力量的支持力度一较高低。相比之下，中央情报局在刚果的境况稍好一些，他们除去卢蒙巴的努力进展得比较顺利。为了实施流亡分子入侵古巴的计划，新总统就需要给予及时的关注，必须把中央情报局训练和武装的流亡者打发回去，否则就会出现对这些人的"安置问题"。总不能仅仅把几百名古巴武装分子送到迈阿密[②]就算完事了吧。[③]

肯尼迪及其助手自视为不发达世界的社会革命的支持者。然而，他们并不认可共产主义卷入其中或者苏联援助的此类运动的合法性。据称卡斯特罗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他明确让著名的共产党人在自己政府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他为苏联扩大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影响敞开了大门，他已经背叛了自由的梦想，正是这一梦想才促使古巴人民起来反对巴蒂斯塔。中央情报局报告说，苏

①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卢埃林·汤普森1961年9月的电报，约翰·F. 肯尼迪文件，总统秘书档，第127盒，约翰·F. 肯尼迪总统图书馆。也可见查尔斯·波伦1961年6月1日致赫鲁晓夫的政策建议书以及乔治·凯南1961年6月2日的电报，第126盒。

② 迈阿密（Miami），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南部的港口城市，与古巴隔海相望。——译者

③ 孔华润：《迪安·腊斯克》（纽约州托托瓦，1980年），第112—132页。

联集团的更多军事装备正在运往古巴。卡斯特罗已不可接受，他的政权必须被推翻。

在肯尼迪的助手们所召开的数次会议上，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强烈要求授权，以贯彻流亡者的入侵计划。中央情报局估计入侵者将会得到古巴国内民众起义的配合，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却对此表示怀疑，他担心美国的卷入将因此泄漏出去，因而更倾向于经济制裁。但是，如果拒绝中央情报局的上述计划，则非但流亡者的“安置问题”不能得到解决，该否决也将有可能泄漏给公众。肯尼迪曾经批评过艾森豪威尔“丢失”了古巴，所以，他不能在国内政治各派别面前表现得比艾森豪威尔还要软弱，也不能撤销艾森豪威尔政府制定的颠覆卡斯特罗政权的计划。为减轻腊斯克的疑虑，部分行动被削减，中央情报局认为必须给入侵者的空中支援被取消了。1961 年 4 月 17 日，中央情报局训练的古巴流亡者被送上了猪湾的海滩。

中央情报局所控制的轰炸机在两天前的空袭中没有消灭弱小的古巴空军，但是，它却使古巴军队进入警戒状态，古巴政府也迅速地上诉到联合国。为避免美国更深地卷入此事，原计划在入侵当天早上的第二轮空袭因而取消了。流亡者军队在毫无遮蔽的地方登陆，而且没有空中掩护、没有急需的武器弹药和通讯工具，在行动过程中又迷失了方向。炸毁通往海岸的公路的努力也归于失败。古巴空军从上方压制住入侵者，地面部队便涌入该地区扫荡残敌。中央情报局预测的作为计划成功所不可或缺的古巴人民起义却没有发生。事实证明，中央情报局的计划设计得很糟糕，被政府的修正所削弱的实施过程也是一场灾难。若要达到目的，只有动用美国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但肯尼迪并不准备那样做。

对美国来说，猪湾入侵是一次蒙耻受辱的失败，而且足以与英法在苏伊士的失败相提并论。美国曾严厉指责其盟国诉诸已不

合时宜的帝国主义手段，指责它们不赞同埃及的民族主义，但是，美国领导人也违反了他们一直非常珍爱的不干涉原则，在该问题上，他们是承担了有关条约义务的。他们试图推翻古巴政府，却遭到了可悲的失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艾德莱·史蒂文森一直激烈地否认他的政府曾经干了这样的事情，最后他非常尴尬地发现，他所为之克尽厥职的总统把他给蒙骗了。卡斯特罗的民众支持率直线上升，同样高涨的还有他对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吸引力。1961 年 7 月，苏古同盟关系宣告建立，12 月，卡斯特罗宣称自己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华盛顿的帮助下，卡斯特罗把革命的古巴从一个刺激物变成了一个火药桶。

肯尼迪承担了古巴惨败的责任，一个月后，他认为与赫鲁晓夫举行高峰会晤的时机已经成熟。两人于 6 月 3 日和 4 日在维也纳碰面，然而，无论双方有什么良好的愿望，它们也将在这种对抗气氛中烟消云散。必须防止在远离其国家核心利益的地区发生冲突，必须努力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两位领导人的上述愿望和期待由于双方所持的强硬意识形态立场而化为乌有。赫鲁晓夫坚持认为社会主义正在蒸蒸日上，他指责肯尼迪试图剥夺苏联即将到来的胜利果实。肯尼迪坚守遏制政策，不承认苏联支持任何可能出现的激进运动的权力。也许令人惊奇的是，在这种氛围下，两人仍能在老挝中立化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

维也纳会晤中出现的最棘手问题是柏林。赫鲁晓夫再次向美国发出最后通牒，威胁要与东德人签订一项终止西方进出柏林的和平条约。肯尼迪答以美国将恪守自己的承诺。每个人都警告说，如果另一方不后退战争将随之而来。在打道回府的时候，两人都准备采取措施，以便增强其威胁的可信度。

执政伊始，肯尼迪的助手们就一直在为柏林危机做准备。当问及杜鲁门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时候，他的建议极为严厉：西方在德国和西柏林问题上的立场不容谈判，为了展示美国准备

战斗的意愿，应该对美国军队进行动员。肯尼迪不赞成这么强硬的姿态，他认为接受德国事实上的分治才是明智的，通过谈判达成妥协要比外交冒险政策好得多。无论是肯尼迪还是他的同僚，没有人愿意在任何实质性问题上让步，但在维也纳会议之前，他们大多数人愿意通过谈判缓解紧张局势。然而，在维也纳会议期间以及会议结束之后，赫鲁晓夫恐吓肯尼迪的企图使后者作出了比艾奇逊更加强烈的反应。

1961 年 7 月 25 日，肯尼迪向美国人民发表电视讲话，解释了柏林的重要性，宣布美国在柏林的军事存在和西方进出柏林的通道不容谈判。接着，他宣布美国常规军事力量大幅度增加 25%，扩大征兵并下令对预备役部队作部分动员。肯尼迪生怕对手不能领会他的意思，就警告苏联不要错误估计美国保持在德国地位的决心。赫鲁晓夫挑起危机，而美国却不愿后退，战争还是和平？这个决定必须要由莫斯科作出。

赫鲁晓夫立即缩了回去。在 7 月 27 日会见一位美国客人的时候，他表达了不希望战争的愿望。在 8 月 7 日的一次演讲中，他要求缓和紧张局势，结束战争恐慌。他许诺不采取军事行动，并明显软化了在柏林问题上的立场：苏联不会“侵犯西方大国的任何合法利益，任何对进出西柏林通道的阻拦、任何对西柏林的封锁都是完全不可能的。”[①] 在几天后的另一次谈话中，他呼吁就此事展开谈判。

正值赫鲁晓夫讲话之时，危机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长期以来，西柏林一直是东德人逃往西方的主要通道。7 月，由于担心西方向赫鲁晓夫的威胁让步，3 万东德难民逃进了西柏林。仅在 8 月 12 日就有 4000 人越界进入西柏林。面对即将来临的崩溃，东德政权请求赫鲁晓夫允许其阻止逃亡的人流。

---

① 《纽约时报》，1961 年 8 月 8 日。

在研究了肯尼迪7月25日讲话后，苏联分析人员注意到他并未对保证东西柏林之间通道的畅通说些什么，他们就决定赌上一把，打算堵住西柏林和柏林苏占区的通道，以阻止从东德逃往西方的人流，并希望美国的反应不至于太过激烈。障碍物于8月13日开始兴建，美国没有做出反应，因为它并未侵犯肯尼迪所认为的美国关键利益。苏联的策略取得了效果，带刺铁丝网障碍物于是变成了柏林墙。危机迅速地消退了，美国也不打算去进攻这些由带刺铁丝网构筑的障碍物，也不想在赫鲁晓夫下了很大赌注的情形下发动进攻。赫鲁晓夫达到了最低目标，也就是终止了东德政权的继续流血。[①]

赫鲁晓夫使用了各种方法，其中有应苏联领导人要求而建立的与肯尼迪联系的一条“秘密线路”，他再次表达了缓和超级大国之间紧张关系的愿望。9月，国务卿迪安·腊斯克三度会晤苏联外长安德列·葛罗米柯，10月中旬，赫鲁晓夫收回了他解决柏林问题的最后时限。苏联没有实现在中欧的目标，但它使美国就其关心的问题展开了对话。肯尼迪表明了在实质性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在边缘问题上则可以作出些许的让步。

美国的战略优势没有给赫鲁晓夫留下多少施展计谋的空间，10月21日，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强调了这一点。他声称美国能够承受苏联的一次先发制人的打击，并可以通过报复摧毁苏联。美国不会从弱势地位出发去谈判，它对苏联所夸耀的任何优势都不加理睬。赫鲁晓夫的

---

① 保罗·Y. 哈蒙德：《冷战与缓和》（纽约，1975年），第169—170页；罗伯特·M. 斯拉瑟：《1961年柏林危机》（巴尔的摩，1973年），第93—95页；亚历山大·L. 乔治与理查德·斯莫克：《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威慑因素》（纽约，1974年），第436—440页；詹姆斯·L. 理查森：《德国与大西洋同盟》（马萨诸塞州堪布里奇，1966年），第286页；琼·E. 史密斯：《柏林的防御》（巴尔的摩，1963年），第258—278页。

恫吓证明毫无效力。事实上，赫鲁晓夫在威胁与和平姿态之间的来回摇摆使苏联外交丧失了信誉，有些理论家坚持认为，苏联策略的变化不会掩盖它统治世界的坚定共产主义动机，赫鲁晓夫给这种理论添加了最精彩的注脚。

赫鲁晓夫在德国问题上促进苏联目标的失败看来已经动摇了他在国内的地位。一些批评者对他粗率的威胁和尴尬的退却颇为忧虑。其他人附和着毛泽东自北京发出的猛烈谴责，严厉地批评赫鲁晓夫过于谨慎。历史学家罗伯特·斯拉瑟认为，如果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的对手当时掌控着国家机器的话，几乎要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美苏坦克对峙可能在10月26日已经发生了。为了阻止东德警察的进一步侵犯，驻柏林美军司令命令坦克进入东西柏林之间检查站附近的阵地。东德政府请求援助，驻德苏军指挥官下令把装甲部队轰隆隆地开往那里。这些坦克相互紧张对峙，他们之中任何一名军官都有能力发动一场战争。第二天，苏联坦克突然撤退了。斯拉瑟认为坦克的开动是赫鲁晓夫那时正在召开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对手们安排的，坦克的撤退则是赫鲁晓夫及其与西方和平共处努力的一次局部胜利。[1]

1962年2月，苏联又一次提升对西方的压力，不断骚扰进入柏林的西方航班，经过磋商，腊斯克和葛罗米柯再次化解了紧张局势。但问题并没有消失，双方只有致力于保持德国或两个德意志国家的现状，才能使他们之间的事情得到满意的解决。但是，一旦苏联认识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说服美国从西柏林撤出武装力量，危机气氛就逐渐消失了。正如腊斯克对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所说的，苏联人可能已经把解决问题的时间推迟到他们获得与美国的战略平衡的那一天，他们正在为这一天的早些到来而疯狂地工作。

① 罗伯特·M. 斯拉瑟：《1961年柏林危机》，第430，440—441页

为了准备1962年10月18日肯尼迪总统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的会晤，国务院柏林特别工作小组的负责人向总统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和“柏林问题谈话要点”。谈话要点对17个月以来的对峙与谈判作了简要总结，认为对话于双方均有益处，特别是借此可以厘清他们各自的立场。但是，“没有人能够实事求是地断言……双方在柏林问题上的相互谅解已经大有进展，如果能达成这样的谅解，作为双方可能的对峙焦点——严重的战争危险的策源地——的柏林问题将会得到解决。”[①]

备忘录起草者与备肯尼迪咨询的苏联问题专家希望，总统能够使苏联人确信西方是精诚团结的，如果有必要，他们将不惜为柏林而战。他们没有提及的——因为他们还不知道——就是美国和苏联因为古巴正处于核战争的边缘。10月14日，美国的U—2飞机在一次侦察飞行中获得了苏联人正在古巴建造导弹发射场的确凿证据。对肯尼迪和其他美国领导人来说，柏林变成了一个次要问题。

从猪湾行动的失败中缓过气后，肯尼迪政府对古巴并未放任不管。在外交上，美国力图孤立卡斯特罗政权，它不仅得到了西半球国家一定程度的支持，也在表面上使北约盟国支持其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尽管肯尼迪已经公开宣布，古巴共产主义政权令人无法忍受，但他没有进一步考虑利用古巴流亡者去推翻卡斯特罗政权。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也没有制止古巴流亡者掠夺古巴船只的行为。而且更为严重的是，美国正在尝试各种各样的秘密行动，其中一些旨在羞辱卡斯特罗，另外一些是为了暗杀他。也许最具威胁性的是由美国军队入侵该岛屿的应急计划以及为了检验

① 腊斯克致肯尼迪，未注明日期（1962年10月17日），马丁·希伦布兰德（Martin Hillenbrand）草拟。通过“信息自由法”（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从国务院获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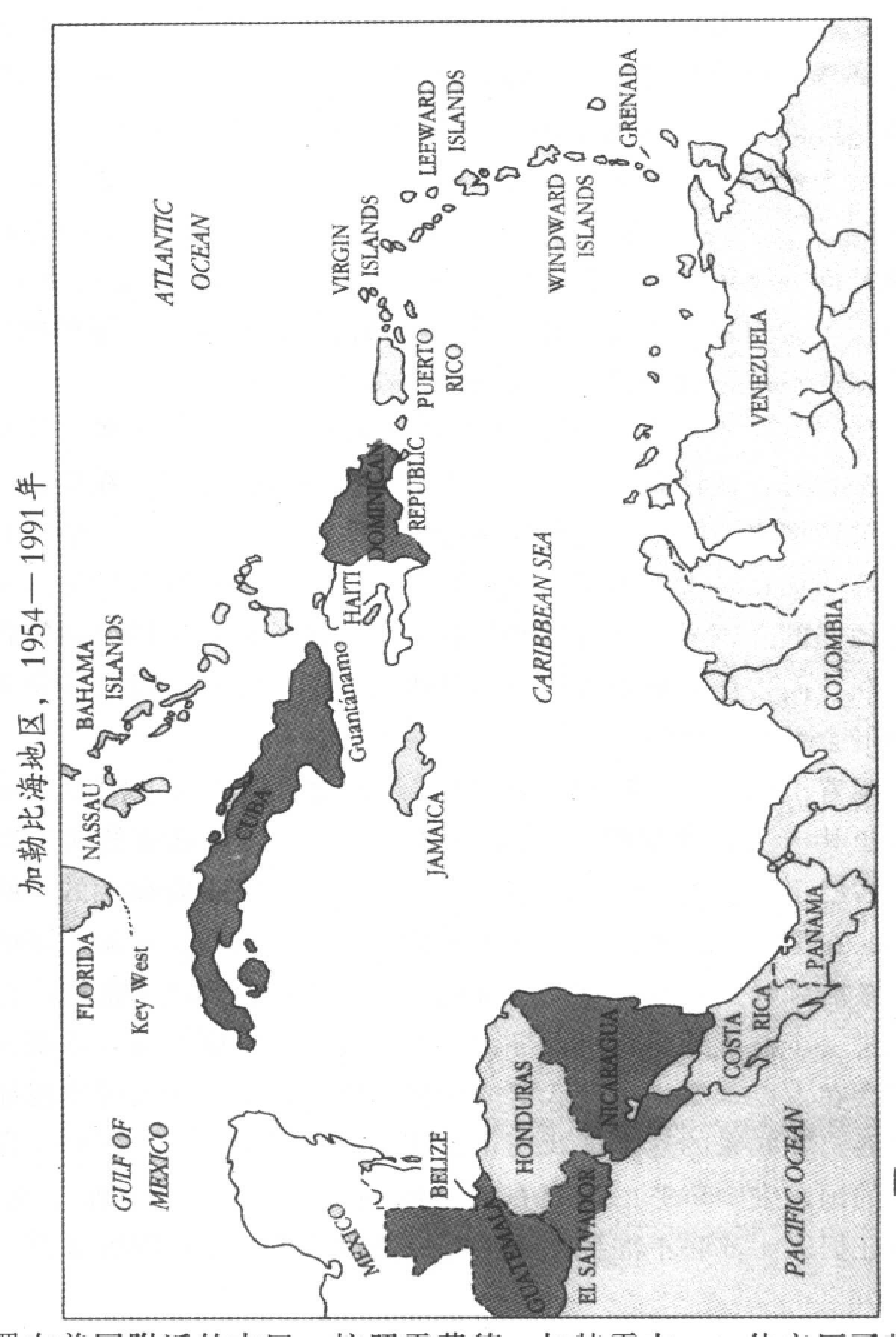
这些计划在1962年春季进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苏联和古巴的情报机构已经意识到其中的一些阴谋，也确信存在着入侵的各种应急方案，它们可能认定这样一场入侵已经迫在眉睫。毫无疑问，古巴政府有理由感到焦虑不安，于是就越发倒向苏联，直至让苏联建立直接威胁美国的导弹发射场。[①]

尽管卡斯特罗急于得到苏联的保护，以应付其政权面临的日益增长的威胁，但他更愿意把接受苏联导弹视为古巴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项贡献。他冒着被随之而来的美国报复的危险，让苏联在古巴领土上部署导弹，是想让苏联人和他们为之服务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取得战略优势。一言以蔽之，他正在帮赫鲁晓夫的忙。另一方面，赫鲁晓夫与他谢世后仍然健在的那一代苏联分析家则坚持认为，他们已经用实际行动保卫古巴，他们把导弹、飞机和苏联战斗部队派往古巴是为了阻止美国的入侵。[②]

人们往往把他们的自利行为视为利他的善举，而把他们的侵犯行径看做自卫的表现。对外交决策动机的研究决不会比对其他人类行为的研究更加容易。在情不自禁地作出向古巴运送导弹的决定后，赫鲁晓夫可能已经为之找好了借口。毫无疑问，他把这一切都迁怒于苏联的战略劣势，迁怒于这种战略劣势对德国问题和任何其他与美国纠葛不断的问题上的影响。1961年10月吉尔帕特里克的演讲已经向全世界宣示，赫鲁晓夫声称的苏联优势只是虚张声势。看来必须做点什么来纠正现有的战略平衡。1962年4月，消息传来，美国在非常靠近苏联边境的土耳其部署的中程弹道导弹已经投入使用，赫鲁晓夫简直是烦透了。正是在那一刻，一个明确的想法浮现在他的心头：把苏联的中程弹道导弹部

① 雷蒙德·L. 加特霍夫：《古巴导弹危机反思录》（修订版，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1989年），第6—8页。

②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493—500页；雷蒙德·L. 加特霍夫：《古巴导弹危机反思录》，第11—24页。



加勒比海地区，1954—1991年

署在美国附近的古巴。按照雷蒙德·加特霍夫——他亲历了整个

事件，而后成为该事件的研究者——的说法，苏联领导人冒险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最可能的原因，是“确信需要制止美国利用其日益增长的战略优势迫使苏联让步……领导层一致认为世界政治中的战略平衡观念至关重要，苏联在1962年的立场必须获得实力的支撑。”[①] 正如研究该事件起因的学者所说的，同时保护古巴是该行动一个附带的考虑，而不是一个“充分理由”。显而易见，苏联人不希望发生危机，他们只想秘密部署这些导弹，给华盛顿一个即便不情愿也不得不接受的既成事实。

1962年8月下旬，中央情报局局长向肯尼迪及其高级外交顾问报告说，他怀疑苏联人正在古巴部署进攻性导弹。在重新检查有关证据之后，腊斯克和其他官员否决了这种想法。毫无疑问，苏联正在给古巴人提供军事装备，但是，国务卿与国防部长以及他们的分析人员认为这些装备都是防御性的，美国已经警告过苏联，向古巴提供进攻性武器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会冒这种风险。

随着1962年中期选举的临近，共和党反对派对政府未能消灭古巴共产主义政权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批评。肯尼迪的属下辩称，古巴不是一个迫切的威胁，那里的军事设施是防御性的，断言苏联在那里部署导弹是缺乏根据的。使国内政治反对派失望的是，政府领导人低估了日益增多的赫鲁晓夫进行投机的证据，他们还进一步被下列事实所误导：苏联人蓄意的欺骗安排，苏联关于不会在古巴部署进攻性武器的保证。更有甚者，在美国发现导弹之后，苏联人的这种把戏还在继续上演。迟至10月14日，肯尼迪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乔治·邦迪还在向电视观众保证说，没有证据表明苏联正准备在古巴部署进攻性武器。而恰恰就在那

① 雷蒙德·L. 加特霍夫：《古巴导弹危机反思录》，第21页；也可参见杰克·斯奈德：《帝国的神话》（伊萨卡，1991年），第246　247页。

一天，U—2飞机带回的确凿证据表明，位于圣·克里斯托瓦尔（San Cristobal）的一个导弹发射场正在加紧兴建。所拍胶片在10月15日被洗印出来，当天午夜，除总统之外，所有的高层决策者都知道了美国、尤其是肯尼迪政府将要面对的这场灾难。

总统在次日早上醒来得知了大致情况，之后就召集被称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或者“执委会”（Ex Comm.）的顾问开会。苏联人到底意欲何为？美国应该如何因应？应急计划包括一场入侵或一次空中打击，美国军方已经开始了这两种选择的准备工作。空中打击获得了相当多的支持，但反对的声音最终占了上风。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认为，苏联在古巴布置的导弹对美国的威胁并不比它本土导弹的威胁大多少，如果苏联向美国发动核打击，不管这种打击从何处发起，美国都可以摧毁苏联。有人认为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可能会抵消美国所享有的战略优势，但他并不为之所动。他坚持认为均势之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苏联早一点取得与美国战略均势，那可能会有利于美国的安全。[①]

经过两天的讨论，甚至麦克纳马拉也被说服要采取必要的强硬姿态。出于他在海外的形象，更考虑到国内的政治因素，总统不得不表示，任何国家如果欺骗美国并挑战其地位，就必须受到惩戒。行动的选择集中到要么对导弹发射场进行空袭，要么对古巴实施封锁。如果苏联没有足够的回应，随之而来的将是空袭或入侵。接下来，总统的顾问之间发生了紧张的争论，在军方领袖的支持下，迪安·艾奇逊要求采取军事行动。最后，大家就实施封锁取得了共识，至少部分原因是肯尼迪认为空中打击不足以解

① 格雷厄姆·阿利森：《决策的实质》（波士顿，1971年），第195—196页；詹姆斯·G.布莱特和戴维·A.韦尔奇：《身处危境》（纽约，1989年），第23—24页。

决问题。肯尼迪一直为他在猪湾事件中的犹疑不决而沮丧不安，因而非常怀疑军方正试图拖他下水，发动对古巴的入侵。他的主要苏联问题顾问卢埃林·汤普森警告说，如果苏联军队在空袭中被消灭，赫鲁晓夫将可能作出丧失理智的反应，肯尼迪希望从实施封锁入手。10月20日，美国武装力量开始进入指定区域。10月22日，苏联人、美国人民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都将会了解这一切。①

在肯尼迪对全国电视观众发表讲话前的1小时，美国方面把事情通知了苏联大使。苏联大使声称，在得到腊斯克通报之前，他对导弹事件一无所知。其后他一直是如此辩解。在美国东部标准时间下午7点，肯尼迪把导弹发射场的发现告诉了美国民众，并详尽地阐明了这对美国意味着什么，解释了他准备采取的应对措施。美国人、特别是通晓事理的人都明白，他们正在灭绝的边缘上徘徊。腊斯克向不结盟国家的大使简要介绍情况的时候，核灭绝的危险笼罩着每一个人。感觉到可能彼此再也不能见面了，大使们摇着腊斯克的手，也许还在念叨着希望麻烦能得到解决的话。又轮到尼基塔·赫鲁晓夫采取行动了，他要在战争和退缩之间做出选择，他的反应就像洲际弹道导弹一样迅速。

这完全出乎赫鲁晓夫和他助手的意料，他们被肯尼迪总统的讲话惊得目瞪口呆。美国已经发现了这些导弹，美国总统与他的大多数高级顾问已为此开了一周的紧急会议，苏联情报机构对此却没有丝毫察觉！发射导弹挑起美国的报复？对苏联而言，这是不可想象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挽救局势。如果苏联不再向古巴运送更多武器，美国会接受在它在古巴的武器现状吗？美国的封锁有多么严重？美国会借机入侵古巴吗？还有，如果它那样做，苏

① 伊利·埃布尔：《古巴导弹危机》（费城，1966年），第80—93页。

联将如何应对？[1]

起初，苏联人否认了美国的指控，把封锁谴责为海盗行为，他们派出潜艇，在水面船只之前试探美国的封锁，命令驻古巴苏军准备战斗，他们多达4.2万人，远远超过了美国情报机关的估计，而且还装备了战术核武器，由当地的司令官指挥。[2] 古巴人动员了预备役，把现役军人增加了3倍，使其总数达到了27万。导弹发射场的建设在加速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正在迅速临近。

按照肯尼迪总统在这一海域跟踪苏联潜艇和保护美国船只的命令，为了迫使苏联潜艇浮出水面，美国海军向它们投掷了深水炸弹。10月24日，战略空军司令部进入全面戒备，在发布命令时使用了"明码"，不给苏联留下任何想象的空间。赫鲁晓夫对美国意图的严肃性没有抱侥幸心理，他没有向封锁发起挑战。10月25日，开往古巴的最后一批苏联船只停了下来，接着就掉转船头。在这场"眼瞪眼"的对峙中，苏联人开始眨眼了。[3]

获悉苏联船只返航的消息，肯尼迪和他的助手们长出了一口气，但是，他们也清楚，为了使导弹能派上用场，驻古巴的苏联军队仍然在夜以继日地工作。一位"执委会"成员认为，与古巴导弹可用之前爆发的战争相比，导弹发射场完工之后的战争将会使美国多付出数百万人的生命。美国必须在任何一个导弹发射场建成之前发动进攻，最坏的估计是只剩下两三天了。必须把美国的意图告诉苏联人。卡斯特罗如此地确信攻击即将来临，以至于他在10月26日一整夜都躲在苏联大使馆的避弹室里，并要求赫

① 雷蒙德·L. 加特霍夫：《古巴导弹危机反思录》，第56－59页

② 雷蒙德·L. 加特霍夫：《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哈瓦那会议》，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第1期（1992年春），第2—4页。

③ 雷蒙德·L. 加特霍夫：《古巴导弹危机反思录》，第61－62，67—69页

鲁晓夫不要退让。[1]

10月26日，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克格勃（KGB）高级官员亚历山大·福明突然与美国广播公司（ABC）驻国务院记者约翰·斯卡利取得了联系，询问如果苏联拆除导弹，答应不再把导弹引入古巴，并且让联合国来核实的话，斯卡利在国务院的朋友是否愿意作出不入侵古巴的公开保证。斯卡利立即通知国务院，使该消息上达到国务卿和总统那里。腊斯克回想起导致朝鲜停火的1951年的一次非官方接触，认为有可能带来突破性进展。斯卡利受命告诉福明，时间无多，肯定不会超过两天了，他还把载有美国政府"最高层"想法——认为这个建议"非常可行"——的一纸信函交给了福明。苏联官方后来声称这是福明的个人行为，但是在1962年10月，总统和他的助手们都认为他是衔命而行。这天晚些时候，肯尼迪接到了赫鲁晓夫的一封长电报。赫鲁晓夫在电文中表示他明白形势的危险性，希望避免冲突并准备谈判，他暗示如果美国答应不入侵古巴，他将拆除导弹，但是他没有对自己的条件作详细的说明。腊斯克和卢埃林·汤普逊断定，福明的解决框架代表了赫鲁晓夫的思路，苏联准备后退，危机即将结束。他们猜想赫鲁晓夫过去一直在与急于挑战美国的其他苏联领导人斗争，并利用福明战胜了他们。[2]

当天晚上，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秘密会见苏联大使。苏联大使指出，如果美国能拆除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也许会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博比（Bobby）[3]称肯尼迪总统授权他告诉苏联，他很久以来就一直在考虑拆除那些导弹，而且希望在危机结

① 雷蒙德·L. 加特霍夫：《古巴导弹危机反思录》，第91页

② 孔华润：《迪安·腊斯克》，第156　157页；雷蒙德·L. 加特霍夫：《古巴导弹危机反思录》，第80—81页，倾向于接受福明自作主张的说法。

③ 总统之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的昵称。——译者

束后不久就付诸实施。肯尼迪的口信被传递给了赫鲁晓夫。[①]

10月27日上午，美国收到赫鲁晓夫的第二封电报。作为苏联拆除古巴导弹的条件，这次赫鲁晓夫要求美国拆除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由于不知道前一天晚上博比·肯尼迪与苏联大使的会谈，“执委会”的多数成员视之为赫鲁晓夫的额外条件，因而要求拒绝，他们担心这个交易会损害美国与土耳其以及美国与其他盟国的关系，这些盟国担心，一旦它们受到威胁，美国将不再提供它所答应给予的保护。

刚刚收到赫鲁晓夫第二封电报，“执委会”就得到了一架U－2飞机在古巴上空被击落的消息。那天上午的晚些时候，美国的低空侦察飞行首次遭到了炮火攻击。一种突然的感觉——苏联立场可能正趋于强硬，军事行动不可避免——笼罩着在场的每一个人。艾奇逊和美国军方领导人怀疑苏联人正在隐瞒什么，他们认为苏联人正在搞缓兵之计，以等待部分导弹投入使用，所以仍然主张空中打击和发动进攻。事实上，由于对正在进行的微妙谈判一无所知，当地的苏联空防司令官已经提升了戒备的级别。[②]

当天下午，“执委会”就罗伯特·肯尼迪提出的建议达成一致。总统决定不理睬赫鲁晓夫第二封电报，只答复他的第一封电报，同意了电报所暗示的、基本上由福明提出的条件。罗伯特·肯尼迪带着总统的口信私下造访苏联大使馆。他告诉苏联大使，他哥哥准备给予苏联所要求的保证，不派美国军队进攻古巴，但是，美国不能单方面拆除它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不过，总统相信北约很快会拆除它们的。换言之，即使苏联不答应把导弹迅速撤出古巴，美国仍然会如此行事。尽管美国没有告诉赫鲁晓夫，

---

① 詹姆斯·G.布莱特和戴维·A.韦尔奇：《身处危境》（纽约，1989年），第337—338页。

② 雷蒙德·L.加特霍夫：《古巴导弹危机反思录》，第82—85页

它已经制定了在10月29或30日进行空中打击的计划，战争与和平的决定权还是落到苏联领导人身上，除非苏联的某位军官、美国海军或战略空军司令部指挥官突然采取行动。

在10月28日这个星期天的上午，一切都结束了。赫鲁晓夫宣布他已命令拆除被美国视为进攻性的武器，并将其运回苏联。消息传来，华盛顿欢呼雀跃，而古巴却弥漫着另一番情形，苏联军官痛哭失声，卡斯特罗狂怒不止。卡斯特罗一直拒绝联合国监督或查验导弹的拆除，为解决驻古巴苏联轰炸机和军队问题上的争执，双方又耗费了几周时间。美国从未公开保证不进攻古巴，在与主要的社会主义大国关系改善之后，它仍然长期敌视卡斯特罗政权，但是，冷战期间最严重的危机以和平力量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1962年，尼基塔·赫鲁晓夫把整个世界带到了核战争的边缘。美国对古巴的挑衅和苏联的核讹诈的因素都不可忽视，它们对赫鲁晓夫冲动的核赌博和置数百万人性命于危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赫鲁晓夫玩弄欺骗手段，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同时向肯尼迪保证他没有作此类事情。毫无疑问，他希望在一次针对美国的外交和军事的突然行动中获得胜利。

约翰·F. 肯尼迪对1962年10月发现导弹的反应使世界离灾难更近了，这种反应也许是不必要的。麦克纳马拉可能是对的，美苏之间的战略均势是不可避免的，两者间的差距缩小得越早越好。苏联部署导弹于古巴在战略上是可以容忍的。如果在发现导弹后不那么大惊小怪，如果接受苏联那些导弹都是防御性的说辞，如果强调美国的强大报复能力，就像吉尔帕特里克在前一年说的那样，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很可能再一次对美国的自信刮目相看。如果说导弹的发现只是严重威胁着肯尼迪政府的政治前途，这还颇能说得通。肯尼迪最为担心的是，共和党反对派会利用古巴导弹问题这个政府一直否认的事实去赢得1962年的国会

选举，而且更糟糕的是，他们还会利用此事去赢得 1964 年的总统大选。

肯尼迪政府一旦决定作出强有力的反应，它就仔细制定行动方案，实施时在胆量和灵活性之间保持一个适度的平衡。最有趣的也许是这样的一个事实：肯尼迪在危机处理的过程中表现出了相当的灵活性，但他选择对美国民众秘而不宣，直到 6 年之后他们才知道，肯尼迪总统曾答应从土耳其撤出美国导弹，直到 25 年之后，包括“执委会”在内的美国人才了解到，在赫鲁晓夫提议和解之前，曾经在与苏联大使举行的一系列秘密会谈中的某一次，总统的弟弟与他就该交易进行过磋商。显而易见，肯尼迪非常希望在公众面前展示其强硬的形象，并确信这是他取得政治成功所不可或缺的条件，他希望美国人民相信，在与苏联总理之间的一次人盯人的摊牌中，是他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许多分析家逐渐认识到，古巴导弹危机是美苏关系的一个分水岭。一般说来，美苏两国领导人的行动更加审慎，都致力于寻求缓和。在肯尼迪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两国的紧张关系逐渐缓解。连接莫斯科和华盛顿的“热线”开通了，两国领导人可以直接而迅速地对话。这两个超级大国签订了禁止大气层核试验条约。虽然不是人人都视之为大的进展，但是，它们毕竟扭转了前两年的发展方向，不仅表明未来可能是和平共处而非不可避免的对抗冲突，而且也表明美国正在建造的避弹掩体可能并非必要。它们构成了斯大林时代不可能出现的走向相互信任的重要阶段，赫鲁晓夫此前的鲁莽和欺骗曾经阻碍了这一目标的实现。双方关系的进一步提升有赖于双方的行动，有赖于两国领导人之间建立的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关系。出人意料的是，到了 1963 年，肯尼迪与赫鲁晓夫很快消失了。一位被暗杀，另一位

被其克里姆林宫的同僚赶下了台。[1]

不可否认，在以后的岁月里，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危机都非常短暂，但是，它们之所以能实现相互威慑而不再诉诸于威胁行动，是由于双方都在足以灭绝其人民数次的核弹头和运载系统方面花费了巨额的代价。自此出现的“相互确保摧毁”（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的战略信条，是指不管哪一方发动战争，都会使一方被另一方摧毁。[2] 既然不能进行直接的对抗，美苏两国就在边缘地带进行了不懈和代价高昂的争夺，当然，这个边缘地带主要是那些不关乎双方关键利益的地区。在那里，在像越南、阿富汗、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国家里，这种争夺给当地人民带来了灾难，无端地浪费了他们国家的年轻人的生命，大量消耗了使其社会得以维持所必须的各种资源。

---

① 原文如此。赫鲁晓夫下台是在1964年10月。——译者

② 参见罗伯特·杰维斯：《核武器革命的意义》（伊萨卡，1989年），特别是第74　106页。

第六章 美国历史上最漫长的战争

美国在越南的战争是大国傲慢自欺、滥用和挥霍财富与权力的范例。对于越南人民，对于他们的历史、文化和渴望，美国领导人既了解甚少也关心不多。对美国而言，越南没有什么重要价值。在统治印度支那的岁月里，法国人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只允许最低限度的外国资本参与本地区的经济活动。美国在那里没有什么商业利害关系，尽管该地区有潜在的丰富自然资源，但凡那里的物产，均能从其他地方获得，换句话说，当地人无力将其任何产品囤积居奇。与此类似，这一地区对美国来说也没有多少战略价值。为使柬埔寨、老挝和越南免遭一个假想对手的控制，无论是1941年时的日本，还是冷战背景下的中国或苏联，当然需要编造一个理由；当然，为了在世界各个角落——以及外层空间——遏制某个对手的影响力，也要编造一个理由。对此前被称为法属印度支那实行善意的统治，这无疑是合乎美国需要的，但是，即使柬埔寨、老挝和越南全都敌视美国，这种变化对全球的力量平衡影响甚微，也难以威胁到美国的关键利益。尽管如此，仍然有5万多美国人以及数十万柬埔寨人、老挝人和越南人在战争中丧失了性命。

一国一旦获得向世界遥远的地区投射力量和干预其他民族事务的能力，那么，至少在其领导人为因之而来的灾难所惊醒抑或其力量消退之前，这种施展力量的诱惑几乎难以抗拒。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一个 20 年里，美国不管是相对实力还是在绝对实力都无与伦比，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何处是美国力所不至的。同样重要的是美国人那种以“胜利者”、以从未输过一次战争的民族（大多数美国人似乎认为是美国赢得了 1812 年战争）、以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的民族自居的那种感觉。他们的民族历史短暂，不会、或许是不愿意从别人的失败中汲取教训。

就美国领导人汲取的教训而言，过去的教训就是：不能姑息侵略者；美国有责任使用力量挫败那些试图扩张极权制度的人；美国凭借这种意志已经找到了阻止希特勒、斯大林以及即将出现在希腊、伊朗、危地马拉的作奸犯科之徒的方法。相反的例子，如在印度尼西亚和古巴发生的事情，要么被遗忘，要么被视作反面教材，那只是在美国缺少意志力时才出现的情形。美国阻击左翼运动的“成功”经常导致邪恶军事独裁的出现，这一事实由于以下信念而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军事独裁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得不到外部支持时也许会演变为民主制度。而由苏联集团支持的共产党政权，则将冥顽不化，永远都不会发生这种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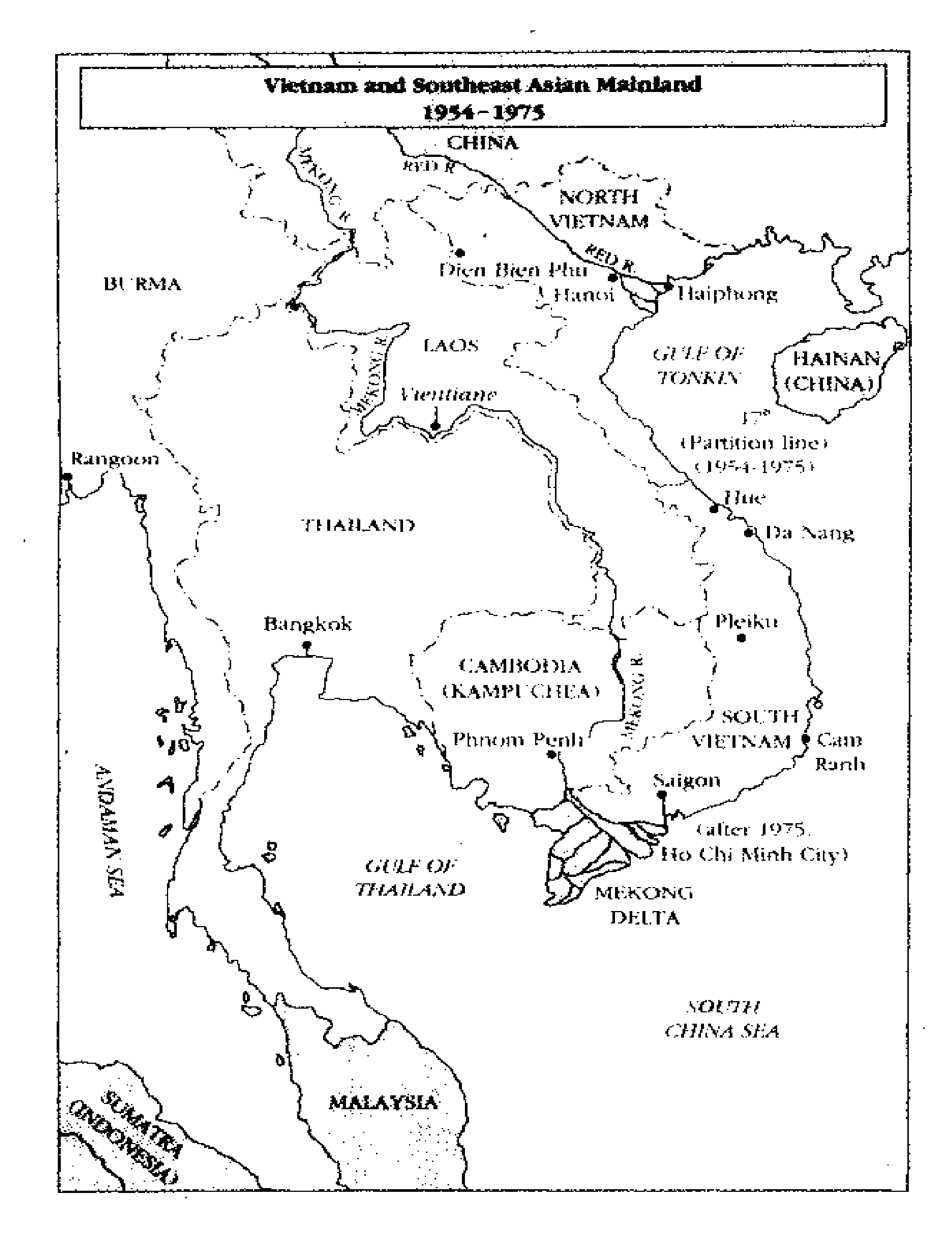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日本侵人法兰西帝国，美国领导人这才注意到印度支那。日本对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的压力，使富兰克林·罗斯福及其同僚忧心忡忡，他们担忧日本的行动会使英国及其盟友从在欧洲、北非和中东阻击纳粹德国的艰巨任务中分心。到战争末期，随着盟军胜利已然在望以及日本军队从印度支那撤退已迫在眉睫，一向蔑视法国人的罗斯福提议，印度支那人民应该由联合国托管而不能再次臣属于法兰西帝国主义。战争结束前夕到这里的少量美国人发现了一个组织良好的抵抗运动，他们不断地骚扰日本人，也不打算向法国人屈服。特别是在越南，要求独立的意愿非常强烈，值得美国给予支持。事实上，胡志明，这位越南抵抗运动的领袖，在日本投降前夜曾经被美国召

募为代理人（agent）。[1]

战争结束时，法国人以武力重返印度支那，决心延续他们在这里的统治。法国领导人警告华盛顿说，美国对法国镇压越南独立运动的敌视将会疏远法国人民和壮大法国共产党，因此可以想见，这将会把法国人推进苏联的怀抱。胡志明试图乞灵于托马斯·杰斐逊和《独立宣言》，但仍然无济于事。毕竟，他是一个共产党人。再者说，越南与美国相距遥远，而且也无足轻重。另一方面，在美国领导人20世纪40年代后期所设想的世界新秩序中，法国极可能是一个重要伙伴。美国对法国的宏大帝国梦想的反对激怒了法国领导人，这无疑会损害美国的欧洲计划。美国选择推动法国力量重返东南亚，使美国传统的反帝国主义诉求让位于严酷的大国政治需要。领导世界的责任凌驾于原则之上，而这些原则正是美国一直喋喋不休的道德优越感的基础。

当法国人败下阵来并被迫于1954年与胡志明的“越盟”（Vietminh）签订协议时，美国已决定要做它认为正确的事情（见第三章）。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想当然地认为，越南仍将美国视为民主革命的灯塔，美国可以以未沾染殖民主义的清白之身干预越南，并为越南的民族主义提供一个重整旗鼓的起点和一柄保护伞，在这柄保护伞下，一心希望挣脱法国统治和国际共产主义而独立的越南人将会兴旺发达。此时此刻，美国准备把17度线以北的越南——“越盟”的重新集结区——让与胡志明的共产党政权，它无论如何也要在南方建立一个分离的非共产主义国家，在这里，很快就被撇在一边的法国人与其同伙重新集合起来。美国人希望他们即将建立的这个国家能够变成一块磁石，吸引北越

[1] 要想迅速了解美国人与印度支那接触最初的情况，可参看加里·R. 赫斯：《美国作为一支东南亚力量的出现（1940—1950）》（纽约，1987年）。乔治·赫林：《美国历史上最漫长的战争》（第二版，纽约，1986年）以及乔治·M. 卡欣：《干涉》（纽约，1986年）。



越南与东南亚大陆，1954—1975 年

并使之脱离共产主义的轨道。

印度支那之所以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极为重要，主要因为这个地区在1954年被视为与中苏集团争夺的下一个回合的战场。共产党人正在努力到处扩张影响，他们在欧洲暂时保持沉默，在非洲或中东尚无立足之地，虽介入了朝鲜，但在东亚留下了造成灾难的极大的潜在可能。中国在1954年支持“越盟”反对法国，中苏两国在1950年对胡志明政权的承认，均促成了艾森豪威尔及其同僚的有关认识。在日内瓦会议上，中国和苏联不关心越南的目标，它们向胡志明施加压力并迫使其向法国让步，这种让步远远超过了法国人的战场所得，美国看来忽略了这一点。鉴于共和党右翼的国内政治压力，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都认为有必要以北纬17°线在越南划界，那些判定杜鲁门政府应为失去中国负责的人，不希望看到因丢失印度支那而遭受指责。

一旦认识到在印度支那采取行动的必要性，艾森豪威尔就开始在该地区实践其多米诺骨牌理论。单就印度支那而论，它可能缺乏战略和经济的重要性，但是，假若它落入共产党人之手，则整个东南亚都将步其后尘。当然，作为进入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的门户，无人会否认整个东南亚的经济和战略的重要性。老挝或越南的任何一方均被赋予整个印度支那的重要性，而印度支那被赋予了整个东南亚的重要性，东南亚则对大半个地球意义深远。与杜鲁门一样，艾森豪威尔在决定介入之后，似乎已经为其干预行动找到了理由，并牵强附会地向美国公众展示了一个貌似有理的说辞。在1956和1958年，国家安全委员会重申了以下主张：“美国的国家安全将因共产主义对东南亚大陆地区的统治而陷于危殆。”“任何一个自由国家落入共产党人之手都会助长其余国家妥协退让的倾向。”“整个地区的陷落将对美国在远东任何其他地方的地位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使自由世界的许多国家蒙受严重的经济后果……而且，对共产主义集团的迁就和退让，还会给日

本和印度造成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压力。"[1]

作为实现美国目标的工具，艾森豪威尔政府创建的吴庭艳政权证明尚不够完善。作为总理，吴庭艳在反共方面虽然称职，但却未成为将越南人民从胡志明那里吸引过来的深孚众望的领导人。必须避开日内瓦协议规定的 1956 年选举，因为据美国情报部门的估计，胡志明将赢得 80%的选票。当获胜者可能是共产党人的时候，支持自由选举的原则对华盛顿就失去了吸引力。

吴庭艳在镇压潜在对手和巩固其南方统治方面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功。然而，他的统治方式使许多越南农民离心离德，并引发了佛教徒之中的积极分子、知识分子和政客们的敌视，这些人本来可以组成忠实的反对党。在农村地区，与"越盟"制定的更激进的计划相比，他的美国顾问筹划的土地改革对农民没有什么吸引力。一般说来，从西贡派去的省、县领导人与其说是同情农民，还不如说是同情地主，而且，与其取代的地方当局相比，他们受到的欢迎更是大打折扣。吴庭艳致力于根除"越盟"在南方的基层组织，措施之一就是重新安置农民。他的"战略村"(strategic—hamlet) 计划要求农民离开家园和祖坟，栖身于设防的营地之中。佛教徒对天主教徒——多半是来自于北方的难民——所享有的优待深为不满，因为他们不仅能在政府中拥有职位，而且还可以自由参加宗教活动。在吴庭艳秘密警察的镇压之下，知识分子和其他政治立场多变的精英分子中的许多人开始转过头来反对他。甚至在艾森豪威尔去职之前，农村的暴动已经方兴未艾，在城市，除了天主教少数派，吴庭艳所得的支持简直少得可怜。美国在越南创建国家的试验已经陷入了困境。

1954 年，约翰・F. 肯尼迪访问了越南，在离开越南时，他

---

[1]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美国与越南的关系（1945—1967）》（以下称为《五角大楼文件》），第九卷，V. B. 3，第 1083，1088 页。

的看法与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之处，也就是说，印度支那不能落入共产党人之手，美国的反帝国主义人士能够在法兰西帝国主义失败之处取得成功，在美国的支持下，一个有生命力的非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政权可以在越南创建起来。艾森豪威尔就印度支那的危机向肯尼迪发出了告诫，作为总统，肯尼迪决心要阻止对美国在该地区地位的侵害。

肯尼迪在印度支那所面对的紧急事件首先来自老挝，艾森豪威尔企图在那里建立一个亲西方和反共产主义政权，结果却劳而无功。美国违反日内瓦协议，支持一个右翼将军，这使河内的胡志明政权增加了对巴特寮（Pathet Lao）共产党人的援助，也使苏联更深地卷入进来。1961 年 1 月，华盛顿在老挝的代理人行将完蛋，肯尼迪的顾问认为，亲西方的势力不大可能取胜，如果能诱使另一方接受老挝复归中立状态，对美国来说就算是万幸了。此时此刻，不愿再打一场有限战争的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得到使用核武器和打击中国的自由，但是肯尼迪拒绝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干预。作为替代，肯尼迪命令美国军舰“中途岛号”航空母舰赶赴暹罗湾，派一支海军特遣舰队到泰国，命令驻冲绳的美军进入战备状态，从而明确向苏联发出了信号：美国宁愿开战也不允许共产党人接管老挝。[1]

与对苏联的震撼相比，美国的行动对其盟国的震撼程度一点也不逊色。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认为，“如果美国不突然做出这种疯狂的举动”，[2] 则无需战争就可以解决问题。赫鲁晓夫意识到了这种风险，一想到制止美国的大规模战争升级所付出的代价，他就感到即使是控制了整个老挝，那也是得不偿失的，于是就表明了谈判的意愿。双方在 1962 年 5 月实现了停火，此

① 孔华润：《迪安·腊斯克》（纽约州托托瓦，1980 年），第 125—128 页。

② 哈罗德·麦克米伦：《指明航向》（纽约，1972 年），第 344—345 页。

后便很快展开谈判。14 个月后，美国和苏联就老挝的中立达成了一项协议。

肯尼迪愿意在老挝问题上妥协，但在越南问题上则不然。在政府就印度支那危机做出适当反应的整个早期讨论中，总统及其顾问表明了在越南问题上毫不妥协的决心。那里的局势是可以挽救的，受美国保护的越南人愿意战斗。从一开始，肯尼迪主要关注的就是顶住赫鲁晓夫的压力和防止国内出现政治灾难。在 1961 年 6 月的维也纳会议之前以及会议期间，肯尼迪对赫鲁晓夫关于民族解放战争的刺耳叫嚣深感烦恼。此后，当中苏分裂的现实为他们充分认识之后，肯尼迪和他的顾问更加清楚，借助越南共产党人采取行动的中国人才是美国人在东南亚受挫的罪魁祸首。但是，无论最初的动议来自莫斯科、北京或者是河内，肯尼迪都深深地担忧，如果不能阻止共产主义横扫印度支那，他将被打上“对共产主义心慈手软”的标签。共和党人已经利用 1949 年中国的“丢失”这件事大做文章，而且，由于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社会中势力犹存，倘若共产党人在越南再度取胜，他在 1964 年再次当选的希望就极为渺茫了，民主党将再次遭受灭顶之灾，罗斯福“新政”和杜鲁门“公平施政”[①] 的成就以及不论他所期望的“新边疆”[②] 计划能带来的何种成果，都将被反动势力全部抹杀殆尽。而美国在越南的成功将会使赫鲁晓夫明白，由民族解放战争所造成的间接侵略将不会有什么收益，同时，那还会消除猪湾失败所造成的尴尬局面，对确保肯尼迪竞选连任也不无裨

① “公平施政”(Fair Deal)，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在 1948 年的一次竞选演说中提出的施政纲领，从内容上来看只是罗斯福的“新政”的延伸。——译者

② “新边疆”(New Frontiers)，约翰·肯尼迪在 1960 年大选时提出的竞选口号，他要用拓荒精神来处理国内外事务，决心在宇宙空间的竞赛中赶超苏联。成为肯尼迪政府及其执政风格的象征。——译者

益。

对肯尼迪及其同僚而言，越南成为一个向朋友、也同样向敌人展示美国的意志、力量和信誉的合适场所。对世界上担心美国会被苏联导弹和核力量吓住的那些人来说，美国在越南的行动表明，它仍将一如既往地前往救援，即使在诸如越南丛林那样遥远而荒凉的地方仍复如是；对国内担心一个民主党总统不能直面共产党分子的那些人而言，事实表明并非如此。莫斯科和北京的人以为通过颠覆活动就能达到他们不敢通过直接、公开的侵略行动所追求的对越南的征服，对他们来说，美国在越南的行动也是一种警告，即他们这种想法是难以得逞的。在越南，肯尼迪可以检验一下他心仪已久的反叛乱手段，他的绿色贝雷帽（Green Berets）[①] 可以开始行动了。这里成了五角大楼斥巨资进行武器研发所产生的大量技术发明和产品的实验场。在整个肯尼迪政府期间，许多杰出的人物，也就是记者戴维·哈尔伯斯坦所说的“出类拔萃之辈”（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譬如麦乔治·邦迪、罗伯特·麦克纳马拉、马克斯韦尔·泰勒，还有沃尔特·罗斯托，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对建设国家所必需的理想充满信心，确信在他们的领导下，美国有意志与力量在越南、并最终在全世界的大国角逐中取得胜利。[②]

当他们竭尽全力把最初从艾森豪威尔那儿承袭下来的刚果、古巴和老挝的危机应付过去之后，肯尼迪及其顾问觉得可以腾出时间来关注越南局势了。随着吴庭艳政府影响力和它得到的支持的日见衰退，随着“越盟”在南方的日益活跃并成功取得了河内的支持，南越局势正在迅速地恶化。美国情报部门认为，南方的

---

① “绿色贝雷帽”（Green Berets），美国特种部队的绰号。美国特种部队创建于 1952 年，肯尼迪上台后不久，为了对付游击战，他对特种部队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并亲自规定其佩带绿色贝雷帽，以区别于其他军种。——译者

② 戴维·哈尔伯斯坦：《出类拔萃之辈》（纽约，1972 年）。

叛乱乃土生土长，逐渐渗入的干部主要是从北方返乡的南方人，而且，胡志明对南方局势尽管不可能无动于衷，但他仍要俭省地使用资源以强化对北越的控制。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或苏联已经卷入其中。肯尼迪的同僚们认为，美国可以用最小的代价平息叛乱，只要增加对吴庭艳军队的军事支持、增派军事顾问，就足以抵消敌对力量、也就是吴庭艳所谓的“越共”（Viet Cong）的增长。美国的目标旨在提升吴庭艳军队的战斗力，时任肯尼迪越南问题的主要顾问罗斯托强调要使用“未曾用过的反游击装备……武装直升机、其他研发手段以及我们的特种部队”，他争辩说，“在某种意义上，开发这些能力而付之于实践是错误的……用克努特·罗克尼[①]的一句老话来说，我们‘留着这些东西并不是为了大三学生开舞会用的’”。[②]

总统向越南增派了美国军事“顾问”，其中包括400名特种部队队员，从而开始了在越南的行动，这就直接违反了日内瓦协议。他要求美国人在进入战斗时更主动地出击而不是逡巡不前，从而进一步违反了日内瓦协议。肯尼迪适时地授权投放凝固汽油弹和除草落叶剂，前者是一种禁止使用的凝固汽油产品，一旦爆炸开来，将粘附到皮肤上，而后者是一种可使树叶脱落、破坏地力的化学制剂，对接触者会产生无法预料的后果。

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像肯尼迪、泰勒和罗斯托那样醉心于反叛乱的行动，他们迫切要求派美国的正规战斗部队开赴越南，以警告河内和北京不要来淌这里的浑水。吴庭艳担心国家的控制权会落入美国人之手，同时担忧南越人民将其视为美国的傀儡，因而

---

① 克努特·罗克尼（Knute Rockne，1888—1931），生于挪威，曾任印第安纳州圣母大学橄榄球队主教练和体育主任，带领该球队多次获得全美冠军。——译者

② 罗斯托致总统备忘录，1961年3月29日，引自乔治·M.卡欣：《干涉》，第131页。

表示无需美国军队的介入。1961 年 10 月，当叛乱的威胁越来越厉害时，肯尼迪遂派泰勒和罗斯托赴越南考察，以决定美国是否有必要出兵。人们本来以为他们会要求加强反叛乱的力度，但他们的报告却要求以解救水灾为由派出战斗部队。肯尼迪仍在拖延观望，他不想派美国军队接手在越南的战争，不想与叛乱分子谈判，但是，他也不想冒险让共产党在越南击败吴庭艳。

肯尼迪似乎已经意识到无法削减吴庭艳政权的需求，作为对这种直觉的反应，他决定向越南派出美国的“支援”部队。这些部队先是成百、而后是成千地陆续进驻越南。到 1961 年底，在越南的美国兵已超过 2000 人，约为日内瓦协议规定数量的 3 倍，1962 年岁末超过了 1.1 万人，1963 年肯尼迪遇刺的时候上升至 1.6 万多人。这些支援部队很快就展开了行动，他们同越南飞行员一道执行任务，驾驶着载有吴庭艳士兵的直升机参加战斗，在需要“自卫”时还向叛乱者开枪射击。尽管吴庭艳表示反对，而且肯尼迪也不大乐意这么做，美国还是在朝着战争美国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肯尼迪及其顾问业已自欺欺人地介入到一场复杂微妙的活动之中，他们考虑过另一种选择，想抛弃这个不得人心而且有时难以相处的盟友，但是，将南越拱手让给共产党人是难以想像的。在肯尼迪入主白宫期间，如果吴庭艳实行一些适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如果他的军事力量得到了加强，如果有更富于进取心的领导人，战争就有可能取得胜利。而且“丢失”越南将在国内付出惨重的代价。如果派去一支数千人的部队就可以提升越南军队的士气和足以扭转局势的话，那么看起来这将是一个妥帖而理智的行动，与一场重大的军事升级相比，它不带有那样的挑衅涵义，而且危险性也较小。在政治上，它也比撤退更明智。他们自以为仍然控制着局势，以为依旧有行动的自由。不管怎样，一场小规模的军事干预最终也不会有多大作用，根本没有不付出代

价就能扭转局势的办法。肯尼迪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差距也就只有那么几步了。

在整个 1962 年，助手们都在不断地告诉肯尼迪，美国的政策正在起作用，叛乱势头已经减弱，战略村计划正取得成效。美国驻越南的军事顾问团开始草拟减少美国驻军的计划。由于对古巴导弹危机的结果和来自越南的官方报告甚为满意，总统的骄矜之情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然而，他对媒体的报道却越来越恼火，因为它们说越南的战事进展并不顺利，吴庭艳政权既专制又腐败，美国的战略成功是无稽的虚夸。肯尼迪傲慢地要求《纽约时报》召回记者，他虽未达到目的，但却轻而易举地吓住了电视广播公司。[1]

截止 1963 年 1 月，肯尼迪收到的其他信息表明，越南的情况都非常不妙。他的朋友迈克·曼斯菲尔德参议员（民主党人，来自蒙大拿州）应总统之请前往战场视察，他证实记者所言并非杜撰。曼斯菲尔德警告说，与 1955 年相比，1962 年的吴庭艳政权更不稳固、更加不得人心。反叛乱的战斗正在演变为一场美国的战争，与控制越南——这对美国来说是划算的——相比，这场战争可能会使更多美国人丧生，还要消耗更多的金钱。1 月中旬，美国飞机支持下的吴庭艳军队遭到了人数处于劣势、已被包围在西贡附近的湄公河三角洲的越共军队的痛击。正在学习对付现代军事技术的越共击落了 5 架美国直升机，击伤了另外 9 架。但驻越美国军事顾问团仍然态度乐观，而总统显然更愿意听到他的政策正在起作用。

1963 年 4 月中旬，中央情报局的一份评估报告几乎不能提供什么可以使人对政府方针保持信心的依据。尽管分析人员认为越共的推进已经受挫，但敌人并未因美军的“介入”而溃败。如

① 乔治·M. 卡欣：《干涉》，第 142 页。

果来自河内的援助一直保持在最低限度，越共就可能受到遏制，但局势依旧“脆弱不堪”。吴庭艳是否会实行必要的改革，以使此时军事上的胜利转化为“持久的政治稳定”，[1] 中央情报局对此表示怀疑。

这种“脆弱不堪”的局势在1963年6月开始土崩瓦解。在随后的岁月里，即使数十万美国军队也无法再使西贡政权恢复原状。60年代早期，很大程度上由于其弟吴庭儒的影响，吴庭艳的政权变得日益专制。5月，在城市顺化（Hue），当局与佛教徒之间出现了麻烦。在一次示威集会上，政府军向群众开枪，杀死了几个示威者。抗议活动很快扩展到沿海各城市。驻越美国人担心这会危及反对越共的斗争，他们敦促吴庭艳妥协，但吴庭儒却要他镇压佛教徒。6月11日，一位佛教徒盘腿坐在西贡一个主要的十字路口上，其他僧人把汽油泼到他身上，接着他就把自己点着了。这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随后很快出现在电视中，目睹此景，美国及全世界的电视观众简直是毛骨悚然。

在美国的压力下，吴庭艳和吴庭儒同意终止天主教徒的特权和对佛教的压制，但这个允诺没有几周便宣告失效。进入8月，抗议活动失去了控制。吴庭艳似乎无力在其兄弟的建议和美国大使的要求之间做出选择，因而就一直无所作为。8月21日，吴庭儒派他的安全部队闯入寺庙，他们挥舞警棍，镇压了佛教徒的运动。吴庭儒部下的残暴行径使肯尼迪及其顾问既震惊又为难，他们不希望美国与这个靠秘密警察手段维持的糟糕的独裁统治搅和在一起。他们认为，最低限度也必须把吴庭儒送出这个国家，而且，此时此刻，也可以考虑更换吴庭艳政权了。

8月24日，美国驻西贡大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收到来

---

①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五角大楼文件》，第12卷，V. B. 4，第524页。

自华盛顿的电报，几乎不加掩饰地指示他鼓励针对吴庭艳政权的政变。洛奇告诉有意于此的越南军队领导人，美国不会长期支持一个有吴庭儒参加的或镇压佛教徒的政府。中央政府如果垮台了，将领们应确信将会继续得到援助。肯尼迪政府以大国才会有的肆无忌惮的傲慢，决定对其一手创建和扶植的政权搞一次政变。而今居住于在宾夕法尼亚大街[①]的上帝已经撤回了它给吴庭艳王朝的委任状。[②]

要不是由于将领们的胆怯和肯尼迪顾问们的再三思虑，政变在 8 月底差一点就发生了。肯尼迪决定在战争获胜之前先稀里糊涂地凑合着，逐渐采取措施迫使吴庭艳政府实行自由化改革并约束其兄弟的行为。但报告显示，吴庭儒和民族解放阵线（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这个叛乱政治机构暗通款曲，令华盛顿十分不安。肯尼迪的手下担心，吴庭儒和吴庭艳会由于美国的压力而与民族解放阵线和河内达成妥协，并要求美国人打道回府。总统再一次为发动一场反吴庭艳的政变说辞所打动。最后，在 11 月 1 日，将领们采取了行动。遗憾的是，吴庭艳和吴庭儒在政变过程中被杀了。不管怎样，通过对他们的清算，美国在越南所支持的事业荡涤了专制的恶名。而今的越南人民将被动员起来，利用美国的援助去保卫他们的自由和抵抗共产党人指挥的叛乱。

美国，这样一个其人民向以坚持不干涉别国事务和反帝国主义的原则而自豪的国家，现在却擅自赋予自己帝国力量的典型特权。它试图在越南南部建立一个国家：南部越南变成了“南越”（South Vietnam)。它为这个“国家”（nation）指定了领导人，

① 宾夕法尼亚大街（Pennsylvania Avenue），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条街，其 1600 号为白宫所在地，故而有人把它作为白宫的代称。——译者

② 罗杰·希尔斯曼：《推动国家》（加登城，纽约，1976 年），第 488 页。

投资其规划，武装其军队，在他们达不到美国的要求时就予以撤换。所有的这些作为都被认为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越南民族的最高利益由华盛顿的那些人决定，1956 年，美国阻止了预定的选举，从而蓄意扼杀了越南人民和平表达其好恶的惟一机会。通过把军队开进越南，美国又试图剥夺越南人民推翻一个他们所鄙薄厌恶的政权的权利，结果给越南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为了把他们从共产主义手中解救出来，美国几乎毁灭了他们的国家。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急匆匆地在 1955 年承揽下帝国的责任，而且告诫约翰・肯尼迪不要"丢掉"东南亚。1960 年大选中的有限胜利、对他人认为其软弱的担心以及他本人强烈的反共产主义情感，使肯尼迪排除了将越南的前途交由越南人民决定的选择。正是肯尼迪开始了这场战争美国化的进程，他将艾森豪威尔所派的军事顾问由 600 人增加到 16000 多人，而且肯尼迪派到越南的人已不仅仅是充当顾问了。他之被谋杀——仅仅比吴庭艳之死晚了数周——把处理一个危急局势的任务留给了林登・约翰逊。

杨文明，这位相对有些人望的将军，成为替代吴庭艳政权的政治集团的领袖。在 1963 年岁末的几周里，暴乱的烈度消退了。民族解放阵线及其在河内的盟友急切地寻求与杨文明——他有位兄弟活跃在民族解放阵线里——谈判和平的可能性。杨文明与他的几位同僚对此很感兴趣，希望能以此结束人民所遭受的痛苦。他们不情愿将南越拱手交给北方，因为胡志明与他的同志们在北方已将其无情和残忍展露无遗，他们也不愿接受共产主义的统治，但相形之下，他们没有吴氏兄弟那样反共。他们希望与民族解放阵线分享权力，希望建立一个没有外国士兵和北越部队、没有自 1946 年以来就一直折磨着他们国家的战争的中立的南越。对和平与从外国统治下取得自由的双重渴望，迅疾而深刻地在越

南社会中传播开来。[1]

越南局势的相对平静正合约翰逊的心意。肯尼迪留给他的顾问请示如何处理越南问题，他告诉他们目前暂不考虑此事，他不想使美国的作用再度升级，不想打一场范围更大的战争。在1963年岁末和1964年年初，他担心的主要是1964年进行的总统选举，不允许任何别的事情干扰将使他得以胜出的竞选运动。为此目的，他希望把精力集中他的国内计划和美国的"伟大社会"[2]的建设之上。那才是他梦想之依托，那才是他选票之源泉。

越南人和美国军方都不接受约翰逊的时间表。负责监督西贡政权的战争努力的美国军人对杨文明的不思进取感到失望，对他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兴趣、他要美国人回家的愿望以及他对美方更多地指挥南越军队进行战争努力的抵制，他们感到非常的不安。更有甚者，杨文明及其同僚反对五角大楼提出的将战争引向北方的建议，他们担心这会引发胡志明的正规部队越过17°线，向南方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没过多久，美国驻越军事顾问就开始寻觅一位新的越南领导人，支持他建立一个更加惟美国之命是听的政府。

在杨文明集团上台3个月之后，在美国驻越军事顾问的认可和支持下，阮庆将军成功地发动了一次政变。[3] 杨文明的下台，使避免灾难的最后一次机会也溜走了。但美国对阮庆很是欣赏，特别是对其在接受美国的政治指导、增加美国驻该国军事顾问的

---

① 乔治·M. 卡欣：《干涉》，第182—186页。

② "伟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在1964年的一次竞选演说中提出的以社会福利和民权为主要内容的施政纲领，旨在消除贫困和取消种族歧视。——译者

③ 参见乔治·M. 卡欣：《干涉》，第182—202页，其中有关于美国政府在阮庆政变中所起作用的引人入胜的研究。

人数、以及参与针对河内的隐蔽行动上所表现出来的热情感到满意。美国援助迅速增长。对阮庆和他的美国担保人来说，不幸的是，阮庆在越南人中的名望远不能与他在美国得到的喜爱相提并论，他的政府一开始就很少得到人民的支持，而且即使是那少得可怜的支持也在急剧地消失。

在1964年11月之前，约翰逊不希望在越南采取任何重大行动，但也不能允许在竞选运动期间丢掉越南。形势越来越明朗，对其竞选的主要威胁来自右翼，来自诸如巴里·戈德华特参议员（共和党人，来自亚利桑那州）那样的人，他们要求采取更为有力的战争行动。这帮人可能意识到了五角大楼对轰炸北越的渴望。约翰逊就摆出一副和平候选人的架式，似乎只有他才能阻止像戈德华特那样的极端分子扩大战争，从而避免给美国造成数万甚至数百万伤亡的代价。但是，在西贡政权败相已露时，美国小伙子就要开赴那里去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了，美国要尽其全力顶住北方的压力，这种需要变得越来越难以拒绝。

始终关注大选的约翰逊和他的顾问试图秘密地阻止形势的恶化。美国没有轰炸北越，取而代之的是在不公开支持的情况下，鼓动阮庆发动针对河内政权的小规模游击战。有证据表明，在老挝有大批北越正规军，这使美国对可疑的共产党战略据点进行了秘密轰炸。当然，这些秘密的军事行动对被炸者来说并非秘密，但对美国人民和国会而言则不然。总统正在越南进行着他自己的战争。

在1964年早些时候，要求进攻北越的压力与日俱增，总统的一些助手认为进攻北越可以显示美国的决心，其他助手认为那将会有力地支持阮庆政权，参谋长联席会议希望能诱使北越采取行动，使得美国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它进行有计划的轰炸。洛奇大使认为也许有必要使用核武器。5月，约翰逊的顾问们同意了一项使用精心挑选和逐渐增长的力量来对付北越的最终计划。立即

开始打击的主要障碍在于总统对国内政治需要的认知，当这种认知在8月很快转变并于11月完全消失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可以阻止美国以其强大的力量对付河内了。

1964年8月2日，一艘美国驱逐舰在东京湾[①]（Gulf of Tonkin）靠近北越海岸游弋时，遭到北越鱼雷艇的攻击。美国分析人员认为，北越领导人可能觉得这艘军舰参与了诸如南越在该地区刚刚结束的隐蔽行动，遂下令攻击它们。以展示美国的决心，该舰受命在一艘美国辅助舰的护航下重返了同一海域。8月4日，据说北越发动了第二次攻击。事情发生在夜里，搞不清是否真有此事，但海军当局向总统保证确有其事，约翰逊几乎不假思索地命令对他所称的公海上的侵略行径予以还击。这是一个展示美国的力量和决心、使北越的脆弱性得以暴露、同时根绝戈德华特批评的绝好机会。这位和平候选人不想让别人对他反击挑衅的决心有任何的怀疑。

东京湾事件不仅为约翰逊政府提供了进攻北越所需要的借口，而且也使总统有机会向国会请求授权，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采取任何适当的行动，包括使用武力保护任何遭到威胁的东南亚国家。他的那些顾问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国会的决议是将战争引向河内的准备工作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8月，众议院以416：0，参议院以88：2的结果给约翰逊开出了一张空白支票，大选之后战争准备的完成使这张支票得以兑现。

尽管河内在南越叛乱中的作用微不足道，美国的情报分析人员对此也一清二楚，但是，美国仍然准备打一场反对胡志明政权的战争。南方的战争进展不妙，阮庆政府的处境比其前任还要糟糕。除了副国务卿乔治·鲍尔一人外，约翰逊的顾问都无法接受战败的结果，都不赞成从越南抽身而退。他们不容许将南越“丢

① 即北部湾——译者

弃”给共产党人，不能容忍它对国内政治所产生的后果以及对美利坚帝国的信誉造成的影响。他们不相信世界上空前强大的力量，居然对这位总统所说的“无足挂齿”（pissant）的国家里出现的一场农民叛乱束手无策。对北越的打击，有可能降低北方向南方渗透的几率，切断对越共的补给和增援，同时给越南人、中国人以及苏联人一个警告，即美国决心要战斗到底。它也将鼓舞起南方的士气。那些正在输掉一场不那么重要的战斗而且对此耿耿于怀的人，出于恼怒和傲慢做出了进攻北越的决定。他们反而去赋予越南的革命斗争如此的重要性，以至于它影响到世界的力量平衡，使之朝着可能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的方向发展。他们作出了以下的选择：扩大战争；增加赌注；使用美国的巨大力量来恫吓越南人；将美国人对他们前途的看法强加给一个对之既不能理解也不愿接受的民族。

1964 年 11 月 3 日，美国人民把一次压倒性胜利给了林登·约翰逊，巴里·戈德华特因而落败。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那些关注战争与和平的人们都为他们认为的和平的胜利而欢呼雀跃。在华盛顿，战争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在西贡，将军们正在进行新一轮的你争我夺，阻挠着美国从南方稳固基地发起军事行动的努力。麦乔治·邦迪和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强烈要求开始有计划地轰炸北方，但为总统所拒绝。系缚战争之犬的皮带已经越扯越紧了。

1965 年 2 月 7 日，越共突袭了在波来古（Pleiku）的一处美军基地，美军 7 人被打死，100 多人受伤。约翰逊立即下令打击北越境内的兵营和军事集结地区。数日后，他下令实施大规模的轰炸计划，该命令于 2 月 28 日生效。一周之内，两个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岘港（Danang）登陆，以保护发起轰炸的机场。约翰逊和顾问们希望无需大规模出动美国地面部队就能使河内和越共屈服。腊斯克和泰勒担心这些“白人”军队会起反作用，担

心当地人会以为他们居心不良、担心当地人不信任与他们并肩战斗的南方政权、而且也担心在辨别村民是否友好时他们会遇到麻烦。但情报很快表明，轰炸并未影响河内的意志，北越的正规部队开始越界进入南方。4 月 1 日，约翰逊批准美国部队参与进攻行动。在 1964 年 11 月的选举日那天，在越南已经有 2.5 万名美国军人，1965 年 7 月达到 7.5 万人。11 月，亦即大选结束一年之后，则有 16.5 万人驻扎在越南，而且有报道称还有更多的人正在开赴越南的途中。候选人林登·约翰逊向亚洲的小伙子承诺的、允许他们为自己做的事情，而今正在由美国小伙子来完成。渐渐地，美国人意识到他们已经处于战争之中。

早在 1965 年 3 月，当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宗教和平人士以及东南亚问题专家开始向政府提出挑战的时候，对美国在越南任务的不满情绪开始爆发出来。4 月，他们在华盛顿举行了第一次反战示威游行，5 月，越战讨论会在全国的一百多所学校展开了。反战情绪随着战争美国化的深入而剧烈增长，慢慢地把越来越多的普通中产阶级的美国人也卷进反战联盟之中。约翰逊及其顾问平息批评的努力常常不够坦诚，因而增加而不是减少了人们的疑虑。此时此刻，总统夸夸其谈的天赋也回天乏力了。

使约翰逊的信誉遭受损害的关键一步是他对 1965 年 4、5 月间发生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一次与越南不相干的危机的处理。他为派遣海军陆战队所做的狡辩，使一个重要而有力的盟友——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许多外交政策的制定者——J. 威廉·富布赖特参议员（民主党人，来自阿肯色州）失去了对他的信任。由于担心共产党人即将把多米尼加共和国变成另一个古巴，约翰逊以其独有的魄力，立即先派了一支海军陆战队的一支小规模的分遣队、而后是 2 万多名士兵，前去镇压由一些有民主倾向的军官对政变上台的保守军政府发起的兵变。美国干涉了一个加勒比小国的内部事务，而总统不论是对该地美国人面临的危

险还是共产主义介入的危险都进行了无限夸大。对约翰逊闪烁其辞的辩解的怀疑以及对他急于承担帝国责任的不快，使得富布赖特与其他人重新审察对越政策，其结果令他们大为震惊。

在 1966 年 1 月 28 日至 2 月 18 日之间，富布赖特就这场战争举行了 6 次电视转播的听证会。在回顾美国政府不断加强的对一个非共产主义南越的承诺的同时，腊斯克坚持认为，战争是河内政权对外的一次侵略行动，美国有义务击退侵略。他争辩说，遭受危机的不仅仅是越南，还有美国向全世界所做承诺的信誉，“我们必须表明，美国信守它在任何地方所做出的承诺。”[1] 可以想像，如果美国人不到越南打仗，那么整个战后集体安全的大厦就会轰然坍塌。其他人也发言支持政府的政策，但听证会的最大收获却是乔治·凯南的反对立场的出现。与其一向藐视发展中国家重要性的立场相一致，凯南认为这场战争是愚蠢的，而且极有可能导致一场与中国的灾难性对抗。他坚持认为，撤军虽然意味着共产主义对南越的统治，但不会对美国任何重要利益造成损害。这次电视转播的听证会使那些杰出的、深受尊重的观察家们的疑虑得以凸现，也确保了对战争持有异议的数百万美国人的体面。甚至罗伯特·肯尼迪和已故总统的其他密友也在公开批评政府。

约翰逊及其顾问们对批评无动于衷，战争在继续进行。每星期都有数十、有时数百的美国人和数以千计的越南人死亡。数十亿本应用于约翰逊的“伟大社会”理想的资金，被抽出来用于战争。由于总统及其属下正将时间、精力以及国家的资源集中到战争中去，美国的社会结构慢慢地紧张起来，它面临着散架的危险，并最终可能被撕裂开来。世界上那些心地善良的人们正以轻蔑的目光注视着美国，迄今为止，人们只以这种眼光看待过蒋介

① 《国务院公报》，第 54 期（1966 年 3 月 7 日），第 346—356 页。

石、佛朗哥和斯大林。作为解放者、保护者的美国已成杳然黄鹤，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对弱小越南残酷施暴的压迫者。

约翰逊的顾问将批评视为一个公共关系问题，在不改变既定方针的情况下，政府要采取更灵活迂回的路线，只要约翰逊表明其行为是理智的，表明他对和平的追求并不亚于任何人，美国公众和世界各地的批评者就会平静下来。美国政府同意暂停数次轰炸，接受或组织了一系列的和平使团，这些代表团有加拿大、苏联、匈牙利、波兰和英国的，也有美国的。美国还向越南提供了可与国内田纳西流域计划相媲美的湄公河流域农村电气化计划，但这只不过是美国政府几乎不加掩饰的伪装而已。尽管越南的叛乱势头正猛，美国对和谈却了无兴趣，它的和平条件是：河内放弃统一越南的梦想，民族解放阵线放弃分享南越政府的权力，敌方要放弃一切为之而战的东西以及对于胜利的任何期望。

美国空中力量的大规模使用也未见成效。约翰逊取消了目标选择上的很多限制，但仍然无济于事。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①]的评估表明，轰炸对北越的士气或向南方输送人员和物资的能力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为竞相争取胡志明的效忠，苏联和中国补充了被轰炸毁坏的装备。在 1965 年大规模轰炸开始之前，苏联一直没有实质性的介入，因而备受中国责难，说它抛弃了国际社会主义事业。苏联向河内提供了大量现代化军事装备，其中包括地对空导弹和喷气式截击机，从而履行了自己的承诺。

所有迹象都表明美国的军事努力徒劳无益，面对这种局面，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反应是要求增派更多的兵力、进行更多的轰炸以及在目标选择上有更多的自由。1966 年 6 月，总统授权将兵力增至 43.1 万人。秋季来临时，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

---

① 国防情报局（the Defence Intelligence Agency），成立于 1961 年，隶属于美国国防部。——译者

开始感到绝望，他对战争升级的必要性也开始产生怀疑，但对如何结束战争却一筹莫展。[1]

约翰逊决心取得战争的胜利，他对麦克纳马拉的疑虑非常恼火，因而很快就转到他那些乐观依旧的顾问一边。诸如克拉克·克里福德和阿比·福塔斯这样的朋友都激励他继续干下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厄尔·惠勒将军向他保证战局进展良好。接替邦迪担任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沃尔特·罗斯托比任何人都坚信美国必将获胜。怀疑论者失去了对总统的影响力，核心圈子成了“唯唯诺诺”和“胜利在望”者的小集团。

1967年5月，在越南的美军已达43.6万人，军方认为，若想在3年内取胜，就需要56.5万人，两年内取胜则需要66.5万人。但中央情报局报告说，“除非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入侵或者进行核攻击，否则不可能有针对北越的足够烈度的空中或海上行动，可以让河内事先认识到这种攻击是如此的难以承受，以至于不得不就此止步。”[2] 共产党政权对胜利充满信心，五角大楼自己的分析人员亦认为再多的美国军队也无济于事，而且可能造成更大的伤害，特别是对南越的经济。

美国看来既无法获胜也无法结束战争，民众的不满在不断增长。由于美军的伤亡成倍增加，游行示威、逃避兵役和开小差的情况也与日俱增。在战场上，由于拒绝进入战斗，美国人所说的“蓄意杀伤”（fragging）——士兵谋杀长官——的现象令人忧惧地蔓延开来。1967年7月，在纽瓦克和底特律爆发了骚乱，数十人被杀，几千人被捕，同时造成了数百万美元的损失。黑人街区爆发的愤怒虽与越战没有直接的关联，但骚乱使人越发感到社会正在分崩离析。人们要求把用于杀戮的开支用到在国内挽救生

① 孔华润：《迪安·腊斯克》，第273—274页。

② 引自孔华润：《迪安·腊斯克》，第277页。

命和向贫困开战之上，战争现在使美国人民每年花掉 200 亿美元。很明显，政府缺乏既满足“伟大社会”又支撑越南战争的资源。8 月，约翰逊为避免财政灾难而同意加征 10%的所得税。民意测验立马就有了反应：过半数的美国人——其中绝大多数人对战争有着自己的看法——第一次认为在越南的战争是一个错误。要求结束战争的压力加大了，甚至教皇也出面呼吁停止轰炸。尤金·麦卡锡参议员（民主党人，来自明尼苏达州）以和平候选人的身份跳出来，就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向约翰逊发出了挑战。

约翰逊的反应是以组建一个新团队作为 1968 年的开局，对战争的明显怀疑论者在其中已无立足之地。美国军方对北越向位于老挝边境名叫溪山（Khesanh）的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发动重大攻势——被视为 1954 年奠边府战役的重演——做好了防备。美国人打算在这里向越南人展示美法之间的不同之处。美国军方领导人确信胜利就在眼前，而他们所需的只是 10 万、或许是 20 万兵力以及再多那么一点点打击北越的自由。他们向总统保证说，越共已被削弱到只要北越不提供支援就无法发动攻势的地步。

1 月 30 日早上，总统及其助手收到一个使他们极为震惊的消息，此时此刻，绝大多数的越南人正轻松地过他们的春节（Tet）或者农历新年。在美国人集中力量于溪山基地时，越共攻进了西贡的美国大使馆院内，在被击败前将其围攻了 6 个小时之久，然而，对大使馆的攻击只是北越渗入南越之深度和广度的一个标志而已。在西贡，机场、总统府和总参谋部都遭到了攻击。与此同时，越共进攻了其他 5 个重要城市中的 4 个，占领了顺化古城及数十个省、县的首府。据说是濒临灭亡的叛乱武装发动了一场大胆的、精心策划的攻势，这场攻势——尤其是对美国大使

馆的攻击——表明，无人能逃过它的打击。[①]

在春节攻势中，越共和北越人员损失惨重，死亡多达4万人。越共主力在这次战役中承担了大部分作战任务，因而伤亡也最大，而且再也未能恢复过来。他们在春节攻势中占领的地区，又被南越和美国的部队所收复，尽管他们花了3个星期才重新占领顺化。各城市的居民并未起而欢迎他们的共产主义解放者。美军司令部为自己训练的越南军队的表现感到自豪，宣称已取得战斗胜利。就杀伤率和所控制的地区而言，美国人无疑是正确的。

然而，北越决策者的主要目标是美国的公众舆论，随着美国公众对战事的日见了解，他们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总统和军方领导人所表现出的乐观在几周之后看起来非常荒唐可笑。战事无尽无休，宛如深不可测的陷阱。2月，每周至少有400名美国人在越南阵亡，但却见不到有什么收获，也不知道这一切何时才能了结。沃尔特·克朗凯特，这位深孚众望的美国电视新闻评论员宣称战争已陷入毫无希望的僵局："面对事实，再说什么而今胜利在望就是让人去相信那些在过去铸成大错的乐观派。"[②]

在美国，不仅仅是公众，即便是政府也对越共所展现出来的能力以及美国和南越的情报机构对他们的进攻的误判感到极为震惊。西贡政权从此次沉重的打击中复原和充分利用其军事胜利的能力，受到了普遍的质疑。不仅在下层民众中间、即使在"朝野内外"和权势集团——总统和内阁成员对他们的态度最为敏感——之中，对战争的支持力度也在下降。共产党人赢得了他们追求的心理上的胜利，约翰逊再也无法按既定方针干下去了，军方追加20.6万人的要求也将不能得到满足，美国的政策将不得

---

① 参见唐·奥伯多弗的研究专著：《春节攻势——越南战争之转折》（纽约州加登城，1971年）。

② 引自玛里琳·B. 扬：《越南战争（1945—1990）》（纽约，1991年），第226页。

不有所改变。

3 月 12 日，国内政治环境开始发生剧烈变化。就在那一天，尤金·麦卡锡，这位寻求民主党提名的堂吉诃德式的和平候选人，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中得到令人吃惊的 40% 的选票，差一点击败了现任总统。在麦卡锡使约翰逊的脆弱性得以暴露的 4 天之后，罗伯特·肯尼迪再次掂量了他的成功几率，也宣布参加美国总统的角逐。反战活动分子组织了“抛弃约翰逊”（Dump Johnson）的大规模集会，总统陷入政治麻烦之中，在越南实现和平也许是他恢复元气的最好机会。

此外，经济也处于灾难的边缘。动员后备军并在海外再部署 20 万人将会使长期存在的国际收支困难更趋恶化。主要由于越南战争的财政支出，黄金正以惊人的速度流出美国，除非增加税收，这在大选之年很难做到，否则美国将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欧洲将陷入恐慌、国际金融体系也可能崩溃。总统的顾问都在苦苦思索着出路。

3 月 25 日，一群权势集团的头面人物，人们心目中的“贤哲”（Wise Man），包括迪安·艾奇逊、麦乔治·邦迪、道格拉斯·狄龙、约翰·麦克洛伊和马休·李奇微在内的极为杰出的前政府官员齐集华盛顿，听取有关越战的简要介绍并向总统提出建议。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战争牵涉了这个国家太多的精力，也消耗了它太多的资源，他们力主逐步降低美国的目标和努力。乔治·鲍尔和阿瑟·戈德堡两人主张暂停轰炸。几个月前，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却一直支持战争，没人能料到他们的态度会有如此剧烈的转变。这些“贤哲”对美国社会的分裂、对美国在世界上地位的衰落以及对黄金的流失都感到忧心忡忡，大多数人得出了结论，认为寻求出路的时候已经来临。他们的这种反应使约翰逊

再也稳不住神了。[1]

3 月 31 日，总统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他提到了过去为寻求和平所做的种种努力，宣布对除了紧临非军事区以北的军事集结地区之外的北越停止轰炸，如果河内保持克制，则对军事集结地区的轰炸也将停止。接着他突然话锋一转，又谈起了他任内所取得的成就和对国家团结的关注。他争辩说，如果让总统职位和选举年的党争搅和在一起，其风险也未免太高了。他接着戏剧性地宣布："我将不争取也不接受党内提名参加下任总统竞选"。这是为了国家团结而做出的大胆尝试，也是对北越发出的表明其和平倡议之严肃性的信号。3 天后，河内同意谈判，但约翰逊并未高举白旗投降，他仍不愿接受失败，越南的和平之路还需要许多年要走。事实上，南方的空战很快就加剧了，这几乎就成了惯例。空军有飞机，有飞行员，还有炸弹，在失去了北方的目标后，他们只好把气力集中于南方。

4 月 4 日，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被谋杀。数小时之后，华盛顿火光冲天，骚乱席卷全国。6 月，罗伯特・肯尼迪又在洛杉矶被谋杀。8 月，在芝加哥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会议的会场外，警察对反战示威者进行了恶意攻击，这一事件被随后的调查打上了"警察骚乱"的标签。当康涅狄格州州长亚伯拉罕・里比科夫在会场抗议警察的行动时，理查德・戴利市长却率领他的喽罗们有节奏地叫喊着："犹太佬！犹太佬！"这可不是赐福于众生的美利坚上帝（American God），也不是受压迫民族的救星。战争改变了一切，美国生活的另一面浮出了水面，丑陋而又残忍，使得一些人想起了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在越南，美国小

---

① 赫伯特・Y. 尚迪勒：《一位总统的毁灭》（普林斯顿，1977 年），第 262—264 页。加布里埃尔・科尔科：《战争之解剖》（纽约，1985 年），第 316—320 页。

伙子正以毁掉村庄去“拯救越南人”，他们对一个异国民族犯下了难以言状的罪行，越南人为独立所进行的凶猛战斗使这些美国大兵既惊骇又迷惘。在国内，美国人相互攻讦，他们被战争、种族和阶级割裂开来，“伟大社会”成了一个病态社会。越南的战争和国内的种族主义引发的紧张，几乎浸染到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很紧，而国际事务又不得不在这种气氛中处理。约翰逊和他的顾问正在和时间赛跑。在美国的丧钟敲响之前，他们能在越南找到可以接受的和平吗？

直到5月，华盛顿才与河内就谈判的地点达成一致，5月13日才举行首次正式会谈。在那一星期，有562名美国人在越南丧生，这是整个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周。7月，美国谈判人员已经看到了和平的重大进展和成功的机会，但约翰逊不相信他们的报告，他继续向对手施加军事压力。到8月的晚些时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的支持者劝说南越领导人不要接受约翰逊政府准备接受的任何和平条款，他们向西贡政权保证，将会在大选结束、尼克松当选后使南越得到更好的条件。西贡因此越发变得桀骜不驯，特别是在就民族解放阵线的地位问题展开谈判的时候。[①]

10月，约翰逊的谈判人员终于使他相信协定即将达成，于是他授权谈判人员试一试，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取得了成功，当然也得益于苏联的帮助。腊斯克在华盛顿与苏联大使一道工作，谈判人员在巴黎与苏联驻法国大使馆一起忙活。苏联人直言不讳地告诉越南人他们可以从苏联得到什么，从而迫使越南人接受了美国的条件。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得到解决，10月31日，约翰逊下

① 林登·B. 约翰逊：《有利地位》（纽约，1971年），第517—518页。也可见威廉·P. 邦迪：《林登·B. 约翰逊口述史辑录》，收藏于林登·B. 约翰逊总统图书馆。

令停止对北越的所有轰炸。但那只是战争的一部分，对南越控制权的争夺仍在继续，约翰逊依然决心不使之落入共产党人之手。西贡政权确信尼克松可以带来更多的好处，就指责约翰逊背叛了他们，如果民族解放阵线作为单独一方参加和谈，它将拒绝与会。尼克松的当选对河内产生了不利影响，北越方面急切希望在尼克松就任之前达成一项协定。河内的让步催生了一个方案：使西贡同意派一名代表前往巴黎。扩大后的会谈一无所获，战争仍在进行。

尼克松曾表示他有一个结束越南战争的计划，但一旦当选，他和约翰逊一样不愿“成为第一位战败的总统”，在胜利无望的情况下，“体面和平”就成了政府的口号。据说尼克松对此有过解释，其涵义就是使西贡政权强大到足以苟延残喘到他的任期结束，这样它那不可避免的崩溃就只能怪特德·肯尼迪（Teddy Kennedy）[①] 这位他所属意的继任者了。

就越南对美国安全的重要性而论，新总统及其主要外交政策顾问亨利·基辛格均不抱任何幻想。两人都是大国政治的无情的实践者，都急于从一场不得人心的战争的重负中摆脱出来，都急于把他们的才智和精力集中到与苏联和中国的关系之上，但是，总统必须在国内外都以强硬的形象出现。他的难题是至少在国内反战情绪恶化到难以收拾之前，尽快找到一个既不投降又能脱身的办法。这个基本程式乃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新面貌”战略的复活，也就是依靠美国的空中力量和当地军队，在这里它被称为“越南化”。按照已确定的时间表，美军逐渐从战场抽身并撤离这个国家。为支持南越军队，空袭再次升级并把轰炸扩大到中立的

---

① 即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1932— ），美国参议员，民主党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曾参与1972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竞争，为肯尼迪九兄妹中最小者，其兄约翰·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曾分别担任过总统和司法部长。——译者

柬埔寨境内的渗透线路和老挝境内的军事集结区。杀戮仍在继续，不过只有很少的尸体是美国人的。随着美军伤亡的下降，尼克松和基辛格认为，美国人民会给他们更大的回旋余地，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成功地操纵国内舆论是必不可少的，基辛格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参谋班子将结束这场战争的努力称作“政治演出”。

北越顽强地据守着自己的防线，坚信有朝一日，美国人民会厌倦战争，要他们的孩子们回归故里，并把越南的前途交由越南人自己决定。这样，尽快决定性地终结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存在的希望也就黯淡下来。但美国仍有理由对“越南化”政策感到满意。主要由于越共在春节攻势中所遭受的惊人伤亡，西贡军队的表现有了明显的改观，而且直到1970年以前，农村地区比叛乱开始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安全得多。南方的力量平衡开始朝向有利于政府的一边倾斜，与西贡及其美国支持者作战的任务就越来越多地落到了北越正规军的头上。由于苏联提供的“萨姆”地对空导弹给美国轰炸机造成了重大损失，北越方面顶住了美国的压力。苏联最先进坦克的到来给胡志明及其同僚增添了抗击任何侵略的信心。对南方的渗透速度加快了，尼克松与顾问们都很清楚，必须封堵住北越向南方渗透的路线。

柬埔寨是一个弱小国家，在保护其人民免受邻国越南的战争危害方面，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这位变化无常的领导人倒是非常老到。为此目的，他被迫忍受北越在其国土上设立基地。美国频繁地敦促西哈努克将越南人从他的国家中赶出去，但他对此无能为力，让更弱小的柬埔寨去进攻越南人，那无疑是自杀。对柬埔寨而言，越南对它主权的侵犯看来只是它为和平与生存付出的小小代价。

长期以来，美国军方一直主张对位于柬埔寨境内的越南庇护所、包括据信是共产党南方叛乱的指挥部进行打击。约翰逊始终

拒绝这样做，但尼克松立即于1969年授权进行秘密轰炸。当然，这个秘密可以瞒着美国人，但是却瞒不过挨炸的人。1970年年初，令美国政府高兴的是，西哈努克被亲美军官发动的一次军事政变赶下了台。5月，美国军队侵入中立的柬埔寨，决心要摧毁它境内的越南人的庇护所，结果给柬埔寨人民带来了难以置信的灾难，从而引发了全球性的反美示威和美国大学校园内的死亡事件。

在美国人和越南人的共同打击下，数十万柬埔寨人失去了生命，他们的国家惨遭蹂躏，一个名叫红色高棉的嗜杀成性的共产党叛乱组织逐渐取得了这个国家控制权，他们在后来的一场令人发指的行动中，屠杀了数十万以上、或许是多达200万的同胞。对于西哈努克的下台，无论美国人怎样兴高采烈，这种高兴的情绪都是短暂的。1970年5月的侵略还引发了美国反战运动的重新高涨，杰克逊州立大学和肯特州立大学的抗议者遭到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射杀，总统被包围在白宫里，军队在白宫院里站岗，以防人们发动攻击。

尼克松政府顶住了入侵柬埔寨所造成的后果，但战场和国内的形势却在恶化。1971年2月，在美国的飞机和直升机的支援下，南越军队对北越在老挝的庇护所发动了进攻，这是战争规模的又一重要扩展，也造就了另一场灾难。很明显，河内的情报人员已事先获悉了这次行动，北越使用了一些新式的苏制坦克，给了西贡军队以沉重的打击。西贡军队的伤亡高达50%，他们狼狈逃离战场，甚至还出现了紧抓住直升机起落架的场景。在国内，威廉·卡利上尉因在美莱村（village of My Lai）屠杀妇孺一事中所起的作用被判有罪，其他老兵站出来检举说此类暴行并非孤立事件。接着，在1971年6月，《纽约时报》开始刊载一份

记录美国在越南决策的国防部文献汇编[1]，揭露了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欺骗美国民众的诸多手段。随后的民意测验表明，71%的美国人认为卷入越南战争是错误的。更令人吃惊的是这样一个现实，58%的国民认为这场战争是不道德的。尼克松也深知，他必须在 1972 年竞选连任之前找到一条出路，他在河内的对手也是如此。[2]

1971 年晚些时候，主要由于对西贡政府的地位无法达成妥协，寻求协议的紧张努力未能取得成效。但尼克松和基辛格却成功地改善了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从而在和平进程中最终赢得了莫斯科和北京的支持。他们认为有能力孤立越南并迫使其让步。1972 年 3 月，河内最初的反应是以正规军越过非军事区，发动了一次常规进攻，这令美国及其南越被保护者大吃一惊。美国依然是以更大规模的空中打击作为回应，并最终摧毁了海防港。美国虽然成功地阻止了北越的行动，但仍然无法避免西贡政权的垮台。

战事僵局的再现、美国额外的让步、来自其现今渴望与美国改善关系的苏中盟国的压力（见第七章）以及对尼克松可能再次当选的认知，使河内最终于 1972 年秋接受了一项没有胜利的外交安排。西贡拒绝了这项协议，但是，总统选举的迫切需要促使基辛格在选民作最后决定之前几天宣称“和平已经在望”，他的助手也欣然承认，他们本可以在前一年的任何时候达成同样的协定。这个声明之所以要发表，就是为了帮助击败民主党的和平候

---

① 即《五角大楼文件》（The Pentagon Papers），全称为《美国的越南政策决策过程的历史》，由国防部主持编撰，1971 年，文件编者之一、兰德公司前雇员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把私下拷贝的文件送交《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媒体发表，震动美国朝野，进一步推动了美国的反战运动。——译者

② 乔治·赫林：《美国历史上最漫长的战争》，第 243 页。

选人乔治·麦戈文。

西贡埋怨美国人出卖了他们，大选结束后，事实证明尼克松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他要求对协议进行修改，北越却坚持不肯让步。尼克松下令进行战争期间最毁灭性的轰炸，也就是对北方地区的“地毯式轰炸”，在为时 12 天的一波又一波的空袭中，所投下的炸弹比 1969 至 1971 年两年间投下的还要多。与此同时，大批军事装备交付给西贡政权，尼克松还做出个人保证：如果北方违反协议，美国会重返越南。1973 年 2 月，对美国人来说，战争终于结束了。

尼克松在和平协议签订之后继续支持西贡，从而使美军得以撤离，但水门丑闻很快便使之动弹不得，并终止、至少是暂时终止了“帝王般的总统职位”（imperial presidency）。国会重申了它对外交事务的控制权，限制了总统使美国再次卷入越南战争的权力，美国对西贡的支持减少了，而这种支持正是该政权赖以生存的主要因素之一。尽管在整个 1973 年主要是由南越军队采取军事行动，但到了 1974 年年中，由于缺乏足够的援助，军事行动被削减了。美国人的撤离和美国援助的减少对西贡的士气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到了 1975 年的早些时候，其战斗意志明显地消退了，政府军大批大批地开小差。据估计北越将发动为期两年的一系列大规模进攻，但当他们在 1975 年 3 月发起首次进攻时，南越军队就已经万分惶恐，很快便土崩瓦解了，要求美国援助的呼吁也毫无结果。理查德·尼克松已经灰头土脸地下台了，他对西贡政权所做的秘密承诺，不可能由杰拉尔德·福特总统来兑现。战斗在几周之后停止了，共产党人控制了整个越南，西贡变成了胡志明市。经过大约 30 年的战争，越南革命力量击败了法国人、美国人和所有国内反对派。对华盛顿的那些人来说，不幸的是，革命是由共产党人、由那些与美国的对手——莫斯科与北京——有密切联系的人以及由那些目睹其同胞因美国干涉而遭受

极大痛苦的人支配的。但是，这一切全都结束了。

5.5万美国人和数百万越南人在美国对越南革命的干预期间失去了生命，这是一场美国本来决不应该介入的战争，一个如此弱小的国家本不该遭受规模如此之大、时间如此之长的干涉。美国没有任何重大利益因印度支那事件而受到威胁，在越南失败的后果微不足道，对美国与其对手之间的战略平衡亦毫无影响。美国试图以在越南的杀戮和死亡来遏制苏联和中国，然而事实上，在战争结束之前，美国与这两个对头的和解就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东南亚的多米诺骨牌并未倒下，固然，在西贡陷落前不久，红色高棉在柬埔寨取得胜利，而巴特寮此后不久也控制了老挝，但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仍然独立依旧，它们并未共产主义化，而且还与美国保持着友好关系，并最终创建了一支在世界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

但是，如果说战争的失败对美国的战略地位没有什么影响，那么，这场战争的代价对美国的伤害实在是太深了，它加速了美国霸权力量的衰落。苏联在战略平衡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日本与西欧重新获得的经济优势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的灾难性经济政策，包括为越南战争筹资的手段，都对美国衰落的时机和深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美元地位一直很虚弱，国际收支的赤字问题困扰肯尼迪，但直到1964年，该赤字还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艾森豪威尔之后的诸位总统都未对国家安全的代价给予足够的重视。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傲慢地拒绝对他们追求的外交目标所需的代价予以密切关注，在他们的考虑中，国际收支一向从属于安全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当政府印制越来越多的美钞来应付其创建帝国的各种行动时，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约翰逊和尼克松政府都试图将战争开支和通货膨胀转嫁给他们的贸易伙伴。1965年，法国起而发难，要求美国拿黄金兑换

他们手中的美元，1971 年，英国和德国也开始反对美国的国际货币政策。世界开始厌倦以收存贬值的美元作为免受苏联威胁的代价，他们认为苏联的威胁已大大减小；他们也厌倦以收存贬值的美元，去支持一个大多数欧洲人都反对的美国人的越南战争。在盟国领导人心中，当货币问题开始向安全问题提出挑战时，紧张情绪在潜滋暗长。政治学家罗伯特·吉尔平解释说，“由于外交和国内问题的双重原因，美国政府对扩张性和通货膨胀政策不停息的追求最终削弱了美元的地位，撼动了国际货币体系，〔美国开始成为〕全球经济中既危险而又受到排斥的一员。”[1]

美元贬值提升了美国的商品价格，致使其失去了海外市场，到 1971 年，美国在这个世纪首次出现了贸易逆差。在这一年里，为阻止黄金外流，尼克松政府拒绝拿黄金兑换美元，尼克松的属下也宁愿结束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从而破坏了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于 20 世纪 40 年代所设计的、给参与国带来惊人财富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假使没有这次战争，假使没有受到通货膨胀困扰的为国民提供工作和服务的国内计划所造成的恶果，美国面临的许多经济问题会依然存在，但是，这些问题因耗费在越南的数十亿美元而恶化了。经济停滞不前而物价却快速增长，即所谓的滞胀，在 20 世纪 70 年代打击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之后，德国和日本被剥夺了参与大国角逐的机会，因而成为美国衰落的主要受益者。日本人将其研发预算的 99％用到民用生产上，从而轻易地占领了美国市场，而美国却将研发预算的 50％用在武器装备方面。另一位政治学家理查德·罗斯克兰斯解释了诸如日本和德国这样的贸易国家的兴起，尽管并非出于自愿，这些国

[1] 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普林斯顿，1987 年），第 149、153 页。

家选择了贸易而不是军事手段去获取财富和权力。[①] 撇开对日本卓越的工业计划的不实指责，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由于那场毫无理智的越南战争，美国至少加速了这个世界所面对的“日本第一”的一天的到来。塑造一个全新的、后霸权领导风格的机会，随同美国的财富和权势，一起被挥霍掉了。

① 参见理查德·罗斯克兰斯：《贸易国的兴起》（纽约，1986 年）。

第七章 缓和的兴衰

1969年，当理查德·尼克松这个冷战斗士的象征人主白宫时，大多数美国人心中显然已经为战争和对抗所充斥。这个国家渴望结束美国人在海外的无谓牺牲，也不再相信如下说教：如果停止支出用以满足军事—工业集团欲望的数十亿美元，一个敌对的世界将会剥夺美国人民的自由。在越南的没完没了的战争改变了美国人的态度，使其对领导人的智慧产生了疑问，同时也降低了对海外军事冒险的支持。美国必须从越南的冲突中脱身。或许，结束冷战的时机也已经到来了。无人能比尼克松更快地悟出美国公众的新愿望。鉴于他曾为煽动反对共产主义的歇斯底里作过如此大的贡献，所以，要把这个国家从那种歇斯底里的高压政治中解脱出来，无人比他更有资格。正如华盛顿的一个智者评价的那样，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他是第一位无需警惕理查德·尼克松攻击的总统。

正如战后所有美国领导人一样，尼克松与其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也希望谋求一种可以保持美国利益的稳定世界秩序。一如其前任，他们也把遏制苏联影响视为通往上述目标的关键所在。但是，他们所面对的苏联已经取得了与美国的战略均势，而且该国领导人还确信，他们的国家正处在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卓绝权势的前夜。更有甚者，当苏联的力量和自信日见增强之时，尼克松和基辛格却发现，一方面，公众和国会的厌战情绪限制了他

们的行动，另一方面，为林登·约翰逊供给大炮加黄油的努力严重削弱了脆弱的经济，也使他们动弹不得。为了对付力量已经增强的苏联，他们必须在战略上克服这些国内的障碍。

尼克松—基辛格路线的关键是决心把外交政策控制在白宫手中，以防止来自官僚机构、新闻界、国会或者街头示威的干预。他们不是试图去教化公众，而是选择通过高超的手腕规避宪法对总统的限制，从而成功地避免美国政治制度的缺陷。他们希望结束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的这种非对称关系，以便能迅速和彻底地放手行动，宛如他们想像中的苏联政治局所做的那样，去追求美国的利益。他们两人都不太尊重美国的传统政治文化。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他们都是权力政治的门徒。当美国利益或他们自己的利益面临危机时，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们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在美国的财富和国力都相对下降和公众支持度陷于低潮的时候，如何遏制苏联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尼克松和基辛格对此几乎有着一致的看法。他们的谈判策略通常被称为“联系原则”(linkage)。他们承认苏联取得的战略上的平等地位，容忍了它离经叛道的政治哲学和苏联及其卫星国侵犯人权的罪行，并予其获取西方的资金和技术的希望。作为交换，他们要求苏联承认超级大国在稳定其利益、尤其是在保持第三世界秩序时的相互依赖关系。美国也希望苏联帮助它从越南解脱出来。尼克松和基辛格不停地劝导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及其同僚，与企图利用边缘地区的动乱相比，与美国合作将会使苏联受益更多。他们要求苏联在不能判定美国是否要坚持到底时克制自己的行为。

与此同时，尼克松和基辛格正在努力奋斗，以恢复公众对整个战后时期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所扮演的领导角色的一致支持。结束在越南的战争将会极大地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缓和与苏联的紧张状态对此也将会有所裨益。虽然会一直存在这样的危险——一旦公众断定冷战结束了，他们为美国领导世界所必须作出牺牲

的意愿就会进一步消退，但是，为了展示对付苏联共产主义的新路线，就不得不冒这个风险，接受和平共处的思想会重新赢得因越南战争而离心离德的支持者。最后，总统喜欢称之为“尼克松主义”的策略宣告诞生，也就是说，美国把它在第三世界承担的责任转给了诸如巴西、伊朗、印度尼西亚和扎伊尔等地区性国家。美国军队不再去到处干涉，取而代之的是：美国将武装代理人的军队，让他们去打仗、去为美国牺牲。或许，美国伤亡人数的减少和它这种“更低的姿态”（lower profile）会让美国人民更乐于接受。因为他们宁愿纳税去援助和训练友好国家的军队，也不愿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海外去打仗。

在克里姆林宫，勃列日涅夫及其同僚蔑视美国之情在不断地增长。种族骚乱、反战游行、街头混乱，如此种种，都印证了他们对民主社会的缺陷的估计。美国人正在撕裂他们自己的社会，而且政府也缺少强行建立秩序的能力或意志。显然，美国正在走下坡路。也许用不了多久，苏联领导人就能期待着在他们有生之年取代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①]

在苏联废黜尼基塔·赫鲁晓夫后的岁月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政治局成员们不再消极等待美国的自我毁灭。为了加速这一进程，他们在大规模援助胡志明政权、伺机损坏美国的中东地位、以及大规模扩充军备等方面，可谓是殚精竭虑。苏联对战略核力量持续快速的建设已经到了他们能够宣称的与美国并驾齐驱的程度。他们的常规力量和军事效能的扩张，也已经到了在第三世界大部分地区与美国力量分庭抗礼的地步。西半球甚至不再是美国独享的活动区域。像尼基塔·赫鲁晓夫那样的遇事冲动者已踪迹不见，他们谨慎小心而且稳健保守，但是，他们也坚信世界

① 哈里·格尔曼：《勃列日涅夫政治局与缓和的衰落》（伊萨卡，1984年），第135—137页。

上“力量的相互作用”已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变，而且，为了取得支配地位，他们准备采取积极的行动。

为了能按“体面和平”之条件从越南抽身而退，美国请苏联向河内施加压力，这几乎不会在莫斯科得到认真的对待。只有1968年是个例外，那一年，为了明确阻止尼克松当选，苏联的确助了和平进程一臂之力，此外，再没有什么诱惑能使苏联领导层背弃其支持“民族解放战争”的承诺。如果美国在越南的战争是克里姆林宫蓄意促成的话，那它不会对苏联人更有利。这场战争消耗了美国资源，加剧了美国社会中的紧张状态，疏远了北约盟国和第三世界国家，也使得越南更加依赖苏联。美国为此流血牺牲，耗尽钱财，名誉扫地。在越南的战争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沉重的代价，而苏联却从中饱受其利。苏联增加对越南的援助，而且最终加速了河内的胜利。

勃列日涅夫及其同僚从未打算结束苏联在世界上拓展影响的努力，如果能让美国为该影响之扩大付帐的话，那就更好了。美国努力把第三世界国家置于超级大国的竞争舞台之外，与其前任赫鲁晓夫一样，苏联领导人也视之为美国维持自身优势和否定苏联即将来临的胜利的手段。同样，他们不相信尼克松有兴趣控制军备，也怀疑美国在苏联赶上之前会停止军备竞赛。他们有能力吓阻美国的核打击，而且还认为发展的势头在自己一边。现在决不是他们承认现存世界秩序的时候。当然，从超级大国之间紧张状态的减轻和美国人孜孜以求的缓和中，苏联军方也看不到有何收益。

苏联确实有一些也许通过与美国改善关系才能缓解的难题。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虽然极好的天气条件意味着好的收成，但此后也肯定会有一些歉收年。领导集团已最大限度地加大了农业投入，在城市为食品价格提供补贴，如果不削减军费开支，他们已经省不下多少积累。工业增长在减速，工业基础设施的投资

捉襟见肘。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苏联人的生活水平获得了提升，消费者的需求也随之增长，但是，20世纪70年代的光景却很难保证。像林登·约翰逊一样，勃列日涅夫也在试图求助于大炮加黄油的法宝，在改善苏联公民命运之时，努力把力量投射到海外地区，致使经济形势开始趋于紧张。其实，苏联本可以从西德、日本、甚至美国注入的资金和技术中获益，西德和日本对此好像兴趣盎然，但是他们太过于胆怯，没有美国的许可就不敢轻举妄动。苏美紧张状态的缓和似乎是这一切的先决条件。[①]

同样，在某些政治问题上，苏联企图在美国及其欧洲盟国之间打开一个缺口，但它的努力还远远不够。苏联人希望欧洲正式承认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收益和欧洲的现状，特别是承认两个德国的边界。此外，西德对此也颇感兴趣，但是，就柏林问题通过某些决议是必不可少的，而这也与美国大有干系。苏联首先期望把与西欧的缓和作为分离美国与其盟国关系的一种手段，但是，苏美关系若无改善，所有这些都是不可能的。

当然，远东地区还有一位毛泽东，他总是与勃列日涅夫过不去。苏联曾做了很多努力，试图与中国重归于好，但均未成功。1968年，为了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部的异端改革运动，苏联进行了军事干预。随之而来的就是以武力保卫“社会主义”的勃列日涅夫主义的产生，但这也没能吓倒中国人。中苏边界事件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其烈度也在上升。鉴于苏联领导人正考虑用何种方法惩罚中国人，使美国置身事外似乎就成为一种明智的选择。中美之间的接触看来并不符合苏联的利益。

到了1969年，在克里姆林宫看来，假若苏联仍能保有在整

---

① 哈里·格尔曼：《勃列日涅夫政治局与缓和的衰落》，第85—86页；雷蒙德·L.加特霍夫：《缓和与对抗》（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1985年），第87—90页。

个第三世界智胜美国人的自由，改善与美国的双边关系毕竟会有些用处。苏联人对欧洲形势比较满意，他们希望的仅仅是西方国家的认可。他们对西方的贸易和投资饶有兴趣，而军备控制对他们的吸引力就差多了，但他们仍然可以在一些领域获得好处，或者通过签订协议消除对苏联不利的条件。更有甚者，也许借助与美国的双边关系，苏联还可以获取一些新的影响。美国资本家在与苏联的交易中不断获利或许有助于缓和美国国内的反苏情绪，无论苏联加诸于中国何种惩罚，华盛顿均可能会缄默不语。但是，在所有这些可能的收益中，没有一个能使苏联领导人打算停止他们在全球扩张影响的努力。而今，由于苏联力量仍在上升，它还不愿意接受对自己的限制。

与此同时，在北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状态并未使中国领导人对来自苏联的危险视而不见。1968 年 11 月，周恩来要求与新上台的尼克松政府对话，但是，更激进的领导人决定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一次即定的会议被迫取消。[①] 在随后的数月中，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引爆了，中国在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挑起一起严重的边界事件，接下来，苏联在新疆进行了一次猛烈的报复性袭击。由于担心苏联对这一地区的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中国人后退了。他们对苏联的敌视更甚于以往，于是就接受了尼克松政府的提议。大使级会谈在 1970 年初得以重开。但是，在周恩来说服年迈的毛泽东——美国已不再是中国的威胁，而且可能是对抗苏联压力的一个重要筹码——之前，这一年也几乎就要结束了。

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外交上之所以渴望与中国打交道，主要是为了寻求帮助，以便结束在越南的战争，他们还希望把中国作为对抗苏联的杠杆，此外，修好对华关系可以使美军加速撤出东

① 即两国之间的大使级会谈。——译者

亚。美国军队将无需准备在欧洲和亚洲同时打大规模战争，这就降低了军事方面的需求。中国在东亚遏制苏联和越南，美国就可以集中所有资源去对付苏联。简言之，与中国的缓和非常符合尼克松--基辛格路线的对苏政策和尼克松主义的要求。[①]

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秘密电报通过多种渠道来回穿梭，友好信号不断增长，而且就在某一日，世人获悉基辛格刚从北京返回。1971 年 7 月 15 H，在未预先通报友邦或敌国的情况下，尼克松宣布，基辛格已经和周恩来会晤，而且他本人，美国总统，已经接受了访华的邀请。对勃列日涅夫及其同僚来说，这可不是一件好笑的事情。

8 月和 9 月，在名义上支持台北的国民党政权保留其席位的同时，美国同意北京的代表在联合国拥有席位。美国提出的保留两个代表席位的动议未获多数国家的赞同，而阿尔巴尼亚以北京替代台北的动议却轻而易举获得通过。这是美国曾经遭受的痛苦最少的外交失败之一。1972 年 2 月，尼克松飞赴中国，在那里，这位以给人扣红帽子进行政治迫害的行家里手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全世界的电视观众惊奇地发现，美国总统坐下来，耐着性子看完了充满共产主义宣传的沉闷乏味的芭蕾舞表演，并热情地为之鼓掌。中美关系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在那令人难忘的一周里，随着双方会谈的深入，有一点已经非常清楚，那就是，正常的外交关系和"正常化"的主要障碍就是美国的台湾政策。中国方面强调，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观念，而且坚持要求美国从台湾撤出其全部武装力量。美国方面不得不承认，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也只能有一个中国，美国对这一立场不表示异议。华盛

① 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波士顿，1979 年），第 163—182、191—194 页

顿已经向“一个中国，但不是现在”(one China, but not now)的政策转变，它将接受一个中国的思想，它而且默认，台湾的未来应该在此后由中国人按照他们自己的和平方式加以解决。美国方面同意最终从台湾撤出武装力量和军事装备，它许诺说，一旦该地区的紧张状态消退，美国将会逐渐完成上述任务。简言之，如果北京帮助美国从越南脱身，同时又克制其在台湾海峡的威胁行动，美国将会加速实现这一目标。[①]

在莫斯科，勃列日涅夫及其顾问不安地注视着这一切。他们最担心的事情还没有发生，中美之间还没有出现达成任何军事协议的迹象。美国还未从台湾的义务中挣脱出来，克里姆林宫的中国专家认定，在美国抛弃蒋介石政权之前，中美关系将不会有重大进展。然而，对苏联领导人来说，在进行政策评估的时候，他们必须把中美关系考虑进去，而且必须努力控制已经出现的战略三角关系，这已经很清楚了。苏联如果对美国的缓和提议无动于衷，那就会推动华盛顿和北京走得更近。尼克松的中国之行极大地提升了他在莫斯科取得成功的可能性。[②]

苏联正确地估计到，军备控制协议将是展示它对美国具有非凡意义的最有效工具。这样的协议一旦签订，美国人就不可能通过和中国缔结军事同盟来加以破坏。更有甚者，尼克松政府正在努力争取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的资金，苏联人对此深感忧虑。科技水平还不是苏联处于劣势惟一的领域，至少值得他们同样忧虑的还有全面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可能的费用。军备开支已经使苏联的预算绷紧到了极限。对消费品开支的进一步削减将是危险的。军方领导人也不热衷对投入到现有项目——尤其是苏联在技

① 哈里·哈丁：《脆弱的关系——1972年以来的美国与中国》(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1992年)，第40—47页。

② 雷蒙德·L. 加特霍夫：《缓和与对抗》，第240—243页。

术上已超过美国或与美国匹敌的领域——上的资源进行再分配。尽管尼克松在计划访问莫斯科的前几天仍然决定轰炸河内并在海防港布雷，苏联领导人对他的邀请依然未改。他们打算就战略武器的限制问题与美国讨价还价。①

从1969年开始，苏美两国的谈判人员就一直在讨论军备控制问题，但是，出于限制武器系统开发和部署的考虑，尼克松和基辛格对达成一项军备控制协议没有多大兴趣。他们关心的是和解的事实而非协议的细则。他们希望发出信号，给超级大国关系来一个改变，即从分歧导致对抗转变为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基辛格和苏联大使秘密避开正式谈判官员，在没有掌握任何技术细节的情况下，帮助各自的领导人制订出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文件，从而实现了他们的政治目标。达成一个限制所有战略武器的全面解决方案的努力，被多疑、不耐烦的基辛格弃之一边。②

1972年5月，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在莫斯科签订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第一个协议，它包括一项限制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的重要协议，因此，双方可以省下一笔投向上述系统——被视为效用甚微——的巨额资金。有关进攻性武器的安排就不那么令人满意，这反映出苏美两国的领导人都受到了来自他们各自的军事—工业精英集团的压力。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都获得了他们孜孜以求的政治资本。苏联统治阶级对美国给予的战略均势感到满意，由于没有付出什么代价，他们也因此感到欣慰。数月之后，美苏贸易协定使苏联向它所期望的经济利益又走近了一步。美国人民因终结冷战的前景而心情振奋，而这位"新"尼克松更由于与美国的两个主要对手都取得和解而容光

① 戴维·霍洛韦：《苏联与军备竞赛》（第2版，纽黑文，1984年），第44—46页；哈里·格尔曼：《勃列日涅夫政治局与缓和的衰落》，第131—133页。

② 雷蒙德·L.加特霍夫：《缓和与对抗》，第148—150页。

焕发。全世界都认为，一个新的、危险更少的时代已经初露曙光。

当美日两国关系因贸易问题而出现紧张时，未来的一种可能图景逐渐隐现。日本外交大臣佐藤荣作[①]没能迅速响应尼克松1969年的要求，限制其纺织品的出口。1971年，华盛顿就报以“尼克松冲击”（Nixon shocks），之所以如此，其部分目的就是挖佐藤的墙角。首先，没有和日本人磋商，尼克松总统就宣布向中国敞开大门，而日本却出于对美国盟友的忠诚，长时间顶住国内压力，拒不承认北京政府。其次，尼克松单方面宣布，美元不能再自由兑换黄金，而且还要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的附加税。日本被迫将日元升值，并限制自己的对美出口。长期从属于安全领域的经济问题正日益成为日美关系中的首要考虑。此前，日本以接受美国政治和战略上的指导来换取在双边贸易关系上的特权，而今这种心照不宣的安排正遭受损害。尼克松对中苏两国首倡的成功降低了安全问题的紧迫性，相对而言，也增加了国内经济问题的重要性。

当然，还有那场使美国深陷其中的肮脏卑鄙的越南战争。如果它使美国资源如此深陷于印度支那具有某种意义的话，那么，尼克松对北京和莫斯科的策略则避免了两种紧急情况。当然，这一切都是在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曾于1968年争辩说，无论何许人，倘若不能在4年内结束这场战争，他就不配当美国总统，而今他正为竞选连任而努力。于是，基辛格在大选前夕宣称和平即将来临，而这却需要美国在12月对河内施以难以置信的无情轰炸，以缔结它与河内之间的协议。但是，最后一批美国军队是在1973年2月离开越南的。对美国人来说，这场苦难终于

① 原文如此。佐藤荣作在1964年至1972年任日本政府内阁总理大臣，长期追随美国敌视新中国，在尼克松访华后不久被迫下台。——译者

结束了，对越南人而言，还有两年多的战争和死亡，而柬埔寨最糟糕的情形不过才刚刚开始。

尼克松曾有数月一直沉浸在他对乔治·麦戈文压倒性辉煌胜利的欢乐之中。由于有关东南亚的种种暴行已经退居报纸的最后几页，而且正从电视屏幕上消失，美国人很可能认为和平已经降临到这个世界上。1973 年 6 月，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与尼克松签署了《关于防止核战争的协定》。但是，即将促使尼克松下台的水门事件丑闻已足以使他心烦意乱，且不说在中东，麻烦又像往常那样浮出了水面。

长期以来，中东就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地区，可能在未来也一直如此。种族冲突，首先是宗教冲突，使该地区深受其害。大国将其允诺的犹太人家园安置在巴勒斯坦的决定以及 1948 年以色列国的建立，使此前所有的苦难都相形见绌，在阿拉伯穆斯林看来，情况尤其如此。以色列之所以在 1948 年熬过对它的首次进攻而生存下来，主要是因为斯大林很快把捷克武器交付到四面楚歌的犹太人手中。就像苏联领导人所期望的，犹太民族与其阿拉伯邻居不会有和解的一天，这可以首先为英国、而后为美国——继承英国作为该地区主要的西方力量——制造麻烦。

斯大林过去没有更多地关注阿拉伯中东地区，但是，其继任者把苏联的影响扩展到了与以色列对抗的那些国家，其中最重要的是 1955—1974 年的埃及。在 1956 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苏联阵营的武器使纳赛尔颇受鼓舞，在危机结束时，赫鲁晓夫仍把那嘶嘶作响的火箭对着已经威风扫地的英法帝国主义分子。俄国在过去曾经声称，它在与其接壤的地区享有利益，莫斯科在 20 世纪 50 年代又对此加以重申，成为整个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一个主要刺激因素。

1967 年，在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下，苏联点燃了这个火药桶的导线。叙利亚的苏联特工散布虚假传言，说以色列的进攻已经

迫在眉睫，叙利亚人就向纳赛尔求援。不久，苏联主席[1]向埃及人重申了这一传言，而后者认为叙利亚的担忧得到了苏联情报的独立确认。纳赛尔试图以两线作战的威胁恫吓以色列，就要求联合国撤出把埃及与以色列隔开的维和部队，还命令其军队开赴亚喀巴湾，从那里他们可以威胁以色列至关重要的埃拉特港。这样，被激怒的以色列向埃及发动了先发制人的进攻，这在后来被称为"六天战争"，以色列击败了埃及、约旦和叙利亚的军队，控制了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在此关键时刻，以色列好像要继续进军大马士革，苏联人因而威胁要干预，但是，鉴于苏联将其力量投射到地中海所受到的限制和美国第6舰队的存在，这种威胁几乎使人难以置信。但是，莫斯科的这种与美国捣蛋的能力再一次暴露无遗，苏联人很快为其叙利亚和埃及的朋友再次提供武器装备，而且派去数以千计的军事顾问。作为回报，苏联人得到了在阿拉伯的港口和空军基地的航行权，他们可以从那里反击美国第6舰队未来的军事行动。[2]

1969年，纳赛尔开始了针对以色列的"消耗战"，在克制9个月之后，以色列作出了反应，它的空中打击一直深入到埃及的心脏地带。以色列的空中力量再次表明，只要它愿意打击哪里的阿拉伯敌人，它就能够打到哪里。再次蒙羞的纳赛尔向苏联人请求空防援助。这一次，也就是在1970年，苏联很乐意地送来了导弹、飞机和包括战斗机驾驶员的数以千计的空防人员。虽然以色列人在一次遭遇战中击落了苏联的5架截击机，但是，苏联飞行员驾驶的苏联战斗机很快就改变了这场战争的性质。随着战争

① 即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尼古拉·波德戈尔内（Nikolai Podgorny）。——译者

② 威廉·B. 匡特：《决策的十年——美国对阿以冲突的政策（1967—1976）》（伯克利，1977年），第37—71页，是对"六天战争"的有益的介绍。也可参见格尔曼：《勃列日涅夫政治局与缓和的衰落》，第111页。

的升级，以色列威胁要侵入埃及，去摧毁苏联的导弹基地。苏联人这才更积极对待美国的停火呼吁，并在 1970 年 8 月实现停火。但是，而今苏联大约有 2 万名军事“顾问”留驻埃及，而且还赢得了阿拉伯国家的更多信任。[1]

停火协议生效 1 个月后，纳赛尔死于心脏病。其继任者安瓦尔·萨达特请求苏联援助，他认为必须收复被以色列占领的土地。虽然苏联在援助问题上表现慷慨，但萨达特未能如其所愿迅速得到他需要的所有东西。苏联人对其计划的怀疑使他忿忿不已，他怀疑勃列日涅夫出卖了埃及的利益，因为勃列日涅夫正在与美国搞缓和。突然间，在 1972 年 7 月，亦即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莫斯科会晤 2 个月之后，萨达特将苏联顾问逐出了埃及。美国领导人认为萨达特的行动是其政策的睿智表现，美国对以色列坚定的支持表明，阿拉伯人只有通过它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苏联影响的扩展已经受挫，和平将会降临到中东地区。

萨达特及其叙利亚同行哈菲兹·阿萨德对战争的准备，苏联政府是了解的，直到 1973 年，苏联政府也深知，为了迫使以色列人吐出“六天战争”的战利品，埃及人和叙利亚人急于有所行动。7 月，勃列日涅夫没能让尼克松迫使以色列表现出更多的合作意愿，也感到没有义务就以色列继续其不妥协立场所造成的可能后果向美国发出警告。美国政府有可资利用的类似情报，包括埃及的战争计划。国务院的情报分析人员也发出过警告。但是，基辛格不仅低估了萨达特的决心，而且还低估了苏联看到美国缘于和以色列的关系而再次陷入窘境的愿望。[2]

---

① 威廉·B. 匡特：《决策的十年——美国对阿以冲突的政策（1967—1976）》，第 94 -102 页。哈里·格尔曼：《勃列日涅夫政治局与缓和的衰落》，第 112 页。

② 雷蒙德·L. 加特霍夫：《缓和与对抗》，第 360—368 页。威廉·B. 匡特：《决策的十年——美国对阿以冲突的政策（1967—1976）》，第 165—170 页。

以色列人对这次攻击也震惊不已，正值他们庆祝赎罪日——犹太人最神圣节日——之时，攻击降临到了他们头上。起初，埃及人向以色列在西奈的防御阵地攻击前进，叙利亚人也向戈兰高地步步进逼。战争开始几天后，为了保持在该地区的影响，苏联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空运，再次援助它所支持的阿拉伯国家。与此同时，苏联呼吁其他阿拉伯国家也加入战端。曾经有一周的时间，美国一直让以色列自己解决问题，直到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威胁要用核武器拯救她的国家才加以干预。美国对以色列空运随后开始了，紧接着就是以色列人的反攻。他们很快击退两条战线的进攻者，几天内就具备了歼灭埃及军队的优势。萨达特认为他的军队仍然节节取胜，在苏联让他看了显示其危险处境的卫星照片之前，他一直抵制停火建议。根据苏联的提议，勃列日涅夫和基辛格制订了以色列人与其阿拉伯对手均可接受的停火协议。

然而，以色列人利用少数埃及人的挑衅为其进一步的进攻辩护。萨达特向华盛顿和莫斯科都发出呼吁，请求它们派军队实施停火协议。愤怒的勃列日涅夫要求美苏携起手来，派军队阻止以色列破坏协议的行为。不祥的是，勃列日涅夫警告说，如果需要的话，苏联将会单方面向这里调派军队，为表明意图的严肃性，他还调动了空降部队。尼克松和基辛格作出回应，命令美国军队处于战略戒备状态，以使苏联人安分守己，同时强迫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苏美对抗得以避免，但双方对彼此的行为都不满意。[①]

1973年10月的中东战争驱散了美苏两国领导人也许曾有的有关缓和重要性的某些幻想。苏联明目张胆地全力破坏美国在中

① 亨利·基辛格：《动乱年代》（波士顿，1982年），第569—599页；雷蒙德·L.加特霍夫：《缓和与共处》，第374—385页。

东的地位，令华盛顿大为失望。苏联人未向美国发出战争已迫在眉睫的警告，他们为煽动阿拉伯世界反对美国而努力工作，就美国在这场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停地散布谎言，而且当石油禁运最终来临时，他们更是欢声雷动。在莫斯科看来，战争的结果可能是一场大挫折，然而，美国迫使苏联退却的战略戒备及其含意更使勃列日涅夫及其同僚耿耿于怀。此后，基辛格努力把苏联排除在中东问题解决之外，而且如愿以偿。萨达特决定修好与美国的关系，这只能说明苏联已遭受重创。美国也许承认了苏联与它之间战略均势，但显然无意让苏联在中东扮演主要角色。大国之间的对抗看来并无多少改变。[①]

1974 年 8 月，理查德·尼克松被迫辞去总统职务，这是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最令人吃惊的事件，是白宫为了图谋摧毁政治对手和探查下属对总统可能的不忠行为、特别是为了确保他与基辛格掌控外交政策的秘密而导演的数年非法活动的顶点。1973 年年中，有关水门事件丑闻——白宫的“管子工”（Plumbers）小队潜入水门大楼搜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的审讯开始了。随着不利于总统的非法活动证据越来越充分，尼克松的权势跌入了低谷，国会重申了它在外交政策领域中的权力。曾经令人烦恼的“帝王般的总统职权”摇摇欲坠，国父们所创建的监督和分权制度又恢复了效用。

1973 年，国会通过《战争权力法》，以确保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下限制总统使用武装力量，而且通过推翻总统的否决展示了它的决心。这一年将尽之时，国会命令结束对柬埔寨残酷无情的轰炸，通过了一项防止美国军队重返越南的法律，而且明确表示要以和苏联的贸易关系为质，把它与苏联在人权问题上的表现、特别是与苏联犹太人移居国外的自由联系起来。这些对尼克松和基

① 哈里·格尔曼：《勃列日涅夫政治局与缓和的衰落》，第 151—156 页。

辛格处理外交事务能力的限制，摧毁了他们挖空心思制定的错综复杂的方案。他们针对印度支那与缓和的“行动计划”（game plan）难以执行，也已经没有能力向他们在印度支那地区的盟友或莫斯科的对手兑现承诺。美国再次向世人展示了典型的强悍国家弱势政府的情形，因为尼克松政府及其继任者杰拉尔德·福特政府——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前后相继的两任政府——均未强大到按其意愿处理世界事务的程度。在尼克松看来，美国已处于正变成“一个可怜巨人”的危险之中。

总统权力受到削弱，这到底是一件好事抑或是一个悲剧，还有待观察家的深入分析。当北越军队对西贡政权发起最后攻击时，美国没有去施以援手，为期 30 年之久的战争宣告结束。正如成千上万的难民在以后岁月里所展示的那样，越南人遭受的苦难并没有结束，然而，对大多数民众而言，和平本身就是一种幸福，这个国家也可以开始其艰苦的重建任务。刚刚摆脱美国 B—52 轰炸机恐怖轰炸的柬埔寨人民还未来得及喘口气，就又要面对他们新的共产党领导人红色高棉一手制造的更大规模的恐怖。有关美苏贸易协定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和事关进出口银行权力的史蒂文森修正案都表明，国会将不会向勃列日涅夫提供他所期待的经济奖赏，这就降低了苏联缓和其行为的可能性，尼克松和基辛格所织就的缓和结构解体了，然而，这看起来更像是他们身体力行的许多欺骗、他们对民主实践的总体蔑视、以及他们的高压专断在官僚机构、国会、最终在美国人民中间所引发的不信任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

美中关系也成为尼克松丑闻的牺牲品。联络处已经在北京和华盛顿建立起来，期待着很快将它们升格为大使馆，这就需要美国抛弃台湾代表中国的托辞、断绝与蒋介石政权的关系以及建立与人民共和国之间正常的外交关系。在为避免弹劾而战的过程中，总统越来越依赖保守派议员的支持，但这些议员中的许多人

长期以来就是蒋介石之“自由中国”（Free China）的支持者，是“赤色中国”（Red China）不可调和的敌人。因为不敢冒疏远他们的风险，尼克松就不能废止与台湾的防御条约，就重要性而论，承认毛泽东的中国远不能与保持理查德·尼克松的总统职位相提并论。他的继任者杰拉尔德·福特也同样需要共和党右翼的支持，特别是在受到为右翼分子长期青睐的首选人物罗纳德·里根的挑战之后。对人民共和国的承认不得不拖了下来。在中国，美国的拖延伤害了力主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人士，也伤害了已不能掌控政策的生命垂危的周恩来的地位。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两国内部出现的继承危机使得有关的果断行动一直未能出现。

或许，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其经济力量的衰落所造成的，这种状况因约翰逊和尼克松政府的政策而更加恶化。必须强调的是，这种衰落只是相对的，虽然美国没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年那样控制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但是，它仍然是一个非常富有和极为强大的国家。美国经济陷入了麻烦而且有些失控，但从未出现崩溃的危险。

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美国经济一直是推动与其有关的国家走向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的发动机。当美国的朋友和盟友重建或发展经济的时候，美国接下了保护它们的帝国的重担。由布雷顿森林体系（参见第一章）演变而来的混合体制（patchwork system）一直在起作用。由于加入了美国主导下的自由主义秩序，这些国家的实际财富大为增长。但是，在1960年之前，美国的许多问题——有的是体制上的，有的是特殊领域中的——已经出现了。首先，欧洲国家和日本已经从战争的影响中恢复过来，在贸易政策方面表现出了更强的竞争力和更多的自信心。他们准备继续与美国领导的体制开展合作，但要求获得代表其利益的发言权。其次，美国人民对社会中的不平等和富足之中贫困的

继续存在越来越敏感。面对严重的国际收支问题、贸易出超的日益减少、以及国内民众对社会公正的要求，肯尼迪政府为发展经济制订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是，同一时期的国防和外援支出的增长又使之毁于一旦。凯恩斯实现充分就业的方法在一个平静安宁的世界里也许能够取得成功，但是，为了应对赫鲁晓夫领导下的那个精力充沛的苏联的挑战，就需要额外增加开支，这又意味着过多的联邦财政赤字、通货膨胀以及国际收支赤字的出现，这些都威胁着在布雷顿森林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

林登·约翰逊为其同胞的社会公正承担了更多的义务。在想像之大胆和获得必要的立法程序行动的总统能力方面，他的改革与罗斯福新政难分伯仲。然而，约翰逊还承诺要赢得越南的战争，在这个希望渺茫的事业上浪费了数十亿的美元。作为一位强势总统，林登·约翰逊虽然能够轻松支配行政部门和操纵立法当局，但是，一想到"伟大社会"计划和战争经费支出，他就失去了向人民增税的力量和勇气。预算赤字直线上升，通货膨胀显著增长，而经济增长率却下降了。理查德·尼克松接手的是混乱一团的国内外经济政策。

为了追逐超越对手的政治和军事优势，尼克松、基辛格及其助手更愿意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些方面，而且盼望在这些方面磨砺他们的技艺。但是，在1969年遭遇具有政治影响的破坏性经济衰退之后，他们认识到必须实行通货膨胀——包括将美元贬值——的对策。在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方面，美国已经束手无策。德国人和日本人一直顶住美国要马克和日元升值的压力，他们不希望美国将美元贬值，于是黄金就以惊人的速度流出了这个国家。巨大的国际收支赤字意味着外国人持有的美元比美国能够兑付的黄金要多得多。这个体系一直令美国花费巨大，但是，政治上的考虑——使友邦得以重建并与之保持至关重要的安全关系——使美国忍受了这种代价。截止1971年，尼克松就已断定这

样的代价太高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限制又太多了。他坚信德国和日本不会与美国分道扬镳，而且对美国改变该体系的有关规则并以能够接受的代价摧毁这个体系充满了信心。与以前货币可兑换的承诺相左，尼克松总统颁布法令，规定国际收支盈余的国家不能以其多余的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为了满足国会中的贸易保护主义者的要求，他向进口货物开征附加税，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他又制定了控制工资和物价的措施。这一年年底之前，有关美元贬值的协议终于达成了。这些措施尽管给国际经济秩序带来了混乱，但却有助于在 1972 年推动美国经济走向繁荣，也增加了尼克松再次当选的可能性。再者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经济实力在 20 世纪 60 年代虽然衰落了，但它仍然强大到足以决定这一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存在方式。为了增加其行动自由，美国破坏了自己创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①]

但是，在以 20 世纪 70 年代为开端的这个新时代，美国不再控制国际金融体系。1971 年，美国出现了它在 20 世纪的首次贸易赤字，它愈益需要德国和日本的默许以及德国和日本的资本，以保持国内的繁荣和向全世界投射军事力量。两国都变得越来越强硬，德国人考虑的是金融问题，日本人关注的是贸易争端。美国领导人逐渐发现，他们已经失去了其前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1/4 世纪所享有的行动自由。美国日益需要外国资本来支撑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维持它在海外的影响，但是，如果没有附加条件，外国资本就不会上门。美国不得不认真对待德日两国对它在国内外所作所为的看法。如果——好像也很可能——美国成为一个债务国，它可能不得不惟其债权人马首是瞻，就像 20 世纪 20

① 参见乔安妮·高：《关闭黄金窗口——国内政治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伊萨卡，1983 年）；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普林斯顿，1987 年），第 139—141 页。

年代的法国为获得所需资金不得不听从美国那样。

由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石油输出国组织引发的石油危机，美国力量的相对衰落也因此更加引人注目。直到那时，美国除了控制世界的金融体系之外，还一直控制着世界的能源市场。然而，随着美国汽车和工业每年消耗越来越多的石油，它的石油储备下降了。美国在历史上第一次要依赖外国供应。它不能再用自己曾经巨大的石油储备来降低世界石油价格和确保向美国人提供源源不断的便宜石油。在 1973 年阿以战争期间，当阿拉伯石油供应国施以石油禁运时，他们本以为友好的伊朗国王却强行提高了油价。沙特人就代替美国人成为世界石油价格的仲裁者，美国丧失了影响他们政策的能力，正如美国没有能力阻止日本政策在 1973 年从亲以色列转向亲阿拉伯所表明的那样。

1974 年，尼克松辞去总统职务，就美国经济而言，这是极其糟糕的一年。入主白宫伊始，萧条的经济，高通货膨胀率以及两者罕有的结合、亦即经济学家所说“滞胀”就横亘在杰拉尔德·福特的面前。福特和基辛格发现，与在边缘地带和苏联的较量相比，美国人民更关注的是工作和生活支出问题。随着 1975 年西贡政权的崩溃，国会和全国上下普遍不希望将捉襟见肘的资源投入到使之无尽耗损、不那么重要而且也许希望渺茫的海外事务中去。越南的战争已粉碎了林登·约翰逊给美国人民的伟大社会的许诺，对他们来说，很难想像第三世界中还有哪里值得他们为之进一步降低生活水平。

美国人民的厌倦情绪传到了苏联，基辛格对此深感不安。他从未怀疑苏联人会尽其所能寻求某种优势，也坚信美国收缩的任何迹象都会被莫斯科视为不冒风险地扩大影响的好机会。要使国际关系得以缓和，除了胡萝卜之外还需要大棒，但是，国会在贸易和信贷方面的行动限制了他使用胡萝卜的自由空间。而今的情势开始表明，政府缺乏它所需要的支持来继续为时 30 年的遏制

政策。1975 年 5 月，当柬埔寨的共产党人扣押美国商船“马亚圭斯”号（Mayaguez）之后，福特政府作出强烈反应，马上派出了海军陆战队。然而，这个行动证明是不必要的，因为被扣人员在救援行动开始前就已经获释，而且在该行动中丧命的救援人员比被扣押的人还要多。不过，令基辛格和福特满意的是，他们已向世人证明，美国可不是好惹的！

安哥拉是一个美国不感兴趣的非洲国家，但是，它在福特政府时期却成为美苏争夺的焦点。在那里，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当地组织——每一个都有外来支持——一直在致力于从葡萄牙人手中取得独立，而自 1974 年春天国内革命以来，葡萄牙人就已经放弃了这个地方。一如所料，该地区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它主要得到古巴的支持，也断断续续得到了苏联、刚果、阿尔及利亚、葡萄牙共产党和一些西欧国家政府的援助。另一个组织是“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FNLA），它赢得了各类稀奇古怪的支持者，其中有中央情报局、扎伊尔、北朝鲜、中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罗马尼亚、利比亚、印度、一些西欧国家、福特基金会以及劳联—产联（AFL—CIO），更有甚者，最后还包括南非在内。第三股重要力量是“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同盟”（UNITA），它得到了中国和急欲相助的南非的援助。部族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使安哥拉革命形成了不同派系间的对立。[①]

1975 年 1 月，非洲统一组织在这 3 个主要组织中进行调停，达成了一项协议：它们将携手工作，并与葡萄牙人一起组成一个过渡政府，葡萄牙人将在 11 月向临时政府移交权力。中国决心阻止亲苏联政权的建立，于是率先加强了“安哥拉民族解放阵

① 雷蒙德·L. 加特霍夫的《缓和与对抗》中第 502—508 页的叙述，使读者得以理解这种纷繁复杂的情形。

线”的力量，中央情报局则紧随其后，向它提供援助。古巴和苏联也及时加快了援助“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步伐。到1975年年中，“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率先挑起激烈的战斗，但是“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却出人意料地获得了胜利。在安哥拉，一个苏联支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似乎就要出现了。

9月末，美国、中国、扎伊尔和南非的增援使“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对手再一次占了上风。10月，南非的大规模干预使“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同盟”包围了仍然由“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力量控制的安哥拉首都。11月，古巴增加了赌注，派出作战部队来帮助“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很快，“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再一次扭转了局势，击溃了北方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扎伊尔军队，并阻止了南非军队推进的步伐。

中国不愿意因与南非联手而自污名声，在古巴大部队到来之前退出了安哥拉的争端。基辛格虽然对当地事务缺乏兴趣，也极少关心与世隔绝的黑非洲地区，但是，他愿意与南非这个恶棍联手，以便阻止一个亲苏政权控制安哥拉。武装干涉的决定看来是哈瓦那作出的，但是苏联没有理由不乐观其成。而且，有证据表明苏联参与了古巴军队的空运和补给行动。安哥拉对美国来说并不重要，但美国不能容忍古巴人和苏联人在此地为所欲为。为了支持它所瞩意的安哥拉革命者，美国行政当局遂向国会要求更多的拨款。

令基辛格极为震惊的是，国会居然否决了他的上述要求。1976年1月，国会禁止向安哥拉提供更多的秘密援助，它不希望再次陷入边缘地带的另一个泥沼之中。随着美国声誉与这场斗争的关系日益紧密，金钱已经不能阻止古巴人的行动，除非动用美国军队。但是，在越南战争甫告结束、国内财政一片混乱——基辛格不屑于考虑——的情况下，动用军队显然是不可行的。

由于无需冒与美国对抗的风险，苏联进一步卷了进来，古巴也增派了更多的部队。没有美国的支持，南非人只好抽身而退。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这个因南非的敌视而受益匪浅的政权，很快就得到了其他黑非洲国家的承认，到了1976年3月，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与扎伊尔、南非达成协议，从而使最主要的外来压力得以缓解。苏联在安哥拉的影响迅速上升，但起决定影响的外来势力还是古巴。1977年，古巴和苏联支持安哥拉政府内的不同派别，但是，古巴支持的一派压倒了亲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无论古巴还是苏联支持的安哥拉政府成员，都不能不为了贸易和投资而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接触。

苏联在安哥拉没捞到什么好处，但基辛格却不那样认为，苏联支持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胜利使其愈发不能忍受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挑战。只要中国和美国支持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获胜，苏联的作用就算不了什么。战场形势一旦有变，美国就宣布苏联干涉是不可接受的，是与缓和相悖的。劝说苏联撤出安哥拉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不管怎样，美国政府缺乏更有力的反应手段。基辛格担心苏联会肆无忌惮地加强干涉、向世人展示其日益增长的对外投射力量的能力。对基辛格来说，最糟糕的也许是害怕美国人丧失应对苏联挑战的意志力。[1]

在勃列日涅夫及其同僚看来，基辛格的责难虚伪到了极点。美国人对于缓和规则的解释是：只要美国能够获胜，对抗就是允许的。而今苏联有能力从事美国在整个冷战时期一直在做的事情，美国人却宣布这种行为是不可接受的。苏联也许会作出迎合美国意图的姿态，但是，在苏联领导人的声明或者在他们有关安哥拉局势的行动中，均没有准备在边缘地带影响力争夺中让步的

---

① 威廉·海兰：《不共戴天的对手——尼克松到里根时期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纽约，1987年），第142—146页。

迹象。

此外，苏联人还面对另外一个、也就是来自于中国的挑战。他们不仅需向自己和其他国家表明，苏联是个与美国一样应受到尊重的超级大国，而且也需要向世界上执政与在野的共产党以及激进派表明，他们的朝圣之地是莫斯科而非北京。苏联愿意为他们做的要比北京愿意付出的多得多。如果苏联政治局曾经认为，它不值得为在该地区的潜在收益而冒美苏紧张关系可能升级的风险，中国的卷入也许就不会把苏联拖人这场冲突之中。再者说，中美两国在安哥拉问题上的合谋看起来触动了勃列日涅夫同僚的原始神经。莫斯科在军备建设上的过多投入，有可能使中美两国得以威胁自己，或者在谋略方面战而胜之。[1]

最后，很明显，当美国在海外使用武力的意愿消退时，苏联的此种愿望却在上升。在某种程度上，正如基辛格所担忧的那样，苏联人在安哥拉发现了一个没有危险的战场。美国国会的行动表明，与美国对抗的风险几乎不存在。像他们之前的美国人一样，苏联人难以抗拒测试其新近研发的海空运输能力的机会，苏联军方渴望试验自己的新装备和新技术。尽管有证据表明，美国干预第三世界的代价怎样销蚀了美国的实力，并造成了它的相对衰落，但苏联人却无视这些历史教训而一意孤行。尽管苏联的经济基础与美国相较远为薄弱，但苏联人仍然希望，他们极为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们占据优势的一个领域——将可以使他们在美国失败之地取得成功，在边缘地带获取利益。

在欧洲这个双方争夺的中心地区，缓和仍然在继续。欧洲人，特别是德国领导人，很少关心美苏在第三世界的争夺，他们急于想采取行动，以降低美苏将自己的国家变成战术核武器试验场的可能性。西德总理威利·勃兰特的东方政策（Ostpolitik）

---

① 雷蒙德·L. 加特霍夫：《缓和与对抗》，第527—530页。

已取得了长足进展，东西欧国家之间的贸易也迅速成长。1970年，西德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双方宣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在德黑兰、雅尔塔所确定的波兰、苏联和德国的边界不容侵犯。1971年，有关西方进出柏林的协定已经达成，只待苏联的确认。1972年，东西德彼此已相互承认。尼克松和基辛格对德国的首倡行动深感不安，但由于全神贯注于越南事务，他们对此也无计可施，只能听之任之。

苏联急于缓和与西欧的关系，希望得到不易从美国获取的技术，并在美国人与他们的北约盟友之间打入一个楔子。勃列日涅夫及其同僚希望所有欧洲国家正式认可1945年之后的边界，他们提议召开一次希望完全由欧洲国家参加的会议，非常明显，这个提议是针对美国的。1973年，在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问题上，苏联人取得了成功，但不得不同意美国、加拿大和梵蒂冈参与其中。

经过两年的谈判，最终在1975年8月达成赫尔辛基协议，在欧洲现状问题上给了苏联人希望的保证。为了得到这些保证，苏联人不得不承诺改善自己的人权状况，具体来说就是给予苏联人民行动和思想的自由。如果他们打算遵守在赫尔辛基的承诺，苏联的政治制度——勃列日涅夫和共产党集团领导人的权力之源——将会遭到破坏。赫尔辛基协议也许并没有结出什么实际成果，但是，正如美国《独立宣言》那样，它们为签署国创设了为之奋斗和遵守的标准，标志着双方向“铁幕”进行渗透的程度。

尼克松和基辛格对欧洲局势的缓和依然心存恐惧，他们害怕欧洲人会放松警惕，担心他们不愿意支持军备建设、还担忧他们会以为冷战已经结束而与美国离心离德。当欧洲人对赫尔辛基协议欢欣鼓舞而且福特总统准备签署的时候，政治对手们却把这个决定嘲讽为他在外交事务上幼稚无知的表现。福特是一位来自中西部的颇受欢迎的保守分子，1976年，他战胜来自党内右翼的

里根的挑战，成为当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但却败给了在很多问题上观点似乎既含糊又灵活的民主党候选人吉米·卡特。正是卡特此人，必须就如何回应苏联在非洲的机会主义、是否继续推动缓和等问题作出决断。

1976年，吉米·卡特当选为美国总统，此次选举将美国政治体制最好和最坏的一面都展露无遗。美国人民厌倦了政府要求的牺牲——他们的孩子在遥远的战争中毫无意义地送命，滞胀的经济又对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他们有充足的理由指责政府和华盛顿的当权者。与苏联、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民不同，美国人有自己的补救之策，那就是通过选举把他们的统治者赶下台，由一个完全与先前的华盛顿无染、与过去任何令人厌恶的政策无涉的人，领导一个新政府重新开始生活。美国将重塑自我。新总统将会去除所有可恶的东西，把国家重新带回自由民主的理想国家的轨道。

很不幸，这位美国新总统虽然在佐治亚州有很好的政绩，但对如何掌控世界头号强国的外交政策并未做好准备。他很聪明也很能干，但在这方面仍然需要好好学习。身处核子时代，面对20世纪70年代末的变幻莫测的世界，执掌美国大权和负责美国外交的人却没什么国际关系的历练，这件事想起来都让人后怕。这不是业余爱好者能够胜任的工作，也不是非专业人士纵横捭阖的时代。然而，吉米·卡特是人民的选择。

其结果是4年之久的混乱。作为一位善良而正派的人，卡特也相当傲慢，他以为能够撇开前任的失误，重新开始一切。像半个多世纪前的伍德罗·威尔逊一样，卡特指责前任政府的自私自利的现实政治，宣称美国的目标是重建其理想中的社会。对尊重人权的不倦的追求将是卡特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他决心缓和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并结束冷战，但却未能敏锐地意识到对苏联人权状况的批评所带来的麻烦。卡特急于加快军备控制的进程，对

美苏多年谈判而产生的建议弃之不顾，以一个更激进的计划取而代之，从而打断了军备控制的进程。这个计划意思含糊不清，最终被苏联人视为对他们的威胁。卡特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国务卿赛勒斯·万斯和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不仅在苏联问题上尤其使他左右为难，在其他很多事务上也使之莫衷一是。卡特总统试图撇开二人的荐言，并努力推行自己的政策，但结果却把朋友和敌人都搞糊涂了，因而国内外都备受蔑视。

对万斯来说，美国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重新振兴和强化美苏缓和，与苏联密切合作，减轻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解决诸如中东问题这样的世界上不易解决的问题。他相信，在年迈衰老的勃列日涅夫政治局领导层的背后，是摆脱了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新一代领导人，他们和任何美国人一样，都渴望结束冷战和急于实现国家的现代化。[①]

具体而言，万斯需要一个范围更广的军备控制条约，也就是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以阻滞、如果可能的话就彻底改变军备竞赛的进程。这样一个协定也许可以减少加剧美国资源紧张和通货膨胀的防务开支。万斯准备接受苏联在中东的角色，他坚信，允许苏联参与是使其行动负责的惟一途径，使苏联利益与该地区和平相结合是阻止其蓄意煽动阿拉伯极端势力的最好方式。苏联在非洲的进攻性姿态虽使万斯备受困扰，但他认为这并没有威胁到美国的任何重要利益。总有一天，克里姆林宫的那些人将会汲取美国在越南得到的教训：在边缘地带施展力量是一把双刃剑，一旦如此行事，它既能增强也可能消耗国家的实力。

万斯对中国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他并不担心，中国人有能力为自己的目的操纵美国，为获得最大的活动空间而恶化美苏之

---

① 参见赛勒斯·万斯：《艰难的选择》（纽约，1983年）。

间的紧张关系。万斯认为，对未来、世界和美国而言，最好的希望就是去鼓励苏联改变其行为。变化不会在一夜间发生，但是，如果能使缓和回到正确的轨道，那么下一轮的苏联领导人就有可能加快这一进程。

布热津斯从不怀疑苏联是美国关注的中心。然而，他不相信在莫斯科能找到问题的解决之策。他认为不存在苏联自愿改进其行为的前景，冷战只有在一个超级大国失败后才会结束。要战胜苏联，美国必须增强它自己和盟国的实力，必须对苏联保持无情的压力。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寻求对苏联的战略优势，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注入新的活力，把中国拉到美国一边，削弱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加深苏联帝国的内部分歧，反击苏联对世界任何地区的干涉。布热津斯基坚持认为，鉴于历史、地理和相互对立的政治文化的影响，美苏之间的争夺是命中注定的，美国只能参与这场较量，并取得最后的胜利。[1]

就苏联内部变化之紧迫性而论，很明显，万斯是正确的。赫鲁晓夫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解放出来的各种力量——社会科学的复兴和对这个世界的严谨的学术研究——都向苏联领导层证明了它们的价值。到 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透过教条主义思想堤坝的“新思维”（new thinking）已由涓涓细流汇成滔滔江河。但是，教条主义的思想大坝仍昂然挺立。大体说来，高踞苏联政府顶端的勃列日涅夫及其同僚对万斯的顾问早已强调过的知识界的骚动仍然无动于衷，党内老迈的领导人不善于接纳新思维和新方法，他们紧握权柄，一如既往，片刻也舍不得撒手，苏联人民对此无可奈何。万斯的想法在 20 世纪 70 年代是不大可能实现的。

勃列日涅夫认为，美国由于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丑闻而遭到

① 参见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纽约，1983 年）。

削弱，而且由一位优柔寡断和懵懂无知的总统领导着，此时此刻正是苏联加紧谋取优势的大好机会，正如1977年秋天苏联所做的那样，空运古巴部队到非洲之角并赢得了美国的长期盟友埃塞俄比亚的忠诚。1978年4月，共产党人攫取了阿富汗政权，12月，苏联的越南追随者轻而易举地战胜了中国支持的柬埔寨红色高棉，这两件事只能让勃列日涅夫心情振奋。1979年1月，伊朗国王——美国在中东和西南亚的代理人——逃离了他的国家，接踵而至的是伊朗的内乱，使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地位大为削弱。甚至在美国的门槛上，开始是在弹丸之地的格林纳达，接下来在尼加拉瓜，亲古巴和亲苏联的势力也先后攫取了政权。

在克里姆林宫看来，卡特对其中任何一种情势只能是徒唤奈何。苏联强权无论在何处都能够所向披靡。苏联政治局成员们踌躇满志，认为不需要再出台什么新方针了。他们无视其政策对美国行为的可能的影响，像布热津斯基预料的那样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苏联领导人抛开了他们惯常的审慎，从而损害了万斯的地位，把卡特推到了布热津斯基一边。[①]

尽管卡特政府终结冷战的所有关键努力的基础已经丧失殆尽，但它却在拉丁美洲、中东和东亚取得很大成功。不幸的是，这些成功没有一个不是以恶化美苏关系为代价。1977年，卡特签署了几个最终允许巴拿马获得运河控制权的条约，一些美国保守派一直极力反对。行政当局赢得了一次伤痕累累的战斗，参议院批准了那些条约，但是，这场战斗却使行政当局失去了它可能需要的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的部分票源。为了重建其保守派的声誉，一些在巴拿马条约上支持行政当局的保守派议员不得不投票反对军备控制。

卡特极力促成的戴维营协议——以色列和埃及之间异常重要

① 哈里·格尔曼：《勃列日涅夫政治局与缓和的衰落》，第145—146页。

的协议——激怒了被排斥在这一和解进程之外的苏联人。早在1973年战争之前，萨达特就已经不再相信苏联会援助他的事业，并越来越指望美国去制约以色列人的行为。1977年，萨达特意识到，卡特需要他人施以援手才可能消除以色列的强硬立场，于是就毅然前往以色列，不仅向以色列人、而且还向以色列的美国朋友表明了与宿敌和平相处的意愿。通过埃及重获其西奈领土、与以色列和平共处、承认以色列国等条件，卡特成功地促成了这一协议，并打破了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的联合阵线。

埃及与美国、以色列的和解使苏联人丧失了在中东最重要的朋友。鉴于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均不信任它，苏联被排除在会谈之外，其所谓的超级大国地位备受羞辱。世界上最重要地区之一的事务正被重新安排，而苏联却被晾在一边。莫斯科不接受这一协定，于是就支持阿拉伯世界的那些一直不承认以色列生存权利的势力。虽然以色列生存的机会大大增加，但这丝毫也不符合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利益，持久的和平也就不大可能实现。苏联对反以色列的阿拉伯好战势力的支持再一次加剧了美国国内的反苏情绪，从而出现了不愿继续缓和的政治气氛。只要苏联被排斥在中东和平进程之外，它就会在那儿制造麻烦。只要苏联在中东捣乱，美苏关系就无法改善。美苏关系不改善，对美国领导人来说，就很难与苏联分享在中东地区的影响。从苏联不肯退缩，政治局不愿让步的情形来看，这真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长期以来，中美关系迟迟未能实现正常化，完成这一任务也是卡特的成就之一。遗憾的是，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被卷进了万斯和布热津基的争斗和两人如何对付苏联的相互冲突的看法之中。万斯确信，对中国的任何偏袒的迹象都将恶化美苏关系，他认为美中关系远不如美苏关系重要。当然，布热津斯基不大考虑苏联的感受，他认为要不断刺激苏联，才能使其领导人感到与美国和解的必要性。布热津斯基的观点最

终占了上风。[①]

中国的目标与美国的并不一致。在遏制苏联强权的问题上，两国固然有着一致的利益，但中国对美苏关系的改善感到担忧。历史上，衰弱的中国曾施展以夷制夷的策略，70年代，中国人意识到美苏争夺对其大有裨益。70年代末，邓小平复出担任中国领导人，他很快就意识到了万斯和布热津斯基的对立，并以之服务于中国的利益。越南对中国在柬埔寨的影响发起挑战，邓小平希望与美国的联系能促使苏联保持中立，在中国打击越南时减少其干预的可能性。

1979年承认北京政权无疑是明智的举动，也是美国外交的重要成就。但是，如果这一成就是以加剧美苏关系的紧张为代价，那么这个代价未免太高了，要知道苏联有能力毁掉美国。万斯不在乎与中国人改善关系的机会，而布热津斯基则对与苏联对抗的代价无动于衷，事实上，他很少放过每一个奚落苏联的机会。但是，正是布热津斯基的行事方法吸引了美国选民，就连卡特也不例外。

华盛顿不顾万斯的反对，坚持发出了以美中战略合作反对苏联的信号。当苏联人作出极为恼怒的回应时，美国那些批评对苏缓和的人却顿时甚感宽慰。另一方面，如果能引导美国公众相信对苏联强硬是一种适当的选择，那么，像亨利·杰克逊参议员（民主党人，来自华盛顿）和罗纳德·里根这样的人，将比卡特更适合扮演国家领导人的角色。

1979年，卡特为挽救缓和作出了最后努力。当时，尽管对美中两国在中国打击越南时的共谋感到恼火，苏联人仍然同意举

① 迈克尔·奥克森伯格：《中美关系的十年》，《外交季刊》，第61卷（1982年），第175－195页；哈里·哈丁：《脆弱的关系——1972年以来的美国与中国》，第67－81页。

行高峰会议并签订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当然，万斯对恢复美苏和解的势头有着真正的兴趣，而布热津斯基则认为，勃列日涅夫愿意与卡特会晤并签署条约表明，他威胁苏联的策略已取得成效。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在军控方面并不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但多数审查专家认为，它比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更缜密、更符合美国的利益。对苏联人来说，他们急需减少军费开支。尽管勃列日涅夫和党内其他老资格领导人似乎并不在乎苏联中层分析家发出的警告，但他们国家的经济正开始走向崩溃，他们的帝国支出远远超过了人民的承受能力。简言之，重新启动缓和的可能性似乎仍然存在，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苏联在第三世界的行动，克里姆林宫对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加之卡特的领导无方，使杰克逊参议员和美国社会的其他反苏分子掌握了主动权。1979 年夏末，赞同缓和的弗兰克·丘奇参议员（民主党人，来自爱达荷州），要求正视苏联在古巴驻军一事，并要求该驻军立即撤离古巴，这件事不经意间就决定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的命运。被选民普遍认为过于自由主义的丘奇，在重新发起的选战中正竭力避开保守派的攻击。事实上，苏联军队在古巴已经留驻多年，美国政府对此也一直是睁只眼闭只眼。为应付因丘奇的揭露而引发的国内政治风暴，卡特就要求苏联从古巴撤军，这次该轮到勃列日涅夫暴跳如雷了。苏联人没有犯下任何错误，他们一直遵守不在古巴增加驻军的承诺，现在却因为要帮助美国总统对付国内的政治难题，而被要求从 60 年代早期就持有的立场上后退。苏联对此一口回绝。卡特和苏联人因此又给参议院攻击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势力提供了额外的弹药。[①]

---

① 雷蒙德·L. 加特霍夫：《缓和与对抗》，第 828—848 页。

1979年11月开始的伊朗人质危机和12月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很快就掩盖了苏联在古巴的驻军问题。1953年，伊朗国王在中央情报局操纵的政变中重新掌权，随着其残暴统治的反对力量的显著增强，他于1979年1月逃出了伊朗。建立一个温和民主的后继政权的希望很快被实力强大并尊奉阿亚图拉霍梅尼为领袖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所埋葬。11月，霍梅尼的追随者占领了美国大使馆，把使馆人员扣为人质，最终将其中的57人拘押了14个月，也就是卡特总统任期的最后一段时间。政府通过多次谈判和一次离奇古怪的救援行动，仍无法使人质重获自由，这就强化了公众对总统领导能力的失望情绪——或者说公众自此就对总统的能力失去了信心。强壮的格里佛[①]却受着一群小人的折磨，这可不是美国人能够接受的自己国家的形象，他们希望领导人能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使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得到应有的尊重。他们不理解卡特为何不能使苏联军队撤出古巴，也不能理解卡特为什么不能从伊朗救出人质，他们要找一个能够而且愿意那么做的人。卡特总统只得比普通民众走得更远。[②]

12月，苏联给了卡特一个采取断然措施的机会，以缓和为代价去创建布热津斯基向他指出的伟业。在阿富汗，1978年4月上台的共产党政权正在分崩离析，部分由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反对派的压力，但主要还是因为阿富汗共产党内部种族派别的内讧。苏联顾问和外在压力也不能使局势稍有改善。邻国发生动乱，而且发生在与苏联之中亚不安分的各民族有着种族联系的民族中间，对苏联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伊朗的胜利除了威胁着美国利益外，也威胁着苏联的利益。美

---

① 格里佛（Gulliver），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18世纪的讽刺小说《格利佛游记》的主人公，小说讲的是他在小人国的经历。

② 加里·斯克：《大失败》（纽约，1985年），该书是研究卡特政府与伊朗关系的最有用的基础作品。

国主要关心的是控制波斯湾的石油，而苏联担心的则是边界地区的安全。政治施压归于失败后，苏联开始诉诸武力，这又是一个大国傲慢自大的经典案例。使整个欧洲和美国都感到恐惧的强大红军挺进阿富汗，去教训一个被林登·约翰逊称之为“无足挂齿的国家”，要它不要去违拗一个超级大国的意志。美国人认为苏联的行动于其安全至关重要，勃列日涅夫及其同僚再一次低估了美国的反应。[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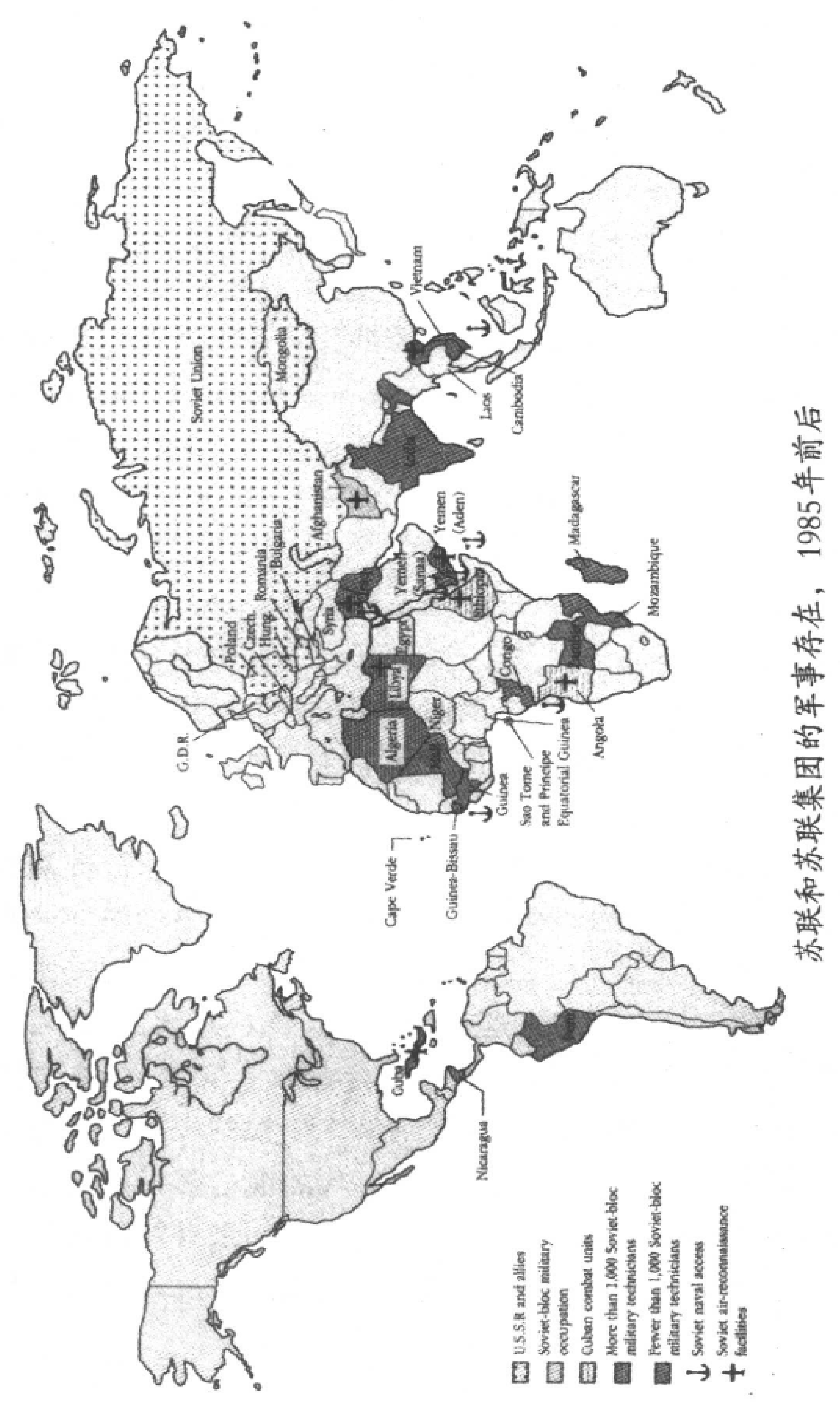
卡特的反应异常强烈。他夸张地称苏联的行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世界和平最严重的威胁，于是对苏联实行粮食禁运，但此举却触怒了美国农民。他最终决定要美国运动员抵制拟于莫斯科举行的夏季奥运会，又激怒了运动员和所有那些认为体育运动比政治更重要的人。他宣布实行“卡特主义”，以此向苏联发出警告：波斯湾与美国利害攸关，决不允许苏联向波斯湾推进。最重要的是，卡特号召加强军备来迎战苏联的新威胁。

苏联人对卡特的强烈反应感到震惊，而且被推上了世界舆论法庭的被告席。他们放弃了与卡特政府合作的希望，坚持迎接对抗的新时代。苏联经济本已经困难重重，阿富汗战争又消耗了它紧张的资源。

在苏联帝国的根基开始垮塌之前，它几乎感觉不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巨大成就、获得世界上与之相关力量支持的快慰以及在通往世界领导地位的大道上昂首阔步的欣喜。无论苏联军队怎样恪尽职守地凶猛战斗，都不能击败主要由中美两国支持的阿富汗游击队。苏联经济——即使是最乐观的看法也已经摇摇欲坠——不能再承受对古巴和越南那样的盟国的极为吃力的援助，而这种援助是作为帝国必须付出的代价。更有甚者，现在可能还会有一

---

[1] 雷蒙德·L. 加特霍夫：《缓和与对抗》，第887—965页的内容毫无疑问是对苏联在阿富汗所作所为的最好的解读。



苏联和苏联集团的军事存在，1985年前后

场与美国的新的、耗费高昂的军备竞赛。对苏联共产主义的恐惧

使美国长期以来夸大苏联的威胁。1980 年，很多美国人认为苏联处于攻势，摆好了架势要实现它主宰世界的目标。勃列日涅夫及其他党内元老对这种看法也欣喜异常，但事实上，这个国家在每一条战线上均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1969—1980 年是一段超级大国朝着结束冷战的目标迈进的飘忽不定、停滞不前的时光。1972 年尼克松总统首访莫斯科和北京的愉悦心情以及对和平的普遍期待，在卡特执政的最后数月里，都化为了泡影。然而，推动超级大国走向缓和的力量依然强大，最重要的是美苏领导人都无法回避国内的经济现实。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如此高昂的代价创立帝国已令双方的社会都难以承受。美国的相对衰落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已经开始，但美国人民却达到了苏联人民难以企及的生活水准。美国权势的工农业基础依然比苏联制度所能创建的任何东西都要强固。苏联人一直在努力赶超美国，然而，他们只在军事上取得了成功，在消费领域，他们就没能实现如此的成就。美国可能已处于衰落之中，但苏联仍然望尘莫及。

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的领导人，他们都不愿意放弃霸权的梦想，其各自的社会结构还在继续遭受损害。双方的争夺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80 年代。很明显，苏联一方的损伤要更大一些，苏联“新思维”的倡导者清楚，这场争夺已不能再持续下去了。然而，美国却不愿放弃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它的制度更优越、更灵活，美国人民的生活也更美好。在罗纳德·里根的领导下，为了赢得新一轮的冷战，美国人民准备将下一代的前途都抵押上去。而勃列日涅夫的继任者却没什么可以典当的，如果睿智的领导人不能找到一种方法，去终结使双方均伤痕累累的对抗，那么，其结果就可能是国家的崩溃。

第八章　上帝选定的国家

如果有人怀疑美国是上帝选定的国家，那么，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重大事件则足以消除这种疑虑。在国际环境极为复杂，核灾难一触即发的情势下，美国人民选中了过去的电影明星罗纳德·里根来领导他们和决定他们的未来，这是美国人民表达其信念的决定性行动，当然，他们的希望并未落空。

里根是一位魅力非凡的人，其自嘲的幽默感极具吸引力，他受人爱戴，并像许多美国人一样，留恋昔日美国的霸权岁月。在他决定领导美国人民的时候，国内经济混乱不堪，人民尚未从越南战争失败的忧伤和伊朗人质危机的羞辱中解脱出来。入主白宫后，他重新恢复了这个国家的自信及其对未来的信心，他正是人民所希望的具有领袖魅力的总统。里根的影响力使人想起了他早年的偶像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所起的作用。当美国人民因大萧条带来的难以忍受的灾难而惊慌失措的时候，罗斯福向他们保证说，除了“恐惧本身”，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恐惧的”，而且他们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1]

与罗斯福迥然不同的是，里根对这个长久以来美国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他不仅一无所知，而且毫无兴

[1] 卢·坎农：《总统里根——一生的角色》（纽约，1991年），该书是关于里根总统的结构最合理的专题研究。

趣。里根对诸如不同政府的政治方针等细节问题总是持厌烦和逃避的态度，外交政策专家为解释政策费尽了口舌，但往往还是劳而无功。对于简报，他不屑一顾，那些呈上来的复杂军事战略更是让他犯困。他通常会接受那些与其想法一致的观点，而且似乎还缺乏分析能力。然而，他担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和总统时期的大多数同僚都认为他大智若愚。卢·坎农——一位追踪里根政治生涯多年的记者——笔下的里根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聪明才智，在这方面，律师、教授与演员相比就只能甘拜下风了。[1]

或许比里根的奇思怪想更让人大伤脑筋的是他对如何施政漠不关心。虽然他希望当总统，希望向美国人民陈述他的观点，希望骑着白马[2]进入华盛顿来拯救他的国家，然而，在就职之后，他不但对如何处理政务提不起兴致，而且也非常不清楚、或者说不关心如何用总统权力使政府运转起来。在大多数问题上，他乐意授权给政府的其他成员，让他们做决策并决定如何付诸实施，曾几何时，他的演讲稿也由顾问们代劳准备，他的任务就是在公众面前表演一番。可以说，他的总统权力与寻常总统权力的概念已经大相径庭，但是，吉米·卡特确实多次对他羡慕不已。

里根对于外交事务并非没有自己的思想，然而，他的许多想法都来自他观看和参演的电影，在他眼中的世界里，美国率领的正义之师与苏联这个“邪恶帝国”进行着你死我活的较量。他认为苏联及其盟国就是“我们正与之交战”的敌人，他无论如何也要赢得这场战争。当时，对抗苏联就是里根了解和思考的美国对

---

① 坎农把哈佛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的理论精彩地运用到了他对里根的精神分析之中。参见卢·坎农：《总统里根——一生的角色》，第137—140页。

② 白马（white horse），是正义、力量与胜利的象征。《圣经》有言：“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红马代表战争，灰色马象征灾难与死亡。——译者

外政策的中心内容。他认为，正是20世纪70年代的缓和才催生了苏联的军事优势。他批评美苏签订的军备控制协议，尤其不能接受卡特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他声称苏联人在谈判所有这些条约时采用了欺骗手段，撒谎和欺骗乃是苏联领导人的拿手好戏。为抗衡这样的对手，美国只能诉诸于军事实力。里根决心重振国威，使美国重新赢得战胜苏联和安全无虞地击败其第三世界代理人的能力，重建美国作为世界支配性军事大国的地位。即使苏联人打算遵守条约义务，也要等到这样的时候到来之后才能对他们有所希冀。他鄙视苏联的政治制度，对美国能否与苏联达成和解疑虑重重。

尽管里根领导了非同寻常的军备建设，并以挑衅性的言辞闻名于世，但是，核武器令人生畏的破坏力还是令他万分紧张。当意识到美国仅仅靠威慑思想、靠拥有部署在海洋、天空、陆地上的足够数量的战略核武器来阻止苏联先发制人的打击时，他简直是惊骇莫名。从理论上讲，不管苏联怎样攻击，美国的核武器都足以报复并摧毁本可以继续存在的苏联，反之亦然。这样，两个超级大国的安全就只能依赖相互确保摧毁的思想了。在遭受第一轮打击后，由于任何一方所遗下的少量战略核武器都可以确保毁灭另一方，因此，进行这样的攻击已没有任何意义。至少从20世纪60年代苏联开发出确实有效的战略力量以来，威慑就一直是美国国防战略的核心思想，但是对罗纳德·里根来说，这还远远不够。他总是把核战争与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也就是世界的毁灭相提并论。因此，与控制相比，他更希望能销毁这些核武器，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目标，他就要尽其所能使美国免受苏联的核攻击。在1940年的一部影片《空中追杀》（Murder in the Air）中，里根饰演了一位保卫美国秘密武器——这种名为“惯量发射器”（inertia projector）的武器能在敌机抵达目标之前将其摧毁——的战士布瑞斯·班克瑞夫特。如今，为了延缓世界末日的

来临，里根必须要像他饰演的角色那样再次有所作为。假如没有核战争的话，美国仅仅凭借自由市场制度的力量就将最终使苏联人难以望其项背。

在入主白宫之后，里根及其周围的男女助手对如何展开行动心中依然没谱。实际上，他的政府用了两年时间才制定出对苏联政策的文件。1981 年，美国进入了自大萧条以来最可怕的经济衰退。像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的赫伯特·胡佛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样，里根及其助手把全部精力都置于解决国内危机之上，至于如何对付苏联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那就只能等以后再说了。

在这个间歇时期，里根总统依然言犹刺耳，但是，他的言论却与美国政府的行动大相背离。为了惩罚苏联红军入侵阿富汗，卡特总统对苏联施以粮食禁运。尽管里根对莫斯科的对手所持态度比卡特更为强硬，然而，他的第一个主要的外交政策行动却是取消粮食禁运。美国农场主在竞选中投票支持了罗纳德·里根，而且里根也对他们有过承诺。无论反共立场如何强硬，鉴于面临的国内外政治困境，里根没有费多少周折就对美苏妥协作出了合理的解释。里根本打算退出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然而，由于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其中的条款相当满意，而且对他所称的美国军队比不上苏联军队的言辞非常不满，他就只好改弦更张，继续勉强履行协议条款。

与此类似，里根总统发现他不能如此轻易地废止有关武器控制的谈判。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苏联新型中程导弹的部署引起了欧洲人的不安，鉴此，卡特同意于 20 世纪 80 年代在欧洲部署新一代的美制潘兴导弹和巡航导弹。苏联人因其拥有威胁西欧的武器而自鸣得意，但是，他们因美国要在欧洲部署威胁苏联的导弹而勃然大怒。为阻止美国计划的实施，苏联在欧洲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舆论攻势。事实上，阻止美国在西欧部署新的中程导弹已成为 1981 和 1982 苏联外交工作的头等大事。为了使自己免

受反对导弹部署的政治活动分子的攻击，打算要部署美国导弹的欧洲东道国政府需要展示其通过裁减军备求得安全的良好愿望和努力，它们认为有必要在部署新武器之前，敦促美国与苏联谈判，废除或削减两国部署在欧洲的中程导弹。里根别无选择，只好派出谈判人员加入中程导弹谈判（INF talks），与他们的苏联对手展开对话。此后不久，国会又迫使里根从拒绝重开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立场前后退。为了掩饰自己的退却，他就把这些谈判称为削减战略武器会谈。他的前任一直满足于通过限制新型武器的开发来控制军备竞赛，而里根却声称他要通过销毁核武器来扭转这一进程。[①]

1981 年的波兰危机为里根在西欧盟国的压力下的被迫退却提供了另一个例证。随着联合在以推翻共产党政权为诉求的团结工会运动周围的工人和知识分子力量的不断壮大，波兰在苏联人的压力下实行了军管。美国的反应是对波兰和苏联施以经济制裁，并要求它的北约盟国也照此行事。更有甚者，里根政府要求欧洲盟国停止援建苏联的天然气管道，以阻挠苏联向西欧出口天然气。西欧国家的反应使里根大为不满。按照华盛顿的指令，驻欧洲的美国公司取消了其主要业务，这个有欠合法的举动触怒了上述公司所在的西欧东道国家。在随之而来的争吵中，美国再次退却，天然气管道的建设得以重新展开。

里根似乎乐意一边大力推进军备竞赛，一边对苏联进行口诛笔伐。但是，他那位性子暴躁的国务卿阿尔·黑格[②]却主张使用其他方式展示美国的决心，也就是在全世界、尤其是在中美洲打击苏联。虽然大家普遍认为黑格渴望把古巴变成美国的后院

---

① 迈克尔·曼德尔鲍姆和斯特罗布·塔尔博特：《里根与戈尔巴乔夫》（纽约，1987 年）；雷蒙德·L. 加特霍夫：《缓和与对抗》（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1985 年），第 1023 页。

② 即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译者

(parking lot)，但他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萨尔瓦多，在这个有希望建立民主政府的孤独无助的国家里，充斥着嗜杀成性的右翼军官队与左翼游击队之间的不断争斗。左翼分子得到了古巴和推翻索摩查家族独裁统治的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持，右派分子虽然要为深孚众望、政治倾向温和的大主教罗梅罗被暗杀负责，而且与美国修女被谋杀有牵连，但还是得到了美国的援助。让自由民主同专制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此地一竞高低，这确实不是一个令人高兴的选择，但却是可行的选择，因为美国在那里的行动代价相对较小，而且也没有多少风险。如果说美国干预萨尔瓦多并未使莫斯科感到特别不安，它倒是向美国右翼势力表明，里根政府的反共产主义不只是说说而已。

当美国政府拒绝接受美苏军控谈判代表在1982年7月达成的非正式协定的时候，那些极端不信任苏联的人简直是欣喜若狂。保罗·尼采是杜鲁门政府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的主要起草人，也是当前危险委员会(CPD)[①]背后的推动力量，因此，他反对共产主义的盛名已确立很久了。保罗·尼采曾首次就卡特的军备控制计划给国家带来的威胁向美国人民发出过警报，而今他正是美国的谈判代表。尼采同他的苏联谈判对手到瑞士维也纳附近的森林中散步，并就中程导弹问题达成了一项妥协，[②]这使白宫大为苦恼，因为它并不希望取得任何协议。美国不愿接受上述协议使欧洲领导人忧心忡忡，但是，苏联人对这项

---

① 当前危险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研究美国安全及战略的民间机构，创建于1976年11月。带有浓厚的保守色彩，与军事—工业集团关系密切，其代表成员有保罗·尼采、迪安·腊斯克、乔治·舒尔茨、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等，主张加强军事实力，反对对苏缓和。——译者

② 有人称之为“林中散步方案”。——译者

安排的拒绝把里根总统从这个窘境中解脱了出来。[1]

执政伊始，里根就向全世界发出了更为明确的信息。在一种“不要惹我”[2] 的明确姿态下，美国海军飞行员拦截并击落了两架敢于在锡德拉湾——利比亚声称对其拥有主权的一个地区——向他们挑战的苏制利比亚喷气式飞机。卡特可能是这样的总统：他会把另一张脸送给别人去打，从而招致第三世界国家的蔑视。里根绝不会如此。美国将不会如此自缚手脚。里根警告说，“要使朋友与敌人都知道，美国不仅要这样说，而且有充足的力量这样做。”[3] 1982 年发生的另一件事情也反映了里根向海外投射美国力量的愿望，当时，他不顾国防部长的反对，命令美国海军陆战队开赴黎巴嫩，试图把秩序带给这个因遭受以色列侵略而陷入混乱、前途渺茫的国家。

尽管里根在选举运动中发表了敌视苏联的言论，而且也一直享有反对苏联的名望，但是，苏联领导人在 1980 年对卡特的怒气是如此之盛，以至于他们对里根的当选表示了欢迎。他们认为，里根一旦上台，就会像尼克松那样抛却积极的反共政策，脱下给人扣赤色帽子进行政治迫害的外衣，为缓和而努力工作。苏联在缓和岁月里受益匪浅，他们不愿看到缓和时代就这样寿终正寝。他们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得到了正式认可，还把影响扩展到了第三世界，更有甚者，在反弹道导弹条约中，他们获得了对

---

① 斯特罗布·塔尔博特：《致命的策略》（纽约，1984 年），第 116--151 页。

② “不要惹我”（don't tread on me），绘有盘卷的响尾蛇的黄色加兹登旗帜（the Gadsden flag）上的藐视性警语。1751 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一篇讽刺文章中指出，作为对英国把罪犯发配到殖民地的谢意，殖民地应该把响尾蛇送给英国人。随着反英独立运动的发展，响尾蛇旗广泛流行，究竟是谁在何时何地添加上述警语已不可考，该旗是 1775 年美国海军与海军陆战队创建的标志，成为美国追求独立与自由的象征。——译者

③ 引自雷蒙德·L. 加特霍夫：《缓和与对抗》，第 1060 页。

美国导弹的技术优势的限制。羸弱不堪的勃列日涅夫已经无力改弦更张，他希望以重开缓和来掩饰以下现实：里根的手段与尼克松迥然不同，它是对1980年卡特政府为苏联人一直坚决反对的所有对抗政策的进一步强化。在1982年去世之前，勃列日涅夫从未看到罗纳德·里根打算与苏联和解的一丝希望。①

勃列日涅夫去世时，其他苏联领导人已经认清了里根毫不妥协的立场，他们打算放弃任何与美国合作的期望。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等待里根退出历史舞台，盼望欧洲和美国都反对他的好战政策，盼望在1984年出现一位新的更有理智的美国总统。但是，更具深远意义的是以下征兆的出现：在征询下属的意见之后，勃列日涅夫的继任者尤里·安德罗波夫开始认识到，苏联的行为激发了美国的战斗精神；20世纪70年代苏联的军备扩张，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扩张主义政策可能被美国视为对它的威胁；苏联对"绝对"安全的追求可能是迫使美国重开军备竞赛的根源；为使美国政策发生有利于苏联的变化，苏联必须修正自己的行为。鉴此，安德罗波夫开始寻找出路。而且，通过对勃列日涅夫的无能和失职的深入剖析以及对苏联经济领域中的紧张状态、阿富汗战争和海外冒险的代价的检讨，安德罗波夫及其顾问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帝国已经扩张过度了。②

安德罗波夫主政苏联期间，肾衰竭慢慢地要了他的命，而此时恰逢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美苏关系最糟糕的岁月。为阻止美国部署新式中程导弹，苏联发起了一次外交攻势，但以屈辱的失败而告终。欧洲各国政府在克服国内的反对和履行批准手续

---

① 休厄林·比亚勒与琼·阿费里卡："里根与俄国"，《外交季刊》，第61卷（1982年之3），第249－271页。

② 迈克尔·曼德尔鲍姆和斯特罗布·塔尔博特：《里根与戈尔巴乔夫》，第24　25页；休厄林·比亚勒与琼·阿费里卡："里根与俄国"，《外交季刊》，第61卷（1982年之3）。

之后，一个接一个地为导弹的部署提供了地点。1983 年 11 月，为了把过错推给美国，苏联人退出了中程导弹的谈判。他们没有从中捞到任何好处。

美国明确表示要在防御武器方面进行一场新的“高科技”竞赛，对苏联领导层而言，最大的威胁也莫过于此。1983 年 3 月，里根在防止核武器使用方面的兴趣使他在丝毫没有知会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的情况下就突然宣布，美国将努力创建一个战略防御体系（SDI 或者“星球大战计划”）。里根总统谋划此事已有数年之久，当找到视之可行的科学家和军方领袖之后，他简直高兴极了。尽管那些支持该计划的总统助手要么视之为与苏联就裁减军备进行交易的筹码，要么视之为减少苏联首次核打击几率的有限反导弹防御的手段，里根总统却把它作为一面防止任何对美国的导弹攻击的盾牌。他的想法可能没有掺杂任何科学的想像。但是对政府的其他人而言，战略防御计划逐渐成为军备谈判的关键因素。像大多数美国科学家一样，苏联科学家也认为该计划荒谬绝伦，但是苏联领导人却不能冒险对它不屑一顾。一定要制止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或者说，苏联一定要在该计划的进展方面与美国一争高下，但这又是他们力所不及的任务。

这一年最糟糕的政治灾难，这个可能对任何美苏和解行动的最大打击发生在该年夏末。8 月 31 日，美国政府获悉，一架大韩民国的喷气式客机（韩国航空公司 007 航班）在从阿拉斯加飞往汉城的途中被苏联飞机击落了。机组人员和所有乘客，包括数名美国人均死于非命。苏联最初对击落客机一事加以否认。接着就推脱责任，说这是一架间谍飞机。美国情报机构侦听的情报表明，这架客机确实因迷途而误入苏联领空，而且苏联人的确把它误认为一架间谍飞机。里根因这一暴行而勃然大怒，于是向苏联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他虚伪地宣称，苏联人知道这是一架民用飞机，却仍然向它开火。在美苏关系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如果事实

表明美国的间谍飞机的确在该地区有过活动，那么，苏联的灾难性行动是可以理解的，或许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安德罗波夫不愿为此事负责，也不愿对这场灾难表示道歉，这种做法确实难以服人，里根为责难苏联人——他们在数年之后仍然坚持认为韩国航空公司 007 航班承担了为美国情报机构服务的使命——而蓄意歪曲证据也实属不必要的煽动。

这一年美国的主要失败发生在黎巴嫩，但是，苏联从美国在那里铸成的大错中并未捞到什么好处。1982 年 6 月，以色列人在黑格国务卿——他把以色列视为美国反对苏联及其支持者的代理人——的默许下侵入黎巴嫩。他们决心根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那里的庇护所，把南黎巴嫩变为使以色列免遭阿拉伯人攻击的缓冲地带。叙利亚尽管有苏联的武器支援，但仍然未能阻止以色列军队的推进。[①]

像世界上的许多人一样，里根对以色列的侵略感到震惊，以色列人坚持认为，他们正在保卫自己和肃清恐怖分子，但里根并不为之所动。当以色列人未能阻止其黎巴嫩的基督教盟友屠杀被困在难民营中的巴勒斯坦人时，里根派遣海军陆战队开赴黎巴嫩，试图维持贝鲁特的秩序。渐渐地，美国人被拖进了黎巴嫩不同派别的内部冲突，这些派别，包括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在叙利亚、以色列和伊朗等各类国家的支持下，为控制这个国家展开了殊死的争斗。在 1983 年 10 月的一天早晨，一个恐怖分子驾驶一辆满载炸药的卡车，避开美国的安全警戒，攻击了海军陆战队的营地并杀死 241 名美国人。里根随后只得把其余的海军陆战队队员撤到了离岸不太远的军舰上。

在一场冲突期间，美国军队被安置在一个难以防守的地方，许多生命就这样消失了。美国没有完成干预黎巴嫩的使命。由于

---

① 雷蒙德·L. 加特霍夫：《缓和与对抗》，第 1062 页。

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意图顾虑重重，苏联人没有直接卷入进来，但是，他们重新开始了对已成为黎巴嫩政治支配力量的叙利亚的援助。以色列人在脱身之前深陷于泥沼之中，耗费了许多月的时光和许多人的生命，其中除了阿拉伯人之外还有以色列人。黎巴嫩不再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国家，世界的目光于是又转移到了其他地区。

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撤离贝鲁特两天之后，美国军队进攻了格林纳达这个加勒比海国家，公开的原因是为了解救美国的医科学生，他们因相互敌对的马克思主义派别争夺对该岛的控制权而陷入困境。占压倒优势的美军粉碎了当地军队——其中包括数百名古巴人和为数不多的北朝鲜顾问——的抵抗，亲西方势力上台执政。苏联人从一开始就怀疑古巴人提及的格林纳达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不打算反对美国在此地炫耀武力。但是，里根通过此事再次向安德罗波夫发出了非常明确的信号。美国之鹰发出了尖利喊叫。美国开始加大了对苏联帝国的边缘地带的压力。

战略防御计划、韩国航空公司 007 航班事件的后果、美国在黎巴嫩和格林纳达的武力炫耀、以及新式导弹在欧洲的部署，如此等等，都向苏联领导人发出了警报：等着他们的是更加猛烈的对抗，而且这种对抗将伴随里根政府始终。力量的互动对苏联领导人日益不利，他们要求人民为即将到来的危机做好准备。事实上，在苏联对美国的忧虑开始定型之时，乔治·舒尔茨——1982 年年中取代黑格成为国务卿——已经开始要求里根总统在对付敌人时不要老是诉诸于上帝的旨意。安德罗波夫比勃列日涅夫幸运得多，因为在 1984 年 2 月去世之前，他就已经瞥见了更具希望的对美关系的曙光。

舒尔茨发现里根对到中国和苏联旅行很有兴趣，就向其建议说，在他访问任何一国之前，有必要改善美国与它的关系。里根称他并非不愿意降低这种紧张状态。经过舒尔茨的安排，1983

年2月，里根总统与苏联大使安纳托利·多勃雷宁进行了一次出人意料的谈话。里根表达了与苏联发展更具建设性关系的兴趣。苏联人也做出反应，允许在莫斯科美国大使馆避难的一群五旬节派[①]基督徒——里根曾表示过对此事的关注——在4月离开这个国家。但是，里根对苏联领导层的不信任压倒了任何其他考虑，到这一年结束也没有见到改变的迹象。舒尔茨坚持其和解提议，他争辩说，美国经济业已恢复，它正在重整军备，已经有能力进行谈判。舒尔茨的地位因民意测验的结果而得到强化，在选民看来，外交政策已经成为里根一个软肋。1984年1月，里根就未来的美苏关系发表了一个比较友好的演说，舒尔茨设法说服苏联外交部长安德列·葛罗米柯，使他相信里根总统是认真的。安德罗波夫回里根一封密信，表示愿意推动两位领袖之间的意见交流。[②]

鉴于安德罗波夫的去世和病怏怏的康斯坦丁·契尔年科的上台，莫斯科难以提出任何激动人心的动议。里根继续展示其友好姿态，并努力重开军备控制谈判。然而，在苏联得到一位强似美国总统的领袖之前，美苏关系不可能发生重大的变化。于是，舒尔茨和里根就把注意力转到战略三角的另一角——中国。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一直紧张，其部分原因是里根在上台之前未能认识到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一项战略资产。对美国右翼势力而言，蒋介石与“自由中国”（即台湾的中华民国）是重要象征，候选人里根为这些把尼克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和解视为重大背

① 五旬节派教会（Pentecostal Church），基督教新教宗派之一，19世纪发源于美国，强调直接灵感，信奉信仰治疗。五旬节（Pentecost），又称圣灵降临节，圣神降临节，降灵节，为基督教重大节日之一，是每年复活节后的第七个星期日亦即第五十日。——译者

② 唐·奥伯多弗：《从冷战到新时代的转折——美国与苏联（1983—1990）》（纽约，1991年），第15—77页。

叛的男男女女所包围。里根声称要恢复因卡特政府1979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中断的与中华民国的政治关系，他经常无缘无故地发表和作出冒犯邓小平政府的言论与姿态。里根的行为加剧了两国在美国继续售台武器上的分歧。尼克松、福特和卡特通过拉近美中关系反对苏联所赢得的优势面临着烟消云散的危险。[1]

副总统乔治·布什和国务卿黑格都曾造访中国，他们希望中国领导人相信，美国对建立一种合作性关系很感兴趣。中国方面继续与美国划清界限，在诸如联合国这样的公共论坛上拒绝支持美国的立场。1982年8月，两国在售台武器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也仅仅是掩盖了未能解决的分歧。舒尔茨从未认可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对中国战略地位的估计，但是他也承认两国友好关系的价值，尤其是如果两国的紧张关系因里根缄口不语而轻易得到缓解的话。他逐渐使里根明白了中美合作、尤其在搜集有关苏联情报问题上进行合作的范围与价值。里根于是就学着不再说他那大多声名狼藉的俏皮话。1984年4月，里根访问中国，这是他对一个共产党国家的首次短暂的访问。中国人以其特有的方式特别殷勤地款待他，此后他们再也没有因他而感到苦恼。他对此次旅行和受到的接待非常满意，在离开中国的时候，他对中国的生活方式抱有一种比事先可能认为的更加乐观的看法。两国的商业与文化关系繁荣起来。两国的政治关系再也没有向20世纪70年代末的状态发展。但是，随着美国力量的复兴，这种关系就不大可能再次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

1984年11月，美国人民再次选择罗纳德·里根来领导他们。在声望与权势臻于巅峰时，里根开始转向苏联，把寻求可能的和解作为他第二任期的中心任务。1985年1月，两国在日内

---

[1] 哈里·哈丁：《脆弱的关系》（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1992年），第107—119页；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纽约，1990年），第204—206页。

瓦启动军备控制谈判。3 月，契尔年科去世，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站到了前台，命中注定要成为 20 世纪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中的一员。

在勃列日涅夫垂垂将死的时候，苏联领导人就已经认识到，不仅经济已陷人困境、社会处于危机的边缘，他们的制度也失去了活力。科学院的研究机构提出了雪片般的要求改革的文章，而且为此提交了许多实施方案。安德罗波夫启动了改革的进程，然而，他那糟糕的身体状况使之难以取得大的进展。契尔年科则比较消极。到 1985 年 3 月，政治局准备选择一位年轻和充满活力的人来领导这个国家，他的目标就是实现苏联经济的现代化。

戈尔巴乔夫很清楚，要使苏联经济重获活力，就可能需要进行激进的变革。然而，他在政治局的虚弱地位，来自军方和文职官僚机构的抵制以及苏联普通劳动者的怀疑态度，都使他感到不能走得太快。苏联知识分子的支持给了他很大帮助，但是，笔杆子的力量在 1985 年似乎还不能主导苏联的发展方向。

戈尔巴乔夫（及其夫人）曾经作为游客到西方旅行过，他对苏联发展模式的优越性不抱任何幻想。他知道，抛开极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就社会发展水平而言，苏联与其说像一个西方的发达国家，不如说更像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它只是“拥有导弹的上沃尔特”[①]。他也知道，要想实现现代化，仅靠引进西方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接受西方的某些思想和价值观念。他必须摧毁通向西方公民社会的斯大林主义屏障，完成赫鲁晓夫未竟的事业。他必须极为小心地推动这项事业，既要避免保守势力的对抗性反应，也要防止向民主政治的冒进，因为那将会削弱苏联共产党的

---

① 德国总理施密特对苏联的评语。上沃尔特（Upper Volta）是西非国家布基纳法索的旧称，原为法国的殖民地，1960 年独立，1984 年改为现名，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译者

地位，苏联共产党毕竟是他的权力之源。

要使苏联实现现代化并增强其实力，就不能不付出高昂的代价。苏联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整个基础都已经腐烂或者说已经过时了，因此必须加以更换。他的同僚、尤其是军方领导人，对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和已成为北约力量组成部分的“高科技”防御装备深感恐惧。但是，他们又到哪里寻找参与这种竞争的金钱、物资和技术呢？戈尔巴乔夫实在是无力再增加军费开支了。

苏联当时的开支中还有对第三世界的援助，它极大地消耗着苏联现有的资源。一位美国分析家估计，苏联人在他们的海外朋友身上每年要用去 400 亿美元。[①] 戈尔巴乔夫及其顾问认为，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对外援助并没有为苏联赢得什么经济、战略、或者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优势。这些金钱不仅被浪费殆尽，而且还成为恶化美苏关系的一个主要刺激因素。虽然一些苏联领导人仍然坚持认为，苏联是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守护神，戈尔巴乔夫对这一点却疑虑重重。他看不到第三世界爆发革命性变革的任何可能。他所信赖的专家已经注意到，20 世纪 80 年代，在第三世界爆发的大多数民族解放运动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而且还反对苏联。[②]

在戈尔巴乔夫面临的难题中，阿富汗的战争尤其值得一提。这场战争消耗了苏联无数的生命和金钱，在国内也日益不得人心。苏联人没有从美国在越南的经验中学到任何东西，但是，阿富汗人首先让他们知道，在一个不发达国家的内战中取胜或者从

---

① 威廉·海兰：《致命的对抗》（纽约，1987 年），第 227—260 页。

② 伊丽莎白·K. 瓦尔克尼尔：《第三世界的革命性变革——苏联的近期评估》，《世界政治》，第 38 卷（1986 年），第 415—434 页；休厄林·比亚勒：《苏联与西方——安全与对外政策》，引自休厄林·比亚勒与迈克尔·曼德尔鲍姆：《戈尔巴乔夫的俄国与美国的对外政策》（科罗拉多州博尔德，1988 年），第 457—491 页。

这样的战争中抽身而退是多么的困难。更有甚者，这场战争使苏联遭到了几乎整个世界的谴责，使它在世界上更加孤立。他必须找到一条脱身之道。

简言之，戈尔巴乔夫需要从冷战中脱身并休整一个时期，以便将他的精力和国家的资源投入到苏联的建设之中，使之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有效率，他自认为能从美国和里根、这个共产主义与苏联的主要敌人那里赢得一个这样的休整时期。首先，戈尔巴乔夫相信苏联的安全是有保障的。勃列日涅夫已经给了他的继任者那么多的核武器，更多的核武器是不需要的，那不会使国家更加安全。苏联导弹的不断增加在美国引起了普遍的忧虑，使美国领导人缺乏安全感，因此又触发了新一轮的军备竞赛。戈尔巴乔夫是第一位理解“安全困境”的苏联领导人，也是第一位懂得如果美国没有安全苏联就不能获得安全的苏联领导人。其次，戈尔巴乔夫知道里根第一任期的军费支出已经导致了难以忍受的国家预算赤字，里根不可能把这种军备竞赛的速度维持下去。为了相互削减军费支出，美国人可能会接受苏联提议，签订一项军备控制协议。最后，他承认苏联醉心于保守秘密，天生需要掩饰自己的弱点，到处制造事端致人紧张，上述特点为他人夸大苏联军事能力和误解苏联意图提供了空间。他准备把苏联社会打开一条缝，甚至还打算考虑接受美国一直要求的现场核查。[①]

里根与世界上其他领导人对戈尔巴乔夫打算着手的非凡行动方针没有做好准备。当这位苏联领导人公开其计划的时候，美国

---

① 休厄林·比亚勒：《苏联与西方——安全与对外政策》，引自休厄林·比亚勒与迈克尔·曼德尔鲍姆：《戈尔巴乔夫的俄国与美国的对外政策》，第457—491页；伊丽莎白·K. 瓦尔克尼尔：《第三世界的革命性变革——苏联的近期评估》，《世界政治》，第38卷（1986年），第415—434页；西莱斯特·A. 沃兰德：《苏联军事思想中的第三世界冲突——新思维的苏联是否已未老先衰?》，《世界政治》，第42卷（1989年），第30—63页。

人认为，帮助他建设一个现代化、高效的苏联经济和一个更强大的苏联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那些怀疑苏联的人在继续观望。在这样一个间歇时期，里根仍然坚持不懈地继续努力，以图击退苏联的影响。“里根主义”——援助那些试图推翻第三世界共产党或者亲苏联政权的势力——的贯彻得到了强化。在1982年的尼加拉瓜，中央情报局以训练和装备反政府武装分子——里根总统喜欢称之为“自由战士”——为开端，卷入了反对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政权的战争。尼加拉瓜是这场战役的核心战场，但是，在阿富汗、安哥拉、柬埔寨以及许多其他遥远地区，只要有人反对苏联支持的政府，美国就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加以援助。在国会试图限制行政当局的时候，里根总统的属下就以秘密手段募集资金，游说富有的海外朋友，比如沙特王室成员或者文莱苏丹提供财政支持。在以色列人的配合下，国家安全委员会里的狂热分子决定把武器非法和秘密地出售给伊朗人，甚至以色列人、最终还有伊朗人都卷入其中。他们把出售武器的款项拿来资助反桑地诺分子，从而违反了国会和美国宪法的宗旨。里根好像对以其名义所做的事情茫然不知，但是，等到“伊朗门丑闻”[①]在1986年被公之于众后，他的地位受到了严重削弱。

苏联人仍然继续着在阿富汗的战争，继续支持入侵柬埔寨的越南人，继续援助安哥拉政府反对它的敌人，但是，他们不再向尼加拉瓜提供米格式战斗机，而且还建议古巴人保持克制。戈尔巴乔夫有更重要的考虑，他希望就军备控制达成一项协议，还希望通过与里根的会见来推动这一进程，并劝说这位美国总统放弃他那耗资巨大的有关战略防御的奇思妙想。1985年11月，里根

① “伊朗门丑闻”（Iran—Contra scandal），亦可译为“伊朗—反桑地诺派丑闻”或者“伊朗—尼加拉瓜反政府组织丑闻”，但不能译为“伊朗—孔特拉丑闻”。——译者

和戈尔巴乔夫前往日内瓦，举行了里根与苏联领导人之间的首次会晤。

里根蔑视和不信任共产党领导人，而且在观念上憎恨这个“邪恶帝国”。然而，在与普通民众、与诸如多勃雷宁和葛罗米柯这样的单个苏联公民接触时，他的态度却截然不同。他发现戈尔巴乔夫与他本人一样，具有一种讨人喜欢、充满自信、决心要保卫其国家利益以及急于避免核灾难的男子汉气概，通过在日内瓦和此后的数次会晤，两人找到了共同的立场。一方对另一方的固执有时也会恼怒或者失去耐心，但是，他们之间和他们国家之间的敌意却在逐渐降低。因十足的相互吹捧而如此经常受到职业外交家和学者们嘲弄的峰会外交，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证明是一种极为有效的解决问题之道。如果没有会面，没有与他展开争论，没有分担他的希望与忧虑，里根就不可能慢慢地信任戈尔巴乔夫。①

在首次会晤期间，除了建立一种个人关系之外，戈尔巴乔夫和里根没有取得什么成果。美国人不打算认真地对待苏联提出的激动人心的倡议，里根仍然坚持推进他的战略防御计划。但是，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实行的变革和结束军备竞赛的建议使全世界都震惊不已。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公开表示愿意放弃前任在中程导弹问题上的僵硬立场，大体按美国的条件签署中程导弹条约；他愿意接受对以前不容谈判的洲际弹道导弹——苏联军方是如此的珍爱而他们的美国对手是如此地不安——的限制；他还表示准备调整欧洲的常规力量平衡，重新部署苏联军队，改变威胁西方及威胁一个防御性国家的传统进攻性姿态。他向苏联人民解释说，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在世界事务中已经不

① 尤其要参见唐·奥伯多弗：《从冷战到新时代的转折——美国与苏联(1983—1990)》，第 139—154 页。

再具有决定性意义，需要找出一条出路，使美苏两国都感到安全，超级大国的目标必须是共同安全。戈尔巴乔夫准备冒险降服他的军方领导人。他决心结束西方对苏联威胁的认识，与里根达成军备控制协定，避免为追求战略防御优势而进行对抗。[①]

美国的反应不能不让这位苏联领袖深感失望。4月，美国飞机攻击了利比亚，其目的就是为了杀死卡扎菲，美国认为利比亚与欧洲的一起恐怖行动有牵连，所以就施行了报复。而这位利比亚领导人与苏联有着密切的关系。几乎同时，里根命令中央情报局向阿富汗抵抗力量提供肩扛式毒刺防空导弹，阿富汗人很快就用它击落了数架苏联直升飞机。美国还向苏联的第三世界朋友不断地加大压力。5月，里根宣布，美国将不再受制于未获批准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在苏联领导人摇动橄榄枝并努力转向防御之时，美国却变得越发危险了。

几乎同时，亦即1986年4月末，苏联遭受了毁灭性打击，戈尔巴乔夫因一次核事故、即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爆炸而不知所措，苏联领导人对这次危机的处理笨拙无比，大多数苏联公民从国外的广播中才得知这次爆炸及其对他们的威胁。戈尔巴乔夫几乎用了3周才发表一项声明，他在声明中愤怒地反驳了西方对这次灾难的规模的估计。这位苏联领导人曾许诺要开放苏联社会，而且还大谈其公开性（glasnost），但是，在西方看来，上述插曲却表明，事情并非如此。

8月，另一个冷战事件提醒世人，斯大林主义在苏联仍未消失，它使这位苏联领导人在西方建立信誉的努力毁于一旦。根纳季·扎哈罗夫，一位在联合国工作的苏联官员，在一次收买秘密

---

① 罗伯特·莱格沃尔德：《战争，武器与苏联的对外政策》，引自休厄林·比亚勒与迈克尔·曼德尔鲍姆：《戈尔巴乔夫的俄国与美国的对外政策》，第118－119页。

文件的行动中于纽约被捕。这几乎算不上一个重要的事件。实际上，在1986年，已经有若干起更惊人的事件被披露出来，其中有美国的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以及军方职员叛投苏联。然而，在扎哈罗夫被捕后的那一周，苏联政府进行了报复，捏造罪名陷害尼古拉斯·丹尼洛夫——一位深受尊敬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驻莫斯科记者。里根致信戈尔巴乔夫，以总统的身份亲自向他保证丹尼洛夫不是间谍，但后者置之不理，这下可把美国人气坏了，高峰会议的准备工作一时间也受到影响。在一番唇枪舌剑之后，舒尔茨和苏联外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丹尼洛夫被宣布无罪，扎哈罗夫在申明对被控罪名不作抗辩之后被驱逐出境。

10月，为了提升他们在国内的政治声望，两位超级大国的领袖都认为有必要取得某些戏剧性的突破。戈尔巴乔夫在国内外都拿不出什么东西来推动他的计划，里根也开始失去他的魔力。尽管美国人民依然热爱里根，但是，国会急剧削减了他提出的国防开支，接着又推翻了他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制裁的否决。如果民主党人在11月的选举中赢得了控制参议院的足够席位，他在剩下的两年执政期间将可能困难重重。里根希望通过向伊朗出售武器使黎巴嫩亲伊朗恐怖分子释放他们手中的美国人质，借此实现一个“十月惊奇”[①]，也就是使选民备受鼓舞的出人意料的胜利，但是，在实施计划时却急中出错，诸事不谐。戈尔巴乔夫和里根都希望，他们在冰岛的雷克雅未克会议上达成的主要协议将会使他们的政治处境得到改善。

戈尔巴乔夫要求进行这次会晤，希望能通过与里根的直接对

---

① “十月惊奇”(October surprise)，美国11月初的大选前夕实施的出其不意但却受欢迎的竞选行动，卡特总统在1980年大选前曾经力促伊朗释放人质，但未能成功。——译者

话达成一项限制战略防御计划的协议。他准备为此作出重大让步。他建议在5年内削减50%的战略导弹数量，从欧洲撤走美苏两国的中程导弹，并在10年之内销毁所有的弹道导弹，所有这些使里根兴趣大增。戈尔巴乔夫不再提及苏联此前为达成协议提出的条件，甚至还答应了战略防御计划的实验室研究。里根表明了接受戈尔巴乔夫建议的意愿，但是，等到他明白战略防御计划将被限制在实验室的时候，他就变卦了。

雷克雅未克峰会在战略防御计划上翻了船，然而很明显，战略防御计划对苏联提出军备控制的建议起了推动作用。他们明确表示要向前迈进，这对他们来说还是第一次。里根在战略防御计划上的固执态度和他在理解某些问题上的迟钝无知交织在一起——正如他同意放弃欧洲安全所大致依赖的导弹那样——时间把事情搞得更加复杂，但美国谈判人员意识到，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实际上已经隐约可见了。[1]

此后数月是里根的一个困难时期。共和党人在这次中期选举中彻底失去了对参议院的控制，"伊朗门丑闻"爆发了，它揭示出了总统与恐怖分子打交道的意愿、他的属下对法律的蔑视以及他偏离政府合法运转轨道的程度。里根从未失去民众对他的爱戴，但是他们开始对他受到限制的能力持一种更为现实的估计。在1987年年初的那些日子里，他的总统职位失去了道德和精神支柱。里根总统于是就随波逐流。

另一方面，为了继续保持对苏联国家机器的控制，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更努力和更迅疾地前行。他试图以苏联的退让换取里根停止其战略防御计划，但结果却劳而无功。2月，他在没有提及战略防御计划的情况下建议销毁中程导弹。那些最不愿意接受军

---

① 迈克尔·曼德尔鲍姆与斯特罗布·塔尔博特：《里根与戈尔巴乔夫》，第163页。

备控制协议的顾问要求里根对戈尔巴乔夫的建议作出友善回应，但要以苏联接受它一直拒绝的闯入式核查为条件。当苏联答应了这个条件后，他们不仅仅是吃惊，简直就被惊呆了。讨价还价用去了数月的时间，在此期间，戈尔巴乔夫击退了莫斯科的反对派，为加强他在政治局和军队中的力量而不断玩弄政治手腕，但是，舒尔茨和谢瓦尔德纳泽在 11 月就核查程序达成一致，12 月，戈尔巴乔夫前往华盛顿，在那里与里根签署了一个重要协定，即中程导弹条约，以便销毁 2500 多枚中程导弹。核查安排是如此的彻底，以至于美国官员开始担心苏联的核查人员会得知美国正在发生的太多的情况。[1]

苏联实行激进新方针的迹象在迅速增加。在国内，违犯人权的情况陡然减少，持不同政见者和所谓的犹太人移民从流放地和监狱中被释放出来。在政府的支持下，俄国的东正教会举行仪式，纪念基督教传入俄国 1000 周年。全国上下，教堂被整饰一新并重新开放。对苏联制度的批评日益为人所接受。戈尔巴乔夫选择在布尔什维克革命 70 周年的纪念日谴责了斯大林主义传统，赞扬了一些斯大林的受害者。对 1939 年苏德条约的控诉在波罗的海共和国也开始出现。戈尔巴乔夫建立以非中央极权经济为目标的改革方案得到了批准。在对外政策领域，苏联向以色列人伸出橄榄枝，还表达了从阿富汗撤军的意向。

1988 年 3 月，苏联军队开始撤离阿富汗，5 月，驻蒙古的苏联军队开始回国，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苏联军队撤出东欧的传言也已经出现。另外，罗纳德·里根于 5 月前往莫斯科，去交换中程导弹条约的批准书。民意测验显示，只有 30 %的美国人仍然把苏联视为敌人，里根也高兴地承认，苏联已不再是一个“邪恶

---

① 唐·奥伯多弗：《从冷战到新时代的转折——美国与苏联（1983-1990）》，第 233－234 页。

帝国”了。12月，在继承人乔治·布什被国人选中接替里根之后，戈尔巴乔夫飞赴纽约，在联合国宣布他将——单方面——裁军50万人，裁撤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军队编制，改变驻东欧的其余苏联红军的结构，使之成为一支防御性力量，以消除对西方的威胁。为了进一步表达他的良好愿望，戈尔巴乔夫与美国一起向古巴人施加压力，以迫使他们从安哥拉撤军。正如他向当选总统布什所解释的，苏联内部的危机使他别无选择。苏联人已无力支撑起一个帝国了。[①]

苏联帝国的崩溃来得比任何人可能想像得都要快得多。当多米诺骨牌倒向克里姆林宫的时候，美国与东欧和苏联国内的情况几乎没有什么牵连。世界第一流的分析家所认为的难以想像的事情接连发生，自由降临到了东欧和苏联的许多地区，两个德国重新统一，而且在某一天，苏联也消失了。冷战无疑已经结束，美国受到了极大的削弱，但它还能够摇摇晃晃地站着宣布胜利。

戈尔巴乔夫的国内政策使整个共产党世界的改革者都深受鼓舞。1968年，勃列日涅夫镇压了布拉格之春，恫吓所有以“带有人道色彩的共产主义”为诉求的改革运动。现在，当克里姆林宫鼓励共产党世界向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和改革方针看齐时，该轮到守旧的斯大林主义分子发抖了。1989年3月，苏联举行了它历史上最自由的选举，许多苏联共产党的中坚分子在竞争人民代表大会的席位时名落孙山。4月，安德列·萨哈罗夫——苏联最伟大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苏联人权斗士的象征，由戈尔巴乔夫下令结束流放生活恢复自由——被苏联科学院推举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苏联不是民主国家，甚至也不是戈尔巴乔夫心目中的民主国家，但是，苏联正在变化，目标也

---

① 唐·奥伯多弗：《从冷战到新时代的转折——美国与苏联（1983—1990）》，第294—318页。

很明确，而且，为了强调这一点，苏联的军队和坦克开始撤出波兰、匈牙利和东德。

东欧共产党政府被迫作出了自己的选择。7月，华沙条约国会议在会后发表的公报宣布，“世界上没有统一的社会主义模式”。戈尔巴乔夫表示苏联不会干预波兰，在这个国家，重振旗鼓的团结工会运动几乎就要击败共产党政权。在匈牙利，改革派共产党人正在使经济脱离社会主义模式，向反对党开放政治。8月，当波兰共产党人为挽回权力而向戈尔巴乔夫惊惶失措地求援时，他则建议他们撒手。

正如波兰发生的惊人事件一样，东德上演了更为壮观的戏剧性事件。9月，匈牙利政府作出重大决定，允许东德难民通过他们的边界逃往西方，这就违反了它与东德政权之间的一项协议。东德诉请莫斯科裁决，但后者置之不理。已经没有现成的新围墙来阻拦追求自由的东德人了。戈尔巴乔夫的发言人评论说，匈牙利的决定与苏联无关，苏联不打算干预。匈牙利共产党人摇身一变成为社会民主党人，打开大门让东德人过境。大规模示威游行席卷整个东德，数十万东德人走上街头要求民主和自由，要求与西德合并。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埃里克·昂纳克打算镇压莱比锡的群众示威。但是，他的属下拒绝了向人民开枪的命令。11月，共产党政权被迫打开了柏林墙的通道，这个把德国和欧洲分开的、冷战的可憎象征被摧毁了。苏联没有干预。

很快，捷克人民再一次走上街头，共产党政权垮台了。亚历山大·杜布切克，这位1968年自由化运动的领导人，返回政坛并被选为国会主席，持不同政见者和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当选为总统。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人民也奋起反抗他们的共产党统治者。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独裁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试图镇压人民的反抗。虽然人民并未支配政党机构，但是，作为新政权所称的改良主义意向的一种保证，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妻子还是

被处决了。

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为罗斯福在雅尔塔勉强承认，长期以来被莫斯科视为它生死攸关的利益——就这样消失了。在波兰、匈牙利、德国以及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解放了他们自己，但是，正是戈尔巴乔夫此人，通过展示其希望保守派共产党领导人下台的意愿，才打开了通往自由的大门。他固然不愿看到共产党人被彻底抛弃，而且对像他这样的改革派共产党人仍然执政可能还抱有极大的信心。但是，直至在这种激烈的转变开始威胁到苏联自身的生存之前，他都没有作出任何努力加以抵制。

在苏联帝国广袤的国土上，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司空见惯，种族、语言和宗教矛盾在一种严酷的少数民族政策下被人为地掩盖了，苏联关于现存文化多样性的规定充其量也只是口惠而实不至。冲突时常发生，但基本上都被苏联领导人无情地镇压下去。当戈尔巴乔夫试图开放苏联社会、试图给予多元化一定程度的合法性的时候，长期焖烧的分离主义运动和种族暴力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波罗的海共和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成为一个特殊的难题。它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享有独立地位，但是，作为 1939 年与希特勒的协定——亦即臭名昭著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组成部分，被斯大林先予以占领，而后又加之以吞并。到了 1989 年，谈论该条约已经不受禁止，苏联政府业已承认自己，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了斯大林所犯下的罪过。显而易见，对波罗的海诸民族而言，下一步就是谴责这个条约并要求独立。戈尔巴乔夫在这里划定了最后的界限：如果允许波罗的海共和国宣布独立，那他怎样阻止乌克兰、格鲁吉亚、或者任何其他存在着强大分离主义运动的共和国也如此行事呢？戈尔巴乔夫也许很好地诠释了温斯顿·邱吉尔：他不想成为主持苏联帝国灭亡的苏联总统。

正值戈尔巴乔夫试图威胁和哄骗波罗的海共和国保留在剩余

苏联版图之内的时候，他与美国的麻烦又来了。美国居住着数量众多而又直言不讳的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而且还有不少美国人不信任苏联。对波罗的海共和国诉诸武力将不仅会损害戈尔巴乔夫表现的善意，而且还会给乔治·布什带来相当大的要求反对苏联的压力，与里根相比，布什最终在接受苏联的新形象时更加迟疑不决。戈尔巴乔夫企图在不疏远美国的前提下牢牢控制波罗的海共和国，但是，鉴于立陶宛独立运动拒不妥协的态度和苏联军队中反立陶宛的俄罗斯人的好战精神，他失败的命运可能从一开始就底定了。

一年过去了，其间经历了难以置信的骚乱、苏联帝国的崩溃和苏联自身的解体，戈尔巴乔夫一直努力地争取美国总统的帮助，但却劳而无功。戈尔巴乔夫表示，为了最好地消除任何敌意，他愿意对苏联的常规力量进行不对等的大规模撤减。谢瓦尔德纳泽在怀俄明州与布什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一道垂钓，他向后者剖白心迹，承认苏联犯下的罪过和错误，发誓要好好做事。戈尔巴乔夫表示，他希望苏联融入世界经济之中，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受斯大林在 1945 年所拒绝的条件。布什于是就顺水推舟。最后，这年的 10 月，在马耳他，两人在他们的首次高峰会议上聚首。布什一开始就采取主动并保证支持戈尔巴乔夫，他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基本立场：在对最惠国待遇不加任何限制的条件下，他打算就美苏贸易协定展开谈判，美国支持苏联加入国际经济秩序的努力。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的经济战争即将在 1990 年宣告结束。而且，美国还准备响应戈尔巴乔夫推动军备控制和裁减军队的愿望。作为回报，戈尔巴乔夫强调要与美国建立一种伙伴关系：为了钳制德国人，苏联人现在期望美国保持其在欧洲的存在。这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

联盟的复兴，但是，美国与苏联停止了相互间的对抗。[1]

有关德国和波罗的海共和国的紧张状态一直持续到 1990 年。美国与苏联都不急于见到一个统一的德国，但是它们缺乏抵制这种合并（Anschluss）[2] 的力量。西德的经济与政治力量决定了合并的时机和条件。德国领导人同意 4 大国——英国、法国、苏联和美国——参加讨论，以决定德国统一的方式，他们对德国的现有边界表示满意，并就此作出了适当的保证。德国人还表示愿意向苏联提供它所急需的经济援助。尽管不太情愿，戈尔巴乔夫还是首先接受了德国的合并，接着又同意一个统一的德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问题依然棘手，但是，在清楚了戈尔巴乔夫的两难处境和他所承受的来自军方与极端民族主义者不断增长的压力之后，布什就克制了对他的批评。戈尔巴乔夫虽然心存感激，但是在减少美国的不满方面依然无所事事。

决定性的考验出现在 1990 年 8 月，美国由于伊拉克人侵和占领科威特而展开了与它的对抗。新的美苏关系成功地经受了这次考验。经过些许的犹豫，苏联最终抛弃了它长期的阿拉伯朋友，站到了美国一边。只剩下苏联装备和训练的伊拉克军队在孤军作战，结果遭受了义愤填膺的美国及其欧洲和阿拉伯盟友军队的重创。甚至像布什这样以缺少“想像力”为荣的人，也以满腔的激情预言世界新秩序的到来。

对戈尔巴乔夫而言，冷战的结束使他当之无愧地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是，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在国内却未能赢得什么荣誉。无论是他的外交功绩还是他的改革（perestroika），都没有

---

[1] 唐·奥伯多弗：《从冷战到新时代的转折——美国与苏联（1983—1990）》，第 374—383 页。

[2] *Anschluss*，德语，“联合、合并”之意，尤指 1938 年纳粹德国对奥地利的吞并。——译者

为他的人民带来物质上的实惠，他也未能作任何事情去改善苏联人民糟糕的经济状况。他在狂风巨浪中左突右冲，开始时朝着一个方向航行，然后又转到另一个方向，他尽管作出了卓绝的努力，但最终还是未能安然冲出风暴。1991 年 8 月，他在一次保守分子发动的政变中被废黜，并被监禁在克里米亚。数日之后，政变领导人发现，军队拒绝镇压聚集在鲍里斯·叶利钦——一位戈尔巴乔夫曾经的支持者，后来成为要求进行更激进改革的象征——周围的数千名示威者。戈尔巴乔夫返回莫斯科，然而大势已去，以改革为诉求的共产主义在苏联已经寿终正寝。波罗的海国家立即宣布独立，在莫斯科没有干预的情况下获得了成功。加盟共和国一个接一个宣布独立，共产党被剥夺了合法地位，戈尔巴乔夫已经没有帝国、没有国家、接着又没有政府可供其统治了。这一年结束前夕，鲍里斯·叶利钦作为俄罗斯共和国的民选总统进驻克里姆林宫，戈尔巴乔夫被迫提前退休。1991 年 12 月 31 日，苏联正式停止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组织松散的独立国家联合体。

冷战结束后，美利坚合众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它在经济、意识形态以及政治方面都取得了胜利。它还避开了与主要对手进行最终的直接军事对抗、也许是核对抗的考验。使人不解的是，很少有美国人放下手中的活计去庆祝这场胜利。他们发现，他们的生活质量实际上在不断下降而非日益改善，他们的经济，也就是苏联、东欧以及第三世界所艳羡的对象，已经陷入困境。他们需要面对的是日渐衰败的工业基础和运输体系、浪费成千上万民众终生积蓄的腐败的金融体系、大规模的失业以及随处可见的无家可归者。由于里根政府一味扩充美国的军事力量而没有要求美国人民掏腰包，赤字上升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使得政府无法应对国内的经济危机，也无法满足不那么幸运的选民的需求。昔日，这个国家是世界获得投资资金的主要源泉，是世界上

首屈一指的债主，到了1985年，它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人，只有依靠日本、德国以及阿拉伯产油国才得以正常运转。在1991年反对伊拉克的战争中，美国不得不号召外国政府捐赠款项来应付战争的开销，它已经不再为海外穷国和本国人民必须的服务提供足够的援助。选民的冷漠侵蚀了美国选举制度的价值。种族主义正在下面而且就在正下方慢慢地沸腾，以令人极为不安的频率不断爆发出来。更有甚者，作为未来的不祥的预兆，国际考试表明，在数学和科学技能方面，美国儿童已经被大多数的西欧和日本孩子远远抛到了后面。

一些分析家，名望最著的如保罗·肯尼迪和戴维·卡利奥曾经提醒说，美国正在衰落，它因帝国的过分扩张而深受其害。或者说，美国领导人至少缺乏政治意志和勇气，去请求人民做出必要的牺牲，为他们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重建这个国家。[①] 但是，美国赢得了冷战，它仍然是世界上的头号国家。

---

①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纽约，1987年）；戴维·P. 卡利奥：《紧迫的经济》（马萨诸塞州堪布里奇，1982年）。

第九章　结语：1945—1991 年的美国和世界

本书评述的时代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数月，终结于苏联的解体。美苏对抗是这个时代国际政治图景的主线。美国和苏联在反对轴心国的战争中结为同盟，它们在 1945 年粉碎了共同的敌人，以胜利者的形象脱颖而出，双方仅视对方为可以信赖的对手。此后的 45 年就是约翰·刘易斯·盖迪斯所说的“长期的和平”时期，因为这两大帝国虽然相互竞争，但并没有发生直接的冲突。[①] 随之是苏联帝国的崩溃，而且是一旦逝去，永不复返。

这个时期之所以还引人注目，其原因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所有殖民帝国的瓦解和非洲、亚洲、拉丁美洲数十个新独立国家的出现。每一个新独立的国家都在努力地界定自我，竭力寻求哪怕是一丁点的财富和权力，在此过程中，它对世界事务的潮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作用有时难以察觉，但在更多的时候却是如此明显，以至于能迫使两大国或者其中之一改弦易辙。世界上的动乱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对任何一个国家——即使该国力量能与美国比肩——而言，也很难实现其霸权目标。当中国的军事力量得到增强、当日本、韩国和东盟国家显示出它们的经济活力时，世界权势的中心由此发生了转移。日本和德国作为重要

① 约翰·刘易斯·盖迪斯：《长期的和平》（牛津，1987 年）。

力量重新出现在世界舞台，欧洲共同体不断得到巩固，这些也是阻止超级大国骄傲自满的重要发展趋势。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正如苏联领导人——他们当中已经没有什么人仍然梦想着社会主义乌托邦——受到他们所认为的资本帝国主义的敌意的激励一样，反共产主义也是驱使美国人采取行动的发动机。当苏联力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70年代不断增强时，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担心也与日俱增。随着20世纪80年代晚期苏联社会的开放，即使像里根这样的理论家也准备与从前的“邪恶帝国”合作。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美国领导人失去了确定新航向的能力，并且行动茫无目标。但是，苏联统治集团的残存力量、也就是在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仍然掌权的那些人，对他们孜孜以求的目标有一种更为清醒的意识，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这个时代肇始之初，斯大林拒绝签署布雷顿森林协定，拒绝参加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当这个时代结束时，他的继承者则不停地乞求加入这些组织，而当此之时，那些有志于领导美国的人却正在谈论抛弃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

或许使人最不可思议的是，该时代刚刚开始的时候，美国是世人曾经知道的最大的经济力量。他既帮助盟友，也慷慨地帮助以前的敌人，在反对苏联的斗争中用巨额财富结交朋友。然而，当这个时代结束之时，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备受困扰的美国外交官员，受命保护本国缺少竞争力的工业，全力以赴去说服日本限制其对美国的出口，并要求日本为进口打开大门。而且，美国总统不得不恳请其他国家提供资助，为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助上一臂之力。

美国和苏联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为什么采取相互威胁的态势？这种态势为何能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我们可以用三种相互交叉的研究方法，得出三个方面的答案。首先是美国

领导人接受其瞩目的大国责任，领导世界以及创造一个新世界秩序的决心。其次，美苏两国的特性造成了一国公民社会的过分行为（美国的强势国家和弱势政府模式），而另一国则不存在这种公民社会（高度极权的斯大林主义政治体制）。第三是“安全困境”。

如果美国没有领导世界的决心，冷战的出现是难以想像的。如果美国选择了一些知识分子在 20 世纪 30 年代提倡的“大陆主义”[①] 观念或另一些知识分子在 20 世纪 60 年代所力主的自给自足政策，那么，战后世界的发展动力将极为不同。但是，一代人之久的美国领导人都得出了以下结论：正是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逃避领导世界的责任，才使阿道夫·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得以暂时横行，才使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现实。联想到桑塔亚那[②]“忘却过去者注定要重蹈覆辙”之格言，他们从历史学家那儿汲取了教训，并开始在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把它们应用到实践之中。

他们的目标是创造一个增进美国利益的世界秩序。在这个世界秩序里，美国的财富和权势将会不断增长，美国人所珍视的价值观念将扩展到整个世界。具体而论，他们创设了一个奠基于能给所有人带来财富的自由贸易和稳定的货币汇率之上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在他们展望的世界中，没有军国主义立足的空间，诉诸武力不再合乎历史的潮流。在理查德·罗斯克兰斯所描述的国际体系中，经济能力而不是赤裸裸的武力居于支配地位，这种体系与他们的设想颇为近似，虽然他们所设想的是美国而非

① 大陆主义（continentalism），指倾向本州各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合作并带有排斥其他大陆性质的政策。——译者

② 即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1863—1952），美国诗人和哲学家，生于西班牙。——译者

德国和日本的经济能力。[1]

布雷顿森林协定的宗旨就是把这个蓝图变为现实。该协定无疑是为美国的长远利益服务的，但是，无论国内还是海外，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正在采取一种负责任和慷慨大度的立场，这将造福于那些加入该体系、也就是接受美国霸权的国家。

布雷顿森林协定也有助于解释强势国家弱势政府的概念。该协定是由那些在1944年掌控政府机器的人设计的，它不仅服务于美国的海外利益，也是为了抢先下手，制约那些时常阻挠美国领导人实践其国家利益思想的特殊利益集团。1944年，政府行政部门打算在反对力量（主要是贸易保护主义者，他们主要通过国会起作用）行动之前建立一种特殊的经济体制。行政部门在战争期间能比较容易得到实践其意愿的更大权力，而且，当代美国事务的研究者将会注意到，行政部门是多么经常地企图按照战时情况来索取它在其他情况下不能行使的权力。

苏联不参加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决定在当时未被视为一个严重的打击，英国人仍然是世界经济中的几个主要角色之一。但是，一旦考虑到罗斯福控制得更为牢固的战略计划，苏联毫无疑问就成了一个重要角色。在美苏之间存在着一代人之久的、而且基本上是意识形态的敌对，但是两国之间并没有生死攸关的利害冲突。他们一致同意击败德国和日本，更有甚者，罗斯福几乎是毫无保留地承认了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

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问题也为美国的政府结构如何限制总统——即使他是一位强势总统——提供了另一个解释，同样重要的是，它还说明了斯大林主义制度的野蛮与残忍如何排除一个可接受的解决办法。罗斯福未费多少周折就解决波兰的民族自决权与苏联增进其安全的权力之间的冲突。波兰人在20世纪30年代

① 理查德·罗斯克兰斯：《贸易国的兴起》（纽约，1986年）。

的所作所为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好印象：他们与希特勒一唱一和，他们迫害犹太人，他们在慕尼黑会议之后还攫取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部分领土。苏联力量对战胜纳粹德国是必不可少的，对于保持战后世界和平也是至关重要的。但是，鉴于美国政治体制的性质，罗斯福需要斯大林的某些帮助。他需要苏联支持他所珍爱的民族自决原则，也需要苏联在总体上对东欧国家、特别是对波兰持一种宽宏大量的态度（就像美国打算对毕竟还是战败国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要做的那样）。但是，正当美国制度急需苏联对波兰实行温和统治时，斯大林主义制度的紧急需求却起到了阻碍作用。

在战争末期，苏联对美国意图的疑虑，加之它对美国优势力量的了解以及对西方敌视苏联的记忆，推动着斯大林和他的同僚采取行动，去强化他们的安全。当“安全困境”——一国安全的巩固自动导致另一国安全的削弱的概念——开始影响到战略思考的时候，这些步骤在1946年引发了华盛顿的担心。从一开始，美国领导人对苏联意图的估计就存在着分歧，在对苏联行动感到苦恼之余，他们一致同意，必须制定政策，以展示美国保护其利益的意愿。这些政策又被克里姆林宫的当权者视为对自己的威胁。尽管每一方都把自己的行动看成是防御性的，但他们都因对方的动作而不断提高警惕。任何谨慎的一步在两国首都均激起了一种反应：对方的威胁正在上升。

1946年的选举结束后，杜鲁门的外交政策顾问提醒国人注意欧洲力量的崩溃和美国填补真空的重要性。但是，国会和美国人民不仅厌恶把自己与世界事务搅缠在一起，还渴望遣散军队和增加消费，杜鲁门的顾问视之为美国承担世界领导责任的主要障碍，这是一场国际关系精英分子的认知和大众压力（强势国家与弱势政府之间的悖论）之间的冲突。他们还就欧洲战后复兴中可能出现的难以逆料的困难发出了警告。马歇尔、艾奇逊、哈里

曼、威尔·克莱顿[1]和凯南并不担心苏联会进攻美国或西欧，他们担心遭受重创的西欧社会不能从战争打击中恢复过来，担心它们被当地共产党分子所颠覆。

他们的任务是让抱有敌意和主张削减预算的国会为美国的竞争对手的经济重建提供资助，目的是反对一种不易察觉的威胁。不久以前，他们以卸下国际责任为由说服美国人民批准加入了联合国，而今又不得不说服他们作出新的牺牲。他们决定使用苏联威胁要统治世界的说辞。他们并不认为这种进攻正在逼近，也没有为战争做准备。但是，他们把苏联人视为扩张主义分子和机会主义者，其所作所为超出了苏联的安全需要。中东地区，特别是希腊以及西欧正处于被当地共产党力量颠覆的危险之中。只有美国有能力能制止他们，如果它有这种意愿的话。

这就是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出笼的基本背景。按照弱势政府的范式，总统的权威不断受到国会的掣肘，特别是当政府这两个部门受到不同党派控制的时候。当然，这种紧张状态乃美国宪法缔造者有意而为之，目的是制约行政部门的权力。在实践中，对那些因为关注自己家乡选区的特殊利益而当选的议员而言，与紧迫的外交政策相比，国内特殊利益集团的要求才是他们优先考虑的问题。为了将国会的注意力集中到对外事务方面，并以之达到自己的目的，总统及其属下也许会挖空心思搞出一次国际危机。某种程度的危机会驱使立法机关服从总统，服从行政大权的魔力以及帝王般的总统职位，这在国内事务中司空见惯，而在对外事务中几乎总是如此。1947 年，通过夸大苏联的威胁，

---

[1] 威尔·克莱顿（Will Clayton，1880—1966），美国商人，政治家。早年从事棉花生意，1940 年进入政界，曾任进出口银行、商务部等部门高级官员，1944—1947 年先后出任主管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和副国务卿，长期负责美国对外经济政策，极力主张自由贸易，为美国取代英国的经济领导地位和实施马歇尔计划贡献良多。

杜鲁门政府误导了国会和美国人民，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国会和公众的支持，授权总统首先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然后再援助西欧。

也许，行政部门没有其他办法从共和党控制的第 80 届国会弄到金钱。杜鲁门及其顾问得到了他们希望的拨款，并为所有接受美国霸权的国家的非同寻常的物质繁荣打下了基础。然而，在此过程中，他们加强了美国国内那些敌视新政和敌视社会民主理想的势力，而且，他们还给了蒋介石的支持者以新的希望。

"安全困境"的情形再次出现。尽管马歇尔计划可能被视为防御性的，是为了保护西欧免遭可能的共产主义的颠覆，但它却被斯大林看做威胁。他的"防御性"反应是强化对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东欧国家的控制，这又引发了美国新的不安。随着对大同盟（the grand alliance）记忆的迅速消退，似乎没有办法使苏联或美国既能加强自己的安全又不使对方受到削弱。

1948 年 6 月，苏联对柏林的封锁增加了美国的担忧。斯大林正努力阻止创建一个德意志国家，因为它不仅能够挑战苏联在东欧和中欧的优势，而且能够抵消苏联自 1945 年以来获得的胜利果实。这种对抗与早先美苏之间的意见分歧已经大相径庭。美国的行动不仅是刺激因素，而且还充满了危险。斯大林必须冒更大的风险，努力阻挠美国向其目标迈进。但是，斯大林失败了，他不得不默认得到美国支持的德国强权不可避免的复活。

美国领导人不认为对苏联怀有任何敌意，他们关于对抗的理解也与苏联人相左。他们承认苏联在安全方面的需求，并让苏联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扮演某种角色。而苏联的反应是敌视的、侵略性的和不祥的。华盛顿的人士怀疑苏联人有统治欧亚大陆的企图，在他们威胁到美国安全之前，美国必须要加以阻止。对苏联的认知因斯大林主义体制而变得复杂起来。要信任苏联的政治体制是不容易的，因为无论是对自己的人民抑或它支配下的其他民族，它一贯采取封闭、秘密和残忍的统治方式，而这正是斯大

林主义的产物。

柏林封锁结束后，美苏关系明显敌对起来。但这两个国家还未真正成为敌人。他们避免了流血冲突，也没有什么迫在眉睫的问题可以使之分道扬镳。他们在重大利益上没有冲突。美国的优势力量保证了它自己以及盟国的安全，美国无意进一步扩大这种优势，也没有证据表明斯大林担心美国会进攻他的东欧缓冲地带。欧洲大陆的分裂也许不能让华盛顿或莫斯科的领导人满意，但他们还是能够容忍的。要美苏关系回到战争年代所达到的友好水平，使它们致力于急需解决的国内问题，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它终究没有成为现实。

斯大林准备巩固他的胜利成果，接受1949年的现状并推动和平共处。他的策略强化了美国的决心，增加而不是减轻了自己政权所面对的危险。他可不愿意和美国打仗。但是，即使是和平竞争也意味着苏联将努力争取与美国平起平坐、求得一个超级大国应有的尊重、继续其对美国意图的怀疑以及与美国争夺对边缘地带的控制。

国际体系的结构，即名义上的两极结构，继续塑造着美苏关系。1949年，两国政府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相互争夺的经验。在欧洲，美国划了一条界线，斯大林认为它与双方现有力量的对比并不相悖，因而就接受了。然而，苏联仍然在努力地争夺权力和影响，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开始摆脱战争的创伤，从而导致美国力量的相对下降，这些都使杜鲁门的顾问越发不能容忍。当看到非殖民化及其推动力量削弱了西方对边缘地带的控制时，他们更是满腹忧虑，于是就决心未雨绸缪，去应对即将到来的世界范围的争夺。

以迪安·艾奇逊和保罗·尼采之见，美国备战的主要障碍是杜鲁门削减国防开支的决定。总统的决定得到了国会和公众舆论的支持，直到1949年苏联爆炸原子弹之后，情况才有所改变。

核垄断的丧失迫使美国重新考虑常规力量的规模和部署。1950年 1 月，杜鲁门批准氢弹研制计划，重新审查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68 号文件所规定的政策，这两项政策的宗旨都是为了保持美国的优势。

在获知苏联拥有核能力之后，新一轮的忧虑又开始了。苏联领导人不接受美国对核武器的永久垄断。他们对马歇尔计划的忧虑或许是没有根据的，但是，他们对德国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感到恐惧以及为反对他们感知的威胁而决定加强军备，却不是没有理由的。然而，苏联力量的增强和苏联安全态势的改善又威胁了美国的安全和利益。苏联对核力量的拥有的确构成了这样一种威胁。

美国和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对抗。历史学家梅尔文·莱夫勒认为，美苏双方在对抗时行动都非常谨慎。[①] 可以想见，美苏之间的竞争经常会引发冲突。但是，使人最为惊异的可能是美国所宣称的遍及全球的利益范围，该利益不仅存在于中东地区，最终还横贯非洲和东南亚。人们容易把这归因于一种使命感、归因于威尔逊的国际主义、或者更简单一点，可能归因于美国作为世界最强大国家的时代已经来临的信念，美国要行为负责，要宽厚仁慈，要创建和监督这个新的世界秩序。美国毕竟是世界上确凿无疑的最强大的国家。它能够独自承担得起必须付出的短期消耗，以使之霸权得到普遍的接受。

与“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相关的问题，是美国允许苏联扮演何种角色。对苏联体制和斯大林主义的蔑视使美国不愿意与之建立伙伴关系。与斯大林政权打交道的历史经验妨碍了美国对苏联的信任。然而，苏联人已经太过于强大，因而不愿再忍受美国的支配地位，除非是被迫而为之。

---

① 梅尔文·P. 莱夫勒：《权力的优势》（斯坦福，1992 年）。

美苏竞争之所以变得敌对，并进而演变为冷战，主要是苏联政权的性质使然，它是一个强大而邪恶的独裁政权，一个使它自己的和所有被它控制的人民感到恐怖的残酷的极权主义国家，一个其秘密性质阻碍了对协议执行情况进行核查的封闭社会。宛如大多数革命政权一样，苏联人对传统外交程序和社交礼仪的价值的了解是缓慢的。与其沟通非常困难，而且他们对对方的怀疑总是展露无遗。

但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在这个问题上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促进他们心中的国家利益之时，总统及其外事顾问面临着两种选择。第一种显然是罗斯福、约翰逊、尼克松、里根和布什的选择，他们可以不顾国会和宪法的约束，去做他们认为的正确的事情，其解决问题的手段虽不光明正大但却非常必要。第二种选择是说服国会和全体国民相信他们治理国家的智慧。这又表现为两种情形。总统可以告诉人民事实真相，就像吉米·卡特承诺要做的那样；总统也可以告诉人民某些比真相“更清楚”的东西，正如迪安·艾奇逊要求哈里·杜鲁门所做的那样，也正如他笃信备至的所有伟大导师所做的那样。在此情形下，要想把事情表达得比其真相更为清楚，那就意味着不顾后果地夸大苏联威胁，夸大苏联在美国不希望见到的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让那些反共理论家极为高兴的是，他们能在事后辩驳说，既然苏联的威胁是如此之大，为什么杜鲁门不采取更多的行动？夸大苏联威胁的观念在美国生根发芽后，反过来又萦绕着杜鲁门、艾奇逊、凯南以及其他人等，使之难以解脱，并且似乎成为某些杜撰者自我意识的一部分。

作为这场有计划有步骤的对抗的明显后果，“安全困境”因美国人的如下观念而大为恶化：美国不威胁任何人，美国正服务于每一个人的最高利益，一些国家、特别是苏联，在其军事地位获得提高之后就一心想采取敌对行动。与其他大多数人不同的

是，凯南还能偶尔把苏联的行动视为对美国力量部署作出的防御性的反应。

在美国拥有核垄断和核优势的年代，由于不想招致它对苏联的核打击，斯大林与生俱来的审慎得到了强化。毫无疑问，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都打算对苏联和中国进行核讹诈，但是，对一个或另一个共产主义大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这种建议主要来自于那些狂热分子，从来就没有被白宫认真考虑过。美国对现状感到满意，它不愿发动一场针对一个大国的战争。美国的历史传统倾向于反对（尽管它们没能制止）侵略行动，它也确实希望在世界其他地区树立这种形象。

当苏联人开发出核能力和必要的运载系统之后，莫斯科和华盛顿的理论专家就断定战争已经没有了赢家。赫鲁晓夫认为，列宁的国际关系思想在热核时代已经过时，核炸弹并不遵守阶级原则。核战争的发动者，无论最终之输赢，将不得不忍受一次它不愿承受的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其所有的城市可能在几小时、或许是数分钟之内就成为废墟，数千万人几乎会立时毙命。避免战争、吓阻敌人的打击而非相互打仗，就成为苏联和美国战略力量的使命。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确实未拥有第二次核打击能力，但艾森豪威尔也是一个审慎的人。随后的苏美高峰会晤和随后的军备控制谈判增强了世人之如下感觉：两国不仅能借此和平解决相互间的分歧，而且还有助于避免相互间的直接对抗。[①]

然而千万不要忘记，苏美冷战造成了数百万人、甚至是上千万人的死亡。沃尔特·拉夫伯指出，在1945—1990年间，与战争有关的死亡人数达到了2180万，其中大多数是作为一个或另一个超级大国的代理人而命丧黄泉，或者成为其中一个超级大国

① 参见约翰·刘易斯·盖迪斯：《长期的和平》，尤其要参见罗伯特·杰维斯：《核武器革命的意义》（伊萨卡，1989年）。

提供的武器的牺牲品。[1] 朝鲜战争可能是发生在边缘地带的最危险的战争。国内冲突升级为国际冲突，并几乎演变为一场世界大战。批准金日成策划的进攻是斯大林在战后时代最严重的失算。杜鲁门派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的决定同样是误入了歧途。

就美国人而言，在美国对第三世界的许多干预中，对越南的干预是他们最为痛苦的一次，它给越南人民带来了难以置信的苦难，进一步削弱了已经动荡的美国经济，并损害了许多美国人在履行世界领导责任的借口下支持进一步冒险的意志。在阿富汗，苏联军队在试图控制这个桀骜不驯的邻国时首次付出了血的代价。但是，如果有一个美国或苏联士兵在战斗中丧命，或许就有多达两百个非洲、亚洲、中美洲和中东的人死于这些战争。在苏联帝国和作为反共堡垒而为美国支持的残暴政权所在的智利、萨尔瓦多、危地马拉、伊朗和韩国这样的国家里，有数百万人失去了基本的人权。

在第三世界，冲突几乎总是由内部或地区问题突然促成的，其中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的介入会给另一个超级大国的信誉或决心提出显而易见的挑战，并加剧了当地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这些冲突几乎没有威胁到苏联或美国的关键利益。然而，超级大国就是不能容忍当地人民对现状的挑战，除非挑战者愿意站到他们一边。随着引发核冲突的危险的日渐减少，干涉的诱惑总是那么让人难以抗拒。超级大国经常低估诸如古巴、以色列、朝鲜或越南这样的国家的自主意愿，并对其主要对手的阴谋诡计忧心忡忡。华盛顿和莫斯科都提出了诸如声名狼藉的“多米诺理论”这样苦心阐述的逻辑依据，以解释为何有必要在遥远的、未开化的地方消耗生命和浪费它们的钱财。

---

① 沃尔特·拉夫伯：《美国、俄国与冷战（1945—1990）》（第6版，纽约，1991年），第335页。

接下来，所有这一切都结束了。毫无疑问，已经终结的不是第三世界的动乱，而是超级大国试图控制世界的意志和能力。美国人的能力和意志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就已经摇摇欲坠，但是它坚持的要更久一些。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经历了一场难以控制的混乱之后，苏联在80年代中期就败下阵来。苏联社会的变化，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苏联军事学说的修改，更重要的还有苏联军事态势的改变，给了美国一个绝对难得的喘息时间。对于考验其决心的每一个挑战，美国人已经丧失了作出反应所必须的财政手段，在他们自己社会的紧张状态超出可以忍受的限度之前，苏联的崩溃使之得以宣告胜利。要找到一个能够支撑起美国的庞大军事机器的明确敌人或潜在的重大威胁，在20世纪90年代是不大可能的。胜利者美国是如此的虚弱，以至于在1990和1991年反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中，除需要苏联的支持外，还需要德国、日本、沙特和科威特来支付这场战争的费用。

国际舞台上的许多变化与冷战关联甚少，最有意义的是非殖民化、欧洲帝国的终结以及数十个新兴国家的出现。每个新兴国家都希望尽可能快地实现现代化，并分享一份长期以来只有宗主国才能享有的财富和权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催化剂，它削弱了帝国的力量，唤醒了殖民地的人民。在某些情况下，冷战的紧张状态也能影响赢得自由以及获得报偿的进程和代价。有时，冷战也会帮助第三世界的人民，以埃及人为例，如果没有超级大国的争夺，谁也不会想起他们，但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竟然能够玩弄莫斯科和华盛顿之喜怒哀乐于股掌之上。有时，超级大国支持的国内冲突阻滞了发展，安哥拉便是如此；或者带来了蔓延甚广的灾难和死亡，譬如在越南与阿富汗。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另一个破坏性遗产是以色列国的诞生，这个国家是世界努力把公正给予犹太民族的结果，在此之前，犹太人一直遭受世人的歧视和迫害，更受到希特勒可怖的摧残。但

是，犹太人回到他们古老的家园迫使成千上万不愿迁走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背井离乡。巴勒斯坦人与其阿拉伯邻居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着反对以色列人的战争，另一方面，双方也把超级大国拖人了这场角逐。苏联急于摧毁英国在中东的地位，它在1948年把起决定作用的捷克武器送交犹太定居者，从而奠定了后者胜利的基础。自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与埃及开始武器交易开始，苏联改弦易辙，向激进的阿拉伯国家提供了尖端军事装备和军事顾问，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90年才告终止。在20世纪60年代，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起初希望保持超然立场的美国成为以色列的主要支持者。当苏联援助阿拉伯人的时候，以色列就越发被视为反对该地区苏联代理人的美国利益的代表。1990年苏联对阿拉伯人援助的结束很快缓解了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力度，但是，即便没有冷战的背景，阿以之间的紧张状态也仍然在继续。

最后，德国和日本作为世界的重要力量再次崛起，东欧国家重获自由，一些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而独立，而其余的加盟共和国还在为明确它们新身份而不懈地奋斗。长期被共产主义压制的民族矛盾演变为国内冲突，这使人联想到20世纪初的岁月。冷战结束了，但世人还不知道和平是否已经到来。

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与年长美国人追忆的1945年的美国已经大相径庭。少数民族——天主教徒、犹太人、非洲裔美国人、讲西班牙语的美国人（Hispanics）、亚洲裔美国人——和妇女的境遇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尽管社会进步的空间仍然很大，但美国社会较前已大为开放，与1945年的情况相比，当今的开放程度之大实在难以想像。有些变化之所以出现，是受到了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宣布的为之奋斗的理想的推动。有些变化，例如美国社会中的天主教徒地位的提高，可能要归因于冷战，因为天主教会长期以来就是反对共产主义的急先锋，而且，在反对共产主义的征讨中，纽约州的斯佩尔曼红衣主教和威斯康

星州的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扮演了普通人心中天主教徒英雄的形象。1960年，约翰·F.肯尼迪当选为总统，宣告了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天主教问题的终结。

美国的财富分配制度还有许多有待改进之处，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它似乎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分配不公的许多情形——譬如说，1%最富有的美国人据有的财产比底层90%的人的财产总和还要多——只能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决定的。新政的拥护者致力于在美国人中间更合理地重新分配财富，但是，对手们已经成功地利用冷战粉碎了美国进步党人的主张。而且，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把国防支出——为了冷战而重整美国军备——作为一种操纵联邦预算的工具，增进了已经非常富有者的财富。

当21世纪的历史学家回顾冷战时代与冷战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影响时，超级大国造成的死亡和破坏给他们的印象肯定没有美国文化的影响和美国模式的成功带给他们印象更深刻，其明显的表现将是遍及世界的麦当劳、比萨屋和肯德基的特许连锁店以及蓝色牛仔装和摇滚乐。更重要的表现将是推进世界相互依赖进程的计算机和传真机。而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人权与日俱增的关注，对法治政府——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的期望以及对市场经济即将带来的奇迹的幻想。

当然，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受到了冷战岁月它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的深刻影响。亚洲裔美国人所占的比例有了极大的提高，除了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中国人之外，接触的增加还使许多朝鲜人、越南人、泰国人移居到美国。新移民对美国文化的拓展、对艺术、饮食和美的理念作出了巨大贡献。除了经营杂货店和饭馆，他们还供职于这个国家的医院和大学。他们给这个担心丧失职业道德的国家注入了新的活力。

就经济而论，20世纪40年代美国人的正确领导和深谋远

虑，使相互依赖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得以成为现实。美国不再拥有足以支配这一世界秩序的财富，许多成员在履行义务时采取了拖延应付的态度，但还是有许多国家嚷嚷着要加入进来。要美国学着与日本、欧盟甚至东盟分享权力看来不甚容易，但它又没有别的选择。

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任何时候都更为安全。恐怖主义将继续存在，而且也确实难以制止，但是，不论美国人多么愤怒，他们还是能容忍这种程度的暴力。世人对冷战时代的关注——由于苏联的存在和威胁而自有其道理——而今在迅速降低，对黑非洲地区、南美洲和南亚本来就不大的兴趣几乎消失殆尽。然而，美国也没有向冷战前期的美国领导人的大西洋主义[①]复归。诸如迪安·艾奇逊、乔治·鲍尔和乔治·凯南这号人一直试图将美国的注意力和力量都集中在欧洲、中东和日本，他们不认可世界其他地区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一旦控制了充足的石油以及西欧、日本与美国的工业力量，美国将在核杀戮之外的任何竞争中所向披靡。在20世纪90年代，像艾奇逊、鲍尔和凯南那样思考问题的人们希望关注整个东亚地区，密切注意中国的复兴以及台湾、香港、东盟和韩国的经济力量。

考虑到他们在20世纪60、70和80年代选择的领导人的品质与能力——滥用国家权力和胡乱处置国家经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人有很多值得庆幸的地方。不管怎么说，他们总算活了下来。他们没有面临外部的威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有东西可吃。他们不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但是，如果他们愿意为此努

① 大西洋主义（Atlanticism），指加强西欧与北美各国、特别是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国间合作的主张。对美国而言就是联合西欧特别是英国，参与或干预国际事务。—译者

力工作，并且能够找到能使其作出适当牺牲的领导人，世界第一的目标仍然可以实现。尽管美国有许多缺点，但是毫无疑问，无论冷战时期的世界给人类带来了多少苦难，但是，与一个没有美国抵制约瑟夫·斯大林构想的世界相比，它的确是一个更好的所在。

参考文献短论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point to be apprehended by the student of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Cold War era is that the documentary record is incomplete, that American and British archival material is being released thirty years after the events at best. Moreover, there is evidence indicating that the integrity of the American record has been compromised. Other materials, Chinese and Soviet for example, are being released very selectively, often to privileged nationals. Little was seen by Western scholars before the mid-1980s – and not much more has been seen since. Finally, most of what we know about the late 1960s and thereafter is provided by participants who are never disinterested, journalists, and those who write "contemporary history," an oxymoron if there ever was one.

A second point worth noting is that enormously important work, much of it theoretical, has been done by 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political economists. In particular the work of Robert Gilpin, Robert Jervis, Peter J. Katzenstein, Robert O. Keohane, Stephen D. Krasner, and Jack Snyder provides valuable guides to an understanding of what happened and why – and what is likely to happen tomorrow. See, for example,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1987);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1976); Katzenstein, ed., *Between Power and Plenty* (Madison, 1978); Keohane, *After Hegemony* (Princeton, 1984);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1983); Snyder, *Myths of Empire* (Ithaca, 1991).

The standard survey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1945 is 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the 6th edition of which was published in 1991. Interesting overviews of the entire era, alluding to Henry Luce's vision of an "American Century," can be found in Thomas L. McCormick, *America's Half-Century* (Baltimore, 1989), and William Pfaff, *Barbarian Sentiments: How the*

American Century Ends (New York, 1989). And every issue of *Diplomatic History* has a new and ofte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some episode from the American involvement in world affairs after 1945.

1. At War's End: Visions of a New World Order

Robert Dallek,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2–1945* (New York, 1979), remains the most useful introduction to FDR's thoughts on world affairs. The quest for a liberal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can be followed from the 1920s through the 1940s in Michael J. Hogan, *The Marshall Plan* (Cambridge, 1990). Richard N. Gardner, *Sterling-Dollar Diplomacy*, expanded edition (New York, 1969), and Alfred E. Eckes, *A Search for Solvency* (Austin, Tex., 1975), are important to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Bretton Woods agreements. The British perspective is most accessible in the relevant chapters of Roy F. Harrod, *The Life of John Maynard Keynes* (New York, 1951). Gabriel Kolko, *Politics of War* (New York, 1968), offers the least flattering evaluation of American ends leading up to Bretton Woods.

John Lewis Gaddis's classic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1947* (New York, 1972) captures Roosevelt's sinuous path toward the goal of maintaining the Grand Alliance after the war. Herbert Feis, *The China Tangle* (Princeton, 1953), is still the best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roblems with wartime China. See also Michael Schaller, *The U.S. Crusade in China, 1938–1945* (New York, 1979). The most balanced account of Chiang Kai-shek's wartime diplomacy is John W. Garver, *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 (New York, 1988). Two very different efforts to read Stalin's mind are William O. McCagg, Jr., *Stalin Embattled, 1943–1948* (Detroit, 1978), and William Taubman, *Stalin's American Policy* (New York, 1982). Gar Alperovitz, *Atomic Diplomacy: Hiroshima and Potsdam*, expanded and updated edition (New York, 1985), is the best-known indictment of Truman's use of the atomic bomb against Japan, but see J. Samuel Walker, "The Decision to Use the Bomb: An Historiographical Update," *Diplomatic History* 14 (1990): 97–114. Roosevelt's decisions on with whom to share the bomb's secrets and from whom to withhold them can be followed in Martin J.

Sherwin, *A World Destroyed* (New York, 1975). Two excellent volumes on the subsequent importance of nuclear weapons are Gregg Herken, *The Winning Weapon* (New York, 1980), and Robert Jervis, *The Meaning of the Nuclear Revolution* (Ithaca, 1989).

2.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The American domestic context is portrayed vividly in Eric Goldman, *The Crucial Decade – and After, 1945–1960* (New York, 1960), and with more concern for women and minorities in William Chafe, *The Unfinished Journey* (New York, 1986). H. Bradford Westerfield, *Foreign Policy and Party Politics* (New Haven, 1955), remains the best account of how partisan politics contributed to the shaping of the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hip.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study of Truman's foreign policy is Melvyn Leffler's magisterial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d War* (Stanford, 1992). Deborah Welch Larson, *Origins of Containment* (Princeton, 1985), provides a fascinating psychological study of how the policy toward the Soviet Union developed.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is traced by Robert A. Pollard in *Economic Securit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5–1950* (New York, 1985). Richard M. Freeland argues persuasive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uman Doctrine and the Origins of McCarthyism* (New York, 1972). Joyce and Gabriel Kolko offer a densely written but otherwise engaging Marxist analysis in their *Limits of Power* (New York, 1972). Joseph M. Jones, *The Fifteen Weeks* (New York, 1955), is the standard work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Truman Doctrine and the Marshall Plan by a participant.

The Wise Men (New York, 1986) by Walter Isaacson and Evan Thomas is a highly readable examination of the thought and interactions of six major policymakers, but Dean Acheson's ow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New York, 1969) is still essential. There are too many books about George Kennan whose own elegant writing and occasional profundities have led historians to exaggerate his importance. See, for example, Walter L. Hixson, *George F. Kennan: Cold War Iconoclast* (New York, 1989), and Anders Stephanson, *Kennan and the Art of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Mass., 1989). The most recent is

Wilson D. Miscamble, *George F. Kennan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47–1950* (Princeton, 1992).

Lawrence Kaplan's *NATO and the United States* (Boston, 1988) is particularly helpful on the origins of NATO. European perceptions and activities are best explored with Geir Lundestad, "Empire by Invit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1945–1952,"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3 (1986): 263–77. See also Alan S. Milwar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Europe, 1945–1951* (Berkeley, 1984), and Anton W. dePorte, *Europe Between the Superpowers*, 2d ed. (New Haven, 1986). Wolfram F. Hanrieder, *Germany, America, Europe: Forty Years of German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1989), offers a wealth of information and insights for the entire postwar period. Marshall D. Shulman, *Stalin's Foreign Policy Reappraised* (New York, 1966), suggests Stalin was seeking to retreat from confrontation on the eve of the Korean War.

Marc S. Galliccio, *The Cold War Begins in Asia* (New York, 1988), looks at American fears of Soviet influence in East Asia in 1945. Steven I. Levine, *Anvil of Victory* (New York, 1987), explains the American response to Communist successes in Manchuria in 1946. The major works on relations with China are Dorothy Borg and Waldo Heinrichs, *Uncertain Years: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1947–1950* (New York, 1980), and Nancy B. Tucker, *Patterns in the Dust* (New York, 1983). See also Robert J. McMahon, "The Cold War in Asia: Toward a New Synthesis," *Diplomatic History* 12 (1988): 307–27, for a superb overview, especially of work at variance with the prevailing Tucker-Cohen thesis. For Japan, see Michael Schaller's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New York, 1985), John Dower's *Empire and Aftermath* (Cambridge, 1979), and Carol Gluck's discussion of the issues and literature, "Entangling Illusions – Japanese and American Views of the Occupation," in Warren I. Cohen, ed., *New Frontiers in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New York, 1983), 169–236. The early American involvement in Southeast Asia is most accessible in Gary Hess, *The United States Emergence as a Southeast Asian Power, 1940–1950* (New York, 1987). See also Robert J. McMahon, *Colonialism and the Cold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truggle for Indonesian Independence, 1945–1949* (Ithaca, 1981), on Indonesia.

Bruce Cumings,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2 vols. (Princeton, 1981, 1990), is essential reading for the serious student of the war. James Matray, *The Reluctant Crusade* (Honolulu, 1985), and Burton I. Kaufman,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1986), are more accessible. Rosemary Foot, *The Wrong War* (Ithaca, 1985) and *A Substitute for Victory* (Ithaca, 1990), are major contributions to understanding American strategy during the war and in the peace negotiations. Allen S. Whiting's classic *China Crosses the Yalu* (Stanford, 1960) should be supplemented by Zhang Shuguang,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 (Ithaca, 1993), which relies heavily on recently released cables exchanged between Mao and Stalin. In recent conferences in Moscow, Washington, and East Lansing, Russian scholars have been forthcoming about Soviet complicity in the North Korean attack, but Nikita Khrushchev's memoir, edited by Edward Crankshaw and translated by Strobe Talbott as *Khrushchev Remembers* (Boston, 1970), is all we have in print at this time.

Three important articles are Okonogi Masao, "The Domestic Roots of the Korean War," in Akira Iriye and Nagai Yonosuke, eds.,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New York, 1977), 299–320; James I. Matray, "Truman's Plan for Victory: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Thirty-eighth Parallel Decision in Korea,"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66 (1979): 314–33; and Robert Jervis, "The Impact of the Korean W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4 (1980): 563–92.

4. New Leaders and New Arenas in the Cold War

Eisenhower "revisionism" was a growth industry for historians in the late 1980s and early 1990s, as archival material for the 1950s was declassified. Richard A. Melanson and David Mayers, eds., *Reevaluating Eisenhower* (Urbana, Ill., 1987), is a convenient place to start. Ronald W. Preussen, *John Foster Dulles* (New York, 1982), is the best of the current biographies. Richard H. Immerman, ed., *J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 Diplomacy of the Cold War* (Princeton, 1990), contains a

number of superb essays. Immerman's own book, *The CIA in Guatemala* (Austin, Tex., 1982), is a very good account of how Eisenhower got things done, as is Fred I. Greenstein, *The Hidden-Hand Presidency* (New York, 1982). Burton I. Kaufman, *Trade and Aid: Eisenhower'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Baltimore, 1982), delivers what it promises.

Warren I. Cohen and Akira Iriye, eds., *The Great Powers in East Asia, 1953–1960* (New York, 1990), includes the perspectives of British, Chinese, Japanese and Soviet, as well as American scholars. The Chinese essays are especially interesting. Akira Iriye and Warren I. Cohen, 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in the Postwar World* (Lexington, Ky., 1989), has substantial material on the 1950s, from Japanese and American scholars, economists and political scientists as well as historians.

Robert J. McMahon is thoughtful as always in "Eisenhower and Third World Nationalism: A Critique of the Revisionist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1 (1986): 453–73. On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and Castro, see Richard E. Welch, Jr., *The Response to Revolu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uban Revolution, 1959–1961* (Chapel Hill, 1985). Stephen Rabe, *Eisenhower and Latin America* (Chapel Hill, 1988), is cast more broadly. Diane Kunz, *The Economic Diplomacy of the Suez Crisis* (Chapel Hill, 1991), provides a fresh approach to a battered subject.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volume on the Suez crisis is W. Roger Louis and Roger Owen, eds., *Suez 1956* (New York, 1989). John C. Campbell, *Defense of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1960), is still useful for understanding the designs of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in the region. Howard Palfrey Jones, Eisenhower's ambassador to Indonesia, relates the pathetic tale of being undermined by Washington and especially the CIA in his efforts to woo Sukarno in *Indonesia: The Possible Dream* (New York, 1971). George M. Kahin, *Intervention* (New York, 1986), is excellent on Indochina.

Useful works on the Soviet side include Adam Ulam, *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 (New York, 1974), William Zimmerman, *Soviet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56–1967* (Princeton, 1969), and Bruce D. Porter, *The USSR in Third World Conflicts* (Cambridge, 1984), as well as *Khrushchev Remembers*, cited earlier.

Thomas Paterson, ed., *Kennedy's Quest for Victory* (New York, 1989), is the best place to start the study of the early 1960s. Warren I. Cohen, *Dean Rusk* (Totowa, N.J., 1980), is more revealing than Rusk's own story, *As I Saw It* (New York, 1990). See Gordon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Stanford, Calif., 1990), for some especially provocative suggestions on Kennedy's policy toward China.

The Berlin crisis has not received as much recent attention as has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It can be studied in Philip Windsor, *City on Leave* (London, 1963); Jean Edward Smith, *The Defense of Berlin* (Baltimore, 1963); Robert M. Slusser, *The Berlin Crisis of 1961* (Baltimore, 1973); Jack M. Shick, *The Berlin Crisis, 1958–62* (Philadelphia, 1972). See also the relevant portions of Alexander L. George and Richard Smoke, *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1974), and Wolfram F. Hanrieder, *Germany, America, Europe: Forty Years of German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1989).

The history of the missile crisis has benefited enormously from a series of conferences involving American, Cuban, and Soviet participants. It is apparent the world was even closer to nuclear war than we had imagined previously. See James G. Blight and David A. Welch, *On the Brink* (New York, 1989), and Raymond L. Garthoff, *Reflections o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rev. ed. (Washington, D.C., 1989).

6. America's Longest War

An unusually wide range of documentation has been available on the war in Vietnam since the "Pentagon Papers" were first published in 1971.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istorical Office subsequently accelerated publication of the relevant volumes of the *Foreign Relations* series.

George Herring, *America's Longest War*, 2d ed. (New York, 1986), remains the single most valuable book on the war in Vietnam. In *On Strategy* (Carlisle Barracks, Pa., 1981), Harry Summers explains how the war could have been won. Other recent books of interest include Gabriel Kolko's dense *Anatomy of a War* (New York, 1985) and

Timothy J. Lomperis's *The War Everyone Lost – and Won* (Baton Rouge, 1984). Marilyn B. Young, *The Vietnam Wars, 1945–1990* (New York, 1991), is a powerful statement by a leading historian and antiwar activist. Lomperis, *Reading the Wind* (Durham, N.C., 1987), is a valuable analysis of the fictional and memoir literature.

7. The Rise and Fall of Détente

The single most valuable book for the Nixon, Ford, and Carter years is Raymond L. Garthoff, *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 (Washington, D.C., 1985). Although ruthless editing might have produced a better book at half the length, it is a gold mine of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a thoughtful midlevel participant. Henry Kissinger's two-volume memoir, *The White House Years* (Boston, 1979) and *Years of Upheaval* (Boston, 1982), is self-serving but nonetheless essential reading. William Hyland, *Mortal Rivals: Superpower Relations from Nixon to Reagan* (New York, 1987), is a useful study by another midlevel participant.

The complex character of Richard M. Nixon is deciphered only in Garry Wills, *Nixon Agonistes* (Boston, 1970). Good critical accounts of the Nixon-Kissinger years are provided by the journalists Tad Szulc, *The Illusion of Peace* (New York, 1979), and Seymour Hersh, *The Price of Power* (New York, 1983), the latter probably a trifle severe for the taste of most readers.

Zbigniew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New York, 1983), is informative, especially of the author's efforts a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to usurp power once reserved for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go, the memoir rivals Kissinger's – but lacks the self-deprecating wit that was always Henry's charm. Instead of Carter's memoir, look to Gaddis Smith, *Morality, Reason and Power* (New York, 1986), for an understanding of Carter's foreign policy efforts. Cyrus Vance tells his own story in *Hard Choices* (New York, 1983).

Given the limited documentation available,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are covered surprisingly well. Robert S. Litwak, *Détente and the Nixon Doctrine* (Cambridge, 1984), neatly indicates the contrasting expectations each side had of détente. Joseph S. Nye, Jr., *The Making of America's Soviet Policy* (New Haven, 1984), contains several

useful essays. Harry Gelman, *The Brezhnev Politburo and the Decline of Détente* (Ithaca, 1984), is vintage Kremlinology. The Soviet thrust in the Third World characteristic of the late 1970s is analyzed nicely in Rajan Menon, *Soviet Power and the Third World* (New Haven, 1986), and Jerry Hough, *The Struggle for the Third World* (Washington, D.C., 1986). David Holloway,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Arms Race*, 2d ed. (New Haven, 1984), focuses on the other critical issue in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1970s.

For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ee Harry Harding, *A Fragil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 (Washington, D.C., 1992). John W. Garver, *China's Decision for Rapprochemen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1968–1971* (Boulder, Colo., 1982), is interesting and suggestive. See also Michel Oksenberg, "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61 (1982): 175–95.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is offered in David Shambaugh's fascinating analysis of the views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elite, *Beautiful Imperialist* (Princeton, 1991). William B. Quandt, *Decade of Decisions: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1967–1976* (Berkeley, 1977), and Gary Sick, *All Fall Down* (New York, 1985), are excellent on Arab-Israeli relations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American position in Iran respectively. On Iran, see also James A. Bill, *The Eagle and the Lion* (New Haven, 1988). Oksenberg, Quandt, and Sick all served 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For economic issues, especially the collapse of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Joanne Gowa, *Closing the Gold Window: Domestic Politics and the End of Bretton Woods* (Ithaca, 1983), and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1987), are most helpful.

8. In God's Country

The journalist Lou Cannon has been studying Ronald Reagan for a very long time and his *President Reagan: The Role of a Lifetime* (New York, 1991), is the most knowledgeable and the best-balanced biography. Another journalist-cum-historian, Don Oberdorfer, has written a valuable portrait of Reagan's metamorphosis from apocalyptic horseman to Gorbachev's partner in the quest for peace. See his *The Turn: From Cold War to the New Er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1983–1990 (New York, 1991), based heavily on interviews with George Shultz. See also Michael Mandelbaum and Strobe Talbott, *Reagan and Gorbachev* (New York, 1987), and Talbott, *Deadly Gambits* (New York, 1984). A very thoughtful, accessible overview of the Reagan years is Robert W. Tucker, "Reagan'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68 (1989): 1–27.

The Soviet side of the 1980s is approached most easily through Seweryn Bialer, *Politics, Society, and Nationality Inside Gorbachev's Russia* (Boulder, Colo., 1989), and Seweryn Bialer and Michael Mandelbaum, *Gorbachev's Russia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oulder, Colo., 1988). See especially articles by Robert Legvold and Bialer. The articles in Marshall D. Shulman, ed., *East-West Tensions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1986), are also helpful – see the essays by Elizabeth K. Valkenier, Donald S. Zagoria, and Frances Fukuyama in particular.

The historical context for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entral America is provided by Walter LaFeber, *Inevitable Revolutions* (1984). For a more contemporary focus see Nora Hamilton et al., *Crisis in Central America* (Boulder, Colo., 1988); Mary B. Vanderlaan, *Revolution and Foreign Policy in Nicaragua* (Boulder, Colo., 1986); Robert A. Pastor, *Condemned to Repetition* (Princeton, 1987); and Tommie Sue Montgomery, *Revolution in El Salvador*, 2d ed. (Boulder, Colo., 1990).

Conclusion: America and the World, 1945–1991

In addition to works already mentioned, see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1987); David P. Calleo, *The Imperious Economy* (Cambridge, Mass., 1982); Richard Rosecrance,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New York, 1986); and 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Oxford, 1987).